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央情报局50年（上）



中央情报局 50 年

一、初生牛犊

英国鸡，美国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不存在统一的情报机构。除了专管国内的联邦调查局外，美国没有从事国外情报工作的统一的机构。国家的情报活动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各个情报机构工作任务重叠，各自为政，收集的情报信息七零八落，缺乏整体性、协调性，人员素质低下，技术手段和工作方法十分落后。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美国立国以来，周边无强，因此美国朝野上下普遍认为不存在直接的外来威胁。三十年代，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有一次闻知国务院情报机构拆检信件和窃听通讯时，勃然大怒，他说：“正人君子绝不偷看他人信件！”于是下令取消了这些特工业务。史汀生的这番话后来被人们作为愚昧无知的名言而津津乐道。其实，在当时的美国，对秘密情报工作的态度正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现实促使美国对情报工作进行重新认识。1940年12月，罗斯福总统委派密友、社交广泛的华尔街律师威廉·多诺万赴英国、巴尔干、北非和地中海等战区考察谍报工作经验。

英国情报机构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世界上属于老字号。英国非常希望美国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情报机构，在那里多诺万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英国谍报机构首脑孟席斯向多诺万介绍了英国谍报工作的经验，并特别强调了美国组建统一情报机构的迫切性。多诺万在伦敦期间，还受到丘吉尔首相和乔治六世国王的接见。丘吉尔就谍报工作问题不厌其烦地“开导”多诺万。1941年3月，多诺万回到美国。他在英国谍报官员斯蒂文森的支持下，竭力主张仿效英国的方法，建立统一的美国中央情报机构，得到罗斯福的赞同。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下令成立美国情报协调局，由多诺万出任局长。该机构是美国最早的一个情报联合机构。当时，情报协调局主要从事对敌国的战略情报研究，收集有关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供总统决策时参考。他们还承担了一些对外宣传活动，以配合政府的对外政策。

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分为公开和隐蔽两部分。公开活动主要是从事情报的分析和研究。招聘来的学者大多在研究分析处，这里把学者的研究方式首次运用于情报工作领域。他们在华盛顿雾谷的几栋破烂不堪的大楼里工作，监听轴心国的广播，钻研农业报告、工业统计、科技杂志和当地的报纸，了解德国占领区发生的一切。

该局的隐蔽工作仿效了英国特别行动执委会的职能，主要在德国敌后从事破坏、游击战等活动。美国海军情报部的“K”是管理密探的影子机构，后来被情报协调局接管，成为其秘密工作的主要部分。情报协调局和后来的战略情报局共有5个专业部门：秘密情报处，从事谍报工作；特别行动处，从事破坏与颠覆活动；反情报处，从事防谍工作，并执行特别行动处的工作；心战行动处，制造和传播“黑色”信息；作训处，训练打入敌占区的游击队。此外，还有财务管理、通讯联系、人员招聘和训练等后勤部门。

研究开发处是由发明家和科学家组成的秘密部门，负责研制和开发情报工作、颠覆行动所需要的工具，为潜入敌区的特务制造伪钞和身份证，生产特工使用的武器，包括无光子弹和无声手枪和各种爆炸装置。一种叫做“凯西·琼斯”的精巧装置专门用于破坏铁路，它用磁铁吸在火车头和电眼的下部，以保证火车在进入隧道中爆炸，这样造成的损失就更大。

研究开发处处长斯坦利·洛弗尔是个异想天开的幻想家。他听说希特勒吃素，于是萌发了一个怪主意：在元首的蔬菜中注入雌激素，这样他的胡子就会掉光，声音变得像女人那样尖。听说日本人特别讲究个人卫生，他便发明了一种腹泻药，他认为可以把药物悄悄运往中国被日本占领的城市，那里的儿童在拥挤的街道上跟在日本兵后面，将药物喷洒在他们的臀部上，透过裤子，就能刺激日本兵腹泻，将稀屎拉在裤裆里。

在建立特别行动处的过程中，多诺万倾听英国人的建议，并接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英国秘密战专家在安大略湖加拿大一侧悄悄开设了一所训练学校，教授美国人各种隐蔽行动技能：制图、暗杀、爆破、徒手格斗……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情报协调局由最初的几十人猛增到六百多人。它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记者、银行家、律师、大学生、商人、歌星、演员、农场主和店小二，其中大多数人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甚至连如何领取纸张这类机关工作常识都很陌生。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都成了行家里手。罗斯福对多诺万的工作十分满意。

然而，情报协调局的对外情报力量毕竟人微力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12月10日，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对美宣战。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引起巨大震动，情报部门事先对日本突然袭击的意图竟然一无所知（有关日方袭击的预报在情报部门之间被搁置起来），而多诺万是在接到罗斯福电话之后才得知此事的。

同许多求胜心切的美国人一样，情报协调局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提出了不少荒唐无稽的作战方案，有人建议轰炸日本火山，以便造成火山喷发，将日本埋葬在熔岩和灰烬中，由于这个计划实在太离谱，最终没有实施。

也许出于西方人对黑色精灵蝙蝠的敬畏，情报协调局听说日本人害怕蝙蝠，于是制定了“蝙蝠轰炸”的计划，罗斯福总统竟认真采纳了。为此，美军捕获了数十万只北美大蝙蝠，在预制好的天罗地网中对这些小动物进行“训练”，使它们习惯于栖息在日本式的民宅。军方人员还在蝙蝠身上捆上一种特殊的微型定时燃烧弹，以便让蝙蝠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放一把火，烧毁民宅，引发更多、更神秘的大火灾。

“轰炸”开始了，由美军第21轰炸机司令部出动的B—29轰炸机在日本天空下了一场“黑雨”，结果，许多蝙蝠没等落地就在高空中冻死了，未死的也是奄奄一息，再没能飞起来，更不用说去放火了。而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根本就不怕蝙蝠那玩意儿！

荒谬的举措交织着人们的愤怒，严酷的现实粉碎了种种臆想。激动过后，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索、争论、再思索……

珍珠港事件的沉痛教训使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建立强大的对外情报机构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接受多诺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将情报协调局与军方情报力量合并起来，成立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它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由多诺万担任局长。战略情报局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它集情报分析和秘密行动于一体（这不同于西方其他国家）开展工作。该局成立后，队伍迅速扩大，其顶峰时期，花名册上的在编与临时工作人员达25000人之多。战略情报局在世界各地设立情报网点，主要从事干扰破坏、搜集情报、破译密码、反间谍、展开心理战、制造和散布假情报等业务。

在接受战略情报局局长的任命前，多诺万提出了三个条件：1.只向总统汇报工作；2.由总统指令政府所有部门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帮助；3.使用总统的秘密经费。罗斯福总统接受了多诺万的要求，并由总统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下令成立了战略情报局。这样，新机构伊始便“带有一种军事单位的味道”，而不是作为战争的临时机构存在；它拥有只向总统负责、独立预算等令人眼红的特权。实际上，战略情报局就是日后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多诺万身强体胖，以开拓性著称。他不注重军衔、年龄和资历，唯才是举。他关心的是一个人能干些什么，即使有鸡鸣狗盗之术，他也要派上用场。他经常说：“‘尽善尽美’是很好的敌人。”作为美国中央情报机构的创建者，多诺万在二战时期热情接纳文职人员，选拔了一大批年龄悬殊的各色人才，其中有4人日后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在瑞士指挥对德谍报网；曾经当过记者并会见过希特勒的赫尔姆斯协助领导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科尔比作为杰德堡突击队员空降到挪威和被占领的法国执行破坏任务；凯西建立了潜入德国的谍报小组。在中情局正式成立后，局内绝大多数的高级职位都由战略情报局时期的老特工把持着，著名的有威斯纳、安格尔顿、克莱因、赫尔姆斯等。还有一些专业人才，例如破译密码的专家威廉夫妇等都被重用和“保存”起来。

这些战略情报局时期的特工被美国情报界称为“第一代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当初接受的是英国人的训练，并在二次大战中得到考验和提高。尽管多诺万后来被杜鲁门总统罢免，但是建立中央情报局的基本框架以及由立法所确定的地位都没有超出当初多诺万提出的构想范围。美国人特别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代特工对他推崇备至，他被公认为“中央情报局之父”。多诺万逝世后，中央情报局特地设立了“威廉·多诺万奖”，以纪念这位建立美国统一情报基业的鼻祖，而且每逢中央情报局及其老特工人员们搞庆典时，会场正面总要高悬他的画像。尽管多诺万的照片一直挂在中情局总部的门厅里，然而他的“干儿子”、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凯西还不满足，他甚至想在总部大楼外建立多诺万的塑像以取代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的塑像。

在多诺万的众多门徒中，艾伦·杜勒斯在当时的名气最大；就以后在中央情报局的建树来评价，杜勒斯和威廉·凯西是“佼佼者”，他们在美国的情报界和国际秘密战线上都留有重要的影响。

北非战役。

战略情报局最初参加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是北非战役。

1941年美国情报特工进驻北非的阿尔及尔（当时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不久情报协调局及其继任战略情报局接管了这里的情报机构。多诺万委派海军陆战队上校威廉·埃迪负责这里的情报活动。

北非登陆是对新生的战略情报局的考验。多诺万对参谋人员说，“我们整个未来将取决于火炬计划的结果和我们情报的准确性”。

埃迪用多诺万给他的200万美元扩大了现有法国地下组织的秘密网络，还与当地阿拉伯各部族建立了联系并开展活动。

埃迪的间谍搜集了大量有关北非海岸防御工事和法军兵力的情报，使北非远征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对作战条件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埃迪走路一瘸一拐，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兔崽子总是大难不死”，巴顿将军不无敬佩地说。甚至多诺万的死敌、陆军情报部部长斯特朗也对埃迪的出

色工作深表敬意。

盟军在北非的登陆行动一开始，埃迪就主张暗杀德国驻北非机构的负责人，其中有不少盖世太保成员。但这一建议被否定了。战略情报局继而派遣一位非洲黑人在纳粹官员的饮料中投放蒙汗药。在另一次行动中，埃迪劫持了德国的气象专家，把他塞进汽车的行李箱中，在去丹吉尔的途中差点闷死。总之，埃迪是个“杀手型”的特工官员。他经常说：“我从不忌讳给敌人放血”。

战略情报局还配合远征军实施欺骗行动，传出假情报说，盟军将在西非海岸的达喀尔登陆；至于集结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大量船只，他们则放风说这些船只只是为了救援被围困的马尔他。

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此时，德国人及其法国傀儡贝当政府才如梦方醒。守港法军仍效忠贝当，战斗十分激烈。战略情报局指挥法国地下组织举行了暴动，但是在许多地方战斗没有打响，因为——预定的武器弹药供应中断；一些抵抗组织没有接到及时动员的通知；上层机构有人叛变；部队的登陆地点错误了。这一切削弱了起义部队的力量，因此在美军进入北非首府阿尔及尔前，该市被抵抗组织和贝当部队轮番控制，巷战整整进行了两天。

战略情报局特工为登陆盟军带路、提供地图、介绍德军和法军的设防情况及其司令部的位罝。就在“火炬行动”（北非登陆）进行时，7个中队的德国飞机在500公里远的邦角半岛上空徒劳地盘旋，它们上当受骗，去追赶根本不存在的开赴马尔他的护航舰队。

11月10日，贝当政府的部队放下武器。

由于战略情报局的帮助，不可一世的德军王牌——非洲军团遭到来自埃及的英军和来自阿尔及尔的美军的前后夹击，最后被迫逃离非洲大陆。

101 突击队

1942年9月初，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批准战略情报局成立101突击队去缅甸开展游击战的行动计划。他对突击队队长卡尔·艾夫勒少校说：“我期待着你们在缅甸丛林中发出电闪雷鸣。”

艾夫勒在美国亲自挑选突击队员。“我让大家自愿报名，并告诉他们，这是在领取进入地狱的通行证。”后来他回忆说。

在亚热带森林中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在这里，巨大的水蛭和疟蚊会把人咬得遍体鳞伤，虎豹、毒蛇和蚂蚁更使人随时丧命。丛林异常潮湿，衣服和皮靴很快会腐烂，武器如不经常保养，也会很快锈蚀。

艾夫勒在印度边境纳积拉的一个茶叶种植园建立了训练基地，招募了数百名卡钦部落的青年作为101突击队的骨干。他们个子瘦小，身体结实，由于吃槟榔果，牙齿发黑，但他们非常适应丛林作战。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缅甸、泰国和老挝接壤的金三角地区，靠走私鸦片或参加当地军阀的雇佣军维持生计。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从卡钦人那里学会了在丛林生存的本领：寻觅和食用白蚁、野蜂、蛇类和果类，用暗箭和绊网猎取野猪——也用同样的方法与日军作斗争。卡钦人最擅长的武器是削尖的竹桩。把它插在敌人巡逻队出没的道路两侧，当日军遭到伏击时，常常躲进丛林隐蔽，结果就扎在尖尖的竹桩上。

1943年1月27日，由8名美国人和4名卡钦人组成的101突击队乘飞机空降到缅甸北部的丛林中，在那里建立了大本营。按照计划，一半人留守，

另外 6 个人带着食品、武器和 C 型熔注炸药去 100 多公里以外的铁路线执行爆破任务。来到岔路口，卡钦头领拔下一根头发，向空中一扬，头发慢慢飘到左边岔道上。“日本人在那边。”他很有信心地说。

两天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在路边埋设炸药。刚刚埋完，就被日军发现。一人在掩护时牺牲，其他人躲进丛林。一会儿，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5 个月后，这 11 名战士摆脱了日军的追击，回到纳积拉营地。他们炸毁了几公里长的铁路和几座桥梁，使附近的铁路线至少瘫痪半个月。

这场战斗标志着长期而艰巨的游击战在缅甸的开始。到 1944 年底，101 突击队在缅甸展开活动，破坏日军通讯、骚扰和伏击日军巡逻队，营救降落在丛林中的盟军飞行员。此时，101 突击队共有 566 名美国人和近万名卡钦人在战斗。他们毙伤敌军 5500 名，营救飞行员 200 多名。在战斗中，有 15 名战略情报局特工和 200 名卡钦人牺牲。

史迪威将军对卡钦人报告的杀敌数字有怀疑。一天，他问一位卡钦人，他们是怎样统计数字的。这位卡钦人打开腰间的一个盒子，倒出一堆像干果似的东西。

“那是什么？”史迪威不解地问道。

“日本人的耳朵。”对方回答。

“到欧洲放火”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 1942 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发出了“到欧洲放火”的著名号令。从 1942 年 10 月起，多诺万选派了大批战略情报局人员赶赴英国的圣·奥尔本斯接受训练，到欧洲执行“烧、杀、砸、抢、抓、炸、骗、偷”的特种军事任务。尽管战略情报局也从事一些搜集和分析情报的工作，但是“从多诺万到一般工作人员都瞧不起这一行”，“我们大家都渴望投身冒险，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实际上，战略情报局的基本工作就是搞颠覆活动。后来有不少人认为，重视搞颠覆，轻视搞情报，是当初多诺万留给中央情报局的一项“有害的、片面的传统”。

战略情报局派出的特别小组几乎遍及世界各地。除了太平洋海军和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部门不让其插足外，这些小组与法国的马基游击队、意大利的各派反法西斯主义者、缅甸的卡钦部落和西西里岛的黑手党一起行动；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他们也开展了广泛的行动。

在希腊，战略情报局为游击队提供了流动野战医院，用骡队从一个村庄拉到另一个村庄。在南斯拉夫，战略情报局在当地游击队的协助下，建立了简易机场，营救了 400 多名飞机机组人员。后来这些特别小组补充了人员和装备，与游击队并肩战斗，狠狠打击了向诺曼底方面急速增援的德军。

对于多诺万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厮杀和破坏，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撰写分析报告那类低级工作”。他甚至不顾别人的反对，亲自去冒险。盟军在欧洲发动攻势后不久，他坚持要去诺曼底。一名海军上将拒绝带多诺万登陆，因为他是了解“超级”密码机密的军官。他争辩道：“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敌人打中我们而死在诺曼底更光荣的了！”当他通过“走后门”来到诺曼底海滩时，德军的机枪子弹从附近向他猛烈射来。据当时同他在一起的布鲁斯回忆：多诺万说，他们不敢当俘虏，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如果陷入绝境，他们就应服毒。他向布鲁斯保证，没有毒药也别担心，“如果我们将要被俘，我会首先枪毙你，毕竟我是你的指挥官；然后我就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多诺万认为，在“霸王”战役中，战略情报局应该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至少与它的同行英同特别行动执行局扮演同样的角色。自1941年以来，特别行动执行局一直控制着盟国与法国抵抗力量的关系。按照多诺万的想法，英国人想的和做的都不够广泛：它的行动只限于跟这儿的一个间谍取得联系，同那儿的一个秘密电台报务员或地下组织打打交道，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这是英国人企图单独控制这场战争而采用小本经营的年头。到了1944年，战局已经大大改观，多诺万决心大干一番。他首先实施了一项向法国抵抗组织“马基”大规模提供武器的计划。

英国人反对这样做，他们想限制运往法国的物资。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各自为政的抵抗组织会用这些武器自相残杀，而不去打德国人；解放后，共产党分子还会利用这些武器去夺取政权。多诺万没有理睬这些，“仍然在战略情报局为共产党人留出一些位置”。他要的是尽可能多的武装起来的法国人去反对纳粹。

实事求是地说，在战略情报局时期，多诺万与英国人以及一些美国右翼人士不同，他能够吸收一些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共同战斗。曾有一名助手反对吸收左派分子参与战略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多诺万对此耸耸肩说：“只要能帮助打败希特勒，即使斯大林参加战略情报局，我也会同意的。”

1944年6月6日，百万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根据多诺万的请求，美国空军大大加快了供应速度，一次出动300架轰炸机向“马基”空投物资。

为了发挥“马基”的潜力，美国战略情报局与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实施了一项代号为“杰德堡”的军事行动计划。经英国人在英伦三岛训练的每个杰德堡小组由3~5名来自不同国籍的特工人员自愿组成。从6月6日那天起，91个杰德堡小组全副武装地空降到法国“马基”控制区，他们在那里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武装和训练游击队，协调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活动。根据盟军统帅部的指示，杰德堡小组与“马基”开始了全面的破坏活动，其重点在法国加莱海峡地区。

杰德堡小组与“马基”使用一种“旋风”炸药，这种炸药看上去像是牲口的粪便，其爆炸力足以粉碎汽车轮胎。他们将炸药撒在德军向诺曼底前进的道路上。杰德堡小组按照英国人教授的技术，破坏德军的通讯系统——在电线上扎进一个图钉，这样，使德国人找不到断路的位置。在6月6日以后的日子里，整个法国的公路路标几乎都指向相反的方向，给德军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杰德堡小组还教会“马基”人员在德军坦克的油箱里扔进一、两块方糖，使“虎”式坦克顿时趴窝。

仅在法国北部，杰德堡小组成功地破坏了100多家为德国人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说来方法很简单：一个杰德堡小组成员（或“马基”的代表）面见工厂经理，要挟他答应破坏某部机器，以免整个工厂被摧毁。大部分工厂经理都同意了。少数不同意者对杰德堡小组迅速而准确地招来飞机轰炸他们的工厂感到目瞪口呆。

仅在6月5日至6日的夜间，杰德堡小组与“马基”袭击了要他们担负的1050个铁路目标中的950个目标。6月7日，杰德堡小组和“马基”战士阻击德军向诺曼底增援。德国第二装甲师整整被拖滞了17天！对于这立竿见影的成效，战略情报局与美国空军迅速向“马基”增补物资。曾经指责多诺万“鲁莽行事，缺乏政治经验”的英国情报机构不吱声了，丘吉尔则高兴得连连搓着手说：“闹得好！闹得好！”

在诺曼底登陆期间，战略情报局参加了大规模的欺骗行动，使德军以为诺曼底登陆只是一种佯攻，盟军的真正意图在加莱半岛。

一时间无线电通讯频繁传向该地区的抵抗组织，扫雷艇和鱼雷艇出没于附近水域，加莱对面英国港口的盟军舰艇也大张旗鼓地进行准备。结果，这一计谋大获成功，把德军第 15 集团军共 22 个师从诺曼底正面牵制过去，与此同时，登陆的百万盟军犹如掘堤的洪水汹涌冲出诺曼底，冲向欧洲大陆。

在大反攻期间，战略情报局的两名年轻特工在法国抓住了正在发报的德国间谍，就地将他变成双重间谍，就像英国人使用德国间谍那样，让他向柏林发送假情报……

总之，战略情报局在法国南部的行动十分成功，他们获得了英国的最高奖赏，并受到第 7 集团军总指挥帕奇将军的表彰，他高度赞扬战略情报局“情报十分准确，行动极为迅猛”。

在众多的隐蔽行动中，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位心理战专家还设计了一个代号为“玉米片”的秘密计划，其目的是通过渗透德国邮政系统的方式将反法西斯宣传品散布到德国人的早餐桌上。例如，有一张美国印制的邮票，把希特勒画成骷髅，凶煞恐怖，象征着死亡与邪恶。战略情报局还仿制德国的邮包，在邮包中装满贴有邮票、盖有邮戳而里面夹有反法西斯文字内容的宣传品。这些邮包由美国空军在执行轰炸攻击任务时，投撒在德国的编组车站和火车站等地，装作从被炸毁的邮车中散落的邮包，从而进入德国的邮政系统。

英、德、苏等国也从事过这类活动。这类战时邮票的发行量并不很多，而且其中大部分在战争期间已经丢失，因此留存于世的极少。战后，一些二战时期的老间谍陆续卖出了收藏几十年的这类战时宣传邮票，这就增加了一些票源。在西德发行的米契尔邮票年鉴中，一枚美国的骷髅形希特勒头像邮票标价竟超过 4000 马克。一些宣传邮票当时曾由邮政人员当做真邮票而盖章邮寄，这种邮票的价格大大高于未使用过的邮票。

兵不厌诈

在诺曼底进攻之前，为了迷惑敌人，使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加莱半岛，盟军的诈骗机构积极工作。1945 年 5 月间，在东英格兰的港口河湾直到泰晤士河口，盟军停泊着 400 艘“登陆舰”，但实际上，每艘“登陆舰”不过是浮在油桶上用木头、管子和篷布搭起来的架子而已。这些舰只是由伦敦附近谢泼顿电影制片厂制造的，导演和指挥是前美国好莱坞的道具专家们，他们现在是战略情报局的成员，多诺万交给他们的任务是，“造假”。“登陆舰”的烟囱冒着烟，四周水面上油迹斑斑，缆索上晾着衣物，摩托艇在各舰之间开来开去，在水面上留下一道道航迹；德国侦察机甚至还能发现这些舰艇上的水手，他们不过是一些身穿军服的老弱病残。数千辆伪装的卡车灯光齐明，造成一支大型护航舰队的假象；“硬海滩”处灯火辉煌，让人一看就感到夜间正在紧张的装运。这支“入侵部队”规模宏大，可以装运整整一个军。在这支舰队背后的东英格兰和肯特郡，田野上到处是坦克、大炮、半履带车辆、堆积如山的弹药、行军灶、战地医院、部队营房和燃料供应站。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假的。

一天拂晓，一条脱缰的公牛低头挺起犄角向着一辆坦克冲去，只听“扑哧”一声，坦克就瘫在地上，原来它是橡皮做的，几百辆坦克都是这样。美国工兵的任务是在夜里制造履带痕迹。

盟军不仅进行物体伪装，还大搞音响伪装。一批好莱坞音响专家、男女配音演员被多诺万请到这里，同英美军队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合作，对德“播放”广播剧：在“美国第一军”的上空，充满了零星分散的无线电噪声，而蒙哥马利进攻部队的上空则保持静默。海峡对面德军的无线电情报人员收听到：“女王第一皇家警卫团报告，在辘重列车里发现数名民妇，没有特许证明，我们该怎么办？把她们带到加莱？”“请速运3吨润滑油到加莱，作为坦克修理时备用。”……

战略情报局还派出了最优秀的建筑师，同英国人一道在多佛尔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伪装输油码头，凡是真正的码头应该配备的设施和场地这里都有。鼓风机扬起冲天的尘土，好象码头建设在加紧进行。军警严守着码头区，国王和首相都“视察”过码头；艾森豪威尔司令曾在多佛尔宾馆的晚宴上向“建筑工人”致词；多佛尔市长曾发表谈话，“对本市建设的保密设施”表示满意。美英空军战斗机不断在上空盘旋，好象在保卫这一设施；每天晚上，皇家工兵在罐子里燃烧原油，使码头上烟雾弥漫；只有在德国侦察机和盟军战斗机“遭遇”之后，才让它们飞入码头上空，并且只让它们呆在3万3千英尺以上，使飞机无法分辨码头设施中的破绽。每当德军的远程大炮试图轰击码头时，便利用大量的金属钠制造火焰，造成“击中”和随后“起火”的假象。

造假已经成为巨大的工业，整个东英格兰象一个巨型电影制片厂。战略情报局徒弟们津津有味地看着英国教头的把戏：愤怒的牧师们写信给东英格兰报刊，严厉谴责“大批美国伞兵、法国和波兰军队进入该地区后，发生的道德崩溃”，“有174名少女被强奸或强奸，有46名少女未婚怀孕”，“在马汉姆和科格谢尔美军基地周围发现大量的避孕套”，好莱坞摄影师还拍下一些“村民痛骂美国佬”、“失身少女痛不欲生”的镜头，刊登在报纸上，以资“证明”。后来战略情报局官员向英方建议，黑锅不要都扣在美国人头上，英国人、法国人和波兰人也应摊派些风化问题，这样才比较公允。

1945年6月，盟军攻入欧洲大陆之后，开始对德国本土实施轰炸。于是欺骗德国战斗机就成为美英情报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方面，盟军飞机在空中播撒大量的金属箔，来干扰德军雷达，吸引德军夜战飞机飞向边界；另一方面开动无线电发射机，专门使用德军地勤系统电台的通讯频率，由美英情报机构会说德语的人员向德军飞行员发布假命令，或者与德军地勤控制人员通话，篡改他们的指示。战略情报局的普雷斯上尉回忆说——

7月初的一天深夜，我们的空军轰炸慕尼黑，沿途的德国战斗机起飞截击，我拿起话筒通告德军飞行员“大批敌人轰炸机正向柏林飞来”，我命令他们“立即增援柏林”，这一招很见效，100多架德国战斗机去“保卫”柏林，只有十多架德国战斗机拦截盟军轰炸机，结果我们把慕尼黑炸了个底朝天。

不久，我们的空军轰炸亚眠，我和英国人皮尔克斯负责“指挥”德军飞行员。皮尔克斯通知德国战斗机向东飞，“迎击”返航的美军轰炸机队。然而，德军地面指挥官从错误的德语发音中听出，是我们在利用他们的通讯系统发布假命令。他向夜战飞机发出警告说：“不要上敌人的当”，“我以施米特将军的名义命令所有飞机飞向亚眠。”皮尔克斯马上反唇相讥道：“不要听他的，他是假的！我是真正的施米特将军，你们都知道我的臀部上有颗黑痣，有黑痣的才是施米特将军！立即向东飞，不得放跑敌人！”德军指挥

官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他是个英美杂种，我的臀部没有黑痣……”皮尔克斯不容他讲完话，立即发话说：“英国人开始骂人了！”我拿起话筒也参加进来：“臀部有黑痣的施米特将军命令你们立即向东飞，立即向东飞！”同时，我们的“风笛”发射机向德军飞行员一个劲儿猛灌刺耳的噪音，那声音象一些苏格兰人疯狂地吹奏风笛。德国指挥官暴跳如雷，他喊道：“不是英国人在骂人，是我！是我！”皮尔克斯同德国指挥官对骂起来，我则一个劲儿催促德国战斗机向东飞。我敢说，此时德国飞行员的耳朵里是够受的了。这番混战，我们又赢了，德国战斗机三三两两散了队，有的向东飞，有的径直飞回基地，有的象没头苍蝇在空中徘徊。当我们的轰炸机完成任务后，我和皮尔克斯大汗淋漓地倒在椅子上。一位中士笑嘻嘻地说：“真不错，你俩刚才喝掉 17 杯咖啡！”皮尔克斯一下子坐了起来，“他妈的，我得赶紧上厕所！”

杜勒斯其人

在战略情报局许许多多的特工人员中，杜勒斯是最出色的一个。

1893 年 4 月 7 日，艾伦·威尔斯·杜勒斯出生在纽约的沃特顿，父亲是长老会牧师，母亲是国务卿福斯特的女儿。杜勒斯的祖父和叔父都当过美国国务卿（后来他的哥哥也当上了国务卿）。杜勒斯曾就学于奥本、纽约、巴黎和普林斯顿，戴上了文学硕士帽和法学博士帽。他还曾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教会学校任教。在印度，杜勒斯亲眼目睹骄横的英国绅士由 5 名印度人拉着布风扇煽凉伺候的奢侈生活，而印度人却穷困潦倒、衣不蔽体。从那时起，杜勒斯的内心就播下了仇视英国人的种子。这也影响到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待英国人的态度。杜勒斯在印度期间，学会了印地语和梵语，他还经常参加民族主义者的地下会议，结识了尼赫鲁家族的成员。印度早期的女权运动和民族运动给杜勒斯留下了深刻印象。1916 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勒斯参加了外交工作，在瑞士和奥地利当过情报官，他与众多的欧洲革命者保持着联系，从中猎取情报。一天，他收到一位俄国人的口信，要与之秘密会面，讨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这位俄国人正是流亡在国外、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当时，杜勒斯把对方看成是普通的流亡者，没有抽出时间去会见。后来他才知道，德国人当时正在与列宁接触，提出要将列宁秘密护送回国，发动革命，条件是同德国签署和平协议。列宁找杜勒斯的目的正是想把这个重要情况转告美国人，他或许还想与美国人商谈其他事情。杜勒斯年轻时的这次过失成了他终生的遗憾。以后，凡是任何人前来求见，杜勒斯再未回绝过。

1920 年杜勒斯与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结婚，有二女一子，儿子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头部负伤，终生残废。

1919 年，杜勒斯兄弟俩在巴黎共同作为美国出席凡尔塞和会代表团的成员。接着，他就任国务院近东事务科科长，后任美国驻北平参赞。1927 年 10 月，他与其兄一起参加了摩根·洛克菲勒系统的苏利文—克朗威尔律师事务所，并成为该事务所的合伙人。作为一名国际律师，杜勒斯结识了欧洲及德国政治和工业上的中坚人物，这为他后来的谍报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杜勒斯回到华盛顿，加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局。此时，他已逾不惑之年，在战略情报局新入伙的同伴中，除了局长多诺万已 57 岁之外，他就算是为数不多的大哥了。不久，他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驻瑞士情报站站长。杜勒斯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接到任命后，他提了个皮箱，

带着两套替换衣服，腰揣 100 万美元的信用卡就赶往瑞士。当时大战正在进行，他费了一番周折，总算在瑞士站稳脚跟。凭借他丰富的谍报工作经验和广泛的社会交往，他的情报网遍布于欧洲和北非，还打入了希特勒的军事情报局。当时，杜勒斯的主要情报来源是德国外交部的外交官弗里茨·科勒。

科勒是负责德国外交部与德军最高司令部联络工作的助理。每天他把来自德国驻世界各国大使馆和情报机构的电报筛选后整理出一份摘要。这一极为敏感的岗位使科勒这个反纳粹者有了帮助消灭第三帝国的机会。后来科勒被任命为外交部信使，这使他得以经常前往瑞士。

1943 年 8 月下旬，科勒怀揣鼓鼓的公文包偷偷溜进英国驻伯尔尼公使馆求见陆军武官。然而，生性多疑、以貌取人的英国年轻助理看到头发脱落、其貌不扬的科勒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认为来访者不是无赖、疯子，就是假间谍，于是毫不客气地将他撵走。吃了闭门羹的科勒当下找到了杜勒斯。

虽然杜勒斯起初也是狐疑满腹，但他决意“先看货，再定夺”。他审阅了科勒带来的情报资料，又经过美英情报专家分工查验，并通过与破译的密码电报比较后发现这些文件不仅可靠，而且非常重要，不可能是用做欺骗的诱饵。于是杜勒斯当下决定招募科勒。

科勒的代号为“乔治·伍德”，他提供的材料在华盛顿战略情报局被称作“波士顿系列”。在 14 个月中，他向杜勒斯提供了 1600 份德国外交部的绝密文件。其中有：德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谈到即将离开大西洋海岸的一支美国大型护航舰队出发的时间和预定航线，这使美方立即改变了航期，从而避免预先等候的德国潜艇的伏击；另一份电报证实了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把炼制特种钢的材料钨伪装成桔子运往德国的消息。那些文件还透露，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有个化名叫“西塞罗”的德国间谍。杜勒斯随即派出女特工尼丽亚·克普前往协助侦破，终于查出“西塞罗”的真实身份——“单干户”间谍、在英国使馆工作的土耳其仆人巴兹纳。后来巴兹纳感叹道：“最倒霉的就是我栽到了她的手里！”

随着战事的顺利进展，同盟国的兴趣转向远东。华盛顿渴望看到德国驻东京武官的报告，以便了解他们对日本的态度，但杜勒斯没有办法直接向科勒提出要求。最后他想出一个主意，让他在瑞士的“情妇”寄给他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她希望给儿子“买些这里的商店过去常卖的日本玩具……不知柏林是否有？”科勒悟出了字里行间的含义，在后来提供的一批文件中包含了直接来自东京的报告。科勒向杜勒斯提供的情报价值相当高，这对于处在大战期间的美国来说，实在是丰硕的成果。杜勒斯也为此受到高度赞扬。然而，处处以教师爷身份自居的英国秘密情报局（MI6，即军事情报六局，亦译为军情六处，负责国外情报搜集工作）非常嫉妒杜勒斯，其付局长克劳德·丹赛嘲讽他“在一堆破砖乱瓦面前顶礼膜拜”。英国方面的傲慢态度，更加激化了杜勒斯对英国人的不满。

1944 年 7 月 20 日“黑色乐队”（主要由德国陆军军官和军事情报局人员组成的反纳粹的密谋组织）刺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后，盖世太保对内加紧了控制，科勒无法再以旅游的名义前往瑞士了，他被迫停止提供情报。最后于 1945 年初逃往瑞士。虽然这一情报来源中断，但是杜勒斯的另外两个关系仍源源不断地向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弗里茨·莫尔顿是杜勒斯的又一个情报来源。莫尔顿的父亲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莫尔顿通过他父亲的朋友和同事，在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

伐克、苏联和南斯拉夫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同各地的情报关系进行联络。莫尔顿能吃苦耐劳，又有非凡的记忆力，他从不把了解到的情况写在纸片上，而是印在脑子里。为了及时向杜勒斯传递情报，他常常自己翻过阿尔卑斯山脉，潜入瑞士边境，把重要情报转告给杜勒斯或者他手下的人员。有时，莫尔顿乔装打扮成盖世太保人员，搭火车去维也纳，到他父亲处收集情报。通过和他父亲熟悉的为纳粹秘密工程工作的科学家的接触，他了解到德国人在佩内明德的V—1和V—2火箭发射基地的详细情况，及时报告给杜勒斯。显然，这些情报的价值相当高。战后，杜勒斯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莫尔顿。从此，杜勒斯与莫尔顿的关系亲上加亲了。

杜勒斯成功掌握的另一个情报关系是吉斯维乌斯。此人是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黑色乐队”的重要成员卡纳里斯上将的密友。他通过卡纳里斯了解到，德国反间谍机关的密码专家已经破译了驻伯尔尼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办事处和英国公使的密码，他及时通知了杜勒斯，而且还从笔记本上读了几段杜勒斯最近发往华盛顿报告的内容，以此证明情报的可靠性，这使美国避免了重大损失。他还向杜勒斯告发，英国在日本的大使馆里隐藏一名德国间谍；杜勒斯还从吉什维乌斯处证实了德国人发展火箭的计划。实际上，吉斯维乌斯的活动完全是在卡纳里斯局长的授意和保护下进行的。在18个月的合作中，杜勒斯掌握了有关“黑色乐队”反对希特勒秘密活动的内幕。

吉斯维乌斯每次从柏林回来，总要到杜勒斯的公寓去。这时，杜勒斯总是让女管家休假。一天晚上，多疑的女管家故意回来取围巾，撞上了刚到的吉斯维乌斯。她拿起他的帽子，发现上面有他名字的缩写字母：“H.B.G”。次日，她向德国领事馆告了密。领事馆的官员对吉斯维乌斯进行了盘问。他假装对他们的干涉十分恼火，声称他同杜勒斯一起吃饭是因为这个有名的美国间谍头子是他的最佳情报来源，并威胁说，如果他们向别人谈论此事，他就立即要求上级撤销他们的外交官职务。最后，他们再三向吉斯维乌斯赔礼道歉。通过这件事，杜勒斯发现自己身边的女管家原来是个德国间谍。为了保护吉斯维乌斯，杜勒斯暂时没有惊动她，但她最终没能逃出杜勒斯的掌心。

“日出”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艾伦·杜勒斯导演了一次精彩的、代号为“日出”的秘密行动。这在美国情报界一直传为佳话。

1945年2月，驻意大利的德军指挥官，通过纳粹德国党卫队的卡尔·沃尔夫将军向杜勒斯探询有关投降的条款。对于杜勒斯来说，沃尔夫是位“不速之客”。杜勒斯没有忘记1916年错过会见列宁的那次教训，他决定与对方接触。

战争期间的瑞士云集着各国的特工人员，他们几乎彼此都认识，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大家都在贝尔维尤旅馆里用餐。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一张桌子上坐着波兰的情报人员，另一张桌上坐着纳粹德国的间谍，不远处又有一张桌子聚着英国人，边上的一张桌子是美国人，他们围坐在一起。各国间谍无形中达成一种默契：彼此之间尊重对方的私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杜勒斯要同德同的高级将领接触，而又不被人发现或怀疑，实在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尤其是“日出”行动涉及面广，敌我双方参与此行动的人达数百名，而这些参加者在行动之前，都必须对此行动有所了解；有这么多知情者，要做到保密，不露出半点破绽，确实相当困难，万一走漏风声，被德国在瑞士的间谍知晓，必将重蹈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失败后的惨剧。

1945年2月25日，杜勒斯接到瑞士军事情报官马克斯·韦贝尔少校的电话，要求与杜勒斯紧急会晤。韦贝尔在瑞士的同盟国各情报机构之间担任联络工作。当晚，韦贝尔与杜勒斯共进晚餐。他告诉杜勒斯，在意大利的德军指挥官有向盟军投降的意图。这个消息是由一名意大利商人和一名瑞士商人透露给他的。临别时前，他要杜勒斯郑重考虑这件事。

对于来自意大利前线的又一次求和试探，杜勒斯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忱。当时，面临崩溃前夕的纳粹德国已经有数人发出过投降的试探。为了不惊动苏联方面，美国人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件事。1944年夏季，在罗马教廷的安排下，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在罗马亲自与德国驻梵蒂冈的大使魏茨泽克秘密会谈。魏茨泽克提出了西线德军投降，东线德军继续与苏军抗争的建议。这个建议遭到多诺万的拒绝，因为这不符合美英首脑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的约定，同时苏联人非常警惕德国的这一动向。1945年1月，魏茨泽克又通知战略情报局，德军总参谋长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和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斯泰特将军准备投降。多诺万将此事告诉了白宫、陆军部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美国方面决定等到2月4日~11日的雅尔塔会议之后行动。这时，杜勒斯正在和德军总司令阿尔伯特·凯塞林派出的代表诺伊拉特秘密洽谈关于这次投降的事宜。然而，雅尔塔会议重申了要求所有德军无条件投降的决心，这实际上是将德国人要求对单方面投降的试探拒之门外。

自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流产后，杜勒斯感到很失望。他本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翻希特勒，使这场战争在苏军攻入柏林前立即结束，然后同德国新政权签订一个条约。现在这个机会已经丧失，战争的继续为苏联提供了一条通向欧洲的中心——易北河的道路，美国的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杜勒斯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他对未来局势的估计和多诺万完全一致。此时，多诺万正在华盛顿构思战后成立一个中央情报机构的计划，以便同苏联进行长期较量。为此，多诺万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出乎意料，就在杜勒斯接到韦贝尔电话的前两周，多诺万的设想方案被报界披露出来，在美国国内引起激烈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不得不更加谨慎行事。

杜勒斯第一次与韦贝尔带来的那两个商人的会晤没有成功。两个商人说他们已和驻意大利的德军司令接触，他有投降的诚意。他们声称，负责意大利北部纳粹德国党卫队的沃尔夫将军也想投降。沃尔夫和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希姆莱的关系密切，希姆莱要他负责奥地利和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麓一线的纳粹据点。这是纳粹德国挑选的最后抗争的堡垒。

华盛顿方面对这个情报相当感兴趣，而杜勒斯却持怀疑态度，因为尚未得到确切的证据说明这个情报是可靠的。当时有人认为，德国人要建立最后据点的传说可能是苏联人精心编造的谎言。其目的是诱骗艾森豪威尔的军队改变进攻方向，离开柏林和德国腹地，向奥地利和德国南部进军，这样，苏军能将德国最大、最重要、最古老的柏林坐收怀中，并得以向德国的腹地长驱直入。当时，根据苏、美、英三国首脑之间达成的协议，在德国战场上，各自的军队打到哪里，就占领和管辖到哪里。谁家不想多占地盘呢？本来，美军骁将巴顿指挥的方面军已经深入德国腹地横冲直撞，他距离柏林并不远了……

然而——

艾森豪威尔将军误认为这一情报是杜勒斯发出的，果然挥师向南了。这恰恰给苏联人带来莫大好处。被斯大林骂作“老滑头”的丘吉尔，看到这种情况急得抓耳挠腮，他连连催促美国人“向柏林进军！向柏林进军！”然而无济于事。他明白，此时的英吉利远非过去的“日不落帝国”，在盟军中，吃美国面包的英国人只能充当配角，不可能事事说了算……

几周之后，美军发现德国南部根本没有什么“最后的堡垒”，再调头向北进军时，苏军已经将柏林团团包围了。艾森豪威尔当年是否中了苏联间谍的圈套，至今仍是一个谜。

杜勒斯这次没有贸然行事。他要测试一下，沃尔夫一伙是否真有诚意。但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一决定告诉任何人，他要摆脱华盛顿对他的影响，独立行事。事后，他在解释自己当时这一先斩后奏的行动时说：“作为一名战地情报官，应该把自己的一切行动向总部汇报，不过，我认为可以有某种保留。如果向总部请示得太多，那么你就会被上级的指示束缚了手脚，更糟的是，你会觉得远在天边的总部人员在包办代替你的行动。”杜勒斯通过这两位商人向德国人捎去口信，要对方释放落在盖世太保手中的两名意大利游击队员，杜勒斯以此作为他和沃尔夫接触的先决条件。后来，杜勒斯在向人们解释他的意图时说：“这两名游击队员被分别关在两处，而且纳粹党卫队把其中叫帕里的看作是重要的意大利囚犯。能否将这两人释放，一方面能说明沃尔夫是否有诚意，另一方面能证明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1945年3月8日，纳粹党卫队将帕里和尤斯米欧尼送到瑞士与意大利的交界处，由瑞士方面转交给杜勒斯，并捎去了沃尔夫将军对杜勒斯的问候。沃尔夫已经表明心迹。几小时后，他越过瑞士边境，在伯尔尼与杜勒斯会晤。沃尔夫向杜勒斯讲述了自己投降的动机：“这样做可以避免双方人员的伤亡，使意大利免遭更惨重的破坏，还可以缩短欧洲战争的进程。”至于战后对他及其部下的处置问题，沃尔夫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意大利的德军指挥官是无条件投降”。杜勒斯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华盛顿和盟军司令部。很快，美国的兰尼兹尔陆军少将和英国的特伦斯·艾雷亲自飞抵瑞士，与沃尔夫作进一步会谈。

几星期后，杜勒斯导演的“日出”行动终于惊动了苏联人。4月5日，斯大林给罗斯福发去一封措辞尖刻的信函，信中说：“显而易见，你并非消息灵通，我的军事同行们得到可靠情报，你们的人已经和德国人进行了好几轮谈判，并已达成一项协议；西线的德军指挥官已为英美军队敞开大门，让他们向东挺进，交换的条件是放宽对德国的停战条款”。毫无疑问，斯大林对“日出”行动已有察觉，但他曲解了这次行动的实质。

美、英、苏三国关于“日出”行动的争端还没有来得及解决，4月12日，罗斯福溘然病逝，由过去不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副总统杜鲁门接管白宫。因此，“日出”行动自然陷入了瘫痪状态。4月20日，杜鲁门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杜勒斯发来电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战略情报局终止同德国间谍的任何接触。杜勒斯接到命令后，应立即停止同德国方面的联系……鉴于和苏联之间的纠纷，美英政府决定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战略情报局发出指示，结束‘日出’行动，并将此决定通知苏联方面”。

杜勒斯接到电报后第3天，蒙在鼓里的沃尔夫通过韦贝尔转告杜勒斯：请盟军立刻准备接受意大利北部全部德国武装部队（包括国防军和纳粹党卫队）的投降。

杜勒斯心急火燎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请示。答复是，让瑞士人代他去同德军谈判。韦贝尔同意出面和德国人周旋，以便让杜勒斯有时间劝说华盛顿改变态度。在卢塞恩，韦贝尔和沃尔夫磨了两天。沃尔夫见杜勒斯迟迟没有露面，渐生疑虑。4月25日，沃尔夫毅然返回意大利，指挥部下顽强抵抗盟军在波伦亚发起的进攻。

4月27日，杜鲁门总统终于改变主张，下令接受沃尔夫在卡塞塔向盟军司令投降，并邀请苏联人参加受降仪式。翌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轴心国军队全部放下武器。“日出”行动的成功使杜勒斯获得了自由勋章和总统的嘉奖。

美国现代密码的开拓者

美国最杰出的密码破译专家是弗里德曼。

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英国陆军开始制造大批小型密码机，并让美军也使用这种机器。美国军方为了测试这种机器的可靠性，便请来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弗里德曼夫妇检验机器编出的密码。结果他们只用了3个小时就把密码全部破译出来。其中有一份密码的电文是：“此密码绝对破译不了”。

本来，这一对伉俪与密码无缘，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使之成为他们的终生职业。本世纪初，美国棉花业的百万富翁乔治·费比恩，抛弃了赚钱生意，在芝加哥市郊福克斯河畔的里弗班克庄园请来不少科学家到那里研究他认为有趣味、有价值的东西，从声波、密码术直至遗传工程。1915年春，遗传学研究生威廉·弗里德曼受聘在此研究用月光来培植橡树。次年，弗里德曼的未来夫人伊丽莎白·史密斯来到这里研究莎士比亚剧本的真正作者是不是十七世纪的双字母密码发明者培根。从此，二人不仅在天意下撮合成了夫妻，而且开始了他们的共同事业——破译密码。1916年冬，威廉把遗传研究工作交给助手，参加了伊丽莎白的秘密文字研究工作。1917年，二人结为伉俪。

这时，费比恩无偿接受了政府的一项任务：破译非友好国家的外交电报。在美国陆军密码局成立前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里弗班克庄园是美国搞密电的唯一地方。

弗里德曼夫妇在破译印度人的密码工作中大显身手，获得成功。后来他们为陆军密码局开办密码培训班，并破译了大量德军密码。1920年威廉写成一本破译密码的著作。不久弗里德曼夫妇在陆军从事密码破译工作，他们解决了好多艰难密码。其中，威廉对赫伯恩机器的改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密码概念，有些内容至今仍被列为保密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丽莎白为当时正在筹建战略情报处的多诺万设计了一套密码程序，还破译了潜伏在盟国的德国间谍的密码电文。威廉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培训新一代编制和破译密码的专家，并领导这个新工作班子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破译了日本的外交电报。不久，日本采用新的电子密码机编制密码，1935年威廉的班子全力破译，1936年破译工作完成。

1939年，日本改用一种新的无线电密码机，用类似自动电话交换机的装置来完成密码的编制和解读。威廉的工作班子经过18个月的艰苦拼搏，1940年秋，终于破译成功。他们弄清了日本新密码机的构造原理，只用了600多美元就仿制成了一台与原机一模一样的密码机，代号“魔术”。

威廉破译的这台密码机以及他培训的密码人员，在战时具有极高的价值，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1942年5月3日至9日，在珊瑚海战役中，美国海军击沉和重创日本航空母舰各1艘，击沉其他战舰4艘，击落日机77架，粉碎了日本企图攻占莫

尔兹比港的计划。

1942年6月3日，在中途岛大海战中，美国海军以少胜多，击沉日军4艘航空母舰，重创其他战舰7艘……此战成为太平洋战场的重要转折点。

在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歼灭日军3万多人，击沉航母2艘，重创航母4艘，击沉和重创其他战舰20多艘，击落敌机200多架。此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以绝对优势开始转入了全面反攻；

1943年4月18日，经罗斯福总统亲自批准，美国空军根据破译的日军无线电通讯，截击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这个大战犯摔死在卡伊里的丛林中；

1944年5月20日至7月9日美军在塞班岛战役中歼敌近5万人，击沉敌航母3艘，击毁敌机475架，基本消灭了日本所有的舰载飞机。塞班岛的占领，使日本丧失了守卫本土的主要堡垒；

1944年10月24日至28日，美国海军在莱特湾海战中歼灭日本4艘航母、其他重型战舰23艘，至此，日本海军基本损失殆尽。

……

日本在整个太平洋战区所有大型战役里始终处于盲人挨打，节节败退的被动局面。直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对日本高层内部的动向也是一清二楚。这就是破译密码的功效。

在对德战争中，当时日本驻柏林大使发回东京的大量军事情报也被美国截获了，其中包括德国新式战斗机的详细情况、德军在巴尔干的实力，还有1943年德军在诺曼底的防御情况等等（根据英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的商定，在密码破译方面作了战略分工：英国主要负责对德密码破译，美国主要负责对日密码破译；两国在伦敦设立了一个联合从事秘密战的机构，主要对敌进行战略和战术欺骗，总导演就是英国首相邱吉尔……）。

威廉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与弗朗克·罗利特创制的一种密码机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军方高级密码装置SIGABA的基础，轴心国方面一直未能破译这种装置的密码。多诺万把威廉夫妇称之为“国宝”。

战后，威廉夫妇从事安全通讯体系的工作，弗里德曼成为进入美国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第一人。夫妇二人直到最后仍然和密码打交道。

这对老夫妻在快走到事业尽头的时候，再次拣起那项首先把他们引向密码道路的不大可能实现的设想——莎士比亚问题……后来，威廉和伊丽莎白相继于1969年、1980年逝世。他们的墓志铭写上了关于莎士比亚问题研究的最后结论：“培根不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

矛盾

自战略情报局进入美国政府机构以后，经历了种种排挤和磨难。作为华盛顿一名经验丰富的官场政客，多诺万在这场角逐中有输有赢。

早在1941年多诺万担任情报协调局局长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想搞垮多诺万及其一伙，后来由于追究珍珠港事件的风波，军方的陆、海军情报部处境被动，同时考虑到多诺万对罗斯福的重要影响，才转而决定联合他。这是当初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多诺万建立战略情报局的原因之一，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首先出面反对战略情报局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由于多诺万主张国内外的秘密活动必须由不同的机构分管，胡佛认为多诺万的组织对他控制美国情报机构和在南美洲的情报活动是一个巨大威胁。他对多诺万与英国

的密切联系散布怀疑态度，并指使联邦调查局暗中搜集有关多诺万“伤风败俗的材料”，结果一事无成。而多诺万以牙还牙，派人获得了胡佛与面首克劳德搞同性恋的大量现场照片，作为日后敲诈他的一张王牌。此外，胡佛还派遣特务打入多诺万的组织，并设法破坏他的工作。1942年，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秘密潜入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偷拍密码。胡佛闻讯后十分恼火，认为这是侵犯了他的“领地”。等到多诺万的人在半夜三更再次光顾使馆时，两辆联邦调查局的警备车停在使馆外面，打开紧急信号灯，拉响警报器，整个社区灯光一片通明。正在拍照的特工人员匆忙逃跑，但他们还是被警察扭送到联邦调查局。多诺万就此在罗斯福面前提出抗议，然而总统非但不责备胡佛，反而下令把这项渗透工作移交给联邦调查局。胡佛还多次在罗斯福面前攻击多诺万。罗斯福则以他惯用的手法来解决分歧——他决定：将欧洲和亚洲交给多诺万，把南美洲秘密活动的垄断权留给联邦调查局，胡佛这才偃旗息鼓——但只是暂时的。

美国国务院也把多诺万的组织看成是一个威胁，认为他正在侵吞外交官搜集国外情报的“传统领域”。国务卿肯尼迪屡屡抗议多诺万多次访问英国而不通知国务院。副国务卿韦尔斯直截了当地对罗斯福总统说，国务院希望解散多诺万的组织。他还抱怨说，多诺万不遵守部门之间的分工，以搜集情报为借口干预别人的工作……但罗斯福总统没有理睬。

最大的挑战来自以陆军情报部部长乔治·斯特朗为代表的军事情报部门。他坚决反对一个文职机构处于战时军事行动的中心位置，尤其反对战略情报局能够秘密获得资金、直接向总统汇报、与英国的密切联系……由于斯特朗身在军界，因而拥有很大的权力（尽管美国是文官政府，但军界的权势举足轻重），他在华盛顿被称为“乔治国王”。斯特朗反对多诺万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在争夺战后情报机构领导人这一职位上，多诺万是他的主要对手。

鉴于斯特朗与多诺万的争论日益加剧，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2年12月23日公布了《战略情报局工作职责》。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将战略情报局提到与军事情报部门和海军情报部门同等的地位，赋予它“拟定、发展、协调和实施心理战的军事计划”和整理“军事行动所需的那些政治、心理、社会和经济资料”的职能。

尽管战略情报局在情报机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但斯特朗仍有一件可以削弱多诺万的武器——他只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超级”和“魔术”密码资料提供给战略情报局，其余的尽量少给或不给（“超级”是英国破译的纳粹德国无线电通讯，“魔术”是美国破译的日本无线电通讯，两国情报部门的这一分工是由英美两国首脑共同商定的）。这一策略促使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从情报搜集转向了颠覆活动，而这正中多诺万下怀。

多诺万十分钦佩并渴望像巴顿将军那样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既然事实上做不到，他就把战略情报局的青年们组成许多小型军队，经英国教头训练后，“到欧洲放火”。

英国当时在国内设有6处大型的秘密训练基地。初入英国师门的美国徒弟对秘密行动的热情很高，认真好学，凡事都喜欢刨根问底，与英国情报界的老油条们形成了鲜明对照；师生之间相处的还不错。曾经参加过秘密行动的英国幽默作家马格里奇写道：“啊，那些首批到达伦敦的战略情报局特工们！他们来时就像刚从女子进修学校出来的妙龄少女，都是些天真无邪的新

手，在我们这个发臭的情报窑子里开始磨练。很快，他们就被熏陶和腐蚀了，与那些混了几十年的老油子们没有什么两样。”

中情局局长科尔比当年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于1943年年末被战略情报局派往英国，在英格兰南部靠近彼得博罗的一座叫做米尔顿大厦的豪华庄园中受训。整个训练由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别行动执行处的突击员和情报人员来主持。训练的科目有：暗杀、爆破、秘密电台通讯技术、柔道、密码术、擒拿与捕俘、野外生存、拉出来打进去、制作和使用假证件、模仿法国人的穿着举止、如何应付审讯、介绍法国地下游击队的活动以及德国人对付他们的方法……“有一次，讲授者是一个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的英国间谍，他用典型的英国低调描述了他被捕和逃脱的经过，顺便提到了他经受酷刑和终于保守了机密的情况。这和我们在大学里听到的学究式的讲课真有天壤之别！”训练结束后，科尔比被编入杰德堡突击队。

然而，英美两国这种初期的愉快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从一开始，一些英国情报官员就认为，同美国人合作最终会导致英国地位的降低，美国的实力终将压倒英国的专门知识；渴望学习和战斗的美国人绝不甘心长期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这些看法很快就应验了，各种矛盾和难题相继产生。战略情报局希望自己同一些欧洲国家的流亡政府建立联系，而英国认为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建立联系；美国人希望独立地向战区派遣间谍，英国人则坚持要事先告诉他们，并得到战区指挥官的批准；英国秘密情报局(MI6)千方百计地要求战略情报局采纳它的密码和通讯体制，但遭到拒绝，战略情报局认为，这将使英国人控制它的全部行动，而秘密情报局却能对自己的活动保密。根据英美两国达成的协议，用于隐蔽行动的飞机由英国提供，于是英国人利用他们的一些权力和地位企图对美国人实施控制和要挟，这使多诺万极为不满。他愤愤地说：“英国人太专横，动不动就拿飞机卡我们，其实，他们现在使用的飞机正是我们美国提供的”。1944年末，战略情报局决定派遣一支由30人组成的小分队去挪威破坏德国的铁路运输，英国人“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反对这一行动，”并拒绝提供皇家空军的飞机实施伞降。战略情报局只好派遣缺乏经验的飞行员驾驶美国飞机运送，结果有两架飞机坠毁，10名战略情报局成员遇难。1945年初，战略情报局招募了一个叫邦尼的女记者，派她去芬兰，试图说服芬兰人脱离纳粹。英国秘密情报局得知此事后，决心破坏这一行动。为此，战略情报局在邦尼去芬兰前，向英国驻美大使馆递交了一份抗议书……

为了缓和矛盾，英美两个情报组织一致同意将全世界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在颠覆活动方面，战略情报局主要负责北非、中国、朝鲜、南太平洋地区和芬兰；英国的特别行动署负责印度、西非、巴尔干半岛和中东；西欧则由双方共同负责。但是一方“侵犯”另一方势力范围的事时有发生。例如，美国人在英国的许可下在南斯拉夫获得了一个立足点，后来，当伦敦从支持米哈伊洛维奇的保皇派转向支持铁托的共产党人时，战略情报局却竭力支持南斯拉夫的保皇派。

英美两国在印度的矛盾最为突出。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称为“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英国担心美国的“荒谬思想”可能促进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对战后的大英帝国统治将是一个严重威胁。伦敦要求战略情报局制定的计划必须经它同意；战略情报局在印度的所有报告在送交华盛顿之前，它有权检查这些报告。美国的亚洲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

坚决抵制了这些要求，他在一份报告中说，他宁愿不要在印度的战略情报局分站，也不允许英国人控制它（史迪威在二战期间抨击英国抗日不力，搞殖民统治有方；他还谴责中国的蒋介石是个“腐败堕落的小人”，不思抗日，一心反共；他在缅甸与日军作战中，身先士卒，坚韧不拔。由于他坚持主张联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共同作战，最终被蒋介石赶回美国）。

丘吉尔的参谋温盖特上校在总结英国的态度时说：“我们同德国打仗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长，遭受的苦难多，作出的牺牲多，结果我们的损失却比其他国家还要多。现在这里（指印度）居然有那么一些可惜的美国佬跳出来，谈论什么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克尔比上校更直白，他把战略情报局“表兄弟”称作“美国的社会渣滓”。美、英特工人员之间的不同政见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当时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

实事求是地说，罗斯福是一位理想主义政治家，他反对老式殖民主义，主张非殖民化，他信奉和追求“自由、民主”。但是，美国并非反殖民主义的激进派。美英矛盾的实质是，美国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与英国殖民地利益之间的冲突。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法国、荷兰、葡萄牙、比利时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之间都有过这类龃龉。

二战期间，以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为一方与苏联克格勃达成过一项协定，支持欧洲反纳粹力量。美英两国主要支持代表“民主自由”的抵抗势力，对共产党的抵抗组织也提供了一些暂时的资助，战略情报局还用飞机将苏联特工人员空投到德国和巴尔干地区；苏联只帮助由它控制的共产党抵抗力量。虽然左右两派势力都在抗击纳粹，“但它们相互间的斗争往往比他们同德国人之间的斗争还要激烈。”东西方大国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在这里已经初露端倪。

1943年12月，多诺万在莫斯科与克格勃就交换情报资料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共享在纳粹占领区使用的特工器材的资料，克格勃提供德国境内战略轰炸目标的情报数据和德国控制区的情况，作为交换，战略情报局送给苏联人微型照相机、微点照片生产设备和密码资料。

1944年末，曾经联合德国反对苏联的芬兰人主动提出向战略情报局出卖苏联4种军事和外交密码以及约1500份文件，多诺万求之不得地同意了。但是，罗斯福总统和新任国务卿爱德华·斯瑞纽斯命令多诺万在不透露来源的前提下立即将密码与文件交还苏联人。多诺万在执行命令前，把严重损坏的密码复制后交给联邦调查局存档。几年后，这些密码帮助揭露了隐藏在美国和英国的苏联间谍网。

1944年初，苏联红军正在进军波兰。2月，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觐见斯大林，商谈如何改善苏联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问题。斯大林明确提出该政府应当“靠边站”。8月1日，苏军兵临华沙城下，波兰地下武装在莫斯科秘密广播的号召下举行了起义。然而，苏联红军却按兵不动，拒绝援助抵抗运动。苏联人硬说因为他们的给养不够，无法打过维斯杜拉河。其实，真正的原因连斯大林本人几乎都不讳言：华沙起义者忠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而不是莫斯科；因此，让纳粹和华沙起义者在血战中同归于尽才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尽管美、英盟国要求使用飞机在苏联着陆以便援助起义，但遭到苏联的拒绝。近在咫尺的几十万红军坐看数师德军与起义者进行激烈巷战，在30多天里，华沙成为一片废墟，尸骨遍野，全城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杀。多诺万焦急万分，他在英国准备了大量的空运武器和物资，而直到最后，

苏联才允许美、英 100 多架飞机参加了这次空运。但是当飞机来到华沙上空时，只有少数飞机空投成功，因为下面的华沙市已被大火和浓烟吞噬，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一切都太晚了，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不久，苏军占领华沙并成立了卢布林政府（1995 年，在我国播放的电视纪录片《二战警世录》中曾经简述了这一史实）。后来，美国外交家凯南回顾说：“实际上，美苏之间有一场全面的、现实的摊牌的话，就应在那时”。

在二战胜利在望的形势下，为了大英帝国的战后利益，早已看透斯大林的丘吉尔决定以“现实主义态度”与苏联摊牌。1944 年 10 月，丘吉尔跑到莫斯科，他与斯大林在一次深夜会晤时，做出了一项秘密交易。丘吉尔建议说：“让我们把巴尔干的事务解决一下吧”。这位道貌岸然的首相在一张纸上写出了伦敦与莫斯科分赃的比例：苏联占有罗马尼亚的 90%，保加利亚的 75%，英国占有希腊的 90%；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双方各占 50%。斯大林接过这张纸，沉吟片刻之后用蓝色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个大勾号，又把它递还给了丘吉尔。丘吉尔问道：“这些事关数千万人命运的大问题，如果给人一种已由我们作了轻率处理的印象，是否会显得有点玩世不恭？我们把纸条烧了吧。”斯大林回答说：“不，你留着吧。”……直到第 3 天，与丘吉尔同行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才得知秘密协议这件事，他当即表示了美国的反对态度。丘吉尔只好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不必多此一举了”。然而，在私下里艾登继续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起对百分比协议进行润色，并做了几个数字上的让步以满足苏方的要求。尽管丘吉尔后来否认，但英苏双方都知道这个交易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划定临时性的军事活动范围。英国很清楚，自己已经筋疲力竭，丧失了昔日世界霸主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它才极力借助美国来参与同苏联瓜分全球的交易，“以保住自己的那份遗产”，甚至不惜背着美国单独行事。

面对苏军已经占领东欧大部分地区的现实，凯南在 1944 年年末首先主张美国应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不能、也不应阻止苏联统治东欧”。凯南解释说：“如果克里姆林宫对于美国在西半球的行动继续在道义上暂不作评论，那么，他们当然认为自己可以在得来不易的东欧地区自行其事。重要的是，我们应和英国人一道确定一条界限，不许俄国人越线为所欲为。”后来，凯南的这一观点又重新提出，并被杜鲁门政府所接受，人们称之为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

随着苏联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展，战略情报局对此日益不安和焦虑。尽管美、英、苏三大国商定不单独接受德国的投降，但是美国最终接纳了东线德军情报处处长盖伦将军。他携带着 50 个有关情报资料的微型胶卷和一批纳粹特工投奔战略情报局。他说他在苏联地区有一个间谍网，可以立即开始为战略情报局工作。经华盛顿批准，由战略情报局出钱，帮助盖伦建立起半独立的情报组织，其总部驻地设在法兰克福。在苏联仍是美国的正式盟国时，盖伦的特工人员就干起反共勾当来了，正如他们当初在希特勒麾下所干的那样，只是他们现在的主子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与盖伦打交道的杜勒斯、威斯纳、安格尔顿、赫尔姆斯等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

“凯西·琼斯”是一次典型的冷战行动。该行动由多诺万于 1944 年构思，1945 年春开始实施——16 个中队的美、英轰炸机对 200 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包括全部苏占德国、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进行空中照相制图。苏联通过自己的间谍得知“凯西·琼斯”行动的意图，于是美英飞机与苏联空军发生了

一系列秘密空战。仅 1945 年 4 月 2 日这一天，双方就发生了 6 次空战，在战斗中 1 架美国战斗机被击落。7 月，苏联空军在德国的克拉更击落两架英国飞机……

脱胎换骨

一战结束前的 1944 年年底，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向罗斯福总统提议，在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美国应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该机构只对总统负责，该机构的负责人与国务卿、陆、海军部长组成顾问委员会，共同协作，实施和平时期的美同情报工作。胡佛搞到了这份建议的文本，于是，他公然违反保密措施，将这一绝密文件泄露给激烈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该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多诺万要在美国国内建立“警察制度”，窥探和监视公民的私生活……舆论界大哗，胡佛则躲在暗处观看这场大战。由于多诺万的提议包含脱离军方控制的意向，因此在政府中首先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接着遭到整个军方、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预算局的强烈反对，美国舆论界把多诺万所建议的中央情报机构称为“超级盖世太保”。当然也有人赞同多诺万的主张。正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1945 年 4 月 12 日，罗斯福溘然长逝。新任总统杜鲁门对多诺万的提议没有马上表态，但他内心里并不信任战略情报局。在他看来，多诺万是个亲英派人物（还是个共和党人）；同时，战略情报局经费开支庞大，得不到国会的支持，而且其他情报部门争风吃醋，竭力反对；还有人抱怨战略情报局已经彻底被英国情报机关渗透了，加上又收到一份指责战略情报局腐败、专横跋扈、裙带风盛行的控告信，因此杜鲁门总统下决心踢开多诺万，另辟蹊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略情报局作为战时的情报机构至少在名义上已不能存在，多诺万深知这一点，但他对白宫的影响已非昔日可比。于是他发动新闻界连篇累牍地讴歌战略情报局在二战中的业绩，希望以此影响白宫的决策，但他的打算最终还是落了空。

1945 年 9 月 13 日，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该局下属的情报研究分析处和行动处分别由国务院和陆军部管辖，战略情报局的资产和人员顷刻之间一扫而光。

战略情报局的终结使美国情报机构和情报活动重新陷于分散和无序状态。这当然不是杜鲁门的初衷。1946 年 1 月 22 日，为统一和平时期的情报系统，杜鲁门决定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NSC），其成员由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组成，全面负责计划、发展和协调美国对外情报活动。该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CIG），作为执行机构，代替原战略情报局的海外情报活动。中央情报组还兼管情报的估计和分发工作，协调美国 25 家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此时，原战略情报局的情报研究分析处从国务院又划归中央情报组）。首任中央情报组组长由海军情报局副局长西德尼·索尔斯担任并兼任第一任中央情报主任，他在事实上是担任该职最短的一位中央情报组组长。索尔斯最初的家当是 3 间办公室和 8 名幕僚，他夹在那些有权势的人当中干着综合各家观点的听差工作，处处仰人鼻息，“其地位不值得羡慕”。1946 年 1 月 25 日，索尔斯毕恭毕敬地找到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向他们各借两个人来帮助开展工作——这就是索尔斯上任后的第一件公务。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使中央情报组这个责重权小的新机构逐渐成型，使和平时期情报工作的构想付诸实施，为战后美国情报系统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组织基础。他还主持创办了《每日情报摘要》和《每

周情报摘要》两份王牌情报刊物，迈出了战后新型情报体系发展的第一步。当时的中情组人员编制定为 100 人左右。

1946 年 3 月，美国三军情报机构奉命与中情组一起对苏联军事力量进行首次评估。这项工作很快暴露出情报界的严重隔阂。军方以保密为由，断然拒绝向中情组这个非军方情报机构提供资料。此外，军方仅对该项工程中有利于他们的情报感兴趣。譬如空军极力主张发展空中力量，以便“赶超”空军大国，尽管事实上根本没有赶超的对象。空军情报机构自己知道，苏联在空中力量方面落后于美国好多年。

1946 年 6 月，中央情报组组长和中央情报主任的职务由空军中将霍伊特·范登堡继任。他本想以此作为日后晋升空军总参谋长的跳板。尽管如此，他在近 1 年的任期内并非一事无成，他不仅利用自己和家族的影响为中央情报组争得了更多的经费、更大的编制和更新的装备，而且还开创了情报组秘密情报搜集和独立开展情报分析研究的先河。范登堡利用国务院软弱无力的机会，抗击并挫败了联邦调查局，夺取了该局在国外的全部情报网，使其成为足不出户，死守美国国内的看家狗。在他的领导下，情报组不再仅仅是个协调机构，而且自身也开始生产情报，进而使其独立性得以加强。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在杜鲁门总统的要求下，范登堡领导的中央情报组写出了第一份专题情报评估报告，内容是有关苏联的实力和动向。这份报告被视为情报评估的样板，它为中央情报组赢得了白宫决策者们的赞许和重视。

1947 年 5 月，海军少将罗斯科·希伦柯特担任中央情报组组长兼中央情报主任。正式成立美国中央情报局后，他由第三任组长摇身一变当上了首任局长。此人精通 3 种外语，但被认为领导情报工作的能力不足，对情报活动缺乏了解；在其任内，中情局在《国家安全法》内规行矩步，“缺乏魄力”，所以在与情报界同行，主要是军事情报部门的竞争中，多次败北。但他也有一定的贡献，例如，在仍有许多人反对这个新成立的情报部门的时候，“他成功地把历史潮流引向支持中情局的轨道”。此外，他鼓吹精英主义，吸收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人进入中情局。1947 年，中情局的秘密口号是：“到 1948 年要比国务院还大”。这一点它的确做到了。

在短短的 1 年多时间里，中央情报组由最初的 8 个人迅速扩大到 2000 多人。但这时的中央情报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没有自己的独立预算，全凭国务院和陆军部的脸色赏钱，而且无权雇佣和训练自己的人员。此外，由于隶属关系，它不能直接与美国总统通话。

1946 年到 1947 年间，在华盛顿的军政界中，展开了一场关于在冷战形势下如何设置军事指挥系统的大辩论。一些人主张，各军种应保持分立（空军也应独立出来），由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一个文官国防部长来协调它们；另一些人鼓吹，陆海军应当合并，由一个国防部、一个参谋长和一个统一的总参谋部指挥；还有一些人则兜售延袭旧体制的“优越性”……最后，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拟议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组建独立的空军，成立国防部，将陆、海、空各部置于它的统一领导之下的有关条款上，对于成立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一事则不再去斤斤计较（尽管国务院与军方仍为由谁控制情报机构问题争执不休）。通过军事体制的大辩论，美国完成了冷战时期组织机构的调整和转变。实际上，中央情报局的诞生正是这一调整和转变的产物。

1947 年 7 月 26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并于同年 9 月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代替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职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

统顾问，统一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对总统提出建议，指导各军种、政府各部门对有关国家安全事务进行有效合作。为进一步加强对外情报工作，政府决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美国中央情报局，并由它接管中央情报组的业务、档案和人员。总统任命原中央情报组组长希伦柯特为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此时，搁到陆军部的原战略情报局的行动处也划归中央情报局管辖。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将中央情报组改名为中央情报局（CIA）；它是一个独立的文职机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因此直接向总统负责），而不是向国防部长负责。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1. 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情况；2. 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关于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建议；3. 对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进行综合分析和估价，并通过现有的机构将情报在政府内部作适当的分发。中央情报局局长要负责保护情报来源和秘密获取情报的方法，防止权限以外的暴露；4. 为了各情报机构的利益，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规定的共同有关任务，由中央情报局统一和有效地去实施；5. 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指示的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务。6.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定和总统批准的范围内，中央情报局局长有权对各情报部门进行视察，并对这些部门所掌握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进行综合、估价和分析。但是，中央情报局如需要对联邦调查局进行上述工作时，须事先以书面形式提出请求。

第5项职能对于中情局在冷战时期起到的一个主要和争议颇大的作用方面有着决定性意义。这一职能经过激烈辩论后故意含糊其辞，因为不论是政府的行政部门或立法部门都不能由自己出面直截了当地提倡或批准中情局从事秘密行动。而美国总统和中情局恰恰利用这一模棱两可的立法规定使秘密行动合法化。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1947年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正式诞生了。

中央情报局的局徽是——银盾：16个红色尖角镶成罗盘形状；银盾上方的饰章：刻着银红两色花纹的花环，环上有一个美国秃鹰的头。盾牌下面是一个金黄色的卷轴，上面写着“美利坚合众国”几个红字。围绕着盾牌和鹰头的则是“中央情报局”几个白字。这一切都衬托在一个蓝色镶金边的圆形底盘上。鹰是力量和机警的象征，而从四方向中心集中的形如罗盘的十几条线条，则表示来自全世界的情报资料都汇集到一个中心点。

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实际上再现了多诺万两年前的构想。中情局的史学家特罗伊曾经写道：“杜鲁门也许没有想到，这样一种情报体系或者更好一些的情报体系本来可以早点建立起来，不必经过这样艰难曲折的过程。当然，战略情报局本来应当经过稍许改造，作为新情报体系的核心继续保留下来。”

1943年6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号附2号（NSC—10/2）文件。根据“10/2”文件的命令，杜鲁门指定由中情局领导实施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计划。文件中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公开的外交活动必须由秘密行动进行补充”。该文件中有3条规定对于战后美国秘密行动的发展至关重要：1. 建立了一个由总统指派、批准和执行秘密行动的机制，并使它对总统负责；2. 对秘密行动做了明确和广泛的定义；3. 指定由中情局主要负责这项任务。这一重要机制一直延续至今。

根据美国法律，中央情报局是在多重的政府控制下工作的。该局首先向

总统负责，总统通过一个由研究国外情报活动的顾问委员会来监督中情局（据说，自中情局成立后，杜鲁门总统每天接见的第一个人总是中情局局长）。其次，中央情报局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中情局局长、正副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以及国防动员署署长组成。该委员会专设一个小组委员会，以监督中情局的工作。中情局根据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发布的指令行事。同时，中情局还要向 4 个国会委员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和拨款委员会）负责，这 4 个国会委员会都针对中情局设有小组委员会。

中央情报局不同于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它无需公开其预算、雇员人数或工作情况。1949 年，随着冷战格局的确定和激化，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修正案，使中情局的权力进一步增加，该法案规定：

1. 凡进入美国永久居住的特定外国人员一经中央情报局局长、司法部长以及移民局局长决定，并符合国家安全的利益，或对执行国家情报任务起过主要作用，则准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进入美国并在美国永久居住，无需考虑该人是否符合准予入境之各项法令。但根据本款之规定进入美国之外国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之人数，在每财政年度内均不得超过 100 名。

2. 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款项时，无需考虑有关动用政府款项之各项法令；凡为秘密、特殊或紧急事务之用领取款项时，只需有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书面证明，而局长出具之每一书面证明，均应视为所支款额之有效凭证。

由于拥有这些可以掩盖其活动、不受法律限制的特权，更使中央情报局成为一支公认的秘密力量。

二、首战欧洲

冷战基调

一战结束后，昔日欧洲列强均已千疮百孔，疲惫不堪；通过对德作战，苏联将东欧国家抓到手里，并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将它们模式化。这样，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成为东半球占有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整个西欧加起来也不足以与之抗衡。

杜鲁门上台后，对斯大林“咄咄逼人、贪得无厌、出尔反尔”的对外扩张政策开始逐步强硬起来，美苏关系逐步从盟友走向对手……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长达8500字的电报。电文的主要内容是：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以苏美两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苏联对美国将是一种长期的威胁，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采取秘密行动，来达到控制全球的目的。国务院马上将电文送交总统杜鲁门及其内阁成员。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阅后，立即将电文复印，分送给军界的高级官员。这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在华盛顿引起了轩然大波，白宫的高级官员们一致同意凯南对未来世界局势的估计。就这样，一份普通外交官的密电，成了华盛顿最高当局制定冷战政策的蓝本，其矛头直指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目的是“遏制共产党对外进行扩张”。实际上，这份电报所阐述的观点并不新鲜，它只是将华盛顿军政界长期以来形成的见解系统化和综合化罢了，因而产生了共鸣，凯南由此也身价百倍，成为美国政界中一个重要的外交智囊人物。1947年4月，马歇尔把凯南从莫斯科召回，任命他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此前，凯南悄悄地作为中央情报组组长范登堡将军的“特别顾问”在该机构工作了一个月……

1947年2月21日，英国使馆紧急要求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紧急援助。关于希腊和土耳其在当时东西关系中的重要地位，需略加解释：

希腊在德军退出之后存在着两支力量：一是希腊共产党和左派抵抗运动组成的“民族解放阵线”，它拥有武装力量，称“人民民族解放军”，并占领了相当的地盘；一是英国扶植的主要由右翼分子组成的政府，英国并在希腊驻有军队。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实际上已把希腊划在它必争的势力范围以外。希腊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拒绝吸收“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参加政府，并进而企图把它们镇压下去。于是1946年3月重新爆发内战，希腊游击队越战越强，对右翼政府形成很大威胁。如果没有外援，政府垮台、希共执政是指日可待的。

土耳其并没有内战形势，但是苏联一直对上土耳其施加压力，要求缔结条约，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俄所占的土耳其领土，并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在美、英支持下拒绝了苏联的要求，顶住了苏联从各方面施加的压力。土耳其的三军全靠英国的支援，所以英国担心一旦英国无力继续援助，土耳其政府就可能向苏联屈服。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有连带关系，希腊如落入苏联势力范围，土耳其也岌岌可危。在雅尔塔会议后，苏联与西方争夺的重点显然是在巴尔干和中近东，因此，尽管在大英帝国的解体过程中英国势力已从印度、缅甸、埃及、巴勒斯坦等一系列地区撤退，希、土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继续，但是这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意义都不同于其他地区，美国决不能坐视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同东欧连成一片。同时，到1947年初，美国的外交总路线已基本确定，英国提出这一要求恰逢其时，美国决策者立

即抓住这一时机，把已经在意向决定的外交政策付诸行动。

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特别会议上发表了有名的、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演说。

这篇演说开宗明义，先讲述了希腊和土耳其的严重局势，说明美国给予援助与“监督”该援助的必要性，接着点出讲话的真正主题：

“无论是通过直接侵略还是间接侵略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国家人民都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也破坏了美国的安全……”

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择……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

我认为，美国政策必须支持那些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

我认为我们必须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命运。

我认为我们的帮助首先应该是经济和财政援助，这时达到经济稳定和有序的政治进程所必需的”。

这篇讲话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之处：

1. 明确指出援助希、土不是孤立的，而是国际战略的一部分，由此带来严重后果在所不惜。

2. 明确提出两种制度之争，使美国外交从此与意识形态分不开，把已经开始的“冷战”理论化、纲领化。

3. 发明了一个“间接侵略”的概念，即任何国家内部局势的发展都可能与美国“安全”有关，只要美国认为危害其利益，不论此事有无苏联直接插手，美国都得以反对“间接侵略”为名进行干涉。

4. 通篇讲话用语夸张，耸人听闻，以致有人听后感到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据说这是杜鲁门采纳了范登堡的意见，故作惊人之语，为的是“把全国吓得要死”，非此不足以动员舆论支持，特别是说服国会拨巨款。这一做法果然成功，但是其后果超出了杜鲁门的预期，在全国造成了强烈的反共气氛，为日后麦卡锡主义的出笼准备了条件，以致杜鲁门政府本身也深受其害。

“杜鲁门主义”给战后美国奠定了以反共为主导思想的对外干涉主义的基调。

二战刚刚结束，美苏两家在欧洲就展开了激烈角逐。苏联支持下的希腊共产党游击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武装暴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发动军事政变，总统贝奈斯被迫接受最后通牒，辞职交权；法国和意大利也令美国担心，共产党在大选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议会中占据了最多的席位。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扶持西方国家，美国政府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马歇尔计划”，向西方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抵御苏联的渗透。”同时，中情局积极开展针对苏联的隐蔽行动（即政治的、准军事的秘密颠覆行动）。1952年，中情局仅在一个中欧国家里，就有40项不同的秘密行动在进行之中……

希 腊

1946年3月，希腊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党邻国南斯拉夫的支持下开展游

击活动，随之迅速发展成为内战。中情局将老特工乌尔默派往希腊，任中情局驻雅典情报站站长，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最终失败与他是分不开的。美国不仅向希腊政府提供军事装备，而且以军事顾问团的名义直接参与了希腊政府军对共产党游击队的军事镇压（军事顾问团团长是范弗里特，后来他在朝鲜战争中接替李奇微，指挥美国第8集团军）。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建议，希腊政府一方面以“民主政治”施行瓦解，收缴游击队武器，解散共产党武装；另一方面向游击队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清除他们赖以生存的基地”。战争持续了3年。后因斯大林欺压南斯拉夫，甚至进行颠覆活动，逼其就范，造成共产党情报局内部分裂；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后，铁托关闭了南希边境，而英美两国则源源不断地资助政府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终于失败。1949年10月16日，希腊内战结束。

意大利

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由地下转入公开的合法斗争。1944年4月~1947年5月，意共曾7次参加联合政府，以后一直作为在野党在政界发挥作用。它在国内群众中有很大影响。

1947年12月，中央情报局开始在意大利进行一项秘密行动：支付贿赂费用，资助基督教民主党的选举，制作和散发反共宣传品……以阻止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当时驻罗马的中情局情报站站长是安格尔顿。

1948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在国内大选中失败，未能进入政府。但它作为头号在野党的政治地位，使华盛顿对此惊恐不安。中央情报局认为，仅仅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去支持加斯贝利政府是不够的，“如果要摧毁意大利共产党的野心，还得有比外交和政府职员更多的东西。需要象苏联人帮助共产党人那样来帮助意大利民主党派和私人团体。此外还需要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略情报局帮助抵抗运动发展的那种隐蔽政治宣传的支援和行动。”经过研究，凯南在马歇尔和艾奇逊的支持下，建议中情局新建一个从事隐蔽行动的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6月18日，也就是莫斯科对柏林实行封锁的前6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10/2号指令，授权中情局进行秘密的政治和准军事行动（即隐蔽行动），为此在1947年末已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处，后改名为政策协调署，在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划归中央情报局局长直辖）。政策协调署由中情局的精干人员组成，国务院任命弗兰克·威斯纳为政策协调署主任。政策协调署的建立完成了中央情报局的组建工作。此时的中情局包括3大业务部门：情报分析、谍报活动、隐蔽行动。紧接着，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赋予中情局在冷战中承担重要任务，包括进行心理战和隐蔽行动。

威斯纳曾在德国从事情报工作，这次挑选他来肩负此项特殊的使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时，威斯纳的一切行动直接对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他果然不负众望，在短短的4年里，他领导的政策协调署已在海外建立了47个秘密情报站，在编人员2812人，合同人员3142人，年预算为8400万美元。“这里成为中央情报局干得最红火的地方。”

政策协调署的工作是“开展宣传战、经济战、破坏活动和准军事行动，包括支援东欧的地下抵抗组织对付苏联的威胁。”唯一的限制是，章程附则中的否定权，即政策协调署的任何行动一旦被揭露，总统有权否认这些行动。

政策协调署是个畸形机构，它的人员挂在中情局的工资单上，中情局为

其行动提供后勤保障和掩护，而政策指导则由同务卿和国防部长负责。但实际上，它的“政治行动”计划几乎完全由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室制定；政策规划室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得力助手。

威斯纳具体负责对意大利的秘密活动，从他上任伊始就作为重点工作展开了。先后在意大利情报站工作的有麦康、科尔比、兰斯代尔、安格尔顿、沃尔特斯等后来名赫一时的人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与美国大使和罗马教廷一道协调工作，扶植意大利国内非共党组织和团体，破坏意大利共产党的声望，阻止它在下届大选中夺魁执政。为此，中情局秘密提供大量经费，重点支持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收买报刊杂志和新闻宣传媒介。为掩人耳目，中情局提供的经费都是通过“第三者”暗中支付的。

中情局在意大利与“第三者”的联系完全以秘密方式进行：只用公共电话与他们联系；使用化名；用密码和暗语安排约会；在秘密接头点与他们会面，会面时双方到达和离开的时间至少错开 10 分钟，绝不能让其他人看见中情局人员与“第三者”在一起，有时，中情局特工与当地的情报人员同乘一辆轿车，在车内交接钱款，传递情报……据科尔比回忆，他曾经多次开着装满现钞的轿车，分别与多名“第三者”秘密交接钱款，“这项工作既紧张，又累人……”

1990 年，前中情局局长科尔比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1953 年至 1957 年，我在意大利工作，同那里的共产党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搏斗，不是流血的搏斗，而是政治搏斗……我们支持了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共和党，而不是右翼。我们支持他们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假如左翼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就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假如他们出书，我们也出书。假如他们建立青年组织，我们也建立青年组织……最后，我们胜利了。”

从 1948 年起到 60 年代初为止，中情局在意大利投资几千万美元，先后有几百名特工参与这项旨在对付意大利共产党“威胁”的隐蔽行动。这是中情局在二战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投资款项最多的一项秘密政治行动。

此外，中情局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对共产党也进行了监视、渗透和颠覆活动。

组建柏林谍报网

二战结束后，德国问题成为苏联的心腹大患，它为此煞费苦心，搞了不少阴暗的活动。其中一个活动是，苏联凭借自己的战胜国地位，强行将德国的一块领土划给了波兰，又将波兰的一块领土划归了自己。这种制造他人矛盾、拿他人充当自己的盾牌并从中渔利的行径遭到了世人的谴责。一位奥地利记者愤怒地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德国问题”是政策协调署遇到的最棘手的难题。围绕着“德国问题”而引起的东西方纠纷日益剧烈，苏联人不愿放弃对德国的控制，而西方国家则担心，德国一旦落入苏联手里，它不仅会成为苏联政治上的卫星国，而且势必成为其军事上的卫星国。最使美国政府担忧的是，苏联人正在德国进行着一系列的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情报活动。根据 1945 年达成的“波茨坦协议”，美、英、苏、法 4 国将共同控制德国的科技机构，共同派出科学家和情报官员收集和分析德国战时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希特勒在战时使用的秘密武器及武器装备改进的蓝本。这是一桩大有“油水”的买卖。4 国派出的代表在弹痕累累的城市里，挖掘深埋在废墟下的保险柜里的资料。

英、法、美 3 国专家密切配合，发现了不少极有价值的资料，他们慷慨地将这些资料送给苏联同行们过目。而苏联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将自己在东德获得的许多珍贵资料偷偷送往莫斯科，同时还把 200 名德国科技人员押往莫斯科“监护”起来。柏林的原子弹研究机构、佩内明德的火箭发射试验站、图林根的精密光学仪器工厂都为苏联未来的科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苏联的秘密警察和军事情报人员还指使在西德的苏联考察小组收集情报。当欧洲战场上的炮火刚刚平息下来，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立即飞往东柏林，他在那里的卡尔斯霍斯特建立了一个情报指挥部，随后他又飞到奥地利的巴登，建立了另一个情报收集中心。后来继任贝利亚职务的伊万·谢洛夫将军当时也在柏林负责招募外国情报人员，设法在西方国家建立克格勃秘密活动的间谍网。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柏林的郊外也建立了一个情报据点。西德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海因茨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苏联人收买的。在柏林墙筑起之前，苏联间谍在柏林街头肆无忌惮、横冲直撞，因此，在西方情报圈里，柏林被称为“绑架之都”。

政策协调署和中情局系统的特别行动处就在这“绑架之都”与苏联人进行周旋，和苏联间谍相比毫不逊色。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怀揣伪造的证件，通过柏林，出色地打入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中。

首任中情局局长希伦科特指令政策协调署帮助莱因哈德·盖伦将军建立了西德联邦情报局。他特地挑选了在奥地利工作的老资格情报官员普莱茨到法兰克福与盖伦协调工作。普莱茨和另一名高级官员克里奇菲尔德一起在盖伦设在普拉赫的总部里建立了一个办公室，他们两人充当了顾问的角色，极力怂恿盖伦将军扩大间谍情报活动的范围。由于盖伦的对手、西德反间谍安全局局长奥托·约翰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支持，而军情六处雇佣了霍斯特·艾特纳（1961 年被揭露系苏联克格勃间谍）暗中了解盖伦情报组织详细的活动情况以及盖伦的部下安插在东方国家的情报关系。所有这一切，都促使盖伦更加死心塌地去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普莱茨的指使下，盖伦派遣特工赫尔曼·克斯特纳去接近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最终，赫尔曼得到了乌布利希的信任，成为东德的内阁官员。盖伦受到中情局青睐的另一个原因是，1949 年春季，盖伦部下的一名情报人员窃得苏联米格—15 型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图和飞行记录。这对于处在冷战时期的中情局来说，无疑算得上是一项辉煌的成果了。

“白银行动”

正当美苏两国情报机构在柏林明争暗斗之际，维也纳隐蔽战线的角逐也戏剧性地进入了高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局（即“秘密情报局”）狼狈为奸，秘密截收和窃听苏联高层领导人的电话通讯，犹如一把匕首插入莫斯科的心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 1955 年 5 月 19 日这段近 10 年的漫长岁月里，中立国奥地利一直处在美、英、法、苏 4 个战时同盟国的共同控制之下。象柏林一样，维也纳也成了东西方国家直接对峙的第二条战线。英美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打入苏联内部，获取其秘密行动计划的情报。

苏联占领军的司令部设在帝国饭店，离奥匈帝国大厦不远。英美情报机构觊觎的重要目标就是帝国饭店。1951 年，中情局驻维也纳情报站获得一份维也纳苏军司令部与莫斯科联系的地下电缆网络图。情报人员如获至宝，他们请来了华盛顿总部电讯室的卡尔·纳尔森。这位老资格的电讯专家从维

也纳市地下设施图和其他市政建设的资料中发现了破绽，经过极其艰苦细致的分析研究，终于将这份残缺不全的电缆网络图拼凑成完整的维也纳—莫斯科通讯系统网络图。但是，纳尔森并不知道英国的军情六处在 1949 年就组织了代号为“白银”的秘密行动，其实，英国人已经成功地窃取了一条苏联人的电话线。

众所周知，行政集中是老牌欧洲帝国的一大特点。俄、德、法、奥匈帝国等，各国的公路和电话线都汇集的各自的首都，这种状况一直延袭到 50 年代。假如从阿尔及尔挂长途电话到北非的突尼斯，非得经过巴黎中转后才能接通。因此，要想窃听这一城市的电话，只需在巴黎做点手脚，便可大功告成。军情六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郊区买了一栋房子，他们在房子的附近离地面 70 英尺的深处挖掘地道，然后从奥地利的电缆线上接出一头，引入房子里地下室的专有线路和设备上，当电缆线上有苏联人通话讯号通过时，录音机就把这些通话内容录制下来。就这样，军情六处的特工人员坐在地下室里，安然无恙地监听了维也纳苏军司令部与莫斯科的一切电话内容。为了掩人耳目，军情六局将这栋房子伪装成专门出售哈里斯花达呢的小商店。当时，哈里斯花达呢在维也纳十分畅销，不知其故的奥地利人光顾这家商店时，没有人会想到在商店的地下室里，英国人正在窃听苏联人的通讯电话。但是，这一秘密监听点曾经差一点被暴露——军情六处雇佣了一名女学生传递情报，她隔一段时间就到据点来取情报，然后在约定的时间里，把情报交给等候在申博兰公园里的军情六局的人员。那天正巧有一名值勤的警察在公园里溜达，他看到一位衣衫不整的中年人正与一位少女在树荫下讲话，警察怀疑这位中年人对少女图谋不轨，于是，他就把这个情报人员抓了起来，费了好些周折，总算没有闹出乱子来。尔后，军情六局的人员更加小心行事，他们的“白银”行动一直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不久，英国人得知中情局的纳尔森来到了维也纳，准备利用已经掌握的维也纳—莫斯科通讯系统来窃听苏联人的电话。不得已，军情六局只好向中情局吐露了“白银”行动的真情。现在，纳尔森在维也纳的新发现则大大提高了：“银子”行动的效率。双方特工达成协议，相互合作，共同监听苏联人的通讯联系。就这样，中情局不仅掌握了奥地利占领区苏军活动的全部情况，而且也了解了苏联人在东西方边界地区的政策。

纳尔森把军情六处监听点收集到的情报和中情局自己建立的 5 条窃听线路收集到的通讯内容经过分析整理后，破译了大量的苏联通讯密码，从中获得了许多有战略价值的情报。例如，当时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文部都为制订对南斯拉夫的政策而举棋不定，多数外交家认为，铁托是共产党，他与斯大林分道扬镳的目的是想迷惑西方国家。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鄙夷地咒骂铁托是“耍花招的流氓”。而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凯南坚持说：“铁托与斯大林分裂是真实的事件”，他要求国务院和总统迅速制订倾向铁托的外交政策。不久，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这时，中情局已从维也纳情报站预先得知：苏联人并不打算通过东欧卫星国向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扩张，也不想马上逼迫南斯拉夫的铁托就范于苏联人的脚下。这一情报对当时的美国政府决策部署在欧洲和远东的军事力量发挥了关键性的参考作用，使其得以从欧洲抽调兵力投放到朝鲜战场。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将军惊呼“美国在欧洲的防御兵力已被抽空，仅仅成为象征性的摆设”。为了保密起见，中情局始终没有把纳尔森的这一发明透露给英国人。

三、颠覆“铁幕国家”

第一次柏林危机

——战后期，盟军向德国进攻，苏联占领了德国的东部，约占领土的1/3，西部成为美英法三国联合占领区。正如斯大林所说：“此次战争非同以往。谁攻占一块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加之于它。军队所到之处，各自建立自己的政权，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德国分裂的命运从此注定。

然而，作为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情况却是特殊的。根据雅尔塔协议和战后的有关文件，柏林虽为英美法苏四国占领，但有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民主政府，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不过，任免市政府领导人需经盟国城防司令部批准。

1947~1948年间，西方三国合并其占领区，成立联占区，并实行币制改革，特别是西柏林市议会选举恩斯特·洛伊特为市长（此人早年参加共产党，后脱离而加入社会民主党），触犯了斯大林。苏联拒绝选举结果，并于1948年6月24日对西柏林实行全面封锁。柏林地处东德腹中，西柏林实际上就是一块飞地。一时间，西柏林与苏占区的陆路、水路交通均被切断，三国驻军和200多万居民被断绝了燃料和食品供应。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斯大林真是大手笔，不做则已，一做惊人！

6月26日，西方三国，主要是美国迅即建立“空中走廊”，日以继夜地向西柏林空运生活必需品。

斯大林随即在东德集结兵力40个师施以威胁，盟国虽然在西德只有8个师驻军，美国针锋相对，将载有原子弹的三个战略轰炸机大队调到英国，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反措施，西方三国同时也封锁了苏占区与西占区之间的交通运输，并禁止进口东方集团的全部出口产品。

对峙了一年多，苏联最后同意解除封锁，四国军队各自撤回原地。

在危机期间，西柏林完全靠美国人的飞机维持生存。从1948年6月26日至1949年9月30日，运送生活物资共计2323738吨，耗资2.24亿美元，55名飞行员遇难，一百多架飞机坠毁。

就在封锁期间，柏林市议会换届选举（每年12月5日为选举日）。但早在11月30日，东柏林先发制人，宣布成立“临时民主政府”。这样，市议会换届选举只能在西柏林举行。义愤填膺的人们再次推选洛伊特任市长。

从此，柏林正式分裂为两部分，东部实行社会主义，西部选择了资本主义。“一城两制”就这样诞生了。

1949年，联邦德国在西部占领区成立，民主德国在东部占领区成立。两德都将柏林视为自己的首都。

第一次柏林危机正式拉开了东西方对峙的序幕。

就在危机期间，“欧洲的紧张局势使白宫下决心摸清斯大林的动向，以便对预期的战争有备无患。”中情局与西方盟国情报机关联手对“铁幕国家”展开了全面的隐蔽行动。

流亡者组织

——战结束后，斯大林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苏维埃帝国”。然而，在这个帝国内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中情局的威斯纳把斯大林统治下的130多个少数民族视为“130多个炸弹”，有朝一日将把苏维埃帝国

炸得支离破碎。

20 世纪上半叶，苏联和东欧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难民潮。

20 世纪 10 年代末至 20 年代初，正值苏联内战时期，大批难民和流亡者涌向西方国家，在那里定居，并成立了许多流亡者组织。

40 年代中后期，随着二战结束苏联对新领土的进驻，生活在当地的少数民族或者被驱赶到西方，或者被整体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波罗的海沿岸到东欧平原大批的民众被迫向西逃亡，来到或经过德国以求避难。在这第二次难民潮中，又有一些流亡者组织相继产生。

这些流亡者团体有许多实际上就是反苏维埃政府的地下组织，他们大都在苏联或东欧国家里有自己的内线网络，还有传递情报的地下渠道，这些流亡者组织与中情局、英国的军情 6 处、法国的对外安全总局、西德盖伦的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情局与流亡者组织进行三方面的合作：1. 挑选、招募和训练间谍；2. 开展对东方的宣传战、心理战，例如建立“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向“铁幕”地区施放携有反共宣传品的气球，印刷和出版反共宣传品等等；3. 对苏维埃帝国开展秘密行动。

苏联被称为“铁幕”国家，因此中情局千方百计地向流亡者和其他了解苏联的人搜集情报，当然，提供情报者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于是，跑情报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不少“造纸厂”和“情报公司”（指那些专门制造假情报的机构）。一位流亡者告诉盖伦的手下人，中情局所购买的情报有十分之九是伪造的。但中情局别无它途，只能同流亡者打交道。“因此，揭露和搞垮‘情报公司’、‘造纸车间’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项旷日持久的任务。”

在德国边境，中情局政策协调署在美国陆军的帮助下，对蜂拥而来的难民和流亡者进行甄别审查，并从中招募特工人员。西德盖伦的情报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深入到难民营和已经定居的难民中筛选物色“合适的材料”。

中情局和英、法、西德情报机构将招募的间谍，加以训练后遣返回国，或参加当地的暴乱，或作为“早期战争警报站”潜伏下来。

然而，空投到敌区的谍报人员（一般都携带电台）几乎都被抓住了，克格勃第二局往往让那些落网的谍报人员继续发报，充当“媒鸟”。而几乎所有被捕的、并充当“媒鸟”的谍报人员都用控制信号将自己被捕的消息通知了中情局设在德国的基地。中情局“对克格勃的方针是，奉陪到底，尽最大努力保证被捕人员的生命安全。”

通过水路或陆路进入“铁幕”的特工人员也很少有生还的。可以说，中情局与西方情报机关在这一时期的颠覆活动遭到了彻头彻尾的失败。

乌克兰

在战后的几年里，乌克兰反对斯大林政权的抵抗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中情局借此机会派人潜入乌克兰地区，煽动和支持那里的人们与政府对抗。政策协调署主任威斯纳还成功地策划了一起鼓动大批医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叛逃西方的行动。

1946 年 7 月，苏联最优秀的军事统帅朱可夫调任敖德萨军区司令。一般人认为，这是朱可夫“失宠被贬”的迹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1947 年美国国务院情报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乌克兰的反政府武装活动猖獗，人数众

多、规模很大；在 1946 年冬天的一次暴乱中他们甚至烧毁了敖德萨的共产党总部；1947 年 3 月，乌克兰游击队在战斗中还击毙了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朱可夫在乌克兰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展开军事行动，平息乌克兰人和哥萨克人的激烈反抗。由此可见当时乌克兰的局势相当严峻。

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苏维埃政府出动了整团、整师的公安部队进行围剿，数万乌合之众土崩瓦解，到 1947 年 4 月，匪情就得到了基本控制。1952 年乌克兰叛匪遭到毁灭性打击。

1953 年 11 月，“中情局训练的两名报务员与这些残存的抵抗部队坚持到最后一刻。”

波兰

在威斯纳的眼里，东欧集团国家稍微容易渗透一些。在史密斯—杜勒斯掌管中情局的早期岁月里，中情局在波兰建立了庞大的地下间谍网。在波兰的美国间谍使用秘密电台、隐显墨水和其他传统的谍报方式将报告发回在西柏林的上司那里。那些波兰间谍不断要求增加谍报人员和更多的黄金，有时还有一个间谍溜出来直接汇报工作情况，并要求提供更多的援助。

直到 1952 年底，中情局才发现，这完全是一个骗局。波兰的秘密警察几乎从一开始就接收了整个情报网。中情局在波兰并没有真正的地下组织。波兰人把这项活动搞下去是为了吸引反共的波兰流亡者回国。回国后，他们立即被投入监狱或被控制使用。在波兰的秘密行动中，中情局被骗去了几百万美元的黄金（折合现今币值 3 千多万美元）。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是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一个小国。在这里，“地理环境具有决定性因素”：1. 秘密基地距离很近，利于调动；2. 阿尔巴尼亚仅与希腊和南斯拉夫为邻，而它们都在 1949 年前与苏联反目，因此，阿尔巴尼亚与苏维埃帝国是隔绝的；3. 阿尔巴尼亚在亚得里亚海岸的不冻港战略地位重要，是控制地中海中部的关键所在。

英国最先开始对阿尔巴尼亚实施秘密行动。英阿两国之间的芥蒂始于 1946 年，当时英舰遭到阿方炮击，后来又有两艘英国驱逐舰被阿方水雷击沉。1949 年 2 月，英国政府批准了“这个旨在将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集团分离出去的行动计划——‘宝贵的行动’。”

3 月，英国秘密情报局和外交部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寻求支持，中情局积极予以响应。威纳斯指定他的副手 F·林赛作为秘密行动的领导人。

他们招募了几百名阿尔巴尼亚反共流亡人员，在马尔他和塞浦路斯的营地进行训练，然后将他们空投到阿尔巴尼亚山区，或用船将他们送往希腊科孚岛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偏远的沿海地区。“宝贵的行动”从 1949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954 年，进行了将近 20 次秘密渗透活动，前后派遣近 500 名特工人员。然而几乎每次入境的一队人马都遭到预先埋伏好的公安部队围攻，彻底覆灭；空降的特务一到地面，迎面而来的就是无数支枪口，在阿尔巴尼亚特工部门的强迫下，这些报务员向基地发报要钱要物。当计谋被识破后，这些“媒鸟”也就死到临头了：他们被游街示众，经过“暴风雨般的拳打脚踢”以及漫天唾沫的洗礼后，终于在绞架下结束了多灾多难的生涯。

最惨重的损失是，中情局在 1953 年 5 月将英国秘密情报局一名“最出色的特工”马加尼空投到阿尔巴尼亚去送死，此人曾经 15 次成功地潜入阿尔巴尼亚执行秘密任务，第 16 次被霍查的秘密警察诱骗上钩。马加尼于 1954 年

4月被处死，实际上宣告了秘密行动的终结。

1954年夏，中情局东南欧处处长J·H·理查森奉命清理“宝贵的行动”这一烂摊子。他飞抵罗马，正式通知中情局驻罗马站站氏J·莱布：“阿尔巴尼亚的秘密行动即将结束。”

“那么，全完了？”莱布问。

“全完了。”

“我不敢想象伦敦知道了会怎么说。”陪同理查森的一名助手注意到工作过度的莱布脸上的胡茬挂着晶莹的泪珠……。

波罗的海沿岸

——战结束时，在德国劳工营和德军中幸存下来的立陶宛人有一半留在西方，有5000人逃往西方成了难民，另外有15万人移居波兰。1944~1945年，被苏联处死的人数与逃亡的人数基本相等。斯大林将东普鲁士港口并入立陶宛后，归并过来的德国人后裔使立陶宛人口有所增加，他们也像立陶宛人一样敌视俄国人。

1946年春，立陶宛的“联合民主抵抗运动”招募了40000多人武装与苏联80000多人的秘密警察和正规军展开游击战。1947年，立陶宛反政府武装减少到25000人。1948年，苏联强迫推行农业集体化，反政府武装力量又恢复到30000人。游击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缓了立陶宛集体化的速度，只达到62%，但它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1950年，反政府武装只剩下5000余人。

从1948年开始，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反共武装。威斯纳的政策协调署主要依赖西德格伦的情报机构开展活动。

“从一开始，格伦的组织就起着决定性作用。格伦手下的特工人员替政策协调署在难民营和定居德国的波罗的海难民中招募人员。代号为‘奥格’的小组负责筛选、甄别对象，并将他们推荐给美国人。”初级训练在德国完成，被选中的新手还要到美国学习像跳伞、收发报等特别课程。

人力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单是在西德，战后涌入的定居者就有4000多名爱沙尼亚人、11000名拉脱维亚人和5000名立陶宛人。中情局还在旅居美国的流亡者中直接招募特工。

在波罗的海一带实施的秘密行动，主要从海路进行渗透。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认为这种方式比空降更可取：空降噪音大，容易引起飞行沿线上苏联人的注意；乘船登陆可以无声无息，有利于隐蔽。

英国有一支海上渗透力量，这就是由皇家海军组成的波罗的海渔业巡逻队，其表面工作是保护当地渔民不受苏联军舰的干扰，同时搜寻和排除战争期间遍布波罗的海的水雷。格伦的情报组织奉命组成秘密船队，使用英国人提供的渔业巡逻队的“E型”船只，并悬挂英国海军军旗，由中情局提供经费。这些人为美国效劳，按合同规定在最初筛选阶段付给他们德国马克，在美国受训的3个月中每周付125美元。其后，在“铁幕地区”内每呆一天，报酬为100美元；如果他们的行动成功，还有1000美元的奖金。据称，参加秘密行动的人有半数左右保住了性命，但绝大部分行动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麻烦”。

1951年以来，中情局与数家西方情报机构合作，派遣特工人员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沿海地区登陆。然而，这里的反叛活动此时已近尾声。1950年2月，拉脱维亚游击队在最后一场战斗中损失殆尽，只剩下一些零零散散

的残余武装；爱沙尼亚那一伙人则弹尽粮绝，虽然收到两箱武器和新派来的几名特工人员，但解决不了给养困难；立陶宛的叛乱组织于 1952 年被迫解散，有几支小队伍依靠中情局的援助继续与苏联人周旋，直到 1960 年还有关于逮捕反动武装分子报道，到 1964 年还有关于击毙残余匪帮的报道。

1955 年底，英国不再允许德国船只使用英国海军军旗，这样，船队就失去了掩护。于是在 1956 年，中情局与格伦的情报机构停止了秘密行动。

在波罗的海诸国的叛乱行动中，双方总计损失了将近 10 万人。

消失了的伊凡

在进入“铁幕”，国家的众多间谍中，伊凡是屈指可数的一个幸运儿。他没有被抓住，却永远地消失了……

现在我们就来讲述伊凡的故事

伊凡·彼得洛维奇是个来自乌克兰北部维切布斯克郊区附近一个拖拉机站技师的儿子。他前些年住在奥尔沙，大约一年半以前逃到了德国美占区。他对流亡营的生活已经厌倦，迫切希望进行一次冒险。中情局在俄罗斯难民营中的监视人员选中了伊凡。

经过对十来个招募对象进行考察和比较，伊凡被中情局带到难民营附近的一处安全住所。这房子是专门用来对招募对象进行考察的。在这里，伊凡经历了一系列极其严格的考察。其中包括全面体格检查、肌腱协调和心理稳定试验、语言模仿能力和学习使用机械的能力测验等。医生和心理学家一直把他折腾了 3 天。

中情局的一名俄罗斯顾问又进一步把伊凡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盘问了一番。他居住的每一个地方、干过的每一件事、认识的每一个人以及他回到苏联后谁会认出他来等等，什么都问。还向他提出些怪问题，长时间地对他进行毫不客气的询问，用测谎器测了他好几次。这一切不仅是为了考验他是否忠诚老实，而且是为了试验他的应变能力，也是为了加深他对假经历的印象。这些假造的经历在他执行使命时可能用得着。伊凡以最高分数通过了初步考核。这时候，他才见到了那两个最后拍板定案的特工人员——

山姆是个美国人，曾经执行过一次集体使命。他的同伴叫弗雷德，战争期间学会了俄语，完全可以冒充一名莫斯科地区的俄罗斯人。那一天，他们三人凑到一起，惬意地聊天。山姆和弗雷德为伊凡的精神和热情所感动，同意让他跟他们一道执行奥尔沙使命。他们把他带到巴伐利亚南部一个湖泊岸边的一所与外界隔绝的小木屋。

下面是伊凡在受训第 7 个月中一天的情况。

早晨 6 点半，山姆将伊凡唤醒。然后，两人身穿部队工作服，从容地穿过屋后的树林，悠然来到湖边，然后又折回小屋。他们不用厨师，烹调由弗雷德负责，早餐很丰富，有咸肉、炒鸡蛋和炸土豆。吃完早饭，为时两个钟头的“飞机标识”识别课就开始了。他们仍在进行观察与报告的训练。接连三天，课程内容都是识别苏联飞机。苏制飞机的照片和轮廓影像在伊凡眼前一闪而过；他随即说出该飞机的识别标记。伊凡此时此刻已经完全娴熟自如了。第二课时用来讲评伊凡的报告。这报告是伊凡在半英里以外对附近的一座美国的机场观察了 3 小时以后作出。他对机场跑道的长度、机场建筑物的方位、飞机起降的频率等都作出了估计，并作了仔细的订正。

教授每周来讲课一次，时间是上午 10 时。他是一位前红军上尉，当过中学历史教员。他也是现代苏联国内问题专家。伊凡离开苏联已有两年之久，

教授的人物是使伊凡能够适应显示。他向伊凡介绍无轨电车票价、面包价格、有关寻找工作和变换职业的最新规定等等。他们谈论大城镇的黑市商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关于证件和电台部件方面的事。他俩一道浏览《真理报》的最新剪报，其中有关于乘坐火车在城市间旅行的规定以及对业余摄影的限制。他们还相互交流一些俄国的时兴土语。

午饭后的两个钟头用来学习无线电通讯。伊凡在附近一座空军基地听课，每天在那儿练习，前后计一个月。然后就一直在家练习。他吃力地把庞大的 RS—1 型收发报机提进起居室，放置在桌上，向基地发出呼叫，他已经把关于美国机场的情报译成了密码。现正在把它发回基地。从基地发来了回电。但是，伊凡老是打断对方说：“太快了，太快了，”他发报的速度极快，而收报的速度却较慢。

最后，他终于取下耳机，将基地来电译了出来。此后的半小时，他用筒式磁带录音机听一段电文录音，以训练自己的听力并提高收报速度。

训练结束之前，他要学会拆卸那台 RS—1 型收发报机并自行小修。他是一个天生的机械师。他那唯一的一架电台是用废旧电台上拆下来的零部件七凑八拼，再加上个网状天线装配而成的。

下一步是教授伊凡摄影术。他们一连好几天用一架伪装成打火机的米诺克斯牌照相机在门外拍照。今天，他俩又漫步到湖边，照了几个远镜头：一艘帆船、一座湖边小屋和一辆停着的奔驰牌小轿车。当晚，将由伊凡冲出底片。

晚上的课程是轻松的，然而却是重要的。证件专家阿尔特是晚饭后到达的。他比克格勃官员们更加了解苏联的各种证件。他知道各种不同的证件是用什么纸张制作的，是用什么油墨印刷的。他掌握着几十个合法的证件填发官员的亲笔签字。他了解各行各业的各种不同证件以及全国各区通行证的款式。

阿尔特集中力量为伊凡即将在德国度过的两年杜撰出在苏联生活的详细经历。他和弗雷德，再加上伊凡本人一道商量着既适合伊凡的年龄和能力而又能搞出证明材料的职业的住址。他们初步决定，这两年是在乌克兰北部的一座大坝建设工地上度过。

晚上 10 点半，一天的课程结束。第二天，伊凡将去附近一座军队大炮射击场进行第三次飞机跳伞。

经过 10 个月的精心培训，伊凡一切按时准备就绪，整装待发，执行空降任务。他浑身上下都穿戴着苏联或东欧国家的产品，怀里揣着几块手表，以备变卖或作贿赂。他还带着一些驻德苏军可能拥有的面值 5 元的美钞。一旦进入苏联，除了手提箱里的电台外，伊凡是“一干二净”的。

在 9 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 C 47 运输机把他空投到离一座村庄 3 英里的旷野里。这个村庄附近有个火车站。给他的指示是，一着陆就把降落伞埋起来并在黎明之前到达火车站。火车将于清晨 7 点 20 分进站。伊凡在空降后 36 小时内发来了电报，说他已安全到达。空投区没有发出防空警报。他平安无事地到达了维切布斯克郊外。电文中未见有威胁信号。

在随后的 3 个月里，伊凡共拍来 5 封电报并向西德境内的地址发出 3 封密写信件。他在一个修路队打了一段零工（谁都知道，重体力劳动的工头们对身份证和劳动簿之类的玩意儿毫不在乎）。然后就在一家名叫“斯大林之路”的罐头工厂找到了一个电气师的职位。他把电台藏在离飞机场两英里的

一个树林中，坚持每周散步一、两次经过机场旁边。他拍来 4 封电报，报告在机场观察到的情况。但一年来，机场上未见什么异常活动。

他在最后一封密写信中说，他在黑市上买了一套证件，从而获得了合法身份。他感到，使用电台已日益危险；由于机场仍然渺无动静，他决定停止发报。

伊凡完成了他的主要使命：提前预报奥尔沙空军基地对西方国家进行的战略打击。至于并没有什么早期警报可发，则是多年以后才弄清的。

*

*

*

1953 年，中情局参加秘密行动的官员与杜勒斯谈到了几年来在东欧所遭到的挫折时，这位局长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意味深长地叹息道：“我们至少正在取得进行下次战争所需要的经验。”

四、朝鲜战争

美国入侵朝鲜

1945年8月，美、苏军队分别进入朝鲜南部和北部接受日军投降，并以北纬33度线作为美国与苏联军事占领区的临时分界线。朝鲜由此开始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三八线对于美国来说，其真实含义就是要阻止苏联借对日作战的机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把欧洲确定为战略重点，西欧成为遏制苏联的最前沿。“欧洲第一”是美国的传统国策，是它全球战略的基石。

在亚洲，美国注重中东、日本和菲律宾；台湾和南朝鲜都被划在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之外，但美国大大提高了它在朝鲜半岛存在的政治意义，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美国对南朝鲜李承晚政府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在全球战略中，美国认为朝鲜半岛不很重要。

1949年5月和6月，美军分别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它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1950年1月，国务卿艾奇逊在谈到朝鲜半岛时说，如果南朝鲜人遭到进攻，一是要依靠南朝鲜人自己起来抵抗，二是依靠联合国的集体行动。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战时设想的由美苏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已经转变成依靠“联合国行动”来保卫南朝鲜抵御苏联的进攻。这项政策针对的目标及其为达到目的而设计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美国必定要干涉朝鲜战争，以及它干涉朝鲜战争的方式和规模。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在朝鲜已进行了至少两年的秘密行动。“在高峰期，这些行动涉及2000名武装特工渗入朝鲜共产党占领区。”

1950年初，中情局在一份汇报中说：“尽管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完全可能发动大规模干涉，但现有事实表明，除非苏联决定打全球战争，这种干涉在1950年不可能发生。”中情局负责秘密行动的官员们认为，“战争不可能在亚洲爆发，只能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发生在欧洲，而且任何战争必将涉及到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全面对抗；目前威胁美国远东利益的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颠覆活动”。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华盛顿可以说普遍的。直到1950年6月，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陆军部还一致认为，尽管南朝鲜只有11万民团、警察和少量的正规军，而北朝鲜拥有180架军用飞机，近200辆T-34坦克和15万正规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这种进攻看来并非迫在眉睫”。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于27日夜，攻陷汉城。

6月26日晚，杜鲁门总统接到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报告说：1.南韩军队已无力防守汉城，溃在旦夕；2.美国随属人员正在撤离朝鲜。

当晚，杜鲁门通过电传向麦克阿瑟下达指示，授权他使用远东海空军部队支援南韩，攻击三八线以南的任何目标。6月27日，美国空军战斗机从日本基地起飞，击落7架朝鲜攻击机。同一天，白宫宣布，美国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海峡两岸动武，实际上是将我国领土台湾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下。此前，杜鲁门政府曾一度公开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持中立态度，无意干涉。

6月27日夜，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联合国成员国为

韩国提供足以击退武装进攻的援助，以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为美国先斩后奏的军事行动提供“合法”依据。而苏联，却别有用心地不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放弃使用对这一决议的否决权，使美国得以利用联合国军的名义出兵朝鲜。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1.从日本派遣两个师赴朝参战；2.对朝鲜北部实行海上封锁。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英国、法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希腊、泰国、新西兰、菲律宾、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南非15个国家出兵参战，美英等国的航空母舰和数百艘战舰封锁了朝鲜半岛海面，对朝鲜人民军轰炸炮击，实施敌后遮断，并利用舰炮支援沿海的美韩军队作战。

美国驻日本的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被授予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头衔，坐镇东京遥控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是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

到了8月份，美韩军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朝鲜人民军。但是，沃克将军仍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防线处处吃紧，纷纷告急，手头的机动兵力早已告罄。

为扭转被动局面，美军计划在朝鲜人民军进攻路线的侧后方——仁川实施登陆。为此，中情局派遣特工多次潜入仁川地区侦察，了解驻军部署、火力配置以及仁川港的水文资料（那里的潮汐落差相当大）。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25000名美军在仁川登陆（登陆人数后来达到5万）。28日，登陆美军攻占汉城，致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后方给养和北撤路线均被切断，13万人民军陷于合围之中。经过浴血奋战，仍有几千名朝鲜人民军官兵冲破截堵，撤回“三八线”以北。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从朝鲜战争爆发之日起，美国首先担心的是苏联出兵，同时它又怀疑苏联是通过朝鲜战争声东击西，意在欧洲动手。此时的苏联为了巩固在东欧的既得利益，在欧洲驻扎了20个精锐师团，这百万苏军对美国 and 西欧各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以说，美国对于苏联的种种忧虑贯穿于整个朝鲜战争的始终。

中情局在8月10日的一份总结中指出：“整个苏联阵营的趋势是，战争的准备在继续。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战争计划的某部分正在急迫地加速实施”。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正从消费品生产转为军工生产，苏联的米格—15战斗机已在匈牙利出现，东方国家集团粉碎了国内反对派。中情局相信，到1952年，苏联将完成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中情局的这一观点与白宫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是相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在战后对苏联军事实力一直估计过高的倾向。

抗美援朝

10月3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捎话给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则认为“潘尼迦是共产党的走狗，他的话不可信。”实际上，华盛顿把中国这一警告视为“虚张声势”。美国和西方的报界则喧嚣：当初北朝鲜军队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时，东方国家为何不谈停止战争，和平解决呢？10月5日，中

情局获悉，有 3 个师的中国军队进入了北朝鲜，“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可能公开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预测没有引起注意。“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不堪一击”，“当年日军一个连象驱赶羊群一样打散一个师的中国军队，而美国打败了日本，”因此“中国远非美国的对手。”10月3日，南韩军队沿东海岸进入北朝鲜。10月9日，美、英和南韩军队从西路越过“三八线”。

麦克阿瑟决定兵分两路进攻北朝鲜：沃克的第 8 集团军从西线进攻，原先登陆的美军第 10 军从三八线附近返回仁川，重新上船到北朝鲜东海岸的元山港登陆，从东线向平壤展开侧翼进攻。这个计划遭到了战场指挥官们的反对，他们指出，这是舍近求远，华而不实的计划。最现实、最简捷的方式是，第 10 军直接越过三八线，沿中路和东路进攻，处在它后面的第 8 集团军随即压上，沿西路进攻。然而，骄横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由于他指挥仁川战役获得成功，此时他的头顶仿佛高悬着灵光圈，他说的话就是真理，绝对正确。白宫的决策者们谁都不愿出面否定他的主张，招惹麻烦。于是，第 10 军把原先搬上岸的补给品重新搬回船上，忙碌了 1 周之后总算启程了。

10 月上旬，第 10 军抵达元山港，结果被水雷毁伤舰船十多艘，在港外徘徊了 8 天才勉强登陆。此时，沿东海岸进攻的南韩军队已经徒步抵近平壤。从军事角度来看，麦克阿瑟的进攻计划纯属花架子，致使战役追击前后耽误了整整 15 天的时间，而且导致兵力分散，事实证明他的计划造成了最大的军事失误。但此入有个特点：虚荣心极强，死要面子，从不认错；功劳归自己，错误属别人。他甚至狂妄到了不着边际的程度，简直和尼采一样——“我就是太阳！”

需要提及的是，为了保证第 10 军顺利登陆，麦克阿瑟秘密雇佣了日本海军的 8 艘扫雷艇参加元山港的扫雷行动，这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

1950 年 10 月 20 日，美国 5000 名伞兵在平壤以北着陆，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23 日平壤失陷。联合国军以南北夹击之势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

在仁川登陆后一个月内，联合国军手中的战俘数量达到 135000 人以上。麦克阿瑟声称，“目前北朝鲜境内的敌方正规军已不复存在，只剩下零星的游击队，因此美军的任务是肃清残余武装，在整个朝鲜半岛恢复和平秩序。”

尽管中国方面多次向美国发出警告，而且美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捕获了一些志愿军战俘，但是中情局、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以及麦克阿瑟本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中国是“说大话、吓唬人”，“中国军队不会正式介入”朝鲜战争。此时的麦克阿瑟得意忘形，向美军官兵许愿说，再过两个月大家就可以回国欢度圣诞节了。

根据已掌握的情报，美国统治集团估计我参战有 3 种可能：1. 为保护边境和鸭绿江水电设施的安全；2. 为从战略上钳制和削弱美国的军力，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消耗战；3. 为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中情局和美国军方认为第 1 种可能性最大，因为在它们看来，“中国军队在缺少空中和海上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可能有效但未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现正在援助越南，10 月末进军西藏，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共的意图是在朝鲜进行全面干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对与美国交战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害怕；反共势力将得到加强，从而危及中共的存在；如果中共在未得到苏联海上和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参战，必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另一方面，中国接受

了苏联的援助，会更加依赖苏联，这就会增加俄国人对满洲的控制；此外，从军事角度看，最有利的干预时刻7、8、9月份已经过去（指美军退守釜山滩头阵地的有利时机和在仁川登陆的关键时刻），”结论是：中国不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内不会。

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机构认为，“中国尚未从国内战争中恢复过来；广大地区尚不稳定；军队装备低劣；大部分军队被极力叫嚷反攻大陆的台湾蒋介石的军队所牵制，因此无力增援，即使调动增援部队，不可能不被发现”。美国远东军司令部10月14日的报告也反映了这种观点。

195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至11月25日的10天内，痛击了分兵冒进的美韩军队，歼灭韩国第6师大部，重创美军第1骑兵师，粉碎了敌人企图在“感恩节”前后占领朝鲜北部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朝鲜人民军赢得了整顿的时间，取得了入朝参战后的第一次战役胜利。

此时，中情局和美军情报机构对志愿军实力不知底细，他们根据对志愿军战俘的调查，估计“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只有3~5万人”。中情局甚至将几名战俘空运到汉城，使用测谎器审讯，后来得出“中国军队可能有9万人”的结论，但对这一结论连自己都感到“惊人、难以置信”。同时，中情局为“中国东北地区集结了几十万军队”而感到不安。

11月8日，中情局奉命提交了一份题为《国家情报预测——中国干预北朝鲜的程度和目的以及中国的能力和意图》的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干预“是一种目标有限的过渡性军事行动”，如能击退联合国军，它将追求更大的优势，否则就把美军拖在朝鲜；如果中国本土受到攻击，它将全力以赴地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但这份基调谨慎的报告对中国干预的目标、规模和能力等一些决策中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11月9日，白宫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最后决定在未判明中国出兵意图之前，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北朝鲜的原定计划。对于麦克阿瑟，“在军事方面他可以相机行事”，并批准他轰炸鸭绿江上所有在朝鲜一侧的桥梁。而麦克阿瑟的胃口更大，妄图一口吃掉在朝鲜北部的中朝军队。

11月8日，东线之敌急进古土里、吉州，并企图迂回江界断我后路；西线之敌沿清川江北进。我军以部分兵力节节阻击，诱敌深入，并实施战役迂回，对东线敌人的退路预先实施了多重截断。11月26日，麦克阿瑟的亲信、军事情报部长威洛比还颇为自信地说：“敌人仍然如此没有攻势，并实施撤退，也许要到鸭绿江对岸避难去了。”然而他所不知的是，此时美军在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只有3万多人（其余都在担负防守据点和交通线的任务），他们面对的是“兵力占有空前压倒优势的对手”。

11月25日，志愿军发动进攻，激战至12月24日，歼灭韩国两个师的大部，美陆战第1师虽突出重围，但伤亡惨重（伤3504人，亡718人，失踪92人）。西线之敌主动放弃了平壤等地，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南；东线美军，除襄阳一地外，也全部被我赶到“三八线”以南或从海上撤退，第二次战役遂告结束。此战迫使敌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彻底粉碎了美国并吞朝鲜的野心，沉重打击了美韩军队的嚣张气焰。

麦克阿瑟气急败坏地叫嚷“我们遭到了15万不宣而战的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第3天，他又声称遭到了20万中国军队的攻击。过了没几天，他在向华盛顿的报告中说他面临30万中国军队压倒优势的袭击，因而遭到严重损

失……并指责说：“11月，我们这里的中央情报局说，他们觉得中国军队不大可能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干涉……现在你们必须知道，一个局限于小地域作战的指挥官没有得到一个国家即将发动战争的情报。这一情报本来是应该报告给我的。”麦克阿瑟这番话显然有推诿责任的味道。

事实上，关于中国是否出兵以及何时出兵的问题，中情局一直充当事后诸葛亮。在回答记者有关这些问题的提问时，前局长希伦科特声称中情局事先都知道。记者追问道：“既然中情局事先知道情况，为何没有警告白宫？美军为何遭到突然伏击？”希伦科特结结巴巴答不上来。后来中情局在美国国会调查麦克阿瑟被解职的听证会上透露，提供有关中朝边界军事形势第一手资料的关键人物是一名中情局特务，他是一名前国民党高级官员。1950年夏天，他被派往中国大陆，对中国北方的军事形势做出估计。他匆匆忙忙与尚能找到的人进行联系。根据谈话和他自己的实地观察，他相当精确地计算出驻扎在中朝边境沿线的中共军队的人数和驻地。他的详细报告，加上其他国民党人士提供的消息，“足以警告联合国军，中国军队即将于1950年11月跨过鸭绿江”。杜鲁门总统在其公开声明中，毫不隐讳地说，他“曾看到并读过一份这样的报告”，并以此指出麦克阿瑟对于美军遭到中国军队重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中情局对我方动态决非“事先都知道。”光是我方出兵的时间，就估计晚了一个多月。

不过，1951年中情局在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分析报告倒颇有见地，报告说：

中国军队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在战场兵力对比上占有压倒优势；中国军队刚刚打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这支军队吃苦耐劳，擅长夜战和山地作战，其战斗力相当强大；中国军队的弱点是，战术比较单调和死板，后勤供给和运输能力差，特别是在美国空军的轰炸下，中国军队所得到的物资补给充其量不到其最低需求的30%；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陆战中缺少火炮和弹药，在火炮、坦克等方面的火力远远不及美军。中情局特别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很差，有30年代日本和德国制造的、还有苏联在二战中淘汰下来的破烂货，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不足；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表明，苏联对中国军队的支持“并不是很大方的”，“远非尽心尽力”；苏联并非希望中国打赢，至少不希望马上打赢，“苏联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苏联所愿意看到的结果是：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两败俱伤。”

苏联出兵否？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从朝鲜战争爆发之日起，美国首先担心的是苏联出兵，同时它又怀疑苏联是通过朝鲜战争声东击西，意在欧洲动手。此时的苏联为了巩固在东欧的既得利益，在欧洲驻扎了20个精锐师团，这百万苏军对美国 and 西欧各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以说，美国对于苏联的种种忧虑贯穿于整个朝鲜战争的始终。

中情局在8月10日的一份总结中指出：“整个苏联阵营的趋势是，战争的准备在继续。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战争计划的某部分正在急迫地加速实施”。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正从消费品生产转为军工生产，苏联的米格—15战斗机已在匈牙利出现，东方国家集团粉碎了国内反对派。中情局相信，到1952年，苏联将完成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中情局的这一观点与白宫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是相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在战后对苏联军事实力

一直估计过高的倾向。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朝鲜人民军空军的空中战术力量主要由2个团约150架攻击机和战斗机组成，飞机性能落后，飞行员也缺乏经验，因此其大部分飞机很快就被美军歼灭。

斯大林曾答应毛泽东全部由苏联航空兵进行空战。但到了10月10日，斯大林违背诺言，只答应由苏联航空兵进行部分而不是全部空战，同时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米格—15战斗机，借以弥补空中力量的不足。

经同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线，以保证志愿军运输供应（1950年12月21日，中国空军首批部队开始进入前方基地——朝鲜安东浪头机场，在苏联航空兵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实战练习）。

米格飞机的出现，对美国和联合国空军都是一个威胁，因此它们活动的区域尽管很小（约占朝鲜北部空域的二十分之一），却被冠以一个带有几分敬意的绰号——“米格走廊”。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至少派出了12个飞行师和7万多人的国土防空军到朝鲜轮流作战。其中国土防空军部队的大部分是地面防空部队。苏联出兵朝鲜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通过实战搞热身训练，使部队获得战场经验。

1951年初，美国在己方控制区域内发现被击落的米格—15战斗机残骸以及俄国飞行员的尸体。由此在美国军政界产生了苏联是否已经出动空军参战的争论，其实质是苏联是否已经出兵参加了朝鲜战争。美国军方认为苏联出动空军参战是确凿无疑的（麦克阿瑟和赴朝作战的美国将军们把这一观点作为要求白宫向朝鲜增兵的根据之一）；中情局认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苏联已经投入空军正式加入朝鲜战争；至于俄国飞行员尸体，则表明可能是个别的俄国人在帮助北朝鲜空军作战，但这毕竟个人行为，并不意味着苏军正式参战。美国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赞成中情局的看法。他们认定，苏联目前极力避免与美国正面交锋，因此他们不会做出与目的相悖的事情，同时，白宫认为，美国在朝鲜战场一直掌握着制空权，因此苏联飞行员是否参战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美国军方和中情局一致认为，苏联不能而且不敢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正面交锋这一点确实是说中了。

请看以下事实：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提到，在战争之初，斯大林突然把在北朝鲜部队中的苏联顾问全部召回。斯大林说：“那里太危险，不能让我们的顾问们驻在那里，他们可能成为俘虏。我们不能留下指控我们参与此事的证据。那是金日成的事。”此举导致了北朝鲜军队一开始就陷入困境。……

在朝鲜参战的所有苏军米格—15战斗机一律涂上朝鲜人民军空军的标志，苏军飞行员身着人民军军服，用朝鲜语进行无线电联络。为克服语言障碍，每位飞行员都发有一本小册子，上面用俄文字母标出常用朝鲜话的发音。为防止因被俘而暴露身份，苏军飞行员奉命只能在己方控制区域上空作战，即使飞机受伤，也要尽力向北飞，不许当俘虏，否则他本人及其国内亲属将面临严酷的后果……正是由于这一指令，一些苏军飞行员在飞机被击落、自己降落到敌方区域后被迫开枪自杀。

到了1952年，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开始变冷。此时，大多数空战任务开始由中朝空军来完成。而且斯大林拒绝向朝鲜战场派遣性能更先进的米格

—17 战斗机参战。此时，志愿军空军使用的米格—15 战斗机的性能已经不及美国新装备的 F—86 型战斗机。

1996 年初，美国新闻媒介报道，俄罗斯最近公布的一些朝鲜战争时期的官方文件表明，斯大林起初没有料到美国会出兵朝鲜，后来他让中国出兵，在中国出兵后，他又怕苏联与美国之间交战；他曾经考虑在盟国建立朝鲜流亡政府（通知中国方面，“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在武器援助方面，中朝两国向苏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俄罗斯公布的这些官方文件对于人们了解苏联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真实立场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隐蔽行动

中情局是在战争爆发后进驻南朝鲜的。特别行动部（OSO）以日本的横滨为基地从事地方情报活动；政策协调署以东京的情报站作为办公地点，由于当时它受中情局和国务院的双重领导，因此与特别行动处作为两个部门分头工作。

麦克阿瑟只对特别行动（包括准军事行动）饶有兴趣。他规定，中情局在他的辖区内应当主要从事秘密战争方面的工作，而且指挥权和控制权都掌握在他的亲信威洛比少将的手里。威洛比作为远东地区美军情报部主任，负责秘密行动和有关情报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中情局在朝鲜战争中，是作为麦克阿瑟属下的一个部门进行工作的，因此，中情局与军方在指挥权限问题上的矛盾相当尖锐和复杂。1952 年夏，中情局将政策协调署并入特别行动部之后，中情局在朝鲜的秘密机构才逐步摆脱了军方的羁绊。

中情局在朝鲜半岛投入了最多的特工力量，其中政策协调署人员占 70%。政策协调署在 50 年代初的主要使命“是在朝鲜、中国大陆和东欧实施隐蔽行动，优先的是准军事行动”。其中包括：战场侦察、捕俘、破坏我方交通线和军工设施，引导轰炸和炮击、空投特务，在南朝鲜配合军方围剿朝鲜人民军的游击队，……搞的还是二战时期的老一套。

在朝鲜半岛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中情局实施了一项秘密的“野风信子作战计划”。在这一行动中，“有成千上万的朝鲜难民被送往北朝鲜防线后方，并让他们想方设法跑回来。这样，就能够提供有关敌军调动的情报。”从北朝鲜返回的难民都受到详细盘问，要他们说出现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中情局得出的结论是，孩子们提供的情报最为可靠——由此可见“风信子作战计划”所得到的情报质量如何了。

中情局搜集朝鲜战场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是审讯俘虏，分析战场缴获的敌军文件，派遣特工人员进行侦察等等。

然而，“中央情报局所收集的情报很少有像样的东西，他们的报告经常是前后矛盾”，美国军方对此甚至不屑一顾。

总的说来，“美国情报工作在朝鲜战争中的纪录很糟糕”，特别是中情局在情报搜集方面并不成功，它的活动主要在军事方面。中情局驻朝鲜战时情报站站站长是艾伯特·哈尼，此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行动”。

1951 年 7 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举行。这时，在战略情报局昔日驻东亚的特务头子汉斯·托夫特的直接指挥下，政策协调署对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开展了“声东击西”的秘密行动。其中包括“在敌占区搜集情报、为被击落的飞机机组人员建立营救网络以及向朝鲜北部派遣 1200 人的游击队。”1952 年 11 月 29 日，中情局驻日本东京的教官唐奈和费克图以及 9 名台湾特工人

员从汉城乘飞机到我东北地区上空活动，目的是将这 9 名特工送到后，接回另外几个“在其他地区工作结束的特工人员”。然而时乖命蹇，飞机被我击落，台湾特务被全部处死，中情局这两名特工被判无期徒刑。1972 年，出于改善中美关系，我国政府释放了唐奈（此前，费克图在狱中自杀）。唐奈回国后，中情局局长科尔比还装模作样地为他授勋。

在“声东击西”行动中，“至少有 6 名间谍潜入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军基地，在那里密切监视苏联可能参与战争的任何迹象。”托夫特还派人切断了黄海海底电缆，这条电缆是我驻东北部队用来与北京进行联络的。此后，“中国人被迫使用无线电联络，这种联络受到美国陆军安全局的监听。”

托夫特最猖獗的行动是充当海盗。在一次代号为“斯托尔”的一次秘密行动中，他在公海上抢劫了一艘志愿军急需的药品和设备。这些药品，包括 3 个野战医院的设备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租用挪威货船运给中国志愿军伤病员的。起初，托夫特试图在货船驶入香港补充给养时进行破坏，但该船没在香港停靠。于是托夫特匆忙与台湾联系，出动不挂国旗的武装船只在台湾岛附近拦截了这艘货船。政策协调署的官员躲在甲板下面观察和指挥，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出头露面将货物搬走，然后让空船继续按照原来的航线行进，货船上的人还以为遭到了中国海盗的抢劫。为了这一行动，中情局给托夫勒 100 万美元。

政策协调署的另一个秘密行动是在 1950 年后期开拍一部电影，它是以战后被关押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的一名日本大佐所保存的日记为蓝本而拍摄的。这部电影在日本的 20 家影院上映，在一次短短的商业性连映中上演了 700 多场。中情局一算，净赚 104000 美元，这是反共宣传行动所得的一份外快。

中情局在朝鲜从事秘密军事行动的特工人员约在 800 名左右。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后来在菲律宾、越南、老挝、中东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充当教官，从事反游击战训练工作。

1950 年 10 月，史密斯接管中情局。他就任局长不到一周，即将政策协调署完全纳入中情局的管辖之下。1951 年 1 月，连任几届中情局局长非官方顾问的艾伦·杜勒斯担任计划司副司长，由他负责合并政策协调处和特别行动处的工作。不久，杜勒斯被任命为中情局副局长。

1952 年夏末，史密斯将政策协调署与行动处合并为计划部（后改名为行动部）。威斯纳任部长，赫尔姆斯任副部长。除了计划部、情报部这两大业务部门外，史密斯还建立了行政部，加强了预算、人事、安全和后勤工作。至此，中情局大体上完成了组织机构的建设工作。

尽管史密斯任职时间不长，但他为中情局建立了延续 20 年之久的基本结构和规模。10 年前多诺万建立统一情报机构的设想终于变成现实。

反情报（即反间谍）机构在战略情报局时期名曰“反情报活动组”，其主要职能是进行颠覆和煽动、散布谣言等。50 年代初，它被纳入到中情局行动处的范围。这些职能确切地说应该叫做“行动”职能而不是“情报”职能。

从 1947 年至 1953 年间，中情局的正式人员扩大了 8 倍，扩充的主要部分是秘密行动部门。1948 年，中情局只有 302 名工作人员，7 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 470 万美元。到 1952 年，它有 2812 名人员，3143 名合同人员，47 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 8400 万美元，并且很快就增至 2 亿美元。此时，在该局的工作人员中，约有 2/3 从事隐蔽行动，他们的经费占该局预算的 3/4，而且中情局的高层职务也大都由这些“行动”专业出身的官员所把持。

实际上，中央情报局应当叫做“中央行动局”或“中央颠覆局”。

由于局长史密斯、杜勒斯的努力以及朝鲜战争的影响，中情局从 1950 年的 5000 人迅速扩充到 1955 年的 15000 人，另有数千名合同雇员以及外国间谍。

70 年代，美国参议院丘奇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朝鲜战争的爆发大大改变了政策协调署（计划部的前身）准军事活动的性质以及该组织总的规模和能力。从 1950 年财政年度到 1951 年财政年度，政策协调署从 584 人猛增到 1531 人。这种发展大部分是由于远东地区准军事活动的增长……朝鲜战争确立了政策协调署和中情局在远东的管辖权，建立了中情局以后 20 年来一直使用的准军事基本力量。到 1953 年，这种力量的各种组成部分均已就绪——飞机、两栖船只和一批有经验的人员。在随后的 25 年里，准军事活动一直是中情局在远东进行的重大秘密活动”。

朝鲜战争之后，中情局的隐蔽行动军事化、全球化成为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对于中情局的这一倾向，甚至连一贯崇尚军事行动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都颇感不安。他曾多次提醒和告诫继任局长杜勒斯，要求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搜集、分析和评估情报资料方面”，因为“这是中央情报局主要和正常的工作业务”。然而，由史密斯、杜勒斯开始的“行动”势头并未被制止，相反，愈演愈烈，直至 60 年代初期的猪湾事件达到顶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情局的“行动”势头符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需要，而且正是艾森豪威尔本人把中情局作为执行隐蔽行动的工具运用于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当中。实际上，艾森豪威尔非常支持和赞同中情局从事隐蔽行动，他督促的本意是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即不能只抓“行动”而忽视“情报”。

五、原子机密

原子弹并非美国的专利

1949年9月3日，美国空军的一架B—

29型飞机正在北太平洋上空18000英尺的高度飞行。突然，高空中出现了放射性云层，飞行员把这一意外发现报告给地面指挥部，美国空军立即派出载有各种监测仪器的侦察机对放射性云层进行跟踪。一周后，美国侦察机随着放射性云层移动的轨迹，飞越加拿大和北大西洋，直至英伦三岛上空。此时，英国皇家空军也监测到有放射性云层存在这一奇怪的现象。

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上述发现向杜鲁门总统做了汇报。根据中情局、美国空军、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联合研究，鉴定的结论是：8月26日~29日，苏联在亚洲大陆某地试爆了一颗原子弹。1948年，中情局局长希伦科特在送给杜鲁门的一份备忘录中曾经预测，“苏联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最早日期可能是1950年年中，但最有可能是1953年年中”。显然，这是中情局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它成为日后希伦科特辞职的重要原因。1950年3月，中情局的情报估价室写出了第一份关于苏联拥有原子弹对美国安全影响的分析报告。中情局认为：苏联人虽然有了原子弹，但他们不可能马上发动一场“热战”；他们不会改变原来的目标和行动方式，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现在能直接给美国以致命的打击；目前，还难以精确估计出苏联拥有原子弹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影响；然而，苏联人一旦有了对美洲大陆直接威慑的能力，就增加了苏联可能以诉诸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危险因素，美国应意识到面临可能遭到苏联摧毁性打击的危险。

早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在一次谈话中佯装随意地说，美国已研制成功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原子弹。而斯大林则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礼节性地表示高兴，并希望“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在房间另一端仔细观察斯大林表情的美国驻苏联大使波伦和杜鲁门这两个牌场老手对此叹为观止（20年后，苏联的一些回忆录提到，就在这次谈话后，斯大林怒气冲冲地发出急电，命令主持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加快搞出原子弹。斯大林回到苏联后，还多次召见军需品人民委员库尔恰托夫，“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给我们原子武器”）。

苏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完全出乎西方国家的预料。杜勒斯和他的顾问们虽然认为苏联迟早要发展原子弹，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成功，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没有美国那样的工业力量，没有足够合格的科学家，没有必需的原料，最重要的是没有关键的技术知识，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产出原子弹呢？美国政界、军界、情报界的惊愕之情逐渐被恐惧和担忧所代替。他们揣测到，苏联的原子弹试验成功，绝非仅仅出于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反映了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取得了惊人和意外的成功。3年前，在莫斯科的一个长时间的招待会结束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醉醺醺地站起身来祝酒说：“为原子弹干杯，我们已经搞到了原子弹。”一个助手抓住他的肩膀，迅速将他扶出大厅。莫洛托夫的失言引起中情局的高度重视。所有事态表明，苏联的原子弹绝非白手起家。由此，一场秘密调查原子弹技术泄密事件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国务院里的“鼯鼠”

早在1945年9月，加拿大总理麦肯奇·金曾匆匆忙忙地访问了华盛顿。

在白宫，他与杜鲁门总统进行了密谈。麦肯奇告诉杜鲁门，1945年9月5日，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在加拿大使馆的密码员古曾科投靠了加拿大。他随身携带了100多份档案材料，并揭露了苏联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苏联已经建立了一个窃取原子弹技术的间谍网，至少有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被拉下水。“这并不奇怪，”杜鲁门对麦肯奇说：“既然他们在加拿大和英国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也必定要设法渗透到我们美国来。”随后，杜鲁门总统责令联邦调查局调查此案。

联邦调查局特工比尔·哈维专门从事反苏联间谍工作。他体魄健壮，嗜好酒色。他曾经对一个熟人讲，他从12岁开始，每天跟一个女人睡觉。哈维以牛仔气息浓厚而闻名。他表面上粗鲁残暴，在审讯时经常拿枪吓唬人，但头脑机智，聪敏过人，对间谍有着天生的灵敏嗅觉。哈维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他都记得很清楚，因此他被称为活着的传奇式人物。哈维自尊心极强，不愿仰人鼻息，这使他与胡佛和不来，在联邦调查局这个官僚机构中鹤立鸡群。哈维自幼生长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对老于世故的华盛顿社交界，他总感到格格不入。但是，让他从事抓间谍的工作，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得知，有一名叫伊丽莎白·本特利的妇女向纽约联邦调查局分局承认，她充当了苏联在美国和加拿大间谍网的信件传递者。哈维马上飞抵纽约，参加了对本特利的审讯。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审讯，本特利提及到苏联间谍网中的100多名人员。经过分析，其中有51名被联邦调查局内定需要立案侦查。哈维在审讯后写了一份报告，内中说：“在应该立案侦查的51名对象中，有27名在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任职，包括一名叫阿尔杰·希斯的国务院官员。”联邦调查局总部也认为希斯是最重要的线索。因为他已经是第二次被指控为间谍了。

早在1939年，苏联隐匿在美国的一个间谍集团的联络员惠特克·钱伯斯曾向国务卿助理阿道夫·伯利揭发希斯和他的妻子普里西拉，以及他的兄弟唐纳德都是苏联间谍。几乎就在同时，美国驻法国大使布利特也向希斯的上级、国务院远东科科长霍恩贝克当面发出警告：希斯可能是苏联间谍。

希斯是哈佛大学历史专业第2届毕业生，曾在最高法院任过职。伯利认为眼前这位循规蹈矩的国务院官员不可能同生活放荡不羁的钱伯斯同流合污，所以忽视了对希斯间谍案的调查。希斯的兄弟唐纳德曾在艾奇逊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又是艾奇逊的得力助手，当然谁也不会相信他是苏联间谍。伯利把钱伯斯对希斯的指控转告给罗斯福总统，他听后忍不住放声大笑，不予理会。

联邦调查局把古曾科和本特利的揭发材料重新整理后，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尽管古曾科未提及希斯的名字，但他明确指出：“1945年5月，这个钻进国务院的间谍曾任国务卿斯特蒂纽斯的助手。”当向希斯调查此事时，他则矢口否认。联邦调查局找不到可在法庭上对他提出起诉的确凿证据，希斯本人也答应离开国务院。不久，他担任了纽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他的事情于是被搁置下来。

哈维立功

哈维一直在冥思苦想：为什么苏联间谍集团的活动这样快就消声匿迹了？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他们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其他证据？数年后，他总算找到了答案。原来，苏联方面得知古曾科和本特利叛变的消息后，认定事情已经败露，立即终止了与此事有关的一切间谍人员的活动。

1947年7月，花费了两年多时间，但调查毫无结果的哈维，因嗜酒如命，被胡佛开除公职。哈维立刻带着他在联邦调查局学到的宝贵知识投奔到中情局特别行动处。在那里，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付诸实践，他和安格尔顿一起成为中情局反克格勃间谍的最有成效的干将。

哈维到了中情局后，顿时成了最受欢迎的人。他把联邦调查局一整套反间谍的侦查方法、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情况以及人员分布等全部兜底交给了中情局。在最初的两年里，他帮助中情局建立了一个反间谍情报处。当他得悉苏联拥有原子弹制造技术的消息后，便以反间谍情报处的名义主动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对古曾科——本特利苏联间谍集团一案重新进行了侦查。

哈维想，既然在1945年美国未能破获这个间谍集团，那么现在就应把这张网撒得更远一些。他仔细翻阅旧档案和各种书籍，希望能从历史资料中找到蛛丝马迹。从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一步棋被哈维走对了。

1944年11月，战略情报局特工从芬兰战场上得到一本苏联密码本的残存部分。这个密码本虽然残缺不全，却有无线电通讯中一些最普通的指示字组。杜诺万局长把这本密码本秘密地复制下来，保存至今。正是这意外的发现为哈维的破案工作打开了缺口。

也许是苏联人的疏忽，或是苏联人对于自己的密码体系过于自信，他们将一批完全相同的加密“乱数”发给了好几个大使馆。所谓加密“乱数”是指用书报杂志或任何公开刊物的行页作为参照码，选择出一个数，事先为使用密码的双方知晓；这些数字被加到密码本上的底码里，便产生了外人不知所云的密报。如果发报人和收报人采用“页式一次一密”的方法，这种密码是根本无法破译的。不幸的是苏联人竟将一批完全相同的加密“乱数”发出，使美国密码专家得以进行分析和比较，他们借助于这本残缺不全的密码本，成功地破译了一些被搁置在冷落昏聩的苏联人的密码电报。其中一份是一个在纽约的苏联间谍于1945年发向莫斯科的报告，内容是英国丘吉尔首相给杜鲁门总统的私人电报。这说明，有一个受到重用并窃居高位的苏联间谍正窝藏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里。在分析了其他几份密报后，又发现这个在英国大使馆里的“鼯鼠”（“鼯鼠”，系指打入英国外交部的苏联间谍麦克莱恩，正是他偷阅了丘吉尔和其它英国政要的电报）定期把英美之间的密件转告给在纽约的间谍头子。密报中还表明，“曼哈顿工程”确实已被苏联人打入了。

一网打尽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这时才恍然大悟：他们目前所对付的不是一个独立行事的间谍，而是一个组织严密，在加拿大、英国、美国遥相呼应的间谍集团。哈维断言，只要克格勃在英国和加拿大的间谍一露出尾巴，一潭死水的美国破案工作必定会柳暗花明，出现转机。

正当哈维和他的同时们为揭开原子弹间谍案陷入困境时，密码专家又破译了两份密码电报，终于为他们拨开了笼罩在眼前的迷雾。两份密报都谈到了同一个人。第一份密报谈到，提供情报的人有个姐姐在美国大学里工作。第二份密报向莫斯科详细汇报了这个人所提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原子弹技术研制的进展情况。经调查，在参与“曼哈顿工程”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克劳斯·富克斯的英国物理学家，他出生于德国，他的姐姐克里斯特曾在斯沃思莫尔学院任职。这样，富克斯姐弟俩成为首先被怀疑的对象。

联邦调查局根据中情局提供的上述线索，对照古曾科当年揭发的材料，终于明白了一切，并迅速通知了英国方面。1950年2月2日，富克斯在

英国的哈威尔被捕，当时他正在英国的一个原子能研究机构任职。

富克斯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英国军情六处（MI6，亦译军情六局，负责对内反间谍工作）对他进行审讯时，他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间谍活动和接触的秘密关系兜底全倒了出来。他承认，他曾把所了解到的关于美国原子弹研究工作的秘密情报交给了苏联人（据近年来俄罗斯披露的材料，富克斯提供的关键技术资料使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至少提前了3年的时间）。他还揭发了一名在苏联出生的美国公民哈里·戈尔德是他的情报关系人，此人现住在费城。军情五处把审讯的结果转告给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胡佛立即向总统杜鲁门作了汇报。

早在1945年，根据古曾科和本特利揭露的情况，联邦调查局曾对美军机械师戈尔德和另外一些人进行过侦查，由于没有发现确切的罪证，侦查工作只好不了了之。现在根据富克斯的口供，联邦调查局正式逮捕了戈尔德。狡猾的戈尔德矢口否认自己的特务活动，他声辩：“我从未去过曼哈顿计划发展中心洛斯阿拉莫斯”。经过搜查戈尔德的住处后，发现了一本非同寻常的小册子，证明了戈尔德说的都是谎话。于是对戈尔德进行了深入的审讯，在事实与压力面前，戈尔德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间谍活动，并向联邦调查局交待了他所有的情报关系，其中包括他的姐夫罗森堡是该间谍网的领导人。

对于富克斯和戈尔德等人被捕一事以及富克斯在审讯中所做的交待，克格勃都是一清二楚的，并迅速进行了“截断”工作（指情报机构为保护其间谍网中未暴露的人员而采取的措施）。然而，为了避免暴露菲尔比的身份，克格勃决定抛弃罗森堡夫妇，因此没有通知他们撤离美国。

联邦调查局在掌握了埃塞尔·罗森堡和朱利斯的确切证据后，于1950年7月17日立即执行逮捕令。在法庭上，联邦调查局只提供了戈尔德的证词和其他的一些证据，但没有出示密码电文。罗森堡夫妇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指控。尽管如此，法庭还是判处他俩死刑。与此同时，苏联在国际上发起了“援救罗森堡夫妇”的舆论浪潮，从西欧到美国，请愿书和呼吁书铺天盖地的飞来，就连罗马教皇保罗庇护十二世也致电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赦免罗森堡夫妇。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和许多内阁成员建议他赦免他们，因为，所有被捕的原子间谍甚至都未判处无期徒刑，而罗森堡夫妇有两个年幼的男孩，在美国很难想象会处死养育年幼孩子的母亲。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两次拒绝赦免罗森堡夫妇，他认为，该妇女既是首犯而且态度最顽固，不应赦免。1953年6月2日联邦调查局监狱处处长贝内曾找过朱利斯·罗森堡，保证说，如果他们同意与警方通力合作，可以赦免。在行刑时，联邦调查局局长曾下令让特工人员隐藏在电刑室里，观察他们夫妇无论是谁，在临刑时，只要流露出有供认的意思，就立即停止行刑。6月19日夜23时，埃塞尔·罗森堡先受电刑死去。轮到朱利斯了，他象妻子一样，临刑前再次申诉自己无辜。电刑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一通电人就死。受刑人通电后，要抽搐好几秒钟后才死去，其情景煞是可怕……

从此，一个在美国埋藏很深的窃取原子弹机密的间谍集团彻底瓦解了。

六、间谍大师菲尔比

英国绅士

从1948年以后，美国密码专家破译苏联密码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其原因是混入美国武装部队保密局的青年职员威廉·韦斯班德出卖情报给苏联人，他告诉对方，美国得到了苏联的密码本，已经能够破译苏联的密码。实际上，韦斯班德并不知道真正的情况。而苏联人则草木皆兵，开始改变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密码顺序，取消了所有复制的密码本。两年以后，联邦调查局确证了韦斯班德的间谍罪，可是他们企图迷惑苏联人，准备放长线钓大鱼，所以没有立刻对韦斯班德进行起诉。联邦调查局不想在苏联人面前摊底牌，也不想让苏联人估计到有多少密码被破译，有多少间谍活动已败露。

这时，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哈罗德·金·菲尔比已经走马上任，负责协调英国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工作。他会晤了哈维和中情局另一名反间谍专家安格尔顿。安格尔顿是当年战略情报局招募的新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军情六处的老办公楼接受过反间谍技术训练，其教师就是菲尔比。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和他的抽烟斗的英国教师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不久，安格尔顿被派往意大利工作，1949年回国后，他加入了中情局特别行动处，成为一名出色的反间谍情报专家。1949年9月，菲尔比到华盛顿任职后，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多，友谊日益加深。后来，安格尔顿来到哈维领导下的反间谍情报处工作，与哈维成为密友。鉴于上述原因，菲尔比在华盛顿期间，与哈维的私人交往很频繁。

菲尔比对安格尔顿备加赞赏，他称安格尔顿是中情局的中坚力量。每个星期他都要约安格尔顿一起去哈维家共餐。在餐桌上，3人谈天说地，还常常谈论各自的工作情况。菲尔比从安格尔顿的口中了解到中情局正在注意一名代号为“信鸽”的苏联间谍，他也得知美国人准备将“信鸽”诱骗出来的具体方案……

对英国情报部门来说，联络官菲尔比的工作十分重要，他在实际上的作用是集大使和行政官员的工作于一身。菲尔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作为联络官代表英国情报部门与美国方面合作，共同执行一些重大的秘密行动。因此，他不但得知中情局已破译了一些苏联人的密码，而且对联邦调查局根据破译后得到的线索进行立案侦查的几起案件的进展情况也非常清楚。菲尔比知道，美国人是从破译的密电中发现“信鸽”的。他意识到长期匿影藏形的唐纳德·麦克莱恩迟早要暴露出来，大祸临头的预感使菲尔比如坐针毡，他苦苦思索着排除威胁的对策在英国密码破译人员的帮助下，中情局又有了新的发现：纽约苏联总领事馆与苏联本土通讯联系最多的时间，都发生在麦克莱恩每两周去纽约一次之后；发出去的情报还透露，情报来自英国大使馆，送情报者的妻子正在怀孕。这些线索使中情局认定间谍就是麦克莱恩。中情局的安格尔顿决定暂时不惊动他，只是把情况通知了英国情报部门，英国人这时才不得不相信他们的这位一等秘书原来是个苏联间谍。原先，英国人认为中情局对英国人的怀疑是美国麦卡锡主义向英国的泛滥，因此嗤之以鼻（关于麦卡锡主义参看第九章）。

菲尔比将麦克莱恩已被怀疑的消息报告给苏联克格勃。但克里姆林宫非常需要麦克莱恩提供的情报，因此决定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再说。在巨大的

压力下，麦克莱恩的精神开始崩溃，酗酒更加利害，他有时甚至在酒馆里醉醺醺地逢人便讲：“我是苏联间谍，我为俄国人工作。”；为此，麦克莱恩被调离美国去开罗工作，但情况更糟……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后，1951年他调回伦敦，在外交部的美国司工作。他的外交部的朋友们认为他没有问题，还在保护着他。

菲尔比失算了

1950年，唐突行事的盖伊·伯吉斯突然捎口信给菲尔比：“我给你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我被安排到华盛顿大使馆来工作了”。伯吉斯性格怪癖，英国负责驻外机构安全工作的头目认为他那偏执的行为在人数少的使馆里容易与人产生矛盾，于是推荐他到规模大的华盛顿大使馆来工作。伯吉斯到华盛顿后，向菲尔比提出建议，要与他同住一间屋子。一向老谋深算的菲尔比竟然同意了伯吉斯的建议，这可以说是菲尔比本人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伯吉斯禀性鲁莽，作为一名间谍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其活动行迹容易暴露。菲尔比一时欠考虑，同意与他同室居住，这等于点燃了一根引火烧身的导火线。

菲尔比眼下的处境并不妙，他已好久没有得到苏联上司的指示了，如果“信鸽”一暴露，他本人也就岌岌可危了。怎么办呢？菲尔比最后打定主意，要设法转移美国人调查的方向，设法让麦克莱恩蒙混过关。菲尔比的这一大胆设想正是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菲尔比没有考虑到他周围有那么多的眼睛在盯着，万一他做手脚时稍有疏忽，就等于又点燃了一根引火烧身的导火线。

菲尔比是个敢下赌注的人。他一旦决心已定，紧张感觉顿时烟消云散他坚信自己这第二次大胆行动能够化险为夷。1945年8月，他就采取过一次大胆行动。当时有一名在土耳其的苏联高级情报官员康士坦丁·沃尔科夫准备叛逃西方，他在同英国人接触时透露，有两名苏联间谍打入了英国外交部，一名打入了英国军情六处；他要求必须直接同英国情报机关的最高领导面谈此事。这份材料正好落到菲尔比的手里，他立即将此情报交给苏联在英国的谍报网，并利用职务之便，巧妙地拖延了沃尔科夫叛逃的日子，给苏联人留下足够的时间将沃尔科夫逮捕。菲尔比的阴谋终于得逞，同时神不知，鬼不觉地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同伙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嗣后，军情六处在内部进行调查，结论是：由于一名外交官的疏忽，走漏了沃尔科大叛逃的消息。

菲尔比毕竟老奸巨猾，他知道这次要保护麦克莱恩无异于是在走钢丝。如果有人把调查“信鸽”所遭到的意外挫折与当年发生的沃尔科夫事件联系起来的话，他菲尔比立刻就会受到华盛顿或伦敦方面的怀疑。一旦对外交官进行调查，怀疑的矛头也迟早会指向他的脑门，因此他感到忐忑不安。麦克莱恩是经菲尔比介绍成为克格勃间谍的，而且他还掌握着麦克莱恩搞同性恋时被伯吉斯拍下的照片（留做必要时用），如果麦克莱恩暴露了，菲尔比自然在劫难逃。对他来说，现在只能孤注一掷了。在麦克莱恩暴露之前，采取紧急补救措施，这样做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侥幸心理使菲尔比向前跨出了冒险的一步。

疑窦丛生

英国情报部门首先对菲尔比产生了怀疑。根据古曾科和沃尔夫当年检举的材料，英国情报部门开始在内部寻找这个神秘的苏联间谍。当年沃尔夫与英国人接触时，他十分担忧地反复向对方强调，他的一切行动必须直接报告给情报部门的最高领导人，否则的话，他完全可能被出卖。后来他的担忧终于应验了。究竟是谁出卖了他呢？1951年，怀疑的焦点已经落在菲尔比的头

上。因为有人反映：1947年，菲尔比在土耳其从事秘密活动，经过英国官方批准，他可以随便和苏联人接触。后来，菲尔比调到贝鲁特工作，他的身边始终保留着一张他在土耳其边境、面对苏联、以阿拉拉特山为背景拍摄的风景照。这一点至少说明菲尔比对苏联人的感情是亲切的。1938年叛逃西方的克里维茨基也曾揭露说，有一名苏联间谍是一名英国记者，曾经在西班牙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消息。这一系列的情况正好与菲尔比十分吻合，菲尔比当时正好为《泰晤士报》撰写西班牙内战的消息。1951年，英国情报部门根据种种疑点，推断出菲尔比可能是苏联间谍。但他们不想打草惊蛇，目的是要利用菲尔比将一些假情报塞给苏联人。英国情报机关借故不让菲尔比再接触机要和敏感的情报。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哈维和安格尔顿也对菲尔比产生了怀疑。这样，便促成了英国情报机关不得不将菲尔比立刻召回英国。

哈维和安格尔顿是中央情报局人员中与菲尔比交往甚密，友谊颇深的人。但他们却是中情局里首先对菲尔比产生怀疑的人。

1951年春季的一天，哈维在家里宴请菲尔比的好友，新来华盛顿工作的伯吉斯。伯吉斯擅长漫画，待酒足饭饱之后，哈维的妻子请伯吉斯为她画一张肖像画。醉眼朦胧的伯吉斯心血来潮，把哈维夫人画成一个大腿裸露，袒胸露臂的风骚女郎。哈维这时也已喝得醉醺醺的，当他和妻子一见到这幅画，顿时被激怒了。在场的安格尔顿见状马上出来打圆场，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哈维这个人自尊心很强，是个难以对付的人。他念念不忘伯吉斯上门对他的侮辱，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他又把这种仇恨移至菲尔比的身上，他认为他俩是一丘之貉。哈维发誓要寻找机会，狠狠报复他俩，出出这口恶气。

由于伯吉斯在华盛顿的行为有失检点，他被召回了英国。临别时，菲尔比通过伯吉斯转告麦克莱恩：“网已向你接近，设法离开。”麦克莱恩在接到菲尔比的警告之前，已经知道风声不好。不久前，另一名在伦敦神通广大的苏联间谍安东尼·布伦特已向他发出面临危险的警告。

菲尔比向他在伦敦的苏联上司汇报了险情。他说，“中央情报局根据破译的1944~1945年的密码电报，把与‘信鸽’有关的日期排列出来，并根据当年英国使馆人员的活动记录，将麦克莱恩列为重点怀疑的6名对象之一。麦克莱恩这个典型的苏格兰名字将使中央情报局把克里维茨基曾说过的话联系在一起：‘有一年轻的苏格兰人充当了苏联的间谍’。麦克莱恩在1944~1948年期间在伦敦外交部任美国科科长，如果中央情报局把这些情况和古曾科、沃尔夫所揭发的材料联系起来的话，疑点又会落在麦克莱恩的头上。”狡猾的菲尔比设想了一个嫁祸于人的圈套，他对大使馆的安全官罗伯特爵士说：“‘信鸽’在俄语里的读音和外交官戈勒布恩的名字颇为相近。戈勒布恩是位学者，他是否会是苏联间谍呢？不妨将这一疑问告诉伦敦，供他们参考。”菲尔比的这一策略为麦克莱恩争得了继续拖延的时间。

逃之夭夭

1951年5月21日，星期五，在暮色的掩护下，麦克莱恩和伯吉斯一起乘汽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溜之大吉。伯吉斯的出逃事先并未作安排，也许他已厌倦当间谍而采取了这一断然行动。殊不知，伯吉斯的一意孤行给菲尔比带来了不少麻烦，人们由此加深了对他的怀疑。英国情报部门直到星期一才得知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叛逃了。他们立即将此事通知了华盛顿。清晨，军情五处在英国使馆的联络官杰弗里·佩特森打电话给菲尔比，说他收到伦敦的

急电，请菲尔比立刻到他的办公室去。接完电话，菲尔比直奔大使馆。他推门走进佩尔森的办公室，只见对方脸色苍白。“金，”佩特森压低了声音说：“鸟飞了。”“哪只鸟？不会是麦克莱恩吧？”“正是他，更糟糕的是伯吉斯也飞了。”佩特森气急败坏地说。一听伯吉斯也溜了，菲尔比再也掩盖不住内心的恐慌和不安。

哈维在中情局的办公室里得到了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出逃苏联的消息，他显得异常镇静。他仔细地翻阅和整理了自己以往所掌握的有关材料。3个星期后，他向中情局特别行动处处长递交了一份长达5页的备忘录，毫不含糊地指出，菲尔比也是个苏联间谍。因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中情局在秘密调查“信鸽”案件，而菲尔比是知情者之一。哈维列举了许多事实，最后指出菲尔比与6年前发生的沃尔夫事件有密切关系。

5天以后，安格尔顿也写了一份备忘录，他虽然没有直接点明菲尔比是苏联间谍，但他详细叙述了菲尔比与伯吉斯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提出了种种疑点，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对菲尔比的结论与哈维是一致的。

已经担任中情局局长的史密斯很快向伦敦发去两份备忘录，敦促对方立即将菲尔比召回英国。他还通知英国情报部门头目斯图尔特·孟席斯，宣布菲尔比是不受欢迎的人。史密斯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如果不解雇菲尔比，我们将终止与你们的情报合作关系。”就这样，菲尔比被召回英国。

菲尔比是英国名门之后，他的父亲老菲尔比是英国著名的探险家和作家。菲尔比19岁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寻求自己的人生观。1933年夏天，他在临近毕业时产生了一种失望的情绪，在生活的道路上他感到迷茫惆怅。于是，他请教自己所敬佩的剑桥大学讲师莫里斯·多布，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把菲尔比推荐给法国巴黎的一个公开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又把他介绍给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地下共产主义行动小组，也就是在那里，菲尔比被吸收为苏联间谍。他先在英国外交部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始终在英国谍报部门工作，直至担任专门针对苏联的反间谍处处长的职位。因成绩“卓著”，他还得到了大英帝国的勋章。

菲尔比本人对英国情报部门的那套把戏了若指掌。他知道，只要他本人坚决不承认，那么任何证据都无法将他定为苏联间谍。事实果然如此。菲尔比回到英国后，英国反间谍机关对他的间谍罪的调查很快就搁浅了，因为菲尔比在英国的那段日子里，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有罪，只是承认他曾经为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通风报信。自此以后，菲尔比虽然没有再受到重用，却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直至1963年1月23日，正当英国情报部门要对他采取行动之前，他从贝鲁特逃到了苏联。菲尔比到苏联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接受他为苏联公民，并授予他克格勃上将军衔，并向他颁发了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和各国人民友谊勋章。1988年5月11日，他在莫斯科逝世。英美情报界中有不少人认为，倘若当初不是菲尔比在营救麦克莱恩的工作中暴露了自己，那么菲尔比或许已经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他会作为迄今为止最有成就的特工载入间谍史，这实在是克格勃所犯的一个大错误。

损失惨重

大西洋彼岸发生的间谍案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为此，中情局对菲尔比间谍集团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检查和评估，其结果令人触目惊心。

麦克莱恩熟捻英美两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情报协议，详悉原子能计划中对铀的需要量，他还接触过外文密码本，直接了解朝鲜战争

时期同盟国最高领导对这场战争所制定的政策。有人指出，美国情报活动的失败就是因为麦克莱恩和伯吉斯捣的鬼。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麦克莱恩逃到莫斯科后，曾同他就某些历史事件交换了意见。后来，麦德维杰夫到西方定居，他提供了不少材料，证实了中情局的估价。

逃跑前，麦克莱恩担任英国外交部的美国科科长，他掌握着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关于朝鲜战争问题所交换的各种看法。他知道1950年10月9日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你要对中国领土上的目标采取军事行动，事先必须得到华盛顿的批准。”他还知道美国和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政策：绝不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和苏联；不动用原子弹；如果败局已定，撤出朝鲜半岛。麦克莱恩在1983年死于莫斯科，当时他已退休，挂着苏联外交部顾问的牌子。

与麦克莱恩相比，菲尔比给美国造成的危害更大。麦克莱恩接触的是国家战略情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情报很快就成了公开的秘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意图迟早总会让世人知道的。菲尔比的情况不同，他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上层人物，包括中情局局长都有直接联系。他生活的世界对外人来说永远是个谜，无法评价他的间谍活动给西方造成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不过，他是苏联最重要的一名堪称大师级的间谍，这一估价是毋庸置疑的。

根据美、英情报机关掌握的资料，早在1943年，德国军队内部反希特勒的“黑色乐队”重要成员、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曾多次试图与美、英情报机关建立联系，但都被菲尔比压下了。因为苏联不希望美、英单独与德国反对派建立联系。

尽管菲尔比间谍集团被揭露，但英国方面并未把它所掌握的底细全部告诉美国人。1996年10月2日，英国《卫报》根据一批已经解密的二战时期文件披露，苏联在二战期间在英美两国有200多名间谍在活动；早在1944年，麦克莱恩就利用他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特殊地位，把丘吉尔和罗斯福有关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计划、东欧国家的未来以及在战后德国建立占领区的往来电报的副本传递给苏联人。

菲尔比知道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构成立了一个“特别政策委员会”，拟定了一个推翻阿尔巴尼亚工产党政权的行动计划。1946年，英国情报机关首先采取了单方面行动。194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英国人的秘密行动，目的是想通过军事手段，阻止巴尔干的共产党政权纳入苏联人的轨道。菲尔比把这些情况详细报告给苏联人：包括1949年10月的第一次派遣特工从海上登陆的计划、1950年6月偷越边境的渗透方案以及1950年10月美国首次以降落伞空投武装人员的计划。结果，派去的几百名反霍查政权的游击队员无一生还。

被菲尔比出卖的另一项秘密行动是“乌克兰民族运动”。英美情报机关积极支持反对斯大林的乌克兰民族武装游击队，不仅为他们提供物质援助（包括武器弹药、食品燃料），还为他们派去了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当时主要通过降落伞空投的方式向乌克兰境内运送物资和人员。可是派去的人员绝大部分都被苏联预先埋伏好的公安部队捕获了，这无疑是有入告密。

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中情局气西方国家情报机构对苏维埃帝国展开的颠覆行动一败涂地，几乎都是菲尔比出卖的结果。

根据联邦调查局事后的调查报告显示，菲尔比知晓联邦调查局对原子间

谍富克斯的审讯情况，以及富克斯所交待的材料，但是苏联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护那些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据说，莫斯科的克格勃头子已经得知联邦调查局准备逮捕罗森堡夫妇的消息，为了掩护菲尔比不暴露身份，苏联人决定牺牲罗森堡夫妇。

杜勒斯后来在评价菲尔比时说：“他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间谍”。

菲尔比间谍案引起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给英美两国密切合作的情报关系蒙上了无法消除的阴影。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两国情报机构之间始终处于猜疑和怨恨的状态。

七、特种工程——人体试验

中情局的分析报告

朝鲜战争期间，一些被俘的美军官兵在广播电台上作反战宣传讲话，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中情局的上层人物对此既恼火又疑惑。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军人的反常举动，极可能是苏联人利用某种特殊的药物控制了俘虏们思维，瓦解了他们的意志，致使他们完全听命于苏联人的摆布。然而，苏联人到底用何种方法来控制俘虏的呢？这对中情局来说仍是个不解之谜，而且意义重大。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写了一份分析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自从1937年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审大会以后，俄国人举行公审的司法程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被告在法庭上常常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和招供。大多数被告的行为举止如此相似，说明他们受到了同一种人为力量的操纵。最为突出和难以令人置信的例子是，匈牙利的明曾蒂红衣主教在匈牙利人民法庭上的认罪态度……这类人会认罪是令人费解的，除非认罪者的脑神经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肉体折磨不可能使一个人的思维发生根本变化，最多只是使人暂时屈服，可是，这种屈服绝不会是心甘情愿的。而且，肉体折磨毕竟多少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痕迹，更先进的技术可能被应用了……它包括：1.神经外科学：对大脑的前叶进行外科分离手术；2.休克法：应用电流或药物；3.精神分析法：麻醉分析与综合分析法，催眠分析与合成法；4.采用上述的综合方法。”

在后来的23年里，中情局的反间谍处以各种名义围绕着如何控制人的行为这一课题，展开了“科学研究”工作。“蓝鸟工程”便是其中最早开展的一个秘密研究项目。

“蓝鸟工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5月，战略情报局在华盛顿开始使用印度大麻进行药物试验。同年，在纽约的“贝利蒙特—普拉扎”旅馆也进行了试验。一些美军官兵在这里被当做“实验用的家兔”，通过香烟和糖果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服用毒剂……在军事医院的临床观察中发现，一些病人麻醉后失去知觉时，便开始说胡话。此外，对犯人和受审者也使用了这类药品。第一例实用性试验就做得在黑社会集团查尔斯·卢西亚诺家族的成员德尔·格雷西身上。当时，战略情报局想利用卢西亚诺家族帮助美籍意大利人向西西里扩张，以防备纽约的码头和船厂遭到敌方的破坏。战略情报局人员在与德尔·格雷西接触和交谈时，给他吸了不少掺杂有大麻的香烟，他边吸烟边向战略情报局的人员讲述和谈论黑社会活动的情况。渐渐地，药物对神经产生了作用，狡猾的德尔·格雷西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蓝鸟工程”是在希伦科特任中情局局长的时候开始进行的。中情局安全室主任谢菲尔德·爱德华兹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该工程的目的是想检定一个由心理学家、测谎专家、施行催眠术的专家和其他技术人员组成的审讯组，借用药物的帮助，对犯人进行审讯时是否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一种被称为“吐露真情”的药物（戊硫巴比妥纳）首先在“绿鸟工程”中使用，后来便应用于实际审讯中。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中情局就曾派遣过这样一个审讯组飞抵东京，审讯4名被怀疑是双重间谍的人员，审讯结果令人十分满意。1950年10月，在一些被俘的北朝鲜军人身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试验。当时曾

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的 J·乌艾特中校和 J·加米利东负责提炼印度大麻的麻醉性毒素衍生物，供试验使用。紧接着又进行了“超—MK”、“三角洲—MK”、“谢尔奇—MK”等一系列药物试验工作。

自从史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后，“蓝鸟工程”便由副局长艾伦·杜勒斯领导。这项工程与中情局里的其他研究项目相互配合，旨在生产一种特殊的“机器人”。技术服务室研究的“洋蓍工程”便是其中的一个。

“洋蓍工程”

“洋蓍工程”被官方美其名曰“开拓科学的方法和知识，用于改变中情局人员的态度、信仰、思维程序和行为方式，从而提高人的素质。”这需要应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最新技术，包括使用催眠术和药物，发挥辅助作用。

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关在这一时期曾多次派遣反霍查政权的游击队员潜入阿尔巴尼亚，但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中央情报局上层人物十分焦虑和担忧，他们怀疑自己内部可能混入了敌方的间谍（直到后来菲尔比间谍集团被侦破才真相大白）。于是，中情局上层人物想用测谎器对所属人员进行测试……“蓝鸟工程”和“洋蓍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了研究工作的步伐。

“洋蓍工程”由戈特利布的助手 S·埃德瓦尔德斯负责实施。

研究的结果，发明了许多用于“洗脑”的制剂。换句话说，这种制剂能使人意志消沉，使那些知道得太多的人，包括中情局人员在内“洗刷掉记忆力”。例如，以印度大麻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四氢大麻酮酸和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等麻醉剂，戊留代巴比妥纳麻醉剂……在这些秘密项目中，对受试者使用了电休克、X 光照射，超声波、精神疗法，甚至运用了神经外科手术。

1978 年，中情局局长特纳海军上将在向参议院提交的报告中说，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中情局药物试验的机构共计 44 个大学和学院，15 个科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12 个医院和门诊部，以及 3 个感化院。为实施这一计划共投资 2500 万美元。进一步调查表明，从事这类肮脏勾当的并非中情局一家。在美国拿活人搞试验的还有陆、海军的情报机构，司法部，甚至还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社会保险部。20 多年来，仅陆军就对 6940 名军人和 900 名公民进行了医药和化学制剂的试验。

从事这类研究试验的机构包括：纽约的蒙特—西奈医院、史丹弗大学医学系、亚特兰大周的联邦监狱、博登汤感化院、加拿大的艾伦神经病研究所。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中情局则利用旅馆或专门的秘密地点进行试验。在纽约区，试验者利用妓女把病人勾引到格林威治—维利季的 81 号秘密住宅里，然后悄悄给他们喝下有毒的饮料，同时对试验对象进行暗中监视，观察药物的效果。他们把美军官兵、中情局人员、犯人、囚犯、酒鬼、癌症患者等当做试验对象。

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家马克科内尔承认，华盛顿希望有朝一日能利用麻醉剂和催眠术使局部的昏迷不醒与巧妙的奖惩制度结合起来，以达到绝对地控制人的行为。

鉴于“蓝鸟工程”和“洋蓍工程”使用了极其敏感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材料，因此整个工程进展情况严格限制在中情局少数参与试验的工作人员范围内。为避人耳目，试验工作限定在联邦德国、远东以及巴拿马运河区美国海军设施内进行。一些有特殊原因需要离开欧洲的中情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被怀疑是双重间谍的中情局人员都安排居住在试验区里。不久，中情局

计划处传出消息说：经过试验之后，几名有双重间谍嫌疑的人员被确证了罪行，然后都处决了。10年以后，中情局确实利用了当年的试验成果去谋杀一些外国领导人。

毒品试验

1953年4月，史密斯被任命为副国务卿，杜勒斯升任中情局局长。计划处副处长里查德·赫尔姆斯向杜勒斯提出是否可以应用生物、化学药品进行试验来控制人的行动。赫尔姆斯给杜勒斯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应研究和发​​展秘密应用生物、化学药品的能力。这方面工作包括人为产生支持目前和未来秘密行动的各种生理条件，这不但是为了挖掘我们自身的进攻能力，而且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彻底了解敌人是如何在这方面开展工作的。敌人在使用生物、化学药物方面比我们还要有恃无恐，开展研究工作可使我们免于受到他们的侵害”。不久，一个用生物、化学药物在美国人身上做“科学试验”的秘密研究工作开始了。肯塔基州莱克星敦地区毒品处理中心的哈里斯·伊斯贝尔博士负责把中情局提供给他的各种药物注射在他照料的几名“毒瘾君子”身上，以观察这些药物能否产生控制人行为的效应。

伊斯贝尔博士的试验证明，药物不能长时间地控制受试者的行为。鉴于第一批受试者都是根深蒂固的“毒瘾君子”，决定第二批受试者是身体健康的正常人。

1953年4月23日，杜勒斯批准“蓝鸟工程”、“洋蓍工程”以及伊斯贝尔博士领导的试验项目均由中情局技术服务室主任西德尼·戈特利布统一协调。除了上述项目以外，戈特利布还接管了1947年已由海军方面着手研究的另一项目“饶舌工程”。“饶舌工程”是研究诱发人讲真话的一种特殊药物，主要运用于审讯和侦查性谈话中，使对方按照中情局的希望“唱起来”。1952年5月，中情局技术服务室与陆军化学部队特种行动师合作研究的代号为“MKNAOMI”的工程也由戈特利布兼管。“MKNAOMI”工程是研究具有高效能杀伤力的生物化学武器，供中情局人员在从事暗杀和其他特殊行动时应用。“MKNAOMI”工程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才终止，那是因为1969年8月25日，尼克松总统下令禁止使用任何能杀生致残的化学武器，并销毁现存的生物武器。

此外，中情局从1953年~1967年间还秘密进行人体核辐射试验（许多资料后来于1973年国会调查之前被局长赫尔姆斯下令销毁了）。

戈特利布当时把各项工程的进展情况直接向中情局计划处处长威斯纳和副处长赫尔姆斯汇报。戈特利布与中情局安全室以及与设在马里兰州阿巴拉契亚山脉丘陵地带的陆军化学部队细菌战研究中心保持密切联系。那时候，中情局反间谍处下属的安全室对戈特利布提供的研究成果十分感兴趣，他们打算在一些中情局新雇员身上作试验，以保证新进人员的质量。

奥尔森丧命

1953年11月18日，在阿巴拉契亚山下湖畔的一栋小木屋里，戈特利布与另外两名中情局人员正同7名从事代号为“MFULTRA”工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讨论工程进展情况。这种形式的讨论会每年要举行两次，那天讨论的主题是要试验一种代号为“LSD”的药物。一位曾经参与“LSD”药物试验的中情局人员回忆说：“50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多次得到报告，谈到苏联正加紧试验一种‘LSD’的药物，苏联人想在世界各地采购制造该药物的化学原料。于是，美国便加快了研究工作的步伐。中央情报局通过小乔赛亚·梅西基金

会和格斯奇特基金会向参与‘LSD’研究工作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专项课题资助，整个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那些埋头学问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自己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那天，当讨论会快进入尾声时，戈特利布把剂量很少的“LSD”放入一瓶柑香酒里，在场的10人中，除1名心脏病患者和另1名绝对戒酒者外，其余8人都各自品尝了放有“LSD”的柑香酒，他们要亲自体验药物在人体中将会产生何种反应。

就在他们喝了柑香酒后的几星期里，来自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生物中心的医生弗兰克·奥尔森情绪变得十分低落，心境压抑。其家属反映说，奥尔森举止行为古怪，宛如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戈特利布意识到这是“LSD”药物产生了严重的毒副作用，于是，他将奥尔森送到纽约，请精神病医生会诊。经过一段时间的病情检查，医生决定送奥尔森去马里兰州罗克维尔附近的一家疗养院进行综合治疗，在动身离开纽约的前一夜，奥尔森和陪伴他的中情局人员罗伯特·拉什布罗克一起住在纽约的斯塔特勒饭店。凌晨3点20分，奥尔森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砸碎了客房的玻璃窗，纵身从10层高楼跳了下去，当即身亡。拉什布罗克被玻璃破碎的声音惊醒，但他却没有立即冲上去阻拦奥尔森的自杀行为。

戈特利布将奥尔森坠楼自杀的消息报告了上任不久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杜勒斯责成督察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负责调查并写出书面报告。

在如何对待奥尔森自杀事件上，中情局内部意见分歧。前中情局T·S·厄曼认为，当时在场的科学家们是在喝了酒后的20分钟，才知道柑香酒中放进了“LSD”药物。还有人说，事先曾有一名中情局官员提出，采取这样的试验方法不妥当。但军方代表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试验；那些人喝了酒以后，表现出异常的“欣快感”，那天夜里只有奥尔森一个人抱怨自己怎么也睡不着。

柯克帕特里克经过调查后，采用了极婉转的语言作出结论：是“LSD”药物效应的试验导致奥尔森的自杀身亡。报告写道：

“尽管戈特利布对那些用药物在身上作试验的人员十分熟悉，可是，他并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疾病史。那天，只有1名患有心脏病的科学家和1名绝对戒酒者没有喝酒，显而易见，戈特利布并不知道在过去的5年里，奥尔森曾经有过要自杀的念头……奥尔森的自杀极可能与服用药物有关，可以说‘LSD’是奥尔森自我结束生命的触发剂……技术服务室进行这种无法控制的试验形式可能会严重损害中央情报局的名誉。而在其他部门的雇员身上作试验，一旦事情被揭发出来，将会破坏中央情报局与兄弟部门之间的关系。技术服务室主任判断能力如此之差，应受到指责。我们应告诫技术服务室主任，在应用药物作试验时，必须严格监督和控制，并且定期向计划处处长报告药物使用情况和使用的结果。”

最初，奥尔森的遗孀艾丽斯只是被告知她的丈夫死于一种不能公布于世的“疾病”，后来才告诉她实情，奥尔森是跳楼自杀身亡。中情局对他的自杀按照公务死亡处理，“对其家属给予了适当照顾”。但艾丽斯对此始终迷惑不解。直到1975年在丘奇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之后，她和她的亲属才真正得知事情的真相，这更使她们悲痛欲绝。1976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赔偿艾丽斯75万美元的损失费，福特总统以个人名义向奥尔森家属表示歉意。

其实，奥尔森只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牺牲品。还有一些人在酒吧间与特工人员偶然相遇，被引诱到中情局的“安全之家”，在那里，特工人员让他们服用各种试验药品，以便观察他们的行为变化。在联邦德国、日本、朝鲜半岛和巴拿马运河区的试验室里，这类试验一直悄悄地进行着。

八、双管齐下菲律宾

寻觅傀儡

50年代初，中情局远东科制定了一项长期计划：阻止菲律宾落入共产党手中。这项秘密计划在实施中意外得手，于是在中情局内引起很大反响。从此，在中情局的宝库中又增加了一条“新经验”，作为他们在以后从事秘密行动、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整套方针手段。

1950年，政策协调处菲律宾地区组组长爱德华·G·兰斯代尔中校以军事顾问的公开身份来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他的秘密使命是扼杀由哈克·巴拉哈普领导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菲律宾共产党的武装暴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哈克于1942年成立了一支菲律宾“人民军”武装力量。二战结束后，菲律宾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都向政府交出了武器，只有哈克的部队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从1948年起，哈克开始酝酿在菲律宾全国发动武装暴动，到了1950年，哈克的人民军已经控制了吕宋岛中部的大部分乡村，甚至控制了马尼拉的部分地区。

兰斯代尔中校到了马尼拉后，精心设计了一个集政治、军事、心理三合一的瓦解哈克武装力量的行动方案。他首先看中了菲律宾人拉蒙·马格赛赛，把此人预定为自己的帮手。

马格赛赛是个国会议员。无论对于左翼的共产党，还是对于二战期间与日本占领军相勾结的腐败政客，他在当时被双方公认为“诚实可靠、守正不挠”的人物，在政治上，他是这两派人都是可以接受的对象。

兰斯代尔多次登门拜访马格赛赛，笼络私人感情。时机成熟后，兰斯代尔便向马格赛赛摊开底牌。他把菲律宾的政治局势和面临的前途向马格赛赛作了分析，并提出了“个人的忠告”；他允诺中情局为马格赛赛提供资助，并以印传单、登广告、上广播等多种形式帮助马格赛赛在菲律宾政治舞台上崛起。1948年，中情局曾用类似的方法在意大利支持了德·加斯帕里。和意大利的情况相比较，美国人在菲律宾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包括菲律宾）打垮了日本法西斯，因此美国人被看作是菲律宾的解放者和可靠朋友。兰斯代尔正是利用了美国在二战中赚取的政治资本，利用了菲律宾对美国人的好感，得以在幕后操纵着马格赛赛。

“文攻”人民军

1950年8月31日，马格赛赛当上了菲律宾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他在兰斯代尔和中情局人员的支持下，亲自出面向哈克的人民军挑战，他的这一整套行动使他在1953年菲律宾大选前赢得了“民族英雄”的称号。

马格赛赛向哈克手下的官兵们提出了两条道路供对方选择：一条路是刀兵相见，流血厮杀定输赢；另一条路是要对方的人员在某些区域内安顿下来，政府给他们土地和财产，让他们“自食其力，安居乐业”。中央情报局预先分析时认为，哈克的部下一旦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和财产，就不可能再听命于在山区游击基地发号施令的人民军头目了，他们必然会主动放弃与政府的抗争。马格赛赛本人出身于一个贫困的铁匠家庭，他的亲身经历使他笃信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是正确的。他不折不扣地按照兰斯代尔的指示去办。马格赛赛对人们说：“如果一个菲律宾农民自己有了一块土地，谁要是想从他手中夺走那块土地，他会同你拼到底。”在兰斯代尔的帮助下，马格赛赛成立

了一个“经济开发军团”，将缴械投降的哈克官兵改编在这个军团里，他给每个人分配了土地、房屋、农具、种子和5年后再偿还的贷款。不出所料，哈克的部下纷纷向政府军缴械，兰斯代尔的绥靖方案取得了“成效”。

但是，兰斯代尔的这一做法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许多习惯于叱咤风云生活的中情局官员对此感到迷惑不解。1952年，在计划处担任远东科科长乔治·奥雷尔竭力反对兰斯代尔的做法，他多次跑到处长办公室表示异议。他对处长说：“真是活见鬼，堂堂的中情局官员却去乡村搞安顿人员这种儿童游戏。我愿意去菲律宾与哈克在战场上决一雌雄。难道重建这个国家也成了我们中情局的任务？”奥雷尔和绝大多数中情局人员所信奉的行动哲学是残酷无情地摧毁自己的对手，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发动军事攻势或进行军事政变，不习惯从事政治和心理攻势。

艾伦·杜勒斯、菲茨杰拉德和兰斯代尔等人毕竟更有“远见”，他们对在菲律宾搞的那一套十分满意。让外国人自己去办事，由美国人在幕后进行操纵，这一点对中情局来说是正中下怀。

贼喊捉贼的“武略”

当时，除了国防部以外，赞成“乡村安顿方案”的人并不多。兰斯代尔和他的手下深谙如何才能博得民众支持的方法。他们知道，光凭“软”功夫不能彻底取胜，文韬武略必须相辅相成。因此，他们在耍“柔”道的同时，还运用了“硬”功。1953年，菲律宾大选即将来临时，兰斯代尔让马格赛赛出动政府军向拒不缴械投降的哈克武装发动进攻，以保证他的“乡村安顿计划”顺利完成。尤其阴险的是，兰斯代尔让马格赛赛的官兵乔装打扮成老百姓，有的人甚至穿上人民军官兵的服装，向哈克控制的村寨开火。马格赛赛一伙人则声称这是“哈克集团内部火并”。这样一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乡村安顿方案”，反对哈克的“大逆不道”。

为了配合武装“讨逆”，兰斯代尔根据菲律宾人恐惧吸血鬼的传统迷信心理，派人将一名在伏击中丧生的赫克族人身体的血放光，尸体抛在哈克武装驻地附近的路口，许多游击队官兵闻风丧胆，纷纷逃离。

东亚“橱窗”

大选之日渐近，中情局长杜勒斯为兰斯代尔准备了500万美元。兰斯代尔回电说不需要这么多，用100万美元资助马格赛赛竞选总统足够。在菲律宾做生意的公司，包括可口可乐公司也提供了秘密捐款，为中情局补充了活动经费。腰揣美元的菲律宾人成立了“自由选举国民运动”组织，在选民中宣传马格赛赛的政治口号“菲律宾不搞经济改革，就不能自由生存”，同时，讴歌他镇压哈克人民军的“丰功伟绩”；中情局的一名特工装扮成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记者，为他撰写演说词；中情局还派人在一些竞选对手的饮料中掺进麻醉药，使他们在竞选活动中摇摇晃晃、醉眼惺忪、张口结舌、丑态百出……

1953年，马格赛赛在大选中取胜，成为第一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扶持上台的菲律宾总统（后来，马格赛赛被人暗杀了）。

兰斯代尔及其同伙为自己在菲律宾采用的新招取得成功而沾沾自喜，兰斯代尔本人也因此官升一级成了上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声称：“这是我们高兴地看到的一种总统选举方法。”《纽约时报》欢呼菲律宾的这次选举成功，称它是“亚洲民主的橱窗”。

九、龙虎斗

“新面貌”

1953年，华盛顿政界出现3大变动：1.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是继20年前赫伯特·胡佛之后出任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2.艾森豪威尔的当选，标志着共和党摒弃“孤立主义”政策，以积极强硬的反共姿态登上政治舞台；3.任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原局长史密斯任副国务卿。

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唯一一位一生从军，主要以其在世界大战中的功绩和名望当选的总统。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将军，而是一个军人政治家。

艾森豪威尔是战时罗斯福政府的欧洲政策，以及罗斯福总统关于战后美苏关系方针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战后，艾森豪威尔继续支持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并且是这些政策的执行人之一。他就任美国总统后，基本上继承了民主党杜鲁门政府所实行的遏制战略和共同安全方针，只是在手段、方法上有所变化。

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起作用的另一强有力的人物就是约翰·杜勒斯。他在历届国务卿中是思想和主张比较突出、对外交政策影响较显著的一个。

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带有宗教色彩，他将美国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运用于美国对外关系中，曾说美国外交政策“是我们国家意志在国外的具体化”。基于这种思想，在战后的“冷战”中，杜勒斯的反苏反共倾向不但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而且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宗教信仰。他认为美苏对抗不是那种传统的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利益协调和妥协予以解决，而上要是异常思想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他甚至认为人类的生存取决于美国的命运。

杜勒斯说，战争“可能消灭俄国”，“但是战争消灭不了共产主义”。结论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是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最终取胜，这就要求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而且，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进攻性战略才能最终战胜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他一再鼓吹，“我们应当让俄国共产帝国内部感到紧张和压力以使其瓦解”。“至于是否追求解放，何时解放，怎样实现解放，这是由被奴役人民自己来决定的事”。

1957年，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杜勒斯曾预言，苏联，中国“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变化”。他说他不对这件事“定任何日期”，但是，“如果他（指赫鲁晓夫）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深信“共产党政权结构”终将有一天“很快崩溃”。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美国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的由来。

“新面貌”政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在50年代初期美苏冷战加剧情况下为贯彻遏制政策而制定的。

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实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项政策目标。对于朝鲜战争结束的原因，白宫众说纷坛。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许多决策人士看来，美国两次发出动用原子弹的威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信念对于日后“新面貌”政策及“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二项重大政策目标是不再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因此，艾森豪威尔决定求助于一种新的战略，它既能遏制全面战争和苏联的扩

张，又能阻止朝鲜战争式的有限战争的爆发，且不致过多加重美国经济的负担。艾森豪威尔认为，朝鲜战争是他的前任在遏制战略上的一个失误。

“新面貌”政策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范围广泛的战略包围圈；二是保持战略核优势。

“新面貌”政策提出的基本条件是美国在战略空军及核武器方面对苏联占有压倒性优势。与美国相比，苏联的战略轰炸机在数量上和性能上都远远落在后面，根本无法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在核武器方面差距更为突出，苏联的核武器处于初始阶段，据中情局估计，苏联当时仅有数枚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也迟于美国，然而苏联在地面常规力量方面几乎一切领域拥有明显的优势。美苏在核常规力量对比方面的巨大反差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清楚地看到了核优势和保持这一优势的重要意义。艾森豪威尔认为，获得这一优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的优势及其巨大潜力。因此保持核优势要比维持大量人力资源的常规力量省钱得多，这样就能更快地发展美国经济，从而为发展强大的军力奠定牢固的基础，说到底，发展经济是保持美国实力的最有效途径。这对于奉行同苏联长期对抗的方针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8年中，“无赤字的国家安全”一直作为美国国防开支的基本指导方针。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新面貌”政策的核心，其立足点是核优势。因此在建军上，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搞“三军均衡”，结果陆海军经费大幅度削减，海军的费用只是由于后来研制和发展核潜艇才开始回升，而空军费用则稳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的核武器生产出现了“大跃进”，从1953年到1961年，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增加了16倍之多。

5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都证明，大规模报复战略使美国既不敢打全面战争。又不敢打局部战争，从而使这一战略原则已经走进死胡同。在朝鲜、印度支那就是这样。大规模报复战略对于遏制有限战争没有多大效果，而用来对付当时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毫无用处。

从1957年开始，大规模报复战略遭到来自政府内外的尖锐批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基辛格和泰勒，他们分别从外交和战略角度予以了抨击。

不过，作为核时代的一种军事思想，作为“灵活反应”战略诸多反应手段中的“最后一招”，大规模报复仍被后来的美国军事战略批判地吸收并一直影响至今。

取而代之

在杜鲁门时期，中情局的主要职责是收集和评估国外情报，偶尔也对外国进行干涉，但多半是秘密提供经费，不直接插手。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中情局加强了“冷战工具”的作用，它负责制定和实施对外国政府的颠覆、破坏行动计划。

沃尔特·史密斯从1951年10月7日宣誓就任第二任中情局局长兼第四任中央情报主任到1953年2月26日辞职为止，虽然干了不到2年，却被认为是美国情报史上最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情报总管，是中情局最有成绩的局长之一。史密斯是个极右翼职业军官，个人威望较高，他召集的会议，不用邀请，各个军事部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会自动出席，而且直到会议就有关情报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才离去。他平时态度生硬，言语简略，直言不讳，经常和大量使用粗话，称得上是一位驾驭官僚的官僚，他当局长期间，在其副

手杜勒斯和杰克逊的帮助下，大胆兴革，创设了国家评估局等一大批新机构，添设了分别负责情报分析、秘密行动和后勤保障三个副局长职务；整顿了情报分析与评估程序，并有效纠正了以往情报评估总是偏袒军方的倾向；借朝鲜战争，大规模增加了隐蔽行动的特工人员，同时扩大了中情局的活动范围，使其一直延伸到远东；设立了联邦政府机构情报咨询委员会，以协调各情报机构间的工作……等等。他的这些措施确立了中情局在政府决策机构中的重要地位。

史密斯本来不希望卸任局长职务去就任副国务卿，他非常喜爱中情局的工作，而且大家也认为他干得很出色。无奈他身体多病，只好提前离开中情局。当时，中情局里有不少人提议让原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接替史密斯的职位。但是，多诺万是典型的亲英派，而英国人正竭力反对由美国人独宰世界，多诺万显然不可能成为艾森豪威尔所中意的人选。多诺万落选的另一原因是，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想要他的弟弟担任局长，艾伦·杜勒斯本人也无意问鼎中情局。

约翰·杜勒斯作为艾森豪威尔的股肱在其竞选总统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与总统的私人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他在推荐人选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分量。在进入白宫前，约翰·杜勒斯利用朝鲜战争高喊要“解放东欧”，而不是仅仅“遏制”那里的共产主义势力。但是，作为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采取的外交行动却远远要比使用外交语言谨慎得多，他实际推行的是一条外交“边缘政策”，他不想公开动用身穿制服的美国武装力量，而是想借助中情局这支影子部队采取隐蔽行动来辅助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让自己的弟弟担任中情局局长，就能将这个强大的秘密机构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现在艾森豪威尔任命艾伦·杜勒斯为局长，约翰·杜勒斯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社会上对艾森豪威尔的这一任命议论纷纷，认为白宫内阁成了杜勒斯的家庭作坊。艾森豪威尔对此明确地回答道，中情局是国务院（对外政策）的延伸，中情局能与国务院密切合作是再好不过的了。艾森豪威尔有着自己的打算，他不但要控制内阁成员，而且还要控制这些人所推行的政策。艾森豪威尔办外交是袖里乾坤，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情局和国务院这3大部门正是他在冷战时期要绝对控制和重用的工具。

杜勒斯与目光凶狠、不善言辞的“甲壳虫”史密斯形成鲜明对照。他和颜悦色，常常像圣诞老人那样哈哈大笑。他戴着黑框眼镜，嘴里叼着欧南石烟斗，衣着很随便，与人们所想像的间谍形象相去甚远。此人爱跳舞、好吃喝，尤其是贪恋女色，“使他那长期受到折磨的妻子感到绝望”。

与以往局长不同的是，杜勒斯经常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讲，兴致勃勃地著书立说。他喜欢亲自欢迎到中情局来工作的新成员，绘声绘色地叙述当年他在瑞士未能与列宁见面的遗憾。凡是呈报给他的建议，他总是限制只写1页纸，对那些他同意的建议，他就随手批上“可以试一试”几个字。

疯狗麦卡锡

40年代末，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论在美国政界悄然兴起，到了50年代初期，在麦卡锡之流的鼓噪下，“共产主义威胁”的风潮笼罩了全美国。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是由3个“恐怖根据”组成的——1.间谍恐怖：原子间谍案；2.战争恐怖：朝鲜战争；3.赤色恐怖：所谓“中国被罗斯福以来的政府‘丢失’了”，麦卡锡指责美国国务院“已成为赤色机构”，造成了“东方四亿人的悲剧”。

约瑟夫·R·麦卡锡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此人是个反共狂。50年代初，他利用原子间谍案、朝鲜战争等事件在美国政界声嘶力竭地叫嚷“美国政府已被共产党侵蚀了”，“要把赤色分子统统揪出来！”……以麦卡锡为首的一伙人由此在美国朝野掀起一股大清洗、大迫害的狂潮，史称麦卡锡主义。后来人们揭穿了麦卡锡的种种谎言，这个骗子从此声名狼藉，“麦卡锡主义”也就成了反共迫害狂的代名词，实际上它是美国右翼分子制造的白色恐怖。到了1954年，麦卡锡主义就没有什么市场了。

麦卡锡主义显赫扬名是从1950年攻击美国国务院开始的。麦卡锡声称那里隐藏着205个共产党分子，必须清理（然而，直到最后，麦卡锡也没有指出这些共产党人究竟是谁），由此掀起一场波澜……

1950年8月，在麦卡锡之流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麦卡锡共同发表了一份新闻公告。公告说：“准许麦卡锡干预国务院的工作。”麦卡锡随即将自己的亲信、原联邦调查局官员斯科特·麦克劳德安插在国务院，约翰·杜勒斯任命他为安全官。国务卿在任命驻外使节前，必须先征求麦克劳德的意见。一次，约翰·杜勒斯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任命查尔斯·E·波伦为驻苏联大使，但事先没有通知麦克劳德，这下激怒了麦卡锡，他开始向约翰·杜勒斯发难。麦卡锡说：波伦在当年苏联雅尔塔召开的会议上，担任了罗斯福的译员，在与苏联人的接触中有可疑之处。麦卡锡的话顿时镇住了约翰·杜勒斯。在举行国会听证会的那天，波伦来到杜勒斯的办公室，准备一起乘车前往国会。杜勒斯不安地说，两人应该分开坐车去。他还补充说，最好两人不要在一起照相。波伦冷冷地盯着这位势力眼的国务卿回答道：“我丝毫不想照相，但我相信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波伦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外交智囊人物，与凯南齐名。）

在一些美国人的眼里，由于麦卡锡的淫威，约翰·杜勒斯要保护他手下的人员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当时，在美国国务院中有一些被认为是对共产党或共产党国家“手软”的高级官员。例如，国务院中国科的情报分析官和外交官，早在4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他们就指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腐败没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解放区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于是，麦卡锡之流一方面攻讦国务院中若干搞同性恋的外交官“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则把矛头指向所谓“倾向共产党”的国务院官员：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是最受麦卡锡鞭挞的学者之一；中国科的戴维斯、文森特和克拉布同时被开除出国务院；才华出众的埃默森被剥夺了晋升大使的资格，仕途生涯从此完蛋；谢伟思则被一贬再贬，最后只能充任办事员去给护照盖章……。在这场反共狂潮中，国务院里几乎所有老资格中国问题专家都被清洗殆尽，只剩下2名懂汉语的官员坐守空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约翰·杜勒斯对那些“同情中共”的国务院官员早就怀恨在心，他和麦卡锡一致认为，由于国务院的“亲共”势力左右了美国在40年代后期的对华政策，抛弃了蒋介石，因此导致中国大陆的“丢失”。此时他正好借麦卡锡反共之名，行排斥异己之实。当时在美同政界已颇有名气的凯南，由于主张联合国接纳中国，并警告不要越过朝鲜的“三八线”，被杜勒斯判定为“非常危险的人”，杜勒斯掌管国务院后，就将凯南解雇。如果说“保护”的话，前任国务卿艾奇逊倒是卖了不少气力。

麦卡锡认为，自己既然能整顿国务院，当然也能管理中情局。这在当时的确并非天方夜谭，他制造的恐怖气氛使多数美国人惶惶不可终日，甚至连

前总统杜鲁门为迎合潮流，公布了“忠诚法案”，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审查和鉴定。麦卡锡的密友、联邦调查局胡佛是最先向中情局发难的人物。由于新建的中情局行使权利并取代了联邦调查局在拉丁美洲的情报网，胡佛命令在那里的手下销毁情报卷宗，对中情局实行“焦土政策”。同时胡佛指责说，由战略情报局的老牌空想社会改良家和世界大同主义者领头，共产党已经渗透到中央情报局。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应付这些指责，本鲁门总统任命麦卡锡的密友、右翼人物史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有人说，史密斯的贡献之一就是安抚了麦卡锡，避免了清洗浪潮殃及中情局。事实上，前中情局局长史密斯在这甚嚣尘上的反共氛围中也夹着尾巴跟着麦卡锡狂吠。他在麦卡锡和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威廉·本顿之间的一桩诽谤案中出庭作证时说：“中央情报局里确实有共产党分子，他们的行动如此诡谲，他们的手已经伸进了政府的每一个安全机构。”其实，史密斯本人就是一个麦卡锡分子，只是他直接没有清洗中情局而已。他甚至提醒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美国著名的大财阀洛克菲勒是共产党人！

1953年6月，麦卡锡道貌岸然地宣称：“我有充分的理由确信，至少有100名共产党分子隐匿在庞大的中央情报局内部。红色势力最危险，我要尽一切努力将他们挖出来。”麦卡锡估计，他的一席话如雷轰顶，足以使中情局屈膝磕头，如同在国务院发生的情形一样。然而，令麦卡锡感到惊讶不已的是，担任中情局局长才几个月的艾伦·杜勒斯却不象他哥哥约翰·杜勒斯那样买他的账，仰仗着艾森豪威尔总统这顶保护伞，艾伦·杜勒斯并没有被麦卡锡的指控所吓倒。

根据法律规定，有关中情局的规模、雇佣的人员和人事档案对外是保密的，这一点确实难住了麦卡锡。麦卡锡在国务院安插了他的“地下力量”，但在中情局里却没有现职官员充当他的“耳目”，难以了解其内部情况。再则，处于“冷战”时期的中情局是执行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力量，艾森豪威尔总统决不愿这个“御用”的秘密机构受到损害。然而，麦卡锡不甘心，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尼克松出面化解

1953年7月9日9点，麦卡锡领导的参议员常设调查小组总顾问罗伊·M·科恩打电话给中情局法律顾问沃尔特·福兹海默，对他说，调查小组委员会要中情局情报处长的助理威廉·P·邦迪于上午10点45分到他那里去一趟。科恩最近得悉，邦迪已被中情局推荐为绝对可靠的人，准备要重用他。科恩还从侧面了解到：邦迪是前国务卿艾奇逊的女婿，而艾奇逊被麦卡锡指责为“有亲共倾向”（系指40年代艾奇逊同意联合国救济与复兴总署给予我解放区一些人道援助）；邦迪在几年前为了国务院阿尔杰·希斯间谍案的辩护之事，曾募捐过200美元。科恩从捐款这件事推断，邦迪可能是中情局的“希斯”，因此需要调查。

福兹海默放下话筒，径直走向情报处长罗伯特·艾默里的办公室……

此时，局长艾伦·杜勒斯正在白宫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有规定，在白宫召开会议期间，不允许任何人中途打电话影响会议。因此，艾默里现在无法把福兹海默报来的这一消息立刻向杜勒斯汇报，只得等白宫会议结束后再说。然而时间不等人……足智多谋的艾默里终于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从而可以拖延两个小时的时间。他让邦迪打电话给妻子，叫她赶快打点好行李，他们将一起乘汽车去新英格兰旅行，并叮嘱他的妻子，

千万别再接任何人打来的电话。随即，邦迪也离开了办公室。他走后 15 分钟，中情局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来上班了，几乎没有人同邦迪打过照面。一切安排妥当，艾默里亲自打电话给科恩，对他说：“很不凑巧，邦迪今天没有来上班，他外出休假了。”一听邦迪外出休假，科恩知道今天没有办法再找到邦迪，他无可奈何地挂断了电话，另作打算。

11 点左右，艾伦·杜勒斯开完会从白宫回到中情局，艾默里立即把上午发生的事以及他的安排向杜勒斯作了汇报。杜勒斯听完后没说话，只是点点头，他立即驱车前往副总统尼克松处。杜勒斯心里十分清楚，调查小组委员会整邦迪，目的是想捅中情局一刀。

尼克松副总统曾和麦卡锡一起在参议院共过事，他与共和党其他人一起支持麦卡锡的调查小组委员会，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不错。他听完杜勒斯的讲述后，便去劝说麦卡锡。他向麦卡锡指出，如果麦卡锡继续在邦迪这件事上纠缠不休，或者在中央情报局身上大做文章的话，他将会明显地失去选票，麦卡锡应当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尼克松打赌地对麦卡锡说：“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上观察过邦迪的言行和态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名忠于职守的美国公民，他为我们的国家已作出了重用的贡献。”尼克松又耐心解释道：“你应该理解这些来自坎布里奇的人的想法，邦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律学院，希斯也是从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邦迪想帮助希斯，只是为了赶浪头，他本人却没有考虑过这浪头会冲击到何处。”听了尼克松的这番话，麦卡锡没有马上表态。

再说科恩听了艾默里打来的电话之后将信将疑，他又去找福兹海默证实情况，福兹海默含糊其词地蒙混了过去。尔后，福兹海默感到心里很不踏实，他生怕事情拆穿后会牵联到自己的头上来。于是，福兹海默去找艾伦·杜勒所。他面带难色地说：“要是调查小组再把我唤去的话，我可不能再作伪证了，我得如实地告诉他们，我没有见到邦迪，但是我知道，是中央情报局把他打发走的……”没等福兹海默把话讲完，杜勒斯便不耐烦地把对方的讲话打断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福兹海默：“这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事，由我们自己来调查，不允许麦卡锡来干预。”福兹海默见局长真的发火了，他没说什么，就退出了局长办公室。

福兹海默心里很清楚，他在艾伦·杜勒斯的眼里只是一名无足轻重的人物，如果邦迪的事发生在他的身上，杜勒斯决不会如此大动干戈。邦迪的情况毕竟不同，他是前国务卿艾奇逊的女婿，曾在艾奇逊和希斯的哥哥唐纳德·希斯合伙的律师事务所里干过事。为了阿尔杰·希斯间谍案的辩护之事，艾奇逊和邦迪曾在一起出谋划策，也就在那时，邦迪捐赠了 200 美元的支票。这些情况，邦迪曾向中情局说明过，而且已经得到了谅解。摆在福兹海默面前的利害关系十分清楚，一旦他在调查小组委员会面前透露了真情，不但中情局的名誉扫地，就连他本人在局里的位置也会受到影响，或许还会遇到其他厄运。福兹海默在衡量了这些利害关系之后，决定守口如瓶。

麦卡锡的苦心

很快，华盛顿的报界传出消息，说中情局同其他机构一样，免不了受到麦卡锡的攻击；艾伦·杜勒斯已同意再举行一次安全听证会，对邦迪的事情重新调查。舆论对中情局很不利。几天后，邦迪终于“休假”结束回到中情局，同事们见他还是安然无恙地端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于是社会上又传出了新的消息：中情局没有向麦卡锡让步，艾伦·杜勒斯不允许麦卡锡对其下属

进行审讯。听到舆论对自己的赞扬，艾伦·杜勒斯心里美滋滋的。但是他不露声色，在中情局内部下达指示，让邦迪的事件马上降温，不要过分刺激麦卡锡。

不久，麦卡锡很体面地写信给艾伦·杜勒斯。信中说：“如果对邦迪调查后发现可疑之处，就把邦迪开除出中央情报局；现在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吧！”科恩曾通过前局长史密斯向艾伦·杜勒斯提出，将麦卡锡的另一名心腹戴维·沙因调到中情局工作。这时，科恩也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对史密斯说：“对于今后的调查工作来说，中央情报局是个有油水的地方，我们不想安排沙因到中央情报局工作。因为随后我们就要对这个机构进行调查，沙因的事就算了吧。”显然，科恩为了给自己下台阶而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至于被麦卡锡整治过的邦迪，后来飞黄腾达，甚至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

麦卡锡为何要拿邦迪来开刀呢？只有局内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自从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他准备重新安排国家原子能和情报系统的监督工作，人员将有所调整。1952年夏季，艾伦·杜勒斯担任中情局副局长时，邦迪作为他的助手参加国家安全委员回答工作质询。那时，安全委员会对情报的估价工作没有什么兴趣，许多时间都花在议论总统选举一事上。分配给邦迪的任务是，准备一本有关中情局活动的小册子，并对共和党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竞选之事作出估价。史密斯局长对邦迪交待说：“我们必须把一切关键问题的判断记录在自己的本子上，无论谁当总统，这都是有用的。”遵照史密斯的指示，邦迪埋头苦干地汇编好材料并送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幕僚班子手中。中情局所提供的材料对新总统重新安排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出于“冷战”的需要，艾森豪威尔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到了中心位置。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周四举行一次例会，作出重大的决策。会上尤其重视中情局的意见，它呈送的情报估价成了艾森豪威尔制定政策的依据。麦卡锡不愿看到中情局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更不愿意看到在总统的身边隐藏着一名可疑分子。于是便演出了上面那场闹剧。他想通过对邦迪进行的“忠诚”调查，来狠杀一下中情局的威风，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岂不知，在尼克松的庇护下，艾伦·杜勒斯没有低头。于是，麦卡锡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麦卡锡再斗杜勒斯

1953年9月，麦卡锡通过他的好友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要联邦调查局调查中情局人员科德·迈那的情况。

迈那是艾伦·杜勒斯在1951年亲自招募到中情局来工作的。按照杜勒斯的说法，“迈耶具有创业时代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典型气质：严格按照自己的信仰办事，坚信美国的正义和个人自由，一旦要为美国的自由去斗争，他会不顾一地去奋斗。”

迈耶对艾伦·杜勒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杜勒斯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我立志投身于中央情报局的决定因素。他快乐和坦率的外表下有着一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他有着丰富的知识，有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人来掌舵，是值得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而且杜勒斯还是在别人最困难时乐于助人的最忠诚、最勇敢的朋友。”

正因为迈耶是艾伦·杜勒斯亲自招募的，而且对他又是死心塌地地追随，所以，不出迈耶所料，杜勒斯再次顶住了麦卡锡的挑战，他拒绝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审问迈耶。他坚持说：“迈耶是中央情报局人员，他是否是又一个‘希

斯’，这只能由中央情报局自己来处理。”为此，杜勒斯召集了一次旁证会进行内部调查，这样做就可以推卸责任，以免日后被人指责是在包庇下属人员。

感恩节那天，迈那突然接到艾伦·杜勒斯的电话。杜勒斯向他表示祝贺。他说：“我给你带来了一条好消息。对你的秘密审查工作已经结束，宣布你无罪，根据总顾问和安全处处长的建议，认为你继续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符合国家的安全利益。”1954年，迈耶又被任命为计划处国际组织科科长。

艾伦·杜勒斯保护迈耶的消息很快在中情局内和首都华盛顿传开了。艾伦·杜勒斯的行动和他当国务卿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艾伦敢于顶住麦卡锡的嚣张气焰，而约翰却没有勇气这样做。有人开玩笑地说：“中央情报局是艾伦的中央情报局，而国务院却不是约翰的国务院。”其实，艾伦·杜勒斯也是迫不得已。如果任由麦卡锡往自己脸上抹黑，对走卒坐视不顾，那么谁还肯为他杜勒斯卖命呢？从根本上说，杜勒斯与麦卡锡在反共立场上并行不悖，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只是为了争权夺利。

面对自己的“地盘”受到侵害，杜勒斯特地挑选柯克帕特里克和赫尔姆斯对付麦卡锡的调查。他们采用两种方法来对付：一种方法是，趁机清除那些从安全角度考虑“不可靠的人”，同时，把清洗的责任全都推到麦卡锡的身上；另一种方法是借保密法之名，坚持局内调查，不向麦卡锡提供可能被他抓住把柄的材料，以保护“忠诚者”。由于史密斯是自己的老上级，因此杜勒斯接受了一些史密斯安插到中情局的麦卡锡的朋友们，但与此同时，杜勒斯忙于把自由派人物网罗进来，其中包括特雷西·比斯尔、莱曼·柯克帕特里克、托马斯·布雷登。

艾伦·杜勒斯斗赢了麦卡锡，使中情局在社会上的声誉顿时提高了，吸引了许多社会上的精华力量和名牌大学毕业生，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秘密机构中来，内部士气十分高涨。

杜勒斯在中情局内暗中培养一种“团结”精神，他鼓励中情局人员之间的婚姻（一个优点就是，双方都经过安全甄别），同时还鼓励组织桥牌俱乐部，以促进组织的凝聚力。

麦卡锡主义造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在史密斯和艾伦·杜勒斯担任中情局局长期间，在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上，中情局取代了国务院的作用，执行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情局在国内的地位和威望的提高，为艾伦·杜勒斯从事隐蔽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务院与中情局如此亲密的关系，使后者能够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国会成立某些委员会来监督其活动的企图。艾伦·杜勒斯曾经相当自信地说：“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情报相比，我们的情报在政府中享有影响更大的地位”。

杜勒斯力挫群雄

1955年，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发生了一场权力之争，使得杜勒斯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其他高级军官恶斗起来。争执的实质是中央情报局是否有权管辖三军的情报支系。按照法律，中情局是有权管辖的。

这场权力之争牵涉到当时的陆军情报局(G—2)局长阿瑟·吉尔伯特·特鲁杜陆军中将。1954年，特鲁杜中将应邀参加驻华盛顿德国大使馆为阿登纳总理所举行的宴会。他特地走向联邦德国政府总理，向总理表示他对中情局支持莱因霍德·盖伦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情报网感到不安。特鲁杜说，他怀

疑盖伦是否可靠，同时也怀疑维持一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并由前纳粹军官领导的“鬼机关”在政治上是否有好处。显然，阿登纳受到了感动。特鲁杜又被请到大使馆进行详谈……

当杜勒斯获悉他们的谈话以后，大发雷霆（他如此震怒还是很少见的）。他立即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面陈问题，并激烈地指控说，特鲁杜越过正常途径，直接去找阿登纳，已经危害了美国的政策和利益，必须严肃查办。军方的重要人物——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国防部长查尔斯（车头查理）·威尔逊都出来为特鲁杜辩护，并声称中央情报局无权干涉军方事务。然而这没有起什么作用。不久，这位从不把中情局放在眼里的特鲁杜将军的陆军情报局职位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就被撤掉了，他被调到楼上，充任美国远东指挥部莱曼·兰尼兹尔将军的副手。这一来，情报界的大小诸侯们立即肃然起敬，再不敢说三道四了。

作为第一个由文官晋升为局长的杜勒斯，敢于同势力强大的军方争斗，当然是因为有后台的支持。经过这场较量，杜勒斯确立了他的权威，并提高了中情局在美国情报界的地位。

杜勒斯与隐蔽行动

如果说中情局局长与美国总统之间接触的程度是衡量他影响大小的主要尺度，那么，杜勒斯便是历届中情局局长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为了让总统了解他们的想法，一些局长不得不像中世纪的朝臣那样施展诡计：常常在总统快要午睡的时候前去拜访，或者研究总统的日程安排，在他办完公务返回椭圆形办公室的路上挡驾，或者在某个周六早晨，趁白宫工作人员稍不注意时突然去见他。

杜勒斯接近艾森豪威尔的机会比任何人都多，但他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每天早晨都去总统办公室交谈。两人的关系并不过分亲密。艾森豪威尔每周约见杜勒斯两次，但每天都要听取中情局相当一级官员的简短汇报。总统对中情局的工作很满意。曾有人向艾森豪威尔指出杜勒斯桀骜不驯、为所欲为，应考虑撤换他，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不会撤换艾伦……尽管他有局限性，但我宁可让艾伦当情报主管，绝不换上其他人！”

直到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审批隐蔽行动的唯一方法是在有关机构之间非正式地达成谅解。虽然在公众场合，总统对涉及隐蔽行动的提问总是吞吞吐吐，但他一直用老兵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活动。一位前中情局高级官员说：“一切隐蔽行动都是白宫做出的决定。”在隐蔽行动不多时，白宫一直实施宽松的控制政策。随着隐蔽活动的数量倍增，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4年末的12/1和12/2两份文件中规定了审批程序，除少数变动外，这些程序在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生效。

总统指派的代表、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各项隐蔽行动计划。计划由该委员会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最后审批。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个委员会称为“5412委员会”或者“特别小组”；在约翰逊执政期间则称为“303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设在办公大楼303房间；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称作“40委员会”，是依据规定其活动的一个文件命名的。总之不管叫什么，它的核心代表人物都是相同的。

艾森豪威尔还建立了总统国外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作为看门狗。委员会由退休的高级官员以及前职业情报老手组成。例如著名的奥马尔·布雷德利

将军、在二战中首次轰炸日本东京的杜利特将军，还有戴维·布鲁斯。中情局秘密工作的基调在杜利特将军建议扩大隐蔽行动的绝密报告中得到了绝妙的体现：

“显然，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死敌公开宣称要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主宰世界。在这场比赛中没有任何规则，到目前为止，人类行动的共同准则被抛弃一边。如果美国要生存下去，必须重新考虑长期存在的美国观念“公平比赛”。我们必须发展有效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必须学会运用比敌人对付我们的方法更高明、更尖端、更有效的手段颠覆、破坏、消灭敌人。”

总统国外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仅仅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小组，它的意见无人理睬。“因为这条狗只会叫唤，很少咬人”。

尽管有以上各种机构存在，中情局局长通常只要总统或者他委托的代表同意，就能确保隐蔽行动得以获准。这种制度反映了无声的默契，尤其在国会内部，提倡不要对情报问题探究太深。中情局在成立后的 20 年与军方和监督情报活动的拨款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杜勒斯作为情报老手的声望、他对国会的亲密友好的态度以及他在其中的势力对创造新气氛起到了极大作用。通常他总是非正式地会见国会小组，简要介绍世界形势和中情局的活动，询问是马马虎虎的，最敏感的讨论则由杜勒斯与各委员会主席之间单独进行。

多年来，国会几次试图加强对中情局的监督并扩大参与这些活动的范围。但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许多立法者不愿对秘密行动以及委员会制度作过多的了解；而且这种制度也不许中、下级官员干预。

在杜勒斯执掌中情局期间最令人瞩目的“功业”是，隐蔽行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冷战。从 1953 年至 1961 年间，中情局年平均预算为 10 亿美元，而隐蔽行动的费用就占了其中的 54%，并新增雇员 2000 人。杜勒斯以“白色案件总管”著称，直接领导隐蔽行动。“每当同威斯纳一起商讨秘密行动时，他总是乐不可支，劲头十足。”他把局里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全部交给副局长查尔斯·卡贝尔，以便全身心投入到他所钟爱的颠覆活动中去。

十、推翻摩萨台

英美分歧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就摆出了一幅对东方阵营强硬的姿态。他声称如果朝鲜停战谈判继续拖延下去，美国将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国务卿杜勒斯叫嚷要在朝鲜进行“自由选举”，接着又提出要结束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共产党游击战；在统一的德国实行“民主选举”，让东欧国家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府……倘若这些要求达不到，美国将建立自己的武库，准备东西方的冲突。就在国务卿讲话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便摇旗呐喊：“国务卿杜勒斯给苏联选择了机会，要么合作，要么面临西方强大的军事对抗。”

美洲大陆吹出的这股寒风在温煦平静的欧洲外交界引起了骚动。英国首相丘吉尔知道，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的“大国”地位已濒临消失的边缘，一旦美苏发生冲突或者双方耗费巨资投入军备竞赛，英国所处的边缘地位必然遭到进一步的侵蚀和削弱。因此，丘吉尔对美国的“冷战热情”大泼冷水。1953年5月11日，丘吉尔告诫艾森豪威尔，不要把局部的事情当做全球问题，应该与苏联缓和，并让苏联人确信，苏联的安全问题能够得到西方的尊重。丘吉尔政府表示，即使没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援助，英国也要保护自身的利益。华盛顿把伦敦的态度看作是第二次“慕尼黑”事件，他们认为英国为了维护其帝国的利益，不惜出卖整个西方的自由。有些美国舆论还特别指出，正是丘吉尔本人在二战刚结束时第一个公开跳出来叫嚷，“铁幕已在东方落下，世界形成了东西方对立的格局”；现在，“铁幕”名词的首创者丘吉尔为了本国利益，向苏联人屈膝下跪，实乃第二个“张伯伦”。为此，美英两国之间产生了分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盛顿指令中情局执行秘密行动来配合其外交政策。然而，丘吉尔最终在一些问题上说服了美国，两家合作在“暗中对苏联及其支持者下手”，“阿贾克斯”行动便是其中的一例。

错综复杂

50年代，伊朗成为美、英、苏三国之间争夺的焦点。苏联坚持推行向波斯湾扩张的政策；美国极力遏制苏联，以维护自己和西方的利益；英国企图保持大英帝国在世界的地位，它不希望美国、更不希望苏联进入伦敦的“地盘”，伊朗问题变得十分微妙。1951年，伊朗新任首相摩萨台宣布伊朗要实行石油国有化，这就使美、英、苏之间的矛盾更趋明朗化。

伊朗是个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古国，英国和沙俄长期为争夺伊朗而激烈角逐。1921年2月，伊朗近卫军团头子礼萨·汗·巴列维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并于1925年正式夺取王位，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礼萨·汗与法西斯德国相勾结，1941年，反法西斯盟军进入伊朗，将礼萨·汗国王驱逐出境，由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承王位。从那时起，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英国人的操纵下统治着伊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两次大战折腾得精疲力竭的大英帝国开始放弃它的“世界责任”：1946年6月，将巴勒斯坦争端提交联合国；宣布即将结束对印度的统治；由美国接替它承担“维护希腊和土耳其稳定的传统责任”，包括每年支付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派驻4万人的军队。但是，英国绝不放弃它在伊朗的利益。

苏联对伊朗垂涎已久。它拒绝遵守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关于在

大战结束 6 个月内从伊朗撤走各自军队的保证。虽然美、英军队已在 1945 年末全部撤离伊朗，但苏军坚持占领伊朗北部地区，同时还支持伊朗国内的叛乱作为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后来在迫使伊朗同意共同拥有对一些重要油田的开采权之后，莫斯科才应允于 1946 年 3 月底撤军。

苏联对土耳其也有贪心。1945 年 6 月，莫洛托夫外长提出苏联对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 3 省的领土要求，后来在波茨坦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主张。吓得土耳其连忙投靠到美国的保护伞下。直到斯大林死后，苏联才主动放弃了领土要求。

总之，“苏联对西亚的兴趣是非常浓厚的”。

1951 年，摩萨台出任伊朗首相，这实际上削弱了年轻的巴列维国王的权力。同时，摩萨台宣布石油国有化，首先直接触犯了英国的重大利益——在政治上，要防止苏联向印度洋和波斯湾扩张，因为这关系到英帝国的安全利益；在经济上，伊朗石油几乎全部控制在英国的手里，伊朗的英国—伊朗石油公司是英国石油的主要来源。这个石油公司是由一个英国企业家在 1901 年创建的，他获得了对该公司 60 年的垄断权。英国政府后来购买了英国—伊朗公司中相当数量的股份，该公司又和皇家海军签订了供应石油的合同。1933 年，经过谈判，又将原先规定的垄断年限延长到 1993 年，伊朗国王则从这个公司收取石油产地的使用费。1951 年，作为著名反英派的摩萨台公开声称，英国已经从伊朗的石油生产中获取了足够的利润，远远超出了在伊朗开发自然资源所应得的份额，为此，应将石油国有化。德黑兰刚传出这一风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作了一次中东之行。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正在衰退，而苏联的影响却在扩大。国务卿杜勒斯认为，美国不能袖手旁观，应当通过政治和外交上的努力，让阿拉伯国家相信，美国并不站在英国和法国一边（因为它们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名声太臭）；应动用中情局的秘密力量，来实施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英国人认为是美国的政策加速了他们在该地区利益的丧失。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将外国资产收归国有的举措，美英等西方国家则一贯视作“布尔什维克土匪行为”，是投靠苏联的表现。对此，他们如临大敌。然而，摩萨迪并非左派人物，他不爱苏联，更恨英国。起初他向美国寻求支持，但没有如愿，于是苏联不失时机地向他调情。

1951 年上半年，英国向伊朗施加压力，要摩萨台政府赔偿英国方面的“损失”，同时还派出一艘巡洋舰停泊在阿巴丹港，吓得其他国家的油船不敢靠近伊朗港口。实际上，这是英国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实行海上封锁。然而，摩萨台没有屈服，始终坚持既定方针。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担忧，英伊争端最终将影响世界石油的供应和油价的起伏，并担心苏联会乘机利用这一事件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此时，苏联对伊朗虎视眈眈，如果逼伊朗太甚，势必将伊朗推入苏联的怀抱。于是，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方面有所节制，不要诉诸武力。艾奇逊在召见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时说：“除非苏联出兵干涉，或者德黑兰发生共产党政变，或者英国在撤离英国公民时遭到袭击，否则的话，我们不支持动用军事力量。”但是美国人的“调停”工作受挫。华盛顿为了确保西方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和政治利益，坚决反对伊朗实行石油国有化。同时，美国也看中了英帝国经济秩序的心脏部位，认准在伊朗这个新市场上，美国可以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在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英国只好请求美国给予帮助。1952 年 10 月，丘吉尔

再次当选为英国首相，11月，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于是，这两位二战时期的老战友开始酝酿联手推翻摩萨台政府的隐蔽行动。

“阿贾克斯”行动

“阿贾克斯”行动的最初建议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提出来的。英国要求美国帮助的动机是想早日收回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利益。而美国人的打算就比英国人更多了。他们不但考虑到西方的石油利益，还考虑到美国取代英国接管伊朗的可能性。

1953年6月25日，国务卿杜勒斯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休斯·威尔逊，副国务卿史密斯和他的助手马休斯，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理查森·鲍伊，国务卿近东、非洲、南亚事务助理墨菲，美国驻伊朗大使亨德森，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小罗斯福。会上，艾伦·杜勒斯把小罗斯福在征求了英国秘密情报局意见后制订的推翻摩萨台的方案作了介绍。整个方案并不复杂，主要是策划内部政变。根据中情局和英国军情五处的分析，可以在伊朗找到取代摩萨台的强大势力。小罗斯福详细说明在采取行动时，应怎样与英国情报机关配合，其中包括动用在伊朗的英国特工人员以及使用在塞浦路斯的英国通讯设备。接着，国务卿杜勒斯征求到会者的意见，除马休斯和鲍伊没有表态以外，其余的人一致同意中情局的行动方案，特地从德黑兰飞回华盛顿的亨德森大使在会议上是个关键人物，他对伊朗的局势有着权威性的了解，他认为，摩萨台领导下的伊朗正悄悄地滑向苏联一边，这对西方是个沉重打击，而且形成了对美国安全的实际威胁。亨德森慷慨激昂道：“各位都知道，我并不喜欢秘密行动那玩意儿，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险恶的局势，我们遇上了一个想和苏联人结盟的疯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放手行动了，愿上帝赐给我们胜利。”国务卿接过话茬：“你说的太对了，让我们齐心协力地干吧！”就这样，中情局的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全力支持。

1953年8月1日至2日的午夜，在德黑兰的一座花园别墅里，一个美国男子悄悄溜出大门，钻进一辆轿车。这个美国人龟缩在后排车座底下，用一条毛毯将自己裹起来。轿车向皇宫驶去轿车停在皇宫里的车道上，年轻的巴列维国王坐进轿车，关上车门时，这个美国人拉下毛毯坐了起来。巴列维笑了。“你好，罗斯福先生。”

小罗斯福解释说，他是用化名非法进入伊朗的；他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私人代表来到这里。“艾森豪威尔总统即将通过他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的一句话亲自证实这一点。演说在24小时内发表。丘吉尔首相已经布置在明天晚上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报时的用语中作一特殊改变。届时，播音员说‘现在’（停顿）‘正值午夜’，而不用‘现在是午夜’的说法。”

取得国王信任后，小罗斯福向他说明，华盛顿和伦敦亟望帮助他推翻他的首相，以确保他的王位。被摩萨台逼得一度宣布退位并准备离开祖国的巴列维喜出望外，双方商定，第二天午夜继续会商。

就这样，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重大秘密行动开始了。

克米特·罗斯福是美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哈佛大学毕业、历史学家、战略情报局时期的中东问题专家。中央情报局成立后，他又成了从事秘密行动的一名干将。此人长相英俊潇洒，而且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这次，由他具体负责在伊朗的代号为“阿贾克斯”的秘密行动。小罗斯福先

在伊朗物色可以取代摩萨台的人选，最后选中了扎赫迪将军。1941年，扎赫迪曾被英国人怀疑是亲纳粹分子而遭绑架。二战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巴勒斯坦。一天，在华盛顿协助“阿贾克斯”行动的英国高级外交官帕特里克·迪安在国务院听取小罗斯福汇报情况，当他听说被选中的人是扎赫迪时，顿时傻了眼，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国务卿杜勒斯和副国务卿史密斯不知原委，莫名其妙地看了看小罗斯福和面前的这位英国客人。国务卿拖长声音问英国人：“你认为怎么样？”帕特里克犹豫了一下，然后清了清嗓子说：“我想我们应征求一下伦敦的意见”。稍停片刻，他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们和伊朗人都认为非要扎赫迪不可的话，那我们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话音刚落，帕特里克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小罗斯福。“你说的有道理，”小罗斯福解释着：“扎赫迪并不是我们看中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向你保证。巴列维国王非要扎赫迪作自己的首相不可，他是伊朗国王看中的呀！不过，根据我们在伊朗情报关系的调查，扎赫迪将军并没有反英的倾向。”

小罗斯福陪着客人走出了国务院，和他们一起来到艾伦·杜勒斯的办公室，目的是想再解释一下，以消除英国人的疑虑不安丘吉尔知道，英国的选择权是有限的，而在摩萨台和扎赫迪之间，他们宁愿接受扎赫迪，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乱中取胜

小罗斯福在德黑兰一座被称为“安全屋”的地下室里建立了他的秘密指挥部。

8月初，小罗斯福派伊朗上校纳西里飞往里海复宫，设法让躲在那里的胆小鬼国王签署命令，罢免摩萨台的职务。

8月12日，纳西里带着罢免令回到德黑兰。得到消息的摩萨台让里亚西将军出动军队，控制了德黑兰。摩萨台发表广播讲话，接管政权。同时军队搜捕支持国王的著名人士。小罗斯福将扎赫迪藏到美国大使馆附近一座地下室里。这时，国王一家仓惶逃离了德黑兰。

人民党及其支持者们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国王”，“绞死美国人”。一些暴徒趁机疯狂抢劫一切可以抢到的东西……

美国大使亨德森（作为“阿贾克斯”行动的一部分，他正在“度假”）返回德黑兰。他威胁摩萨台说，如果不制止抢劫和破坏，恢复秩序，美公民将撤出德黑兰。亨德森后来回忆说：“摩萨台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要到了警察局长，命令他立即派警察恢复街头秩序，驱散正在捣乱破坏的人群。”

这是70岁的摩萨台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由美国人训练的警察和士兵用枪托、警棍和催泪弹疯狂驱赶骚乱的人群，摩萨台自己亲手解除了对自己的支持。

8月19日，小罗斯福向他的伊朗特工人员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他拿出中情局带来的钱款招兵买马……

他们首先雇佣了齐尔卡那巨人。这些人都是举重力士，接受过古代伊朗的训练方式，肩膀宽阔，肌肉发达。200多个齐尔卡那巨人当天浩浩荡荡走上街头，展现出令人望而生畏的场面。他们一面高呼“国王万岁”，一面像托钵僧那样跳着、扭着。路边的一些帮手分发10里亚尔钞票，人们蜂拥而上。“国王万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人群随即洗劫了一家亲摩萨台的报社。

英国人在伊朗已物色了不少人作为自己的耳目，这些人大多数是伊朗的中产阶级和商人，他们在德黑兰颇有市场。就在帕特里克和美国人碰头后没

有几天的功夫，德黑兰的大街小巷便沸沸扬扬流传着各种各样败坏摩萨台形象的谣言。街头出现了支持巴列维国王，反对摩萨台的示威游行，就连军队也出面表示要效忠国王，要求摩萨台下台。摩萨台的支持者和人民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迫在眉睫的政变；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机关雇佣的暴徒对摩萨台的支持者大打出手，同时还为反摩萨台的军队提供武器装备，一时间街巷枪声连绵不绝……

1953年8月20日，“阿贾克斯”行动终于取得成功：摩萨台被逮捕，判刑20年；由扎赫迪出任伊朗新首相，国王返回德黑兰。中情局在这次行动中，只出动了8名特工人员在幕后活动，原先准备的300万美元经费，结果只花了100万美元。

摩萨台下台后，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取而代之的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这个公司实际上就是由美英资本操纵下的国际石油财团的化身。它经营原来由英国控制的伊朗南部油田，掌握了99%的伊朗石油生产。这个财团对伊朗石油的总投资为9.8亿美元，其中英美石油公司各占40%的股份，英荷壳牌公司占14%，法国占6%。

艾森豪威尔在与苏联争夺中东地区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伊朗基本将苏联势力赶走，使其长期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据点；通过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挫败了苏联对达达尼尔海峡的野心。

6年后，艾森豪威尔访问了伊朗。街道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每人得到10里亚尔的钞票做辛苦费），从机场到皇宫近10公里的路上全都铺上了波斯地毯……

尾 声

“阿贾克斯”行动是中情局的一次巨大成功，小罗斯福满面春风地从伊朗凯旋回归华盛顿。他在白宫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了“阿贾克斯”行动的前后经过，杜勒斯兄弟俩、白宫办公室主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等都在场。听完汇报后，国务卿杜勒斯显得比谁都兴奋，他得意洋洋地问小罗斯福：“你个人对这次行动成功的看法如何？”小罗斯福略微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对伊朗的情况研究以后，使我们确信，首先是伊朗的军方，其次是伊朗的大众和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不需要动用海军陆战队，也可以推翻一个政府，达到预期目的。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单靠秘密行动来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武力了。”听完小罗斯福的发言，国务卿杜勒斯脸上的表情顿时起了变化。很明显，他不同意小罗斯福的这种看法，而艾伦·杜勒斯则点头表示同意。

离开白宫以后，小罗斯福意识到，伊朗的成功蕴含着一种新的危险，它将使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多地运用中情局隐蔽行动的能力。而在小罗斯福看来，这是对中情局隐蔽活动性质和使用问题的错误理解。随后，他飞往伦敦，向中风后正在养病的丘吉尔首相介绍伊朗所发生的一切。小罗斯福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足足呆了两个小时，丘吉尔显得很疲倦，一个瞌睡接着一个瞌睡，小罗斯福只能等到丘吉尔睁开眼皮时断断续续地讲。听完小罗斯福的汇报，丘吉尔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小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后不久，国务卿杜勒斯又把他召去，要他再负责一次重大的秘密行动。但是遭到了小罗斯福的断然拒绝……

十一、颠覆危地马拉政府

小国“侵犯”美利坚

拉丁美洲历来被美国视为自家的“后院”，这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美国实际上的保护国。美国长期以来与拉美国家形成的这种“特殊”关系必然引起拉美各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因此，就在“阿贾克斯”行动结束的几星期后，杜勒斯兄弟俩又开始策划推翻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

美国在危地马拉有一个联合果品公司，这个公司与英国在伊朗的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情况大同小异。美国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拥有 18.8 万公顷土地，它还控制着危地马拉的海运、电讯、外贸以及重要的海港和铁路运输，是危地马拉最大的经济实体。与英国—伊朗石油公司所不同的是，它与危地马拉人的关系并不融洽，但在美国政府中有不少权势很大的朋友，包括杜勒斯兄弟俩。1931 年，联合果品公司与当时的乌比克独裁政府达成一项为期 99 年的协议，使果品公司占有的土地比包括天主教会占地在内的危地马拉一半土地拥有者的土地总和还要多，协议实际上免除了联合果品公司的一切税收和义务，甚至它的主要商品香蕉的出口税也微不足道，同时，联合果品公司还取得了无限制利润汇款以及对通讯网络和运输网的垄断等特权。当时为联合果品公司谈判这笔交易的律师就是约翰·杜勒斯。1951 年 3 月，经过民主选举的阿本斯（上届政府的国防部长）接替阿雷瓦洛，担任了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阿本斯是一名军官，国内政治权力掌握在军人手里，全国 22 个省长全部是军人。阿本斯继续推行前任总统提出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他的政府得到了国内共产党和劳工团体的支持。从 1952 年起，阿本斯实行了较为激进的“土改”，征用和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和大地主的土地，共计 55.4 万公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空闲土地）。联合果品公司还剩下 16.2 万英亩土地，其中仅 5 万英亩进行了耕种。阿本斯政府提出付给 60 万美元的土地征用费，以个可流通的长期土地债券来偿付。艾森豪威尔指责补偿费是“不适当的”。然而，60 万美元的数字并非凭空捏造，它是联合果品公司为这些土地付税而自行申报的价值。联合果品公司则坚持 25 倍于政府的赔偿费。国务卿杜勒斯多次敦促阿本斯政府赔偿联合果品公司的经济损失，但阿本斯不予理睬，并拒绝将此事提交在海牙的国际法庭裁决。为此，美国国务院在第一届美洲国家会议上指责危地马拉的“强盗行为”。而在这之前，中情局已经悄悄草拟了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方案。从“幸运”到“胜利”

1952 年，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中情局代号为“幸运”的秘密行动。这次行动准备在尼加拉瓜亲美的索摩查家族的帮助下，使用美国果品公司的船只把武器弹药送给在尼加拉瓜流亡的危地马拉人和尼加拉瓜雇佣军，借用国外的武装力量来推翻阿本斯政府。美国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家族和委内瑞拉的希门尼斯政府的积极支持。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命令计划处西半球科科长 J·C·金上校具体负责此事。不久，副国务卿戴维·布鲁斯得悉此事，他认为这个秘密行动的计划不妥，违背了国际法，他说服了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再去做杜鲁门的工作，让他取消这个方案。就这样，“幸运”方案被搁置下来。

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上台，危地马拉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来。艾森豪威尔认定，阿本斯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共产行为”。美同驻危地马拉大使约翰·E·普里京向国内报告说，“据我看，这个人的思想像一个共产党，谈吐

也像共产党，即使他实际上不是共产党人，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出现以前，他也可以充充数了”。

自从小罗斯福在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得手后，国务卿杜勒斯就萌发了在危地马拉再来一个“阿贾克斯”的念头。他与弟弟艾伦·杜勒斯商量后，还是选中了小罗斯福，认为他已经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让他负责此事更有成功的把握。但是，小罗斯福对在危地马拉搞的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的秘密行动并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已转向在阿拉伯和埃及将要发生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行动。小罗斯福找了个借口，推托了这次的委任。无奈，杜勒斯兄弟只好再找金上校负责此事。

金与小罗斯福的观点截然不同，前者更相信中央情报局在执行秘密行动时应借助军事力量。他上任后，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郊外的奥帕洛卡建立了“幸运”行动的指挥部，大约有100名特工人员参加。金上校首先在距离危地马拉城不远的省会萨拉马市组建了一支200人的叛军队伍。然而，这支杂牌军在与政府军的一次短兵相接中，全军覆没。为此，金上校被免去领导危地马拉秘密行动的职务，改由计划处长威斯纳担任指挥。

威斯纳分析了金失败的教训后，决定采用舆论宣传、破坏行动和派遣突击队员进行骚扰等综合方法来推翻阿本斯政府。威斯纳把这次行动称为“胜利”行动。他派自己的村手特雷西·巴恩斯协调各方面工作，并调中情局朝鲜站站长艾伯特·哈尼上校担任“前沿指挥”。哈尼是个反情报专家，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在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行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金上校对于自己被解职一事一直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于是他千方百计向威斯纳、巴恩斯、哈尼等人诉说，他的方案是最佳方案，只有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合作，取得危地马拉军队的支持，才能推翻阿本斯政府。金上校语气尖锐地对哈尼说：“如果你们认为避开联合果品公司也会成功的话，那简直是白痴的想法。”他还要求威斯纳对危地马拉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这样，军队就会主动站出来，推翻现政府。威斯纳似乎有所领悟，他把金的这番话转告给局长杜勒斯，杜勒斯听后也觉得金讲的在理，可以作为参考，便去找国务卿商量，经过一番密谋后，杜勒斯兄弟俩定下了最后的行动方案。

次日，杜勒斯在乔治城的家中举行鸡尾酒会，款待一些主要的下属人员。会上，他把和国务卿定下的方案告诉了各位：按原计划进行。这时，房间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热烈。“上校，”杜勒斯问哈尼，“你认为能取得成功吗？”“是的，局长，有你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哈尼信心十足地回答。杜勒斯高兴地咧着嘴笑了。他拍了拍哈尼的肩膀说：“好好干吧，小伙子，你的前面已经是绿灯了。”这时，被冷落在一旁的金上校，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里应外合，赤膊上阵

“胜利”行动的准备工作的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中央情报局花费了大约2000万美元，组织了一支游击武装和一支空军力量，并物色了前危地马拉人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来充当推翻阿本斯政府的先锋。

中情局还设立了秘密广播电台“解放之声”（于1954年5月1日正式播音，因为劳动节那天能保证有广大的听众）。“解放之声”以“工作、面包和祖国”为口号进行煽动。播音员宣称他们是从危地马拉国内播音（其实是在国外），他们假装遭到政府的“袭击”，宣称第二天再从另一个新地方重

新播音，从而“证明”阿本斯的无能。“解放之声”煞有介事的宣传，欺骗了不少外国新闻媒介，甚至《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都把它作为消息来源加以引用。

中情局策划和实施向危地马拉空投传单，诬蔑阿本斯政府将祖国出卖给共产党分子。中情局还通过纽约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与危地马拉神职人员秘密联系，于是每逢周日就出现大量反对阿本斯的所谓“致教友的公开信”。危地马拉军队中那些不相信阿本斯是共产党人的军官都通过直接贿赂被收买了。

1954年5月13日，中情局接到报告，有一艘瑞典的“阿尔夫”号货船载有15424箱捷克的武器弹药停泊在危地马拉东岸的巴里奥港。这一情况华盛顿大为震惊，艾森豪威尔取消了原来对“胜利”行动的最后几点限制，决定放手让中情局自行其事。约翰·杜勒斯在公布“阿尔夫”号运输军火一事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即使联合果品公司一案已经解决，即使他们付给每个香蕉一块金币，但就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渗透的现实而言，问题仍如今天一样未得到解决。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海军封锁了危地马拉，中情局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也参加了对危地马拉的空袭。

6月19日，《纽约时报》的通栏标题声称：“危地马拉发生起义；陆、海、空大入侵开始；起义遍及主要城市。”

实际情况被夸大了许多。真相是，阿马斯由150人组成的“突击队”于6月18日越过洪都拉斯边界，深入到危地马拉境内6英里，在布莱克赖斯的教堂安营扎寨，等待阿本斯政权的垮台。当时的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京以及一些中情局特工人员则在首都策划军队发动政变。

中情局的战略建立在恐吓的基础上。在奥帕洛卡受训的特工人员对危地马拉的电台通讯进行了干扰，所以危地马拉市的居民很少有人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有关政府军惨败和起义部队好几个精锐师马上到达的谣言四处传播。实际上，在整个叛乱期间，危地马拉军队一直安然呆在军营里。

为了阻止“解放之声”播音，阿本斯在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实行了灯火管制，切断家庭用电。这一行动更加剧了紧张气氛。在这种形势下，中情局雇佣的飞机在危地马拉上空低飞盘旋，经常仍下几颗炸弹或集束手榴弹。人们将这种扰乱政府和市民心理的轰炸称作“黑色倾泻剂”。

“解放之声”大肆宣扬有关苏联飞行员驾机叛逃到西方的报道，增加气氛。当一名危地马拉飞行员也逃跑后，中情局的特工人员试图让他公开呼吁其他飞行员也效法他的行动，但他拒绝了。于是，中情局特工将他灌醉，然后再说服他作一次“假想的”呼吁。他的讲话被秘密录制下来，经过剪接后由“解放之声”圆满地播放了。这样一来，阿本斯担心其他飞行员也要驾机叛逃，干脆停止了所有飞机的起飞。中情局的威吓手法迫使阿本斯放弃了空军，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军事力量，更加孤立，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

虽然阿本斯没有了空军，但他的高射炮部队仍能发挥一些阻击作用。6月22日，艾伦·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汇报——

阿马斯用来发动“入侵”的3架轰炸机现在只剩1架了。《时报》在持续用大号标题报道危地马拉起义一周之后，也对此失去了兴趣：农民们并没有揭竿而起，集合到阿马斯的麾下，军队仍然驻守在军营里，“起义”部队则在教堂里“枕戈待旦”；如果这场行动得不到美国支持的话，极可能因厌

倦情绪的蔓延而很快失败。

密切注视着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艾森豪威尔，在当天下午立即召集杜勒斯兄弟和负责美洲事务的国务卿助理亨利·霍兰来白宫商量对策。艾伦·杜勒斯介绍说，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曾提出，愿意支援阿马斯两架P—51型战斗轰炸机，条件是美国必须再补偿他们。对“胜利”计划一无所知的霍兰认为，美国不应该插手危地马拉事务，他劝说总统：“要是我们的行动被外界知道，拉美其他国家会把我们向阿马斯提供飞机看作是美国对危地马拉内政的粗暴干涉”。霍兰的观点当即遭到总统的否定。艾森豪威尔转身问杜勒斯：“你估计阿马斯要是没有飞机，成功的可能性大吗？”“几乎是零”，杜勒斯脱口而出。“要是我们支援他飞机呢？”“这便增加了20%成功的可能。”杜勒斯回答。在白宫会议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杜勒斯说：“艾伦，你的20%这一数字太有说服力了……要是你刚才回答我说有90%的可能性，或许我更难下这个决心。”杜勒斯诙谐地说：“总统先生，当我看到亨利挟着3部法律全书走进你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他的案子又失败了。”就这样，白宫决定向阿马斯支援飞机，还责成中情局特工戴维·菲利普斯加强“解放之声”秘密电台的宣传攻势，以便从心理上加速瓦解阿本斯政府军的斗志。

卡斯蒂略上台

于是，叛乱分子又恢复了轰炸。在内外夹击下，几天后，阿本斯政府土崩瓦解。6月25日，阿本斯跑到墨西哥大使馆避难，两天后他就宣布下台了。瘦狗模样的阿马斯腰挎左轮手枪、得意洋洋地进入危地马拉城，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军人独裁政权（也正是这个阿马斯，不过半年即死于中情局策划的一次暗杀行动中）。

既能干，更能说

消息传到华盛顿，那些心情焦的、期盼成功的要人们欢呼雀跃。国务卿杜勒斯更是眉飞色舞，连声叫好。艾森豪威尔要中情局尽快把“胜利”行动的全部情况向白宫汇报，杜勒斯局长高兴地地点了点头。

回到中情局后，杜勒斯兴奋地对手下人员说：“诸位，我们明天上午要到白宫去向总统汇报‘胜利’行动的情况，今天我们先预演一下吧！”那天晚上，暑气熏蒸，几名中情局高级官员围坐在杜勒斯家后花园的一张石台旁，喝着冰镇汽水，听着布雷登讲述着“胜利”的经过。还没等他讲完，杜勒斯忍不住叫了起来：“我还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罗哩罗嗦的废话。”说完，他转身对负责“自由之声”电台的菲利普斯说：“大家都说你的笔头功夫不错，你为布雷登重新写一份讲稿吧。”

翌日清晨，杜勒斯带着几名中情局人员来到白宫东侧的影院内，过了一会，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司法部长以及白宫班子的二十几名高级官员陆续走进影院。影院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随着前面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镜头，布雷登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讲稿是菲利普斯连夜赶写出来的）。不一会儿，一扇门开了，只见一个人疾步走进半明半暗的影院，随即门又轻轻地关上了。新进来的那个人没坐下，却走到菲利普斯的旁边站着，看着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些镜头，心急地问布雷登：“那个人是谁？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菲利普斯和其他中情局的官员对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很反感。当幻灯片放完之后，室内恢复了明亮，那人才慢悠悠地走到一旁。菲利普斯定睛一看，才知道这位一个劲儿问话的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副总统尼克松，此人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出足了风头，是个有名的反共强硬派。

艾森豪威尔首先提问：“卡斯蒂略损失了多少人？”“只有一个人，是个传令兵。”赫克托回答，艾森豪威尔摇了摇头，脱口说了一句：“不可思议！”接着，尼克松又提了好几个问题，他的提问简明扼要，但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无疑，他对危地马拉的政治局势了如指掌，这给中情局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才对他的反感一下子都消失了。艾森豪威尔转身又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奇微将军：“苏联人怎么样，有反应吗？”李奇微回答说：“他们好象还没有什么动静。海军方面正监视着一艘停泊在危地马拉附近水域的苏联潜艇，这艘潜艇有可能是来撤离阿本斯的一些支持者，也有可能是为抵抗者运送武器。”

艾森豪威尔在离开影院前与在场的各位握了握手。他握着布雷登的手说：“太好了，你汇报得很出色。”布雷登满面春风地说了声：“谢谢！”见此情景，菲利普斯和赫克托对视着，脸上也露出了微笑。艾森豪威尔最后走到杜勒斯面前，握着他的手说：“艾伦，谢谢！谢谢你的中央情报局的同仁们，你们在我们居住的西半球拔掉了苏联人的一个滩头堡垒。”快要走到门口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海军部长重申了一句：“密切监视那艘苏联潜艇，如果它胆敢靠近危地马拉海岸，就把那狗娘养的打沉！”艾森豪威尔边说边走出了大门。

十二、柏林隧道

“黄金”行动

1951年，美英两国情报机构在维也纳联合实施了地下窃听苏军电缆通讯的“银子”行动。然而，这决不是仅有的一次。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柏林就主演了一场“二进宫”，配角是英国军情六处，帮手是西德盖伦的情报机关，行动的代号是“黄金”。

早在1948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就企图窃听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电话通讯。美国方面认为，窃听苏联人的电话可以填补情报收集的空白。据一些在二战结束时去苏联工作，而后又回到西方的德国科学家反映，苏联的一些最机密的通讯采用了超高频信号输出技术。由于平时惯用的长、短波无线电通讯容易遭到敌方的拦截而被窃听，所以苏联和美国一样，又恢复使用陆上通讯线路。在他们看来，只要陆上通讯线路没有被敌人分路搭线，它就是一种绝对安全可靠的通讯工具。中情局在前一时期已经从“白银”行动中尝到了甜头，而今“冷战”正在升级，因此他们期待着在“黄金”行动中狠狠捞一把。

不久前，中情局电讯专家卡尔·纳尔森在维也纳参加“银子”行动中发现，通电话时，真实声音在受干扰（加密）后的一瞬间仍然留在电线上，这就是回波效应。通过特殊手段可以从电缆线上把加密的电讯信号回波收集下来，经过技术处理，把它还原成清晰的通讯内容。中情局准备把纳尔森的新发现应用于窃听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陆上通讯线。一旦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将使新近成立的、只靠拦截无线电通讯来收集情报的国家安全局的工作相形见绌。

1953年，中情局在华盛顿举行专题研讨会研究如何在东德窃听苏联人的陆上通讯线。实际上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比美国中央情报局早一步想到要利用东柏林这块敏感地区来打苏联人的主意，他们曾向中情局提出过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在这次研讨会上，中情局便邀请了英国情报人员参加。讨论的话题围绕着如何在柏林下手。苏联与民主德国之间最重要的一些通讯线路集中在柏林，如果能在柏林的通讯线上安装窃听设备，即使窃听设备被苏联或民主德国人发现，它们也只会以为是一些加了密的通讯被窃听了，而这种电讯无法破译，他们会感到无所谓的。别说苏联人对纳尔森发现的“回波效应”窃听技术毫无所知，就连中情局的英国伙计也蒙在鼓里，不知其中的奥妙。只有中情局内部极少数人知道此事。当杜勒斯局长仔细听取了纳尔森关于“回波效应”的技术汇报之后，他立即认定了这项新技术的重要使用价值。然而，菲尔比事件在杜勒斯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他担心英国会出现第二个菲尔比。后来的事实证明，杜勒斯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所以在开始行动之前，杜勒斯下令：“鉴于安全利益的需要，在柏林实施的工程中，要尽量少写书面材料。”而且在“黄金”行动的整个过程中，中情局不得把“回波效应”技术透露给英国人。但是，毕竟英国人搞窃听的手段比美国人高明，因此杜勒斯同意在柏林与英国人合作。中情局的其他官员也认为，英国人的分析情报能力很强，而且对情报质量非常讲究，他们对于收集到的有关苏联的政治、军事情报往往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美中不足的是，英国缺少情报来源，因此他们很希望中情局提供情报。无形中，英美两国达成了默契，中情局准备把在柏林窃听到的材料拿出“大部分”与英国人共同享用，另一部分

则自家独吞。当然，独吞的那部分是不能告诉英国人的。

工程艰巨

中情局认真细致地总结了上次在“白银”行动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在研讨会之后不久，“黄金”行动的组织者便制订出具体实施方案：准备挖一条长约 1476 英尺的隧道，延伸至东柏林，拦截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空军司令部与柏林连接的陆上通讯线路；隧道底部离地面 20 英尺，顶部离地面 13.5 英尺，从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开始钻孔打洞，因为该地区云集着低矮的棚屋和板房，这都是来自民主德国的人用旧材料和破砖瓦搭建而成的，在这里钻孔打洞完全可以避人耳目。杜勒斯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黄金”行动便秘密地展开了。这的确是一项十分繁重而复杂的工程，要挖的隧道正好处在苏联人和民主德国巡逻队的脚下，因此在挖掘时，不能发出一点声响，从隧道里挖出的泥土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用车运走，隧道的入口处要尽可能建得小一些，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而暴露。下面在挖掘时，不能使上面的路面塌陷下去，否则将会留下痕迹。一旦隧道建成后，在近乎封闭的隧道里，要安装不少电子窃听设备和变压器，它们在工作时会散发出大量的热量，这些热量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去，势必会影响隧道里的机器设备。所以，隧道里必须设有通风装置，但是在这样长的隧道里，分段将通风管引向地面，很容易暴露出来，因此，只好改为从隧道入口处压入新鲜空气，让空气沿着隧道运行一个来回，然后从隧道口排出，同时在隧道内还得安装空调设备。所以，要完成这项工程，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与苏联间谍打了多年交道的中情局高级官员比尔·哈维在柏林负责全面指挥隧道的挖掘工作。中情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作了如下分工——

中情局担负的任务是：1. 选择场地，使隧道的位置正好处在苏联人的电缆下面；2. 用录音机收集所有的电讯信号；3. 把所有的电讯材料送往华盛顿处理。

英国军情五处的任务是：1. 建造通讯管道；2. 在苏联的电缆线上搭线，将有用的信号输送到隧道顶端的窃听室录音；3. 帮助在现场再建立一个处理录音材料的工作室。

为了确保隧道的挖掘工作万无一失，英美双方分别作了可行性试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在科罗拉多州进行的，主要检验挖掘技术和通讯技术，测试的结果令人满意。有关人员估计，只要投入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完全有把握大功告成；据初步估计，要消耗 2500 万～3000 万美元。英国情报机关的试验工作是在朗莫的皇家工兵部队处进行的。他们先在地下挖了一段隧道并建造了一个窃听室，然后让盲人和盲狗在隧道以上的地面来回走动，看他们是否感觉到脚下有异常的情况，试验结果同样令人满意。

1955 年在研究柏林地图时，中情局的一位官员注意到，美国占领区的一段边界距离苏军总部的主要电话线只有 300 码。不久，隧道的工程正式开始后，在柏林的美国工兵部队先在距两德交界处 100 多码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半露出地面的地下大仓库，目的是容纳从隧道里挖出的 3100 多吨泥土。在表面上，美国故意放风说他们正在建立一个雷达站，观察东柏林机场附近的交通。同时，在这个大仓库里进进出出的装有电子仪器和泥土的车辆，使人们信以为真这里将要建造一个无线电雷达拦截站。当苏联人得知自己的无线电通讯受到西方情报机关的拦截时，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因为凡是重要的通讯，他们都加了密，依他们的观点来看，只要密码系统没有受到损害，通讯将是安

全可靠的。中情局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这一想法，建立伪装的雷达站，以此来迷惑苏联人。事实证明，苏联人确实上当了。

隧道挖掘是以老鼠掏洞的方式小心翼翼进行的。每次向东柏林只推进几英尺，因此地面不会听到噪音。英国人掌握了向上挖隧道的本领，他们开通了从控制室到电话电缆的垂直竖井。工程进行得十分艰难，在一处遇到了地下水，在另一处碰上了奇臭无比的化粪池排放区，美军工兵只好头戴防毒面具、身着防水服去工作。每次工作结束，工兵们脱下胶制防水服时，里面倒出的汗水足足有一碗。

在隧道挖掘过程中，各方面的配合十分密切。有专人观察周围的动静，每当巡逻队从隧道上面经过时，下面的挖掘工作便嘎然停止。在挖掘过程中碰到的又一个难题是必须测量挖掘的位置。从来也没有人在如此隐密的情况下挖掘如此长的隧道，而要对准的目标却是直径只有2英寸的电缆线。为了精确测量挖掘的位置，中情局人员假装在东西柏林的交界处打棒球，他们故意把球远远地打到民主德国管辖的区域，然而这一把戏却被持友好态度的民主德国卫兵破坏了，他们见有球过来，便把球抛回西区。最后无奈，只好让两名中情局特工化装成美国兵，驱车去东柏林执行公务，他们在预定的地点停车，假装车轮漏气，要换车胎，借此机会，冒着风险，把两个小型无线电发射装置放在选定的位置上，这才使隧道挖掘有了精确的方位。

风声鹤唳

苏联的电缆线埋在索恩法尔德公路的一侧，离地面约18英寸，直径为2英寸。索恩法尔德公路是连接东柏林和卡尔斯霍斯特的主要公路线，交通十分繁忙。隧道和附近的窃听室就建在公路的下面，通风管必须尽量贴近路面，为了能承受住来往车辆的巨大压力，隧道、窃听室和通风管的结构必须非常坚固。除此之外，窃听室的绝缘要求也很高，否则，公路上汽车的隆隆声传到下面的窃听室就象装在一个大鼓里，四周尽是闷雷般的回响。尽管动了不少脑筋，实际使用时的效果仍不能令人满意，以致多次发生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有一次，由于窃听室内的热量辐射直接引起地面上的冰层融化，幸好天降大雪，掩盖了这一切，没有引起苏联人的怀疑。一次，一匹马恰巧从窃听室的上面走过，马蹄的异样响声传入窃听室，在室内工作的人员以为发生了不测事件，引起一场虚惊。还有一次，那天清晨浓雾弥漫，天气寒冷，窃听室里的传声器发出连续不断地有节奏的声音，正在忙碌工作的人们愕然呆立，不知上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直到迷雾驱散后才知道，原来民主德国警察正好在窃听室的上面设了一个临时检查站，检查来往的机动车辆，“咄、咄”的声音正是值岗的警察跺脚取暖时发出的……又是一场虚惊。

为了防止隧道里面的潮湿空气影响电子设备，隧道与其比邻的窃听室进行了隔绝，使窃听室成了近乎封闭的独立小屋，同时在窃听室外面15码处，还安装了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坚固大门，门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严禁入内——奉驻德苏军总司令命令”。安装这扇门是有道理的；中情局估计到这条隧道迟早会暴露，一旦有人沿着隧道查到门前时，门上的这道“命令”可使他止步二思，无法继续前进，在窃听室里的特务们则得以趁机销赃和逃跑。美国人的这一伎俩后来真的“派上了用场”。此外，在东、西柏林交界处的地下，还特意放入装有倒刺的铁丝网，使人看起来好象是俄国人修建的地下坑道。

从 1954 年 8 月开始，经过 7 个月的努力，秘密隧道终于在 1955 年 2 月 25 日竣工。隧道从雷达站开始，穿过东柏林阿尔特-格林尼克区的公墓，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地下，全长 500 码，沿着那条公路的两边，接通了苏军总部的地下通讯电缆。

地下淘金

中情局原先估计，在电缆线上窃听到的通讯量不会很多。后来才发现，苏联的 3 条陆上通讯线都包括 1 路有线电报线和 4 路电话线，每路线同时可供 4 方面使用，各条线路上的通讯量都很大。于是，在大仓库里安置了 600 台录音机，把所有的通讯内容全部录下来，这样，平均每天要使用 800 盘录音磁带。录音室里非常繁忙，机房工作人员的汗水和录音机散发出来的热量增加了录音室里的潮气，墙壁上挂着水珠，有好几次不得不中断录音工作，用空调设备来排除室内的水汽。

在每个星期里，中情局部派出专机将录音磁带运回华盛顿处理，然后将材料分送到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关，经过翻译后，供分析人员研究。中情局里有 50 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人员在一间只有 45 平方英尺的密室里从事翻译工作。人们给这间密室起了个绰号叫“袜厂”，因为在这栋房子的四周看不见窗户，钢板把四面围挡得严严实实，远看起来就象一台织袜机。如此设计这栋房子的目的是，防止室内无线电信号向外扩散，被苏方接收。翻译人员有着极严格的保密纪律，这里的负责人对每个来这里工作的人都反复叮嘱：“不要打听你翻译的材料是从何处来的。”翻译工作十分艰苦，材料堆积如山，他们只好每隔两周休息一次。后来隧道被苏联人发现了，“黄金”行动不得不终止，然而积压下来的材料花了 27 个月的时间才翻译完毕。

除了华盛顿总部设有大规模的材料处理和材料翻译分析的工作班子外，在柏林现场还配备了一支监听人员队伍，这是为了防止一些时间紧迫的重要情报失去时效。中情局的监听人员用经过改装的被称为“野蜂”的苏式译码器，将一些苏联人的电讯内容在现场打印出来，这种译码器每分钟可打印 100 个字，然后再将这些打印材料送交在现场的俄语和德语翻译进行初步分类处理。

1956 年 4 月 21 日，中情局从苏联人的电缆线上截听到第一个有重要价值的通话，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获取了许多珍贵的情报。例如发现英国在西柏林的情报机构里隐藏一名苏联间谍，经侦查，该人就是前面提到的乔治·布莱克。

杜勒斯立

即把这一发现通知了英国情报机关。又如，从一次正常的电讯材料中证实了民主德国的铁路处于严重失修状态，由此，中情局的分析人员排除了苏联会向柏林发动突然进攻的可能性。另外，从收集到的大量初级、次级情报中，中情局综合出苏联、民主德国两国的政治状况，并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当然，在窃听到的资料中多数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例如苏军城防司令官的老婆进行走私，苏联将军们交流酗酒纵欲“妙不可言的体会”等等。通过“黄金”行动，最重要的收获是，美国对苏联是否怀有向西欧发动进攻的战略意图有了事前的明确了解。

昙花一现

然而时乖命蹇，秘密隧道仅仅使用了 11 个月零 11 天，就被苏联人发现并抖搂出来了。1956 年 4 月，苏联通讯兵在检查电话线路时发现了秘密隧

道，他们走到写有“严禁入内”字样的大门前不知如何是好，经过逐级请示，终于得到批准打开了大门。据民主德国通讯社报道，当时有3个美国人在里面工作，他们在仓惶逃跑时竟忘记将电灯和窃听器关闭，一壶咖啡还在电炉上煮着。中情局在后来的报告中一口咬定，苏联人发现隧道纯属巧合，硬说“柏林隧道的暴露，是无法避免的，它超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防备措施。苏联人发现有一根电缆因长期受到雨水的侵蚀，工作性能差，工作状态欠佳。水汽渗透到电缆内，使电缆传递信号的功能失灵，于是，他们动手把电缆挖出来检修，这才发现电缆被人搭线窃听了。”其实，中情局的说法纯属打肿脸充胖子。苏联人早就得知秘密隧道之事，只是为了避免暴露安插在英美阵营中的“鼯鼠”，苏联才有意等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安排了一次“偶然”的线路检查维修，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乔治·布莱克是英国军情六处驻柏林的高级官员，后来发现他是一名苏联间谍。布莱克在柏林隧道建成后，对隧道之事有所了解，但他不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应用纳尔森的“回波效应”技术来窃听苏联人的电讯。毫无疑问，布莱克已经把柏林隧道的秘密告诉了克格勃。然而，苏联人并没有采取紧急措施来阻止中情局的隐蔽行动。其原因是：1. 苏联人认为自己的密码系统绝对安全可靠；2. 为了不使“鼯鼠”布莱克暴露。因此，他们当时没有急于把秘密隧道揭露出来。“黄金”行动的决策者们最初断定，即使苏联人发现了秘密隧道，他们也只好哑巴吃黄连，将此事掩盖起来。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很自信：苏联人不会公开谴责美国人窃听了他们上层人物的电话和机密通讯，否则的话，只能使他们自己丢丑；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能在柏林成功地挖掘一条秘密隧道，公众将会认为这是情报战线上的杰出作品。然而，事与愿违（但美国人认为，这也是偶然发生的）。

1956年4月21日，柏林卫戍区的苏军司令正巧外出，由代理司令主持日常工作。不知这位代理司令是忽视了、还是不了解莫斯科方面发来的指示，他竟草率作出决定，向柏林记者们介绍了如何发现中情局秘密隧道的经过，还让记者们参观了隧道及其里面的各种设施。顿时，这成了一条特号新闻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纷纷谴责美国情报机构的卑劣行径，而西方舆论则欢呼“这是现代间谍史上的奇迹。”1956年5月1日，《华盛顿邮报》以《爱的隧道》为标题发表了社论，高度赞扬了中情局特工们的“聪明才智”。5月7日，《时代》周刊以《充满奇迹的隧道》为题目，介绍了柏林隧道的情况。杜勒斯看到西方舆论界如此讴歌中情局十分得意。然而，许多中情局人员却对隧道的流产有着另一番感受：他们呕心沥血，辛苦建成的秘密隧道在昼夜之间就成了废物，人们为它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这怎能不让他们心灰意冷，垂头丧气？踌躇满志的局长看到部下的情绪如此低落，也不免忧心忡忡。为了鼓舞士气，振作精神，杜勒斯决定，把中情局的另一个“果实”抛出来，这便是他执意公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原因之一（“果实”系间谍行话，意指到手的情报）。

十三、震惊寰宇的秘密报告

铁托不帮忙

1956 年是中情局在隐蔽战线上：“走向成熟并获得丰硕成果”的一年。第一件震动国际的大事是：2 月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美国方面认为这个报告极其重要。首先，它说明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集体领导体制中，赫鲁晓夫的个人权力已经上升；其次，它说明苏联社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苏联人要摒弃斯大林主义，这是“解冻”的开始。

苏联是个高度集权的“封闭”式社会。在这里，许多重要情况都被当权者们严严实实地捂盖起来，西方情报机构即使从中寻找蛛丝马迹都相当困难。

1956 年 3 月，赫鲁晓夫长达两万字的秘密报告中的零星内容已经在社会上流传，驻莫斯科的西方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全力以赴地收集公众的反应，希望从中揣摩出苏联权力结构的新变化。报告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一次特别安排的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报告的复印件没有散发。克格勃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保存了一些报告的复印副本，这是为了听取苏联党内和东欧共产党国家意见时而备用的。于是，设法搞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部内容成了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首要任务。

身为中情局长的艾伦·杜勒斯感到压力很大，他必须尽快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弄到手。为此，杜勒斯反复强调，只要搞到秘密报告，花多少钱都行！他首先把情报处长罗伯特·艾默里找来商量此事。

艾默里及其手下特工与南斯拉夫人的关系不错。艾默里向杜勒斯建议，让他亲自前往贝尔格莱德，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这一渠道，争取把秘密报告搞到手。艾默里很自信地说：“据我所知，苏联也送给南共联盟一份秘密报告的副本。外长卡德尔对斯大林深恶痛绝，而目前，南斯拉夫正在接受美国数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与南斯拉夫的这笔交易肯定能成功。”杜勒斯听后表示赞同。

艾默里与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里德尔伯格拜访了南斯拉夫外交部，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尔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向铁托元帅提出，能否把苏联人送来的秘密报告借给艾默里和里德尔伯格看一下，他保证说美国人将绝对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持强硬路线的内务部长兰科维奇坚决反对这个交易，最后，铁托还是否定了卡德尔的意见。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就在艾默里上窜下跳、托人苦求铁托高抬贵手之际，中情局的另一位竞争对手、计划部部长威斯纳也千方百计地独辟蹊径，他想抢在艾默里之前，把报告弄到手。4 月份，威斯纳终于如愿以偿。

3 月 12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他的去世在波兰国内引发了一阵混乱。流言蜚语风传由于贝鲁特不顺从莫斯科，因此被苏联人害死了。本来波兰人在历史上就对俄国人深怀怨恨，此时社会上群情激愤，使表面平静的波兰局势扑朔迷离、危机四伏……趁此机会，中情局计划处的特工人员通过在波兰的秘密关系，搞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送给东欧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不久，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E·波伦收到华盛顿寄给他的中情局在华沙搞来的秘密报告。波伦经过仔细研究

后，断定这份报告不是伪造的，确实是赫鲁晓夫的讲话。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给东欧共产党国家的那份报告是节略本，不是讲话的全文，其中有34段关于苏联今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被删去了。

怎么办？——继续搞！

中情局收集情报的渠道确实令人瞩目。这时，隶属于计划部（后该称行动部），却直接对中情局局长负责的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已经在暗中行动了。安格尔顿与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全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关系很密切，他在摩萨德的帮助下，终于搞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据说那是一位华沙市委书记将秘密报告交给了担任记者的犹太人，遂以5000美元高价卖给摩萨德的，现在转手到了中情局的腰包里，总算大功告成了。

威斯纳和安格尔顿决定把上述这份几经周折才搞到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交给当前机要室负责人雷·克莱因，请他分析鉴定这份报告的真伪。克莱因和专家们经过长时间的仔细分析和对照，终于作出了权威性的回答。在威斯纳主持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克莱因向威斯纳和安格尔顿等一大批中情局官员公布了鉴定结果。他以充分的证据，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其中他谈到：“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份报告，都是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来表达的，这正是赫鲁晓夫平时讲话的特有色彩……”克莱因的最后结论是：“我们已经有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讲话的全部内容。”这个消息顿时使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喜笑颜开，眉飞色舞。

需要提及的是，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萨德在搞到秘密报告之后，都采取了“消毒”措施（情报界行话，指公开某份文件前的准备工作，特别指“加工”，也指为了保护情报来源而采取的措施）。长期以来，尽管西方新闻界对秘密报告的窃取经过遐想妄猜，众说纷坛，但一直不得真谛。同时它又催发着具有当年“拓边”时期执着精神的美国人锲而不舍，追寻探究神秘……

世纪间谍

祖籍波兰，现为以色列公民的威克多·格雷耶夫斯基是个烟不离口的退休老头。1994年2月的一个阴冷的下午，他接受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对着录音机，威克多平静地说：“38年来，我一直等待着政府能对我发声‘谢谢’。”然而，以色列政府至今仍未公开承认威克多为西方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窃得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后来将成功地获得秘密报告称作他本人“情报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但从未透露过胜利的取得应当完全归功于犹太人。当然以色列也从未告诉美国人这份超级机密文件是如何弄到手的。致使威克多苦等了38年仍未得到那声“谢谢”，其惊人战绩一直被视为冷战期间的绝密深藏在铁柜之中。

威克多于1925年出生在波兰克拉科夫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纳粹占领波兰后，他们举家逃到东方。二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即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1947年，其父母和姐妹移居巴勒斯坦后，威克多认为自己在新生的共产党波兰国家里一切如意，所以就独身一人回到了华沙。他在那里加入了波兰共产党。1950年新闻专业毕业后，他进入政府新闻机构——波兰通讯社工作，几年后晋升为一个栏目的主编，全权处理来自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内的新闻消息。这是个关键而高级别的职务，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在华沙的各国、各方面的人员。他经常受邀参加苏联使馆的招

待会，还频繁出现在西方国家使馆举行的鸡尾酒会等场合。在社交活动中，威克多不仅接触东方集团外交官，还结识了许多西方朋友。

1955年2月，威克多飞到以色列，探视正在生病的父亲，从而成为波兰政府批准以旅游者身份进入以色列的第一名波兰公民。他事后说：“从一开始，我就确信出国申请一定会批准，因为政府对我十分信任。”威克多在父亲的病榻前呆了整整一个月，在此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变成了一名犹太民族主义者。

当时，他只要扔掉回华沙的机票和波兰护照，即可“叛逃”成功，与家人团聚。但是他觉得应该忠诚于共产党领导的波兰，遂决定按期回归。1956年1月，威克多回到华沙后，撰写了一系列介绍以色列的文章，并因此获得了可以经常去那里旅游的签证。他常对人说：“从踏上以色列国土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这个国家。”威克多回到华沙不久，苏共20大召开了。1956年2月的这个大会的核心是总书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在赫鲁晓夫起身准备讲话的前一刻，应邀而来的外国代表团成员均被“赶”出会场，使他们对赫鲁晓夫究竟讲了什么一无所知。对此，他们既不敢流露丝毫气恼，又不敢吐露一点儿抱怨，只好带着满腹的困惑打道回府。

大会结束几天后，赫鲁晓夫决定让东欧几个卫星国的最高领导人知晓报告的内容，因此特命苏军派特使、乘专机，带着7份俄文原版文本分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亲手交给这些国家的最高领导者。

每份文件58页，封面上清晰地印有“绝密”二字。扉页上是莫斯科的指示：必须确保将文件内容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遵旨行事，只让他们最亲近的几个助手传阅，并严令他们不许复印或做任何摘录。

在华沙，波兰共产党主席爱德华·奥哈布读过报告后简直惊呆了。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所用的激烈言辞就等于是异教邪说。奥哈布心乱如麻，在激愤中觉得有必要和助手们谈谈自己的感受，因此找来几个最受信任的助手，一起详细研究报告的内容。随后，这些人强烈意识到，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所发生的“重大且十分严重的事件”的真相。奥哈布在助手们的压力下屈服了，同意将秘密报告复印几份。几天后，更加轰动的秘密报告的摘录稿、手抄本开始在波共办公大楼内的各个办公室之间传来递去。

与此同时，西方情报部门也获悉此事，并展开了全方位的间谍活动。西方极欲得到此报告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大骂他的前任，是苏联官方指责斯大林对苏联人民犯有罪责的首份正式文件；报告中有大量可以让外人一窥这个超级大国政治内幕，以及经济、军事实力的素材。为了尽早得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命令，专门拨出1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但美国间谍在东欧各国首都的“秘密行动”却一再受挫。

此时，威克多通过非正常渠道也听说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原来，自从离婚后，他又有了新欢，她在共产党书记处担任异常敏感的工作——机要秘书。这位女秘书经不住心上人的花言巧语，终于“第一次”违反纪律，将锁在办公室保险箱里的秘密报告的俄文原件带回家，让男友“开阔眼界”。

威克多手拿着报告心里已经想到可以把这份密级最高的情报卖给喝鸡尾酒时认识的美国人或其他西方外交官。但是，不久前的以色列之行使威克多对那个犹太国家产生了使命感，坚定了他要将报告无偿交给以色列的决心。

为此，威克多计划将报告的全文拍摄下来。但那时全录影印法还未问世，因此需要一种超小型、重量轻的照相机。当时，波兰人几乎都未见过这种相机。于是，威克多找到自己最信赖的一位朋友借相机，这位朋友经常与以色列驻华沙的外交官来往。就这样，威克多利用朋友的相机并在其帮助下，顺利地拍下长篇秘密报告，随后委托这位朋友将胶卷送给以色列在华沙的摩萨德特工。

摩萨德特工带着胶卷立即乘飞机离开波兰，到维也纳安顿好并确信没有危险之后，他才与国内总部联系，报告“稀世珍宝”已经到手。

1956年4月初的一天，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俄文稿放在以色列海法市一栋大楼内的阿莫斯·马诺尔的办公桌上。马诺尔当时任以色列国内辛贝特(国内安全总局)的局长，领导国内的情报和安全工作。

如此重要的情报怎么会先送到以色列国内反间谍机构来呢？为什么没有送到负责国外间谍活动的以色列最主要的秘密机构——摩萨德的手中呢？原来，作为情报老手的马诺尔早就在国外布建了自己的秘密情报网，他手下的特工与摩萨德人员肩并肩地工作在以色列驻各国使馆中。

马诺尔面临的最大挑战一直是设法让美国相信以色列是“自由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块“净土”，从没有被苏联情报特工渗透过。辛贝特在华沙等共产党国家中的主要任务是对要求进入以色列的犹太移民进行审查。

对俄文一窍不通的马诺尔要求助手立即将报告译成希伯来文，他还请来局内的苏联集团问题专家研读原件，以判定它的真伪。当各方面都认定他得到的的确是近两个月来西方情报机构都馋涎欲滴的“圣盘”时，马诺尔高兴得差点晕过去。

周五下午，马诺尔带着专家们的分析结论和秘密报告胶卷驱车前往首都特拉维夫，直奔总理家中。戴维本—古德里安听完汇报并阅读了文件后说，最重要的是这份报告的俄文原件。因为他深谙俄语，他相信，只有阅读原文，才不会曲解文件的观点。

当马诺尔汇报说美国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挖掘”这份文件时，古德里安明确指示说，交给美国人可以，但以色列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费”，“现在正是确立和加强以、美两国情报合作关系的最好机会”。

5年前，古德里安就与华盛顿签署了两国情报合作协议，并多次向美国人表明以色列可以提供大量有关共产党国家政府内部机制运转情况的信息，但白宫和中情局一直瞧不起小小的以色列，认为它在情报领域内不会有什么作为。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马诺尔是共产党的“鼯鼠”。1952年马诺尔到美国进行工作访问时，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曾试图阻止他入境。

古德里安现在相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定能让美国人大吃一惊，对以色列的情报能力刮目相看，进而加强两国全面的合作关系，首先是加强情报合作关系。

4月中旬，摩萨德官员作为以色列方面的特使带着秘密报告的原始胶卷飞抵华盛顿，直接交给了著名的亲以派人物、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局长杜勒斯痛快答应了以色列提出的条件，全面加强中情局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合作；为证明自己的诚意，在中情局内还成立了专门协调美以两国情报关系的工作小组，并任命安格尔顿为负责人。

艾森豪威尔政府被以色列情报机关的通天能力、神速效率和滴水不漏的

办事程序所震惊，他们叹服了。前中情局副局长克莱因评价说：“一流的效率、卓越的功绩”。不久，美国向全世界公布了赫鲁晓夫长达2万字的秘密报告。

在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这份秘密文件的获得一直被视为美国的辉煌成就。到了80年代，有人认为功劳应属于以色列人，但他们相信“圣盘”是库萨德而非辛贝特获得的。各国舆论界纷纷猜测，想找出“创造奇迹者”。根据威克多·格雷耶夫斯基的陈述和马诺尔的证实，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威克多是第一“功臣”。

尽管威克多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但他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1957年1月，在所谓的“哥穆尔卡大迁移”中，有3万名犹太人离开波兰来到以色列，威克多也在其中。他们都是根据波兰共产党主席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命令，被迫离开自己所担任的政府工作职务后申请去以色列的。这次“大迁移”实际是奉苏联人的旨意进行的，是政治大清洗的一部分。

像其他所有新移民一样，威克多先经过希伯来语言课程，后被以色列外交部聘为翻译。60年代，他在国家电台任波兰语播音员；70年代提升为东欧部负责人，担任组织、领导以色列对东欧各种语言的广播工作。威克多对记者说，1957年他到达海法时，只有家人在那里欢迎他。多年来，从未见到过马诺尔，也没有以色列政府官员向他表示过一点点谢意。对此，辛贝特前领导人马诺尔感到十分内疚和尴尬，他说：“我们之间确实从没有面对面交谈过。”

已经70高龄的威克多最后对记者说：“我对自己做过的事从未后悔过”。他相信总有一天以色列政府会承认他“为西方社会曾做出的贡献”，并一再表示只要有人对他说声“谢谢”，他就心满意足了。

抛出“原子弹”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已经摘要手，下一步该如何处置呢？这个问题在中情局的上层人物中产生了争论：

克莱因竭力主张将报告的全文公布于众。他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应该把它发表在报刊上，这为有兴趣了解苏联问题的学者和年轻学生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史料，让他们看清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真面目。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谴责苏联的独裁统治，现在苏联政治局的头目自己出来讲这种话了，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让全世界的人们都来观赏一个极权国家的领导阶层自我谴责的精彩镜头吧！”

但是，威斯纳和安格尔顿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要充分挖掘这份报告的价值，应在这份报告的内容上多作文章。他们建议先从赫鲁晓夫报告中挑选一部分内容，有的放矢地透露给少数人，让它在这些人身上产生特殊效应。这样做比发表在报刊上，让大家都能读到它的作用要大得多，而且在今后的反宣传中，它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显而易见，威斯纳和安格尔顿是别有用心。当时，计划部正在慕尼黑郊外的中央情报局训练中心策划一个代号为“红袜子—红帽子”的秘密行动。中情局人员在那里对来自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者进行准军事训练。训练后，将这批人派往东欧国家的主要城市同时造反，随后在苏联内部唆使少数民族打内战，威斯纳的“解放军”则在叛乱发生几小时后攻击苏联驻军，在苏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北约将派出“维持和平部队”，驻在当地“恢复秩序”，“直至进行了斯大林1943年在雅尔塔所保证过的民主选举后才撤离。”尽管这个

计划想入非非，可威斯纳信心十足，满腔热情。可是直到 1956 年 4 月，这批东欧人尚未达到从事秘密行动的要求，仍需要继续接受训练。为了下一步能配合“红袜子—红帽子”的秘密行动，威斯纳和安格尔顿非常希望推迟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时间。他俩相信，等时机一旦成熟了，再抛出秘密报告，这必将在东欧国家引起特大混乱，也有助于“红袜子—红帽子”秘密行动的顺利实施。

柯克帕特里克和赫尔姆斯认为，大规模的隐蔽行动是对当地间谍网安全的威胁；此外，能否成功极无把握。柯克帕特里克相信，隐蔽行动与核武器一样不易控制，除非自始至终绝对保密，否则万万不能尝试。

由于双方意见不一，公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事暂时搁置下来。1956 年 6 月 2 日，杜勒斯把克莱因找去。大脑袋、大块头的杜勒斯坐在办公室的转椅里，一只脚搁在桌子上，透过黑框眼镜和颜悦色地注视着克莱因，问道：“威斯纳告诉我，你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把赫鲁晓夫的报告公布于众，是吗？”“是的。”克莱因简短地回答。接着，他把要公开发表的理由说了一遍，杜勒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理了理灰白色的头发，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笑着说：“天啊！又该由我作决定了。”说完，他顺手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与威斯纳接通了电话。杜勒斯对他说，是否要公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事，他经过再三的考虑，准备决定现在将此报告公布于众，问威斯纳是否有意见。毫无疑问，既然局长本人做了决定，威斯纳只得顺从。他的回答彬彬有礼。接着，杜勒斯又接通了国务院的电话，找他的哥哥约翰·杜勒斯。他把他对威斯纳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并补充了几点个人的看法。显然，国务卿没提出任何异议。就这样，杜勒斯派人将那份从华沙弄到的秘密报告送到了国务院，请他们将此报告转交给《纽约时报》社（此前，安格尔顿还是将某些反宣传的东西塞进秘密报告里，以便增加效果）。1956 年 6 月 4 日，美国《纽约时报》以醒目的标题全文刊登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同时，由中情局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之声”电台一连 3 天向东欧和苏联广播秘密报告的全文，中情局甚至使用气球向东欧和苏联撒放传单……

不出所料，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开发表后，顿时在欧洲大陆引起一片骚动。6 月 28 日，波兰的波兹南造船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发展成为武装骚乱。人们袭击了党政机关、进攻公安局，与大批军警发生武装冲突。事件于当天平息，但在这一事件中有 44 名工人死亡。到 10 月份，整个东欧集团国内普遍发生了政治危机。

杜勒斯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非常满意，他公布秘密报告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领导的中情局成功地窃取了苏联人的绝密材料，并作为头号新闻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上，这将抵消苏联揭露并大肆渲染的有损于中情局形象的“柏林隧道”事件。

十四、东欧骚乱

风自东方来

1953年9月，迈耶接替布雷登担任中

情局国际组织科科长，直接负责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的协调和联系工作（有关这两家广播电台的情况，详见第五十一章）

1956年6月4日，《纽约时报》将中情局得到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布于世。紧接着，“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反复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播放秘密报告的全文。6月28日，波兰的波兹南爆发了工人罢工和骚乱事件，骚乱于当日被政府平息。从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波兰的波兹南骚乱实际上是东欧骚乱的开端。对于这一事件的发生，中情局预先曾获得大量动态反映，但没有受到重视。

1956年夏季，在慕尼黑“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工作的中情局顾问们根据从“铁幕”后面参观回来的记者写的大量报道、来自东欧国家流亡者们反映的情况以及接收的东欧各国电台广播，他们得知将在波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等国家发生一场反对苏联的冲突。这一情况报告给迈耶，他立即转交给国务院和中情局情报分析人员。然而，情报分析人员对此将信将疑，他们认为东欧共产党对国内控制很严，不可能出大乱子。

为了搞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情报部长艾默里曾亲自寻访欧洲。在欧洲的那段日子里，艾默里与瑞典、联邦德国、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同行们交换了意见，主要对波兰和匈牙利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分析和估价。当时，在波兰的一些城市里已经出现了零星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这正表明其国内政局动荡不定。8月中旬，中情局计划部和情报部根据种种迹象判断，东欧国家中正孕育着动乱的苗头。不出所料，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发生了武装暴乱。

事件发生后，局长杜勒斯责怪迈耶没有把“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反映的情况直接告诉他或其他制订政策的高级官员。迈耶在杜勒斯面前承认，他当时对这些情报心中也没有底，所以对情报分析人员的判断结论无法提出异议。杜勒斯不满地说：“这是个有益的教训。”

实际上，在匈牙利发生的武装暴乱不仅有其现实的原因，而且还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拉科西下台

1944年10月，在霍尔蒂统治下的匈牙利仍处于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于是，已经收复国土的苏联红军对匈牙利发动了进攻，但是遭到了纳粹德国党卫队和霍尔蒂政府军的顽强抵抗，直至1945年4月4日，匈牙利才得到彻底解放。在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这段时间里，纳粹分子疯狂清洗、迫害和屠杀在匈牙利的犹太人。这些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多数本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对他们的迫害严重地影响了匈牙利的国民生活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战争结束前夕，一些象德国法西斯一样残酷的匈牙利人成立了“箭十字”组织，他们在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苏军占领匈牙利之后，“箭十字”组织中的一些成员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领导下的秘密警察——国家保安队（AVH）。

1949年4月，匈牙利共产党利用国家保安队清理了政府，成立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大众阵线”。3个月以后，以拉科西为首的持强硬路线者又对内

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从而把匈牙利政府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拉科西是个秃顶，是个1米60多一点的矮个子，身短体胖，斯大林在背后叫他“屁股头”。拉科西信奉斯大林那一套独裁专制兼恐怖镇压的做法，他领导下的国家保安队成为一支镇压人民群众的血腥势力。国家保安队有正式成员10万人，还有数以万计的驻外人员，对于一个全国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匈牙利来说，这无疑是个地地道道的秘密警察国家，其恐怖森严可想而知。国家保安队极力仿效当时苏联的那一套，大搞个人迷信，推行造神运动，对拉科西顶礼膜拜，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甚至荒谬地规定：“英明”二字只能用于颂扬和描写拉科西！

斯大林死后，拉科西的地位迅速动摇，他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由寻求开放改革和民主自由的纳吉担任。1955年，拉科西东山再起，解除了纳吉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决定进一步镇压国内不同政见者，想以此扼杀匈牙利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他公开提出，“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但是，拉科西万万没想到，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引火烧身。

1956年7月18日，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拉科西慷慨激昂地把自己的计划和设想向政治局委员们作了简单介绍。这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贸易部长米高扬神情严肃地走进会议室，他提出要拉科西下台。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拉科西惊愕不已，但他不买米高扬的账，立刻给赫鲁晓夫挂了电话，询问原委，当他与赫鲁晓夫通完话回来时，面如土色，表示同意辞职。

苏联要拉科西辞职，事出有因。不久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东欧问题提出了新设想：改变斯大林的传统政策即严格控制东欧卫星国、把对方当做保护性的缓冲地区。这在东欧国家的政府中引起了阵阵恐慌。所以，从苏联的外交政策考虑，应当给东欧国家留有更多的发展余地。波兹南事件爆发后，世界舆论的强烈不满使赫鲁晓夫的新设想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再加上拉科西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不符合莫斯科的意图，所以，赫鲁晓夫要拉科西下台，由格罗接替他的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卡达尔任书记。不久，又恢复了纳吉的党籍。

然而，格罗也是个持强硬路线者，但在当时，他在匈牙利民众中的形象并非如此。因此从表面看，拉科西下台后，匈牙利国内的矛盾得以缓和，局势暂时平静下来。

哥穆尔卡硬顶赫鲁晓夫

波兹南事件后，曾被斯大林的走卒打入大牢、刚刚恢复名誉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波兰悄悄推行“非斯大林主义化”的改革政策，这激起了另一批持强硬路线者的恐惧。1956年10月19日，这些强硬路线派要求苏联立即派遣军队前来遏制他们认为迫在眉睫的波兰人暴动。为此，赫鲁晓夫亲自飞抵华沙，严厉谴责哥穆尔卡的新政策，并且调动驻在波兰的苏军，以此施加压力。

哥穆尔卡与匈牙利纳吉的政治观点雷同，两人相比较，哥穆尔卡是一名更坚强的政治家。他在40万波兰人的集会上，公开抨击斯大林主义的恶果，许诺要在波兰实行进一步的改革，他的讲话受到情绪激昂的波兰民众的欢呼和支持。这时，“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十分谨慎地告诫波兰人，现在暴动将是一种自杀，支持哥穆尔卡的路线是防止苏联入侵的最好方法。“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宣传受到哥穆尔卡政府的赞赏，于是，下令取消了国内对“自

由欧洲广播电台”无线电波的干扰，使它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每一个波兰人的家庭。

苏联和波兰的强硬派此时都意识到，一旦对波兰的改革实行武力镇压，只能激起波兰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于是，赫鲁晓夫不得不停止对波兰的干涉，同意将驻波苏军从华沙调回波兰的基地，并且把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调回国内。

中情局情报部长艾默里从欧洲回到华盛顿之后，与全体情报部同仁们密切注视着东欧国家事态的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艾默里和他的手下人员通过在波兰的情报关系，源源不断地向美国政府提供最新的波兰内部情况和东欧事态的发展。

艾默里与记者希金斯的私交很深。希金斯是个才华横溢、颇有魅力的随军记者，在朝鲜战争期间，她一直搞战场报导。她善于结交朋友，从众多的朋友中得到了许多别人无法得到的消息。她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结交了几名编辑和记者，彼此间的关系相当不错。因此，艾默里经常到希金斯办公室打听波兰的情况，只要他拨通《人民论坛报》编辑部的电话，便可直接从这些消息灵通人士口中得到货真价实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是从党中央政治局的朋友那里得到的。而那些政治局委员们也有意把内部的消息透露给这些编辑们，以便使这些消息传到美国人那里，如果苏联真的大动干戈，波兰人能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显然，《人民论坛报》的编辑们知道艾默里是中情局的高级官员，他们对他从不回避任何情况。

一天，艾默里带着刚收到的新情况约见惠勒。惠勒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导人，后来担任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艾默里·跨进惠勒的办公室，便急不可待地问道：“将军，请你发表高见，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惠勒明白艾默里的意思，他坦率回答道：“我们正密切注视着东欧局势的发展。”艾默里听后说道：“要是波兰发生战争，波兰可以动用25个师的兵力来抵抗苏联人，只要我们能向波兰提供物质援助，东欧的这场交战将对我们美国有利。”惠勒感谢艾默里给他提供的重要情报，他认为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军方的情报人员并没有给他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依然认为，共产党阵营是铁板一块，不会分裂。送走了艾默里，惠勒马上召集部下，对波兰形势作了重新估价，草拟了一份应急计划。

这时，华沙传来了消息：哥穆尔卡硬顶着赫鲁晓夫的恫吓和苏军武力的威胁，终于赢得了胜利。

苏军开进匈牙利

波兰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匈牙利，这个消息极大的鼓舞了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纷纷上街举行游行示威，要求纳吉上台执政，并逮捕前任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欧悄悄酝酿着另一场危机……

1956年10月23日，在法国巴黎沿塞纳河畔几英里的塞夫勒，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个国家的代表确定了向埃及进攻的最后步骤。应当说这一事件对匈牙利事件的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就在这同一天，上台不久的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步其前任后尘，动用国家保安队镇压示威群众，并把纳吉抓了起来。格罗的高压措施激怒了广大的匈牙利人民，工人也加入到学生的行列，抗议格罗的暴力行径。国家保安队用机枪扫射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政府还出动军队和武装警察力图恢复社会秩序，然而，那些支持示威群

众的部队官兵却把武器弹药送给愤怒的群众。

次日，群众的示威游行转变为武装暴动。为此，党中央政治局决定解除格罗的职务，并将纳吉召回政治局，让他再度出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主席。

10月31日，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一行动本身实际上注定了纳吉最终的命运。在匈牙利政府大楼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跟在纳吉身后要他在请求苏联出兵的声明上签字，纳吉几乎是一路小跑甩掉了他。于是安德罗波夫要求匈方政治局内亲苏派逼迫纳吉出面请求苏联出兵。后来在一名国家保安队军官的手枪威逼之下，纳吉被迫同意了。第二天黎明，苏军坦克开进首都布达佩斯，在后来的10天中，匈牙利人与苏军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

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暴动，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赫鲁晓夫知道美国正值大选的时期，现政府为了争取连任，一般都不会在重大国际事务上采取冒险的举动；现在英法派兵入侵埃及，使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和政策发生了冲突，彼此关系已经明显紧张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出兵匈牙利，除了在政治上会引起一些反响外，决无其他后顾之忧。所以，赫鲁晓夫才下定决心，放手大干了。“解放”

1956年11月1日。“救急！救急！救急：求助！求助！求助！”布达佩斯电台反复播放着紧急呼救的信号，其中伴随着阵阵爆炸声和枪炮的轰鸣。“美国军队在哪里？求助！求助！”……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美国军队前来“救急”的事情。

中情局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是，它答应了它不能给予的东西，唤起了不能实现的希望，发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暴动。然而，这不是中情局一家的失误，它只是在重复国务卿的“战歌”，从事总统的旨意。

艾伦·杜勒斯曾对同行说过，假如共产党威胁要接管一个国家，他不会“等待邀请后再前去援助”。

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曾许诺要帮助东欧各国“从苏联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使许多东欧血统的美国人在1952年大选中投了艾森豪威尔的票。这些许诺还在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和其他地区的人民中造就了海市蜃楼，而且被“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装潢得越发宏伟逼真。每逢圣诞节，白宫都在电台向东欧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了解你们正在遭受的痛苦，同你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即你们的权利一定会使你们重新回到自由世界各国的行列中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在匈牙利的失败竟是中情局秘密活动的一次巨大成功的结果。1952年，共和党在竞选运动纲领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解放东欧”。约翰·杜勒斯说：美国将“运用一切手段”去实现东欧的解放。艾森豪威尔当天晚上打电话告诉他，以后要在“一切”与“手段”之间加上“和平的”几个字。尽管如此，但强调的还是“解放”。

这种口号在美国国内称得上是竞选运动的火腿肉，能吊不少人的胃口。但是，东欧人不知道如何区分美国竞选中的牛皮和实际行动中的排骨。其实，关于解放东欧的言辞都是为美国国内政治服务的，并非真要仗义挺身。在美国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或白宫的侠义声明。那种认为东欧人只要效法“法国抵抗运动”就能取得独立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法国抵抗运动”胜利的原因至少有三：1.盟军吸引了几乎全部的德军；2.几乎

全体法国人都支持“法国抵抗运动”；3.法国有一个紧密团结的地下组织。这些因素在1956年的东欧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美国人侈谈“解放”，纯属欺世盗名。

赫鲁晓夫出动了20万大军和2500辆坦克进入匈牙利。在布达佩斯街头的激战中，数万匈牙利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此时，艾森豪威尔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对匈牙利给予公开的军事支持。当有人询问他时，艾森豪威尔指了指地图说：“匈牙利四面是陆地，和西藏一样，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那里作战。”这倒是真话，美国根本不具备赶走20万苏联红军的能力。

“解放”成了一场骗局，它过去一直就是一个骗局。中情局内部当时有不少人对艾森豪威尔的变卦感到气愤。科尔比那时只是个小人物，他回忆说：“毫无疑问，威斯纳和计划部的其他高级官员，特别是负责秘密行动的人在武器、通讯器材和空中补给方面作了充分准备，以支援自由战士，这本来正是使情报局具有准军事性质的目的。”“尽管美国坚定地承担遏制苏联人的义务，但它并不准备试图解放苏联人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地区，这一点已最终确定下来。”

其实，美国的“诚意”在3年前就已经很明确了。1953年6月，万名柏林工人走上街头请愿，要求政府降低最近提高的劳动生产“定额”。当时中情局驻柏林站站长亨利·赫克谢尔请求上峰允许他们予以武装支援，但被拒绝。6月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通过莫斯科向民主德国提供有限的食品援助，以示“关怀”。柏林6月暴乱被苏军平息。

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宫和中情局就是制造动乱的祸手，杀人不见血。

1956年初冬，白宫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一次代号为“日光浴”的总检查。会议在白宫后花园里举行，由国务院、中情局和美国军方的专家代表A、B、C各方提出自己的战略路线。A组组长乔治·凯南慷慨陈词，主张采取“遏制”方针，“让铁幕下的人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同时美国给予他们适当的支持；这种做法耗资少，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也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与会者发言结束时说，他赞成凯南的观点，这正是美国应采取的战略决策。

中情局摩拳擦掌

计划部长威斯纳和其他一些中情局的高级官员根据所掌握的情报和眼前的事态，预见到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将会得手，为此，他们忧心忡忡。威斯纳怒不可遏，破口大骂英法两国只顾自己在中东的殖民利益，葬送了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把东欧从苏联控制下一举夺回的最好机遇。不久前，威斯纳在希腊时患了肝炎，现在精神上又受到沉重打击，病情每况愈下。尽管如此，威斯纳还多次催促杜勒斯局长尽快批准“红袜子—红帽子”行动中的地下武装人员“出击东欧”，并动用中情局的秘密军事力量，支持匈牙利的抵抗者。

最初，杜勒斯很想支持匈牙利人与苏联人干到底，但随着中东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加剧，杜勒斯就举棋不定了，埃及发生的事件毕竟比匈牙利事件更重要。再则，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尽管不象军方情报官那样，把东欧国家看成铁板一块，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东欧的共产政权决不会因内部发生骚乱而垮台。他们说，波兰的哥穆尔卡只是在共产党的阵营中坚持改革，匈牙利的纳吉也没有寻求以另一种制度来代替共产主义制度，说到底，他们

都不是美国人所钟情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斗士”。分析家们的这些观点对杜勒斯具有很大影响。

现在，各路情报纷纷涌向华盛顿。有一份情报说，苏联已经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地区调集了大批军队向匈牙利边境进发。情况已经很明显，克里姆林宫不再需要寻找什么借口来掩饰自己的军事行动，他们决心尽快使自己的卫星国后院秩序安定下来。对此，有人提出尽快动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开入匈牙利，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了否决。理由是，在中欧的苏联军队的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北约可调动的力量，苏联在该地区的后勤供应线也比北约短得多，一旦动用了北约军队，就必然增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

情报部长艾默里看准了苏联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中的不利因素，大胆提出了一个新设想。艾默里认为，苏联核武器的力量薄弱，目前又遭到匈牙利军方和老百姓的联合抵抗，苏联与匈牙利东部连接的铁路线和公路线十分脆弱，只要有选择地对苏联的里沃克地区、罗萨尼亚以及罗马尼亚西部山区要隘处进行核打击，那么，苏联通向匈牙利的运输线将会处于瘫痪状态，美国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可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艾默里精心起草了一份给苏联的最后通牒，要求苏联立即停止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否则，美国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艾默里把这份最后通牒交给杜勒斯局长，请他呈交国务卿和总统以作为参考。艾默里很自信地对杜勒斯说：“要是赫鲁晓夫问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是否准备和美国打一场核战争，朱可夫肯定回答说没有准备好。这份最后通牒一定会吓倒苏联人的。”计划部长威斯纳十分支持艾默里的设想，同时，他又提出要采取常规的秘密军事行动。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威斯纳曾逗留在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当地人仇视苏联的情绪很深，这对他的触动很大……

在艾默里和威斯纳两人的共同催促下，杜勒斯找他那担任国务卿的哥哥密谈了好几次。杜勒斯最后一次从他哥哥处回来后，将他们兄弟俩商量的结果告诉了艾默里和威斯纳。杜勒斯遗憾地说：“你们的建议和设想无法付诸行动。”他感叹地继续说道：“当我们的盟友正犯下同苏联类似的侵略罪行时，即使苏联用武力镇压了匈牙利的暴动，我们又能拿苏联人怎么样呢？”威斯纳据理力争。他说：“解放东欧和击退苏联军事力量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2年大选时定下的两个目标，中央情报局为了等待东欧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的局势，已经做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工作。”杜勒斯解释道：“总统大选正在进行，现在不是大动干戈的时候。”

“红袜子—红帽子”胎死腹中

中情局计划部筹划的。‘红袜子—红帽子’秘密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上面一声令下了。然而，匈牙利事件发展得如此之快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正当华盛顿为美国是否要卷入这场事件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匈牙利的暴动被镇压下去了（需要提及的是，在匈牙利事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盖伦领导的联邦德国情报机关向匈牙利人秘密提供了武器弹药，支持暴动）。于是，一切都划了句号。

11月4日，匈牙利成立了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纳吉被迫出走，躲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后来，在苏方允诺不伤害纳吉的条件下，铁托同意交出纳吉。然而，纳吉一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立即被克格勃特务拖走，不久被处决。临刑前的纳吉·伊雷姆说：“在多瑙河的河谷，我曾在1953

年和 1956 年两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荣誉。拉科西和俄国人都阻止了我。如果现在需要用我的生命来证实共产主义者并非是人民的敌人，我甘愿做出这一牺牲。”对于莫斯科的背信弃义，铁托怒斥苏联人是“大骗子”，终生不忘；1989 年，匈牙利国内为纳吉恢复了名誉，几十年来一直忍辱负重的前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卡达尔沉痛地说：“我敢保证，纳吉从来不是反革命分子。”

就在匈牙利事件刚刚结束之际，苏联官方谴责“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煽动匈牙利国内反革命暴乱。

欧洲委员会和迈耶带领的中情局人员分别对苏联的指控进行了“调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也责令政府人员调查此事，调查人员反复收听了所有的录音带，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对“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指控是“无中生有”。然而，调查材料证实，当匈牙利事件进入高潮时，“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不象在波兰事件发生时那样沉得住气，而是采取了露骨和“偏激”的态度；电台不加评论地转播了匈牙利各地广播电台的广播，其内容正是谩骂、攻击和反对拉科西、格罗政府的，有的则直接攻击苏联，并呼吁外界的援助。这些广播内容正符合中情局的一些人想要插手匈牙利事件的愿望。其实，“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在大政方针上一直都是按照中情局的旨意办事的，并未“出格”。

另一组奉总统之命调查东欧秘密行动的特拉斯科特将军发现，“匈牙利人受到了威斯纳手下特工的鼓动”，相信一旦反叛开始，美国军队会立即干涉；在布达佩斯发生暴动时，威斯纳仍加紧策划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叛乱。这位将军使总统相信，如果那样做，结果仍是一场灾难。就这样，威斯纳的秘密行动结束了，有关人员被解散。

11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尼克松副总统也从维也纳去了奥匈边境，他在那里询问从布达佩斯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们是否认为“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及“美国之音”的广播在鼓动他们起来反叛方面产生了影响。学生们简短地回答道：“是的。”

就“红袜子—红帽子”秘密行动来说，从一开始就走漏了风声，即使按计划执行，也是必败无疑。仅举一例。联邦德国盖伦的情报机构为这一行动提供骨干人员，然而它派驻北约司令部的联络官海因茨·费尔夫是苏联间谍，他接触过北约所有的秘密档案，包括“红袜子—红帽子”行动。威斯纳甚至把费尔夫请到美国去密谋策划。由于费尔夫历史上当过纳粹，他不能获得签证，于是威斯纳给他伪造了身份。费尔夫的克格勃上司对威斯纳曲线帮助苏联间谍进入美国真要感激涕零了。

再说威斯纳，其建议被否定后，一气之下飞到了维也纳，他似乎想近在咫尺地目睹自己匈牙利之梦的破灭。有一天晚上，他在边境过夜，看着匈牙利那边机枪一闪一闪的火光，那是苏联保安正在试图阻止难民们逃往西方。威斯纳难过地离开了奥地利。不久，威斯纳回到了华盛顿，这时他已经处于一种狂躁的状态，经常咒骂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为苏联出兵匈牙利提供机会，并大发脾气，乱摔东西。一次，威斯纳病情发作，狂暴喧嚣，同事们手足无措，不得不让医务人员将他抬出中情局总部，由狄克·赫姆斯代理他的工作。

威斯纳其人

4 个月以后，威斯纳康复出院，仍然回到了计划部。可是，就在他作了

一次环球旅行，回到华盛顿之后，旧病复发，从此一蹶不振。

7月4日，正好是周末，威斯纳、比斯尔等一些中情局高级官员相约一起来到位于波托马克河畔的尼采家中聚会。尼采曾任国务院政策司司长，后来又担任过海军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他被认为是美国当代第一流的战略理论家。威斯纳比别人来得晚，他兴冲冲地捧着好几匹妇女用的布料走进屋子，大家被他这一异常举动搞懵了。威斯纳却毫不理会，他滔滔不绝地同大家瞎扯，讲话很快，不难看出，威斯纳的精神分裂症又犯了，大家都为他惋惜……

1958年，威斯纳离开了计划部，去伦敦站当站长，由比斯尔接替他，担任第四任计划部部长。虽然威斯纳还想在情报站做些“有用的事”，但他的病情日益加剧，1961年他不得不辞职。1965年，威斯纳在马里兰州自己的农场里用猎枪自杀。

威斯纳是一个典型的“冷战狂”、在中情局里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是密西西比人，过去在华尔街当律师，在二战时期成为战略情报局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在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都干得不错。罗马尼亚著名的普洛耶什蒂油田的确切位置就是他侦察到的，这才使美国空军轰炸机把它彻底摧毁了。

1944年8月，威斯纳参加了由苏联人协助的紧急空运行动，撤走了1300名同盟国战俘。航空救援小组离开后，威斯纳作为战略情报局驻布加勒斯特办事处负责人留下来。他发现，德国人和他们的罗马尼亚盟友在苏联人进军中仓惶逃跑时丢下了许多情报档案，于是威斯纳和他的小组抓紧搜集秘密档案，网罗德国间谍和帮助纳粹反对苏联的罗马尼亚奸细，还有那些愿意改弦更张为新主子效力的老牌特务。1945年春，威斯纳一伙被苏联人赶出了罗马尼亚。

1945年秋，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威斯纳离开了情报部门，他和密友杜勒斯重操旧业开办律师事务所。

1948年，威斯纳当上了中情局政策协调署主任。他的第一个设想——建立“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于1949年实现了，这个电台从一开始就像芒刺一样使东欧政府痛苦难熬。他还是帮助盖伦建立联邦德国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中情局内，他的昔日好友史密斯和杜勒斯先后成为局长，对他相当倚重，他自然干得更欢了。

威斯纳中等身材，很粗壮，秃顶，说起话来有些夸夸其谈，但搞起秘密行动来，“鬼点子最多，脑子最活”。40年代后期，美国共产党的诺埃尔·菲尔德跑到苏联后，威斯纳拐弯抹角地给斯大林送去一份假情报说：“菲尔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工人员。”斯大林相信了。于是，菲尔德被克格勃抓了起来。由于菲尔德在二战时期在欧洲做流亡人士的工作，与东欧许多领导人熟悉，由此，东欧国家的许多领导人被大逮捕的浪潮席卷进去，在这次清洗运动中，大约有15万人被捕，一部分人被处决，大部分人被送往劳动营服苦役。

还有像策划军事行动颠覆阿尔巴尼亚、在柏林掏洞窃听，寻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危地马拉发动政变，以及在印尼进行的流产叛乱等等，都与他有关。此时他担任中情局主管计划的副局长。许多人认为，威斯纳本来是可以当上局长的。

十五、苏伊士运河危机

英美算计纳赛尔

1956年10月23日，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离巴黎不远的赛夫勒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最后的行动方案：由以色列首先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动进攻，英法两国遂以“保护苏伊士运河”为借口，派遣军队重新夺取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的国际航道。运河北起地中海沿岸的塞得港，南到红海之滨的陶菲克港，全长172.5公里，河面宽180~200米，可通行6.5万吨的巨轮。运河的通航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印度洋和太平洋西岸各国的航程，与绕道非洲的好望角这条航道相比，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各国的印度洋之间的航程可缩短5500~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各国到印度洋缩短了8000~10000公里，对于黑海沿岸各国来说，则缩短了12000公里。欧美石油需求量的80%必须经过苏伊士运河这条便捷的航道来运输。实际上，苏伊士运河是中东的石油大动脉。仅在1955年一年之内，大小油船共运载了6700万吨的石油经苏伊士运河运往欧洲各国。因此，运河的主权国埃及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张王牌。

英美两国在对待埃及的问题上一向存在着分歧。历史上，埃及是英国的殖民地，苏伊士运河就是在那个时期开挖通航的。作为老牌的“大英帝国”，虽然已经衰败，但它一心要维护其在埃及的殖民利益。美国是后来居上者，国力雄厚，财大气粗，它不希望英国在中东和埃及坐大，自己吃独食。总的说来，美国不支持英、法等国继续保持其殖民统治，但是作为自己的西方盟国，美国时时注意协调自己同这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关系，以符合对苏冷战的全局。

1952年7月23日，中情局支持年轻的埃及军官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英国卵翼下的法鲁克国王的统治。1953年6月18日，纳赛尔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了埃及共和国。中情局由小罗斯福出面，秘密资助了以纳赛尔为首的政变领导人，并为他们出谋划策。

国务卿杜勒斯任职后，首次国外旅行就拜访了纳赛尔。杜勒斯在同纳赛尔的交谈中明确表示，美国不参与英法两国在中东的殖民利益的争夺，但是最担忧苏联和共产党会插手中东事务。纳赛尔当即向杜勒斯诘问到：“我怎么向我们的人民解释，我对持枪站在60英里外的苏伊士运河上的人不关心，反而去担心千里之外举着刀的那个人呢？”杜勒斯向纳赛尔表示，美国愿意派中情局支持纳赛尔，并向他提供贷款援助以修建阿斯旺水坝。从那以后，纳赛尔和美国确实热乎了一阵子。

纳赛尔上台后，于1955年2月向美国寻求援助，购买武器，但美国故意要求资金枯竭的埃及必须用现金支付，而当时英法不卖武器给埃及。于是，埃及用棉花换取捷克的苏制武器（实际是经苏联的同意），这使美、英感到不安。

1955年12月，英美两国出于各自的目的，正式向纳赛尔提出建造阿斯旺水坝。英国希望借此机会诱使纳赛尔采取亲西方的政策，以确保其油船在苏伊士运河上畅通无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想借此机会拉拢纳赛尔和新兴的民族主义者，两人都把这当做加强世界反苏力量的一项长远计划。实际上，美国和英国在中东问题上都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1956年7月，埃及接受了美、英贷款建议。但是此前，纳赛尔承认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并接待了苏联外长的访问，而且苏联已经为修建水坝提供了贷款。于是美英两国马上通知埃及，撤回贷款建议。

众所周知，英国并不喜欢纳赛尔，他们千方百计想把他赶下台，从而恢复法鲁克王朝在埃及的统治。195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在没有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英国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

1953年，英国情报机关招募了纳赛尔的空军情报部门头目穆罕默德·卡利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先后付给卡利尔总共15万英镑。但是，英国没有料到卡利尔对埃及政府忠心耿耿，他向纳赛尔告了密。后来，纳赛尔揭穿了英国要在埃及复辟法鲁克王朝的阴谋，并公开了英国的底牌。

小罗斯福在回忆这件事时谈到，英国知道美国也不满意纳赛尔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们曾向美国提出共同策划秘密行动，在埃及再来一个宫廷政变，推翻纳赛尔，另换傀儡上台。而美国方面却持谨慎态度。他们对英国人说：“从原则上说，我们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不相信，在目前的条件下，赶走纳赛尔会取得成功，况且我们还没有找到愿意担此重任、而且又有把握取得成功的宫廷政变组织者。你们可能会找到敢冒此风险的埃及人，但你们衡量过他的能力了吗？”中情局拒绝了与英国情报机关的合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杜勒斯兄弟考虑的不仅是美国在中东的商业利益，而且还有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在他们看来，政治因素更重要。他们的目的是想把中东的民族主义者拉到反苏反共的阵营中来。当然，英美两国在中东地区还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布赖米绿洲的归属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例。

英美“柔道”

1954年，鉴于由美国财团组成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拥有巨额投资，而且沙特阿拉伯人十分倾向于美国人，沙特国王和费萨尔王储向美国提出以石油为代价，请美国人帮助沙特阿拉伯获得对布赖米绿洲的主权。布赖米绿洲一直被英国控制下的阿曼和阿布扎比占有，沙特阿拉伯对此垂涎三尺，想把它弄到手。

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承担了这项任务。他再次委派曾在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小罗斯福作为他的“地下大使”飞往沙特阿拉伯。

小罗斯福与沙特国王商量后，准备在布赖米绿洲先搞一次公民选举，以作为日后夺取绿洲的借口。为了避免在选举中节外生枝，小罗斯福送给当地酋长一辆带有空调设备的高级轿车，想以此来讨好对方。小罗斯福明知这位酋长与阿布扎比酋长是兄弟俩，手足之情岂能被区区一辆轿车所代替，因此，第一次计划失败了。经过深思熟虑，中情局狠下心来，决定出巨额金钱贿赂对方。于是，小罗斯福又向这位酋长建议，只要对方肯把布赖米绿洲割让给沙特阿拉伯，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开放，不让英国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在那里钻井抽油，他愿意支付给对方价值9000万美元的黄金，这批黄金将由中央情报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支付。老奸巨猾的酋长哪肯轻信小罗斯福的许诺，他要小罗斯福写下书面材料作为凭证，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酋长出卖了美国人。英国人恼羞成怒，就此事向日内瓦的国际法庭提出起诉。中情局为了掩盖事情真相，便设法贿赂日内瓦国际法庭的仲裁人，但是这番运作徒劳无功。最后，英国人还是打赢了这场官司，布赖米绿洲仍归阿曼和阿布扎比所有。杜勒斯没有就此事责怪小罗斯福，因为他毕竟尽了最大的努力。

纳赛尔得罪西方人

1956年4月，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成立了一个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联盟。艾森豪威尔鉴于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则越来越倾向于被阿拉伯国家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以色列一边。5月，纳赛尔断绝了与台湾蒋介石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样一来，得罪了华盛顿的反共政客们，国务卿杜勒斯先前许诺的资助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一事在美国国会难以通过。7月19日，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国取消援助埃及修建水坝的贷款计划，这使纳赛尔在国内的威望受到严重打击，他被美国的要挟激怒了。7月26日，纳赛尔宣布，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将原先由英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纳赛尔的这一行动是无可非议的。早在1954年，纳赛尔推翻法鲁克王朝以后，曾与英国签订了一个协议，让英国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苏伊士运河的管理，但是守卫运河的英国军队必须在1956年全部撤离埃及。协议中还附带这样的条款：一旦埃及、土耳其或其他阿拉伯国家遭到除以色列外其他国家的侵犯时，允许英国军队重返埃及。显然，现在纳赛尔提出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并将其国有化是正当的、合法的。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见缝插针，不失时机地向纳赛尔提出共同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建议，但遭到了纳赛尔的断然拒绝。杜勒斯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正是在这个时候，英法两国决定利用目前美国人对纳赛尔怀有敌意和不满，趁机收回自己在埃及的殖民利益。他们在私下里曾向杜勒斯透露过这种打算，但他们没有把详细计划告诉他。其实，杜勒斯通过自己的情报关系，对此有所知晓，但是杜勒斯抱定一个宗旨，对方既然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向美国通报他们的计划，他就不参与英法两国的阴谋，坐山观虎斗。

1956年10月29日，在暮色的笼罩下，以色列向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不到两天就占领了西奈半岛。

10月30日，英、法两国向埃及和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要双方远离苏伊士运河区。这是预先安排好的一场戏，目的是想束缚埃及人的手脚，同时为出兵入侵埃及制造借口。埃及为了抵抗以色列的侵略，必须要把军队和军需物资送往苏伊士运河的对岸——西奈半岛，因此埃及对英、法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于是，英法两国以此为理由，出动飞机轰炸埃及的军事目标，并派出军队在苏伊士运河邻近地中海的一侧登陆。

一叶知秋

事前，中情局没有得到英、法、以三方进攻埃及的官方计划。此时，美国正值总统大选时期，忙得不亦乐乎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中东的突发事件大吃一惊，他尤其对英法两国领导人事先隐瞒入侵埃及的计划非常恼火，为此，他决定将英、法在中东的利益抛置一边。

实际上，中情局对英、法、以三国进攻埃及一事并不感到意外。此前，中情局通过对一份普通电报的分析，已经估计到以色列将进攻埃及。

10月25日，美国在以色列的武官向华盛顿陆军部发来一份电报，电文是这样的：“刚才想到应该把此情况告诉你们。我的汽车司机——一个独腿断臂、瞎了一只眼的后备役军人，也被应征入伍了。”

10月26日上午7时半，情报处长艾默里象往常一样，按时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看到了这份从军方转来的电报，立刻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以色列的战备动员竟达到了如此的程度，显然不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

了进攻别人：约旦军队对以色列有威胁，但决没有大到迫使以色列连残疾人都应征入伍的地步，既然约旦不足为惧，那么，以色列进攻的对象只能是埃及。最巧合的是，从星期五的日落起到星期六的日落止，正好是犹太教徒的安息日，犹太人在这一天不吃不做。由此，艾默里推断，以色列很有可能在下星期一上午向埃及发动进攻。于是，他放下电报，立刻来到局长杜勒斯的办公室，他对杜勒斯说：“以色列已经作了战争总动员，应该马上通知观察小组”（观察小组系美国情报委员会下属的预报情况的小组委员会）。“我已经发出通知了，一小时后召开紧急会议，我马上就在那里去。”艾默里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局长办公室。

当天晚上，国务院和中情局的有关人员就艾默里作出的推断进行讨论。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被认为是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摩萨德”关系最密切的人，大家请他发表一下看法。安格尔顿说：“艾默里的预测似乎有点骇人听闻，我不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昨晚，我一直同在华盛顿的以色列朋友呆在一起，他们一点也没有透露过此事，我推测这是以色列人在搞战备演习，并非是想对别国发动进攻，我不相信以色列会去打埃及。”讨论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星期六上午，国务卿杜勒斯在办公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艾默里把自己的推断又陈述了一遍。杜勒斯想起英法两国曾向他透露过要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意图，他把英法的意图和艾默里对以色列的推断联系起来，还是倾向于艾默里，认为他的推断有可能是正确的。当天晚上，杜勒斯准备到达拉斯发表演讲，原想提及一下此事，但犹豫再三，他最终还是在讲话稿上划去了有关的两句话。后来他回忆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外界人误认为以色列把进攻埃及的事情已预先通知我们美国”。

10月29日，华盛顿正式得到了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的情况报告，国务卿杜勒斯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十分钦佩艾默里的敏锐反应和正确推断。

然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勒斯事先没有向他告诫此事很不满。山姆大叔伤心了11月6日，以色列已经占领了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英法联军也控制了几乎整个的苏伊士运河区。这一天，恰好是美国总统的投票选举日。3天以前，国务卿杜勒斯因患癌症，需要立即住院作外科切除手术，此时正是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内最困难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他公开反对英、法两国的军事行动，将会使他显得无能，影响他的形象。更使他和白宫班子闹心的是，英、法、以偏偏在匈牙利发生暴乱这一非常时刻，到中东折腾，这不仅使西方阵营面临分裂的危险，使美国分散精力，并给苏联人遮了丑，使其有机可乘，在匈牙利下手。

事实果真如此。赫鲁晓夫瞅准了西方国家之间正在勾心斗角，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本人又忙于大选，于是，他安下心来，在匈牙利放手大干，为所欲为。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提出建议，由苏美双方联合调停苏伊士运河危机，他警告英、法两国必须迅速撤军，否则的话，苏联将以武力支持埃及。艾森豪威尔十分清楚，赫鲁晓夫想借此机会在中东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将世界舆论的视线从匈牙利事件中转移出去。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最后，美国只得同苏联一起，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英法两国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还通知英国，如果在周六前不撤兵，美国立即中断经济援助贷款。美国对法、以两国也施加了压力。

12月22日，鉴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英、法两国被迫从埃及撤军，苏

伊士运河将重新回到纳赛尔政府的手中，在此之前，暂时由联合国军看管。苏伊士运河危机得到了解决。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苏联是赢家。实际上，苏联只是卖了一个口头人情给埃及。出于对苏联的感激和信任，从此，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与苏联的交往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而美国在中东和埃及的影响却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中情局曾向和纳赛尔共同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纳吉布将军提供了一笔巨款，要纳吉布建造一个“开罗塔”，以纪念为埃及共和国诞生而作出贡献的中情局人员。后来，纳赛尔与纳吉布闹翻，纳赛尔便将这笔钱全部没收了。

美国还曾向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王储馈赠了巨款，但是，费萨尔手里拿着中情局的钱，背地里却支持纳赛尔，成了纳赛尔的“情报员”。美国人好不伤心！

十六、黑 鸟

计 划

1954 年上半年，以基利安为首的美国情报咨询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该委员会提出的一份关于未来敌国发动突然袭击情况的调查报告，研究如何改善美国的战略报警体系。会后，情报咨询委员会责成埃德温·兰德领导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来监视苏联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设施。

不久，中情局照片判读室主任阿瑟·伦代尔让基利安、兰德等人参观了一些摄影技术方面的惊人发展。兰德对高水平的新型摄影机、镜头和特殊胶片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兰德十分欣赏伦代尔的高超判读能力，他经常侦查出照片上看不见的东西，“其价值胜过万字情报和一千个间谍”。难怪克莱因称伦代尔是“超级判读大师”。于是兰德开始思索在苏联上空拍照的途径。

兰德获悉，6 个月前，洛克希德公司向空军推荐了一种高空单引擎侦察机的设计构想和图纸，但被拒绝。空军反而订购了一种轻型轰炸机，但试飞后效果不理想。于是空军又转向气球计划，准备利用这些无人驾驶的气球飘过苏联上空进行侦察，然后在太平洋区域回收。可试飞了多次，还是不行。

兰德断定，空军拒绝洛克希德公司的设计构想是个大错误。他私下说服了艾伦·杜勒斯把侦察机的研制工作接过来。这样，兰德小组委员会经过研究，向基利安委员会提出了两项建议：1. 立即制造一种能飞越苏联上空而不需中途加油的高空侦察机，其飞行高度必需超越导弹的射程范围；2. 研制一种专供飞机上使用的、具有高分辨率的照相机。情报咨询委员会采纳了兰德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并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方案。

在感恩节的前一天，兰德、杜勒斯、基利安和帕塞尔晋见总统。经过考虑，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这一方案。他说：“伙计们，我相信美国需要收集这类情报，我也准备批准情报咨询委员会提出的计划，但我要提醒诸位的是，我们所作的一切事情迟早要暴露出来，那必将引起一场风波。”总统反复强调，要严格控制该项计划，注意保密。

杜勒斯将该方案抓到手之后，立即委派自己的特别助理理查德·比斯尔专门负责该项工作。

比斯尔于 1954 年刚刚加入中情局，杜勒斯独具慧眼，马上就看中了他，并委以重任。比斯尔虽没有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显赫经历，却有着令人羡慕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在 30 年代，比斯尔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成了英国前工党领袖、经济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的得意门生；1936 年，比斯尔在耶鲁大学任教，他率先在美国传播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和组织了盟军的海上行动；大战一结束，他又成为“马歇尔计划”的鼓吹者，积极在美国国会兜售“马歇尔计划”。比斯尔与中情局计划处处长威斯纳的私交很深，和杜勒斯也有一面之交，并且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后来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是好朋友。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比斯尔在中情局里十分受人欢迎。耐人寻味的是，比斯尔在中情局的杰出贡献并不是用他的经济学家的手腕来管理中情局，而是用技术手段来收集和管理情报，从此开创了中情局情报活动的崭新时代。

比斯尔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原子武器引起世界恐怖的年代，要正确地评价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紧张，不能只限于收集政治情报，中情局的

情报收集和情报管理需要进行改革。比斯尔和一些有识之士率先将美国先进的电子、航空和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情报工作中，这对于着眼于近期效果、习惯用传统的方法来收集情报的机构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根据杜勒斯的指派，比斯尔代表中情局参加了在空军研究发展局局长室举行的会议。会上，比斯尔提出总统批准的计划应由中情局来控制，中情局将从局长支配的资金中提取 2200 万美元，作为全部的研制费用，这样，整个计划就不必得到国会批准，还可以避免延期和额外的麻烦。对于该计划来说，保密工作是头等重要的，一旦泄了密，让苏联人知道此事，他们势必要抓紧时间，研制出对付美国新式飞机的导弹。会上决定，把计划研制的飞机列为中情局最高机密的工作项目；为了掩人耳目，这架飞机被正式命名为 U—2 型飞机。“U”在美国空军的飞机用途分类中代表“杂务”的意思。以此类推，“S”代表“侦察”，“B”代表“轰炸”，“E”代表“战斗”或“格斗”，“A”代表“攻击”，“C”代表“运输”，“SR”代表战略侦察……。

比斯尔运筹帷幄

在是否应用技术手段搞侦察这一问题上，杜勒斯和比斯尔确实要比前任中情局局长史密斯有魄力。史密斯在位时，白宫曾准备把中情局变成拦截空中电讯的中心，然而，史密斯没有接受这个任务。在他看来，分析电讯任务，提取有用的情报才是中情局的主要任务。史密斯不想包揽和管辖分布于世界各地、占地达上万英亩的电讯拦截站以及在里面工作的数千名技术人员。1952 年，只得新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局，负责拦截全世界的无线电通讯，其总部设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它接受中情局的工作委派，在业务上服从于中情局。

在杜勒斯和比斯尔的眼里，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是中情局的一大损失，它削弱了中情局在美国对外情报工作中独占鳌头、一统天下的地位。杜勒斯和比斯尔不愿中情局落后于自己的情报伙伴，他俩相信，一旦 U—2 型飞机研制成功，它发挥的作用将使中情局在运用技术手段收集情报方面与国家安全局相媲美。在 U—2 型飞机的研制过程中，比斯尔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杜勒斯对自己“伯乐识骥”的才能颇为得意。

比斯尔独立领导这项工程，甚至不让艾伦·杜勒斯插手。在他看来，保密不仅意味着安全，而且意味着绝对控制，控制就是力量。

比斯尔挑选了几名精干的人员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他们在离中情局总部不远的 E 街秘密设立了一个办公地点。1954 年 12 月 1 日，比斯尔的特别小组正式定名为发展规划组，确定 4 名行政、会计、承包和作业的官员进行工作（后来又增补了 2 人，但办公室里从来没有超过 8 人）。这样就使发展规划组的财务和行政管理与中情局里的其他机构截然分开。发展规划组在顶峰时期有 250 人，其中 30 名是负责安全的官员，还有一些人负责电讯和联络方面的工作。为了保密起见，发展规划组里的来往电讯都是通过军方的通讯网络，使用的密码系统也不同于中情局其他部门。发展规划组还准备了 3 个飞行大队，其中 675 人分驻在国外的空军基地，200 人留守华盛顿，150 人被派往爱德华空军基地和犹他州试验场，比斯尔说服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让 U—2 型飞机的研制工作在犹他州的联邦原子能试验场进行，利用原子能委员会这顶保护伞，防止秘密泄露出去。一切安排就绪，各路人马开始分头工作。

比斯尔私下与洛克希德公司签订了合同。洛克希德公司同意耗资 2200

万美元，造出第一架 U—2 型飞机，公司从费用中提取 9% 的利润。合同中附带说明，如果飞机的费用低于 2200 万美元，洛克希德公司的利润还可增加，公司的总裁凯利·约翰逊亲自负责飞机的设计工作，他是个老资格的设计专家，曾设计过 P—38 轰炸机、F—104 战斗机等最先进的美国军用飞机。由于约翰逊同基利安委员会有关系，所以他对政府制造 U—2 型飞机的意图十分清楚。他理所当然成为比斯尔最中意的人选。比斯尔要约翰逊先造一架 U—2 型飞机的样机，以考察飞机的性能是否能达到设计要求。8 个月后，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附近的一个秘密车间里，第一架 U—2 型飞机诞生了，总共耗资 1900 万美元。

此前，比斯尔通过在壳牌公司任职的詹姆斯·H·杜利特将军，要该公司研制一种供 U—2 型飞机使用的在高空不凝结的特殊航空燃料。不久，该项目如期完成。

U—2 型飞机的结构是全金属框架，翼展为 103 英尺，机身长 63 英尺，“几乎全身都是机翼”，实际上，它就是一架装有发动机的风筝。飞机配有一个特殊的涡轮喷气发动机舷外支架轮子，它要在 70000 英尺以上的高度，以每小时 500 英里的速度飞行，稍有疏忽，飞机就会向下俯冲或倒栽。驾驶这种飞机难度很大，因此在爱德华空军基地，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对 U—2 型飞机驾驶员进行了特殊方式的严格训练。

与 U—2 飞机相配套的照相机也试制成功了。这是一种广角镜头的照相机，拍出的照片清晰度高，通过 7 个胶片窗口，在一个画幅上可拍摄 125 英里宽的地面。当飞机在高空侦察时，每次可拍摄 8 小时的照片，需要的软片数量非常多，为此，又研制出一种又轻又薄的硬性生胶片。每次飞行可携带 3560 米胶卷。1955 年 8 月 6 日，第一架 U—2 型飞机试飞成功，技术性能测试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嗣后，中情局转交给艾森豪威尔一张照片，上面是他在佐治亚州奥古斯托夫打高尔夫球时把球从地上捡起来的情景。当总统得知这是 U—2 型飞机在 20000 米以上的高空拍摄的照片时，他看了又看，赞叹不已。

此时，战略空军司令部试图管辖 U—2 型飞机，遭到杜勒斯和比斯尔的拒绝。他们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支持。总统还确定，虽然飞行员将来自战略空军司令部，但他们必须接受文职身份，在与中情局签订合同之后参加飞行。

白宫决策

到 1956 年 6 月为止，美国已经制造了 22 架 U—2 型飞机，它们分布在土耳其、联邦德国、英国，日本、挪威、巴基斯坦和台湾的空军基地。所有的飞行员都是从军队退役的民航驾驶员，他们与中央情报局签定了高薪受聘的合同。在名义上，U—2 型飞机属于美国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局，作为“飞行气象实验站”，负责“采取放射性样品”，实际上它归中情局指挥，活动计划要经总统批准。

6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中情局的计划方案，派遣 U—2 型飞机首次在苏联上空进行侦察飞行。飞行的具体日期由中情局自己决定，但艾森豪威尔只给了他们 10 天的权限，所有行动必须在 7 月 5 日前结束。比斯尔抓紧时间，组织了 4 架 U—2 型飞机，配备了 6 名飞行员和 200 名地勤人员。飞机从土耳其的日契尔利起飞，越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上空，拍摄了许多重要的设施和军事布防的照片，然后在挪威的多博安全着陆。

艾森豪威尔对派飞机到苏联领空侦察一事一直持谨慎态度。他很清楚，

苏联迟早会用导弹将飞机打下来，因此他寄希望于美国能尽快发展侦察卫星。但在目前情况下，U—2型飞机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它提供了有关苏联军事战略部署的重要情报。权衡之下，艾森豪威尔只好冒着风险，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在苏联使用U—2型飞机，但对飞行的次数作了严格的控制。每次飞行都要履行严格的手续：事先，中情局必须拟定本次飞行侦察的任务和侦察目标，并征求情报委员会的意见。然后在艾森豪威尔的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专门会议，讨论此事。出席会议的除总统外，还有国务卿杜勒斯、国防部长或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情局正副局长杜勒斯和卡贝尔将军、比斯尔以及总统的军事秘书古德帕斯特。会上，由比斯尔介绍本次飞行计划以及所采取的安全防卫措施，然后，华盛顿的最高决策者点头批准。从1956年6月到1960年5月，美国U—2型飞机在苏联领空共计进行了至少50次高空侦察飞行（据说美国总统并非全部知道，因为杜勒斯一开始就没有想事事汇报），绝大部分的飞行集中在1956年~1958年。飞机每次飞越苏联上空时，都有特定的目标，一般不重复侦察同一个目标。飞机驾驶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偏离原定的航线，但决不允许改变飞行的高度。正是这一规定，才使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意外地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U—2型飞机的间谍活动遍及全世界。1956年它侦察到英、法联军的船只正在集结，准备进攻埃及，还拍摄到以色列飞机轰炸埃及空军机场的照片，使白宫得以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策。1958年9月，“中国人对台湾发出了最可怕的威胁。U—2型飞机的侦察飞行却没有发现中国集结部队准备进攻。”艾森豪威尔获悉后，就在美国全国电视广播中宣布：“没有任何让步可言……也不会爆发战争。”“不久，‘危机’消失了”。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高空侦察照片的大量获取，中情局照片判读室主任伦代尔手下的判读员由当初的20人已经猛增到1200人。

“新大陆”

1957年2月的一天，U—2型飞机飞越苏联某地上空时，飞行员突然发现远处的地面结构十分奇特，飞行员断然改变原定航线，朝那个方向飞去。当时，飞行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知道那里是苏联的丘拉坦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像往常一样，飞行员归来时，带回许多高空拍摄的胶卷。5天后，判读员根据冲印出来的照片，制作了丘拉坦发射场的模型。对于中情局来说，这是一次特大的收获。

U—2型飞机在苏联上空飞行时，航线经常变化，除了从挪威的多博起飞外，有时还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白沙瓦起飞。中情局想以此迷惑苏联。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当U—2型飞机第一次出现在苏联上空时，苏联的雷达已经发现了它。在后来的4年里，苏方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了多次警告。

1957年8月26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导弹。6个星期后，苏联又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地送上了太空。

苏联空间技术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震惊了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正如几年前，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一样。但是，这一次，华盛顿最高当局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惊奇。因为中情局已向白宫报告了U—2型飞机发现了丘拉坦发射场和其他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施。艾森豪威尔及其顾问们认为，既然苏联能比美国提前一步把卫星送上天，那么，它完全有能力把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打下来。因此，白宫对是否再使用U—2型飞机

变得更加谨慎了。

1959年4月11日，为了进一步弄清苏联军事设施的情况，艾森豪威尔再次批准动用几架U—2型飞机去苏联领空“窥视”。但是到了第二天，总统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把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和比斯尔叫到办公室，对他俩说：“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再让世界舆论谴责我们美国了。现在只有美国才有这种能力从事高空飞行侦察活动。”比斯尔完全领会艾森豪威尔的意图，经过周密安排的U—2型飞机侦察计划只得停下来。

与盟国联袂

比斯尔很有心计，他知道，中情局要继续派飞机去苏联侦察，就得另想办法，从总统的限制中解脱出来。比斯尔想到了英国皇家空军，准备请他们帮忙，承担一些飞行任务。杜勒斯局长也有类似的想法。有杜勒斯撑腰，比斯尔的胆子更大了。他向英国皇家空军正式提出此事。英国人对于送上门来的肉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双方在谈判时却遇到了麻烦。英国皇家空军认为，“如果英国作为美国合作的伙伴，驾驶U—2型飞机对苏联进行侦察，那么在每次飞行前，必须要同时得到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批准。”比斯尔解释道：“我们不想把这种合作的方法作为伙伴关系，我们美国自己有权拟定U—2型飞机的侦察任务，不必听从伦敦方面的任何指挥。因此你们执行飞行任务，也不必得到华盛顿方面的批示。”皇家空军的人终于明白了比斯尔的言外之意。于是，双方的交易谈妥了。英国从美国得到了5架U—2型飞机，停放在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准备执行飞行任务。比斯尔在中情局和皇家空军之间负责对苏联侦察的协调工作。比斯尔对英国方面采取的安全保密措施非常满意，他认为，和皇家空军打交道完全可以放心行事（虽然双方谈得不错，而且英国对最初进行的侦察飞行也很卖气力，但英国人后来就不那么合作了，经常保留侦察资料）。

与此同时，比斯尔又去找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向对方提出了同样的建议，阿登纳很爽快地同意了。于是，在联邦德国的威斯巴登建立了一个由中情局控制的U—2型飞机基地。比斯尔还去找了法国总理，征求对方意见，然而双方会晤后毫无结果，比斯尔便没有作进一步的努力，因为比斯尔和大多数中情局的人都持有这种看法：法国的安全保密工作不可靠。从更深一层来说，法美两国关系不融洽是这次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西方盟国中，法国的对外政策可谓是独树一帜，经常与美国相抵触。

比斯尔的英、德之行圆满成功。知情者认为，中情局向英、德提供了U—2型飞机，决不是杜勒斯和比斯尔滥用职权，如果没有美国总统和英、德两国政府首脑的同意，这笔交易绝不会成功。比斯尔所起的作用只是在一个大王国里再建立一个小王国罢了。厄运

1960年5月1日，收敛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情局馋性难捺，决定派加里·鲍尔斯驾驶U—2型飞机进入苏联领空对一些重要城市进行侦察摄影。殊不知，这次飞行栽了大跟头，从此结束了U—2型王牌侦察机在苏联的历史使命。

鲍尔斯是从土耳其的因契利尔起飞的。预定首先在丘拉坦发射场上空拍照，继而向北飞行到苏联原子弹研究中心斯弗罗夫斯克和普列谢茨克一带地区。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拦截到的电讯表明，普列谢茨克是苏联最新建立的发展SS—6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基地。鲍尔斯准备结束飞行时在挪威的多博降落。

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本来预定在 5 月份进行两国最高级首脑会晤。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杜勒斯，批准中情局这次带有特殊使命的飞行任务，但必须在美苏首脑会晤前两星期完成，决不能因这次 U—2 型飞机的侦察任务而影响两国会晤。中情局想等到天气好时再让鲍尔斯飞行，可是，苏联北部持续的恶劣气候使飞行计划一拖再拖，直到 5 月 1 日，总算来了好天气。

鲍尔斯熟练地驾驶着 U—2 型飞机在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飞行了 4 个小时，突然，他感到飞机后部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他坐在座位上，身体不由自主地朝前倾了一下，双腿被夹在仪表板下。说时迟，那时快，飞机随即呈螺旋形状向地面倒栽。“天哪！完蛋了！”鲍尔斯惊叫了一声。打着转的飞机所产生的强大离心力使鲍尔斯动弹不得，但他此时却十分冷静，他知道，如果自己借用弹射椅使自己脱离遇难的飞机，那么自己的双腿肯定完蛋。他迅速打开座舱罩，小心翼翼地将身体和双脚向外移动，他已经没有时间接好电线，按一下按钮让飞机自行毁灭，也没有吞服事先准备好的氰化钾毒药去自杀，他想再碰碰运气。看准了时机，他灵活地跳出了座舱……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他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时，发现周围站着一群持枪的苏联士兵。就这样，鲍尔斯成了苏联人的俘虏。苏联人对鲍尔斯还算客气，没有让他享受闻名于世的克格勃酷刑。在苏联人的详细审讯中，表面驯服的鲍尔斯并没有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苏联人也没有刨根问底地追问不休；他们此时最关心的是有关 U—2 型飞机技术性能方面的情况。既然有了一架坠落的残机，苏联人已经很满足了。其实，击落 U—2 型飞机并不象后来苏联官方人士所吹嘘的那样轻而易举。60 年代初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格鲁乌上校潘可夫斯基透露，为了击落它，苏联当时发射了 14 枚导弹，都没有直接命中，只是其中有 1 枚导弹在飞机附近爆炸才把它打下来。30 多年后，苏联的前空军将领在回忆此事时透露，从 U—2 型飞机第一次进入苏联领空那天起，苏联人花了整整 4 年的功夫，付出了多次机毁人亡的巨大代价才算把它击落（而且有 1 名苏联飞行员因被己方导弹击中而牺牲）。还有人进一步透露，为了击落 U—2 型飞机，苏联克格勃特工事先在土耳其因契利尔基地曾对那架 U—2 型飞机的飞行高度仪表做了手脚（换上一颗磁性螺丝），致使鲍尔斯在苏联上空飞行时一直认为自己处于 50000 英尺以上的高度，实际上他当时的飞行高度只有 30000 英尺，因此在苏联萨姆导弹的有效射程内他被击落了。

5 月 1 日下午，古德帕斯特向艾森豪威尔报告，在苏联上空执行侦察任务的 U—2 型飞机“迟迟未返，有可能失踪了”。此时，白宫很自信，认为“没有理由惊慌失措”：第一、大家都认定鲍尔斯报销了；第二、中情局曾向总统保证，“如果飞机失事的话，不会留下任何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因为飞机装有自毁装置”；第三、无论如何，赫鲁晓夫对此都不会说什么，正如他未曾提到以前 U—2 型飞机多次进入苏联领空一样。

关于前两点，中情局对艾森豪威尔的保证糟透了。鲍尔斯没有死，而且试图销毁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是不可能的，这一证据就是胶片本身。前中情局副局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于 1968 年写道：“还没有人设计出一种方法能很快地销毁紧卷成一卷、长达几百英尺的胶片。即使鲍尔斯及时按动了‘爆炸按钮’，将飞机和摄影机炸掉，苏联人仍能找到成卷的胶片。”

中情局曾告诉艾森豪威尔说，飞机上有“自毁装置”，这不是老实话。这一装置必须由飞行员控制，而且只有一个 2.5 磅重的炸药包，根本不足以

“毁灭”一架飞机。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后来愤愤地说：“中情局向我们许诺说，苏联人甭想得到一个活着的飞行员，然而，他们却把降落伞给了这个狗娘养的家伙！”

飞机出事后，美国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局立即发表一个新闻公告，声称有1架“气象飞机”失踪了。

5月5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击落了U—2型飞机，并谴责了这一挑衅行动。

U—2飞机被击落已经过了好几天，可是苏联对于生擒飞机驾驶员鲍尔斯和收集到了飞机残骸一事只字未提（赫鲁晓夫有意要作弄美国人）。而美国方面却想当然地认为，鲍尔斯在跳出座舱前，肯定会打开飞机的自毁系统，已经是机毁人亡了。假如鲍尔斯没有死，被苏联人擒获的话，相信他也会借口飞机迷失方向，或是说对发生的事记不清而搪塞过去。所以，当苏联人谴责美国派遣侦察机侵犯苏联主权时，艾森豪威尔还振振有词地驳斥苏联人是“捏造事实”。赫鲁晓夫见美国人上了圈套，于是在5月6日公布了U—2飞机残骸和鲍尔斯本人的照片，使美国难堪。但赫鲁晓夫并不想为这件事而影响美苏首脑会谈，因此他有意给艾森豪威尔留下台阶。他声称，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次U—2飞机事件可能不知情，是杜勒斯和美国军方的擅自行动造成的。此时，摆在艾森豪威尔面前的只有两条路，1.要么顺着赫鲁晓夫给出的台阶下来，佯称对此事不知，由艾伦·杜勒斯承担“欺君惑主”的罪名，而且杜勒斯也已经同意甘当替罪羊，递交了辞呈；2.由自己承担责任，保住杜勒斯……经过一番苦心思索，5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受权表示遗憾，但断然否认U—2飞机入侵侦察是下属的擅自行动。声明中直言不讳地承认，此事是经总统批准的，这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对此，赫鲁晓夫记者招待会上咆哮说：“想不到这计划是经美国总统批准的，难道他们还要我喝彩不成？！做这类事情，简直不顾自尊。……在他的声明中露出了恐怖的军国主义狼牙。”赫鲁晓夫断然取消了预定在巴黎与美、英、法三国首脑举行的最高级会晤。

赫鲁晓夫当初热切期待最高级首脑会议，而后又断然取消，其原因说法不一：

1.为了在政治局内部持强硬路线的同伴面前显示自己也是个强硬派；

2.此时，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下一届民主党人肯尼迪上台希望很大，苏联对肯尼迪抱有好感，愿意把缓和的资本出让给肯尼迪，而且肯尼迪上台不久果然实现了美苏首脑会谈；

3.苏联本来在U—2飞机事件中已经给了美国政府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同时也是为最高级会谈留有余地，但美国的态度使苏联认定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认真会谈的诚意，而且，在美国对U—2事件强硬蛮横的态度下，苏联参加会谈简直就是磕头下跪，赫鲁晓夫当然不能干。

艾森豪威尔为U—2型飞机承担责任一事，就连美国的议员和普通民众都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历届美国总统都是有错向下推，从没有认账的先例。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对间谍活动承担责任的总统。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想让外界认为他是个被下属愚弄的傻瓜。

自此以后，U—2型飞机在苏联的侦察飞行寿终正寝。尽管中情局要求在苏联继续U—2飞行，但艾森豪威尔说，在我任内的最后8个月，不会恢复飞行了。显然，U—2飞机事件使艾森豪威尔很扫兴。究其现实原因，一般人认

为：1.苏联已经具备了击落U—2型飞机的能力；2.美国通过间谍卫星对地侦察的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可以取代U—2型飞机的大部分侦察任务。但是，中情局日后还继续利用它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上空进行间谍活动。

至于飞行员鲍尔斯，在1962年2月10日被美国用苏联间谍头子阿贝尔交换回国。起初，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这种交换，他认为鲍尔斯泄露了国家机密。肯尼迪接任总统后，重新研究了这件事，他认为U—2事件与他无关，而交换有助于缓和美苏关系，于是同意了这笔交易。鲍尔斯回国时，美国政府很为难，不知是应该把他当做英雄来欢迎，还是作为叛徒投入监狱。中情局虽然对鲍尔斯进行了盘问，但没有亏待他，给了他5.2万美元的酬金。据鲍尔斯说：“有些机密我没有告诉苏联人”。

黑鸟 SR—71

在U—2型飞机投入使用后不久，比斯尔就奉命组织研制SR—71型战略侦察机。“黑鸟”与U—2型飞机一样，都是在“臭鼬工场”生产的。“臭鼬工场”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高级产品发展部的绰号。为制造这种飞机，这家公司采用了当时最新的技术，从设计到飞机的处女航仅用了3年时间。“黑鸟”浑身漆黑，在高速飞行时因高温而呈深蓝色，机头呈鲜红色。它的最高时速为2600英里，飞行高度在10万英尺以上。“黑鸟”于1962年开始飞行。尽管这时已经使用了间谍卫星，但“黑鸟”的有些功能是当时的间谍卫星所无法取代的：它装备的一种照相机可以拍摄到地面上长度仅9英寸的目标，它携带的另一种摄影机可以在一小时之内拍摄到近26万平方公里的全景照片；还有一种横向雷达可探测到两侧各80英里的目标讯号。

1964年，“黑鸟”编入美国战略空军，专门从事攫取情报的侦察飞行。“黑鸟”自身装备了一种能够迷惑导弹的电子干扰系统，在遭到火箭或导弹的攻击时，能使弹头在飞机以外的一定范围内爆炸。苏联曾多次以导弹攻击“黑鸟”，但导弹飞到8.8万英尺的高空时就失控了，只能望空兴叹。

多年来，“黑鸟”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比尔和日本冲绳岛嘉首纳空军基地起飞，围绕地球执行间谍任务。1964年，它初出茅庐就记录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一系列数据；1965年，它发现美军战俘被囚禁在越南北方山西的几间草屋里，美国就此出兵劫营，结果扑空；在“伊朗人质危机”期间，“黑鸟”为营救计划事先进行了侦察，但营救行动中途夭折；1986年，“黑鸟”侦察到卡扎菲在黎波里的一座帐篷里，接着里根下令轰炸，可飞机没有除掉卡扎菲，却把法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打得千疮百孔；1987年，“黑鸟”发现停泊在阿巴斯港准备在波斯湾布雷的伊朗船只，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一支美国突击队在“中情局特工的配合下把这艘船劫走了。”

SR—71型飞机所参与的最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是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当时埃及和伊拉克正在大举进攻以色列。中情局获悉，战局危急的以色列已经做出最坏的准备：使用原子弹。于是立即出动SR—71型战略侦察机，经中途空中加油，在2.5万米的高空飞越以色列的内格夫沙漠。当它飞过以色列正在安装核武器的空军基地时，一架正在东地中海上空搜索电讯情报的美国海军“鹰眼”式预警机截获到两架以色列的F—4型战斗机正在迅速爬高，企图拦截SR—71飞机。但它们无法追上，因为“黑鸟”在得到预警报告后立即升高到“鬼怪”式战斗机的升限以上，加速飞离了以色列。经再次空中加油，返回美国比尔基地。

这只“黑鸟”带回的情报万分火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仓促召开会议，

尼克松总统别无它法，只好动用华盛顿—莫斯科的热线，劝告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部署在开罗和阿斯旺水坝周围的苏制“飞毛腿”导弹也装上了核弹头。这样，中东交战双方都装备了数量有限、但威力巨大的核弹头，美苏两大国就可以避免卷入，从而防止了一场美苏之间的核冲突。1973年10月13日，一艘载有核弹头的苏联货轮离开奥德萨港尼古拉耶夫海军基地。当该船抵达埃及时，以色列已经扭转了战局。此时没有必要使用它的杀手锏了，核灾难终于没有成为现实。

作为间谍飞机，SR—71的侦察设备还是相当先进的。但是，1989年美国发射的更为先进的KH—12间谍卫星在高空摄影方面比它更胜一筹，能够透过云层和夜色拍摄到更为微小的目标。因此，这就决定了“黑鸟”SR—71的最终命运。

1990年1月26日，被称为当今最优秀的战略高空侦察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比勒空军基地正式退役，进入博物馆作为陈列品供人参观。有两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说，在“黑鸟”身上开刀的做法未必正确，因为它仍然是目前飞机中飞得最快和最高的家伙，创下了从未被击落的记录；况且发射一个先进的间谍卫星需耗资10亿美元，而维持一队“黑鸟”的经费一年只需2亿美元。

十七、是 1000，还是 150？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50 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鼓吹“大规模报复”军事战略，其前提是美国当时拥有对苏联的核优势；核武器和远程重型轰炸机是这一战略体系的核心。

美国军方对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低水平国防开支政策持有异议。它首先表现在有关“战略轰炸机差距”的大争论中——

中情局与美国空军情报部门在评估苏联空中力量这个问题上一贯存在着分歧。1947 年，中情局认为苏联最早也要等到 1950 年才会有原子弹。空军方面则坚决声称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将取得成功。进入 50 年代，双方在苏联“战略轰炸机差距”上的分歧以及后来发生的有关“导弹”情报上的分歧成为中情局与空军方面激烈争论的焦点。

早在 1946 年还是中央情报组的时候，一些情报官员就指出，苏联一旦发展了原子弹，他们就需要拥有能运载和投掷原子弹的重型轰炸机。当时，美国空军方面对苏联发展原子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意图麻木不仁，注意力只是集中于苏联在欧洲部署的常规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的意图上。直至 1947 年下半年，美国空军方面对苏态度戏剧地发生了变化，似乎比谁都更担忧苏联人的原子弹和战略轰炸机对西方国家的威胁（其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拨款）。

1948 年，一名苏联叛逃者透露，苏联人在美国 B—29 轰炸机的基础上，准备生产新型的战略轰炸机。1948 年 5 月 1 日，这个情报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上得到了证实：一队图—4 型的苏联轰炸机掠过红场上空，其机型与美国 B—29 型轰炸机几乎一模一样。空军方面惊愕了。他们说：“苏联人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制造出这种类型的战略轰炸机，无疑，苏联人制造原子弹和轰炸机的能力一定大大超过我们原来对他们的估计。”

此时，对苏联人素有戒心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却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他们不同意空军方面的观点。中情局的官员指出：“空军方面的估计仅仅建立在表面的观察和叛逃者提供的并不精确的情报上面，尚未得到真凭实据来证明其情报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为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架图—4 型轰炸机能够中途不着陆作远距离的飞行。”

1954 年 5 月 1 日，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结束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空军军官查尔斯·E·泰勒上校向华盛顿发回一份报告说：一队米亚—4 型轰炸机以分列式队形掠过莫斯科上空。第二年阅兵式之后，查尔斯又发回类似的报告。这似乎证实了先前的推断，即苏联已经拥有 1000 架重型轰炸机的进攻实力。尽管中情局根据自己已收集到大量的证据，否定了空军方面估计的数量，但空军总参谋长柯茨·E·李梅上将仍然利用空军单方面估计的数字，并进而提出：“增加 B—52 轰炸机的攻击力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从那以后，中情局和其他军事情报部门对美国空军部情报处的工作越来越不信任。

原来如此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原来泰勒上校在莫斯科中了苏联人的圈套。他在红场上空观察到的米亚—4 型轰炸机和图—4 型轰炸机比起美国同类型的 B—29 和 B—52 轰炸机来说，不但航程短，而且发动机的功率也相差很多。苏联制造的这两种飞机数量非常少。泰勒两次在阅兵时看到的飞机其实属于同

一类型的飞机。苏联人故弄玄虚，先后采用不同的排列队形反复飞越红场上空，这就给泰勒和空军情报部门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苏联人至少已拥有一个飞行中队的米亚—4型轰炸机在1955年的阅兵式上空出现。事实上，苏联在当时仅拥有8架米亚—4型轰炸机。直到1953年苏联才研制出1.5万磅推力的喷气式发动机，而这只不过是战略轰炸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功率。

中情局抛出的有关苏联战略轰炸机的评估情报并非是情报官员的杜撰或揣测，而是华盛顿的情报专家们根据多年悉心积累和研究了苏联经济情报资料，经过综合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情报专家们的论据是：按照苏联工业生产的基础，到1959年，苏联达不到制造1000架米亚—4型轰炸机的生产能力。因为苏联人没有足够的机械生产线和铝锻造设备来完成这项任务。中情局还通过窃取的苏联民航客机上的机舱悬架进行了金属材料化学分析，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的论点：苏联的冶金技术水平很低，达不到制造远程重型轰炸机的要求。1956年美国U—2型侦察机拍摄回来的照片更加证实了苏联并没有一支强大的轰炸机部队。中情局在书面报告中明确断言，苏联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只有90~150架。有关“轰炸机差距”的争论到此告一段落。

空军部在这次争论中的失败削弱了军方对艾森豪威尔降低国防预算政策的顽固抵制。

艾森豪威尔与国防开支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艾森豪威尔对于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作为一名政治家，他认为最大的威胁是美国由于苏联恫吓而投入一场军备竞赛，而这将导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最终崩溃。他认为，美国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的经济生产率，而不是炸弹和导弹。他进而认为，坚实的经济有赖于平衡的联邦预算，平衡的联邦预算阻止通货膨胀的关键；而要达到预算平衡，他必须削减国防开支。

为此，他削减了常规武器，并在日益依靠使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上减少了空军和海军的数量。结果，在他执政的整整8年里，年度国防开支一直保持在400亿美元左右。这

比杜鲁门的建议和民主党所鼓吹的数目还要低100亿美元。由于减少了国防费用，艾森豪威尔大体上保持了预算平衡，其显著的成效之一是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25%或者说在8年期间为10%。

艾森豪威尔主张，为了威慑苏联，美国必须有对莫斯科扔一、两颗原子弹，苏联人在任何地方的所得都抵偿不了莫斯科被毁灭的损失。美国不需要用成千上万颗原子弹和导弹来使苏联人相信这种威胁的存在。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必要用具备摧毁整个苏联的能力来威慑克里姆林宫。

艾森豪威尔引用美国原子权威奥本海默的话说：美国和苏联是同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不应实行耗费巨资的军备计划。

艾森豪威尔确信，国家用于国防的开支越多，至少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就越不安全。这是一种公然违反一般人看法的见解，然而它的确确实正确无误；因为，道理显而易见，美国的军备越发展，苏联也就要向更高程度发展，而且对于装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不存在防御的办法。艾森豪威尔常说，军备竞赛从来都不具有多少意义，可以说，在核武器时代，军备竞赛完全是一种疯狂。

以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和休伯特·汉弗莱三名民主党参议员为首的鹰派批评艾森豪威尔“那种远古时期的观点已经严重危害了国家的安

全”。1958年，他们声称存在着落后于苏联的“轰炸机差距”，到了1959年，这个差距又成了“导弹差距”。

艾森豪威尔知道，所谓的“差距”纯属胡诌。1957年~1959年，U—2型飞机的侦察结果表明，苏联根本没有扩充导弹或轰炸机机群的应急计划；它还证明，美国在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已经对苏联占有明显的优势，大体上至少是三比一。

中情局在对苏联的军备分析问题上支持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U—2型飞机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报告是我制定对苏战略的重要依据”。然而，他始终没有透露有关在U—2型飞机停飞苏联后美国实施的“科罗纳”行动计划，而恰恰是这一秘密行动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提供了决策的基本依据。

军方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艾森豪威尔发生了争执。两位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和马克斯韦尔·泰勒因不满总统裁减陆军而辞职。为了压服军方执行他的政策，艾森豪威尔颇费了一番气力。然而，在他下台后，军备竞赛遂成为历届美国政府的国策。

“科罗纳”计划

1957年10月，苏联抢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一片哗然。美国人清醒地意识到，苏联既然能把卫星送入太空轨道，也完全有能力把核弹头发射到美国的国土上。西方情报机构对苏联的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实力知之甚少，尤其是导弹核武器的发展情况更是一无所知。航空侦察虽然获得一些情报，但要冒风险，而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无法深入广阔的苏联腹地了解它的全貌。而间谍卫星却能在160公里的高空，透过“铁幕”的封锁，获得所需要的情报信息。

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制定中情局负责研制一种回收胶卷型的间谍卫星系统，这就是代号为“科罗纳”的绝密计划。它被隐匿在公开的“发现者”号系列卫星中。由中情局计划部（即行动部）部长比斯尔负责主持这一计划。

“科罗纳”计划在开始阶段出师不利，遭到了一连串的挫折。在以“发现者”为名的38次发射中，前12次发射均因运载火箭或卫星回收系统的各种故障而失败。例如1959年4月发射的“发现者”号虽然成功地进入了地球轨道，但它携带的第一个胶卷回收舱却落在北极的斯匹茨尔岛上，很可能被苏联人回收了。1960年2月发射的“发现者号”卫星因返回舱弹射角出现偏差，无法返回地球，被射入更高的轨道。后来该回收舱在坠入地球大气层时还出现了一场虚惊：当时美国海军的雷达早期预警系统在近极地轨道上发现了这颗不明国籍的卫星，误以为是苏联的轨道式轰炸武器。还有一次，回收舱落在苏联中亚地区的原野上，当地农民不知何物，把舱内的胶卷扯出来，绕在树桩上围成了一个简陋的厕所；另有一次，“发现者”的回收舱落在苏联的森林中，被伐木工人用斧子劈开了。

接二连三的失败，引起了从总统到中情局局长的关切，负责研制卫星的洛克希德公司及该计划的各级主管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取消这项计划”再次成为高层领导的话题，但由于美国急需这种侦察手段，加上U—2飞机在1960年5月1日被苏联导弹击落，引起美苏间的一场政治危机，增大了要求用间谍卫星获得情报的压力。“科罗纳”计划的执行者们迫切需要一次成功的飞行。

洛克希德公司将返回舱的自旋稳定火箭发动机由热气式改为冷气式，消

除了热气火箭发动机在点火时使返回舱在太空产生像车轮一样旋转的可能性。

经过一系列最新修改，1960年8月10日发射的“发现者”13号终于准确入轨，并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遗憾的是，这次发射未带照相机和胶卷，只携带了一面美国国旗。艾森豪威尔总统欣喜若狂，将星条旗盖在经过2次失败后从太空回收成功的第一个人造物体上。

“科罗纳”计划在过去18个月进行了14次发射（含1959年1月21日试射失败的“发现者”零号卫星），如今这种卫星总算接近于一帆风顺了。

1960年8月18日，距“发现者”13号回收成功仅6天，“发现者”14号也成功入轨，相机按计划开始拍摄。卫星环绕地球17圈，7次飞越苏联领土。返回舱被一架C—119飞机成功地回收。整个回收过程是：飞机伸出一个悬钩，从缓缓下降的回收舱上方飞过，钩住降落伞，切断伞绳使降落伞收缩，然后将降落伞和胶卷舱一起拽进飞机货舱，环环相扣，一丝不差。

“发现者”14号使用的是全景相机，可对卫星路线左右两侧各35度范围内的地面扫描，地面分辨率大约15米，可覆盖苏联将近五分之一的国土。而U—2型飞机在过去4年间24次侦察飞行覆盖的苏联领土只有26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发现者”14号一次飞行拍摄苏联国土的面积相当于U—2飞机24次飞行获得侦察照片的总和。

“科罗纳”计划最初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苏联在以多快的速度生产远程轰炸机和弹道导弹（包括中程和洲际导弹），以及它们部署在何处。另一个目的是确定苏联防空体系（包括截击机和防空导弹发射场）的部署情况，以便供战略空军司令部制定轰炸目标。“发现者”14号是世界上第一颗成功回收得到侦察胶卷的照相侦察卫星。它的照片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虽然不算清晰，但在当时冷战加剧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如此珍贵的情报，从照片上识别出军用机场、导弹发射阵地等，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为了庆贺来之不易的成果，人们欢呼拥抱，将图片判读人员一次又一次抛起来，似乎也要把他抛入太空。

“发现者”14号的成功，给“科罗纳”计划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为了弄清苏联各种战略核武器的部署情况，在一年多时间里又连续发射了22颗“发现者”号间谍卫星，其中7次空中回收成功，4次海上回收成功。各项研制和发射活动都处于绝对保密控制之下。间谍卫星的发射场设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它位于加州太平洋沿岸。这里火车飞奔，运输繁忙，每次卫星发射都选在两列火车通过的短暂间隙时进行。

“发现者”号使用过8种相机，分别以“锁眼”（KH）为代号。其分辨率从初期KH—1的12米~15米提高到KH—5、KH—6的1.8米~3米。其中KH—5相机是制图相机，为美国陆军测绘局提供战略武器精确瞄准目标所需的制图信息。KH—6是一种高分辨率成像系统，专为获取苏联列宁格勒反导弹发射场的情报而研制的。“发现者”回收舱内的胶卷重量从初期的4.5公斤增加到36公斤（含两个胶卷舱，相当于4800米长）；卫星在轨停留时间从3天延长到19天，送回地面照片覆盖面积从4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880平方公里。

“科罗纳”计划从1960年开始侦察活动直至1972年结束，成功回收了100多颗卫星，它们提供的准确情报使美国军政最高机构可以由此作出正确的决策。60年代曾指导“科罗纳”计划的中情局科技部部长惠伦说：“卫星侦察对美国情报界的影响相当于二战中盟国对德国超级机密‘神奇密码’的破译。”

卫星侦察深刻地改变了冷战的进程，或许还曾促使我们从核大战的门槛退缩回来。”

在“科罗纳”计划实施的十多年里，正是美苏两国冷战愈演愈烈的时期，它对美苏关系产生了戏剧性影响。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科罗纳”行动计划揭穿了美国国内假想存在的美苏间所谓“导弹差距”的真相，为美国立下了大功。

1960年前后，美国朝野流传着一个可怕的消息：苏联在弹道导弹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基辛格在1960年出版的《选择的必要》一书中断言：“导弹差距”在1960~1964年这段时间内将成为事实。这意味着如果苏联首先袭击美国，我们可能失利。不仅民主党的肯尼迪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大肆散布“导弹差距”，攻击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就连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也在竞选中大谈所谓的“差距”，靠耸人听闻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这使艾森豪威尔相当不满。美国国内一片核恐怖，人们认为，美国已处于苏联成群的洲际寻弹的包围之中，随时都可以把氢弹扔到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去，美国将束手待毙。

当时的苏联也利用这种有利的舆论，推波助澜，试图以“兵不厌诈”的策略迫使美国就范。赫鲁晓夫对外宣称：“现在我们已有了许多火箭、许多原子弹和氢弹。如果他们袭击我们，我们就能把所有敌人从地球上扫除干净！……在我们的工厂装配线上，每年可生产出250枚带氢弹头的火箭。如果这些致命的东西在某个国家爆炸，那里什么都不会留下。”

事实果真如此吗？中情局“发现者”14号飞行前的1960年2月提交的绝密级“国家情报估计”中报告：到1961年年中，苏联可能部署140~200枚洲际弹道导弹。可是在对“发现者”—14、—18、—25、—26和29号卫星获得的照片进行分析后，中情局于1961年9月21日发出的另一份“国家情报估计”中却指出：苏联已经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还不到25枚！而当时美国已拥有比苏联多几倍的洲际弹道导弹（96枚“北极星”潜射导弹、24枚“宇宙神”洲际导弹）和多3倍的B—52战略轰炸机，还即将拥有能从地下井发射的“大力神”弹道导弹和更先进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据当时曾在中情局情报部供职的专家赫夫斯塔特勒后来透露，实际上苏联当时仅有6枚可供实战的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和数量不多的远程轰炸机。

通过“发现者”卫星的情报，美国已经摸清了苏联的底牌，在后来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和手段，迫使苏联节节后退。

“科罗纳”计划总共耗资8.5亿美元，仅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亿美元。钱虽花得不多可它在12年间完成的任务却是范围广、数量多。其中包括——

1. 摸清了苏联战略武器的实力和进展情况。例如，苏联全部导弹发射设施、每种战略导弹、每种潜艇、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数量及其部署地点；苏联为保护苏伊士运河而在埃及设置的导弹；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的核设施；苏联境内的防空体系以及反导弹防御体系；苏联原子弹和氢弹的储存地点。为美国战略核武器绘制打击苏联目标的精确地图。

2. 跟踪监视了苏联新潜艇从建造、下水直至服役的全过程。

3. 在美苏载人登月的竞争过程中，监视了苏联登月火箭的试验和惨败。同时，“科罗纳”计划发展起来的返回和回收技术，为“阿波罗”登月飞船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4. 监视了苏联对第一阶段战略核武器限制条约的遵守情况。

5. 监视了中国导弹发射试验场、防空导弹阵地及水面舰队的情况。如 1964 年 10 月 20 日，即中国首次大气层核试验成功之后的第 4 天，装有 KH—4A 相机的“科罗纳”卫星拍摄了我国罗布泊核试验场的清晰照片。

6. 在 1967 年和 1971 年两次中东战争中，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提供了大量卫星侦察照片。

1967 年的 6 天阿以战争中，“科罗纳”卫星首次用于战术侦察。当年 6 月 16 日发射的卫星（分辨率为 2.7 米）按地面指令在 5 天内拍摄了从埃及到叙利亚整个中东地区照片。据以前一份列为绝密的报告透露，中情局图片判读重新向以色列提供了下述重要情报：“在 3 个阿拉伯国家的机场上发现共有 245 架飞机可能被摧毁，其中埃及 201 架、约旦 26 架、叙利亚 18 架”；“在埃及境内 35 个已知的地空导弹发射阵地中，有 30 个被卫星发现，其中 12 个装有地空导弹，5 个无法确认，9 个未装导弹”；“1 艘客轮在塞得港以南 5.5 公里处被击沉”。同样，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科罗纳”卫星也被用来监视中苏边境冲突和印巴战争。

1972 年，“科罗纳”计划被新的卫星侦察计划所取代。

间谍卫星与战略核武器似乎是冷战时期诞生的孪生宠儿。二者都被拥有它的国家视为最高的国家机密。但它们的使命却截然不同，前者是窥视敌方战略核武器及其秘密情报的航天密探。30 多年来，美国和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发射的数以千计的航天器中，绝大部分都属于间谍卫星。当然，目前仍在太空运行的各种间谍卫星，其技术水平和侦察能力远远高于已被解密的早期间谍卫星。

1995 年 2 月 24 日，美国现任副总统戈尔在中央情报局总部为揭开这一秘密而举行的尖端仪式上，首次公布了“发现者”号卫星拍摄的 4 幅绝密照片。他还宣布，美国政府批准将 1960～1972 年“科罗纳”计划中拍摄的 86 万张侦察照片全部解密。

这次解密的照片 86 万张照片，耗费了总长度为 640 公里的胶片，他们分别被装在 1.7 万个胶卷筒内，相当于在这 12 年中每分钟内拍摄一幅；其覆盖地球表面面积达 17.5 亿平方公里，相当于把当时的苏联覆盖了 88 次。实际上，这些照片中有 95% 为国外地区照片，只有 5% 是在美国本土上空拍摄的，而且有近半数约 40 万幅照片不同程度地被云层遮挡。这说明在早期可见光照相侦察活动中，可利用的侦察照片只有一半左右。

除上述 86 万幅照片外，同时解密的还有相当于 11 立方米体积的秘密资料，包括“发现者”卫星的技术报告、侦察目标、人物和射击资料等。

这批解密的资料已于 1995 年 10 月起由中情局分期分批移交给美国档案国家档案馆。

十八、与苏加诺过招

在艾森豪威尔的眼里，苏加诺最不可原谅的过错是他选择了中立，在冷战中不参与任何一方。艾森豪威尔认为，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实际就是倾向共产党阵营。

正像当时的其他领导者，如缅甸的吴努、埃及的纳赛尔、印度的尼赫鲁一样，苏加诺拥护新的不结盟运动。作为东道主的印度尼西亚，于1955年冬在万隆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

而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甚至指令美方人员不得同中方人员握手。正是杜勒斯本人亲手将改善美中关系的大门多次关上。例如1957年缅甸总理吴努告诉白宫，在他访问北京期间主动替美国讲了情，当时中方同意释放被关押的中情局特工约翰·唐尼和理查德·费克图二人。中方没有提出任何交换条件，只是要求美国允许一些新闻记者来访问中国，以增进西方对新中国的了解。然而，遭到杜勒斯的拒绝。于是，那两名中情局特务在监狱里一直熬到70年代。

苏加诺与苏联及其东欧国家交往，还邀请中国参加了万隆会议，这使美国极为仇视，这也是中情局采取秘密行动颠覆苏加诺政府的一个直接原因。

1955年初，中情局得到100万美元的款项，用来支持印尼玛斯友美党参加当年9月29日的全国大选。在香港黑市上，中情局将美元兑换成印尼货币“盾”，从而将预算批准的款额增值，相当于400万美元的数目。然而，在竞选中，印尼共产党获得了3405万选票中的600万张，远远超过了玛斯友美党。紧接着，苏加诺于1956年访问了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中情局的威纳斯对秘密行动部远东处处长说：“我认为我们收拾苏加诺的时机已经到了。”

1956年12月，印尼西苏门答腊和北苏门答腊的驻军司令官宣布“独立”，1957年3月，叛乱进一步扩大。这些上校们宣布该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并取代了文职政府。

中情局与印尼的叛军“有多条联系渠道”。比斯尔当时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据他回忆，至少在1954年，中情局就与印尼军方建立了秘密联系。他说：“我可以公平地说，凡与中情局打过交道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成了苏加诺的反对派。”中情局通过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在印尼军方和警方中招募了大量“希望为中情局工作的印尼人”，其中包括那些发动叛乱的地方军上校。

对于叛军提出的提供武器弹药的要求，中情局立即响应。“当威斯纳手捧一张付款单去找局长办公室的时候，杜勒斯兴高采烈地签了字。这张付款单使威斯纳能为印尼行动支取1000万美元”。不久，武器装备和3支特工队由美国潜艇运往苏门答腊。与此同时，中情局招募了300~400名美国人、菲律宾人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特务，驾驶一小队运输机和15架B—26轰炸机，支援叛军的行动。

11月30日，在中情局的支持下，印尼宗教团体“伊斯兰教国运动”对苏加诺行刺。当时苏加诺在两名儿童的陪同下离开一个为学校集资举办的义卖市场，5枚手榴弹向他投来，虽然苏加诺幸免于难，但有10人死亡，48名儿童受伤。约翰·杜勒斯决定吊慰死难者，并祝贺苏加诺幸存。他告诉艾伦·杜勒斯：“如果不这样做，会使人生疑。”

丑坏苏加诺

1955年，印度尼西亚国内进行大选，印尼共产党获得了1/4的选票。为此，苏加诺总统提出，印尼共产党在内阁成员中也应占1/4的席位；他还主张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实行“纳沙贡（即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的合作）”。鉴于苏加诺的“亲共倾向”，中情局决定采用“危地马拉政变”的方式推翻苏加诺政权。1956年，威斯纳指挥中情局计划处向驻扎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反对苏加诺的印尼叛军直接提供援助（一年后，中情局又以新加坡情报站为据点，策划了多起支持苏门答腊叛军的秘密行动，作为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也参加了这一秘密行动）。为了配合军事行动，计划处远东五组副组长约瑟夫·伯克霍尔德具体负责一项丑化苏加诺的秘密行动，作为政治宣传攻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情局根据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发现这位以“武士”精神著称的总统已坠入一名苏联女间谍的情网。有些人说苏加诺可能受到了这个女间谍的直接影响，或是被苏联克格勃抓到了把柄，对他进行讹诈，因此才不得不亲近苏联人。中情局决定利用这件事来大做文章，彻底败坏苏加诺的名声。

在社会上，人们对苏加诺总统的好色早有所闻，他的钱财和地位使他轻而易举赢得了许多多情女子的芳心。在印度尼西亚，妇女的地位十分低下，她们只是男子的附属品和寻欢作乐的工具；加上印尼有70%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在这个伊斯兰教的“千岛之国”，人们对于总统寻花问柳、娶妻纳妾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反感。按照伊斯兰教规，已有4房佳丽的苏加诺还可以再娶8个。

苏联为了投其所好，在苏加诺访苏期间，的确派出了一批色情间谍与其寻欢作乐，随后，克格勃的官员别有用心地邀请苏加诺观看他在床上颠鸾倒凤的春宫电影，企图以此讹诈他。没想到的是，苏加诺观看电影时，面色坦然，微笑着说：“电影拍的还不错，请你们再拷贝几部，我带回去欣赏！”弄得苏联人无可奈何，只好作罢。中情局当然不知道这些底细，还以为性讹诈对苏加诺有效果呢。

中情局的一伙“道德家”们要在印尼人民面前揭开苏加诺生活之谜，让人们看看总统如何与一个外国女人耳鬓厮磨，这并非是一般的生活方式，而是完全的堕落。如果这件事办成了，在国内，人民将会怨恨和反对总统；在国际上，将使同情苏加诺的人无地自容，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蔑视他。在这种形势下，印尼民众将揭竿而起，赶他下台。到那时，大家就会相信，印尼只有摆脱苏加诺的统治，国家才会兴旺发达起来。这就是中情局的一厢情愿。

此事该如何下手呢？参加该行动的一名中情局官员想出个主意：加工一部色情影片，经过改头换面，作为苏加诺的“宫廷轶事”来曝光，揭露他的淫乱生活。这个想法当即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请来中情局安全室主任谢菲尔·爱德华兹，要他协助完成这一任务。

爱德华兹与洛杉矶警察局关系密切，他通过对方搞来一部底片颗粒较粗糙的黑白影片，其内容是关于一名墨西哥男子迷恋上一位风骚女郎的浪漫故事。史密斯和参与推翻苏加诺政权的秘密行动的几名官员在华盛顿审查了这部片子，感到不满意。他们认为影片里的男主角“貌合神离”与苏加诺相差太远，而女主角只有迷人的性感，无法使人相信她确实就是那个克格勃的女间谍。既然现成的色情片子达不到既定要求，中央情报局只得自己动手拍摄片子，由罗伯特·马休负责制片工作。马休曾担任过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在

国内人头熟，经验也丰富。

中情局派人物色了许多戏子，但一直找不到满意的人选来扮演美丽的苏联女间谍，也找不到与苏加诺长相接近、且能模仿苏加诺举止言行的男演员。眼看拍片工作又要流产了……正当大家为此事一筹莫展时，洛杉矶警方又送来一些内容淫秽的影片，总算解了中情局的燃眉之急。影片中的那位男主角，皮肤黝黑，看上去很象墨西哥人，只要稍微修饰一下，即可乱真。中情局请洛杉矶警方设法找到了那个黑肤色、秃顶的男演员。苏加诺在公开场合总是带着黑色的“铜鼓”式帽子，苏加诺不带帽子时从不让人为他照相。负责制片的官员认为，苏加诺在床上不可能带着“铜鼓”帽，影片应将秃顶的苏加诺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既拆穿了苏加诺的虚荣心，还可以使影片显得更真实。经过一番周折和努力，一部以《快乐的日子》为片名，介绍苏加诺私生活的色情片拼凑成功了。中情局从影片中取下不少特写镜头，冲印成照片送到远东地区广为散发。人们看过照片后，都认为是某个恶作剧的人在苏加诺下榻的宾馆里秘密设置了照相机，从而把他在床上作爱、出乖露丑的淫态偷拍下来了。据说观看这部片子的人很多，票房收入不菲。

美国风味

1958年1月6日，苏加诺总统开始出国访问，中情局派遣特工人员密切监视他的行踪，企图寻机再做点手脚。

1月12日，苏加诺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在这次苏加诺出访的几个国家中，唯有开罗是中情局能窃听到苏加诺电话的地方。当初小罗斯福在帮助纳赛尔推翻法鲁克国王的日子，在开罗悄悄保留了一些从事秘密行动的设备及其秘密关系。

苏加诺下了飞机，刚到宾馆，便急不可待地给纳赛尔打了个电话。他先是情真意切地向纳赛尔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和感谢，随后他邀请纳赛尔马上到他下榻的宾馆来一趟。他说：“我这里有3位美丽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她们想开个小宴会，你能否也来热闹一下？”纳赛尔听了对方这番话，先是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稍停片刻，纳赛尔才醒悟过来，他不动声色地谢绝了对方的盛情，马上把电话挂了。显然，在对待女色上，纳赛尔要比苏加诺检点得多。

最初，当中情局得知苏加诺准备包租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进行出访和旅游时，曾经想到招募一名漂亮的美国空中小姐，让她有意靠近苏加诺，引诱他上钩；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甚至有可能以“美利坚风味”取代“俄罗斯风味”。可是时间太仓促了，已经来不及操办此事：那个空中小姐事先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她很难在献身时从苏加诺那里掏出有价值的情报。就这样，中情局最终未能将“美国风味”派上用场。据说那位应征的航空小姐因为没有让她去赴汤蹈火竟然痛哭失声……

苏加诺不孬

1957年上半年，中情局负责行动计划的副局长威斯纳责成乌尔默向驻扎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岛的印尼叛军直接提供军事援助。40年代末曾经担任驻雅典情报站站长的乌尔默，此时升任中情局远东处处长，他具体负责策划印尼的一些军官发动政变，企图推翻苏加诺。就在苏加诺外出的那段时间里，中情局与苏门答腊岛上的叛军首领们密切联系，加紧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而且还派出中情局的飞行员，驾驶B—26型轰炸机支援对方，这和中情局当年在危地马拉采取的行动一模一样。

2月，当苏加诺正在日本访问时，苏门答腊岛上的叛军宣布成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革命委员会。面临国内动荡不定的政局，色鬼苏加诺一点都不像中情局所想象的那样优柔寡断、弱不经风，而是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命令忠于他的军队向叛军发起进攻。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叛军节节败退。6月26日，印尼政府军攻占叛军的最后的“首都”、西里伯斯岛的万鸦老。

5月18日，中情局指派艾伦·波普驾驶B—26轰炸机支援岌岌可危的政变军队。在匆忙中，波普认错了目标，将炸弹投向一座大教堂，许多正在做礼拜的善男信女当场毙命，血肉横飞，惨不忍睹。随即，波普的飞机被印尼政府军击落，他被抓了起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都声称波普是个兵痞，矢口否认美国与反叛有任何联系。然而印尼人查获了波普的空军和民航公司的身份证，以及他按照该计划所签订的合同。铁的事实揭穿了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公开谎言。这一事件激怒了广大印尼人民。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矛盾进一步激化，杜勒斯下令：“必须尽快脱身。”就在比斯尔接任计划处处长职务前不久，中情局被迫终止了对苏门答腊叛军的支持。1958年6月，叛乱基本平息。这是中情局在大规模的隐蔽行动中第一次遭到严重挫折。波普在苏加诺的大牢里蹲了4年，直到1962年，在肯尼迪的弟弟、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亲自过问下，苏加诺才同意释放波普。波普回国后，在迈阿密由中情局控制的南方航空运输公司继续服务。

美国官方始终否认中情局曾经参与1956~1958年在印尼发生的军事叛乱。但是印尼人心里很清楚，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地的叛军得到了中情局支持。这一事实在对叛乱分子的审讯过程中更清楚了：参与叛乱的有数百名美国人、菲律宾人和中国台湾国民党特务。苏加诺不想和美国人闹翻，决定息事宁人，不了了之。他明白，一旦和美国公开闹翻，印尼将失去美国的物质援助。

1959年，中国西藏的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艾森豪威尔随即对中国的事务“越来越关切，”加上苏加诺对美国所表现的温和态度符合国务卿杜勒斯在远东推行的政策，出于美国在远东利益的考虑，华盛顿增加了对印尼的经济援助。华盛顿方面的立场是，只要苏加诺愿意和美国保持经济合作，不“投靠”中国或苏联，华盛顿就允许苏加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统治这个国家。

十九、中情局在非洲

(一) 卢蒙巴之死

联合国军进驻刚果(金)

1953年，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暗杀机构——第七计划处，由派遣到中情局的美国陆军军官鲍里斯·帕希上校担任处长。该处是政策协调办公室下属的一个“特别行动”机构，最初是一秘密行动组织，后来成了计划司。

政策协调办公室主任、第七计划处的上司弗兰克·威斯纳说：第七计划处的任务包括暗杀活动和“绑架‘铁幕’后面的人物……如果他们对现政权不满，我们的人为了他们的安全能够将他秘密护送出国；第七计划处也绑架那些碍于我们利益的人。”正如该机构的条文所说：“第七计划处负责暗杀、绑架和诸如此类随时可能由上级交付的职责。”威斯纳在一份备忘录中解释说：这是“一个与同行机构竞争的问题，如果需要，所有其他掌权者都搞暗杀。”

1955年，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由于周恩来因故未乘坐这架飞机，暗杀没有得手。这一事件的背后就是由中情局指使的。中情局曾经多次策划暗杀周恩来的秘密行动。

1960年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一年里，中情局策划了多起暗杀外国政府首脑的秘密行动，他们是：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拉菲尔·特鲁希略、伊拉克共和国总理阿卜杜拉·卡赛姆、刚果总理卢蒙巴。

但是这四起谋杀行动并未全部按计划如期行事：暗杀卡斯特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安排在1960年9月就已全部妥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秘密行动一拖再拖，直至1961年肯尼迪总统当政后才正式实施；1960年12月，中情局草拟了一份暗杀多米尼加总统特鲁希略的行动计划，但是特鲁希略并非死于这伙暗杀者手里，而是被中情局武装的另一伙“持不同政见者”在一次公路伏击中干掉了；中情局打算让技术服务室主任戈特利布把一块在毒液里浸泡过的手帕邮寄到伊拉克，然后设法转送到卡赛姆的手里，使对方中毒身亡，可是手帕没等寄到巴格达，1963年2月8日，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动了政变，翌日，卡赛姆被处决。只有卢蒙巴之死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1961年1月17日，卢蒙巴的死讯传到了华盛顿，那天正好是艾森豪威尔卸任总统职务的前五天。1月19日，艾森豪威尔与即将上任的肯尼迪举行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两人专门谈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60年代，美国在非洲的政策归根结底是排斥苏联和中国的势力。非洲已成为美苏角逐的场所。

1960年，包括刚果(金)在内的16个非洲国家纷纷宣告独立。刚果(金)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它在刚独立时，由全国仅有的13名大学生组成了政府。独立后的军队、行政机构和经济管理部门仍在比利时人的控制之下。比利时政府起初以为，允许刚果(金)独立是稳健之举，自己既可以从这块旧殖民地获得利益，又不必承担任何风险或责任。但是，几星期后，比利时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1960年7月6日，刚果(金)士兵哗变，要求驱逐比利时军官，当即发生了流血事件，不少本地人和欧洲移民在冲突中丧生。7月8日，比利时政

府悍然出动伞兵部队镇压刚果(金)军队,并支持和怂恿冲伯集团在刚果(金)南部最富庶的加丹加省宣布独立,成立了“加丹加共和国”,策动卡隆古成立了“开赛矿业国”。刚果(金)总统卡萨武布和总理卢蒙巴向美国发出呼吁,请求帮助。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如果美国单方面派兵插手刚果(金)事件,势必要引起苏联人出面干涉,只有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才可能防止苏联人的直接卷入。所以艾森豪威尔提议让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向联合国呼吁。7月14日,美、苏两国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向刚果(金)派遣联合国军队的决议。于是,1.5万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刚果(金),其中有1万多名官兵是美国人。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示联合国军不介入刚果内部事务。

“卢蒙巴就是卡斯特罗”

面临这种局面,帕特里斯·卢蒙巴发表声明,不论是谁,只要帮助他收回加丹加省,把比利时人赶走,他就愿意接受对方的支持。

卢蒙巴对联合国军拒绝进攻加丹加省以消灭分裂势力不满,于8月19日要求联合国军撤离刚果,并谴责了联合国、比利时和美国。他命令刚果军队讨伐开赛省,并向加丹加省推进,以维护刚果的统一。这一行动得到了苏联、中国、阿联、几内亚、加纳等国家的支持。这样,卢蒙巴开始向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靠拢。

华盛顿方面认为,卢蒙巴已有左翼倾向,他发表的这一声明正是他“公开寻求苏联人当奶妈的明证”。有人担心,卢蒙巴可能会把刚果(金)变成第二个古巴。中情局对卢蒙巴恨之入骨,认为他是造成刚果(金)局势动荡的罪魁祸首,“是黑鬼卡斯特罗。”

1960年8月18日,中情局驻刚果情报站向局长发回的电报说:“不论卢蒙巴是真的共产党,还是玩弄共产党游戏以巩固他的政权,刚果反西方力量正在迅速加强,采取行动以避免出现另一个古巴的时间已不多了。”艾森豪威尔及其重视中情局对刚果形势的判断,从此美国得出了“卢蒙巴就是卡斯特罗”,就是“俄罗斯黑鬼”的结论。

有关卢蒙巴的这些情况很快在华盛顿传开了,他简直成了声名狼藉的人。更有人说,卢蒙巴举止怪癖、落拓不羁、爱吸大麻,还相信巫术。7月底,卢蒙巴访问了华盛顿。在美期间,卢蒙巴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安排一名白人妓女来陪伴他。美国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反映说:“卢蒙巴讲话对不正面瞧着你,而是两眼朝上看。他能够操一口流利的法语,讨论问题时总是东拉西扯,与主题根本不相干,他似乎被一种想成为救世主的狂热劲头支配着自己的行动……他简直是个没有理性的人”。国务院曾经希望与卢蒙巴合作,但在他与狄龙会见后,一切成为泡影。

卢蒙巴受到冷遇,返回刚果(金)。由于不能从美国获得军火和支持,他便转向苏联,中国也表示支持他。苏联很快向刚果(金)送来了军事人员、技术专家、飞机、武器和弹药。卢蒙巴十分感激地接受了苏联人的援助。同时,他与赫鲁晓夫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刚果(金)。

1960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艾森豪威尔说:“我们必须让联合国军留在刚果,”如果把它赶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杜勒斯认为,卢蒙巴已被卢布收买。

8月25日,5412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中情局对卢蒙巴采取行动的方

当的行动的必要性表示出极为强烈的情绪，他想知道所制定的计划是否足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委员会最后“同意对刚果的计划不必排除关于采取任何能搞掉卢蒙巴的特定行动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和中情局在暗杀问题上的发言记录都是这样似是而非、模棱两可。5412 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任务就是仔细检查政策和计划，避免将总统牵扯进去或使他陷入困境。有些“过于敏感”的行动计划不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讨论，于是转到 5412 委员会去制定。该委员会“为掩盖记录提供了极好的方法，使国会或历史学家无法指出谁下令采取了那次行动，谁负有什么责任。”

8 月 26 日，杜勒斯向中情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现今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站站长劳伦斯·赫奇曼发去一份密电。电文中说：“上峰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卢蒙巴继续占据高位，结局将使刚果变得更加混乱，并为共产党接管刚果铺平道路，这将使联合国的威望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认为，干掉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我们国前秘密行动中优先考虑的大事。你与大使商量一下，设法得到他的帮助，如果发生了特别的情况，他不想插手这件事，他有权自行作出决定，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了”。杜勒斯还亲自在电报上签了字，这是中情局总部对外指示时极少出现的情况，可见其电文的重要性。当时比斯尔正在外出度假，不在华盛顿，但他和参与这一行动的中情局其他人员都很清楚，艾森豪威尔对卢蒙巴极其痛恨，把他看成是一条疯狗；总统迫切希望尽快解决刚果（金）的问题。因此，杜勒斯在给赫奇曼的电报中使用了最强硬的语气。

策划暗杀

9 月 5 日，刚果（金）总统卡萨武布解除了卢蒙巴的总理职务，据说是因为在 3 周前，卢蒙巴在苏联人的鼓动下毅然宣布与联合国断绝关系。卢蒙巴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说，刚果（金）已失去对他个人的信任，并斥责他与比利时人串通一气。与此同时，卢蒙巴邀请苏联人直接插手刚果（金）的事务。不久，刚果（金）的军队开始逮捕在那里的联合国官员。卡萨武布认为，卢蒙巴的所作所为是想篡权。大多数的联合国官员，包括美国人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也认为，这是卢蒙巴为了牟取个人的权利，想抛弃联合国的原则，进一步挑起刚果（金）内战的一个步骤。然而，卡萨武布与卢蒙巴之间的冲突很快被另一起突发事件掩盖了。

9 月 14 日，在中情局和比利时情报机关的双重策动下，刚果（金）陆军参谋长蒙博托上校发动军事政变，接管了政府权力。但卢蒙巴依靠国会和忠于他的部队，仍积极参与刚果（金）的事务。他本人将自己置于联合国军的监护之下。

鉴于上述情况，9 月 21 日，在有艾森豪威尔总统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说：“当前，蒙博托在刚果是一支有效的力量，而卢蒙巴尚未被搞掉，他的存在对我们是极大的危险。”杜勒斯用英语中含义不清的“搞掉”二字来表达中央情报局对卢蒙巴的处理意见，这既可被理解为“把他杀了”，又可理解为“使他在政治上彻底垮台”。那天会议上的备忘录中这样写到：“最后决定，处理和解决刚果（金）问题并不排除采取任何特别行动搞掉卢蒙巴。”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可以断定，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中情局的行动方案，决定暗杀卢蒙巴。

9 月份，按照比斯尔的命令，中情局的毒品专家、技术服务室的戈特利

布忙得不亦乐乎：在美国陆军特种化学部队的帮助下他收集、准备和配制了相当数量的生物毒剂。这是一种选择性生物毒剂，使非洲黑人极易患上一种致命性疾病。9月26日，他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到利奥波德维尔，把毒剂亲自交给暗杀行动负责人赫奇曼，用于干掉卢蒙巴。为了掩人耳目，中情局特别训练了两名非美国籍的职业杀手。这两名职业杀手被分开在美国接受训练，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训练结束后，两人又分别来到利奥波德维尔，从赫奇曼处领取了生物毒剂。赫奇曼知道此次暗杀行动十分复杂，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取得成功，他向中情局总部请求派一名执行官前来监督暗杀行动。比斯尔任命计划处下属的一个行动小组组长贾廷斯·奥唐奈前往利奥波德维尔担任执行官。奥唐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他与比斯尔和戈特利布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暗杀外国领导人的行动应当与维护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而且这类暗杀只能发生在迫不得已的非常情况下，由最高总司令，即美国总统亲自签署命令。因此，奥唐奈不准备将卢蒙巴置于死地。他对比斯尔说：“我不想直接参与暗杀卢蒙巴的行动。”但比斯尔坚持要他立即赶赴刚果（金）。因为就在蒙博托发动政变之后，在刚果（金）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保护为名，把卢蒙巴软禁起来，猎物已经到手了。最后，奥唐奈答应比斯尔，他准备去刚果（金），但不是为了去监督中情局暗杀卢蒙巴的行动，而是去确保联合国军把卢蒙巴转交给蒙博托处理。实际上，奥唐奈的这一决定完全是为自己考虑。此时，卢蒙巴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奥唐奈不想让自己的双手直接沾上卢蒙巴的鲜血，一旦刚果（金）人自己杀掉卢蒙巴，那事情就与他无关了。奥唐奈对比斯尔说：“刚果人的罪行还是让刚果人自己去审判吧！”为了确保自己的行动有人作证，临行前，奥唐奈去见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比尔·哈维和计划处付处长赫尔姆斯。他对赫尔姆斯说：“狄克，我这次去刚果办事，是比斯尔要我去的，我对他说，我不想把卢蒙巴杀了。”“你这样做是对的。”赫尔姆斯回答说。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总统和杜勒斯兄弟俩的批准，比斯尔决不会冒然执行暗杀卢蒙巴的行动，同时他也知道，中情局为了保护总统不因参与谋杀外国领导人的计划而受到谴责，一直奉行“似乎有理的否认”的理论：策划阴谋没有留下书面文字，商议和下达指令时往往采用“迂回曲折”的语言。这就为以后的否认和抵赖，留有回旋余地。所以，听了奥唐奈对他说的话后，他也不便多说什么。后来他也没有把奥唐奈的这些话告诉别人，因为在计划处，比斯尔一手操办着暗杀卢蒙巴的秘密行动，不让赫尔姆斯染指。

惨遭毒手

戈特利布等人到了刚果（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接近卢蒙巴和怎样使用毒药。一个方案是采用牙膏、牙刷，但他们不知道非洲领导人的牙齿卫生习惯。毒杀方式还涉及到毒药发作的时间。就这样，事情拖到了10月初。浑身罪孽的戈特利布认为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再不回美国，他可能会被杀掉去进刚果河里。于是匆匆离去。

10月7日，中情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向兰利总部发去一份电报：“戈特利布已经留下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将设法继续进行该行动。”10月15日，中情局总部发出回电：“或许可以派突击小组进行劫持（卢蒙巴），从河岸向悬崖上的那栋房子袭击……征求你们的意见。”10月17日，利奥波德维尔站回电：“无法向目标附近靠近，建议总部尽快送来外国造的配有望远镜瞄准器和消音器的机枪

.....”

尽管中情局作了缜密的布置，但卢蒙巴并没有落到中情局的手里。11月27日，卢蒙巴从联合国部队的监护下逃脱，他准备到斯坦利维尔重新率领他的支持者与蒙博托和联合国的军队抗争。赫奇曼将卢蒙巴的计划报告给蒙博托，并配合他的军队设置路障拦截卢蒙巴。不幸的是，3天以后，卢蒙巴落入蒙博托的手中。

在刚果(金)的中情局人员担心卢蒙巴会再次从蒙博托手中溜掉，于1961年1月13日从利奥波德维尔向中情局总部发报：“卢蒙巴可能会利用他的打手队和舆论宣传，利用目前联合政府中出现的一系列的失败情绪来确保国会对自己的支持。.....当前，拒绝采取极端行动将导致美国在刚果(金)政策的失败。”

1961年1月17日，卢蒙巴被押解到加丹加省首府伊利沙伯维尔。“由于遭到严刑拷打，在拖下飞机时他已是奄奄一息了”。没过几小时，卢蒙巴就被冲伯集团杀害，尸首随即焚烧掉了。卢蒙巴的许多追随者也在伊利沙伯维尔机场遇害，这里由此以“屠宰场”而闻名。

1月19日，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兴奋地向中情局总部发出电报：“感谢帕特里克(爱尔兰的守护神)，如果我们知道他要来的话，我们一定会烤一条蛇来款待他，”

一贯与美国不和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在得知中情局假手冲伯集团杀害卢蒙巴之后，愤愤地指出：“这是比亲手杀人更卑劣的犯罪。”

(二) 把牢底坐穿

当今的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是南非著名的黑人运动领袖，他曾在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监狱里度过了28年的铁窗生活。

纳尔逊·曼德拉1918年生于南非的一个部落酋长的家庭。他学过法律，并于1952年在约翰内斯堡当开业律师。

1944年，曼德拉加入主张非暴力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后来成为该组织的主席和军事总司令。残酷的斗争现实使曼德拉及其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放弃了非暴力的主张，1961年，半地下性质的“全非洲人国民行动委员会”成立，曼德拉被指定为该组织的名誉书记，继而又成为以破坏行动力斗争方式的非洲人

国民大会武装部“民族之矛”的领导人。

1962年8月，曼德拉被南非当局逮捕以煽动和非法出国罪被判处5年徒刑。1964年，法庭改判曼德拉终生监禁。

关于曼德拉被捕的经过，多年来一直众说纷坛。有人说他是被黑人同胞出卖的，也有人说他是因交通违章被南非警察偶然捕获的。然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电视新闻却以确凿

的证据，揭开了曼德拉被捕的真相。

1987年8月25日，在曼德拉被捕25周年的日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里，播发了该公司驻巴黎记者詹姆斯·汤姆林斯发回的电讯：“.....毫无疑问，曼德拉是被一名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美国人出卖的。”CBS还根据“美国消息来源”指出，这个美国人就是当时美国驻南非德班领事馆的官员唐纳德·里卡德；此人目前已经退休，隐居在科罗拉多州帕果萨泉。CBS的记者采访了他，但他以“此事涉及国家安全”为借口，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因为每一个中情局的成员都曾宣过誓，终生不得泄露

他们所掌握的机密情报。

1958年至1962年，唐纳德·里卡德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德班领事馆的官员，实际上是中情局的特工人员。在南非的4年里，他奉命伪装同情黑人运动，骗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信任，打入了该组织内部，并得以同南非国大的领导人频繁接触。1962年8月上旬，里卡德与南非国大领袖曼德拉约定，8月25日在纳塔尔州霍尔维克镇会面，商讨由里卡德向南非国大提供资助的问题。但是，里卡德却把这一计划报告给德班安全局的丹尼·贝斯特上校，并提供了曼德拉的化名，以及他驾驶的汽车牌照。结果，南非警察以检查车辆为名，在霍尔维克小镇的郊外公路上，抓到了化名为塞西尔·威廉斯的纳尔逊·曼德拉。从此，曼德拉身陷囹圄28年。唐纳德·里卡德是中情局的特工，这一点没有疑问。在美国国务院保存的一份情报机构人员名册中，就有这个名字。此外，在1968年民主德国情报专家朱利叶斯·马德尔编纂的《名人传》中就收入了里卡德的名字前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员约翰·马克在《如何识别暗探》一书中也提到过里卡德。就连中情局的一位前高级官员也不否认里卡德是中情局的成员。当年与里卡德同在德班领事馆的另外两名官员也是中情局的特工：唐纳德·卡斯蒂尔和约翰·伦霍尔。这两人后来都成为情报研究专家，现已退休。

曼德拉被捕后，里卡德已不适合继续留在南非。于是，中情局命令他返回美国，后来又前往缅甸和南朝鲜。在里卡德离开南非的前夕，其密友、中央情报局特务、联合国军上校麦克·霍尔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告别晚会。参加晚会的有霍尔夫妇，还有几名记者：G·H·卡尔品，布赖恩，罗伊·拉顿等。

里卡德在这次晚会上，出于“炫耀”自己，泄露了他出卖和诱捕曼德拉的事情。罗伊·拉顿后来对约翰内斯堡《星期日时报》记者说：“我不敢肯定他是否谈过曼德拉的事，但他肯定说了不少有关南非国大的事情。比如，他自称认识一名制造了《纳塔尔人报》报社炸弹爆炸事件的人。”南非《论坛报》根据拉顿的谈话报导说：“里卡德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灵通人士，他对有关黑人激进团体的行动计划简直是了如指掌。”

拉顿还对记者说，“我早就确信里卡德在力中央情报局工作。当我还在《星期日时报》作新闻编辑时，里卡德前来看我，要求委任一个叫麦克·霍尔的人作该报驻刚果（注：扎伊尔）记者。”他说：“我签署了委任书。本来指望这个叫霍尔的人能为我的报纸发回一些有关刚果战事的报导，然而，他从来不曾这样做过，鬼知道这家伙在刚果干什么。”

事实上，这个麦克·霍尔当时正以上校的军衔，在刚果（金）指挥“联合国军”作战。

关于里卡德出卖曼德拉一事，《星期日时报》曾采访了当年担任德班安全局头目的丹尼·贝斯特上校。贝斯特声称他与里卡德有“私人交情”，他不能肯定里卡德当年曾向他透露过曼德拉的情报，但是“我们肯定经常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帮助”。这种说法当然是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一种推诿之词。事实上，里卡德确实向贝斯特提供了曼德拉的行踪，作为交换，他从贝斯特手里得到了南非政府的“班图斯坦计划”这一绝密情报。

里卡德高兴得太早了。没过几天，就有人把他在晚会上泄露机密的事报告给美国大使馆。于是，里卡德被召到比勒陀利亚，受到美国大使馆官员以及南非安全局的斯沃特上尉的严厉盘问。据一名当年参加过审查里卡德的南非退休警官回忆，“里卡德作了可怜巴巴的陈述，否认他曾说过有关曼

德拉被捕事件的话。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只不过是一个自知有过的人所作的虚弱抵抗。告发者报告的情况，加上出席晚会的其他客人的旁证，足以证明：他的过错是十分明显的”。后来，在那大出席晚会的记者卡尔品还为中情局写了书面证明材料，证实里卡德确实在客人面前炫耀过他在曼德拉被捕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至今回避曼德拉被捕一事，但上述事实已经清楚证明：

1. 里卡德的确出卖了曼德拉；
2. 里卡德是奉命行事，其命令来自中情局；
3. 南非白人当局“经常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帮助”，相互勾结，镇压黑人运动。

1989年，坐牢28载曼德拉终于被释放。不久在大选中一举夺魁，当选为南非总统。

（三）渗透坦桑尼亚

1964年1月爆发的桑给巴尔革命使中情局感到极大的恐慌。非洲——设拉子党很快接受了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援助，大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和外交人员接踵而至。美国国务院与中情局一样感到忧虑，认为这又出现了一个古巴。国务院在一份情报报告中说：“大方不用花多大力气，便可在那里创造出经济进步的表象，并以这块小地方作为宣扬共产主义的橱窗。正如美国以波多黎各来宣扬自由企业的优点一样。”

为遏制共产主义，中情局考虑了3个方案：1. 对桑给巴尔进行封锁；2. 加强美国在该地的存在；3. 以援助或“不请自到的军事入侵”把共产党国家挤走。经过研究，第1和第3方案被排除了，因为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进而“导致大部分非洲国家出现更大的反对西方的情绪”。最后决定采纳第2方案，以增加援助、贷款和表示友好的方式加强美国在该地的存在。这一方案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公开的，要求所有驻盟国的美国大使吁请驻在国政府在桑给巴尔建立使团，以加强西方的存在，并提供援助。二是秘密的，中情局着手收买桑给巴尔左派领导人。第一个目标是该岛新任外交部长，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阿布杜勒·拉曼·穆罕默德·巴布。

1964年3月，巴布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一个贸易和发展会议。一天晚上，在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中情局的一个官员以美国某大船运公司代表的身份在洲际旅馆与巴布搭讪。这位中情局官员说他的公司愿意帮助桑给巴尔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他知道桑给巴尔可能与印度尼西亚签订出口丁香的合同，但桑给巴尔没有船运公司，运输便成了问题。他的公司有意与桑给巴尔签署协定，以非常合理的价格提供租船。巴布回答说他将向政府报告此事，政府肯定会给予考虑。

接着，这位中情局官员便揭掉了他的外层伪装，说：“关于你的情况，我们想作为个人帮助你。我们知道你们对某些国家，比如中国很感激，因为他们提供了帮助。我们想帮助你们取得真正的独立，因为只有真正的独立，你们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潜力。”巴布饶有兴趣地说：“啊，啊。”“那好，”中情局官员说，“我们想在瑞士为你开个来往帐户，第一次存款为300万美元，对此满意吗？”

巴布自然未作任何承诺。中情局的人步步进逼，“考虑考虑也好，我们将在桑给巴尔与你联系，等你的回答。嗯，对了，还给你带来了一件小礼物

——一块劳力士金表，请收下，算作我们认识的纪念品。这是表的保单，请注意，上面有表的数码。我们的人在桑给巴尔见到你时，他会说，‘你在哪里搞的表，很好’。你回答‘是的，我在日内瓦弄的’。他听后便会拿出保单。保单上的号码与你表上的数码相同。如果我们的人先打电话给你，他会说他是马塞林诺，来自米兰，当你确定他是我们的人时，你可告诉他你对300万美元的决定，并顺便告诉他一点你认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情况。你明白了吗？”巴布回答说听懂了。结束谈话时，中情局的人从衣兜里掏出一叠100美元的钞票。“我忘了，你在这里肯定需要花钱，这是2万美元，这样你就不用为我们办事而自掏腰包支付了。”

巴布收起钱和表。他一返回桑给巴尔，立即晋见总统卡鲁米，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交出了2万美元和劳力士金表。几周后，把布在内罗毕接到了“米兰来的马塞林诺”的电话，后者说他现在在达累斯萨拉姆。两人商定第二天在桑给巴尔见面。当巴布返回桑给巴尔时，“马塞林诺”虽曾到过但没有会面，因为这一行动被国务院制止了，国务院决意以自己的政治手段解决桑给巴尔的问题。

国务院的政治手段是说服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使他们认识到在东非海岸出现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对他们政府的安全和稳定是危险的，然后由这3个国家说服卡鲁米，使他认识到，除非他与附近的一个大陆国家结盟，否则他政府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把他推翻。后来的局势正照国务院的意图发展。在美国的促成下，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只担任一些次要的职位，有些人后来被投入监狱（巴布因参与1972年试图推翻卡鲁米的流产政变，被判刑6年，卡鲁米也在政变中被杀。1978年，巴布被释放，现住在美国和英国）。

中情局在坦桑尼亚的活动还算是“文明”的，更有甚者就是以刀兵相见。1966年，趁恩克鲁玛总理访华期间，中情局策划加纳军人发动政变，将吃人肉的阿明推上台，建立了军人独裁政权；1970年11月22日，中情局策划一伙武装分子乘船偷偷在几内亚登陆，妄图发动暴乱，由于消息泄露最终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在非洲发生的50多次政变中，中央情报局插手参与了90%以上。

50年代中期，中情局的非洲处只有几十名工作人员，到了70年代初，已达到400多人。

二十、黑手

拉洲历来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后院”，不容“叛逆”政权存在。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之死就是一个明证。

30年代，特鲁希略在美国的支持下上台，建立了军人独裁政府，其血腥残暴闻名世界，素有“加勒比狼狗”之称。50年代末，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串通特鲁希略参加反对古巴的秘密行动。

然而到了60年代初，美国与多米尼加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其原因是，特鲁希略取消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圣多明各经营香蕉、咖啡和可可的垄断权。而且，为了预防美国在经济上进行讹诈，特鲁希略还同东欧国家保持了贸易联系。从此，特鲁希略便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他创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叫做多米尼加海外公司，该公司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设备。“加勒比电台”的新发射机就是来自于捷克斯洛伐克。他还派遣经济代表团去莫斯科，这就更是“大逆不道”了。

在华盛顿，人们差点透不过气来：有个古巴就够受的了，现在又冒出个多米尼加，美洲岂不要赤化了吗？

在中情局眼里，特鲁希略就是个左翼危险分子。于是有人建议搞政变，但形势不允许：因为自从特鲁希略把温和派巴拉格推上总统宝座之后，得到了国内的一致拥护，而且他还实现了全国联合，让一些社会主义者参政，这就更加扩大他的力量。经过研究，中情局决定采取“老式的枪杀”来除掉特鲁希略。

1961年3月，原古巴独裁政府头子巴蒂斯培的朋友罗塞利（美国黑社会首领）在中情局特别行动处特工霍华德·亨特的陪同下秘密来到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他们与温皮、安迪斯和迪尔伯恩见了面。前者是当地的一个超级市场老板，其余两人是美国国务院的特派员。他们在一起研究了干“湿活儿”的具体方案（“湿活儿”指使用流血手段的行动）。

在巴拉格总统的支持下，中情局与美国黑手党召来的杀手在华盛顿大街布置了埋伏。事前，中情局已经秘密将武器运进了圣多明各。

1961年5月30日，特鲁希略乘坐雪佛莱牌轿车行驶在华盛顿大街上，两名多米尼加杀手的汽车在后面隐隐跟踪。接近伏击地点时，这辆汽车很快追上了特鲁希略的轿车。它的前灯闪了几下，像是要超车似的。雪佛莱轿车放慢了速度，向右靠了靠，但是那辆汽车还在闪灯而不超车。实际上，这是利用闪灯向前方的伏击者发出信号。这辆汽车把雪佛莱牌汽车逼向预定地点。接着，这辆汽车并肩向前行驶。杀手德拉马萨从车窗向特鲁希略开枪。就在雪佛莱牌轿车加大油门，不断左右摆晃以躲避子弹的时候，前面突然射来一股强光，使特鲁希略的司机睁不开眼睛，他只好猛地一拐弯，向返回的公路急驶。这时，特鲁希略受伤，他坚持要司机停车。接着，特鲁希略爬下来靠在汽车上，向杀手们开火，打伤了其中的5个人，终因寡不敌众被乱枪打死。迪亚斯将军把特鲁希略的尸体塞进自己汽车的行李箱中……

特鲁希略死后，多米尼加国内局势混乱，各派政治组织和团体纷纷涌动，准备夺权。这时，中情局慌了手脚，生怕左派一举上台。他们竭力鼓动特鲁希略的追随者反对左派势力，并设法打入左翼政党，混进他们召开的会场，从中制造混乱。在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里，中情局的68名特工和顾问来到特鲁希略城，帮助巴拉格镇压群众罢工和示威游行。然而，巴拉格的军队已经

失控，他们掉转枪口迫使巴拉格辞职，成立了由国务委员会领导的政府。

暗杀特鲁希略一事后来在美国国内被揭露。面对舆论的谴责，中情局的高级官员辩解说，虽然中情局曾经策划过暗杀行动，但是失败了；杀害特鲁希略的那伙人并非中情局所雇，因此与中情局无关。然而，凶手丢在现场的美制武器是任何人都无法抵赖的。在多米尼加国内，所有的合法枪枝都是经过登记注册的，而凶手们所使用的这些美制武器在多米尼加过去从未出现过，更不用说登记了，显然它们都是非法偷运进来的，而且是由中情局提供和偷运进来的；此外，中情局与这伙行动成功的杀手有联系，“并进行过多次接触”……这些铁的事实，中情局在后来都被迫承认了，但就是不承认与特鲁希略之死有关系，因为中情局“没有直接参加暗杀行动”。难怪有人称中情局是“无赖大学”。

在西方情报界，“黑手”是指专门给他人出谋划策或下达指令，而自己却不直接参与动手的人。由此看来，把中情局称为“黑手”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二十一、冥王星计划

两届总统，一脉相承

1959年，卡斯特罗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了革命政府。随后征收了美国和古巴大庄园主的土地，并将外国（包括美国）和古巴的所有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这些措施激怒了美国人。从此，古美两国关系日益恶化。1961年1月，美国宣布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关系，4月，便发生了“猪湾事件”。艾伦·杜勒斯就古巴问题同艾森豪威尔总统频频碰头。在助手们的陪同下，杜勒斯带着古巴糖厂的彩色分布图去向总统汇报破坏古巴食糖生产的行动计划。艾森豪威尔耐心地听完后说道：“艾伦，这很好，但是你要搞垮卡斯特罗，不要老是围绕着糖厂浪费时间。我们应该制定一个方案，真正能对卡斯特罗干出点名堂来！”中央情报主任干脆地回答说：“是的，先生！”

中情局入侵猪湾的计划是在1960年3月由比斯尔草拟、同月14日提交给5412委员会的。该计划代号“冥王星”，包括4部分：1.建立一个“可靠的和统一的”古巴流亡政府；2.发动“强有力的宣传攻势”；3.建立一个能够“响应”流亡政府的“古巴秘密情报和行动组织”；4.“在古巴境外建立一支准军事部队，为将来的游击活动做准备”。

3月17日，艾森豪威尔在与艾伦·杜勒斯以及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讨论后批准了这一计划。艾森豪威尔特别强调了第1点，要在古巴流亡人员中物色到一位领导人来组织流亡政府，以领导反卡斯特的秘密游击行动。

根据“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行动计划”，准备挑选25名年轻力壮、精明强干的古巴难民进行特殊训练，让他们作为首批游击队员潜入古巴，然后再训练30~35名古巴流亡人员，作为增援力量派往古巴。这些掌握破坏手段和通讯技术的特工潜入古巴后，便与当地反卡斯特的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向他们提供来自美国的物质援助，结束冬眠，恢复元气；作为“第五纵队”储备力量，当国外反政府武装打回古巴时，即可里应外合，加速现政权的垮台。这项训练工作由比斯尔的副手特雷西·巴恩斯和J·C·金上校具体负责。最初的训练营地在迈阿密郊外，但这里的环境对保密十分不利。当地的居民能够经常看到古巴人在训练，并听到营地内大喇叭的声音，有一次，居民们开玩笑，把一些鞭炮扔进营地，古巴流亡者以为自己受到了攻击，于是一面开枪，一面从营房蜂涌而出……结果，一个恶作剧者受了伤，一些古巴人被逮捕。由于联邦政府暗中说情，地方法官才撤销了对他们的控告。但迈阿密报社风闻这个消息，并得知该营地与中情局的关系。于是杜勒斯局长会见了报社的记者和头头，说服他们删掉了这篇报道。

为了保密起见，比斯尔于5月在巴拿马运河区选择了一个隐蔽的训练地点。破土动工后，准备在7月份实施训练项目。然而，建设工程一直拖到年底才完成，整整耽误了5个月的时间。第一批接受训练并达到要求的古巴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小组。他们开始执行任务，在古巴北部海岸成功登陆，可是潜入境内不久，即被古巴的秘密警察跟踪和发现了，其命运可想而知。

7月，比斯尔在危地马拉又建立了一个训练基地。中情局雇佣了20名教官，其中包括东欧人、墨西哥人和台湾国民党特务。首批新兵有160人。

为了解决秘密运输问题，中情局以低价获得南方空运公司公开发行并已售出的全部股票，这样，中情局在美洲有了自己的民航公司。但由于飞机机务人员数量不足，中情局违背了总统关于不使用美国人参加战斗的命令，要

求亚拉巴马国家空中警卫队司令多斯特为其招募了 80 名美国人参加 B—26 轰炸机和 C—54 运输机的飞行。

1960 年 8 月 18 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 1300 万美元的补充预算并同意调用国防部的人力和装备进行猪湾计划的准备工作，同时他再三强调在古巴反政府武装中要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这是实施猪湾入侵以及成立古巴流亡政府的先决条件。为此，比斯尔

一伙费了不少气力将所谓“革命阵线”和“人民革命委员会”合并成一个组织——“古巴革命委员会”，由前古巴政府领导人卡尔东出面坐镇，招降纳叛（后来有人批评该组织太狭隘，没有吸收另外 116 个古巴的政治小集团）。

比斯尔的行动规模大大扩充了。因此，他将训练营地转到危地马拉的加勒比沿岸，一共建立了 3 个训练中心。在训练期间，比斯尔在离洪都拉斯海岸 110 英里、古巴西南方向 400 英里处的斯旺岛还建立了广播电台。比斯尔配备的这部 50 千瓦电台的功率很大，可覆盖整个加勒比地区。电台为了表明其“公正的立场”，对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和古巴的卡斯特罗都进行了攻击。

艾森豪威尔在他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时间里，对推翻卡斯特的秘密行动方案抓得很紧。1960 年 11 月 4 日，中情局决定，进攻古巴的流亡人员武装扩大到 600 至 750 人，配备重武器；进攻前先从尼加拉瓜基地向古巴军事目标实施空袭，然后在古巴登陆。中情局这项新计划实际上是未来肯尼迪政府发动猪湾入侵的核心内容。

1960 年 12 月，商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摆在中情局的面前，1. 派遣人员进入古巴，煽动民众造反，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宣传活动难以取得成功；2.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任期即将届满，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只有等新总统上台后，得到批准方可行事。令中情局头目感到欣慰的是，新上任的总统是肯尼迪，此人颇有一番雄心，他不会过分责怪中情局的行动。

12 月 6 日，即将卸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与肯尼迪进行第一次工作会议时，艾森豪威尔向肯尼迪介绍了国家的安全机构和策划的一些秘密行动，其中谈到了古巴问题。艾森豪威尔极力主张新总统支持中央情报局资助、装备和训练古巴流亡部队，以备入侵古巴时使用。1961 年 1 月 19 日，肯尼迪宣誓就职的前一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艾森豪威尔建议肯尼迪尽快批准中情局入侵猪湾的计划。在此之前，肯尼迪已经收到了杜勒斯呈交的有关入侵古巴秘密行动的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竭力向肯尼迪鼓吹对古巴采取武力行动，而且必须抓紧时间，不能拖延。理由是：

1. 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已经训练完毕，焦躁不安，急于行动，已经难以控制；

2. 危地马拉国内压力很大，不久将不得不关闭这些训练基地。

届时，这批古巴人如果还不能回到古巴，就只好送到美国来。这样他们就会广为宣传、表示他们的不满；

3. 不久之后，古巴军队将取得苏联的装备，在苏联受训的古巴飞行员也将回到古巴；大批米格式战斗机已经运抵古巴，时间不等人。基于以上理由，加上国内的考虑，肯尼迪决定实施入侵计划，在政府内部明确反对这一计划的只有施莱辛格和助理国务卿鲍尔斯。

此时，美国入侵古巴的行动计划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肯尼迪还

提出了一个必须搞下去的理由就是，那些古巴难民已是尾大不掉，美国要摆脱他们，“把他们扔到古巴，总比把他们留在美国好”。

这个计划中的关键在于，它既是美国一手策划、一手包办的，而美国又坚持不抛头露面。

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 3 周后，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出席宴会的有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和新总统的十几名高级助手。酒过三巡，两班人马之间增加了了解。中情局的官员神吹大侃他们腾云驾雾般的秘密功绩，总统幕僚们听得目瞪口呆、如痴如醉。杜勒斯巧妙地让各司负责人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树立了“良好形象”。这场表演结束后，比斯尔对杜勒斯说：“我是你领导下的吃人鲨鱼！”

1961 年 2 月，上任伊始的肯尼迪与阁僚在一起多次推敲中情局入侵古巴的方案，到了 3 月份，中情局入侵古巴的方案已发展成为一个大胆的设计，即准备组织一个约有 1500 名古巴流亡者参加的代号为“2506 旅”的部队，该旅装备着坦克和飞机，在古巴进行两栖登陆，占领滩头阵地，摧毁卡斯特罗的武装力量，然后向纵深发展。肯尼迪对这个诱人的设想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该方案的风险性相当大，胜负难卜，一旦失败，在政治上声名狼藉，窘迫被动，局面不堪收拾。然而，他急欲在他上任的 100 天内创下惊人之举，借此来造就一个年轻有为的美国总统的形象，从而弥补自己仅以多出 11.4 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击败竞选对手尼克松的苍白面孔。如果在上任伊始，就推翻一个共产党政权，还有什么比这更吸引人的呢？想到这里，肯尼迪动心了……

3 月 11 日，肯尼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讨论猪湾行动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情局的杜勒斯和比斯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以及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官员。总统顾问小阿瑟·施莱辛格也出席了会议。

海军陆战队上将戴维·M·肖普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一事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向总统和周围的顾问们问到：“先生们，你们知道古巴到底有多大？”人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肖普把按同一比例缩小的古巴地图覆盖在美国地图上面，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惊愕地发现，古巴的面积要比美国的长岛大得多。然后，肖普又把一小块东西放在古巴的地图上面，他身旁的人疑惑不解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是塔拉瓦岛，”肖普严肃地说：“塔拉瓦岛的面积就这么大，可是我们出动了 1.8 万名海军陆战队员，花了 3 天的时间才拿下它。”肖普将军当然不是要考问大家的地理知识，他的真正用意是提醒人们，入侵古巴绝非轻而易举，此次军事行动必须清醒而谨慎。

在这次会议上，只有总统顾问施莱辛格一人反对中情局的入侵方案。会后，他特地写了一份备忘录给肯尼迪，说明了他的反对意见。其余的到会者，包括那些身经百战、肩上佩戴肩章、胸前挂满勋章的将军们都赞成这次冒险行动。肯尼迪被这些军事权威和情报头目们的一致意见镇住了，他有点紧张和不安起来。比起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军事知识少得可怜，他不知道取得一项军事行动的胜利，到底需要做多少事情，只是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小心对待。肯尼迪的想法是，让古巴人自己去和卡斯特罗较量，一旦斗败卡斯特罗，成立了新政府，美国立即予以承认和支持，这样就可以避免外界认为美国卷入并一手操纵了这一事件。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肯尼迪终于同意了行动方案，条件是美国不直接插

手。这显然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决定，愚蠢透顶。要让 1500 名古巴流亡人员抵抗 20 万名卡斯特罗的正规军，来守住猪湾这块滩头阵地，如果没有美国武装部队的全力支援，简直是天方夜谭。（猪湾，旧译吉隆滩，位于古巴北部沿海一带沙滩，附近是沼泽和灌木林。）

争抢头功

中情局的入侵计划得到肯尼迪的批准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行动了。杜勒斯要曾经帮助比斯尔拟定军事行动计划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杰克·霍金斯到中情局来工作，让他和巴恩斯两人拟定新的入侵猪湾的方案。然而，这两个人并不是理想的一对。霍金斯是地地道道的行伍出身，他作为军人，强调的是军事方略和军事手段；他认为中情局要他制订的是登陆的军事行动，他只需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其他的事与己无关。所以在他制订的登陆方案中提出，只要有 800~900 名古巴人强行登陆，便可成功。却没有考虑到登陆后的一系列后勤保障工作。巴恩斯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曾经空降到法国的敌后从事秘密活动。后来他到了瑞士，在杜勒斯手下搞策反和地下情报活动。从那时起，巴恩斯和杜勒斯的私人关系日益密切起来。有人认为，并不是巴恩斯的才干超群、能力过人，而是他与杜勒斯之间的私人关系使巴恩斯成为中情局的红人。在仕途上一向顺利的巴恩斯在制订计划时只看到入侵行动必胜的乐观前景，却没有想到入侵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

在这段时间里，比斯尔正忙于“发现者”号卫星和 SR—71 超音速高空侦察机的研制工作，可是他又不让负责秘密工作的副处长赫尔姆斯过问入侵计划的制订和准备工作。赫尔姆斯心里很明白，不论入侵成功与否都将给中情局带来不利影响。他特地去找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罗杰·希尔斯曼，讲出了自己的忧虑：入侵古巴的行动计划已经出现失控现象，比斯尔独揽大权，不让情报处长艾默里和谢尔曼·肯特插手此事。赫尔姆斯希望希尔斯曼通过他的影响来挽回当前的局面。希尔斯曼毕业于西点军校，在二战期间就已是很有名气的从事游击战的官员了。大战结束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国际问题教授。自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希尔斯曼担任了国务卿助理。赫尔姆斯认为，有关入侵古巴的行动应采取哪些军事步骤，希尔斯曼完全有资格与霍金斯上校争辩。但希尔斯的进言无人理睬。赫尔姆斯在计划处越来越孤立，尤其是他对中情局入侵古巴的计划大泼冷水，引起了杜勒斯和比斯尔的不满，他们曾考虑把赫尔姆斯调离计划处，去接替狂躁病日益严重、精神越来越抑郁的威斯纳，出任中情局驻伦敦站站长。然而，赫尔姆斯的丰富经验和冷静态度，不仅使他避开了即将来临的一场暴风雨，而且他的一些真知灼见使自己名利双收。赫尔姆斯在当时坚持：“一定要让安格尔顿的反情报处插手这次入侵行动的内部安全问题。”后来事态的发展使中情局的首领们认识到赫尔姆斯是对的。加强中情局内部安全、严守入侵计划的秘密比起其他事情来实乃首要。一次，中情局的秘密信使遗失了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里面有中情局在古巴的特工人员和联系人的名单。还有一次，担任中情局与在迈阿密古巴流亡人员总部联络工作的特工格里·德罗勒正在一家宾馆的客房里与人讨论入侵古巴的事情，正巧被一名美国秘书小姐偷听到了。这个诡计多端的女秘书，贴着墙把偷听到的内容记在本子上，交给了她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哥哥。后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借机在中情局的背后捅了一刀（中情局与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历来不合，仇隙颇深）。

比斯尔狂热地张罗着军事冒险行动，自有他的目的：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比斯尔就期待着能有那么一天接替杜勒斯，坐上中情局第一把交椅。比斯尔与肯尼迪的弟弟、担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交情甚笃，他们属于同一代人，相互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比斯尔看来，秘密行动的效益往往是立竿见影，此次行动如果成功，无疑是给自己脸上贴金，锦绣前程指日可待。

分 歧

由于霍金斯上校和巴恩斯在制订入侵行动的军事计划时出现了分歧，比斯尔和巴恩斯只得再次组织力量，加快方案的制定。比斯尔急欲立即实施军事入侵，以免夜长梦多，万一让卡斯特罗知晓中情局这一秘密行动，苏联就会加紧向古巴提供飞机、坦克和武器弹药，中情局势必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不久，入侵行动的草案拟定出来了，但这份草案并非尽善尽美（当然，如果后来肯尼迪全力支持的话，仍有可能取得成功）。比斯尔先把草案中的几个主要环节向总统的亲信邦迪作了介绍：古巴流亡人员首先强行登陆，迅速抢占滩头有利地形，建立一个环形防线。只要能抵挡住卡斯特罗空军的攻击，守住滩头堡这块阵地，那么，等候在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政府就能带着援军赶到古巴。这时，美国公开承认古巴新政府，同时出兵支援滩头堡的古巴流亡者向哈瓦那挺进，夺取政权。尔后，比斯尔又把上述计划向总统作了汇报，并对他说，古巴流亡人员的战斗力很强，士气很高。肯尼迪听后则强调，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事应当让古巴人自己去干，不要让世人知道美国在插手。比斯尔和巴恩斯心里很清楚，这次行动如果没有美国的轰炸机对登陆人员提供空中支援，要保证行动成功是不可能的。

1961年3月底，肯尼迪召开了第二次“猪湾行动”的大型讨论会，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国务卿腊斯克不在国内，由副国务卿鲍尔斯代他出席会议。会上，杜勒斯和比斯尔把新草拟的军事行动方案向到会者作了介绍，鲍尔斯惊呆了，他不知道美国正准备从事这样一项秘密行动。他当即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入侵方案不合法、不道德、不可行，有损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形象。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也反对这个方案。后来，鲍尔斯向腊斯克提议，应把杜勒斯的局长职务撤掉。

4月4日，肯尼迪在白宫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到会者有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茨、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国务卿助理托马斯·曼、总统顾问小阿瑟·施莱辛格、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白宫班子成员阿道夫·伯利和里查德·古德温。

比斯尔在会上提出，为确保入侵行动成功，必须配有空军的支援。富布赖特当即表示反对。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支持比斯尔的观点，他以军事家的眼光断定，如果不掌握制空权，两栖登陆必败无疑。然而，肯尼迪本人不同意动用美国空军轰炸古巴空军基地的建议，他对美国是否要在入侵行动中提供空援一事持保留态度。就这样，会议结束时作出了如下决定：入侵计划不变，但空援未定。外行说了算

为了避免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陷入困境，肯尼迪决定削减美国B—26型轰炸机和其他空中力量对古巴流亡人员的支援。肯尼迪与艾森豪威尔的所想所做毕竟大不相同。当时，艾森豪威尔担心对“古巴旅”训练的时间太短，为了使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他宁可推迟入侵猪湾的时间，让新总统在条件成

熟的情况下，重新审核中情局的入侵行动。这正是典型的艾森豪威尔的作风：万事准备充分，不能草率行动。艾森豪威尔的这一长处在美国军队中是有口皆碑、享有盛誉的。而肯尼迪，他不仅对军事无知，还以个人的意愿修改了中情局拟定的入侵方案，使这个本来就纰漏颇多的行动方案更是千疮百孔。与此同时，他又急着催促中情局尽快行动。

在决策方面，肯尼迪断然摒弃了艾森豪威尔依靠各委员会和白宫班子共同研究问题、商量对策的传统，由他自己直接掌握和控制他想要做的事情。为此，肯尼迪在白宫成立了一个战斗指挥室，他亲自打电话给国务院和中情局的值班官员，了解情况，发号施令。在古巴进行的冒险行动，肯尼迪对他的亲密助手，甚至对一些由他任命的高级官员都是保密的，直到入侵猪湾的最后时刻，这些人才得知事情的真相，大家感到迷惑不解，牢骚满腹。

为了配合入侵行动的顺利进行，暗杀卡斯特罗的秘密行动也在加紧实施。在2月底至3月初这些天里，中情局技术服务室搞出了一批“肉毒杆菌毒素”制剂。这种制剂一旦被人服用，马上就会患病，并在几天内死亡，却不会在人体内留下任何毒物的痕迹。3月初，罗塞利从中情局得到了毒剂胶囊，3月12日，罗塞利、贾恩卡纳和特拉菲坎特陪同马休飞抵迈阿密，与一名古巴人碰头，由他把毒药带进古巴，转交给执行任务的杀手，让他伺机放入卡斯特罗的食物里。

大约在入侵猪湾的前一周，罗塞利和贾恩卡纳再次在迈阿密碰头，当时肯尼迪的情妇坎贝尔也在场。他们得知，此时在古巴执行任务的杀手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尽快下手，他准备在卡斯特罗经常光顾的那家饭店下毒，平时卡斯特罗每星期都要去那家饭店吃一次饭。卡斯特罗很幸运，偏偏在这段时间里，他突然没有再会光顾那家饭店，这次暗杀计划宣告流产。然而，时间不等人，距离入侵猪湾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

4月10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得知了入侵古巴的计划，他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了强烈抗议。他认为入侵古巴这一行动将在联合国引起轩然大波，“使美国失去支持的力量”副国务卿鲍尔斯也继续反对这项计划。但是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入侵行动失败后，华盛顿曾流传着这样一件事：一天，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白宫遇见了鲍尔斯，他伸出3个指头指着鲍尔斯，粗声粗气地嚷到：“你，鲍尔斯，也该为这次入侵行动的失败负责。别忘了，当初大家都是赞成这次行动的！”言下之意，鲍尔斯不该向报界透露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入侵古巴的行动。其实，在此之前，入侵计划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纽约时报》就曾披露过这条新闻。上台不到90天的肯尼迪始终和新闻界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友谊，记者们连篇累牍地报导肯尼迪和美国第一家庭的佳话逸事，肯尼迪被吹得天花乱坠。《纽约时报》在入侵猪湾前，还大肆宣扬美国支持古巴流亡人员的军事行动的“正义性”……他们这样做，或许是为了给肯尼迪涂脂抹粉，然而，这一捧一吹帮了倒忙。在美国新闻媒介的喧闹声中，卡斯特罗洞若观火，严阵以待。

肯尼迪中途变卦

入侵行动开始前不久，曾在危地马拉军事政变中负责阿马斯政府广播电台的中情局官员戴维·菲利普斯也被邀请到位，他的任务是发动反卡斯特罗政府的宣传攻势，煽动古巴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失望心理。菲利普斯在古巴与中美洲之间的天鹅群岛建立了一个“天鹅广播电台”，该电台和入侵行动的组织者保持着密切联系。

4月12日，肯尼迪公开声明，“美国不在军事上干涉古巴的事务”。4月13日，肯尼迪下令：“对古巴空袭的飞机必须装扮成叛逃的卡斯特罗的空军驾驶员反戈一击，去轰炸自己的空军基地，而不要被人看成是古巴流亡人员驾驶的飞机。”4月14日，肯尼迪批准比斯尔可以行动了。肯尼迪责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检查一下各方面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得到的回答是：“古巴旅，看上去很有把握完成这次入侵行动。”这时，肯尼迪总算放心了。

4月14日夜晚，入侵行动的帷幕终于拉开。聚集在危地马拉秘密营地的1500名古巴流亡人员组成的“2506旅”带着坦克和各种轻重武器，乘着近百条船向猪湾进发，煞是一副大干的架势。

按照预定计划，4月15日对古巴进行首次空袭，目的是摧毁卡斯特罗的空军基地，消灭其空军力量，从而掌握制空权，以配合入侵人员强行登陆。中情局军事专家认为，卡斯特罗事先在战术上已经犯下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他把所有的空军力量全部集中在一个基地上。如果一切按原计划行事，即使入侵行动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在军事上依然是十拿九稳的。

按照计划安排，准备出动3批B—26型轰炸机，袭击约40个古巴地面目标。比斯尔要求第一批出动18架次的B—26型飞机，第二批出动15架次飞机，第三批出动7架次飞机。机翼和机身上涂有古巴空军标记的飞机将由中情局的飞行员和经过美国训练的古巴飞行员联合驾驶，从尼加拉瓜的基地起飞，对古巴实施空袭。就在4月14日军事行动全面开始后，肯尼迪把比斯尔叫到办公室，对他说：“我不希望第一次就出动那么多的飞机……，这次空袭应当是‘低调子’的袭击。”“什么？你说什么？”比斯尔惊讶地问道。肯尼迪斩钉截铁地说：“具体工作由你决定，但不许出动那么多的轰炸机。”听到这一命令，比斯尔顿时目瞪口呆，好一阵说不出半句话来。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所推崇的、一向敢作敢为的总统在最后一刻失去了勇气，他怀疑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是否向总统讲清了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要有制空权。

无奈，4月15日从尼加拉瓜仅仅出动了8架涂有古巴空军标志属于中情局的B—26型轰炸机轰炸了古巴的三处空军基地。为了掩盖轰炸行动的出发地，事后其中的两架B—26轰炸机分别降落在美国迈阿密和基韦斯特，装作是从古巴飞来寻求政治避难的。然而，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在记者面前张口结舌、语无伦次、破绽百出，这一来，记者更是穷追不舍。同时，刁钻的记者发现这两架轰炸机的机头与古巴空军B—26轰炸机上的塑料机头不同。于是，这场被戳穿的骗局立时见报。空袭战果也很有限，古巴空军还剩下6架B—26轰炸机、4架“海上怒涛”式战斗机和两架T—33教练机。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认为T—33教练机没什么价值，但它们毕竟是喷气飞机，装有30毫米机关炮，攻击地面目标和B—26轰炸机绰绰有余。

这次空袭的消息顿时在世界各地传开了，舆论哗然。

在联合国，古巴外交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强烈谴责外国飞机野蛮轰炸古巴的事件，他揭露这是美国策划的一个阴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事先对这次空袭行动一无所知，但他知道肯尼迪总统在不久前已经公开宣布美国不在军事上干预古巴的事务。于是，他打电话向国务院询问，国务院的回答说，这是古巴叛逃分子驾驶的古巴飞机轰炸了古巴的机场。史蒂文森信以为真，在联合国的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驳斥了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

由于只出动了8架飞机，因而未能摧毁卡斯特罗的空军力量，现在迫切需要再次袭击。4月16日，肯尼迪终于开绿灯放行了。几小时后，正当飞行

员准备就绪，待命起飞时，突然又接到肯尼迪停止起飞的命令，这对于中情局和古巴流亡人员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大家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

后来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肯尼迪突然改变主意事出有因。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知道受骗后恼羞成怒，4月16日下午，他坚持向肯尼迪提出自己的主张，一定要取消入侵古巴的计划。鉴于联合国对美国入侵古巴一事反应强烈，肯尼迪开始动摇了，由于已经不能中止入侵计划，只得取消第二次空袭，为自己找个台阶下来。也有人说，肯尼迪改变主意是因为听从了国务卿腊斯克的说教。4月16日下午，腊斯克告诉肯尼迪：“联合国大会辩论后，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的空袭行动将严重损害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为避免给自己增加更多的政治麻烦，肯尼迪毫不顾忌将会产生何种严重后果，断然取消了第二次对古巴的空袭计划。接到这一命令后，比斯尔、巴恩斯和中情局副局长卡贝尔立即赶到腊斯克那里，想让他改变主意，再一起去劝说总统收回成命。比斯尔和卡贝尔用许多充分的理由向腊斯克说明取消第二次空袭的危害性，希望腊斯克和总统能接受谏言。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正是腊斯克最起劲地鼓动肯尼迪取消第二次空袭的。比斯尔焦急地对腊斯克说：“登陆时间已定，全部准备工作也已就绪，现在突然取消空袭行动，已为时太晚了。”“那好！”腊斯克无可奈何地说：“我再给总统打个电话。”在电话里，肯尼迪问腊斯克：“第二次空袭是否对这次军事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第二次空袭是本次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腊斯克拿着听筒脱口回答。他听了肯尼迪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之后，又回答说：“那么我现在仍建议取消这次空袭。”说完，腊斯克转过身对卡贝尔问道：“总统和我的意见仍然是一致的，你呢？卡贝尔将军，是否想和总统讲几句话？”卡贝尔耸了耸肩：“我还有什么可对总统说的呢？”腊斯克挂断了电话。总统取消第二次空袭的命令已经无法挽回了。后来有人曾责怪比斯尔和卡贝尔没有在最后的时刻和总统通个电话，设法说服肯尼迪改变自己的主意。

每一个参加猪湾行动的中情局人员都认为，肯尼迪的这一决定显然是在拿整个入侵行动开玩笑。菲利普斯说：“我们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并不期待古巴民众揭竿而起去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但是缺少空中掩护力量，对于整个入侵行动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赫尔姆斯说：“肯尼迪想要改变已经制定好的入侵行动，已为时太晚，只得取消空中掩护力量。其实他这样做，就等于报废了整个入侵计划。如果按照原计划，整个行动是否会成功，这一点我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在最后的时刻，却做出了削减力量的决定，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失败的因素。”

猪湾事件后，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卡斯特罗时问道：“你认为美国人入侵行动失败的因素是什么？”卡斯特罗毫不迟疑地回答：“入侵者缺少空中力量的掩护。”

惨 败

虽然肯尼迪取消了第二次空袭，但入侵行动还得继续进行。4月16日夜，3艘生锈的运兵船和两艘护航舰偷偷驶入猪湾。他们原准备在一片空无人迹的荒海滩登陆，可眼前的一片灯火把他们惊呆了。原来中情局向他们介绍的猪湾是3年前卡斯特罗夺取政权前的猪湾。如今，中情局认为无法通行的沼泽地一带早已筑起了现代化公路，预定攻击的地域也建起了庞大的海滨公园。

4月17日凌晨时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蛙人”先行上岸设置指示灯，随后古巴流亡者组成的“2506旅”开始登陆。然而，当初被中情局图片判读员认作水草的暗礁使登陆部队举步维艰。铝制登陆艇的底部被暗礁戳破，离岸150码便无法前进，士兵们背着沉重的装备，跌跌撞撞地勉强爬到岸上，后续登陆部队则被迫推迟到天明。

卡斯特罗在北面一个巨大的食糖加工厂建立了指挥部，指挥1000名民兵向南反击。当天晚上，古巴的正规军在轰炸机、战斗机、122毫米大炮和40辆T—34坦克的掩护下向猪湾展开全线进攻。

“古巴旅”凭着3辆坦克同数量上占绝对压倒优势的古巴军队拼死战斗。当天，卡斯特罗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在没有敌方空中拦截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炸沉了入侵部队的两艘运输船，其中有一艘船装载着大量弹药和10天补给品。运输船的沉没等于切断了入侵部队的后勤供应。翌日上午，肯尼迪才同意派飞机支援登陆部队。但那天云层很低，飞机驾驶员很难看清地面目标，结果不仅没能摧毁目标，反而有3架B—26型轰炸机被古巴军队击落。那天晚上，肯尼迪在白宫举行晚宴，招待国会议员，参加宴会的人们都穿着体面的夜礼服，一派豪华高雅的气氛。席间，比斯尔传话给肯尼迪，要求紧急接见。

宴会结束时已经夜深人静了。比斯尔、菲利普斯与肯尼迪足足争论了两个小时。比斯尔始终坚持，空援在目前是必不可少的；白天，B—26型飞机的驾驶员已经精疲力尽，而且还损失或损坏了几架飞机，目前能否动用一下停泊在离猪湾只有50海里的“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上的美国喷气式飞机去参战？这时身着夜礼服的肯尼迪和他的助手们都缄默不语。后来，腊斯克表示反对，还有一个白宫班子的文职人员附和着腊斯克的意见。可是，肯尼迪的军事顾问支持比斯尔的观点。正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肯尼迪作出了不偏不倚的决定：批准海军出动喷气式飞机在次日上午前去助战，攻击在海滩上与入侵部队相持的卡斯特罗的军队，但作战时间不得超过1小时，预定的攻击时间是19日早晨6点半到7点半。

但这一次中情局又犯了一个大错，“古巴旅”飞行员基地所在尼加拉瓜与古巴属于两个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记了校正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猪湾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美国海军喷气式战斗机还停留在“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于是，古巴空军战斗机蜂拥而上，将两架古巴旅的B—26轰炸机击落，机上的4名美国人全部丧生。

在海面上，“2506旅”的接应船只再次遭到古巴空军的轰炸。肯尼迪曾经下令，海军的喷气式飞机的任务是保护入侵部队的B—26型飞机和船只，不能直接向卡斯特罗的部队和飞机开火。因此，“埃塞克斯”号上的喷气式飞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506旅”被卡斯特罗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此时，海滩上的古巴旅登陆部队已经精疲力竭，弹尽粮绝。他们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我们无力再战。”在“布拉加”号运输船上，中情局官员格雷斯頓·林奇回电：“对不起，祝好运。”

“2506旅”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与数万名古巴军队整整激战了3天3夜，终究抵挡不住卡斯特罗的陆军、空军的上下夹击和围攻，成了瓮中之鳖。到了4月20日，近300具入侵人员的尸体遍布在硝烟弥漫的海滩上，还有数百名人员严重伤残，失去了战斗力。就这样，弹尽粮绝的1189名入侵者乖乖地成了古巴军队的俘虏，古巴方面约有1700人阵亡，2000人受伤。

这一天正好是肯尼迪就任总统的第90天。

中情局行动部原先报告说在古巴境内有3000~5000人在从事反卡斯特罗的游击活动，很多古巴人将参加“2506旅”。然而，“揭竿而起”的场面并没有发生。确实有那么几股颠覆分子搞破坏，但他们唯一的重大成绩就是4月14日放火烧毁了古巴最大的百货商店。

4月19日，艾伦·杜勒斯准备出席在华盛顿尼克松家里召开的汇报会。那天傍晚，这位局长迟到了90分钟。杜勒斯神情紧张，浑身发抖。当问他要不要喝点酒时，艾伦说：“当然要——我确实需要喝酒。这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天！”尼克松问他出了什么事，杜勒斯脱口而出：“一切都完蛋了，入侵古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中央情报主任匆忙而简单地叙述了经过，责备肯尼迪的那些“神经过敏的助手”使得他在进行空中打击计划这类事情上让了步。艾伦说：“我本该告诉他，我们决不能失败。”杜勒斯眼睛盯着地板，“我几乎要这样做了，可是我没做。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入侵行动失败的原因除肯尼迪取消空援外，还有一个因素是选错了登陆地点。在登陆前不久，才匆匆把登陆地点从古巴沿海城镇特利尼达德移至猪湾海滩。时间紧迫，没能对猪湾附近的地形作详细调查，甚至连乱石和暗礁都没有确切地标明，以致一艘运输船莫名其妙地在猪湾西部入口处的珊瑚礁上撞毁，这一来，就大大延缓了人员的登陆和抢占有利地形的速度。更糟糕的是，入侵人员登陆后，便陷入了萨帕塔沼泽地，这就等于用绳子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只是在部队登陆之后，大家才醒悟到，猪湾并非是一个合适的滩头堡，入侵部队无法守住这块弹丸之地，并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更谈不上向周围扩展了。后来，杜勒斯感慨地说：“上峰在没有充分认识到可能会削弱游击活动能力的情况下，轻易地改变在特利尼达德登陆的决定。殊不知，猪湾远离埃斯坎布雷那块最适合游击活动的区域。再则，猪湾是个不太被人知晓的地方，这样，就很难把古巴国内的反叛力量迅速召集过来。事实上，我们应该挑选一个大家都知晓的地点登陆，这样就很容易让古巴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比斯尔认为，当肯尼迪决定美国军队不直接参加古巴流亡人员的军事行动时，再更改登陆地点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泥泞的沼泽地严重妨碍了“古巴旅”向埃斯坎布雷山后撤的速度。比斯尔说：“参与这项秘密行动的每一个人，我、杜勒斯、肯尼迪和腊斯克都明显地犯了严重的错误。”菲利普斯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比斯尔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官员在得知肯尼迪对空袭实行种种限制时，已经意识到这次行动将要失败的前景，但他们仍然艇而走险，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来挽回不利的局面。”比斯尔承认说：“霍金斯上校和我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否要取消这次军事行动，这或许是我们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关于猪湾入侵的失败原因，人们罗列了许多计划安排、战术指挥方面的错误，但那些都是次要的。最关键的错误在于，凭1000多人去抗击20万古巴军队，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猪湾入侵标志着中情局在准军事行动方面达到最高峰，同时也是它走向低谷的开始。此后，美国政府将大规模准军事行动一律交由军方主持，中情局只承办小型战斗。

“冥王星”行动导致1200多名流亡者进了古巴的大牢。由于受到贸易封锁的损害，不久卡斯特罗提出用俘虏交换药品、拖拉机、机器零部件等物品。这方面的谈判和交易从1961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古巴导弹危机后，卡斯特

罗的价码降低了，而美国则趁势将古巴所需的约值 3500 万美元的医疗设备、药品和儿童食品等价格提高。这一交换是通过詹姆斯·A·多诺万律师来进行的。他曾经安排用苏联间谍阿贝尔交换中情局 U—2 飞机驾驶员鲍尔斯。

1962 年 12 月，以物换人的交易达成协议。“2506 旅”的 1179 名老兵返回美国。在这场曲折复杂的把戏中，中情局曾计划将一套带有病菌的潜水服交给多诺万，让他送给卡斯特罗（详情见第二十二章）。

“痛定思痛”

猪湾入侵以彻底失败告终，肯尼迪在私下里承担了这场灾难的全部责任，他责怪自己轻信了别人的意见，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至此犯下了最可怕的错误。他对亲信人员说，猪湾事件是他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他给了批评他的人一根永远可以鞭挞他的棍子。同时他又无可奈何地说：“这是美国最伟大的军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的中央情报局的绝密行动，我一个年轻的总统有何理由反对它呢？”肯尼迪坦率地承认：“保留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职务是我的一个明显的错误，轻易地相信中央情报局关于入侵古巴军事行动成功可能性的估计，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当肯尼迪回到家里，和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然而，肯尼迪很快恢复了冷静和自信，他对威廉·曼彻斯特说，在入侵猪湾事件后，有两点可以使他感到宽慰：1. 他终于丢掉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会犯错误这一幻觉，今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意见，也要认真审核一下；2. 从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看，仍然有 83% 的美国公民支持他。肯尼迪诙谐他说：“这和当年艾森豪威尔的情况一样，干得越糟，得到的支持反而越多。”他对助手们多次表示，一定要把让他栽跟头的中情局“碎尸万段，焚尸扬灰”。于是，“碎焚”中情局的任务便落在了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身上。

入侵行动失败以后的那几天里，罗伯特·肯尼迪一直呆在中情局总部，向参加猪湾行动的中情局人员追根刨底地了解情况。

4 月 21 日，肯尼迪亲自打电话给前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约他次日来白宫会面。泰勒因战略思想与当局不合，辞职退役后正在撰写《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批评美国的防御政策。现在他正担任林肯艺术中心主任。泰勒应邀拜访了肯尼迪。在总统办公室，两人交谈了很长时间，显然，双方的谈话很投机。最后，泰勒接受了肯尼迪的邀请，领导总统调查小组对猪湾事件进行调查。几乎就在同时，中情局督察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主动成立了督察长调查小组，调查猪湾事件。巴恩斯则在计划处内主持猪湾事件的分析工作。

泰勒和柯克帕特里克分别领导调查小组对入侵事件分析之后，写出了调查报告。泰勒的报告没有局限于猪湾事件，它批评中情局的领导和管理不力，字里行间也批评了白宫在猪湾事件中突然取消了空袭而引起的严重后果。报告中这样写到：“中央情报局没有把空袭的必要性事先向总统和国务院讲清楚，……他们提出即使登陆部队不能守住滩头堡，也可迅速转入游击战……（白宫）在没有认真审核行动计划的书面材料、没有将讨论的结论录音下来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几次由高级官员参加的特别会议，便默然同意了整个军事计划……”

柯克帕特里克的调查报告除了与泰勒的报告有异曲同工之处外，还掺杂了一些个人的评述。他通过猪湾事件，对中情局高级官员的品格进行了剖析……他的报告就象一枚重磅炮弹，落在中情局的大院里，直至 25 年后，这

份报告仍然严加保密。

不过，莱曼·柯克帕特里克曾经回忆说：“没有让安格尔顿、赫尔姆斯、艾默里和我参与这次行动，但处于我们这样的高级职位，对正在发生的事不可能一无所知。我感到这项计划根本行不通，因为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从古巴难民中获得的假情报，即入侵部队将得到帮助，将会爆发起义。但我获悉了关于空投到古巴山区一个 10 人小分队的遭遇情况。2000 名古巴民众追剿他们，他们甚至无法从当地居民手中搞到食物。我最后写信给杜勒斯，要求他按常规向猪湾行动派出 2 名监察员。24 小时后杜勒斯回答说：‘不同意’。”

无疑，猪湾事件正发生在中情局“不走运”的时候。其实，即使不发生猪湾事件，也会发生其他让中情局倒霉的事情。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中情局搞的一些重大秘密颠覆活动多次得手成功，这使中情局忘乎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已经有人告诫艾森豪威尔，中情局是个独立王国，桀骜不驯；艾森豪威尔则多次提醒杜勒斯不要把时间花费在无关紧要的秘密行动上，应在搜集和分析情报上下功夫，但杜勒斯我行我素，继续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秘密行动上（艾森豪威尔还是相当信赖杜勒斯的）；肯尼迪上台后，准备对中情局进行改组，但由于需要执行猪湾入侵行动等原因，肯尼迪没有马上下手。

猪湾事件后，肯尼迪兄弟认为中情局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了，现在正是时候，应借此机会完全控制住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秘密机构。柯克帕特里克原先估计自己的这份调查报告会成为肯尼迪在中情局剥洋葱的蓝本，白宫想必会委任他当中情局局长，以实施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然而，柯克帕特里克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杜勒斯尚未正式辞去局长的职务，肯尼迪已决定任命麦康为中情局局长。即将上任的麦康对柯克帕特里克报告中论述的观点是赞成的。在他正式上任后，他下令将全部有关报告销毁，惟独把柯克帕特里克的那份报告锁进局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在猪湾事件调查委员会里，杜勒斯每天受到肯尼迪兄弟俩、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等人的严厉询问和批评，他低着头，耸拉着肩膀，十分沮丧。然而，他回到中情局后又恢复了笑容，“两只患有有关节炎的手相互摩擦着与大家聊天，他聊天的话题常常是体育”。

肯尼迪希望在上任后 100 天内取得辉煌胜利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肯尼迪兄弟俩意识到中情局就象一架风车，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卷入麻烦的旋涡。肯尼迪说：“猪湾事件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我从中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必须管住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有麦克纳马拉管，国务院有腊斯克管，惟独中央情报局没有人能真正管住它。”这时的肯尼迪变得更“聪明”，更“成熟”了。

猪湾事件是中情局和肯尼迪政府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中情局在隐蔽行动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峰，同时又是它走向低谷的起点。

猪湾事件后，肯尼迪政府在对第三世界所推行的政策中，怀柔成分比上届政府大大增加了。美国在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通过粮食援助解决饥荒、派遣和平队实施发展农业、普及教育等援助计划来笼络关系，建立美国的形象。

中情局小改组

在猪湾事件中焦头烂额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商量后，决定惩罚一

下这个不可一世的机构。肯尼迪颁布了命令，限制中情局计划处的活动，今后它再搞准军事活动必须事先得到国防部的批准。肯尼迪还扬言，要削减中情局的预算，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中情局的人员翻了一番，它的预算已超过国务院预算的50%；在美国一些驻外使馆里，中情局的人员数量甚至超过了国务院的人员数量。

在中情局里，那位被请来担任军事专家的霍金斯上校，由于在制订军事计划时缺乏全面考虑，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军事问题没有事先提醒中情局头目们注意，所以他必须承担军事行动失利的责任。杜勒斯和比斯尔对入侵猪湾的失败，理所当然应承担主要责任。肯尼迪决定撤掉杜勒斯、比斯尔和副局长卡贝尔的职务。耐人寻味的是，那个一直反对入侵行动的副国务卿鲍尔也被撤了职，由乔治·鲍尔接替他。为了照顾杜勒斯的面子，肯尼迪没有马上让他退位，允许他留任到中情局搬进新总部之后，再让他体面地提出辞职，因为新总部是他筹建的。

中情局新总部座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兰利，占地144公顷，它的自助餐厅可容纳1000人，停车场可停放3000辆汽车。据官方建筑师说，建造它时花费了4700万美元，按照现今的美元比值计算，相当于5亿多美元。

7个月后，杜勒斯离开了当初专门为自己设计的豪华气派的局长办公室。据说，肯尼迪对杜勒斯流露过这样的话：“在议会制度下，应该是我走出白宫，但在我们的制度下，该走的是你。”

此时的杜勒斯祸不单行：儿子病情严重，极度狂暴，他不得不将儿子送到瑞士疗养；不久，他本人中风，卧床不起……

杜勒斯是中情局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局长。对他的评述已无庸赘言，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见解。

尽管比斯尔是肯尼迪的好朋友，但无法改变总统的决定。《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詹姆斯·赖斯顿给比斯尔带来了肯尼迪要他辞职的消息。赖斯顿也是肯尼迪的知己。当他在白宫单独与肯尼迪共进晚餐时，第一个得知这个消息，他马上转告给比斯尔，比斯尔这时还尚未得到白宫的正式通知，多少有点将信将疑。不久，杜勒斯和邦迪代表官方向比斯尔转达了白宫的这一决定。比斯尔先是一阵惊悸，心绪平静下来后，他还抱着一线希望说：“我去找肯尼迪。”当他向肯尼迪推究原委时，肯尼迪回答说：“事情就这样定了。猪湾事件要是发生在议会制的国家里，总统也必须辞职。在美国，总统不能辞职，只有让你和艾伦走了。”在比斯尔尚未正式提出辞职前，即将上任的新局长麦康认为，利用技术手段收集情报是一条很重要的渠道，他想在中情局建立一个科技处，专门负责这方面的情报活动。他考虑到比斯尔在领导U—2型飞机、SR—71型飞机和“发现者”号间谍卫星研制过程中的卓越成绩，想让比斯尔继续留在中情局工作，担任科技处处长。这一想法得到了肯尼迪的支持。当麦康向比斯尔征求意见时，比斯尔说他需要回去再考虑一下。几天后，比斯尔对麦康说，他不想再留在中情局工作了。他执意离开中情局的部分原因是，在中情局，科技处长的地位远不如计划处长那样显赫，在大家的心目中，计划处长是仅次于局长的职位，这一点比斯尔当然不会直接了当的向麦康挑明的。

比斯尔本来是一个学者和经济学家，然而，他在中情局里所干的勾当却与他的文明本行相去甚远——他不仅参加了危地马拉的秘密行动，还要为暗杀卡斯特罗去操心。在他的黑名单上，暗杀对象还有第三世界的其他首脑：

刚果的卢蒙巴、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伊拉克的卡赛姆……虽然比斯尔从此“金盆洗手”（到一家企业当经济顾问），但他未竟的缺德事业香火不断，后继有人……

从猪湾事件惨败中恢复理智的肯尼迪兄弟俩，内心相当矛盾：他们既想把中情局砸得粉碎，可内心深处却偏爱这个强大机构中各种各样的秘密活动。肯尼迪对他的一名颇有影响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特说：“我必须得到质量最高的情报。”因参与入侵行动而受到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严厉盘问的菲利普斯回忆说：“罗伯特刨根问底地打听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各种情况，显然他十分钟爱中央情报局和它所从事的各种神秘活动。”后来，肯尼迪兄弟俩再次制订了暗杀卡斯特罗和推翻其政权的计划。肯尼迪的助手理查德·古德温把此项秘密计划命名为“檬行动”。“檬行动”仍由中情局具体执行，罗伯特·肯尼迪担任幕后总指挥。这件事足以证明肯尼迪兄弟俩还要继续重用中情局。按照他们的观点，中情局这台风车应该由他们自己来驾驭，摒弃它是不明智的。于是，肯尼迪找来罗伯特·洛维特，征求他的意见。洛维特是美国政界中资历颇深的外交智囊人物，在文森豪威尔当政时，在对外情报活动咨询委员会任职，他对杜勒斯领导下的中情局曾提出过不少批评。洛维特对肯尼迪说：“中央情报局处理一些问题太外行了，这个机构必须重建，对其行动要加以限制。”肯尼迪曾准备让性格坚强的弟弟出任中情局局长。可是罗伯特·肯尼迪拒绝了。他说：“任命我到一個没有政治倾向的机构去任职并非明智，艾伦·杜勒斯总的来说干得还不错。”罗伯特·肯尼迪为杜勒斯有些抱不平，而肯尼迪本人对杜勒斯也还有好感，因此他没有反驳自己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继续说：“我是民主党人，而且又是你的弟弟，确实不宜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最后，肯尼迪还是同意了他弟弟的意见，但要他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非正式地监督和控制整个情报界的工作。肯尼迪最后找到了接替杜勒斯的人选，他就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康；同时又任命受比斯尔排挤的赫尔姆斯担任计划处处长。肯尼迪还决定，监督中央情报局活动的总统特别小组，即“5412委员会”，由泰勒将军领导。被撤销的对外情报咨询委员会重新恢复工作，并改名为“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具体负责中情局和其他秘密机构的活动。肯尼迪召回了基利安，让他担任顾问委员会主席，克利福德任委员。1963年，克利福德接替基利安任主席。

罗伯特·肯尼迪对“5412委员会”特别重视，他宣布将由这个委员会来领导中情局的秘密行动，以改进中情局的组织和管理体制，从而提高它的工作效率。罗伯特·肯尼迪要实现中情局一直没能实现的目标——搞掉卡斯特罗，他要用行动来证明，总统和中情局在对待卡斯特罗的问题上，有着一致的目标。

尽管肯尼迪曾经下决心“粉碎”中情局，但最终仅对它的十多名中、高级官员作了调整，并没有什么大的举动。

二十二、古巴导弹危机

老头小看后生

1961年4月22日，被猪湾事件中搞得焦头烂额的肯尼迪总统在戴维营约见艾森豪威尔，他想听取前任总统的“高见”。在这前一天，应肯尼迪的要求，艾森豪威尔会晤了艾伦·杜勒斯，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详细介绍了入侵猪湾的全过程。肯尼迪和杜勒斯对军事行动失败的估计基本上是一致的。

“猪湾事件”尚未结束时，卡斯特罗公开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他又多次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积极寻求苏联的保护，同时反美更加激烈。

苏联当然认为古巴是其在拉美的一个阵

地，必须竭尽全力支持它。特别是在美国对古巴实行全面封锁禁运之后，古巴在经济上、军事上只能完全依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入侵猪湾的失利直接影响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使赫鲁晓夫看到了肯尼迪缺乏成熟性，软弱可欺，增强了苏联削弱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在拉丁美洲站稳脚跟的决心。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卡斯特罗取得了对反革命势力的彻底胜利后，我们加强了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卡斯特罗公开宣称，古巴将遵循苏联的道路，我们欢迎卡斯特的胜利。我们断定，入侵猪湾只是个开头，美国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鉴于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不断威胁，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呢？我头脑中时常在思考着这个问题，经常和主席团的其他人员共同讨论这个问题。”苏联对古巴有求必应，源源不断地运送武器，但是使用武器的人员却不是短期能训练出来的，而且这些都不足以抵御以此真正的大规模入侵。苏联的方针一贯是不与美国直接冲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威慑手段，使美国不敢动手。于是，“大家终于找到了一个保卫古巴的好办法——把核导弹悄悄运进古巴，”企图以此作为既成事实，逼美国就范。赫鲁晓夫曾直言不讳地说：“除了保卫古巴，我们（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还将会造成西方津津乐道的‘武装力量的平衡’。……现在倒要他们尝尝如果敌人的导弹对准着你是什么滋味，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从苏方的立场来说，部署导弹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而且恰恰是为了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因为如果美国果真大规模入侵，使古巴濒临灭亡，将使苏联处于两难境地）。

1961年6月，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首次在维也纳举行了最高级会晤。直到那次会晤后，肯尼迪才认识到猪湾事件直接影响到了苏联人对他的态度。赫鲁晓夫根本没把这个年轻的美国总统放在眼里。二战时曾在苏联担任美国大使、现任肯尼迪巡回大使的艾夫里尔·哈里曼曾向肯尼迪提出忠告，让他在会晤时一定要想办法压住赫鲁晓夫的嚣张气焰，否则对方会得寸进尺，毫无顾忌。但是，哈里曼的这一忠告并没有引起肯尼迪及其亲信们的重视。腊斯克、邦迪、波伦、汤普森和凯南则认为，肯尼迪可向赫鲁晓夫表明，入侵猪湾只不过是块砖头扔进了窗户，并没有反映肯尼迪的个人意愿。还有人提出，这次最高级会晤正是了结猪湾事件的最好机会，肯尼迪可向赫鲁晓夫讲明，他已从中得到教训，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他定要果断处理。

维也纳最高级会晤之后，肯尼迪在单独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的采访时说，这次会晤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事情。以前，艾森豪威尔参加最高级会晤时，总要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陪同，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就

让国务卿替他回答，而肯尼迪太过于自信，他和赫鲁晓夫交锋时，不要国务卿腊斯克或其他人员在旁边辅助，却喜欢单枪匹马与自己的对手摊底牌。然而，不久前失败的“猪湾行动”毕竟是美国输给了苏联一个回合，这对赫鲁晓夫是很有利的。在会谈中肯尼迪说：“猪湾事件是一个错误。”赫鲁晓夫回答说：“是的，卡斯特罗本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你将他变成了共产党人。”赫鲁晓夫恫吓肯尼迪说，西方如果不从西柏林撤走，苏联将不惜使用导弹和坦克，并在6个月内单独与民主德国签订和平条约。最后还是肯尼迪让步，向赫鲁晓夫作了心平气和的解释。美国记者尼采把维也纳会议描写成“赫鲁晓夫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咆哮，强调他的钢铁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一个超级大国，而肯尼迪，可爱的孩子，不会管理任何事务”。

第二次柏林危机

1955年5月，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此举惹翻了苏联。3天后（即5月14日）苏联火速成立了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华沙条约组织。

西柏林像一个孤岛座落在民主德国的腹腔中。它与联邦德国的联系必须经过民主德国的陆路交通。

虽然柏林分属两大集团，但边界一直开放，每天有50万人来来往往。西柏林是个自由城，对公民进出没有限制。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之间，边界长达165公里，它蜿蜒在街道、树林、住宅、花园、河流中。

随着民主德国政府的建立，民众越境便日益汹涌。从1949年至1989年，逃亡从未停止过。

据联邦德国“难民部”统计，从1949年至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立前一天止，逃往联邦德国的总人数达260万。尤其在1961年，出逃人数急剧上升：6月2万人，7月3万人，8月上旬，每天逃亡1500人。逃亡者有工人、农民、学生、民警、军人、法官、科技人员；总之，从大学教授到家庭妇女，社会各阶层无所不有，都在撒腿跑。

大量人员，特别是科技人才的外流给民主德国造成了严重损害，而且对社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对于仅有1000多万人口的民主德国来说，逃亡将近300万人，已经使它面临着生存危机。苏联当然不会袖手旁观。1961年8月13日零时，由民主德国党政一把手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亲自指挥的建立柏林墙的行动全线开始。

由工人战斗队、警察、军队（包括苏联驻军）组成的三个梯队全部出动，控制居民，驱散群众，同时，德共人员向群众宣传演说，以牵制人们……就这样，东柏林像开锅一样的民众情绪被压制下去。当西柏林人、西德人乃至西方世界从惊兀中明白过来后，西柏林边界已经架设好铁丝网，天亮之前，整个边界被控制起来。

随后，钢筋混凝土的柏林墙拔地而起。在筑墙过程中，西柏林市民涌向边界，围着施工的士兵和工人，抢夺工具和器材。民主德国军警用高压水龙驱散人群。30万西柏林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柏林墙高4.2米，平均间隔不到200米就是地堡或瞭望塔，在民主德国一侧沿线布满地雷、电网和自动射击装置。由第二重墙形成了百米无人区，它绕过一个又一个街角，穿过一道又一道河流，曲曲折折。

柏林墙在苏联和民主德国的眼里，它是抵御西方颠覆的护卫墙、和平之墙。但在全世界面前，柏林墙的意义似乎更多的是东西方冷战的象征。

赫鲁晓夫指派民主德国军队在西柏林边界修筑柏林墙，以显示苏联准备单方面采取强硬行动来达到战术和战略上的目标。尔后，肯尼迪要求苏联就西柏林的地位进行谈判。经过谈判，赫鲁晓夫同意不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况且已经筑好了柏林墙，赫鲁晓夫决定就此住手。柏林墙的建立，说明苏联对西柏林在事实上的承认，同时表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退居守势（1964年6月，苏联彻底放弃了“缔结对德和约”的立场，并与民主德国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承认“将把西柏林看作独立的政治单位”。至此，从1958年11月开始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才算结束）。

1961年9月，皮埃尔·塞林格在纽约秘密会见了挂着苏联英语杂志编辑招牌的克格勃高级官员博利沙科夫。博利沙科夫交给塞林格一封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长达26页的私人信件。另一次，博利沙科夫同总统的顾问西奥多·索伦森在华盛顿大街上一起散步时，又把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另一封信夹在报纸里，交给了索伦森。这两件事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甚至连苏联驻美国大使也被蒙在鼓里。也许肯尼迪看出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年轻，缺乏经验，软弱可欺。所以当肯尼迪第一次得知赫鲁晓夫把导弹运往古巴时，他怒不可遏地喊到：“他不能这样对待我！”罗伯特·肯尼迪则说：“我们被赫鲁晓夫欺骗了，但我们也欺骗了自己。”

苏联导弹在古巴

1962年7~9月中旬，中情局多次向白宫报告，大约有70艘苏联船只装载着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和SA—2地对空导弹前往古巴，以加强古巴的防空能力。然而，中情局关于赫鲁晓夫推行边缘政策的报告没有引起白宫的重视。苏联在古巴安装核导弹的第一份正式报告是一个古巴难民在迈阿密透露的。1962年8月，中情局专门派遣U—2型侦察机在掠过古巴上空时，拍摄到了古巴正在建造地对空导弹发射基地的照片。肯尼迪总统要求苏联予以澄清，但赫鲁晓夫矢口否认在古巴部署威胁美国安全的大型导弹。白宫将信将疑。于是，中情局申请的U—2型飞机沿古巴海岸平行飞行进行侦察，并不时向内陆进行突然而急速的转弯，然后又折向海外，但这也未能提供新的证据。因此直到10月初，白宫的顾问班子还坚持认为，苏联人绝不可能在古巴安装地对地导弹。10月14日，U—2型飞机直接飞越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上空，在6分钟内拍摄了928张照片，证实苏联正在那里建造带有核弹头的SS—4型中程弹道导弹发射设施。照片送到肯尼迪的手里，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肯尼迪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必须敦促赫鲁晓夫拆除导弹，否则美国就要入侵古巴，摧毁导弹设施。导弹危机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中情局在帮助肯尼迪政府处理导弹危机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U—2型飞机拍摄到的照片和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华盛顿，使刚接替艾默里情报处处长职务的克莱因忙得不亦乐乎。他协调着各方面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以掌握苏联在古巴的确切情况，及时将情报送到白宫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中心——临时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有：国务卿腊斯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财政部长狄隆、总统助理邦迪、总统顾问索伦森、副国务卿鲍尔、代理副国务卿亚利克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国务卿拉丁美洲事务助理马丁、驻苏大使汤普森、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待里克、国防部长助理尼采、中情局局长麦康、副总统约翰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总统特别助手奥唐奈。真可谓人才济济。

他们根据克莱因的情报，为总统出谋划策。

这时的肯尼迪对麦康和克莱因刮目相看。早在导弹危机发生前，麦康就已经预感到苏联一定会在古巴安装进攻型核导弹。自从在航空照片上看到苏联正在古巴西部建造地对空萨姆导弹基地起，他就认为这些基地是为了保护苏联核导弹的。因为常识使他断定，俄国人不可能用萨姆导弹来保护普通基地。他曾当面提醒过肯尼迪，但是肯尼迪听后不以为然。中情局机要室主任杰克·史密斯在回忆这件事时谈到：“1962年9月，麦康丧偶后重新结婚，他带着新娘去法国的尼斯度蜜月。这时，我们根据特务情报和古巴难民的报告，得知苏联正在古巴建立可以直接进攻美国的核力量。为了证实情报，需要派U—2型飞机去实地侦察，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侦察的结果证实苏联正在古巴安装导弹，但不是地对地导弹，而是地对空导弹。当时没有人想到苏联是否会用作为防御武器的地对空导弹来掩盖作为进攻型武器的地对地导弹，只有麦康怀疑到这一点。就在他度蜜月期间，他特地打来热线电话到中情局总部，通知我们，苏联正在安装一些进攻型导弹，请设法找到证据”。10月4日，中情局要求对古巴西部上空进行侦察，这一要求直到10月10日才得到批准，又碰上连续几天的坏天气，大雾笼罩着古巴西部和圣克里斯托瓦尔上空，直到10月14日，中情局才出动飞机侦察。这次侦察结果证实了麦康的预测，也使中情局在肯尼迪政府中赢得了声誉。到10月19日为止，U—2型飞机已经发现了9个中、短程弹道导弹基地和24个防空导弹基地正在加紧建造之中。

白宫的反应

鉴于上述发现，在白宫有人建议对古巴实行封锁，迫使赫鲁晓夫拆除在古巴的导弹，而中情局认为应该采取军事行动来一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这一建议得到了一些持强硬路线者的赞同。10月16日，有人作出一项估计：至少有8000万美国人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一致赞同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在白宫当顾问的前国务卿艾奇逊也主张要动用武力来解决导弹危机。

10月的第一个星期将是美国的中期选举，纽约参议员肯尼思·基廷领导的共和党人提出警告，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军事设施，要求肯尼迪对卡斯特罗采取行动。基廷这时还不知道苏联在古巴安装了核导弹，肯尼迪政府一直把这件事严严实实地捂着。

肯尼迪兄弟俩首先征求了已退休的老外交家洛维特的意见。洛维特主张封锁古巴，“以显示力量”。“第一步先采取比较温和而不是流血的步骤较合适”，“我们可以随时加快战斗的速度，但是一旦交战，再想降低就困难了”。肯尼迪兄弟俩很欣赏他的见解。

10月16日，协助肯尼迪应付导弹危机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开会商量对策。在后来的13天中，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以便帮助总统作出正确的决策。罗伯特·肯尼迪主持着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他从导弹危机一开始，就支持鸽派的观点——赞成对古巴实行封锁这一回旋余地较大的方案。执行委员会中另外两名鸽派代表人物是麦克纳马拉和鲍尔，在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下，执行委员会中的鸽派观点逐渐占了上风。最后，全体委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古巴先不采取军事行动，而实行全面封锁，看苏联作何反应。这一方案尽管也有引起双方轮番升级的危险，但风险毕竟比空袭导弹基地要小得多，至少一开始可以不放一枪，不死一人，留有给苏

联下台阶的余地。就连一开始坚决主张军事入侵、摧毁那里的导弹设施的中情局局长麦康也转变了态度，同意对古巴实行封锁，视情况变化以后再说。

在美国公开表态之前的日子里，肯尼迪充分做到了内紧外松，以确保绝对对机密，麻痹敌人。10月18日，他与出席联大的苏联外长会谈，在谈到古巴问题时，双方都滴水不漏。葛罗米柯重申苏联对古巴的军援纯属防御性质，肯尼迪不动声色，只是强调他在不久前的声明中关于假如有进攻性武器，美国一定要采取行动的那部分。那时，苏联仍蒙在鼓里，而美国操算在先，因此棋胜一着。

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演说，宣布武装封锁古巴，其中包括三军进入战备状态，出动飞机和舰艇对古巴采取严密隔离、“加紧严密监视古巴”等7点措施，并且直截了当地要苏联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迅速拆除和撤退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在发表演说之前，肯尼迪已预先将决定通知了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政府。10月23日，肯尼迪又签署了“禁止把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宣布从24日起将拦截一切可能前往古巴的船只，并勒令这些船只听候美国政府的检查。美国共出动船只183艘，其中包括8艘航空母舰，将古巴团团包围起来。此外，肯尼迪命令陆军的第1装甲师从得克萨斯州进入佐治亚州，命令另外5个师出于完全的戒备状态，并命令携带核武器的B—52型轰炸机在空中示威。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入侵古巴的准备工作也开始了。这意味着，美国将派出25万陆军、9万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至少出动500架次的飞机进攻古巴的导弹设施和机场。赫

鲁晓夫丢人现眼

两天以后，赫鲁晓夫也作出了强硬反应，下令苏联军队处于战备状态，并扬言要击沉阻挡苏联船只通向古巴航行的美国军舰。剑拔弩张，刀剑出鞘，美苏双方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肯尼迪兄弟俩和执行委员会成员正屏息等待第一艘苏联船只遇到美国拦截时，赫鲁晓夫将作出何种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在导弹危机的日子里，中情局向肯尼迪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情报，从而使肯尼迪和他的助手们对苏联的情况胸有成竹。

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格鲁乌的潘可夫斯基上校于1961年投靠了英美间谍机构。一年来已源源不断地把苏联的军事情报提供给西方，总共达5000余份。这使中情局获悉了苏联运往古巴的导弹以及军事装备的种类、型号、性能和潜在的能力。在那段非常时期里，这些情报犹如雪中送炭，对情报分析家们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有关苏联导弹发展情况的报告表明，直到1962年，苏联方面还不具备使用洲际导弹核武器向美国发动袭击的能力。潘可夫斯基曾向中情局证实苏联导弹部队司令和300多名官兵在一次导弹试验场的爆炸事故中全部丧生。潘可夫斯基提供的另外一份情报帮助美国很快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造的导弹发射场。这些情报对肯尼迪处理古巴导弹危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肯尼迪预先了解到苏联导弹数量、导弹性能以及导弹技术人员素质的底牌，苏联在导弹武器方面远远不如美国，两国的导弹数量之比为1：3。因此，他判断赫鲁晓夫肯定会退却。

美国使用封锁手段执意要苏联从古巴撤出全部导弹。在肯尼迪看来，这是最明智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如果达不到目的，他就做好准备，不惜同苏联一战，甚至准备打核战争。

10月24日，加勒比海出现了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几艘苏联船只汽笛

长鸣，耀武扬威地朝古巴驶去。这时，在白宫战斗室里坐镇的肯尼迪简直是如坐针毡，面孔紧张得变了形，额头渗出大粒的汗珠。一旦苏联人的船只越过封锁线，美国海军就要向其开火，这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估计，一旦美国和苏联打一场核战争，在战争爆发后的一个小时内，美国和苏联将有一亿人员伤亡，这将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灭绝性的战争。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苏联船只行驶到美国海军封锁线以外的海面时，戛然而止，随后就掉转船头按原路返航。至 26 日，陆续停驶或改航的苏联船只全部返回国内，美国飞机一直“护航”，跟踪到苏联港口。消息立即传到白宫，肯尼迪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这场赌博他赢了。

10 月 26 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来一封长信。信中提出，苏联愿意撤出导弹来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翌日，赫鲁晓夫又写来一封信，增加了一个条件：苏联在撤走古巴导弹的同时，美国也必须撤走在土耳其丘比特的地对地导弹。

处理导弹危机的执行委员会详细听取了克莱因领导下的情报分析人员的意见，对赫鲁晓夫面临的政治形势、苏联目前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计划以及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衡量后，罗伯特·肯尼迪首先提出看法，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肯尼迪总统不要理睬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只对第一封信作出回答；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要求，美国不入侵古巴，撤消军事封锁；但苏联必须从古巴撤走导弹。后来，美国还是撤走了在土耳其的“木星”式导弹，这倒并非迫于苏联的压力，而是肯尼迪早就有这个打算。撤走在土耳其已经过时的导弹，不仅不会影响美国的核威慑能力，而且在世界舆论面前有助于树立美国的“和平”形象，取得宣传上的主动。

不久，16 艘苏联船只装载着从古巴拆卸下来的导弹，经美国飞机和军舰靠近进行了“肉眼观察”后放行，横渡大西洋，折回了苏联港口，历时 13 天的古巴导弹危机终于结束。赫鲁晓夫在这一事件中丢尽了脸，苏联的“伟大形象”在全世界面前黯然失色，顿时灰溜溜的……相反，肯尼迪却在国内外第一次赢得了声誉，抬高了他在美国国会中的身价。此时此刻肯尼迪对中央情报局十分垂青，因为核赌注的决心是从这里确定的。

在美苏冷战 40 多年中，这次危机离战争边缘最近、最危险。这是一次实力和意志的较量。首先，赫鲁晓夫低估了美国的情报系统，低估了中情局，以为一切部署就绪即可迫使美国承认既成事实；其次，他低估了肯尼迪强硬的一手；更重要的是，60 年代初的美国拥有战略优势，苏联还不到摊牌的时候，所以赫鲁晓夫吹牛皮、说大话的恐嚇外交在实力较量中一败涂地。

国务卿腊斯克后来评论说：“我们互相瞪眼，各不相让，但我想还是对方先眨眼了。”

从结局来看，赫鲁晓夫是退让认输的形象，接受了城下之盟。当时中国指责他“先是冒险主义，后是投降主义”。古巴虽然同意撤除导弹，但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成了大国角逐中的一个卒子，苏联归根结底还是在同美国做交易。当然，美国认为自己赢得很有面子，但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也获得了胜利，即美国公开承诺不再入侵古巴，这也是事实。不久，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建立了“热线”电话，两国首脑就国际重大问题直接交换看法。

古巴导弹危机的一个更深远后果是，苏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卧薪尝胆、奋起直追……

二十三、暗杀卡斯特罗

肯尼迪的两项任命

1961年1月20日，43岁的约翰·肯尼迪宣誓就任第35届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老板。当肯尼迪考虑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时，他遗憾地发现，自己认识的各界专家太少了，他所熟悉的人大多数都在他的年龄层次上，缺少经验，难以承担重任。为组建一个“年轻有力”的新政府，肯尼迪着实花费了一番心血。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肯尼迪在首批任命中轻率地公布了两位重要人选：任命艾伦·杜勒斯继续担任中情局局长；任命埃德加·胡佛继续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两个老家伙对肯尼迪及其政府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肯尼迪的密友们得知这两项任命时，都劝他改变这一主张，他们的理由是，胡佛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已经长达36年，杜勒斯从1953年以来一直担任中情局局长，这两个部门都该换换人了。肯尼迪没有接受劝说，而是自有打算——任命胡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肯尼迪惧怕胡佛手里所掌握的有关华盛顿各界头面人物的大量丑闻材料，包括他本人的肮脏底细（例如肯尼迪家族与黑社会集团的联系、吸毒、与众多女性淫乱等等）。因此，出于两方相安无事的考虑，肯尼迪对胡佛小心翼翼，不去触犯他……

肯尼迪声称，他要想方设法避开官僚政治、社会舆论等常规渠道，他所重视的是办事效率，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会不惜一切走完全秘密的捷径。显然，肯尼迪这次任命杜勒斯，是因为他很满意杜勒斯领导下的中情局在上届总统任职期间成绩斐然。肯尼迪曾说过：“我可不管对方是什么机构、什么部门，每当我想找一些最急用的材料或听取一些参考意见时，中央情报局是我必去之处。而国务院即使回答‘是’与‘不是’之类的问题，也得拖上个四、五天”。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把肯尼迪说过的话透露给中情局情报处长艾默里，从中不难看出肯尼迪对中情局的器重。

然而，中情局在上届总统任职期间究竟干了些什么呢？肯尼迪并没有详细了解，就匆匆作出了任命杜勒斯的决定。有人认为这是肯尼迪冲动的性格所致，也是他不成熟的表现。后来的事实证明，杜勒斯在中情局干的许多事情确实令肯尼迪及其助手惊讶：中情局正在策划暗杀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同犯罪集团秘密结成联盟。而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曾发誓，要用一切手段与犯罪集团做斗争。中情局的这一做法显然和肯尼迪的最初意愿相悖。1960年7月13日，杜勒斯向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肯尼迪介绍古巴情况时，只字未提中情局的这项秘密计划。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项秘密计划的全过程。

与黑手党联璧

1959年12月11日，J·G·金上校向杜勒斯送交了一份备忘录，上面写到：“仔细考虑之后，认为非干掉卡斯特罗不可。……许多了解古巴情况的朋友都相信，只有干掉他才能加速古巴现政府的垮台。”杜勒斯批准了这份备忘录。随后，由比斯尔和金上校负责组织暗杀卡斯特的秘密行动。

1960年1月13日，白宫特别小组召开会议，同意中情局制订的推翻卡斯特的紧急秘密计划。3月，金上校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研究具体的行动方案。7月，中情局总部向哈瓦那发去一份密电，命令对方同时暗杀卡斯

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但不知何故，中情局总部在当天又收回了这项命令。9月，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已经就绪，中情局准备和与犯罪集团合作，实施这一行动。

在美国的犯罪集团中，有许多人昔日在古巴从事赌场、妓院、毒品、走私之类的行当，古巴革命胜利后，这些人逃亡到了美国，他们巴不得早日夺回在古巴失去的一切。中情局断定，这些犯罪集团的亡命徒甘愿冒险。中情局安全室主任爱德华兹和另一名局内官员詹姆斯·奥康内尔找到罗伯特·马休，要他出面网罗歹徒。马休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后来成了华盛顿一家私人侦探公司的老板。马休是在1954年离开联邦调查局的，以后经常为中情局工作，成了中情局得力的雇佣人员。他曾在罗马帮助中情局窃听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电话，并把电话内容透露给当地的报界，从而阻止了船王垄断运输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就是这位船王，后来娶了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1955年，马休帮助中情局拍摄了一部色情片《快乐的日子》，“披露”苏加诺总统的私生活。马休确实很能干，他甚至和黑社会的人也有交往，所以他深得中情局上层人物的青睐。正因如此，中情局便将这次重要的使命托付给他。马休接到任务后，就去找在好来坞结识的黑社会头目约翰·罗塞利，愿出15万美元（这是中情局行动处出的高价），要对方把卡斯特罗杀掉。罗塞利原在古巴哈瓦那经营黑社会团伙的“逍遥宫”和赌场，现在负责拉斯维加斯以及加州的黑社会团伙组织。罗塞利认为，有中情局在后面撑腰，以后他的非法犯罪活动就不会再受到联邦政府的起诉，所以他很爽快地同意了马休的这笔交易。随后，罗塞利找到他的上司、芝加哥和美国中西部黑手党总头子山姆·莫尼·吉安卡纳和另外一名古巴犯罪集团头子桑托·特拉菲坎特，寻求他俩的帮助。莫尼和特拉菲坎特也答应了。10月11日，罗塞利陪同马休来到了迈阿密，把马休介绍给莫尼和特拉菲坎特，觥筹交错之后，4人进行了密谋，决定雇佣流放在外的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去实施暗杀行动。

罗塞利、莫尼、特拉菲坎特属于有权势的三人帮。早在30年代，罗塞利就参加了黑手党。那时他只是新泽西州朗杰·兹维尔曼帮的一个无名小卒。后来他移居芝加哥，投靠到艾尔·卡彭的门下，从事敲诈勒索的勾当。1931年，卡彭因逃避所得税而被捕入狱，罗塞利便转移到了好来坞，组织了一个戏剧舞台雇员和摄影人员国际联盟，用欺诈的手段混迹于影视界，这些丑事败露后，他被判了10年徒刑，在加州的监狱里关押了4年。莫尼在黑社会的经历要比罗塞利显赫得多。他在最初是为“42号”帮派的大头目杰克·麦古恩当贴身保镖，以后就平步青云，最终爬到了黑手党总首领的位置。这次，罗塞利参与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非请莫尼出面不可，否则难以成功。特拉菲坎特在古巴的黑社会里也很有名望，他在哈瓦那有不少内线。当然，这两个黑社会头面人物也认为，马休和中央情报局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帮助，这正是天赐良机，对他们的黑道事业大有好处。另一方面，使他们有恃无恐的是，莫尼的情妇朱迪·坎贝尔竟成了即将担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的情妇。

1960年2月7日，坎贝尔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饭店与肯尼迪邂逅相遇，当时肯尼迪在那里为竞选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而奔波着。在饭店里，弗兰克·西纳特拉介绍他们两人相互认识。4周后，坎贝尔第三次和肯尼迪见面时，她便投怀入抱，成了肯尼迪的一枝花。

从一开始，莫尼就知道坎贝尔与肯尼迪在厮混，自己很高兴抓住了肯尼

迪对妻子不忠的把柄，将来一定会有用得着的一天。1960年11月大选过后，莫尼更相信自己的算盘打对了，他可以把坎贝尔当做与美国总统和中情局联系的一条纽带（1962年冬季，莫尼明知道坎贝尔依然与肯尼迪保持着私情，他还是向坎贝尔小姐求婚）。1960年10月中旬，老奸巨猾的莫尼为了验证马休是否真的受中情局之托前来和他们打交道，他就设计了一个圈套。他请马休在拉斯维加斯一家饭店的客房里安装窃听器，他对马休说，房间里住着他的女友，他怀疑女友会把他要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泄露给别人。马休信以为真，马上照办了。殊不知联邦调查局的人很快赶来了，他们搜出了窃听设备后，就把马休抓了起来。这一来事情闹大了，中情局不得不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理由，出面保护马休，不让联邦调查局对马休起诉。莫尼证实了马休的身份后，就再也没有什么顾忌的了。可是他搞的这一手，却使中情局陷入了困境。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10月18日写信给比斯尔，认为中情局反卡斯特罗的计划已经泄露，不能等闲视之。胡佛在信中写到：“莫尼向他的几个朋友透露了卡斯特罗就要完蛋了，他的朋友不信，莫尼则进一步说，卡斯特罗将在11月份被暗杀，还说他与这位杀手会晤了3次……莫尼还声称，谋杀卡斯特罗的一切安排已经就绪，杀手已与一位姑娘谈妥，认她把一粒药片放在卡斯特罗喝的饮料或吃的食品里。不过，莫尼还没有详细透露细节。”比斯尔收到这封信，使他感到左右为难。

罗塞利、莫尼和特拉菲坎特为谋杀卡斯特罗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但均告失败。转眼已到了1961年，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人便加紧策划这起事关重大的暗杀行动。

1961年2月，中情局把戈特利布提供的“肉毒杆菌毒素”交给罗塞利，让他找人去毒死卡斯特罗。然而，幸运之神却总是保护着卡斯特罗。3月份和4月份，中情局又连续两次策划投毒，又告失利。其原因是派去谋害卡斯特罗的古巴人都临阵退缩了。中情局所采取的这些秘密行动正好是肯尼迪当政的日子，所以中情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是否得到了肯尼迪的批准这一敏感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了。

有人证实说，肯尼迪在重新任命杜勒斯为中情局局长后的第8天，杜勒斯和比斯尔在肯尼迪父亲的家里拜访了正在休息的肯尼迪，他们介绍了中情局在古巴的冒险计划，其中涉及到暗杀卡斯特罗的秘密行动。肯尼迪听完之后未置可否，只把它作为参考意见。也有人认为，肯尼迪从坎贝尔小姐那里得知了暗杀卡斯特罗一事。确实，肯尼迪偏偏要与这个同时和中情局雇佣来暗杀卡斯特罗的罪犯有勾搭的女人发生暧昧关系，这不能不使世人感到瞠目结舌的巧合。不管通过什么渠道，肯尼迪肯定被告知了暗杀卡斯特罗一事。

1961年4月，比斯尔把暗杀卡斯特罗一事亲口告知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邦迪则催促比斯尔赶快建立一支“执行任务的力量”。肯尼迪的另一名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沃尔特·罗斯则敦促比斯尔建立一支暗杀队。不过，邦迪和罗斯是否在肯尼迪当政时已被告知此事，这一问题依然不为人们所知晓。有人说，在肯尼迪党政前后的那段日子里，中情局雇佣黑手党人用戈特利布提供的有毒药品去暗杀卡斯特罗，这个计划是艾森豪威尔当政最后一年制订和批准的，肯尼迪只是把它作为中情局在执行前任总统批准而尚未完成的任务。

需要提及的是，杜勒斯对肯尼迪并不陌生。在中情局的档案中就有一本关于肯尼迪心理活动状态的分析材料，其中包括二战时期他在伦敦的报告，

那时他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任美国大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对老肯尼迪的亲德情绪不放心，一直对他进行暗中监视，建立了他和他儿子的档案。这些材料于1942年落到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手里，后来进了中情局的档案。这些材料都成了中情局如何最有效地“抚摸”肯尼迪的分析依据。

“猫鼬行动”

1961年4月20日，猪湾事件刚刚以失败告终，白宫研究古巴问题的小组形成一致看法：美国不能长期容忍卡斯特罗政权作为自己的邻居，要有相应的举措。这种看法几乎得到肯尼迪政府的一致赞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扬言：他将竭尽恐怖之能事来对付卡斯特罗。

1961年夏季，罗伯特·肯尼迪指令中情局对卡斯特罗进行全面反击，其中包括暗杀卡斯特罗。策划和执行暗杀行动的班子由比尔·哈维负责。哈维当即邀请马休、罗塞利和莫尼再次参加这项行动，并且要求技术服务室的戈特利布准备更多的毒药和施毒器具进行配合。这项秘密反击行动很快得到了白宫的支持，罗伯特·肯尼迪是幕后的总指挥。肯尼迪的助手古德温把这次秘密行动命名为“猫鼬行动”。肯尼迪挑选了中情局秘密行动专家、曾在菲律宾和越南平息“暴乱”的兰斯代尔将军担任罗伯特·肯尼迪的副手，并主持“猫鼬行动”的实施。在罗伯特·肯尼迪和兰斯代尔下面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其人员包括泰勒将军、兰尼兹尔将军、乔治·邦迪、亚里克西·约翰逊、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和新上任的中情局局长麦康等人。在中情局内，“猫鼬行动”特别执行小组又称“W特遣队”，仍由哈维具体负责。兰斯代尔在肯尼迪面前吹捧哈维“是美国的詹姆斯·邦德”。一贯喜爱神探小说的肯尼迪看到身体肥胖、眼睛鼓起、声音粗厉的哈维不禁流露出疑惑的神情。

1961年11月4日，特别小组在白宫召开了第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罗伯特·肯尼迪说：“我的想法是，我们主要应依靠古巴人，用间谍活动、破坏行动和制造混乱等方法在古巴挑起事端。”不久，肯尼迪总统亲自发布指令：“不惜一切手段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从此，“猫鼬行动”就秘密开始了。

1962年1月19日，罗伯特·肯尼迪在自己的办公室又召开了特别小组会议，敦促大家“要不惜时间、金钱、人力和物力去推翻卡斯特罗的政权”。他还向大家转达了总统的话：“我们在古巴的最后一章尚未写完，现在到了该动笔的时候了。”罗伯特反复强调了总统对除掉卡斯特罗的强烈决心。他最后说：“这件事是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其他任何事情都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时，罗伯特·肯尼迪已得知中情局雇佣黑手党人参与这次暗杀行动，他并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1962年5月7日，赫尔姆斯、爱德华兹和中情局总顾问豪斯顿在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向罗伯特·肯尼迪汇报中情局动用黑手党人去谋杀卡斯特罗一事。两天以后，罗伯特向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转告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因为胡佛自从得知中情局雇佣黑手党杀手为自己服务之后，一直耿耿于怀，伺机加以利用狠狠整一下中情局，把它彻底搞臭。早在1961年5月22日，胡佛就曾交给罗伯特·肯尼迪一份备忘录，指控中情局让黑手党头子参加反卡斯特罗的秘密活动。胡佛知道，肯尼迪兄弟俩过去在参议院反非法活动委员会追踪过的暴徒之一就是现在中情局邀请来暗杀卡斯特罗的莫尼。胡佛满以为罗伯特·肯尼迪绝不会容忍中情局的这一做法。他在备忘录中这样揭露中情局：“爱德华兹说，在反对卡斯特罗的行动中，他于1960年秋季亲自与罗伯

特·马休接洽，让马休出面与芝加哥地区的大恶棍山姆·莫尼·吉安卡纳接头……爱德华兹上校还说，鉴于这是肮脏的勾当，他不可能知道马休和莫尼在中情局的秘密使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比斯尔先生最近向泰勒将军和司法部长介绍中情局卷入古巴事件时也承认，中情局在这次行动中动用了莫尼和黑社会的力量来反对卡斯特罗。”现在，罗伯特·肯尼迪反而把赫尔姆斯和爱德华兹在5月7日和他谈话的内容转告给胡佛，无非是两个意思：1.出于对胡佛的畏惧，以此表示对胡佛的尊重；2.向胡佛表明，他对中情局所干的一切都很清楚，你胡佛别在这件事上再纠缠不休了。但是，罗伯特·肯尼迪是否把中情局雇佣黑手党来暗杀卡斯特罗的事告诉他的哥哥，这一点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肯尼迪兄弟俩可谓亲密无间，甚至共用一个电影女明星马丽莲·梦露做情妇。从这一点来推断，如此重要的事情，罗伯特·肯尼迪决不会不告诉他哥哥的。肯尼迪总统肯定早就得知中情局与黑手党之间的肮脏勾当，甚至可以说，他本人就是这种勾当的幕后策划者。

5月14日，豪斯顿和爱德华兹特地把5月7日向罗伯特·肯尼迪汇报情况一事写在备忘录上。

1962年8月23日，邦迪发布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81号备忘录，这是一项总统指令，要求“猫鼬行动”立即转入第二阶段，即开展大规模的秘密活动，其中包括发动宣传战、从繁杂众多的对古巴进行破坏的预选方案中挑选出最佳方案，以及挑动和加剧古巴与苏联军队之间紧张关系的事件……

赫尔姆斯回忆那时的情况时说：“中央情报局得到指示后，马上按照计划行动，准备不惜一切手段来除掉卡斯特罗。这‘除掉’二字显然是指暗杀卡斯特罗，因为再也没有人会有胃口想用军事入侵手段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了……当时，由于情况紧急，上面催得又紧，因此狂热的方案就产生了。”

一败再败

当时哈维率领的“W特遣队”立即在迈阿密大学的校园里建立了大型的秘密行动神经中枢，约有400人分别在华盛顿和迈阿密为其工作。另外，又在佛罗里达州设立了50个办事处，建立了一支由小型的高速舰艇组成的海上力量和一支空军力量。“W特遣队”还雇佣了2000多名古巴人投入到这个庞大的行动中去。哈维建立的这个秘密行动力量很快就成为仅次于中央情报局总部的第二大机构，全年的总开支约一亿美元。

兰斯代尔领导的“猫鼬行动”特别小组一口气提出了33个暗杀和推翻卡斯特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使用生化药品毁坏古巴的甘蔗园；雇佣暴徒攻击古巴警察；策反卡斯特罗政府的高层共产党官员等等。在所有的方案中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一个项目是，开展大规模宣传，向古巴广大的天主教徒散布谣言说，基督将要再次降临人世，只有除掉反基督的卡斯特罗，耶稣基督便会在古巴显灵。这个主意是兰斯代尔将军想出来的。50年代初，兰斯代尔在菲律宾策划反哈克的秘密行动时，曾经用过类似的方法，当时在直升飞机上安装了扩音喇叭，在飞机上对菲律宾的一些原始部落进行广播，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这次准备先在古巴各地散布谣言，与此同时，在离古巴海岸不远处停泊一艘美国的小潜艇，到了深更半夜，向空中发射曳光弹，以造成耶稣基督即将降临的假象。一旦古巴人相信了谣言，便会揭竿而起，推翻卡斯特罗政权。麦康的助手沃尔特·埃尔德称这是“靠幻觉来消灭自己的敌人”。“猫鼬行动”特别小组的成员认为兰斯代尔的想法太狂热，最后没有采纳他的计划。然而，矛头直指卡斯特的“猫鼬行动”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迫于肯尼迪兄弟俩急于推翻古巴现政府的焦灼心情，吉安卡纳建议使用毒药。于是中情局准备了一种肉毒杆菌毒剂，经过在猴子身上的试验，证明“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哈维和罗塞利就把毒剂交给一个古巴人带到岛上去，但和以前一样，又失败了。在后来的暗杀行动中，中情局还企图同时害死卡斯特罗的弟弟、副总理劳尔·卡斯特罗和古巴第三把手切·格瓦拉。一次，罗塞利派出3名强悍的人员组成暗杀小组去伏击卡斯特罗，但行动失败了。这时，肯尼迪兄弟俩开始烦躁起来。兰斯代尔和泰勒奉命经常向哈维和“W特遣队”索取暗杀行动的情况报告，弄得哈维忙于应付这类行政事务，可他只能发发牢骚而已。罗伯特·肯尼迪更是急于求成，他经常绕开正规途径，亲自给中情局打电话，直接向参与“猫鼬行动”的有关人员打听消息，敦促他们加紧行动。其实，“猫鼬行动”未能取得成功的症结与入侵猪湾的失败同出一辙：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对付卡斯特罗是根本行不通的。

哈维自己也承认，1962年8月以后，他的“W特遣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只好急于求成，使得“猫鼬行动”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哈维本人不必通过麦康，可以自行其事。白宫肯尼迪的高级官员不用得到麦康的许可，便直接向哈维发布命令，指示他的行动。

麦康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从个人的意愿出发，他反对暗杀行动，所以负责暗杀卡斯特罗的哈维与赫尔姆斯以此为借口，不同麦康讨论有关行动的事宜。哈维与赫尔姆斯一致认为，除非麦康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询问情况，否则，他们不想把暗杀计划详细告诉麦康。他们觉得，麦康与肯尼迪兄弟俩不同，前者笃信天主教，最好还是不给他出难题，不让他知道自己的部下正在搞暗杀的勾当。再说，哈维与赫尔姆斯不必从麦康那里得到什么指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会直接向他们发布命令的。所以，从1961年“猫鼬行动”酝酿成熟，直至1962年10月，因古巴导弹危机而促使“猫鼬行动”下马，麦康一直不知道中情局雇佣黑手党人去暗杀卡斯特罗。直至1963年8月，《芝加哥太阳时报》载文披露中情局和吉安卡纳勾结从事某项秘密活动，致使麦康大惊失色，他的前任杜勒斯和他的下属从未把这些事告诉他。后来，麦康要赫尔姆斯写一份情况报告，于是赫尔姆斯把豪斯顿和爱德华兹在1962年5月14日写的那份备忘录的副本交给了麦康，他总算松了一口气。原来在这段时间里，罗伯特·肯尼迪实际上全权指挥着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充当了中情局里计划部部长的角色。既然如此，麦康还能说些什么呢？

撤换哈维

1962年7月2日，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卡斯特罗带着关于肯尼迪政府企图推翻古巴政权的“猫鼬行动”计划来到莫斯科。他在会见赫鲁晓夫时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赫鲁晓夫答应从秋季开始在古巴安装中程弹道导弹。1962年8月，美国的U—2型侦察机在古巴上空飞行时，发现古巴正在建造地对空导弹发射基地时，肯尼迪政府还不以为然。10月4日，另一架侦察机在古巴上空拍摄到苏联人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建造导弹发射基地的照片，肯尼迪直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于是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为了不给苏联人在古巴安装核导弹找到任何借口，罗伯特·肯尼迪指示麦康，终止中情局在古巴的一切活动。尽管罗伯特·肯尼迪已发出指示，但哈维仍一意孤行，他批准了在迈阿密受“W特遣队”训练的古巴人在古巴秘密登陆。对此，麦康非常气愤，他解除了哈维在“W特遣队”的领导职务，不让他再参与“猫鼬行动”。实际上，麦康早就对哈维感到不满，认为他太浮夸了，曾多次想

解除哈维的职务，但都被赫尔姆斯劝阻了。另外，在古巴导弹危机的那段日子里，哈维多次与肯尼迪兄弟俩顶撞和争吵。哈维坚持积累情报，罗伯特·肯尼迪催促加紧行动。一天，在白宫的战斗室里，罗伯特·肯尼迪接过译电员送来的一份电报，看完后他准备带着它离开作战室。实际上这份电报是给中情局和哈维的，见罗伯特·肯尼迪要带走电报，哈维突然从他手里一把将电报夺了回来，猝不及防的罗伯特·肯尼迪显然被哈维的骄横态度激怒了。从那以后，肯尼迪兄弟俩再也没有让哈维到白宫战斗指挥室来，他们已不想再重用这个目中无人的下属了。哈维自己很清楚，欣赏他的史密斯、杜勒斯、威斯纳已经不在，虽然赫尔姆斯愿帮忙，但他说了不算；自己落魄的时候到了。一连好几个月，哈维没有接到任何工作任务。1963年2月，哈维在迈阿密与罗塞利共进晚餐，他不得不告诉对方，中情局的“猫鼬行动”已经终止。从此，中情局与黑手党的联系便结束了。这就是哈维在“猫鼬行动”中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后来，哈维被派到意大利，担任中情局驻罗马情报站站站长。树倒猢狲散，哈维领导的“W特遣队”也跟着解散了。中情局重新成立了特情组，由罗伯特·肯尼迪的密友、计划部远东处处长得斯蒙德·菲茨杰拉德担任特情组的负责人。然而，由白宫一手控制的反卡斯特罗的计划并没有因中情局的人事调动和机构改变而受到影响，肯尼迪兄弟俩也不想真正放弃“猫鼬行动”，他们执意要与卡斯特罗斗到底。

绝活儿

1963年，在菲茨杰拉德的策划下，中情局和经过训练的古巴人一起共进行了6次大型的秘密行动，包括在古巴登陆、炸毁铜矿、焚毁甘蔗田、制造铁路交通事故、破坏发电站和炼油厂等等。

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始终没有停止过，菲茨杰拉德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设想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方案。这里略举几例——1.由中情局技术服务室提供一种“爆炸性海贝”，把它放在卡斯特罗常去游泳的海底，但这个计划最后没有被采用，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中情局干的。

2.设法送给卡斯特罗一套保温潜水服，在潜水服的夹层里预先放好戈特利布提供的毒剂，衣服经过这种毒物浸泡后便带有结核病杆菌。技术服务室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可是又遇上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把潜水服送到卡斯特罗手里而又不引起他的怀疑呢？菲茨杰拉德想到了詹姆斯·多诺万。多诺万曾担任过苏联间谍头子阿贝尔的辩护律师。以后，多诺万作为中间人，安排了阿贝尔与被苏联抓住的U—2型飞机驾驶员鲍尔进行交换，使二人分别释放回国。当时，多诺万正在同卡斯特罗方面谈判释放在猪湾事件中被俘虏的古巴流亡人员。无疑，让多诺万来完成这一任务是再合适不过了。可又有人提出了疑问，是否要把潜水服夹层有毒之事如实告诉多诺万？如果对多诺万说了，他是否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要是不让他知道的话，多诺万很有可能先穿上试试。最后，多诺万并没有按照中情局的计划办，他自己掏钱买了一套潜水服，作为礼物送给了卡斯特罗。中情局挖空心思准备好的那套潜水服，最终被销毁了。

3.买通卡斯特罗下榻的宾馆服务员，一旦看见卡斯特罗把靴子留在卧室门外时，便在鞋上洒一些铭盐。这种盐具有很强的脱毛力，只要卡斯特罗再穿上鞋，就会使他的大胡子脱落，这足以败坏他在古巴人心中“美髯公”的形象，降低他的超凡魅力。

4.授权中情局驻哈瓦那情报站为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安排一次事故”，

但这项命令很快就撤销了。

5. 卡斯特罗的烟瘾很大，于是准备了一些有毒的雪茄，期望他在发表讲话前抽上一支。但此种方法实施的难度极大：一是无人敢去冒此风险，二是卡斯特罗喜欢古巴自己生产的闻名世界的雪茄，并有以此待客的习惯，因而很难断定卡斯特罗能否享受到那支有毒的雪茄。有鉴于此，毒剂雪茄只好扔在实验室里，无人问津。

6. 在卡斯特罗的播音室里喷撒一种类似迷幻药的化学物质，使他在演讲中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由于这种药物的化学性质不稳定，所以被放弃了。

需要说明的是，所有毒杀“工艺”都是由下毒博士戈特利布一手完成的。

后来，中情局的暗杀行动总算有了突破。他们招募了一个叫玛丽·洛伦茨的德国女郎。此人水性杨花，原先是卡斯特罗的狂热追随者，后来又成为反卡斯特罗的古巴移民弗兰克·菲奥里尼的情妇。菲奥里尼移居美国后改名为斯特吉斯，10年后在美国的“水门事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中情局人员先是设法接近洛伦茨，熟悉之后就摊开了底牌，出高价要她找机会干掉卡斯特罗。在花言巧语下，洛伦茨同意了。于是，通过菲奥里尼，把两颗剧毒胶囊送到了洛伦茨的手里，她把胶囊藏在一罐冰冻奶油里。然而，当她在哈瓦那卡斯特罗的卧室里打开罐装奶油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两颗剧毒胶囊，原来胶囊在奶油里溶化了。“见鬼去吧！算卡斯特罗走运”。洛伦茨默默地说：“既然如此，那就让历史去决定卡斯特罗的命运吧！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

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一再破产，菲茨杰拉德开始坐立不安起来，他终于转向罗兰多·丘伯拉，这个在1961年被古巴黑社会犯罪集团头子桑托·特拉菲坎特招募的古巴少校。丘伯拉自从与特拉菲坎特挂上钩以后，一直和中情局保持着联系。他和卡斯特罗很接近。然而，他却野心勃勃。他和几个密友对卡斯特罗亲近苏联人的作法很不满意，在暗地里一直寻找机会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并将其置于死地。在政治暗杀方面，丘伯拉可称得上是一个老牌杀手了。早在1956年，他枪杀了古巴旧政权巴蒂斯塔总理的军事情报部门头子博兰科·里柯。中情局一直把丘伯拉当做宝贝看待，不到关键时刻不动用他。1963年9月，丘伯拉在巴西的圣保罗与中情局特工会晤，表示他准备在内部“消灭”卡斯特罗，为此，他向中情局申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以便在遇到不测时使用。丘伯拉还提出要会见罗伯特·肯尼迪。中情局官员回答说，一定尽力照办。中情局要求罗伯特·肯尼迪会见丘伯拉并非是一件什么难事，只是考虑到在暗杀卡斯特罗的前夕，让总统的弟弟去会见杀手是很不明智的。因此，决定让菲茨杰拉德作为罗伯特·肯尼迪的私人代表去会晤丘伯拉，并且向对方保证，他的行动得到了肯尼迪政府的全力支持。会晤的地点定在巴黎，时间是10月29日。会见时，丘伯拉要求得到一支装有望远镜瞄准器、可以在远距离射杀卡斯特罗的高速步枪和高爆力炸药。菲茨杰拉德满口答应了。11月23日，中情局人员交给丘伯拉一支特制的有毒钢笔，这支笔装有皮下注射针头，针头很精致，注射时受害者根本无法察觉到钢笔上小小的毒针正在射向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中情局希望丘伯拉用这支笔去进行暗杀。然而丘伯拉拒绝了，他需要用更先进的武器。在第二次会晤时，菲茨杰拉德扬扬得意地告诉丘伯拉，肯尼迪最近在迈阿密发表的反卡斯特罗的演说中，有一部分是他起草的。菲茨杰拉德连连给丘伯拉打气说，一旦卡斯特罗政府垮台，美国一定会支持古巴的“进步人士”；他还力劝丘伯拉使用那支笔。

命运有别，生死注定

大千世界，纷乱迷离。就在菲茨杰拉德和丘伯拉秘密会见的同一天，肯尼迪在达拉斯的大街上遭到了杀手的枪击，子弹穿透太阳穴，脑壳破裂，脑浆迸溅，当天就死在达拉斯的帕兰克医院。

当肯尼迪遇刺的消息传到中情局时，麦康正在与赫尔姆斯共进午餐。麦康的助手匆匆推门进来报告这条消息，赫尔姆斯大吃一惊，他的脑海里立即闪过一种想法：可能是某个阴谋集团干的罪恶勾当，自己有责任尽快了解一下世界其他地方是否有异常情况发生，以便帮助了解暗杀总统之谜。

肯尼迪饮弹身亡的消息传到哈瓦那时，卡斯特罗正在接受法国记者丹尼尔的采访。卡斯特罗听后先是一愣，随即脸上显出悲哀的神情。他对法国记者说：“我个人认为，肯尼迪本人应该对一切负责。我应该这样说，他对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应该了解得很清楚。”他又对丹尼尔说，他本人很乐意与美国和平共处。未了，卡斯特罗重复了好几遍：“这是一个坏消息！”过了一会儿，卡斯特罗又转向丹尼尔问道：“你看，约翰逊能管住中央情报局吗？”显然，卡斯特罗担心的还是中情局。

肯尼迪死后，中情局也终止了暗杀卡斯特的秘密行动。1964年秋季，丘伯拉再次向中情局提出要一支狙击手用的高速步枪时，中情局的特工回答对方说：中情局已不再插手谋杀卡斯特的计划了，因为这是新总统约翰逊发布的命令，中情局不准搞暗杀。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此时印度支那战事日益突出，白宫根本无暇顾及哈瓦那。于是，中情局在迈阿密和佛罗里达诸岛的秘密基地也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

二十四、肯尼迪遇刺之谜

神秘的枪声

1963年11月23日，是美国现代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按照原定的计划，肯尼迪总统要到达拉斯进行一天的访问。下了飞机，肯尼迪感到天气非常好，就命令拿下汽车上的防弹罩，他想让所有的得克萨斯女人亲眼看看美国第一夫人是多么迷人。他还坚决反对警察的摩托车队在他的汽车两侧护送，因为这样会挡住街道两旁人们观看他和第一夫人的视线。中午12点左右，身着灰色西服和灰条纹白衬衫、系着天蓝色领带的肯尼迪偕同身穿粉红色衣服、带着无边帽子的第一夫人杰奎琳乘坐着总统的敞篷汽车，向达拉斯方向驶去。

通往商业中心的大街上，起初冷冷清清，不一会儿，人逐渐多了起来，而且群情沸腾。当总统的车队驶近迪利广场时，陪同康纳利州长一起坐在总统汽车里的州长夫人颇为自豪地转过脸对肯尼迪说：“总统先生，你肯定不会认为达拉斯不爱你吧！”肯尼迪开心地笑着回答：“是的，当然不会”。

就在肯尼迪这次得克萨斯州之行以前，许多人都劝他放弃这一计划。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曾说：“我确实怀疑总统是否应该去达拉斯。”参议员富布赖特直言对肯尼迪说：“达拉斯是个危险的地方，我本人不想去那儿，我认为你也不要。”肯尼迪没有理会这些好心的忠告，他有自己的打算。他念念不忘的是，他之所以能在1960年的大选中，以极其微弱的多数险胜尼克松，主要原因是赢得了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斯州的选票。现在，肯尼迪十分需要继续得到得克萨斯州的支持，从而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看到眼前这热情洋溢的场面，肯尼迪高兴地向达拉斯市民们频频招手致意。

这时，总统的车队渐渐驶近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的拐角处，汽车放慢了速度。当车队进入迎面的迪利广场时，车速仍然没有加快。总统夫妇沉浸在欢悦之中，遥望着前面的高架桥，他们似乎觉得大桥已在热情地召唤他们了。此时此刻，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教科书仓库的6楼，有人正在用一支装有望远镜瞄准器的步枪对准了总统的头部，与此同时，在车队右侧警戒线后一个俯瞰迪利广场的杂草丛生的小山丘上，还有第二支步枪瞄准了总统。说时迟那时快，随着枪响，肯尼迪总统的脑壳碎片和脑浆在瞬间迸裂溅散，康纳利州长“啊”地惨叫了一声，一下扑倒在他妻子的怀里，失去了知觉。总统夫人和州长夫人不约而同地惊叫了起来。顿时，广场陷入了一片可怕的混乱之中。车队风驰电掣般地载着中弹总统和州长驶进达拉斯帕兰克医院。没过多久，46岁的肯尼迪总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康纳利州长的伤势虽很严重，但他却侥幸地从死神手里逃了出来。

杀手奥斯瓦尔德从教科书仓库的6楼仓皇逃出，开着一辆轿车在公路上飞驰，警官狄皮特拦住这辆超速行驶的汽车，却被奥斯瓦尔德开枪打死了。但奥斯瓦尔德终难逃脱，最后还是被生擒了。根据警方当时的音响录音资料表明，枪声共响了4次，3次来自教科书仓库，1次来自小山丘。那个隐藏在小山丘上的杀手究竟是何人，至今无人知晓。击中总统和州长的子弹究竟是从哪个方向射来，迄今为止，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杀人灭口？

起初，人们并不知道奥斯瓦尔德就是埋伏在仓库6楼向肯尼迪总统开枪的凶手。他的被捕是因为他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官，后来才弄清他是一名杀手。

达拉斯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人员以及白宫保安人员立即对奥斯瓦尔德进行审讯。审讯持续了一天，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奥斯瓦尔德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是替罪羊”。于是，警方先把奥斯瓦尔德关押在达拉斯警方总部的地下室。谁也没有料到，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1月24日，达拉斯警方正准备将奥斯瓦尔德从警察总部移交县监狱关押。一名叫杰克·鲁比的达拉斯脱衣舞夜总会老板混入了警察总部，他穿过地下室走道，守候在押送奥斯瓦尔德去县监狱的必经之处，当奥斯瓦尔德被押解出来时，鲁比乘人不备，从一名警官身后扑上来，开枪击毙了杀害总统的凶手。

就这样，这位打死杀害总统的凶手的“英雄”成了阶下囚。鲁比为何要杀害奥斯瓦尔德呢？他受到谁的指使？这又成了一个谜。

看上去，鲁比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在向他的精神病医生求援时说：“我是受骗去杀奥斯瓦尔德的”。鲁比对采访他的一位记者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要是知道事情的真相，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在另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又声称：“我唯一可以说的一句话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始终是个谜，全世界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这便是我杀死奥斯瓦尔德的动机，我是唯一知道我行动的人。”当记者问鲁比真相是否会大白于天下时，鲁比回答说，“永远不会，因为知情人永远不会让真相大白……他们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他们把我推入现在这样的境地。”然后，鲁比就沉默不语了。

到底是谁指使奥斯瓦尔德和那个躲在小山丘、后来又逃之夭夭的神秘枪手杀害肯尼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怀疑是黑手党干的罪恶勾当，也有人认为是古巴得知中情局企图谋害卡斯特罗之后所采取的反措施，还有人认为是外国间谍集团策划的阴谋。80年代末，美国有人提出了新的论证，认为杀手的目标本来不是肯尼迪，而是州长康纳利，结果却造成了肯尼迪的“误死”，康纳利的“错生”。总之，说法很多，且都有一些根据，但尚无令人信服的定论。

官方调查

1963年11月29日，原副总统约翰逊接替肯尼迪的总统职位后，签署了第1130号行政命令，宣布成立肯尼迪遇刺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其主席，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的名字命名为“沃伦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中有前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调查委员会对奥斯瓦尔德进行了全面和详细的调查。奥斯瓦尔德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雷达兵，1959年，他怀着失望的心情投奔苏联，1962年6月，奥斯瓦尔德带着他的苏联妻子返回美国。回国后，联邦调查局曾对奥斯瓦尔德盘问过3次。据他本人说，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他大失所望，因此才回来。但是联邦调查局从奥斯瓦尔德的谈话中发现，他“已经感染上了马克思主义病毒”。

9月，回到达拉斯定居后不久的奥斯瓦尔德夫妇接受了白俄移民默仁希尔德夫妇的拜访。默仁希尔德夫妇是达拉斯俄国侨民的召集人。作为一个召集人，访问刚从苏联归来的奥斯瓦尔德夫妇显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说来也巧，默仁希尔德还是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姑母的好友呢。不知何故，默仁希尔德一眼便对这个刚从苏联归来的美国青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两人之间的年龄差异很大，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发展得非常迅速。有人怀疑默仁希尔德扮演了某种情报人员的角色。据说，他曾为波兰和法国

的情报部门工作过，现在他也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的共谋者，是为中情局听取汇报的。默仁希尔德谈了他对奥斯瓦尔德的感觉：“他是一个行为怪诞的人，但他具有一种探索精神，他会按照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去干。”

转眼到了1963年的春季，生性孤独的奥斯瓦尔德已把默仁希尔德看成是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后来，默仁希尔德在海地谋得了一份工作，为海地的大独裁者杜瓦利埃勘探石油和天然气。4月19日，默仁希尔德告别了奥斯瓦尔德，离开了达拉斯。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默仁希尔德神秘地自杀了。他自杀的日子正好是众议院暗杀问题特别委员会即将询问他的那一天。后来人们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了这样的一段话：“奥斯瓦尔德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狂热崇拜者。他认为卡斯特罗革命成功前的古巴是美国旅游者的妓院，是美国歹徒的乐园。虽然奥斯瓦尔德也崇拜肯尼迪总统，但他认为肯尼迪在古巴推行的政策是一种灾难。”

1963年4月，奥斯瓦尔德被一家出版公司解雇了，他安顿好妻子和女儿后，毅然离开达拉斯，来到了新奥尔良，寻找把他从小抚养成人的叔叔和婶婶莫雷特夫妇。莫雷特夫妇是一个出版商，却和卡洛斯·马塞罗黑社会犯罪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塞罗犯罪集团声名狼藉，据联邦调查局1963年9月的一份报告说：“曾听到有人议论，马塞罗犯罪集团有杀害肯尼迪总统的阴谋。”

奥斯瓦尔德到达新奥尔良的第二天，就从报上得知肯尼迪将在11月份访问达拉斯。7月1日，奥斯瓦尔德到图书馆借阅了一本肯尼迪撰写的《勇敢者的画像》。11月9日，奥斯瓦尔德因参加支持卡斯特罗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局以扰乱治安和制造混乱罪逮捕，他的叔叔莫雷特出钱将他保释出狱，陪同莫雷特去办理交涉手续的是马塞罗黑手党的成员皮科拉先生。

1963年9月13日，报界又刊登了肯尼迪将在11月21日或22日访问得克萨斯州的消息。没过几天，奥斯瓦尔德决定去古巴，他想从苏联驻哈瓦那大使馆得到他和妻子去苏联的签证。当时，古巴在美国没有专门办理签证的外事机构，奥斯瓦尔德只得先到驻墨西哥的古巴大使馆申请去古巴的签证。9月17日，奥斯瓦尔德终于得到去墨西哥旅游的签证。

疏漏

1963年9月27日至10月2日，奥斯瓦尔德先后走访了墨西哥城的苏联和古巴大使馆。在墨西哥城的中情局人员很快发现了奥斯瓦尔德在苏联大使馆时，曾与克格勃官员库茨涅科夫交谈过。库茨涅科夫是克格勃专门从事暗杀和破坏行动的臭名昭著的第13处人员。奥斯瓦尔德在古巴大使馆时，会见了一名叫考尔德伦的女雇员，据说她是古巴情报处的人员。奥斯瓦尔德的墨西哥之行到底是为了办签证，还是带有其他使命？由于中情局驻墨西哥情报站人员工作上的疏忽，没有将这些疑点向国内汇报，因此，当奥斯瓦尔德从墨西哥旅行后风尘仆仆地返回美国时，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没有向他了解本次墨西哥之行的情况。实际上，在这之前，已发现奥斯瓦尔德与在美国国内的亲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和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人员都有频繁的联系。

9月底，美国报刊证实肯尼迪将于11月23日访问达拉斯。10月3日，奥斯瓦尔德兴匆匆地直接从墨西哥回到达拉斯。10月15日，奥斯瓦尔德在他妻子的好友露丝·佩因的帮助下，在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仓库正好处在总统车队很可能要经过的路线上。11月9日，奥斯瓦尔德向苏联驻华盛顿使馆的领事处发去一封信。信中谈到，前不久他去了

墨西哥，他的妻子为此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盘问，他要求使馆人员在他和妻子的入境签证到达时，立即通知他。不过，奥斯瓦尔德的这封信却落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手里。11月22日清晨，奥斯瓦尔德在临去上班前对妻子说，他在五斗橱的抽屉里放着一些钱。待奥斯瓦尔德走出房门后，他的妻子发现皮夹子里有170美元，还有一枚奥斯瓦尔德的结婚戒指。在奥斯瓦尔德走出寓所大门时，他的邻居看见他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口袋。当天中午，一场震惊世界的悲剧就发生了，奥斯瓦尔德成为这场悲剧的主角。

联邦调查局先声夺人

当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到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后，双方立即派出专人调查奥斯瓦尔德的幕后操纵者。

中情局驻墨西哥情报站向华盛顿总部发回的电报证实，奥斯瓦尔德在9月底至10月初曾在墨西哥城逗留了几天。麦康局长立即向约翰逊总统和邦迪汇报了来自墨西哥城的有关奥斯瓦尔德曾去过苏联和古巴大使馆的情况。当天晚些时候，约翰逊总统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谈到了此事。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听到这一消息时，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半天说不出话来。或许他意识到，他们兄弟俩推行颠覆古巴的政策所产生的可怕后果，他哥哥为此丧了命。身为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决定不插手调查杀害他哥哥的案件，他把此事委托给司法部副部长卡普巴赫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肯尼迪遇刺后的第6天，胡佛成立了一个由局长助理领导的17名联邦调查局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以弄清这次暗杀阴谋。但是，胡佛没有把成立调查小组一事告诉调查暗杀事件的权威机构“沃伦委员会”。这时，中情局总部又收到驻墨西哥情报站发回的电报。电报中说，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认为，苏联人十分狡黠，他们不可能直接插手暗杀美国总统的阴谋；古巴人很愚昧，他们有可能同奥斯瓦尔德合作。中情局局长麦康立刻把这一电文转交给总统和司法部长。与此同时，墨西哥当局逮捕了曾与奥斯瓦尔德联系过的古巴使馆的一名雇员。

肯尼迪死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公开宣布：奥斯瓦尔德枪杀肯尼迪总统，完全是个人所为，古巴政府和古巴流亡人员与这次暗杀事件没有任何联系。

1972年胡佛逝世。几年后，一直与中情局有联系的电子专家戈登·诺维尔回忆说，1967年，他卷入了同调查肯尼迪遇刺有关的事件中。“胡佛要我放弃此事，而约翰逊政府和中情局的人则要我继续进行。我被告知，如果我搞下去，会引起胡佛的愤怒。但是安格尔顿说，胡佛不是没有弱点的，中情局有办法使他屈膝降服。我有这样的印象：利用性照片，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安格尔顿给诺维尔看了一些胡佛与克莱德正在搞同性恋的现场照片。“安格尔顿要我去告诉胡佛，我看到了这样的性照片。我到‘五月花’饭店，胡佛同克莱德坐在房间里。当我说是安格尔顿派我来，而且我已经看到性照片时，正在吃东西的克莱德几乎被噎住。胡佛大怒，对我说，‘滚出去！’我就出去了。”诺维尔还补充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安格尔顿对我说，这些照片是在1946年拍摄的，当时他们正在争夺国外情报的控制权，胡佛想要弄到手，但未能如愿。”

安格尔顿向胡佛亮出的这张王牌，渊源于1941年胡佛与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闹别扭。当时胡佛曾经派人搜集“包括性淫乱在内的败坏名誉的材料”，以便搞垮多诺万。然而他什么也没捞到。多诺万则投桃报李，秘密调查了胡佛与克莱德的关系。战略情报局以及后来的中情局曾多次以此讹诈过

胡佛。这些丑闻材料后来又被黑社会头子所掌握，由此胡佛的鼻子上又多了几根牵绳。

胡佛在世时，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一直是水火不容。50年代，两家的特工人员甚至在华盛顿的酒馆里大打出手，被双双扭送警察局，这成了当地报刊上的热门话题；在70年代有一段时间里，两家的人员甚至互相都不说话。

显然，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在肯尼迪遇刺一案中的不同态度都是有背景的。

后来，美国政府对肯尼迪遇刺案又进行了多次调查，仍无头绪。

中央情报局吞吞吐吐

中情局没有把他们正在进行的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向“沃伦委员会”汇报，尽管身为“沃伦委员会”成员的前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对这个暗杀计划略有所知，但是从1961年以后，他就离开了中情局，对于中情局后来和丘伯拉密谋暗杀卡斯特罗之事一无所知。然而，中情局与丘伯拉的关系对“沃伦委员会”的调查取证工作非常重要。1963年10月，中情局特情组负责人菲茨杰拉德在会见丘伯拉时，曾明确告诉对方，他是罗伯特·肯尼迪的私人代表，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丘伯拉的政变行动。这件事看来最有可能促使卡斯特罗加快采取报复行动。当时，中情局驻墨西哥情报站曾向兰利发报，提醒总部注意卡斯特罗9月7日的讲话。卡斯特罗说：“如果美国领导人继续坚持对古巴领导人的阴谋活动，古巴将进行报复。”墨西哥情报站在另一份电报中还报告，在墨西哥城苏联人的联系名册上有丘伯拉的名字。这表明，丘伯拉有可能是个双重间谍。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卡斯特罗肯定早就知道中情局要暗杀他的计划了，所以古巴人抢在前面，先下手为强（据说，丘伯拉反对古巴政府的活动被发现了，结果被卡斯特罗的反间谍机构逮捕，并判处终生监禁）。

中情局也没有把奥斯瓦尔德与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人员有接触一事透露给“沃伦委员会”。猪湾事件以后，中情局雇佣了一些古巴人在各地从事秘密活动。例如让他们在中情局的一些控股公司工作，去非洲一些国家执行秘密飞行任务……。显而易见，中情局担心讲出这些事实后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认为自己早已从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那里得知了奥斯瓦尔德企图暗杀肯尼迪的阴谋。1975年，曾与丘伯拉联系的中情局官员在向沃伦委员会作证时承认，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们同奥斯瓦尔德的接触和肯尼迪的遇刺事件有联系。那些当年参加调查肯尼迪死因的中情局官员在作证时说，要是那时知道中情局里有人和丘伯拉有联系，那么调查材料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很明显，中情局对调查肯尼迪遇刺的“沃伦委员会”隐瞒了许多事实真相，他们害怕一旦透露出某些情况，他们就得承担部分罪责，或者由此背上黑锅，甚至会被人怀疑中情局本身也插手了暗杀肯尼迪的阴谋。中情局的这些作法给“沃伦委员会”设置了不少障碍，使调查工作步履维艰。

还有一件事涉及到中情局——鲍尔斯之死。

鲍尔斯就是当年驾驶U—2型飞机被苏联击落后抓住的那个飞行员。他回到美国后，作为试飞员为洛克希德公司工作了几年，后来成为直升飞机驾驶员，为洛杉矶电视台监视高峰期的交通情况。1977年8月，他驾驶飞机做广告宣传时，机毁人亡。他死得很蹊跷。人们认为这是中情局蓄意安排的事故，因为中情局要阻止他“吐露真情”。

原来，鲍尔斯在 1970 年出版的《越境飞行》回忆录中提到：1957 年，U—2 型飞机把日本的厚木作为基地。1957 年 9 月，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奥斯瓦尔德来到厚木的雷达部队。1959 年，他投靠了苏联人，把他所了解到的有关 U—2 型飞机的性能等机密情报出卖给苏联人。鲍尔斯认为奥斯瓦尔德与 U—2 型飞机被击落有联系。其证据之一是，沃伦委员会拒绝让一份绝密文件销密。这份文件是中情局于 1964 年 5 月 13 日致胡佛的备忘录（由赫尔姆斯起草），内容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获得有关 U—2 型飞机的秘密情报”。鲍尔斯对于仍将这份文件列为秘密文件并不让他看感到不满。

1979 年，一名美国记者根据新闻自由法提出申请，得以看到这份文件。文件中说，厚木机场是 U—2 型飞机的秘密基地，有严格的飞行路线和停机场所。奥斯瓦尔德“没有机会进入这一地区”。赫尔姆斯的结论是：“没有证据或迹象表明奥斯瓦尔德与 U—2 的活动和它在日本的计划有任何联系和接触”。

人们认为，正是因为鲍尔斯表示要追查和吐露真情，并且已经涉及了奥斯瓦尔德，才导致他在正常的飞行中丧生。但这毕竟属于推测，尚无证据支持。

莫斯科的消息

当“沃伦委员会”为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准备举行听证会时，一名叫尤里·伊万诺维奇·鲁申科的克格勃官员提出要投靠中情局，他向中情局官员透露说，克格勃没有介入奥斯瓦尔德暗杀肯尼迪的阴谋。

1962 年 6 月 3 日，在日内瓦担任苏联代表团参加裁军会议安全官的鲁申科找到中情局，自愿充当间谍。他向中情局官员表示，他要作为一名潜伏在苏联境内的美国间谍，而不想被看成是投靠西方的叛逃者。其理由是，他在苏联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因此他必须留在苏联。中情局指派彼得·巴格利负责鲁申科专案，他在伯尔尼情报站工作，他对于鲁申科不是一名坐探感到满意，并安排了进一步会见。在这次会见中，中情局派遣基斯瓦尔特专程赶来提出权威性建议：如果鲁申科回到他的岗位上去，并为中情局做工作，到适当时候，就将他和他的家属接出来，给他们一份终身退休金；鲁申科现在的代号是“狐步舞专家”。鲁申科同意了这笔交易，同时他留给中情局两项情报以表诚意：1. 克格勃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最机要处暖气片后面的墙壁里藏有 52 个麦克风窃听设备；2. 英国海军部有克格勃鼯鼠，此人是个同性恋者。这两项情报都确凿无误。1964 年 1 月 20 日，鲁申科再次同参加裁军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一起抵达日内瓦，趁此机会，他又一次同中情局挂上了钩。他说有重要情报报告，希望能立即投奔美国。他还告诉中情局，自从奥斯瓦尔德在 1959 年从美国叛逃到苏联后，他就一直在克格勃处理奥斯瓦尔德的档案，并监视着克格勃和奥斯瓦尔德的关系。

在肯尼迪遇难两个月后，鲁申科突然改变了主意，要投奔美国，而且还带来了有关奥斯瓦尔德在苏联的情况，在这节骨眼上，鲁申科的这些作法引起了中情局的怀疑。但中情局官员转念一想，在“沃伦委员会”召开听证会之际，要是真的能掌握有关奥斯瓦尔德的确切情况那是再好不过了。天赐良机，不容拖延。中情局驻日内瓦情报站立即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在兰利总部。

在日内瓦，鲁申科首先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奥斯瓦尔德的情况向中情局人员做了汇报。他说，奥斯瓦尔德出逃到苏联后，便申请加入苏联国籍，但

是克格勃认为奥斯瓦尔德并没有多大用处，便打发他早日回到美国。奥斯瓦尔德发现自己不受苏联方面的欢迎，便以自杀相威胁。见状，接待他的克格勃人员心软下来，便答应让他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定居。1962年，奥斯瓦尔德从明斯克回到美国，此时他已娶了苏联妻子玛丽娜。玛丽娜并不是一个聪明人，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且有反苏言行，所以苏联方面就把这对夫妇一同打发走了。1963年9月，奥斯瓦尔德的确去过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但他是为申请重返苏联的签证才去的。按照惯例，到苏联的签证申请都要先送到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审查，这样，奥斯瓦尔德的入境签证申请正好落到鲁申科的手里。鲁申科说，是他建议驻墨西哥的苏联大使馆退回奥斯瓦尔德的入境签证。事后，当克里姆林宫听说奥斯瓦尔德开枪杀死了肯尼迪时，顿时惊慌失措，便命令鲁申科调查克格勃与奥斯瓦尔德之间的关系。鲁申科说，他对奥斯瓦尔德和克格勃之间关系的的关系是最有发言权的。鲁申科还提出，他愿意在“沃伦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

在中情局总部，负责鲁申科叛逃事件的计划部部长赫尔姆斯与计划部苏联科科长戴维·墨菲认为，鲁申科提供的奥斯瓦尔德在苏联的情况可能对“沃伦委员会”有好处，他们准备同意让鲁申科来美国。几天以后，鲁申科突然被克格勃召回了莫斯科，这时，鲁申科已经知道美国答应了他的要求。1964年2月4日，鲁申科转道来到德国，从德国的美国空军基地乘飞机直接飞抵华盛顿。赫尔姆斯当即把鲁申科叛逃之事通知了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要他们帮助收集各方面的反应。

疑 问

2月26日，联邦调查局出面盘问鲁申科有关奥斯瓦尔德和暗杀肯尼迪之事，鲁申科提供的证词正好与联邦调查局的一名代号叫“浅顶软呢帽”的耳目提供的情报相符。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耳目是以前外交官身份为掩护，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克格勃人员。后来发现此人原来是一名双重间谍。联邦调查局审讯了鲁申科以后，还没等中情局提出结论和意见，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便把鲁申科的全部供词送到“沃伦委员会”。胡佛的独断专行引起中情局的不满，这两个局之间的矛盾已经是积重难返了。

此时，中情局和“沃伦委员会”最关切的问题是，苏联或古巴在奥斯瓦尔德暗杀肯尼迪一事中究竟有无牵联；如果有牵联，牵联究竟有多少。于是，中情局非法将鲁申科带到一个拘留所，把他单独监禁起来。赫尔姆斯说：“既然鲁申科已落入中情局的手里，这使中情局面临着最棘手的问题。一方面美国总统已经罹难，另一方面，那名来自苏联的情报官员则声称，克格勃从来没有和杀手奥斯瓦尔德联系过，苏联对于奥斯瓦尔德暗杀总统的阴谋毫无所知。直到今天，这一说法仍令人难以置信。”苏联科副科长彼得·巴格利提出疑问：“鲁申科偏偏在调查奥斯瓦尔德的节骨眼上来到美国，不是有点怪诞吗？我们无法在苏联国内弄清事情的真相，在克格勃当中，我们也没有其他关系可以了解到奥斯瓦尔德的情况。克格勃在世界各地遍布了成千上万名特务，看起来我们似乎很幸运，这个唯一和中情局有秘密关系的鲁申科，竟然负责奥斯瓦尔德一案，而且还与奥斯瓦尔德的事有过三次交往：第一次是奥斯瓦尔德1959年叛逃苏联；第二次是奥斯瓦尔德去墨西哥的苏联大使馆申请签证返回苏联；第三次是奥斯瓦尔德枪杀肯尼迪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头子们要克格勃检查一下有关奥斯瓦尔德的档案。这三件事鲁申科都插手了。在克格勃的成员中，能有几个像鲁申科那样对奥斯瓦尔德的事情了解得这样一

清二楚？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中情局反间谍处对鲁申科早就提出了疑点，担心鲁申科是克格勃派出来的双重间谍，来向中情局和“沃伦委员会”提供有关奥斯瓦尔德的假情报。如果这个疑点被证实，那将是一件令人十分担忧的事情。如果克格勃真想为奥斯瓦尔德编造假情报的话，那只能说明克格勃想掩盖奥斯瓦尔德是克格勃间谍的事实。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发现鲁申科的讲话漏洞百出，因而他声称不能担保鲁申科投奔美国的诚意。反间谍处对奥斯瓦尔德有怀疑，这当然也影响到副局长赫尔姆斯的态度。4月份，赫尔姆斯向“沃伦委员会”主席、首席法官沃伦表示，他对鲁申科叛逃美国的诚意也持保留态度。赫尔姆斯说：“我们不知道鲁申科在‘沃伦委员会’面前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我们不能为他投奔美国的诚意作担保，也不能对他的讲话是否属实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情况提请‘沃伦委员会’认真考虑。至于联邦调查局在鲁申科投奔美国后不久，向‘沃伦委员会’呈送的那份有关奥斯瓦尔德情况的报告是值得怀疑的。我尽量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我不想使用极端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也不想把这件事情戏剧化，我只想强调说，我们不能为鲁申科的诚意担保。”“十分感谢，我将把你的话转告‘沃伦委员会’的同事们，我十分珍视你告诉我们的情况，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的。”首席法官沃伦诚恳地回答赫尔姆斯。

谜团

令人遗憾的是，按照约翰逊规定的期限行事的“沃伦委员会”，在1964年9月27日发表的最后调查报告中，既没有提及鲁申科在联邦调查局的供词，也没有提及他在中情局的供词。“沃伦委员会”撇开了鲁申科突然投奔美国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提出了奥斯瓦尔德刺杀总统是单独行事，不存在其他阴谋的结论。这个结论立即遭到了来自各方的种种非议和驳斥。鲁申科本人在肯尼迪死后所担负的到底是什么使命，现在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中情局认为，鲁申科不外乎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鲁申科本人是一个真心实意投奔美国的克格勃人员，然而他的叛逃企图在他付诸行动之前已被他的克格勃上司察觉，于是克格勃杜撰了奥斯瓦尔德的传奇故事，又故意让鲁申科叛逃到美国，来蒙骗美国人。第二种可能性是，鲁申科是苏联的一名反情报间谍，是来欺骗中情局和“沃伦委员会”的，是企图使美国人不再信任投奔美国的其他苏联人，并且把“沃伦委员会”对奥斯瓦尔德和克格勃关系的调查引入歧途。

围绕着鲁申科叛逃美国之事在中情局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主要负责审讯鲁申科的苏联科副科长彼得·巴格利和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等一批中情局官员认为，鲁申科在叙述许多事情时，都在编造谎言；实际上，奥斯瓦尔德当年在苏联时受到了良好的接待，他很可能是为克格勃效劳。不过，怀疑克格勃直接插手了暗杀肯尼迪的阴谋也并非可信。鲁申科可能是克格勃派出的一名间谍，其目的是为克格勃辩护没有参与暗杀行动。直至15年以后，巴格利在国会作证时仍然斩钉截铁地说：“我相信鲁申科是克格勃的间谍。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所叙述的有关奥斯瓦尔德在苏联时的情况都是克格勃编造出来的……克格勃精心编织出这样的故事，证明他们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要隐瞒。”

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认定鲁申科是两面间谍，并开始逼迫他承认。但鲁申科不屈不挠。于是，安格尔顿的反间谍处在华盛顿附近的秘密基地上专为鲁申科造了一座小监狱。他被单独监禁在那里达3年半。表面上说，这是

为了孤立他以利审讯更有成效。事实上，在监禁的 1277 天中，只有 292 天受审讯。有时，连续审讯 24 小时，不让他休息。不受审的时候，他日夜受到监视，禁止看守人员同他谈话。在这些年月里，他同外界没有接触，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报纸。两年多不给他任何读物。他曾做了一个权当日历用的玩意儿，也被拿走了。鲁申科的胃口正常，但人消瘦了许多。用他的话说：“我饿，这是最折磨我的。因此我没法不去想食物。我想食物是因为我老想吃。我只得到很少、很恶劣的食物。”他的牢房没有窗户，只有门上有一个带铁栅栏的小洞。一张铺草垫的铁床，没有枕头、被单，偶尔给一条毛毯算是唯一的铺盖。到了冬天，鲁申科还是一身单衣。他要牙膏和牙刷被拒绝，每周只能刮 1 次脸。整个期间，鲁申科曾有 17 次被喂了毒品，分别属于 4 种不同品种，每次 1 种或更多。医生隔些时候就来对他施加心理压力。

从 1964 年 4 月至 1967 年 9 月，鲁申科一直被中情局反间谍处监禁在一个 8 英尺见方的小牢房里，受到严厉的审问，以查清他究竟是不是传递假情报的苏联间谍（其实，这也是局里反间谍专家们为了讨好上司所玩弄的一种把戏）。1967 年，苏联科对鲁申科的审讯情况写了一份 900 页的报告，正式宣布鲁申科是苏联的反情报间谍。一年后，又将这份报告缩短到 447 页，送交赫尔姆斯。中情局的这一结论和 1964 年 9 月“沃伦委员会”呈送约翰逊的调查报告发生了冲突。左右为难的赫尔姆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从安全室请来了布鲁斯·索利，要他再写一份调查报告。索利是个局外人，从未插手过鲁申科的案件。他首先解除了对鲁申科的监禁，以友好的态度和鲁申科相处。经过 9 个月的接触和交谈，索利于 1968 年写出了结论报告，认为鲁申科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1977 年，第 10 任中情局局长史坦斯菲尔德·特纳为了搞清鲁申科的真相，委托退休的中情局官员约翰·L·哈特再次进行调查，其结论与索利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哈特认为，鲁申科提供的情报过去都被曲解了。鲁申科投奔美国的诚意最后终于被承认，并受聘为中情局的“顾问”。中情局局长特纳坚持认为鲁申科不是苏联间谍，是真诚投奔美国，而且他对反间谍处虐待鲁申科的做法相当气愤。但是，巴格利等人依然不服，他们用种种理由反驳哈特的观点。显而易见，鲁申科案件仍然是中情局里的一桩悬案。人们认为，只要这个悬案没有真正解开，肯尼迪被刺之谜将永远是个未知数……

策反与间接证据

1964 年春季的一天，一名美国官员正在莫斯科参加一次外交会谈。席间，一位苏联“外交官”走过来闲聊似地说：“到东柏林找杜姆布劳斯基，”美国人接着又跟他“闲聊”了两句，各自

回到会谈双方的阵营中去了。看上去，这只不过是一名苏联外交官同一位美国外交使节的正常交际而已，即使双方有最好的间谍在场，恐怕也难生疑窦。殊不知这位递送情报的“外交官”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花费重金收买多年的情报员。

翌日大早，这位美国“外交使节”匆匆走进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6 楼的情报中心，用密码书写了一份文件，随即拍往西柏林美国中央情报局总站。其实，这位美国“外交官”压根就不认识杜姆布劳斯基，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只不过是一名以外交官身份从事情报传递的联络员罢了。

然而，情报传到西柏林后，却引起了巨大反响。希弗雷德·杜姆布劳斯基是何许人也，中情局非常清楚。身材瘦长的杜姆布劳斯基总是戴着一副墨

镜，他有许多化名，但是他的真实姓名却从来无人知晓。当时，他是苏联驻东柏林情报站副站长。杜姆布劳斯基在国内已经遇到麻烦，莫斯科正准备召他回国，围为有人已经受到制裁，当然，杜姆布劳斯基也在被检举之列，可是，杜姆布劳斯基并不知道这些。

中情局在西柏林的情报总站的策反行动组顿时忙得开了锅。总站首脑一边亲自调兵遣将组织人马，一边周密策划面授机宜。他当即决定，马上把策反杜姆布劳斯基的队伍组建停当，一当华盛顿指令到达，立即行动。

此次策反具有双重意义：首先，策反本身的意义重大，杜姆布劳斯基是克格勃的重要人物，他直接指挥克格勃在西柏林和西德的间谍网，掌握许多高度机密；另外，他与叛逃美国的鲁申科曾经在一起工作，因此对他进行策反将有助于对鲁申科一案的判断。如果鲁申科叛逃是真，那么杜姆布劳斯基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克格勃势必要追究，因此他本人的“忠诚”也就成了问题，作为资深的老特工，杜姆布劳斯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切，要么被清洗，要么到西方；如果杜姆布劳斯基对自己面临的险境无动于衷，那只能说明鲁申科是克格勃精心安排的一个诱饵……

策反组由心理学家、体育学家、物理学家和一名退休的大学历史教授组成。他们正在仔细研究杜姆布劳斯基的履历和嗜好。这位克格勃头子尚未娶妻，喜好女色，酒量不大，但喜爱社交生活；他挥金如土，到处猎取艺术珍品和金银玉器，以备回国后继续享用。显然，这位达官贵人已经完全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策反组在对杜姆布劳斯基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以后，认为他们眼下首先应给这位间谍大师制造一点恐惧心理，使他感到自己就要被召回莫斯科，这种花天酒地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同时，再给他留下一线希望：倘若他能与西方合作，供出克格勃派往西方的重要间谍的名字，可望得到 10 万美元的奖金，身边有一名私人保镖，终生受到保护，还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方案确定以后，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见到这位克格勃的神秘人物，并在东西柏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看来，匿名信是个最好的办法。这天夜里，杜姆布劳斯基返回住处，发现有一封用俄文写的信件插在门缝里。信中说，他在国内已经遇到麻烦。无论是真是假，这位副站长满腹疑虑，而且内心深处埋下了恐惧的种子。接着就是第二封信，第三封信，告诉他一件接着一件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

与杜姆布劳斯基见面的时刻终于到了。一封信告诉了他东柏林见面的地点，这位苏联克格勃的头面人物届时乖乖地按照预定的暗号，将一张凳子放到了自己寓所的地板上，表示愿意接受会晤的建议。几天之后，一名美国游客身背一架照相机，出现在东柏林的街头上。此人不会讲德语，在东柏林秘密警察眼里，他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美国哑巴”而已。其实，他就是中情局精心选派前来与杜姆布劳斯基会晤的策反组历史学教授，他能讲一口地地道道的俄语。

“你想要什么？”这位苏联情报头子有点神经质问道。他知道来人是一名西方特工，他小心询问时也在狡黠地窥视对方的来意。

“你在莫斯科已经遇到麻烦”，美国佬语调肯定地对他说，并进一步透露，此消息是最近投奔西方的、他的俄国同行鲁申科（此人曾在杜姆布劳斯基手下干过）提供的。还说“莫斯科将要谴责你对鲁申科问题的失职；一旦你应召回国，克格勃就会立即逮捕你，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你很清楚……”

美国佬用力耸了耸肩膀，杜姆布劳斯基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美国人从他那张拉得老长的马脸上已经看出，杜姆布劳斯基上钩了。

两位谍坛老将第二次会面时，这位俄国佬仍在照常工作，显然他并未接到奉召回国的命令。倘若真有其事，克格勃的特务们也早该找上门来了。当然，这位苏联间谍头子也绝不会坐以待毙，他肯定已经同莫斯科的友人取得了联系，看来还是无风不起浪。俗话说，先下手为强。此时，这位俄国佬不得不为自己的退路的着想了，出路只有一条——叛逃！

杜姆布劳斯基下定决心之后，接着考虑的是自己要多少钱。他是知道自己的身价的，于是他开出了50万美元的价码，而且钱要存放在纽约银行；投奔美国后，必须长期得到人身保护，以免遭到克格勃的暗杀。这就是第二次会晤时，杜姆布劳斯基向历史学教授提出的所有条件，也是中情局要向东柏林的苏联克格勃第二号人物付出的全部代价。不久，杜姆布劳斯基经由西柏林顺利抵达华盛顿，一张克格勃安插在美国的工作人员名单出现在中情局局长的办公桌上……

杜姆布劳斯基来到美国后，中情局内部关于鲁申科一案的争论更趋激烈。后来有人提出疑问：大量的证据表明，鲁申科的真实性无可置疑，而反间谍处为什么还将他长期关押（而且很少进行审讯）并死不认错呢？他们与肯尼迪遇刺一案究竟有无联系？

“华盛顿种马”

肯尼迪对女人的嗜好，在现代美国历任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还在他当参议员时，就被封号为“华盛顿种马”。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他的一个高级助手私下预言：“上届政府专心打高尔夫球，这届政府将专心玩女人”。总统顾问索伦森也曾意味深长地说：“伴随肯尼迪政权的将是色情。”

虽然肯尼迪有一个美貌聪慧的妻子杰奎琳，而且共同生活了10年，但是他们二人并无真正的感情。肯尼迪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没有离婚。

肯尼迪的“情人”实在是太多了。在他死后，女秘书、女招待，社会上的女明星、女演员、女记者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妇女，都从不同程度上宣称与这位总统有过“风月性质的交往”。

就在肯尼迪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当天，6个妖冶的小姐在他周围站成一排卖弄风骚，肯尼迪挑选了两个，开始了入主白宫的生活。当天晚上，举行了5个庆祝舞会，第一会场在伊梅弗拉饭店。经过一番逢场作戏后，肯尼迪离开杰奎琳和约翰逊副总统夫妇，来到楼上参加第二个舞会，周旋一会儿后，他便迅速爬上楼梯，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女演员安吉娜幽会，然后，装作散步的样子回到楼下包厢。

肯尼迪常常和保镖们一起寻欢作乐，他不但让他们去物色美女，还十分开通地让他们随心所欲地玩女人。当他要出外休假时，先遣队员们要提前两周到达预定地点，为总统物色好“数量很多”，能满足消费的漂亮女子。

对那些不谙春情的新手，肯尼迪是平易近人的，经常为他们开绿灯，随他们便，自己不过问私事。

从私生活上讲，肯尼迪处事对人很随意，且能容忍一切人的愿望。因此，他周围的人对他很满意，没有怨尤之言。

肯尼迪嗜好游泳，而且喜好与女人游泳，每当有这种活动时，他就为侍从们放假。如果杰奎琳不在，白宫就是美女们的天下了。这些女人毫不避讳，

追逐嬉戏，尽情玩乐，使总统非常开心。

一次，白宫的养狗员想到地下室去，刚打开电梯门，里面却跑出一个赤条条的金发女郎，定睛一看，原来是总统的女秘书。她惊慌地问他：“总统到那里去了？”像这样的事有几次险些让杰奎琳撞上。

但杰奎琳却表现得十分豁达，她经常外出旅行。

就在肯尼迪畅游“欲海”时，光彩照人的美国性感明星玛丽莲·梦露出现了。她使一切女人都黯然失色。政坛黑马立即醉倒了。

梦露经常冒充肯尼迪的妹夫皮特·罗弗德的秘书出入白宫。罗弗德心领神会，常常安排梦露与肯尼迪幽会，甚至还让梦露与肯尼迪一道来自己的海滨别墅住上一段时间。

肯尼迪的另一个情人是华盛顿的社交界名人、艺术家玛丽·迈耶夫人。直到总统遇刺时，两人还有交往。如果不是一起离奇的悲剧事件，他们的韵事可能至今无从泄露。

玛丽与肯尼迪在大学期间就相识。1956年她与科德·迈耶离婚后，搬到离布莱德利办公室不远的一所画室，从此便与肯尼迪重温旧情。

玛丽的密友是《华盛顿邮报》副主编詹姆斯·特鲁伊特的妻子、雕塑家安·特鲁伊特。显然，玛丽把她与总统的韵事告诉了特鲁伊特夫妇，这才使詹姆斯有可能在肯尼迪被刺多年后，将这件事公开，引起轰动。

肯尼迪第一次与玛丽上床是在1961年12月，即他当选总统一年之后。到了1962年春，他们的关系已经相当稳固。每当杰奎琳出门，玛丽就到白宫去。她在日记写道，有一次，她带了6支大麻烟卷去和总统幽会，两人一共抽了3支，直到肯尼迪停下来时说：“别再玩了，说不定苏联人已经采取什么行动了。”

与肯尼迪的朋友和崇拜者一样，她对1963年11月23日总统之死感到悲痛和震惊。她却不知道自己在一年之后也惨遭厄运。

1964年8月13日，她正在运河故道散步，突然遭到枪击，她的头部和胸部各中一弹。警察未能查明凶手作案动机，却拘捕了一个叫雷蒙德·克伦普的25岁的工人。

据目击者说，他曾与玛丽撕打。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经过审讯后，只得将他释放。凶器也未发现。

后来，布莱德利的一个亲戚在电话里告诉他说，玛丽有一本日记，她生前曾想把它烧掉。这使玛丽之死更加神秘化、复杂化了。

几个月后，布莱德利夫妇拿到了那本日记。据说其中多处提到玛丽自己与肯尼迪的交往，从而使人们确信他们之间存在一段浪漫史。

布莱德利夫妇把这本有犯罪牵连的日记交给了他们的朋友、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后来，安格尔顿“谨慎处理”了这本日记，也可能像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在中情局总部毁掉了。

1975年，众议院情报活动委员会对肯尼迪遇刺案进行了第4次调查，结果又发现了一个女人，她就是朱迪丝·坎贝尔。

坎贝尔与芝加哥黑手党头子吉安卡纳和罗塞利关系密切。1960年2月，她的情人、歌唱家弗兰克·辛那特把她介绍给肯尼迪。于是，他们立即开始了幽会。幽会的地点遍及全国，包括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帕尔姆海滨……

这位相貌酷似杰奎琳的黑发美女在后来出版的自传《我的故事》中说，肯尼迪向她讲述了自己的婚姻危机，而他的政治雄心使他不得不与杰奎琳同

床异梦。坎贝尔与肯尼迪在白宫共进午餐并做爱至少有 20 多次。他们浪漫史的高峰是 1961 年夏，到了 1962 年春，关系即告结束。

她说，有一次肯尼迪向她提出邀请另外一个女人三人同居一室的建议，被她愤怒地拒绝了。她还说，肯尼迪对好莱坞的闲言碎语很感兴趣，喜欢听她讲述谁跟谁一块上床的桃色新闻。

坎贝尔与肯尼迪通过许多次电话。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当时正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协同进行反恐怖活动。他把坎贝尔同吉安卡纳的关系通知了总统，并私下警告总统，同她继续私通最终会损害他的政治生涯。

胡佛还指出，在 1961 年到 1962 年约 54 个星期里，他们二人互通电话达 70 多次，其中坎贝尔给白宫的电话是从吉安卡纳家中打来的（后来她否认这一事实）。胡佛曾利用这件事向总统施加压力，以便允许他的手下对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进行调查、骚扰和窃听电话等活动。

胡佛对总统隐私的揭露和警告可能是使肯尼迪结束与坎贝尔私通的原因，尽管后者对此持有异议。

二十五、肯尼迪遇刺真相

1994年，在美国悬置了27年的肯尼迪总统遇刺谜团终于真相大白，昭揭于世。由于这一案件相当曲折，必须先从来龙去脉说起……

来历·交易

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乔·肯尼迪是个爱尔兰移民，靠贩卖私酒起家，发了一笔横财。在纽约和芝加哥黑社会的帮助下，老肯尼迪的萨姆塞特公司搞到了3种最赚钱的私酒在国家的进口经销权。这个买卖一直做到30年代。此外在20年代，老肯尼迪还钻入好莱坞影界搞了不少牵线的幕后交易，从中赚了大钱。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前夕，老肯尼迪和一些工业资本家像大众汽车公司达瑞特和洛克菲勒等都知道市场将要面临的大崩溃，他们在市场崩溃之前利用市场短缺赚了上百万的美金。用知情者的话说，“经济危机就是他们一手制造的”。

30年代，老肯尼迪利用他在东海岸地区发展基金争取捐资活动的影响，进而为自己在美国政府中谋得了国家安全与进口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职位。4年后，也就是1938年，地区发展基金会给了他“肥得流油、让人眼红”的驻英国大使的职位，用以换取相应的一大笔钱。

与其他黑道人物不同的是，老肯尼迪一心要让儿子们在美国政界飞黄腾达，他不仅要钱，还梦想着要权要势，要整个美国。在老肯尼迪的扶持下，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兄弟俩在50年代中期已经当上并连任美国参议员，正在准备向白宫冲刺。

而就在这时，老肯尼迪与他的顾问、黑社会头面人物弗兰克·卡斯特罗吵翻了。于是弗兰克联系了美国各黑帮组织，准备签署一个针对老肯尼迪的条约，以搞垮肯尼迪家族势力。如果此事得逞，老肯尼迪的儿女升官图必毁无疑。为此，老肯尼迪求助于美国黑社会老大，奥菲特（芝加哥黑社会集团）总头目莫尼出面消弭。

山姆·莫尼·吉安卡纳（1908.5.24~1975.6.19），原是意大利西西里的移民（西西里岛是世界著名的黑手党发源地），青少年时代混迹于街头无赖之中，后来加入臭名昭著的黑社会“42号”帮派。在几十年经营中，他通过谋杀、暴力、抢劫、色情等阴谋手段控制了整个芝加哥，直至全美国，并将业务扩展到古巴、墨西哥、欧洲和亚洲。1953年，在哈瓦那召开了黑社会各犯罪辛迪加老板大会。会上，美国全国36个最大犯罪团伙首领公推莫尼为总首领。他的势力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行业之中，直接控制着大部分赌博业、色情业、建筑业、运输业，以及毒品、宝石、军火走私等等。每年进项达10亿美元。

1956年3月，老肯尼迪风尘仆仆来到芝加哥东方大使饭店会见莫尼，请求他制止并赶走弗兰克。莫尼指出，老肯尼迪过去靠弗兰克赚了不少的钱，可是他过河拆桥，现在拒绝为弗兰克的一些非法资产做掩护，欠了弗兰克很大一笔人情，违反了黑社会的规矩。老肯尼迪说：“我现在负担不起我们的交情，我的儿子现在也负担不起我们的交情。”

“这是侮辱！”莫尼怒吼道，“你他妈的怎么想的？啊？……你知道他打算怎么报复你吗？”

“这我知道，他有一个条约反对我。”

“那么，你怎么会认为我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你想怎么样？”

“你知道，我的儿子约翰·肯尼迪在政界正在不断地提升……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成为总统。现在，我不能让他受到威胁，是吧？”

莫尼转过身来：“那么你想让我干些什么呢？”

“和弗兰克谈谈……让他明白。如果你不让这个条约停止的话，我就是个有瑕疵的人了。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能帮助我的儿子走进白宫。在里面有个咱们的人，这难道不是我们全都向往的吗？”

莫尼又转向窗外，背对着老肯尼迪：“假如我和弗兰克谈判……我没有看到这对芝加哥有什么好处……你对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许诺。”

“我能回报，我会的。你现在帮助我，山姆，我将来会留心芝加哥……而你……可以坐在他妈的白宫的办公室里，如果你想要的话。你会得到从总统那里得到的信息。但是，我只需要时间。”他焦虑地说，“我被逼无奈，我想如果有这个条约，如果我儿子被搞成这种背景，他可能竞选不会成功，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要你去和弗兰克谈判了吧？”

莫尼转过身，望着他的眼睛：“让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但是当你儿子被选上的时候，你要实践你的诺言……那天是——”

老肯尼迪插话说：“那天也是你山姆·莫尼·吉安卡纳当选的一天。他将是你的人，我发誓。我儿子……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会知道他欠你他父亲的生命。他不会拒绝你的。你放心，我的诺言会实践的。”

当天晚上，莫尼给纽约挂了长途电话，那个反对老肯尼迪的条约被取消了。

老搭档

这里，需要将莫尼与中情局的老关系做一介绍，以揭下文。早在 50 年代初，莫尼的奥菲特组织就和中情局有了来往。莫尼曾经帮助芝加哥的联邦警察局将中情局的鲍勃·马赫推上领导层，使他从泰斯手里夺过了领导权，从而成为奥菲特的内线人物，并一直为它工作了多年。在中东、危地马拉和亚洲，只要奥菲特组织需要，中情局都会提供帮助，为奥菲特组织的非法活动提供保护。作为替黑社会服务的回报，中情局每年从哈瓦那运往美国本土的贩毒利润中提取 100 万美元的好处费。中情局在其他方面也依照这个惯例，一般从奥菲特的利润中提取 10%， “以供他们见不得人的一些挥霍”，这些钱款大都存在瑞士银行、意大利银行和巴拿马银行，而且帐号秘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相安无事。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无孔不入的黑势力。

50 年代后期，随着古巴国内暴乱骚动的逐步升级，美国政府想派兵支持古巴的政变者推翻巴蒂斯塔的统治，以便使将来的新执政者对美国的利益提供保护。中情局转而寻求奥菲特组织的帮助。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在哈瓦那有几百万美元的投资，这些利益正受到古巴动乱的影响。

奥菲特总首领莫尼同意与中情局合作。他派遣麦卡维利去充当哈瓦那首领罗费肯特的助手（此人过去是中情局泰斯手下的得力干将之一，他曾经和奥菲特的人一起从事军火买卖和贩毒生意），以便保证合作的顺利实施。合作的内容是：中情局从奥菲特手里购买军火（钱款出自奥菲特其他项目利润中为中情局提取的好处费。因为在中情局的正当开支中没有这笔预算，无法既支持巴蒂斯塔政府，暗地里又支持反政府组织），为古巴反政府组织（其

中包括卡斯特罗的组织)提供武器。奥菲特负责联系和购买军火,然后把它们存放在中情局的仓库里,最后通过海运或空运到达古巴。中情局只负责接受船只和飞机的运货。奥菲特组织的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即中央情报局)签订合同,把船只和飞机出租给它。麦卡维利负责与中情局联系并把枪支送往洛杉矶;罗费肯特的另一个手下将和中情局的一些人把武器送给反政府组织。

整个行动进行得很顺利,巴蒂斯塔政府最终被卡斯特的由72人起家的游击队推翻了。为了庆祝他的胜利,美国迈阿密市长还带着乐队和身着军服的少女亲赴哈瓦那。

莫尼与中情局还有其他交易。通过奥菲特与梵蒂冈的关系以及隐密的银行交易,莫尼帮助中情局将非法所得的数百万美元汇入梵蒂冈顾问辛多纳的“基金库”(用于收买政府官员、从事隐蔽行动等),作为交换,中情局向梵蒂冈提供了丰厚的施舍……此外,莫尼还在中情局的世界性走私和洗钱的冒险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资助·成功

1959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老肯尼迪知道,如果没有强大的黑社会予以支持和协助,要想使他儿子约翰·肯尼迪克服障碍,获得总统提名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再一次通过电话求助莫尼,这个能把整个国家的黑社会的势力全部带过来为他儿子夺取总统宝座而效劳的人。

老肯尼迪告诉莫尼,“联合起来,咱们将势不可挡。”莫尼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操纵总统比当总统有意思。莫尼决定,全力以赴支持约翰·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当然,这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莫尼绝不会白白付出代价的。现在,老肯尼迪已把自己的生命归功于莫尼,但是那远远不够,莫尼要的是他的灵魂,以及他儿子的灵魂。

莫尼并不相信肯尼迪这个老头,为了保证他们的忠心,为了保证他们偿还债务,莫尼命令好莱坞的总管弗兰克·辛纳特拉以及另一个黑帮头子默雷“为约翰·肯尼迪提供骚娘们来实现这个计划。”辛纳特拉是莫尼最信赖的帮手,同时又是肯尼迪家族的好友,特别是约翰·肯尼迪的玩友。按照莫尼的指令,辛纳特拉已为肯尼迪准备好了所需要的骚女人,而且还有更多的女人在排着队等候前往……

在莫尼的眼里,老肯尼迪的儿子继承了他们的父辈对于女人肉体的强烈爱好,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老肯尼迪经常出入卡尔纳瓦,打牌赌博,享受风骚女人。50年代初期,约翰·肯尼迪就已步其父的后尘,在卡尔纳瓦找了一个僻静的小别墅,在里面尽情淫乐。莫尼本人曾多次参加肯尼迪们在卡尔纳瓦的“聚会”。聚会中,这些男人“或与两个有时更多的卖笑女子一起淫乱。在澡堂里、在过道中、在阁楼上、在地板上,但是从来不在床上。”莫尼自己先后与几百个漂亮的影星和名模“享受肉体的欢乐”,而肯尼迪父子们也不逊色,他们玩过的女人至少有100个以上。

莫尼快活地告诉别人,肯尼迪家族的人“喜欢那种秘密的、不正当的刺激和激动,”而且“越不正当就越好”。莫尼相信,只要有合适的女人,他就能把约翰·肯尼迪掌握在自己手中。

莫尼为了掌握肯尼迪家族的肮脏秘密,特地将卡尔瓦纳买下,所有地点都用窃听线路连接起来。“我要给这个全美闻名的家族准备好足够多的烂泥,在需要的时候抹在他们的脸上。”

1959年秋，老肯尼迪与莫尼就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等事宜在芝加哥东方使者酒店举行了3次秘密会谈，最后确定了相互间的协议，当时约翰·肯尼迪也在场。由老肯尼迪和莫尼拿出初步方案，然后约翰·肯尼迪与莫尼进行最后敲定。

在会谈中，莫尼提到了他与中情局的合作关系，约翰·肯尼迪对此惊诧不已，一直牢记在心……

会后，莫尼得意忘形，他狞笑着对自己的弟弟说：“我已经从约翰·肯尼迪和他下流的老爹身上弄到了不少烂泥，足以毁掉10个政治家的前途。我这里有他们大量的照片、录音磁带、胶卷，都安放在保险柜里。美国公众一定很高兴看到他们的总统被3个女人弄得舒舒服服。哼！我如果需要打出一张王牌，钥匙就在这里！”

1960年1月，在肯定自己收集的烂泥已经足够迫使肯尼迪家族遵守双方订立的契约之后，莫尼指示辛纳特拉开始行动，支持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

辛纳特拉动员了他在影视界的所有力量，让好莱坞的一大批明星出面支持约翰·肯尼迪竞选，他们都与莫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由辛纳特拉出面，邀请约翰·肯尼迪参加在好多个明星家里举行的支持他竞选的豪华聚会。作为压轴戏，辛纳特拉邀请肯尼迪参加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由他的朋友和支持者举行的集会。

在拉斯维加斯，肯尼迪被作为皇室成员接待。屋子里的一切，从卧室到洗漱室都是那样富丽堂皇，极尽奢华。慢慢地，约翰·肯尼迪越来越深地卷入莫尼的世界。“莫尼不一定参加明星们的每一次晚会，但是他的影响却从每一个起居室、旅馆、舞会、闺房的每一个角落里显示出来”，一切都由莫尼那双看不见的手安排好了。

莫尼坚持要辛纳特拉再找一些合适的姑娘，并建议他再邀请约翰·肯尼迪到拉斯维加斯的桑迪来，然后把这些“诱饵”介绍给未来的总统（莫尼称这些女人为诱饵）。

1960年2月7日，在拉斯维加斯的桑迪，辛纳特拉把他的又一个漂亮的棕色美女朱迪·坎贝尔介绍给约翰·肯尼迪。在莫尼看来，朱迪与其他的骚女人有所不同，对约翰·肯尼迪更有魅力。

3月，约翰·肯尼迪与朱迪·坎贝尔正式同床，并经常从他的政治竞选中抽出时间来与她幽会。莫尼得知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就是要在约翰·肯尼迪身边安置一个“正式的”姘头，这样才有利于控制肯尼迪。约翰·肯尼迪频频换女人曾使莫尼大伤脑筋，因为这容易使约翰·肯尼迪失控。

竞选活动开始了。其间，莫尼与老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在纽约、芝加哥和卡尔纳瓦多次会面磋商。约翰·肯尼迪对美国的几个州有点担心，其中最担心的是西弗吉尼亚。莫尼通过他在卡尔纳瓦的代理人史基利告诉老肯尼迪，他可以负责解决西弗吉尼亚的选票，但有一个条件，就是约翰·肯尼迪当上总统后，要让阿多尼斯回国。因为东部的黑帮伙计们希望阿多尼斯回来。“让一个被放逐的匪徒重新回到这个国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老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说，他们需要考虑一下。

莫尼还向肯尼迪父子说明，目前卡车司机协会不会公开出来支持约翰·肯尼迪，否则会使麦卡锡委员会对豪夫及其手下产生怀疑。“但是在这之后就好办了，不会出问题的。”莫尼从协会中提取200万美元支持约翰·肯尼迪的竞选活动，条件是要约翰·肯尼迪指令罗伯特·肯尼迪不管卡车司机协会

的事。约翰·肯尼迪同意了。

整个肯尼迪家族都出动了，为约翰·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拉选票。然而，真正能得到选票的地方是在那些大型场面、摄像机镜头之外。莫尼派史基利带着满满一箱子钞票赶赴西弗吉尼亚州，这是他再次追加的 50 万美元……

7 月，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尼迪击败汉弗莱，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会前，莫尼与老肯尼迪讨论了约翰·肯尼迪竞选伙伴的人选。莫尼代表黑帮势力向老肯尼迪推荐一个叫林登·约翰逊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作为约翰·肯尼迪的竞选伙伴。尽管老肯尼迪并不喜欢约翰逊，“但是我们需要约翰逊留在白宫，”这样，“我们可以操纵整个他妈的国家了”。老肯尼迪同意了。“因为他欠约翰逊不少情：作为给老肯尼迪的一个恩惠，约翰逊让约翰·肯尼迪进入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它奠定了约翰·肯尼迪政治生涯的基础。”于是，老肯尼迪说服了他的儿子选择约翰逊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这一决定使肯尼迪的支持者，包括罗伯特·肯尼迪对此责骂不已。

虽然肯尼迪得到了奥菲特全力的支持，但奥菲特仍然是“两面下注”，他们绝不在一家身上押赌注。莫尼和另一个黑手党头子马塞罗给了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尼克松 100 万美元。同时，给林登·约翰逊也是 100 万美元。但是都比不上给约翰·肯尼迪的数目。奥菲特光是为约翰·肯尼迪初选时的选票就花费了 800 万美元。

奥菲特组织与尼克松一直相处得很好，莫尼在华盛顿还与他多次会面。当时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担任副总统，并以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身份与肯尼迪竞争。尼克松在政府中帮过奥菲特的忙：给了莫尼一些高速公路修建合同。在此之前的 1947 年，由于他的出面，使莫尼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黑帮头子罗比免于在议会面前受到质询（当然，“奥菲特也帮了他和他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伙计的忙”）……正因为尼克松与奥菲特的关系不错而且源远流长，相互间比较了解和信任，因此曾有人主张在总统竞选中支持尼克松。但莫尼认为，当初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时，奥菲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帮了他的忙，而且，现在也为他竞选总统下了注，因此不欠他的人情。特别是，老肯尼迪已经许过大愿，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支持尼克松是“一条安全的路子，但安全的路子不能通向我想到达的地方”，对于莫尼来说，支持尼克松得到的是“牛奶”，而支持肯尼迪得到的是“整个奶牛”。“究竟是要牛奶还是要奶牛？我呀，我要的是整个奶牛！”莫尼斩钉截铁说。

1960 年 11 月 8 日，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在全美国展开了。为此，莫尼让辛纳特拉任职于竞选办公室，每隔半小时收到一些竞选报告，通知幕后坐镇的莫尼。前一阶段均表明肯尼迪领先，但到了午夜，形势发生了逆转，NBC 电台新闻发言人预言尼克松将取得胜利……一阵匆忙中，约翰·肯尼迪从哈依尼斯机场给芝加哥黑帮头子达利打电话，火速求援。达利找到了莫尼，于是莫尼向其余尚未公布投票结果的地区的黑帮首领们发出紧急行动的命令，要他们竭尽全力扭转败局。莫尼的手下人马以约翰·肯尼迪的名义动员起来了，把所有能想到、能运用的阴谋手段全部施展出来。莫尼急红了眼，他豁出去了，简直把老命都搭上了！

为了保证选票，奥菲特组织成员四处招揽民众，从一个选区到另一个选区，从一个投票处到另一个投票处，以至于他们投了大量超额的选票。站在

投票箱前，他们很清楚，所有的选票都将归于肯尼迪。偶尔有一些不明底细的市民宣称，他们不需要这样的暴政，于是便遭到莫尼手下恶棍们的毒打，一些人的胳膊和腿骨被折断，以至于投票站被迫关闭……

在不少地方的选区（例如芝加哥），选票是故意伪造出来的。在尼克松的根据地伊利诺斯州，他只赢了 4500 张选票。在官方要求重新统计的时候，却没有人去复查，同时，奥菲特组织向尼克松施加了压力……尼克松本人承认失败了。

就这样，约翰·肯尼迪仅以不到 10% 的优势击败了尼克松。莫尼后来承认，光凭他个人根本无法取得成功，黑手党所有成员都发挥了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集体的力量，才勉强将约翰·肯尼迪推上总统宝座。如果没有奥菲特全力以赴的支持，肯尼迪家族即使累吐血也断不会入主白宫。

作为约翰·肯尼迪的最大支持者，莫尼同意辛纳特拉去华盛顿筹备总统就职庆典，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盛大的庆典……

古巴问题

就在肯尼迪正式上台之时，莫尼利用白宫的新关系，开始着手扩大他的黑社会圈子，接触各种独裁者、总统和皇帝。他们来自各个国家，如海地，多米尼加、伊朗、黎巴嫩、意大利、法兰西、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菲律宾和老挝。

8 月份，莫尼与中情局的朋友们商定共同打击古巴的卡斯特罗、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和“刚果的黑鬼”卢蒙巴。

莫尼曾经告诉他的弟弟：“无论如何要给卡斯特罗以重大打击，至少奥菲特帮要这样做。肯尼迪一上台，卡斯特罗就会受到打击……美国所有的人都必须资助我。”

莫尼回忆说：“我们帮助中央情报局将武器运给卡斯特罗，原指望那家伙会补偿我们，在生意上给我们便利。但是卡斯特罗忘恩负义……如果曾经存在过一个杂种的话，他就是一个他妈的双倍的杂种！”

莫尼继续谈到，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是最早策划除掉卡斯特罗的人之一，他挑选了比斯尔和爱德华兹来实施这一计划；为了取得奥菲特的帮助，他们拜访了马休。“马休经常与联邦调查局打交道，他为我们的‘卡车司机’（协会）律师朋友威廉姆斯做事，和巴尼斯特一样是我们的大使，他现在已去新奥尔良警察局工作，与中情局一起处理古巴流亡者的问题。马休和巴尼斯特一直为中情局工作，他们是好人，倒霉的好人。他们使我赚了许多的钱。”

莫尼与马休第一次见面后，就让他助手约翰·罗塞利往来于马休和中情局之间。同时，莫尼将鲁比调回去，让他给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古巴流亡人员提供军火和装备，此前，莫尼的手下弗兰克已派人与中情局的哈维一起行动了。

11 月，罗伯特·肯尼迪被任命为司法部长。这个消息使莫尼十分失望和愤怒，他大骂约翰·肯尼迪是个混帐。此时，莫尼主要依靠辛纳特拉和汉弗莱与约翰·肯尼迪联系。为了施加压力，莫尼指令罗塞利密切注意西方国家对肯尼迪的关心，同时让他在哈瓦那赌场的老板麦克维尔到卡尔瓦纳去，加强监视肯尼迪家族经常出没的娱乐场所。

1961 年初，莫尼先后两次派人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见肯尼迪，想弄清底细：任命罗伯特·肯尼迪为司法部长是用意何在？奥菲特的利益如何得到保护？后来，莫尼亲自去白宫会见肯尼迪，然而，会谈的结果丝毫没有打消

他的疑虑。

莫尼认为，老肯尼迪把罗伯特·肯尼迪安置在司法部的用意，只有两种可能：1. 让罗伯特·肯尼迪钳制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并告诉他，在老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同意的时候，再撤除奥菲特组织；2. 把罗伯特·肯尼迪作为亲信使用，将联邦调查局的精锐部队交给他，以消灭那些接受了肯尼迪家族好处的人。这两种可能性相比较，前者显然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老肯尼迪将通过罗伯特·肯尼迪在“向有组织的犯罪开战”的名义下，把奥菲特清扫出去。

就在莫尼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约翰·肯尼迪开始通过朱迪·坎贝尔捎给莫尼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机密备忘录，总统还通过玛丽莲·梦露和安吉·狄金森等与他同床共枕的女明星给莫尼传送文件。

对于莫尼从总统那儿得到的文件的研究表明，约翰·肯尼迪是一个警惕的人，联邦调查局对莫尼的监视是高度细致的，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广泛。过去，莫尼把联邦调查局人员当做儿童侦查员看待，而这些文件表明，联邦调查局比他想象的要恐怖得多。虽然莫尼在联邦调查局至少有一个提供情报的内线，但极难获得更多的东西。莫尼答应了约翰·肯尼迪，他将注意和约束自己的行动。但是，莫尼进一步认定，约翰·肯尼迪已经违背了他在选举前的诺言。

后来真相暴露出来了。约翰·肯尼迪给莫尼的文件只不过是一些经过严格挑选的关于胡佛每日议题的联邦调查局备忘录。像莫尼搞窃听勾当这类内容的文件，约翰·肯尼迪丝毫没有透露给莫尼。

与此同时，作为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正计划向犯罪组织发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进攻。他编制了一个全国 30 个主要犯罪团伙首领名单，在这份名单上，第一个人就是山姆·莫尼·吉安卡纳。

司法部长命令联邦调查局加紧追查犯罪团伙。为了扩大名声，罗伯特·肯尼迪还亲自带领警察到车上检查那些逃税的社会底层小人物。

早在 1959 年，莫尼就让手下人豪夫在麦卡锡委员会主任律师罗伯特·肯尼迪经常出入的地方安装窃听器。豪夫在中情局的窃听专家斯品德尔的指导下学习技术专长。斯品德尔被政府官员和下层社会称为“线路之王”，一向以高超熟练的技术而闻名。他经常帮助奥菲特组织，同时，中情局也和他一样对黑帮很够意思。

到了 1961 年，莫尼又把斯品德尔请来。在莫尼的紧急命令下，斯品德尔指挥奥菲特和中情局的一队专业人员进行工作，“在肯尼迪经常去的每一英寸的地方布置线路，将肯尼迪家族置于看得见的网络和电子监视系统之中。”

为了完成跟踪司法部长和总统的任务，莫尼找到他的中情局老搭档马休，要他组织一队侦探，监视肯尼迪家族。“我要知道他们什么时间大便，如何性交。只有马休手下的人和中情局的人能够知道这些”。

1961 年 4 月，马塞罗在总统的指示下被流放到危地马拉。此时，莫尼最坏的担心更加重了。尽管马塞罗在约翰·肯尼迪的竞选中立下汗马功劳，也不足以使罗伯特·肯尼迪给予他某种保护或宽恕。这给莫尼一个强烈的暗示，他不能置之不理。莫尼说，他在“中央情报局任职的朋友们得知此事，一个个气得脸发青，他们打算将马塞罗秘密运回美国。但由于他们现在卷入到推翻卡斯特罗的行动中，因而无法从手头的任务中转移过多的精力。”

莫尼此时也已深深卷入到中情局颠覆古巴的行动中去了。为了便于和政

府打交道，他选择了理查德·凯因作为他的代理人。凯因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的真名叫瑞卡多·斯卡泽蒂。他是一个数学天才，通晓5种语言，又是一名神枪手，他是芝加哥警察局培训出来的，奉莫尼之命，他成为中情局的特工，并参加了在迈阿密对古巴流亡人员的训练。猪湾行动计划制订后，凯因回到芝加哥。此后不久，莫尼得到了中情局的帮助，将凯因安排在一个高度机密的位置上：谢里夫办公室的首席调查员。谢里夫是莫尼的对头，也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暴徒。趁他不在，莫尼在他的心脏安插了一个真正的特务。

为了暗杀卡斯特罗，中情局和奥菲特分摊了伊利诺斯化工大学的一批有才能的研究人员，他们研制的致命的化学毒物已经被这两个组织使用了很多年、很多次。它包括：掺毒的雪茄；通过皮肤吸收的致命的细菌粉末；掺入药剂的化妆品，如果把它涂在脸上或身上，将导致剧烈的心脏病；高效毒药——“只需1滴，即刻死亡”，用以倒入食物或饮料中；致癌的可注射的化学制剂；采用放射X光的办法让卡斯特罗患上癌症；还有慢慢起作用的致命的病毒……这花样繁多的手段不管多么隐蔽和高明，最后都没有成功。

最初，莫尼和中情局的朋友们都没有认识到暗杀卡斯特罗有多么困难；他们不知道，所有的食物和饮料都是经过取样的，在卡斯特罗来到之前，都由政治犯尝试过了。所以，他们最先暗杀卡斯特罗的办法——在饮料中下毒，使他对阴谋有了警觉，这反而使他更加安全了。

此外，卡斯特罗周围都是忠勇的卫兵，从技术方面看，武力攻击很难得手；而另一方面，职业杀手留着卡斯特罗的性命，就能够不断地收取黑社会的金钱，因为他们还要靠谋杀而生存；奥菲特的成员则没有为政治理想去卖命的蠢货，这也是暗杀活动屡试不成的原因之一。

4月14日，猪湾行动开始，然而仅仅3天的功夫就全军覆没了。

在中情局内部，“人们对总统和司法部长近乎叛国的行为感到失望”。紧接着，肯尼迪兄弟俩关于砸碎中情局的誓言招来了愤怒，掀起了轩然大波，它使秘密计划中那些与莫尼有关的人担心“肯尼迪会对中央情报局的自作主张和它的存在进行威胁。”他们的看法加强了莫尼对肯尼迪家族的怀疑。正是在这种骚动不安的气氛中，美国两股最强大的势力结成了同盟。“奥菲特和中央情报局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美国总统。”

反目成仇·一尸多用

对于莫尼来说，他还面临着其他威胁：联邦调查局已经向奥菲特施加压力，莫尼不论走到哪里，都被严密地监视着。不久前，联邦调查局与他的信使威廉·“行动”·约翰逊建立了秘密联系。为了杀一儆百，莫尼让他的副手布西里去“处理”约翰逊，“越可怕越好”。

于是，约翰逊这个300磅重的贷款专家被绑架到芝加哥的屠宰场，挂在一个6英寸长的铁钩上。布西里和打手们对约翰逊使用了连恶魔都会嫉妒的刑具：扳手、碎冰锥、剔骨刀、酒精喷灯……。另外，他们在他的膝盖上扎针，把赶牛用的通电的刺棒塞进他的肛门和直肠……撕心裂肺的疯狂尖叫逐渐微弱下来，凶手们把他放在绞盘上，再泼些冷水……经过两天彻夜不停的拷打，约翰逊终于幸运地死去了。

从年初以来，莫尼对肯尼迪家族的最后控制几乎消失。尽管莫尼一直努力坚持一个挥之不去的信念：他支持的总统应该而且能够保护他。但是到了6月份，这个家族开始切断与奥菲特的联系：汉弗莱突然在椭圆形办公室不受欢迎；肯尼迪们已开始公开冷落弗兰克·辛纳特拉，并拒绝邀请奥菲待指

定的歌手在最近重建的“棕榈春天”庄园度假。

为了使他对辛纳特拉的轻慢显得有理，罗伯特·肯尼迪提交了由联邦调查局准备好的 19 页的报告，强调指出辛纳特拉与黑社会有联系。而与此同时，约翰·肯尼迪让人给辛纳特拉送消息，说他是一个不检点的人，因而他的表演在白宫和总统府的其他社会职能部门是不受欢迎的。

不仅如此，老肯尼迪还向奥菲特传话说，司法部长不允许阿多尼斯回国，因为他们对美国的许诺比西弗吉尼亚州的选票要早。同时，莫尼在新奥尔良的合伙人、被迫跑到危地马拉丛林躲藏的马塞罗也没有得到赦免，他只好偷偷潜回美国不能公开露面。

肯尼迪家族还拒绝了朱迪·坎贝尔对白宫的拜访；从 3 月开始，约翰·肯尼迪再也不向奥菲特提供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了……

最使莫尼愤怒的是，罗伯特·肯尼迪要求联邦调查局加紧向犯罪组织进攻，“使这个国家摆脱山姆·莫尼·吉安卡纳之流的骚扰和控制”；整个莫尼家族（包括那些与奥菲特无关的亲属）都被严密监视起来，法院、议会和其他政府机构不时传唤他，调查犯罪活动……肯尼迪家族当初应允对他的赦免，原来都是骗人的鬼话。

为了躲避美国国会的调查，莫尼不得不流亡墨西哥。

正如莫尼所说，肯尼迪家族一面毁约，一面哄骗，对奥菲特“搞双重骗局。”

过去几个月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于莫尼来说，都是双重欺骗的确凿证据。如果不开战的话，他在奥菲特的地位以及他遍布全国的喽罗将蒙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很简单，美国的头号歹徒在整个一生中从未被人当做傻瓜看过——反之，如果他被人当做傻瓜看待，那么那个冒犯他的人就绝不能继续活下去。

莫尼决定：“我打算给他们传送一个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信息。”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莫尼利用中情局的帮助，搜集了肯尼迪家族在性行为方面的大量罪证，他打算把肯尼迪家族中这些肮脏虚伪的东西向全世界曝光，在必要的网络中去彻底摧毁肯尼迪王朝。

当然，这种方法中还存在一个敲诈的问题。莫尼想以此来迫使肯尼迪家族就范。但是，在暴露肯尼迪家族罪恶的时候，势必会将中情局与奥菲特组织的真实关系也暴露出来。因此，莫尼勉强同意了他的中情局老朋友们的意见：敲诈是不可能的；从对肯尼迪家族的监视中获取的任何信息可以通过一些更为间接的方式来使用。

几个星期来，莫尼为达成的这个协议而痛惜。明明知道自己有足够的证据永远地毁灭肯尼迪家族，但却不能使用它。这使莫尼加深了忧虑。

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莫尼终于找到另一种办法，这对于肯尼迪问题将是一个更为持久的解决。这个解决方法就是——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长期以来一直与奥菲特有着密切来往。她崭露头角时得益于 70 岁的好莱坞制片商、奥菲特的伙伴乔·施恩克。随后，施恩克把玛丽莲·梦露介绍给另一个制片人科恩，经常给她拍一些廉价商业片。此时的玛丽莲·梦露只是个两毛五分钱的电影角色。两个制片商得到的回报是与玛丽莲·梦露同床睡觉。

到了 1953 年，玛丽莲两毛五分钱的电影生涯结束了。在拍过轰动一时的裸体挂历之后，玛丽莲凭借电影《尼亚加拉》而跻身于明星界。

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中情局利用玛丽莲·梦露的性魅力成功地笼络了从中东到亚洲的国家领袖。莫尼也多次品尝过她的风味。

在整个 1962 年，奥菲特和中情局的兼职特工斯品德尔对约翰·肯尼迪的作爱进行了详尽的录音窃听（包括朱迪·坎贝尔，玛丽莲·梦露，交际花玛丽·梅耶，女演员安吉·迪克森等等）。在民主党全国会议之后，玛丽莲·梦露与约翰·肯尼迪罗曼蒂克地联系在一起。1963 年 3 月，罗伯特·肯尼迪也醉心于她。玛丽莲，这个由一打家庭养育起来的孤儿，现在则从一个肯尼迪到另一个肯尼迪之间浪漫穿梭。

到了 1962 年 6 月，玛丽莲的电影生涯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对奥菲特和中情局的用处也大大减少了。但是，玛丽莲·梦露对于奥菲特和中情局联合从事各种秘密勾当了解得相当多。到了 7 月，由于她被罗伯特·肯尼迪抛弃，她的情绪剧烈波动，经常歇斯底里。她威胁罗伯特·肯尼迪说，要“揭露他的全部丑事”。由此，玛丽莲·梦露成了一个负有可怕责任的人。

奥菲特组织的人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中情局担心复仇心切、吸毒成瘾的玛丽莲把事情捅出去，便要求莫尼除掉她。

莫尼欣喜地发现，如果杀掉玛丽莲，有可能连同废黜肯尼迪兄弟俩。

7 月 21 日，玛丽莲·梦露飞往塔奥湖的卡尔瓦纳旅馆。在这个周末的聚会中，莫尼还邀请了辛纳特拉和拉夫德。晚宴时，玛丽莲·梦露忘我地喝着酒，她向莫尼哭诉罗伯特·肯尼迪拒绝了她的电话——她曾经想到弗吉尼亚他的家里去找他，等等，都是有关罗伯特·肯尼迪不名誉的事情。正如她所说，在罗伯特·肯尼迪的眼里，她“只不过是一块肉”。

当天夜里，莫尼与玛丽莲·梦露同床共枕，最后一次品尝她的味道……

3 天后，莫尼接到中情局的消息说，罗伯特·肯尼迪将于 8 月 4 日去加利福尼亚度周末。莫尼立即飞抵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春天”度假村，公开参加在辛纳特拉家中举行的宴会。接踵而来的是 4 名杀手。莫尼选择了最信赖的杀手尼德莱斯·吉诺拉来配合此事。尼德莱斯还带来一个帮手托图瑞勒和另外两个职业杀手，一个来自堪萨斯城，一个来自底特律。

窃听就在附近。杀手们耐心地等待着司法部长的到来。

罗伯特·肯尼迪终于出现在玛丽莲·梦露的房间，他还带着另外一个人。从窃听器里得知，玛丽莲对着罗伯特·肯尼迪大吵大闹，肯尼迪命令那个随从人员（很明显是个医生）给她扎一针“干掉她”之后，司法部长和医生很快离开了这里。

杀手们等待着夜幕降临。在午夜时，他们进入玛丽莲的房间。她最初时挣扎了一下。她已被麻醉过，注射了镇静剂，这多亏肯尼迪的医生。杀手们用带着橡皮手套的手轻易地将她的裸体按倒在床上。他们平静地搬开她的嘴巴，接着在肛门里又塞进一副栓剂。然后出去等待……

这种栓剂是由一个芝加哥化学家配制的，他曾经为暗杀卡斯特罗配制过无数种化学药水。强制注射的致命的毒剂在她身上留下了肿块，她只是软弱地挣扎了几下。使用这种药剂消除了任何拯救玛丽莲的希望。栓剂可以迅速地被吸收进入血液，发挥作用。栓剂与注射剂同样高效，而且不留针迹。

此时的莫尼急切地盼望着警察到来过问此事，从而将罗伯特·肯尼迪拉进明星自杀的丑闻里。

然而，莫尼的杀手们在几个小时的电话窃听中得知，那个医生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一系列电话，提醒他注意玛丽莲的死，于是他派遣一名联邦

调查局的侦探奥塔什来防止丑闻发生。

约翰·肯尼迪和拉夫德不知道那天晚上还有别人闯入了玛丽莲的房间，他们相信是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医生导致她服毒致死。肯尼迪一想到会在明星谋杀案和玛丽莲的性游戏上受牵联，便感到极度恐慌。他指示拉夫德和奥菲特组织中的一个人（这特别具有讽刺意味）假装侦查玛丽莲，以便在官方人士到达前清扫好房间……

当天晚上玛丽莲的日记消失了，胡佛的警探还没收了那本十分危险的电话记录。于是，再没有什么证据可以牵联到罗伯特·肯尼迪的身上了。

最终，玛丽莲·梦露被确认是自杀，而罗伯特·肯尼迪却干干净净，这种假象一直维持了多年……

杀！杀！杀！

杀害玛丽莲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反肯尼迪的行动进一步引向深入……

1963年早春，莫尼和他在中情局的关系决定了谋杀总统的计划。奥斯瓦尔德是当然的人选。

奥斯瓦尔德与中情局和奥菲特组织都有联系。最初，他就为美国情报组织服务，后来他参加了海军情报组织所属的、在日本的一个高度机密的间谍基地进行的严格训练。后来他成为中情局的特工人员。

奥斯瓦尔德曾经是中情局派往苏联的间谍，他能说流利的俄语。他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亲卡斯特罗分子或亲共分子。事实上，奥斯瓦尔德是一个右翼分子、是暗杀卡斯特罗的积极参与者。总之，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情局的人。

为了给将来的调查工作“定向”，中情局事先做了大量背景性工作，使奥斯瓦尔德看上去像一个共产主义分子：把他送到苏联和古巴；让他与亲卡斯特罗分子接触；发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在行刺前几天还特地给他拍了一张手拿步枪的照片……总之，把奥斯瓦尔德打扮成一个由于生活贫困对美国现实不满、向往共产主义的激进人物。

在完成了中情局的任务后，奥斯瓦尔德带着俄罗斯妻子离开苏联回国，在一家负责高度机密工程的公司为中情局工作。后来，他回到新奥尔良，中情局就指示他去找一个人——前联邦调查局驻芝加哥代表班尼斯特。在那里，奥斯瓦尔德领受了任务，并被派往达拉斯。在达拉斯，他与莫尼的代表鲁比重新建立了联系。不久，奥斯瓦尔德与莫尼的另一个关系——默仁希尔德接上了头。此人是苏联流亡者、中情局的特务，还是一个地质专家。他帮助莫尼在石油方面赚了几百万美元，还将许多得克萨斯的石油商人介绍给莫尼。

此次谋杀总统行动所需资金来源于得克萨斯富有的右翼石油商人。每个与谋杀计划有关的人都可拿到5万美元。

在这次秘密行动的准备工作中，罗塞利作为莫尼的代表与中情局联系，同时，罗塞利还继续担任莫尼与马塞罗、特拉菲坎特和豪夫的联系。这一决定是在莫尼与班尼斯特会晤时作出的。达拉斯谋杀策划了好几个月，涉及方方面面，而且行刺地点也选择了好几个不同的城市：迈阿密、芝加哥、洛杉矶和达拉斯。最终，肯尼迪被引到达拉斯。这个城市为行刺的成功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整个阴谋活动一直贯穿到中情局的最高层，而且涉及到许多前任和现任

官员：有得克萨斯金融界的右翼人士、副总统约翰逊、前副总统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手下参加猪湾行动的军官……在行刺前，约翰逊和尼克松先后在达拉斯多次与莫尼见面，“他们知道事情的全部”。这两位当过副总统的大人物与奥菲特的关系颇深，尤其是约翰逊，他实际上就是奥菲特在美国政界的代理人。

这次谋杀是由奥菲特组织和中情局共同策划和实施的。莫尼负责奥菲特方面的事情，并提供其他必要的支持；中情局也派出他们的人负责其余的事情。

这次疯狂而大胆的行动牵扯到达拉斯警察局的一些最高长官。最大的便利来自市长伊尔·卡贝尔，他是中情局前任副局长查斯·卡贝尔的兄弟。由于市长负责全市范围的安全工作，因此为总统车队提供警察保护一事也由他具体安排。行刺那天，市内以及肯尼迪周围的安全防卫纯粹是象征性的，“连一个4岁的小孩都能把约翰·肯尼迪干掉。”

莫尼曾经多方征招职业杀手。对杀手的标准要求很高：必须是“超级神枪手”。奥菲特方面一共准备了6名杀手：两个是马塞罗的人，还有两个是特拉菲坎特的古巴流亡者“朋友”，最后由莫尼从芝加哥带来了凯因和尼可莱蒂。

中情局也投入两名杀手：罗斯克·怀特和狄皮特。他们与凯因、奥斯瓦尔德、费奥里尼在一起。而其中的奥斯瓦尔德被作为“孤独的刺客”。

凯因和尼可莱蒂都是刺杀时的真正枪手，他们的位置在达拉斯油库的对面。事实上，奥斯瓦尔德根本就没有开枪，真正从6楼那个窗口开枪的是凯因。奥斯瓦尔德的表面使命是持枪守候在现场，实际使命就是当替罪羊（起初他并不知道）。对于策划者们来说，奥斯瓦尔德只要拿着枪就足够了。

在行刺过程中，中情局的高层人物躲在一家旅馆里，通过无线电设备进行现场指挥，真正的杀手们都有步话机，通过它可以保护他们的射击点，能在行刺之后立即知道奥斯瓦尔德的行踪。莫尼的预备人员，米尔瓦基·菲尔全副武装站在那里，随时准备应付最后一分钟射手出现的意外。

中情局挑选的怀特、狄皮特和凯因一样，都在司法部门任职，他俩在达拉斯的警察局。他俩的任务是借口正当的自我防卫，在远离现场的某处干掉奥斯瓦尔德（两个人可以相互作证）。然而，狄皮特却让那个“孤独的枪手”跑了。这样一来，怀特就不得不干掉他的同伴了，并声称是奥斯瓦尔德杀害的，作为逮捕奥斯瓦尔德的理由。

接着进入角色的是杰克·鲁比。他在这次谋杀行动中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按照计划安排，鲁比负责监督奥菲特组织的这次行动，以及与达拉斯政府机构的协调。此人过去奉奥菲特组织的派遣与中情局合作从事非法活动，双方对他都很满意和信任。同时，他与达拉斯司法界的官员们有着非常好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处理行刺后与地方警察发生问题时极为有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莫尼选择了鲁比作为奥菲特驻达拉斯的代表。当意外发现奥斯瓦尔德活着被捕时，灭口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鲁比的头上，

利用自己与达拉斯警察的关系，鲁比能够在奥斯瓦尔德被监禁后就地设法干掉他。然而第二天，奥斯瓦尔德就要被迅速转移出去。时间紧迫，鲁比只好豁出去了。在奥菲特组织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与其死在莫尼的手里，不如被当做杀人犯死在电椅上。

鲁比与奥斯瓦尔德很熟，“他们确实是朋友”。当奥斯瓦尔德看到鲁比

向他走来时，两人脸上的表情都极不自然。奥斯瓦尔德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知道鲁比前来是要把他干掉……

值得提及的是，在 1963 年 11 月 22 日的事件中，莫尼“完全避开了”，他将一切具体事务都交给了她最可靠的中队长去办理。莫尼与中情局那些高层人物一样，极少过问这个计划的内部细节，“因为其结果至关重要”。他仅在行刺前晤了中情局的主要人物、一些政治家和得克萨斯的支持者，仅此而已。

奥菲特组织知道，对于肯尼迪之死，胡佛的联邦调查局绝不会为罗伯特·肯尼迪去弄个水落石出的，他对肯尼迪家族恨之入骨。

约翰·肯尼迪归天，是奥菲特组织对肯尼迪家族最明确、最严厉的警告。老肯尼迪对此心照不宣，他表示“不要求政府深入调查”的意愿就是明证。但他并不死心，继续扶持罗伯特·肯尼迪东山再起。

1968 年 6 月 6 日，罗伯特·肯尼迪来到洛杉矶的阿马巴萨多旅馆，参加他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庆祝会。

一个约旦青年西汉·比沙拉·西汉开了枪，并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打死罗伯特·肯尼迪的是另一个奥菲特组织的枪手，他是做常规警卫的卫兵，是一个准备在最后一分钟发挥作用的人。这位前司法部长最终没能逃出莫尼的手心。被迫出走国外的莫尼决心不让肯尼迪家族重登政治舞台。

1974 年，莫尼被墨西哥驱逐出境，被迫重返他在芝加哥的橡树园住宅。1975 年 6 月 19 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来到芝加哥，准备听取莫尼作证，询问他与中情局合谋暗杀卡斯特罗的有关问题。当天午夜时分，莫尼在橡树园的地下室里正在烹调煎锅上的肥肠，一名他熟悉和信任的人进屋将他打死：1 枪打进后脑，1 枪打进嘴里，5 枪打在下颌。

证据显示，莫尼之死不仅仅是黑社会的报复。从“受威胁而杀人”的角度看，比起芝加哥奥菲特组织，莫尼对中情局的那些关系构成更大的威胁。奥菲特的人知道，莫尼绝不会泄露秘密，而中情局则对他的忠诚很不放心。

要确认杀害莫尼的凶手，莫尼本人的一句格言倒是很有见地的：“查出谁还活着，你就能找到凶手”——

1974 年，与莫尼闹翻的凯因被人在餐厅开枪打死。

1976 年，罗塞利死于佛罗里达，他那被肢解了的尸体装在特拉菲坎特家附近的一个密封的油桶中；莫尼的另一个伙伴马塞罗患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显露奇怪的出神经病变的迹象，一直到死。

在所有卷入中情局秘密行动的主要人物中，只有特拉菲坎特没有遭人暗算。奥菲特组织的人认为是特拉菲坎特安排了对莫尼的谋杀，他是受中情局的指使，拉拢了芝加哥奥菲特的代表、中情局的同谋者罗塞利。

罗塞利在参议院的秘密证词以及他的惨死很快导致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形成，并对肯尼迪总统之死重新展开了调查。

1977 年，刚好是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决定要尼可莱特出庭作证后，他就被暗杀了。莫亨契尔特也是在准备出庭作证的那一天被害……

1990 年 10 月，怀特的儿子对美国报纸记者说，他的父亲和皮怀特都参与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活动。一时间这成了美国的爆炸性新闻。随着再次调查的逐步深入，真相也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之将死，其言亦诚

1960 年至 1962 年期间，正是朱迪·坎贝尔与美国总统肯尼迪打得火热的时候。不用说，她肯定掌握一些被严密隐藏起来的有关肯尼迪的秘密。1992

年，她将这些秘密说了出来，由此，肯尼迪与黑手党挂钩的谣传终于得到证实。

坎贝尔为什么此时才吐露真情呢？身为总统旧爱的坎贝尔过去一直被舆论界贬损，她心里很明白，如果她要谈“历史”，总统在时，不仅无人相信，而且她的生命不保；总统死后，则更无人愿意相信。再加上顾虑黑手党的反应，因此她在国会、记者、作家历次调查和询访中都三缄其口。如今，她濒临癌症末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有心将实情全盘托出，乃对作家安东尼·撒墨斯说出秘密。以下就是撒墨斯根据坎贝尔的口述写下的报道《肯尼迪、黑手党与我》部分内容——

1961年4月28日傍晚，在芝加哥东方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会谈达15分钟之久。一人是年方44的翩翩男子，面容为世人熟悉；另一人是年逾50，面容饱尽风霜，但无几人认识他。这两人都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在密商进行一起谋杀事件。

这次密商的事在官方档案中是看不到的。那个较年轻的一人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另一同谋是全美最骠悍的黑手党头目吉安卡纳。他与肯尼迪商讨的是谋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

当两个巨头会商时，坎贝尔正坐在浴室的澡盆里。她协助安排这类聚会，并担任他俩信使的次数，前后不下20次。她最初的工作是帮肯尼迪携带大笔现金交付吉安卡纳，供他操纵总统选举之用；后来肯尼迪顺利入主白宫，她便为肯尼迪将有关卡斯特罗的情报传递给吉安卡纳。

1960年时，26岁的坎贝尔是加州社交圈里的名媛，但她绝不是新闻媒体动辄加封于她的“荡妇”或“绑匪押寨夫人”的典型。

1959年，经弗兰克·西纳特拉引介，她才卷入一个牵涉肯尼迪、吉安卡纳、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政治游戏。

坎贝尔生性不爱曝光，这也是她能在1975年后对与肯尼迪和黑社会老大的交往始终缄默之故。而事实上，若非参议院违约，1975年的那次匿名作证不致使她家喻户晓。

她承认过去在“招供”细节时故意拖泥带水，虽然参议院从白宫电话记录中查出她确曾打过70次电话到总统办公室，而且从联邦调查局的一些记录中也验证出她与肯尼迪、吉安卡纳确为密友，但由于新闻媒介一味猛烈抨击，她只能承认与肯尼迪和吉安卡纳的关系纯属“情感”，不涉及国家机密，而且是在不同时期交往的。

她说：“从一开始，肯尼迪就直言不讳。他说，这些封包内装的是‘情报资料’，它涉及‘干掉’卡斯特罗的方案。我想肯尼迪不瞒我，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与我正在热恋之中，他认为让我多介入些，可能心理上会得到安慰。当时我还是20多岁的年轻女子，对政治没啥概念，而且当时我深爱着他，他又是总统，所以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去质疑，但我知道，肯尼迪对中情局与黑手党的勾搭内情是完全了如指掌的。”

坎贝尔还透露，1960年当肯尼迪竞选总统时，曾两度要她带钱给吉安卡纳。当时她经常收到他俩送的玫瑰花（肯尼迪送红的，吉安卡纳送黄的）。

坎贝尔说：“自认识后，我一直都与肯尼迪保持密切的电话联系。每次他都会问我：‘你最近忙些什么？见过什么人？’我告诉他，常与吉安卡纳见面，他就会笑着道，‘你得当心这个家伙啦！’”

1960年4月6日，肯尼迪邀请坎贝尔去他家作客。肯尼迪请坎贝尔为他

安排与吉安卡纳见面。接下来，肯尼迪请坎贝尔带“很多很多的钱”给吉安卡纳。“肯尼迪给我一个软皮公事包，摸起来鼓鼓的，提起来沉甸甸的。在约莫凌晨一两点钟时，肯尼迪召来一辆出租车，我带着公事包回到我下榻的旅馆。”

坎贝尔说，她乘火车到芝加哥时已是4月8日上午8点30分，吉安卡纳果然在那儿恭候。“一看到吉安卡纳我一声不吭地赶紧将它递给他，而他也未置一言顺手拎了过去。”

坎贝尔说，1960年7月肯尼迪赢得民主党提名后，吉安卡纳从肯尼迪那里得到了更多的钱。坎贝尔在纽约市的那娃罗旅馆赁屋而居，主要是供她与肯尼迪幽会之用，不过到了8月，该屋又另作它用——吉安卡纳来此与肯尼迪进行密谈，而且也从这里领取肯尼迪留下来的第2个塞得满满的皮箱。

坎贝尔说：“自肯尼迪当选后，吉安卡纳还常对我说：‘你的男友要不是因为你，是当不上总统的。’说多了，我自然越发感受到吉安卡纳用钱收买影响力，进而左右选举结果的真实性。”

坎贝尔觉得她的口供难逃世人的讥笑和议论。世人不了解，如果她所言为真，为何在1975年有机会一吐为快时，却欲言又止呢？又为什么在1988年接收女作家访问时要保留一手？

坎贝尔说：“70年代那个时候我害怕被杀；当然，我也是为了保护肯尼迪。我曾与丈夫讨论过，决定我只透露到足以打发记者的程度，谈些我与肯尼迪之间无关痛痒的恋史片段，尽量回避那些会使我被暗杀的话题。”

至于1988年坎贝尔面对女作家凯蒂时再度有所保留，一是因她不信任凯蒂，二是根深蒂固的恐惧。

坎贝尔的恐惧是有根据的。吉安卡纳在1975年参议院还没来得及传讯他之前，死于自家的地下室；罗斯利不信邪，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3次，但没过几天，他就失踪了，后来在一个油桶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已经被肢解得几乎难以辨认。

如今，57岁的坎贝尔打破沉默，受病魔困扰固然是一个直接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给历史一个公道及为自己找回名誉。

她说：“当人们处在我现在的健康情况时，许多想法都不一样了。现在我决心揭开内幕，让历史学家重新评估肯尼迪是否堪当总统。当然，也是为我的儿子考虑。他这辈子恐怕很难摆脱这个故事的阴影，但至少我能扫除过去舆论媒介强加在我身上的不公平待遇。我认为，任何陷入丑闻的女人都应该反击。为什么像肯尼迪这类男子，拈花惹草之余至多只获得‘性好女色’的评语，而女人则要饱受无数不堪耳闻的丑名！”

坎贝尔对外界误解她感到异常委屈。她说：“我从不是要人养的女人，肯尼迪曾给我2000美元，但那是为了一件我已买妥的貂皮大衣，而他事后坚持要弥补我。其实金钱对我没啥意义。我的祖父留给我大笔田产，我的嗜好是绘画，我根本毋须依靠权贵。我本很不愿意把肯尼迪牵涉进去，他如此信任我，才让我当中间人，但他实在不该三番五次置我于危险之中。当然，他很聪明，利用我为工具，可以巧妙地引开世人怀疑他涉及谋杀的眼光。即便是当时我有足够的勇气将此事公诸于众，又有谁会相信我呢？他们不把我埋了才怪……”

坎贝尔的上述披露都被确凿证据所证实了。特别是她宣称，肯尼迪在竞选期间与吉安卡纳勾搭，并赠予大量现金供他收买选票一事是千真万确的。

据可靠消息来源称，与帮派挂钩的做法在肯尼迪家族中由来已久。早在30年代，老肯尼迪经营威士忌企业致富时，就曾毫不忌讳地与黑社会头目罗斯利一起打高尔夫球；当肯尼迪投入竞选厮杀之际，据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老肯尼迪“下榻于加州的卡尔瓦尼旅馆，接待许多帮派老大的来访，而卡尔瓦尼旅馆的部分股份，即为吉安卡纳所有。”

肯尼迪不避帮派的作风，显然得自父亲的真传。黑手党钱财管理人——兰斯基的遗孀说：“肯尼迪与兰斯基曾在古巴碰过头。”（肯尼迪确实与他的哥儿们在1957年访问过古巴）

3个月后，也就是1958年2月，肯尼迪在一次赴亚利桑那州讲演之旅中，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他与某帮派老大包那诺的密友奥格斯特一起参加弥撒，并下榻于奥格斯特的别墅中。

肯尼迪与吉安卡纳的芝加哥帮过从甚密，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如西纳特拉和肯尼迪的姐夫彼得·洛佛等。

1960年2月，当西纳特拉在拉斯维加斯把坎贝尔介绍给肯尼迪时，总统大选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当时在桑德斯饭店的西纳特拉的朋友戴维斯说，肯尼迪的姐夫洛佛将他拉到一边低声说：“如果你想看看100万美元是什么样子，你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在橱窗里摆了一只棕色皮包，那里装的都是旅馆老板送给肯尼迪竞选的礼物。”桑德斯旅馆老板之一就是吉安卡纳。

1960年3月，肯尼迪与坎贝尔开始交往两周后，一名线民向联邦调查局检举说，弗歇提正带着一帮未经指认的小喽罗，“在西纳特拉的指令下，正铆足了劲，为肯尼迪助选。”弗歇提是吉安卡纳的密友，坎贝尔与他也有数面之交。

如此看来，黑社会帮派为肯尼迪竞选出钱出力，拼足了劲头。那么，肯尼迪为何还要像坎贝尔所说的反过来两度秘密送现金给吉安卡纳呢？答案的关键在于时间。

1960年4月6日晚，肯尼迪让坎贝尔将大笔现金火速送出一事，显然是为当时即将临头的西弗吉尼亚州初选打点之用，因为吉安卡纳的亲信迪阿·马托说，肯尼迪曾数次向吉安卡纳表示，西弗吉尼亚州情况告急，因此吉安卡纳派他赴该州为肯尼迪“拉票”，后来，肯尼迪果然顺利竞选。

又据不久前解密的联邦调查局文件披露，1960年11月，肯尼迪在伊利诺斯州险胜尼克松的结果揭晓后，伊州芝加哥城买票贿选的传言甚嚣尘上，而芝加哥正是吉安卡纳势力的大本营。

换言之，综合官方档案及坎贝尔的证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肯尼迪顺利入主白宫，黑手党的介入纵使不是唯一因素，但吉安卡纳确实功不可没。

关于肯尼迪伙同吉安卡纳策划谋杀卡斯特罗一事，坎贝尔的证据极有说服力。特别是她个人的记事本以及当年留存的机票、旅馆收据等佐证都与白宫日志记录相吻合。例如：坎贝尔在1961年5月5日1点15分与肯尼迪在白宫共进午餐；6点乘白宫专车赴机场；6点40分与吉安卡纳一起用餐；7点40分离开芝加哥；8点40分抵达拉斯维加斯；5月6日与弗歇提和罗塞利碰头。坎贝尔说，这类为总统带信到芝加哥给吉安卡纳过目后，再送到拉斯维加斯罗塞利手中的任务，在1961年一整年内，可说是家常便饭。

1961年4月15日，猪湾入侵一败涂地。肯尼迪气急败坏，连连怒斥中情局笨拙无能。他愤愤地说：“中央情报局一直向我保证，他们会在部队下手前，先将卡斯特罗干掉；结果却捅出这么大的漏子！”

谋杀卡斯特罗确实是中情局先出的点子。他们早在肯尼迪之前即借助吉安卡纳的黑帮势力和影响，这些内情据说连艾森豪威尔总统全都知道，但他刻意坐视。

猪湾事件事件后，肯尼迪变得非常消沉。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说：“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憔悴过。”的确，肯尼迪对美国后院有个共产党的古巴存在，简直是怒不可遏，寝食难安。有一次，他在晚餐时与人重提古巴问题，激动得将餐具击碎一地。

尽管忠于肯尼迪的人士一口咬定，总统与谋杀行动无关。但中情局官员始终对总统在此案中的角色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既不将总统拖下水，也不为总统开脱罪责。当时的中情局副局长赫尔姆斯说：“总统要除掉卡斯特罗，对于这类事情，中情局是不可能独断专行的。”

问题是：肯尼迪既然授意中情局行凶，为何还要忌讳与黑手党直接打交道？难道是猪湾事件后，他已对中情局失去信心？认为凭他与吉安卡纳的交情，自己介入能够通盘掌握？还是这就是肯尼迪的典型行事风格，鲁莽冲动、酷爱悬疑？

肯尼迪为他与吉安卡纳之间的暗中交易，最终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据吉安卡纳派往西弗吉尼亚州“打点”选民的马托说，当初讲好让肯尼迪一路领先、直登白宫的交换条件是：允许被驱逐海外的黑手党老大阿都尼斯重归故里。

从这一点来看，显然肯尼迪总统是食言了。因为当时以打击有组织犯罪作为施政要点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是不可能在这点上迁就他老哥的。不用说，肯尼迪的胞弟因此与吉安卡纳结下深仇。1961年7月，吉安卡纳虽然与肯尼迪共谋暗杀卡斯特罗，但有一次他气不过，当着联邦调查局特工的面咆哮道：“我对肯尼迪一家太了解了，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切通通抖落出来！”

到了1962年初，黑手党在饱受肯尼迪家族严厉执法的压力下，更感被愚弄欺骗。

“他有求于你时，他会使出浑身解数，直到得手；但你休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好处！”这是联邦调查局特工监听到的吉安卡纳臭骂肯尼迪时的一段录音。

在这期间，按坎贝尔的说法，肯尼迪与吉安卡纳间的联系完全中断；到了当年秋季，她与总统间的恋情也逐渐褪色到不再往来。为了弥补心灵上的空虚，坎贝尔转而再投入到吉安卡纳的怀抱，但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极短，便分道扬镳了。坎贝尔回忆说，那时候，每与吉安卡纳谈及罗伯特·肯尼迪时，他满怀“恨意”，至于提到总统也是满口的“不屑”。

就是那个秋天，黑手党佛罗里达州的老大特拉菲坎特说：“肯尼迪一家极不诚实，他们收贿，还不守信用……肯尼迪这个家伙迟早要引火烧身，你看好了，他不久就会死在枪下。”

到了1963年，坎贝尔形容自己像丧家犬似的，整日心神恍惚。这时，吉安卡纳也变得怪异起来，有时凝视着她的双眸不发一语，有时又极其温存体贴，倒是罗塞利仍像以往一样“正常”。而早已发现她同时与总统及黑帮老大来往的联邦调查局胡佛那一帮人，也开始像秃鹰般地监视、干扰她的言行。

1963年11月20日，坎贝尔在几度变更住所后，迁入比佛利的克里斯特饭店。就在她安定下来的第3天，她接到母亲的电话，当时她母亲只说：“快

看电视！”即使到今天，坎贝尔回忆起肯尼迪遇害时的情景，仍忍不住热泪盈眶。

惊闻噩耗之余，坎贝尔连续数日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拒绝接听电话，并借酒排遣哀痛和惊吓。后来，还多亏罗塞利苦心相劝，才将她从昏天黑地的孤寂中引导出来。

吉安卡纳的外甥在一本书中肯定了美国国会关于肯尼迪死于谋杀的结论，并印证他舅舅确实涉及此案。至于坎贝尔担任肯尼迪与吉安卡纳信使的细节，书中也有说明。不过更精彩的是，作者在书中把另外两个人如何同样被“利用”的内幕也悉数端了出来。

坎贝尔回忆了1975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要她作证时的情景。现场没有一位参议员在座，连委员会为她找的律师，后来她才发现竟然是肯尼迪总统姐夫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让她只能以“是”或“否”来回答问题，不要多啰嗦。坎贝尔说：“简直荒谬到了极点，委员会的人尽提些不相干的问题，结果他们一直找不出事实的真相。那种做法有点像他们搬开了一块石头，看到了一些他们不愿看到的东西，所以匆忙将石头又搬回去。”

情报委员会在正式报告中，也没有将实情写出。报告中说，白宫和坎贝尔最后的一次电话联系是在1962年3月22日，而在打这一电话的几个小时之前，肯尼迪总统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还碰了面。据胡佛的助理德罗克说，胡佛在那次会面中告诉肯尼迪，他对坎贝尔的事情了如指掌。肯尼迪对胡佛的警告，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给坎贝尔。坎贝尔说：“他要我立刻回我母亲家去，然后再打电话给他。我打过去时，他告诉我，我公寓内的电话不安全，他非常生气，从电话中都可以感觉出他的愤怒。他还说胡佛告诉他，我是两个黑社会分子的朋友，并知道我曾去过白宫。我感觉胡佛是以我帮总统传信给吉安卡纳一事来威胁他。”

坎贝尔最后一次打电话到白宫是8月6日。这一天是饶有意义的——

离洛杉矶坎贝尔家不远的另一街区，住着肯尼迪总统的另外一名情妇玛丽莲·梦露。8月4日至5日晚上，梦露猝死，死因不明。最后看到她活着的人是肯尼迪的妹夫。他在5月5日清晨5点钟让一名私家侦探将梦露的房间清理一下，以免任何与肯尼迪有关的物品被查获。但这名侦探没能帮上忙。

根据已经解密的白宫电话记录显示，肯尼迪的妹夫在事发后一小时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接着，白宫传唤在洛杉矶的刑事组组长布朗，说是出了点“问题”。布朗事后告诉同事说，“问题”就出在梦露的睡衣里，在衣内找到一张皱纸条，上面写有白宫的电话号码。于是，一项全面的掩盖工作就此展开。

梦露与坎贝尔一样均与弗兰克·西纳特拉有染；她们都去看同一位妇产科医生克朗恩（西纳特拉的朋友）；她俩也都认识罗塞利。根据电话记录，坎贝尔在梦露死后第二天曾给白宫打过两次电话，但肯尼迪没有接。

联邦调查局的一些报告里还提到，8月7日那天，负责监视坎贝尔公寓的人员“坐视”一名男子进屋行窃。坎贝尔回忆说，事后她检查屋内，发现只少了一本电话记事本。

以上就是美国近年来公诸于世的有关肯尼迪之死材料，至此，应当说是真相大白了。

二十六、印尼“九州事件”的幕后黑手

山雨欲来风满楼

50年代末，军队在印尼已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印尼军队是在反对荷兰殖民主义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战时军政合一的环境，导致军人较早地卷入国家和地方政治事务。1957年，在纳苏蒂安将军的敦促下，苏加诺颁布了军管法，宣布全国处于军法管制之下。军管法赋予军队极大的权力，他们有权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他们可以制定与公共秩序和国内安全有关的法令和规定，如果这些法令和规定与原有法律相矛盾，则以军管法为依据。与此同时，印尼国内还建立了“战时掌权者当局”，它上起中央，下至村社，与文官体制并行。军人集团借此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国家各级行政部门。到1958年，印尼全国约80%的行政事务由军人掌管。1957年，中央战时掌权者当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纳苏蒂安宣称，苏加诺和我就是内阁。他下令将企业置于军队的直接掌管之下。随即委派4000名中上层军官担任被接管企业的经理或监督者。军人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1958年中期，掌握陆军大权的纳苏蒂安公开表示：“印尼在世界两大阵营中，站在美国一边。”然而印尼总统苏加诺所倡导的是“纳沙贡”思想，即“民族主义者、宗教集团和共产党人组成的人民联合阵线的思想”。虽然在60年代初，军队和各派政治团体都表示拥护，但实际上它已被架空。当时存在的是两大阵线，一个是由共产党和左翼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左派军官组成的阵线，另一个是以陆军为首的武装部队及其他右翼人士组成的阵线。以纳苏蒂安为首的右翼陆军将领从50年代中期就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60年代中期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国际上风云一时：他作为东道主，召开了亚非国家首脑的万隆会议；先后热情接待了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来访；为了西伊里安领土之争不惜与马来西亚、英国及荷兰顶牛；同时他周旋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既接受苏联的援助，又收纳美国的贷款……

就在苏加诺总统为了西伊里安岛的归属问题摆开与马来西亚对抗的架势时，印尼共产党向苏加诺提出两项改革军队体制的建议，1.在陆军内部推行政治委员制度；2.建立一支与海、陆、空、警4支队伍并列的第五种武装力量——工农民兵武装队伍。

苏加诺接受了艾地的建议，开始推行改革措施，但遭到包括陆军参谋长雅尼在内的一批陆军将领的反对。苏加诺十分生气，他打算改组陆军上层领导。陆军上层将领们得知此事后，阳奉阴违，并着手进行准备……

美英等西方国家对苏加诺总统与印尼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深感不安。1965年6月，“澳新美安全条约”的外交部长在华盛顿举行年会。会上，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直言不讳地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策略与在柏林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采取的策略相类似，他们正逐渐地、分阶段地取得更大的权力。如果苏加诺仍在台上，印尼的国内局势和对外关系会变得更糟。”腊斯克要求澳大利亚方面作出努力，阻止印尼共产党向东南亚其他地区扩展，找出一个“解决印尼问题的方案”。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利用对印尼提供军事援助的关系，加紧在印尼陆军中物色和收买反共将领。

在国内，苏加诺并没有他自己的党派组织，此时他需要共产党的支持，

故对印尼共产党常有赞扬，而对陆军时有贬斥。长期以来，艾地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对他的影响也比较大。1965年，苏加诺在印尼共产党建党45周年的纪念会上说：“我爱印尼共产党，把他看成是我的兄弟，如果他牺牲了，我将感到好象失去了一位可爱的亲友。……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印尼就不可能作为第一流的大国站在世界舞台上。”他对陆军将领则批评说：“昨天是进步的人，今天可能变成反对进步的人。昨天是革命的人，今天可能变成反革命。即使你过去在1945年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将领，但如果今天你成为革命的敌人，那你就变为反动力量”。

由于苏加诺明确要求贯彻“纳沙贡”思想，这就不能不与反共亲美的右翼陆军军官发生矛盾。苏加诺为了削弱陆军这支政治力量的基础，5月初下令把刚刚建立起来的国防学院置于文官控制之下。几天后，他又提出一项几乎要把陆军这支反共政治力量摧毁的建议：在部队成立“纳沙贡”顾问委员会，印尼共产党将同其他政党一道派代表参加。顾问委员会成员充当从最高军事顾问到军分区各级军事指挥官的顾问。

苏加诺指示下达后，陆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表面上按照苏加诺的要求“把车轮向左转”，但在幕后，雅尼和陆军的少数将领都在秘密联系，想方设法抵制苏加诺“对陆军的摧残”。

1965年5月末，苏加诺与陆军参谋长雅尼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起因是—

1965年3月，英国驻印尼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写信给英国外交部。信中报告了他与美国驻印尼大使讨论美国与英国同印尼军方领导人共谋颠覆印尼政府的计划；信中提到与印尼将领有关的问题。当时任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印尼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苏班德里约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命人去核实。随即他被告知，该信件的字体和格式同8个月前火烧英国使馆时拿到的其他文件一样。苏班德里约对有关这个信件的真实性的报告确信不疑，他于1965年5月26日将信件交给苏加诺，与此同时，苏班德里约从印尼情报机构参谋长苏达尔托准将那里获悉，陆军内部成立了一个“将领委员会”，他们反对苏加诺的现行政策，准备发动政变。与此同时，共产党主席艾地从另一渠道也得知了同一消息。他俩先后向苏加诺汇报了这一非同小可的情况。到9月初，风传政变的具体日期为10月5日，那天是印尼武装部队日，陆军可以此为借口，把大批部队调入雅加达来参加游行。

苏加诺读过这些报告后，认为报告内容是可信的。自1956~1961年美、英支持约章集团在苏门答腊和北苏拉威西进行叛乱以来，苏加诺对美国、英国，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恨之入骨。1965年夏，西伊里安问题得到解决，形势对苏加诺很有利，因此他利用这个机会，把反对荷兰的满腔怒火转向美国 and 英国。在他与陆军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他相信美、英情报机构会收买陆军将领在印尼搞政变，将领委员会是存在的，确有政变的危险。

尔后，苏加诺对信件和将领委员会问题采取公开处理的方式。5月下旬，他召集各军总司令、国防安全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参谋长雅尼讨论这些文件。雅尼否认了信中的说法，他告诉苏加诺，陆军将领中，只有巴尔曼和苏根德罗与英国和美国保持密切联系，但他们是奉命执行任务。对将领委员会的问题，雅尼避而不答，他反过来指责印尼共产党有夺权企图。最后，雅尼将军宽慰苏加诺总统说，他将回去调查，然后向苏加诺汇报。但是，雅尼将军此后不了了之。

两天后，苏加诺又在各军区司令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信件问题。几星期后，他授权苏班德里约选择能引起国际注目的时机，宣布这一消息，并作为美英阴谋反对印尼的证据。苏班德里约原计划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宣布此事，由于这次会议推迟举行，于是，他改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此事。

就在政变传闻迭起之际，苏加诺于8月3日突然晕倒，卧病在床，这使印尼本来已经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起来。军界领导人都在密切注意苏加诺病情的发展，并积极准备，应付苏加诺死后的不测事件。苏加诺本人也为病情焦虑，急电召回正在苏联和中国访问的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两人进行了促膝长谈……苏加诺身体复元后，可能感觉到雅尼等人在欺骗他。8月中旬，他在庆祝印尼国庆节的讲话中批评了印尼陆军将领，对印尼共多有赞扬。

两天后，印尼共产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谈到苏加诺健康不佳，一旦逝世，陆军的“将领委员会”势必凭借武力接管政权。同时会议也分析到，以纳苏蒂安和雅尼为首的陆军将领与空军上层领导和陆军中下级军官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会议决定：“开展一场运动来挫败‘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不过，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具体讨论印尼共产党将要采取何种军事行动，从而保证自己的政治行动顺利实施。

印尼共产党一直信奉“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因此自己并没有掌握可以开展军事行动的力量。艾地曾暗中建立了一个叫做“秘密局”的特别机构，由夏姆具体指挥，夏姆仅对艾地本人负责。艾地建立“秘密局”的初衷是，万一印尼需要动用武装力量时，将由“秘密局”承担这方面的任务。“秘密局”的工作也有一定成效，他们不但掌握了一部分陆军中的连、营级军官，而且还将空军司令达尼将军和西婆罗州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的苏巴尔佐将军等人争取过来。

不久，艾地和苏班德里约又获悉：“将领委员会”与9月21日在军事法律学院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在10月5日前发动军事政变，组成新内阁，由纳苏蒂安将军任总理，雅尼将军任第一副总理，苏普拉普托少将任内政部长，哈尔约诺少将任外交部长，苏托约准将任司法部长，巴尔曼少将任检察总长。

在此紧急情况下，艾地命令夏姆设计一个对付“将领委员会”的行动方案。嗣后，艾地将此事通知了苏加诺。苏加诺听后，心情显得很沉重，但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随着陆军将领委员会政变的传闻日益具体，军队中一批忠于苏加诺、不满高级将领的军官也在集结力量……

“九州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的——

“九州”枪声

1965年9月30日深夜，十几辆载着4连全付武装士兵的客车和汽车从哈利姆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个叫鳄鱼洞的偏僻山村出发，在陆军中校翁东为首的一批年轻军官带领下，向雅加达陆军高级将领住宅区急驰而去。车停后，他们各用1个排的兵力去捉拿巴尔曼、苏托约、哈尔约诺、苏普拉多和班查伊丹将军，对国防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部长雅尼则派了1个连的特种部队士兵去突袭。官兵们蹑手蹑脚地朝7个预定目标扑去。担任总部设在雅加达的战略后备指挥部的司令的苏哈托没有被列入要捉拿的名单。显然，这次事件的策划者把他低估了，没有料到他在几天后竟然扭转乾坤。

3个排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睡意朦胧的将军们还没弄清到底发生了什

么事，就被反绑双手，蒙上眼睛推上了卡车。哈尔约发现有人闯入他的住宅时，便掏出手枪拒捕，因而被当场击毙。班查伊丹也因拒捕被枪杀。

当士兵冲入雅尼的住宅时，雅尼知道情况不妙，他立即奔出房间，锁上玻璃门，一个怒气冲冲的士兵用自动步枪从背后向他扫射，雅尼应声倒地。他被拖上卡车时已奄奄一息了。

纳苏蒂安算是最幸运了。当士兵们刚要跨入他的私宅大门时，纳苏蒂安的夫人被响声惊醒，她猜到有麻烦了。她迅速锁上通往卧室的边门，推醒自己的丈夫，帮助他翻过与伊拉克大使馆官邸相连接的那堵围墙逃走。副官比雷登中尉的身材和外表酷似纳苏蒂安，他穿起将军服被当做纳苏蒂安蒙上眼睛反绑起来。袭击者将 3 具将领尸体、3 名将领和假纳苏蒂安押回鳄鱼洞，生者全部处死，7 具尸体扔入一口废井中。

10 月 1 日清晨，印度尼西亚广播电台宣读了翁东中校的公告。公告说：“‘将领委员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暗中进行颠覆印尼政府的活动。他们企图在苏加诺总统因病逝世后夺取政权，但阴谋破产了。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又策划在今年 10 月 5 日前发动政变。我们领导的‘9. 30’运动是陆军内部的运动，是针对那些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苏加诺总统心怀叵测的陆军‘将领委员会’”。中午 12 点，“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接管国家一切权力，并发表了第一号法令。翁东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尔巴佐、空军上校赫鲁、海军上校苏纳尔迪和高级警官安瓦斯任副主席。其余 40 名委员包括空军参谋长达尼、空军上校拉蒂夫和少校苏约诺。“革命委员会”从其组成人员来看，完全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包括印尼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陆、海、空、警四大军种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其中许多成员对该机构毫不了解，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在广播中听到他们的名字，感到十分惊愕。“9. 30 事件”只经历了几小时，其后雅加达一如常态，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营业。

“9. 30 事件”领导人翁东是苏加诺的总统卫队营营长，具有激进思想，当时被认为是陆军中一位前途无量的军官。1947 年苏哈托结婚时，他是婚礼上的宾客；在 1948 年茉莉芬事件中，他曾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过；1962 年苏哈托任解放西伊里安战区司令时，他是其手下的一名军官，在战斗中战功显赫，随即晋升为少校，并任营长。

10 月 2 日，印尼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赞扬“9. 30”运动是爱国和革命的行动（后来，这成为陆军镇压共产党的证据之一）。

印尼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兼马来西亚曼达拉警戒战区司令部副司令苏哈托将军是从广播中听到“9.30”事件的。他在得知纳苏蒂安死里逃生，苏加诺不愿与印尼共领导人艾地走，而返回茂物总统府后，发表声明，指责翁东的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并声明由他掌握陆军领导权，於当天出动坦克和装甲部队，还调集了伞兵突击队镇压“9. 30”运动。

10 月 1 日黄昏，苏哈托的军队占领了整个雅加达市区，控制了局势。当天下午，空军司令达尼将军发表声明，支持“9. 30”运动，表示坚决保卫苏加诺总统，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颠覆活动。

10 月 2 日，苏哈托命令伞兵部队、坦克和装甲部队包围了哈利姆空军基地。面对这一形势，苏加诺在茂物行宫召开武装部队司令会议，任命普拉诺托将军为陆军“代理司令”，委任苏哈托负责“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全”，并呼吁避免进一步流血。这一来，空军部队就渐渐瓦解了。

10月4日，纳苏蒂安—苏哈托军人集团声称“9. 30”运动是印尼共产党一手策划的，于是指使军队和暴徒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大屠杀。按照流传的一般说法，约有50万印尼共产党人和群众遇难。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也于同年遇难。政变领导人翁东身着便装，乘坐公共汽车准备外逃时，被两名士兵认出，遂遭逮捕，于次年3月被处决。到1967年3月，印尼共产党政治局5名常委中的4位，政治局10名正式委员中的6位都被杀害，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讯社1966年10月11日报道说，关于在这次清洗中，死亡50万人的传闻是错误的，实际数字是16万人左右。司法部门调查估计是12万人，而来自各地区和乡村的估计数字约20万人。印尼共产党人在这次屠杀中究竟牺牲了多少，其可靠数字，人们恐怕永远不会知道。

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在军队的威逼下，被迫签署命令，承认苏哈托的权威。同一天，军队接管印尼中央情报局总部，并宣布解散印尼共产党，“纳沙贡”到此寿终正寝。苏班德里约被捕后，先是判处死刑，由于他“认罪态度较好”，而改判20年徒刑。

1968年3月，苏哈托废黜苏加诺，担任印尼总统。

在一幅新闻照片上，苏加诺垂头丧气地站在话筒前宣读声明，站在一旁身着军服的苏哈托面带嘲笑冷冷地斜视着他……

鬼影憧憧

在印尼和西方国家中，关于推翻苏加诺政权的一般性解释是：印尼共产党在苏加诺支持下，准备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这一计划后来被印尼右翼军方领导人的部队镇压了。

然而，当今有不少东、西方历史学家以确凿的事实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了印尼的军事政变。最明显的是，印尼政变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挑动和唆使下，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和无辜华侨。尽管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至今仍回避印尼“9. 30”事件，但对于这一指控始终不敢否认。中情局官员拉尔夫·麦吉曾经参与过中情局1965年在印尼的秘密活动。他声称，中情局制造了导致印尼大屠杀的气氛，手段高超，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以至中情局打算把这套经验介绍到整个第三世界中去。

麦吉在一部被中央情报局删除部分内容后才允许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弥天大谎》中写道：

1965年，一批年轻的印尼军官企图推翻得到美国支持的军人统治集团，并且谋杀了7名高级将领中的6人。中央情报局便利用这个机会来推翻苏加诺，消灭共产党……由于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字被删除）行动，估计死亡人数达50万至100多万。最初，印尼军队把印尼共产党抛在一边，因为共产党没有参与政变的阴谋（8句话被删除）。结果，印尼军方领导人（7个字被删除）发动了一场血腥的镇压运动。在激发起公众对印尼共产党的怨恨时，宣传报道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遇难将军的碎尸照片出现在报刊和电视上，还附带种种耸人听闻的荒谬传说，讲照片上的印尼将军被印尼女共产党挖下眼珠，阉割了。蓄意编造故事是为了激起对共产党的公愤，为大屠杀作准备……中央情报局特别自豪所取得的成功（1个字被删除），还推荐这一事件作为未来秘密行动的样板（半句话被删除）。

8年以后，发生在智利的右翼军人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变，正是按照中情局取名为“雅加达方案”的蓝本秘密进行的。

在“9. 30事件”中，中情局驻雅加达情报站站长休·托瓦是一个关键

人物，他“负责建立了中央情报局与印度尼西亚军方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回报，印尼军方向美国提供了有关苏联装备的各方面情报及样品。

美驻印尼大使亨利·洛奇也是个重要人物。他曾在韩国、越南任职，李承晚、吴庭艳的垮台都与他有关。现在苏加诺也垮了。难怪舆论界称他为“颠覆专家”。

英国人爱德·肯尼上尉曾经为英国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机构工作。他在谈到印尼“9. 30”事件时说：

“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这个国家很快表现了对共产党的同情，相当数量的共产党从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渗透到马来西亚。1952年，我被派往新加坡，阻挠共产党的渗透活动。1965年，澳大利亚方面对苏加诺总统的企图变得十分惊恐，我接受任务，在印尼为澳大利亚招募谍报人员……

1964年获取的情报已经十分清楚，苏加诺总统打算在印尼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澳大利亚方面与美国方面合作，策划了推翻苏加诺的阴谋。我与负责特别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彼得·弗拉纳根一起，贿赂了印尼陆军的高级官员，要他们干掉苏加诺和他的追随者。1965年，印尼军官实施了政变计划，苏加诺没有被杀害，而是被软禁在他的家里。成千上万印尼共产党人残酷地被杀害了。血腥大屠杀使我感到厌恶，我终止了继续为澳大利亚情报机关服务，1967年初，我回到伦敦。我的行动显然违背了我的上司的意愿。”

据1996年英国《观察家报》报导，刚刚披露的秘密文件表明，英国在印尼“九州事件”中支持军人集团屠杀了50万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

秘密文件披露了英国在三个关键方面所起的作用——

1. 政治支持

英国外交部授意驻印尼大使吉尔克里斯特“在目前继续混乱的情况下，我们在暗中支持将军们的行动是万无一失的”。也正是这个大使，在写给伦敦的信中声称：“我从不向你们隐瞒我的观点：在印尼发生有效的变革之前必然会发生屠杀事件，这是分娩前的阵痛，是很自然的事情。”英国方面已经向印尼军方表明了支持的态度。

11月24日，英国情报机构报告：“已有大批印尼共产党人被杀害。还给一些受害者发了匕首，要这些人自己结束生命，但是大多数人拒绝这样做，于是便命令他们转过身，从背后向他们开了枪”。到12月中旬，据美国大使馆估计已有10万人遭到杀害。

2. 隐蔽行动

10月5日，英国一名政治顾问向外交部建议：“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尽可能地在暗中采取行动，以败坏印尼共产党在军队和人民心目中的名声。”

外交部接受了“败坏印尼共产党名声”的建议，并提出了一些“相适宜的宣传命题”，如：“印尼共产党的残暴行径”、“中国在（向印尼共）运送武器方面所起的作用”等。10月9日这位政治顾问证实，已经安排散发了一些材料。

英国的秘密行动甚至还有更险恶的一面。1965年，在印尼对婆罗州提出主权要求的情况下，英国曾帮助马来西亚保卫这个岛屿。但是，英国外交部生怕印尼军队因卷入婆罗州的战斗而放松对印尼共产党人的捕杀。于是，英国驻印尼大使向伦敦建议，“我们应该向将军们传递这样的信息：当他们在追击印尼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对他们发动进攻。”

吉尔克里斯特本人亲自向印尼军人政权发出了“措辞谨慎的口头信息”，

以便让他们取消顾忌，放开手脚去杀戮印尼共产党人。

3. 提供武器。

由于英国是美国的盟友，而英国在婆罗州问题上支持马来西亚，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向印尼军人集团提供武器时，事先取得了英国的同意。美国的秘密文件表明，11月初，印尼的一些将军要求美国提供装备，“以武装年轻的穆斯林和民族主义分子……用他们来对付印尼共产党”。随后，中情局将贴上“药品”标签的军用物资秘密运往印尼。

从上述事实中不难看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机关在印尼“9.30事件”事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西方盟国澳大利亚的谍报机关也是“功不可没，”积极配合。至于西方情报机构所散布的“中国参与印尼政变”的谣言，完全是国际阴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印尼国内有些人至今仍指责“中国参与了1965年‘9.30’事件”。对此，笔者将1985年4月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回答记者的有关提问摘录如下：

“记者：中、印尼两国都是亚洲大国，两国外交关系迟迟未能恢复，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印尼领导人一再表示，要求中国必须公开表示不再支持印尼共产党，印尼才会同中国复交。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吴：“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首先，一个国家的政党同其他国家同类政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是很正常的。正如各国社会党之间、民族主义政党之间、宗教团体之间保持联系一样，是一种国际上的普遍现象。

第二、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已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我认为，这种关系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利用这种关系去干涉别国的内政。

第三、正如胡耀邦总书记在访问澳大利亚时所表示的，18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印尼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至于外传中国卷入1965年‘9.30运动’，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是在‘9.30运动’发生后才知道的。

我们主张，对过去的事实采取向前看的态度，恢复中、印尼两国外交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二十七、走狗的下场

越南问题的由来

1858年，法国通过对华侵略战争，将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1940年，日本军队开进越南；在欧洲向纳粹德国投降的法国政府于是授意它在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作为傀儡与日本合作。

1941年，胡志明从中国回到越南，成立了反日抗法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在二战期间，美国承认越盟组织，中情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之密切合作。越盟向战略情报局提供有关日军的情报，帮助寻找美国被击落的飞行员；战略情报局则向越盟提供了5000多件武器和大量弹药，并派出教官训练越盟游击队，使之成为正规军。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越盟开进河内以及越南其他几十个城市，胡志明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1946年2月法军接替中国国民党军队进驻越南北方，企图恢复其在印支的殖民统治。1946年12月，法军进攻河内，越南人民开始了抗法战争。

1949年，法国建立了以保大皇帝为首的“独立的”越南国家。在法国里维埃拉休憩胜地度过其大半生的保大实际上是法国人的傀儡。如果没有法国人，他的政府连一天也维持不住。胡志明领导的越盟与法国殖民者进行了激烈的武装斗争。

1947年12月，由莫里斯·贝勒上校领导的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后来改名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在亚洲开始正式工作。他借助于巴黎的第15局、第18局建立了印度支那无线电监听网络，它是由以台湾、香港为起端的量角交叉法固定的。于是，法国谍报机关将60%~80%的越盟参谋部的电文破译出来。1950年，法军在越南高平受挫，法国反间谍局宣布：有8个越盟营在中国接受了训练。这一警告使越盟的武元甲有所警觉，6年后，在奠边府战役前，越盟改变了发报密码。

法国殖民政府千方百计要消灭胡志明政权，企图通过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越南人民。以保住它在亚洲的殖民地。一个美国情报官员曾指出，“起初，美国不愿接受法国这种赤裸裸的举动，但是由于中国的‘丢失’（指蒋介石被赶出大陆，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法国地位的日益恶化，美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1950年，美国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到1954年为止，美国已承担了这场战争78%的费用。美国已把越南战争视为遏制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国的政策有两个方面：1.从遏制共产主义出发，认为印度支那冲突具有全球意义，是东西方对抗的一部分，美国及其盟国应援助法国打败越盟，保证印支不落入苏、中、越一方；2.反对法国恢复殖民统治，又无力在这一地区投入过多的军力。

1953年4月，艾森豪威尔批准“立即租借给法国6架巨型运输机在印度支那使用，并由民航飞行员驾驶。”为了保密，他让艾伦·杜勒斯和中情局处理此事。

法国殖民军与越南人民军都在争夺主动，战场形势犬牙交错。越方一度遭到很大损失。赫鲁晓夫曾经回忆说：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开了预备会议，中国由周恩来出席，越南由胡志明主席和范文同总理出席。我们根据越南的形势确定了我们将在日内瓦采取的立场。越南的形势很严峻，越南的抵抗运动濒于崩溃，游

击队指望日内瓦会议能达成停火协议，以使他们能保住在反法斗争中赢得的土地。……

在……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留我长谈并把我叫到一个角落说：“胡志明同志告诉我越南的形势没希望了，如不赶快停火，越南抗法就坚持不住了。因此，他们已决定如果必要就撤到中国边境，并请我们做好准备，就像出兵北朝鲜那样出兵去越南。换句话说，越南人要我们帮助他们赶走法国人。我们根本不能同意胡志明的请求。我们在朝鲜已牺牲了許多人，那场战争我们的代价太大，目前我们没有条件再介入另一场战争。”

我向周恩来请求说：“一场关键的斗争正在进行，越南人打得不错，法国人损失严重。你们没有理由对胡志明说，如果在法国人的打击下胡志明的部队撤到中越边界，你们不去帮助他。为什么不撒个谎？让越南人相信，如必要，你们会帮助他们，这将鼓励越南游击队坚持抗法。”周恩来同意不对胡志明说，中国不会进入越南领土抗击法国。

后来奇迹出现了。当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参加会议时，越南游击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夺取了奠边府。在第一次会议上，法国国家元首孟戴斯·弗朗斯建议把法国的军事力量限制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我们又惊又喜。我们从来都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指示我方在日内瓦的代表要求分界线再向南移至十五度线，但这只是为了更好地讨价还价。经过简短的争论，我们接受了……建议，签署了条约。

尽管有美国的支撑，但法国此时已经力不从心了。

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军经过55个昼夜的浴血战斗，终于迫使奠边府的法军投降，拔掉了法国殖民军在越南西北部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整个印度支那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情局立刻提出报告：美国的军事援助对法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目前已经承担了法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大部分开支；越南是西方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势力的前沿，“基于这些原因，美国不应放弃越南”。当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公开反对通过谈判来解决印度支那战争。他担心越南将会落入共产党的手里，东南亚随之发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敦促美国出兵干涉，并且要求作出估计，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武器，将会引起什么后果。国务卿杜勒斯、副总统尼克松、国防部长威尔逊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除外）等白宫全体成员，都赞成动用核武器。空军参谋长特文宁说，如果当初在奠边府使用战术原子弹，就能清除那里的共产党，高奏马赛曲了。但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他说，我不愿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第二次对亚洲人使用原子弹。部分原因是，这将可能使美国在亚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被置于屠夫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我痛恨原子弹“那个可怕的东西”。艾森豪威尔感谢中情局支持了他的观点。1954年6月15日，中情局在一份情况估计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将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军事行动来防止越盟的灭亡……美国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只能加速中国作出是否参与越南战争的决定”。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提出建议：美国应取代法国在越南收拾残局，扶植新的南越傀儡政权。6月，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通知法国，美国不再承诺对它的支援。

扶植吴庭艳

1954年7月20日法国、英国、苏联、中国、柬埔寨、老挝、南越和北

越共同签署了日内瓦停火协议，一致同意在越南举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选举。副国务卿、前中情局局长史密斯在代表美国发言时说，虽然他的政府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美国不会使用武力来破坏协定。

在法国撤离印度支那的过程中，美国逐步填补这里的“真空”。

1954年6月，兰斯代尔上校作为中情局第一批人员以军事顾问团成员的身份来到西贡。杜勒斯给他的指示是：“悄悄进入越南，尽可能不去激怒法国人，但要疏远他们。”兰斯代尔的任务是，建立和扩大军事顾问团(SMM)，以便“开展反对敌人的准军事活动，展开心理战。”

兰斯代尔来到越南后，向法国提出建立中情局驻越办事处。此时的中情局已经在着手考虑如何取代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地位。法国人拒绝了中情局的这一建议，但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中情局驻越人员只好仍混迹于军事顾问团里。美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起初是中情局与军方的混合机构，实际由中情局把持，中情局特工以军方人员的身份在越南活动。随着美国在越南扩大军事介入，该机构成为美国军方驻越指挥中心，中情局则另起炉灶，建立了驻越情报站。

1954年11月，法国驻联合国一个高级官员在一份绝密报告中做出了对印度支那未来20年的预测——“可以看出：1.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政治向导是艾伦·杜勒斯的中央情报局，特别是兰斯代尔上校（他于吴庭艳就任前两个月抵达越南），他曾使菲律宾的马格赛赛当上主席……2.这些法国的反对者正在说服华盛顿，只要民族主义者掌权，让法国人离开，以便挑唆越南南方人民反对北方的共产党人就可以了”。

兰斯代尔在菲律宾秘密训练一批由南越军队官兵组成的执行破坏任务的小分队，然后由美国海军船只送入越南北方。他们穿上老百姓的服装前往河内散布谣言、制造混乱。

8月，中情局在西贡的军事代表团中有了10名特工人员。他们陆续组织了一些秘密小分队，分别进入北方。其任务是：

1. 企图摧毁河内最大的一家印刷厂，但被越盟的部队挫败了；
2. 进行所谓的“黑色心理战罢工”：以越盟的名义散发传单，指示居民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宣布放假三天，公布假的货币改革纲要。这一行动取得成功。第二天，越盟的货币贬值50%，河内的大多数人走上街头欢庆“假日”；
3. 在越盟接管政权的前一天夜里，到城市汽车燃料库，将燃料弄脏，以便使汽车发动机逐渐毁坏。

小分队的活动前后进行了7个月，结果大部分人被擒，成了河内谴责美国人的铁证。

日内瓦停火协议签署后不到一个月，中情局在一份报告中说：“如果按原定计划于1956年7月举行全国性的大选，如果胡志明不对越南的政治前景持偏见态度的话，那么他还有可能会在选举中获胜。”连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也承认，“我同熟悉印度支那事务的人交谈……他们无不认为……80%的人 would 投共产党胡志明的票，选他为领袖。”9月，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与去西贡观察“风向”的兰斯代尔一致看中了南越的吴庭艳，认为他是抵制共产党势力的一张王牌。进而形成了中情局的政策建议：应该尽快向吴庭艳表态，才有可能使他在南越取得成功。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中情局的这一建议。1954年10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亲笔写信给吴庭艳，明确表示了

美国对他的支持。

1954年年中，吴庭艳到达西贡，受到中情局驻西贡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兰斯代尔上校的欢迎。

吴庭艳原先旅居美国，法国人后来在比利时的一座天主教寺院里发现了她，把她送回南越，担任法国支持的保大皇帝的总理。1955年10月，吴庭艳在中情局的支持下废黜了保大，成立了越南共和国，自任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中情局从越南方面得到报告：“吴庭艳当政后，并没有对越南的改革抱有兴趣，恰恰相反，他在国内加紧了控制和镇压。”与此同时，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却指出，在越南还没有人能像吴庭艳那样得到这么多民众的支持，“他是一个管理有方”的行政官员；实现南越的经济繁荣要比实施民主更能有效地抵制胡志明的影响。显然，中情局把赌注押到了吴庭艳的身上。

实际上，吴庭艳在越南不得人心，他遭到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反对。“他一无军队、二无警察、三无政府。但他确实得到了兰斯代尔上校的支持，以及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战争宝库中的金钱、人力、武器、训练、宣传和政治方面的本领。”

1979年被美国国内报刊公布的《五角大楼文件》披露，为了扶植吴庭艳政府，兰斯代尔在北越活动的各路人马煽动北越天主教徒以及被法国人抛弃的信奉天主教的军队逃往南方。中情局驻西贡的军事顾问团向越南天主教徒许诺，如果他们愿意移民，就会得到土地、房屋和贷款……为此，中情局组织散发了伪称是越盟的传单，对越南民众进行恐吓……散发传单的第二天，难民登记数量猛增两倍。中情局各组散布“中共军队强奸越南姑娘、对村庄进行烧杀抢掠”的谣言，还散发各种传单，宣扬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河内和北方各城市必将毁灭干净……在300天时间内，中情局为被它诱惑的北越人免费提供交通，由中情局的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和美国海军的军舰将100万北越人恐吓和诱感到越南南方。

在这场大欺骗行动中，美国海军军医汤姆·杜利中尉是个显赫的人物。他在越南海防组织了35000名天主教徒集会，要求到南方去。他利用医生这个人道身份作伪装，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写文章，捏造越盟开肠破肚残杀了1000名孕妇，用竹棍敲打赤身裸体的神父的睾丸，用筷子插进儿童的耳朵不让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等等耸人听闻的谎言，欺骗美国国内舆论。直到1979年调查他的罗马天主教圣徒身份时，他作为中情局特工的真相才被揭露出来。

虽然天主教在以佛教为主的越南南方人数极少，他们却成为吴庭艳政权的社会支柱。通过欺骗行动搞到的100万人口增强了吴庭艳的实力。

特种部队在越南

“猪湾事件”后，肯尼迪痛感在对付第三世界的反帝武装斗争方面，核武器根本用不上，常规部队也事半功倍。因此他接受了泰勒“灵活反应”的战略主张，这其中包括“特种战争”和“特种部队”。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原有的特种部队名存实亡。肯尼迪决心重新组建，亲自给予指导。由于西方没有关于游击战的理论著作，他研读了毛泽东和古巴的格瓦拉在游击战方面的著作，并把这两种书指定为有关军事人员的必读书。在泰勒的帮助下，他扭转了美国军事领导人的抗拒情绪，在北卡罗来纳州建立和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装备与人员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了五、六倍。不久，海、空军也跟了上来，海军发展两栖部队和水下破坏队伍，并仿效越

南渔船建起一支船队，在越战中专门骚扰越共的海上供应线。空军建立起支援丛林战争的运输机队以及称作“森林杰姆”的突击队。海军陆战队员增加了15000人，全部接受游击战训练。国防院校的课程中增加了游击战与“反暴乱”行动的科目。另外，由于游击战的性质是要与当地群众打交道，决定让特种部队的人员普遍接受文官的训练，同时又让文官接受“反暴乱”训练；驻外军事顾问、武官与教练，都加紧学习当地语言。实际上，特种部队人员就是反游击战专家。

特种部队是肯尼迪的得意之作。他对其装备细节都亲自过问：下令都戴“贝雷帽”（一种无檐软毡帽），所以这种部队又称“绿色贝雷帽”；指示以轻便胶鞋代替笨重军靴以适应丛林泥泞土地；后来又指示给胶鞋底打上铁钉以应付南越武装设置的蒺藜；还指示为身材矮小的南越士兵专门设计了更轻便的战地收音机以及火力相同而枪身较短的步枪，等等。这支队伍不但要执行军事任务，而且要执行文职任务。他们要能在丛林、乡村以及敌后生活。据说肯尼迪经常引用毛泽东关于战士与老百姓应是“鱼水关系”的话，他知道游击战争的力量在于群众的支持，因此，他原来的计划主要不是依靠大量投入美军作战，而是以少而精的专家派往各国训练当地人组成的游击队。当然，战争的性质决定了军民能否建立起“鱼水关系”，在这一点上，美国侵越军是无能为力的。特种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越南战争，因此注定了这一尝试必然彻底失败。

时间不长，由于吴庭艳拒绝在南越实施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吴庭艳政权，西贡的局势日益恶化。中情局人员从西贡发回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吴庭艳在南越实行独裁专制政策，使南越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社会中坚力量与现政权离心离德；吴庭艳把国家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里，把一些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伙伴推到了对立面去。1961年再次来到越南的兰斯代尔也发出了警告：吴庭艳和他的负责南越秘密警察的兄弟吴庭儒联合镇压反对力量，这已在南越内部产生了不安定的情绪，政局相当动荡。看来，兰斯代尔对吴庭艳也逐渐失去了信心。

兰斯代尔少将提出了在南越建立“战略村”、实施政治经济改革的计划。他和中情局的官员们认为，与越共争夺的关键在农村，“那里带有根本的性质”。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科尔比支持这一观点，并搞了一些“试验点”，准备将来以点带面去推广（中情局认为，在这一时期越战形势最有希望）。肯尼迪支持这一建议，他要求把建立“战略村”作为特种部队的一项任务来执行。但军方对此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与越共的较量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到农村搞福利事业”。本来肯尼迪准备在任命兰斯代尔担任驻越大使或到越南担当其他职务，由于军方的反对，这一切都未能实现。肯尼迪死后，“战略村”计划名存实亡，中情局所从事的军事活动也逐渐转交给军援司令部。

继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后的肯尼迪政府认为，只要吴庭艳能致力于南越的经济繁荣，实施改革，履行美国对他的希望，南越有可能成为遏制亚洲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桥头堡。这时的中情局对吴庭艳已经完全丧失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扶不起来的政府。但肯尼迪没有理会中情局直接来自南越的情报分析，他认为现在该采取行动了，以解决从艾森豪威尔政府手中接管下来的第二个重大国际问题。肯尼迪决定，派总统军事代表、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和白宫班子成员罗斯托去东南亚，对急剧恶化的南越局势作出确切估价。泰勒和罗斯托都是持强硬路线的鹰派代表，二人在西贡及周围地

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后,11月份向肯尼迪作了汇报,要求首批向南越派出8000名美军人员,以后再增加到20万人;还要求向南越派出大规模的美国顾问团,并对吴庭艳政府进行改组。泰勒认为,越南并非不适合打仗,但不派军队便不能完成美国挽救南越反共政权的计划(此前,吴庭艳政府已要求美国派出战斗部队去越南)。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坚决要求派遣美军去南越参战。泰勒和罗斯托的报告提出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顾问和其他白宫的“新边疆”人物均表示赞同,只有副国务卿鲍尔和主持老挝谈判的哈里曼等少数人提出谋求政治解决的主张,反对出兵东南亚。鲍尔是个对美国战后干涉主义政策不满的民主党自由派政治家,他曾从道义立场出发,反对猪湾入侵计划。他的主张首先就被腊斯克否定了。1961年11月4日,在有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等人参加的白宫会议上,鲍尔说:“我们千万不能派兵去南越,否则,我们将会陷入比朝鲜还严重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鲍尔还告诫说,我们美国人不要重蹈法国人的覆辙。令鲍尔震惊的是,肯尼迪总统不愿讨论这个问题,他似乎早已下定了决心。

另一些行政官员对泰勒调查团的建议是有取有舍的。他们赞成扩大军援,但反对派遣战斗部队。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国务卿腊斯克。腊斯克在40和50年代之交,是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有名的强硬派。但也许正是在中国问题上的经验,使他怀疑大力支撑腐败无能的反共政权能否奏效,并且担心美军大规模卷入可能带来的威胁。他告诫说,美国不应把新的大笔威望赌注押在一匹看来要输掉的赛马上,他要求特别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吴庭艳是否愿意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他说,如果吴庭艳不改革,区区数千美军就不可能扭转局势。调查团中的国务院成员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不过,他们都赞成军方提出的其他军事干涉措施。

肯尼迪当时倾向于腊斯克等人的主张。他曾这样评论泰勒的建议:“他们想要一支美国部队。他们说这是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所必需。但是,事情将恰如柏林的状况:部队开进去,鼓乐大作,万众欢呼,但4天之内每个人都会把这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我们将被告知必须派遣更多的部队。这好比酗酒,一杯下肚,酒力渐消,你就得再来一杯。”

11月5日,肯尼迪决定实施泰勒调查团除派遣战斗部队以外的建议。这个决定事实上确立了美国此后近三年的越南政策:用美国战斗部队以外的军事手段,特别是美国战斗支援部队和数量急剧增加的军事顾问,直接协助西贡政权作战,争取打败乃至消灭解放武装。这是美国干涉的重大步骤,也是导致美国政府在越南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自拔的关键步骤。1961年结束时,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人员已从肯尼迪就职时的875人增至3100人,而到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时已达16000多人。另一方面,尽管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战斗部队始终未进入越南,但正如《纽约时报》编者所说,“支援部队”与“战斗部队”几乎只是官僚机构的一种文牍区别,在越南战场上很难说有什么根本不同。

事实的确如此。肯尼迪作为遏制政策和“多米诺理论”的忠实信徒,早已准备好在南越战场上投下赌注。1961年12月,肯尼迪准备派出军事代表团去西贡,同时命令国防部准备派遣美军去南越。不久,大量的陆军车辆、直升飞机和B—26型轰炸机在南越集结,大批的美国特种部队踏上了南越的土地。在泰勒—罗斯托提出报告15个月的时间里,身穿制服的美国陆军部队在南越大动干戈,美国空军出动飞机轰炸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阵地。随

着美国军事力量在越南急剧增加，原先的军事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南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中情局尽管对白宫在越南采取的政策存有种种疑虑，但他们仍然死心塌地为美国政府效力，妄图赢得这场战争。西贡和华盛顿的情报专家对于越南战争的中、短期前景写出了专题分析报告，在南越各地的中情局秘密特工人员则千方百计地施展各种手法笼络当地人，从他们那里了解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情况，直接

为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提供情报，以配合美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

吴氏兄弟倒行逆施

美国驻越军人急剧增加使吴氏兄弟感到不满和不安。特别是，对新来的上万名美国人都需给予先前仅几百名美国顾问享有的“半外交特权地位”，这使他们感到对自己统治地位的潜在威胁。1963年初，吴氏兄弟公开表示美国应减少驻越人员。这反过来引起美方的强烈不满。美吴矛盾导致吴庭儒在1963年春同北越和民解秘密接触，以便试探“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他认为，只要对美国人下逐客令，北越就很可能尊重吴氏兄弟在南越的统治地位。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获悉了吴庭儒的这一举动，并通知了白宫。

另一方面，吴庭艳却一厢情愿的认为，美国派遣军事人员来南越参战是对他个人及其政权表示支持，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镇压国内持不同意见者，甚至对佛教徒也横加摧残。他不惜派兵进攻和占领了许多佛教寺院，逮捕了上百名佛教僧侣，使已经混乱的南越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吴庭艳缺乏自知之明，根本不懂得美国政府支持他的原意。其实，白宫之所以支持他，是要他保住南越（就像南朝鲜一样），与共产党画地为牢。现在他却对一个和共产主义毫无关系的宗教事业采取高压政策，这充分暴露了吴氏政权的绝对专制和暴虐无道。从一开始就反对美国直接卷入越南战争的副国务卿鲍尔说：“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在南越支持的是一个以政治上的腐败和党魁控制来操纵政权的老虎，而不是提倡民主的杰佛逊总统的信徒。”应肯尼迪的邀请去西贡实地考察后回来的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毫不含糊地告诉鲍尔：“吴庭艳是美国在越南推行政策的不可逾越的障碍。”1963年5月，在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87年纪念日那天，吴庭艳的士兵在顺化市开枪打死了9名虔诚的佛教徒。为抗议吴庭艳政府的野蛮暴行，一名佛教僧侣在繁华的西贡街头将汽油浇在自己的身上，盘膝而坐，点火自焚。另外一些僧侣团团围住他，以示对吴庭艳迫害佛教徒的抗议。对此，吴庭艳的弟媳吴庭儒夫人叫嚷道：“让他们烧死，我们鼓掌！”她称佛教徒的自焚是“和尚烤肉”。到10月份为止，南越已发生了7起僧尼焚身自杀事件。8月21日，吴庭艳的兄弟吴庭儒命令他的特种部队在深更半夜偷袭佛教徒的寺庙，他们使用了机关枪和催泪弹。吴氏兄弟对佛教徒的残酷镇压，是为了确保天主教少数派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吴庭儒夫妇自认为他们是这一派无可争议、当之无愧的领袖。为了抬高个人的身价和权力，吴庭儒夫妇恣意破坏西贡政府的形象，这些更加激起人们的不满。而吴氏政权日益走向极端，它袭击学校，把甚至把中小學生关起来。这一切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政府由于支持这个独裁政权遭到了空前的谴责。以致于肯尼迪说，如果因佛教徒事件而撤除越南，那么整个东南亚就会崩溃。因此可以说，美国要继续留在南越，吴氏倒台是个先决条件。很明显，吴庭艳集团已成为美国推行越南政策的累赘，白宫决定另外寻觅一个“民主的、能得到南越人民广泛支持”的领导层来取代吴庭艳的家族统治。

争 论

1963年的夏季，在华盛顿召开的几次反暴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对如何处理吴庭艳及其声名狼藉的亲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情局局长约翰·麦康力保吴庭艳。他争辩说，吴庭艳的确是个“畜生，但他是我们的畜生”。而年届古稀、资历颇深的副国务卿艾夫里尔·哈里曼坚决主张换马，他认为，吴庭艳受他那个鸦片鬼弟弟吴庭儒的控制，而且根据中央情报局截获的一些可疑材料，他怀疑吴庭儒在暗中与共产党合作，他还对吴庭艳政权的残暴以及佛教徒以死拼争的强烈反抗感到震惊（中情局计划处处长，后任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后来咕哝道，哈里曼不懂得，对于佛教徒来说，“自焚只不过是升天的另一种途径”）。哈里曼明确主张“对吴庭儒发动一场政变”。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不同意推翻吴庭艳，他曾公开称吴庭艳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我们在那里的独生子”。

8月21日，吴庭儒派兵袭击了寺庙，与此同时，中情局向华盛顿发去报告说，吴庭艳军队中持异议的将军们害怕被吴庭儒的人暗杀。根据这些情况，8月24日下午，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哈里曼、国务卿远东事务助理罗杰·希尔斯曼、总统顾问邦迪的助手迈克尔·福雷斯特尔3人共同起草了一份给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电报。电报中授权洛奇大使转告一些南越高级将领，如果他们能推翻吴庭艳政权，美国将承认他们组建的新政府。电报还要求这些军事将领们迅速行动，把吴庭儒夫妇赶下台，否则，美国不可能继续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南越政府。

8月24日是周六，大多数官员都离开了华盛顿。起草电报的这几个人四处寻找各方面的头头签字同意。肯尼迪最后批准了，但条件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同意。国务卿腊斯克同意了，但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情局局长麦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都不在，是由他们的副手签字的。中情局方面是由赫尔姆斯签名的。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

当这些头面人物在周一回到华盛顿并得知电报的内容后，都非常恼怒。随之而来的辩论激烈的会议和混乱状况使肯尼迪惊呼：“我的上帝啊，我的政府已经四分五裂了！”

在这期间，白宫的态度摇摆不定。批准搞政变的电报先是收回，继而又恢复生效。在西贡的那些准备搞政变的将军们被弄得两眼发呆，犹豫不定。在华盛顿和西贡之间，相互矛盾的信息来往于好几个不同的通讯联系渠道——中情局的渠道，国务院的渠道，洛奇大使通往白宫的私人渠道，以及连白宫都不知道的一些渠道。哈里曼凭借他对官场斗争的灵敏直觉，发现了泰勒将军和驻西贡军事使团团团长保罗·哈金斯将军之间有一条秘密联系渠道。对此，肯尼迪赞叹道“哈里曼真是个精明的老畜生！”鉴于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肯尼迪派遣一个使团去西贡调查那里的实况，却还是带回了两种意见：海军陆战队的克鲁拉克将军断言那里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而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则报告说那里的政权正在崩溃。肯尼迪哭丧着脸说：“天哪！你们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

就在华盛顿争论激烈的时候，南越总统特别军事顾问杨文明将军找到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约翰·理查森，向他汇报了准备暗杀吴庭艳兄弟的计划。理查森马上把杨文明的计划报告给洛奇大使和中情局总部。理查森提议说：“我们不应该说我们反对这个暗杀行动。”

9月5日，麦康得悉杨文明的暗杀计划后，他认为中情局不应参与暗杀

行动。于是，他向西贡站发去电报：“我们不能挑动、批准和支持暗杀行动。”后来麦康特地拜访了肯尼迪总统和罗伯特·肯尼迪。麦康向他俩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中情局的作用是收集越南事态发展的情报，然后呈送给有关当局，并不一定要去直接插手某些事情；美国总统应对吴庭艳施加压力，迫使他改变目前的所作所为，争取在国内尽可能多地得到人们的支持。麦康恳切地对肯尼迪说：“总统先生，假如我是一支棒球队的领队，我手里只有一名投手，不管这名投手的技术水平如何，我得设法保留他。目前，倘若我们把吴庭艳搞掉了，南越势必会不断发生政变，这样一来，南越政局动乱将会延续好多年”。肯尼迪同意麦康的看法，但在如何对待吴庭艳的问题上，肯尼迪持保留态度。

实际上，麦康向肯尼迪兄弟俩讲述的正是中情局情报分析专家的基本观点：1. 一旦南越发生政变，吴氏政权马上就会被推翻，吴庭艳本人极可能在动乱中毙命；2. 目前，南越还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3. 发动政变只应除掉吴庭艳，而不要危及和激怒吴庭艳。

尽管麦康不赞成政变，但还是执行了白宫的指令，“向西贡的南越军方首领们表明了美国支持政变的态度”，中情局驻西贡站还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政 变

6月27日被任命为美国驻南越大使的洛奇，于8月21日走马上任。他是肯尼迪的亲信，他的意见很有分量。他向白宫报告说，吴庭艳是阻碍美国赢得战争胜利的绊脚石；他催促华盛顿尽快支持反吴庭艳的将军们。在两派意见中，他貌似公允地主张“不去阻挠”政变。实际上，他是赞成推翻吴庭艳政权的。肯尼迪很欣赏洛奇的说法，最终按照这个口径批准支持政变。8月30日，洛奇大使给肯尼迪总统发去了电报。电文是这样的：“为了取得成功，南越人要采取声势很大的行动，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也就是说，南越的将军们会大张旗鼓地干的。”他的估计与中情局情报分析专家的预计基本相同。

中情局负责与西贡策划政变的将军们联络的卢西恩·科宁对一名南越将军说：“美国反对搞暗杀行动。”一听这话，那个将军赌气地回答：“那好，既然你们不喜欢搞暗杀，我们就不讨论这件事了。”

自从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访问了西贡之后，华盛顿和西贡之间的电报频繁往来。不久，肯尼迪终于下定决心，同意南越将军们发动政变。南越将军们得知白宫准备抛弃吴庭艳后，西贡马上爆发了内乱。

1963年11月1日，南越军人发动政变。当天，南越的将军们打电话给科宁，要他带上手头所有的现金到他们的总部。科宁带着42000美元赶到了政变的司令部，将军们对他说，这些钱准备用来抚恤在政变中丧命的弟兄们。科宁于是就在这里坐看整个政变的进程。

吴庭艳兄弟和他们为数不多的卫兵在总统府一直死守到第二天黎明，吴庭艳见大势已去，就亲自打电话给政变的将军们，同意投降。到这时，科宁才离开了政变司令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大约10点钟，科宁又来到政变司令部，他这次来是奉肯尼迪之命，探听将军们准备如何发落吴庭艳。将军们告诉科宁，吴氏兄弟从总统府通过地道逃到郊外的堤岸市，很快被政变士兵捕获，在装甲车里被打死了。这两具尸首遍身弹痕和刀伤，痛恨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后来，赫尔姆斯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在政变中被杀，我可说不清这到底算不算是暗杀。对于吴庭艳之死，我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出于非常简单的政治原因，吴庭艳死在他自己同胞的手中，要是不发生这次死人事件，而是采用其他方法让南越政权变更的话，那就更理想了。”

麦康和中情局情报分析专家事先对南越形势的估计并没有引起白宫的重视，但是最后却被事实所验证了。吴庭艳一死，西贡的政局变得更加动荡不定，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发生了6次军事政变和政权改组，“几乎每个将军都想当总统”，形成了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一个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

战争升级

1963年下半年，越南战场军事形势恶化，促使肯尼迪政府考虑战争升级，而攻击北越被认为是釜底抽薪的办法。由于在大选前不便公开攻击北越，加强秘密战就成了这方面唯一的选择。肯尼迪遇刺前几天，白宫决定，由驻越军援司令部和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联合拟定和实施大幅度强化秘密战的计划，它将着重于一种“打了就跑”的突袭战。

约翰逊上台后，要求迅速完成计划以便迅速实施。1964年1月，他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即“34A行动计划”。自2月1日起实施。主要内容为：派U—2型侦察机和地面特务搜集北越情报；用空投和海上进入的突袭队破坏北越沿海地区重要的交通线；派遣南越鱼雷快艇，在中情局和绿色贝雷帽的陪同下，袭击人民军海、空防设施；所有这些行动的频率和规模将分成三个阶段逐步加大，以便完成计划的宗旨——“通过越来越严重地惩罚北越和施加压力，可能使北越领导人确信应为自己的利益而停止侵略”。

中情局向越南北方空投特务的行动算是相当成功，总共空投了8次，多数小组保持着地空之间的无线电联系。

此外，秘密战还有两项内容：1.伙同万象政权对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和老挝战斗部队进行轰炸。美国在老挝组织了一支由几十架美制T—28型战斗轰炸机组成的空中力量。这些飞机全都涂有老挝王国空军的徽号，其中多数属于中情局，由美国驻老挝大使控制下的美国和泰国飞行员驾驶。轰炸从1964年春开始，由一支代号为“美国佬小组”的美国海空军侦察机中队为其确定目标。2.派出无线电监测船只，搜集和窃听越南沿东京湾一带的各种通讯。

美国对越南北方实施的秘密战，相应在南方遭到越共更频繁、更猛烈的反击：波来古、新山一等空军基地遭到毁灭性炮击、美军军官宿舍挨炸……

1965年3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美国驻西贡使馆外引爆了汽车炸弹，许多人受重伤，其中包括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站长德西瓦尔。

约翰逊政府随之开始对北越实施大规模空袭，并向越南大量增兵，20多万美军作战部队正式参战。

此时，中情局在西贡的情报官员已达400人，成为中情局在海外最大的情报站。在头顿还有一个搞清乡扫荡的绥靖工作训练中心；在岷港有从事34-A秘密行动的船舶基地；另外还有一支由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苗族部队。

在中情局内部，有许多人对越南的前途悲观失望，不愿去那里工作，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挽回“已经不可挽回的局面。”1964年，在计划部任远东处处长的威廉·科尔比（1973年后，他升任中情局局长）为在越南工作的中情局人员制定了轮换制度。他想在中情局局内实行官员轮流去越南服务的

制度，理由是“把这个危险而困难的任務更公平地分配给其他地区处，让大家共同来分担在越南的重任。”科尔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局长麦康。麦康听后，冷冰冰地抢白道：“科尔比先生，总统认为越南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要求我们派遣出类拔萃的人去那里工作。你必须派我们质量最高、最好的人去，并把他们留在那里。我可不愿再听到别人说，让不称职的人到那里去分担责任等诸如此类的话。”

二十八、内外交困

旧怨新仇

就在吴氏兄弟二人死后 20 天，肯尼迪也命丧黄泉。肯尼迪原定于 11 月 25 日召开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只得改由新总统约翰逊来主持。约翰逊把会议提前到 24 日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是把肯尼迪引向战争冒险行动的全班人马：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美国驻越南大使洛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中情局局长麦康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继续在越南打下去？实际上，这次会议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争论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会议结束后，约翰逊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向报界宣布：约翰逊总统将延袭前总统肯尼迪的政策，把越南战争打下去。

白宫的新主人既然下了命令，中情局闻风而动。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前中情局中东问题情报分析专家罗伯特·W·科默设想了一个代号为“长生鸟”的计划：训练越南人从事各种秘密行动，中情局则集中精力对收集到的情报进行分析。科默提出，中情局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联合进行情报协调和开拓。为此，中情局特地派出得力干将科尔比去西贡，在科默建立的“CORDS”组织任第二号人物，负责“长生鸟”计划的日常工作。然而，中情局在越南开展情报收集和秘密行动时常与军界或其他机构发生纠葛和冲突。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空军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 1954～1955 年间，在比斯尔承担研制 U—2 型飞机时，空军部就另有盘算。当时，美国空军部正在致力于发展空军的运载能力，尤其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 B—52 型轰炸机研制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美国空军部同意让中央情报局去搞 U2 型侦察机的研制工作。在他们看来，用 U—2 型飞机去收集情报只是一种遥远的设想，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收集情报还得依靠拦截空中电讯。出乎意料的是，比斯尔只用了 18 个月的时间，第一架能飞越苏联上空而不需中途加油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便问世了。这件事委实使美国空军方面的官员感到吃惊。不过这些人心中还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们认为，舍此可以节省些钱去办更实际、更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明智的，更何况一旦 U—2 型飞机投入使用，中情局的 U—2 型飞机需要空军方面派出飞行员去驾驶，这样一来，U—2 型飞机就等于掌握在美国空军部的手里。然而，事与愿违，空军部的算计落空了，飞机和飞行员都被中情局通通收去，而且 U—2 型飞机在实际使用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按照赫尔姆斯的话来说：“这使情报活动从饥荒年代转变成丰收年代。”比斯尔借着 U—2 型飞机试制成功这股东风又转入领导间谍卫星和新一代 SR—71 型侦察机的研制工作。直到这时，美国空军部才感到追悔莫及，他们决心要夺回理应属于他们管辖的空中侦察的权力。

在 1963～1965 年间，中情局和美国空军部在空中侦察权问题上的争斗几乎达到了高峰。空军部提出，中情局在空间照相侦察之事应由空军部门来管辖。其实在两年多前，中情局、美国空军部和美国海军部已达成协议，同意相互合作进行高空侦察。这份协议的实质内容已经明文规定了由中情局控制高空侦察计划。当时，洲际弹道导弹已研制成功，美国新成立的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全面负责美国的空间计划。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空军部的轰炸机以及战略空军司令部在美国的国防地位大大地削弱了，他们已不再是美国主要的防御力量了。为了保持自己昔日的雄威，美国空军部决心要把至关重要的空间照相侦察权夺回来。空军方面唯一能打出的王牌是：中情局的空间侦

察行动要依赖美国空军的人力和基地等方面的帮助。经过一番争执，终于在1965年8月谈妥了这笔交易：由国防部长全面控制空间侦察计划；中情局局长有权提出收集情报的要求，一旦国防部长与中情局局长产生意见分歧，中情局局长可以直接诉诸总统裁决。

在华盛顿，中情局虽然和美国军方的上层人士达成了协议，但是那些远离本土在异国他乡工作的中情局人员、美国空军以及驻越军援司令部却不理睬这个协议，各方人员仍是我行我素，你争我夺，不仅不能协调配合，而且各自为政，拒绝相互交换情报信息。

乔治·基根少将是美国在南越的空军情报负责人，他说：“我在东南亚最大的对手并不是北越的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而首先是中央情报局，其次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我不得不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对付这两个机构。我要帮助空军司令对河内采取有效的空中行动，而我却得不到我所需要的侦察工具，要不是我在华盛顿经过一番‘拼搏’，我绝对不可能有权使用U—2型飞机、SR—71型飞机和无人驾驶飞机进行高空侦察的。”

在回顾1967年阻止北越通过胡志明小道将人员和物资运往南越的情况时，基根叙述了中情局如何拆美国空军的台脚：

“我当时发现敌人的物资有90%是通过两条山间小路运往南越的。通过拦截对方的电讯，破译对方的密电，从而我掌握了确切的情报，知道北越将什么物资运往南越。照理我是无权干这种事的，但由于我们和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之间的矛盾，他们不肯为我拦截和破译密电，我只好自己动手了。我的上司对我每天能把炸毁的敌人卡车数目统计出来，感到很满意，他们能及时向五角大楼报告。殊不知，中央情报局通过他们自己的渠道，也在向华盛顿送情报，并在总统面前告我们的状，说什么‘不管空军方面怎么轰炸，敌人的卡车总能从美国空军的眼皮底下溜过去。’后来我才发现，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监视着美国空军的军事行动。他们派出一些路边监察人员，进入山区，隐藏在敌方的后面，每当有卡车经过山间小道时，便发出信号。实际上，我每天派人在那里拍8次照片，分明没有见到卡车行驶在山间小道上。我断定一定是有人在虚报情况。中央情报局多次拒绝我的要求：派空军方面的人员去山间小道实地探究情况。后来我还是自作主张，空降了一些人去看了个究竟，这一下我才恍然大悟，中央情报局派出的路边观察员只是通过听声音来判断到底有多少卡车通过山间小道。一些敌人的卡车为了躲避轰炸，从一个隐蔽地拐入另一个隐蔽地，或者先朝西开，又原路折回，这些都被中央情报局的路边人员误认为是进入南越的北越卡车了。他们仅仅是以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来计算进入南越的卡车的数量。”

1963年11月，中情局提出运用人工降雨的手段来对付“胡志明小道”，遂与美国空军合作，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播撒碘化银，制造暴雨，引发洪水，阻断交通。气象武器试验相当成功，但美国空军与中情局的合伙经营并不顺利，每每争吵。中情局指责空军“干活粗糙，质量不高且不彻底”，空军认为中情局是鸡蛋里挑骨头，而且怀有受中情局摆布的怨气牢骚。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先后动用飞机2600多架次，投放催化弹7400多枚，耗资2100多万美元，参加人员达1400多名。

红眼病

在中情局的眼里，美国空军是冤家，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也不是好货。

1965年，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成立了“人民行动队”，训练南越反攻骨

干力量。受训后的南越人被派往农村地区与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对抗。在“人民行动队”成立后的5个月里，3支“人民行动队”的小分队共打死了150名民族解放阵线武装人员，俘虏200多名，而他们自己只有6人死亡，20人受伤。中情局为此趾高气扬，在华盛顿也觉得风光多了。然而，“人民行动队”被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看中了。1964年5月，洛奇辞去南越大使的职务，回国帮助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竞选总统，暂由泰勒将军接替大使的职务（1965年，洛奇又重返南越，继任大使，直至1968年，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洛奇被派往巴黎参加越南问题的和谈）。泰勒将军对中情局训练南越人的计划很感兴趣，他坚持要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向接替哈金斯任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的威斯特摩兰将军汇报这项训练计划。而威斯特摩兰把中情局的这项计划看作是对驻越军援司令部的潜在威胁，认为中情局夺走了他们的兵源，把应属于驻越军援司令部管辖的武装力量拉到中情局的门下。而中情局则以“人民行动队”人员不穿制服为理由，拒绝让美国驻南越司令部接管这支武装力量。威斯特摩兰在和西贡情报站站长交涉时，质问对方：“要是他们不穿制服，你们如何能辨别他们究竟是普通的南越农民还是‘人民行动队’的成员呢？”“正是因为难以区别，所以才能蒙骗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西贡情报站站长不甘示弱，驳斥着对方。“他们必须看上去像士兵的样子，才能像士兵那样去行动。”另一名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将军蛮横地说。中情局人员还是寸步不让，竭力维护本家的利益。最后，威斯特摩兰断然决定：“我和我的同事们以征兵的形式来解决南越军队的兵员来源，我们要把‘人民行动队’人员分配到南越的空军、海军、地方军和民团。”显然，威斯特摩兰要把这场越南战争完全置于驻越军援司令部的控制之下。

在军队里，威斯特摩兰将军是泰勒将军的下属，也是泰勒的“灵活反应”战略的忠实执行者，两人有着一致的观点，认为越南的这场战争是美国人的战争，应当尽可能打正规战，而不是打游击战。当威斯特摩兰和中情局争论“人民行动队”的所属权时，泰勒大使明显地站在威斯特摩兰一边。1966年11月，驻越军援司令部终于把中情局一手扶植起来的“人民行动队”接管过去。为此，中情局一直耿耿于怀。

他也踩一脚

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们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战争悲观失望，这不仅使中情局与驻越军援司令部之间矛盾丛生，而且与空军、白宫以及美国政府中的其他机构的关系也很紧张，此时的中情局简直成了孤家寡人。

南越傀儡政权换马以后，政局日益动荡，而且军事形势更加危急，北越军队源源不断涌入南方，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合为一股，战场形势咄咄逼人。约翰逊总统面临如此糟糕的烂摊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南越撤军，他将蒙受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羞辱和亏损；要么增兵，将这场战争逐步升级。约翰逊每把战争升级一步，他都盼望这样做能迫使北越和南方解放阵线坐到谈判桌边来。约翰逊认为，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能赢得一些时间，使自己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虽然约翰逊是这样想的，但中情局却不这样看。约翰逊的战争升级每遇到一次挫折，就使中情局增加一分忧愁，因为他们也跟着背黑锅，不仅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还要被国内的反战民众臭骂……就在华盛顿官僚们为越南问题苦心焦虑的时候，兰德公司的合同分析专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把五角大楼有关越南战争的文件

泄露给《纽约时报》，这一下使中情局暗自高兴，感到自己终于能在公众面前抬起头了。这些泄密的文件完整地汇集了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全过程，其中包括许多会议记录，讲话稿和政策文件，从中不难看出中情局对越南战争的估计和提出的建议要比其他部门更准确。可是这样一来，却得罪了国务院，使中情局与国务院之间的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当时，许多中情局官员在国外常常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有的担任政治官员或领事，有的还当上了大使或参赞。在南越，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在美国大使馆担任政治官员，同时还兼任大使的“特别助理”，从形式上说，他应受大使的支配。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西贡站站长试图摆脱与大使之间的主仆关系，以便使在越南的中情局人员有充分的余地从事秘密活动，再不必因担忧引起外交上的麻烦而受到约束。但是，由国务院派遣的大使不同意中情局的这种做法。因此，中情局只得屈居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控制之下，按照他们所制定的政策行事。而中情局驻越人员对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在南越的最高代表——驻越大使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很不满，认为他们对越南战争的估计以及所采取的行动都是错误的。有些事如果让中情局来搞的话，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人民行动队”，一炮打响，可是事与愿违，“人民行动队”刚做出成绩，就被别人接管了。

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理查森原先与吴庭艳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他强烈反对美国同意南越的将军们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这件事使洛奇大使十分恼火，他经过一番幕后工作之后，终于迫使中情局将理查森召回美国。1964年，皮尔·德西尔瓦接任西贡站站长。

此时中情局局长麦康认为，大家在越南战争中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他不希望新任站长德西尔瓦与洛奇之间再发生类似不愉快的事情。然而事与愿违，令人扫兴的事还是发生了。在德西尔瓦赴任的一次午宴上，洛奇大使瞧也不瞧他一眼，便冲着麦康说，“我不需要也不想要中央情报局再派一名新站长来西贡。”洛奇边说边朝着德西尔瓦坐的方向比划着。麦康对洛奇一向没有好感，他收敛了笑容，耐心地听对方把话讲完。他心中自有主张：如果洛奇提不出正当理由的话，他作为中情局局长有权不更改对德西尔瓦的任命。这一次麦康总算顶住了洛奇的进攻，使洛奇没有台阶可下。对于这次交锋的失利，洛奇念念不忘，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私愤的机会。

洛奇大使原住在大使官邸里，面积很大，但样子不气派，他对自己的住处一直不满意。前西贡站站长理查森刚离开南越，洛奇就派人将理查森的房子装修了一番，搬进去住上了。副大使跟着搬进洛奇原先的房子，让自己的旧房空关着。德西尔瓦上任后，只得住到副大使空着的房子里。等他刚安置完毕，他的秘书便打来电话告诉他，洛奇大使要马上见他，德西尔瓦以为有什么重要的公务，便急匆匆地赶到洛奇在大使馆顶楼的办公室。洛奇大使阴沉着脸，示意德西尔瓦坐下，自己则反剪着手在窗前来回踱着步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转过脸对着德西尔瓦说：“皮尔·德西尔瓦先生，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我在午餐会上讲过的话，我想你能理解这一点，我对你并没有成见，我只是不希望中情局再派一名站长来西贡。当然，这并不是我现在要和你争论的事情，我现在叫你来，有两件事要你立即办理一下。第一件事，你一定注意到在你办公室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大使特别助理’，你来西贡后，我不想再看到那块牌子，请你把它摘下来；第二件事，你的前任给你留下一辆黑颜色的大型‘雪佛莱’轿车，这辆车要比我的车更新、更长，

我不希望你再继续使用这辆车。”洛奇的这席话使德西尔瓦十分尴尬，他知道，自己今后在西贡不会有好日子过的。这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局长麦康在华盛顿也是同样，自身难保，苦熬时日。

白宫不疼爱

在肯尼迪任总统时，他每天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中情局送来的情报简报（这是中情局特地为总统编撰的《总统情报简要》）肯尼迪看完后，常常在上面写些批注，有时还亲自打电话给克莱因或杰克·史密斯，甚至还会打电话给中情局的普通工作人员，详细询问简报上的有关内容。有时报刊上登载的消息在简报上没有提及，肯尼迪也会提出疑问。约翰逊当总统后，与肯尼迪大相径庭，他喜欢在一天工作之余，才浏览一下中情局送来的简报。中情局在约翰逊那里几乎从来没有得到任何阅后的反馈，有人甚至怀疑约翰逊是否过目了中情局精心为他准备的情报材料。在肯尼迪当政时，麦康是总统办公室的常客，肯尼迪延续了艾森豪威尔的传统——发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让中情局帮助处理一些重大的问题。除此之外，肯尼迪乐于听取不受欢迎的消息，而约翰逊却远非如此。在越南战争中遇到的麻烦越多，他就越不敢正视所发生的一切，到后来根本就不理睬旁人的忠告。最后，他索性减少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会议的人数，在他每周一次的工作午餐上，只有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顾问邦迪，后来由沃尔特·罗斯托代替邦迪参加会议。麦康长期没有得到总统的邀请，他心里很不是滋味。麦康是企业家出身，腰缠万贯，他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他认为，既然自己和总统的关系不融洽，还常常给他带去他不爱听的消息，以致约翰逊不愿意和他多说话。照此下去，他还有什么必要继续留在中情局担任这徒有虚名的局长呢？于是，麦康打定主意，辞去了局长的职务。

麦康在其任期内较为成功地处理了一些重大事件：1.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预见到苏联在古巴安装进攻性导弹，并提供了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照片以及苏联叛逆者潘可夫斯基提供的确凿证据，使肯尼迪压倒了赫鲁晓夫；2. 尽管持反对意见，但成功地指挥了越南政变，搞掉了吴庭艳，将美国选中的阮文绍扶植上台；3. 用 U-2 型飞机侦察到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准备情况，并通报了西方盟国；4. 根据冷战的需要，在中情局内部新增设了科学技术部，开创了以高科技手段搜集情报的新时期，同时恢复了因古巴登陆计划失败而元气大伤的全局人员的士气。

1965年4月28日，约翰逊任命已退休的海军中将威廉·雷伯恩出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为副局长。

雷伯恩长得短小精悍，一头红发。他于1905年6月8日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迪凯特。1928年，他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1943年考取海军飞行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夏威夷海军飞航枪炮学校校长，后任美国军舰“汉阁”号的指挥官、特种部队司令，并在海军总部的军械局负责导弹研究和发展工作。战后，雷伯恩到西太平洋航空母舰分队任参谋长，后任“白罗柯克”号军舰舰长。1952年，他到海军大学深造，毕业后任海军部导弹局局长助理、特别设计局局长。5年后，他负责领导北极星导弹潜艇的发展工作。1962年，他在海军部担任参谋长，负责特别设计和研究事务，直至1963年从海军退役。退役后，他前往加利福尼亚，在通用喷气飞机公司担任分管计划管理工作的副总经理。由于他在负责北极星导弹潜艇的发展工作中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使他在国会里结交了不少朋友。从那时起，约翰逊就看

中了雷伯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事业中有什么建树，而是因为在总统竞选中坚决支持约翰逊，并且还是“得克萨斯老乡”。约翰逊断定他会按照自己的意图来管理中情局，使中情局对越南战争的观点和态度都顺从白宫的想法。

外行当家

雷伯恩对国际事务孤陋寡闻，对错综复杂的情报业务更是一窍不通，加之其蛮横粗暴，局内的不满情绪甚高。在一次汇报中，他甚至问中国主要出口什么食物（这本来是最起码的常识）、中苏两国关系好像不和，这是为什么（其实，中苏敌对已经是好多年前就存在的是事了），使中情局的人不知怎样向他汇报才好。还有一次，在中情局人员的会议上，雷伯恩无可奈何地问道：“利比亚哪个部族是寡头政治的执行者？”因此中情局里的一些人对他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人还嘲弄他。有关雷伯恩愚蠢的逸事很快在局内流传开来，后来竟然登上了报纸，这使新任副局长的赫尔姆斯很难堪。白宫也知道了这些事情，所以每当总统顾问邦迪打电话到中情局通知雷伯恩去白宫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总要附带一句话：“总统要局长带赫尔姆斯先生一起参加会议。”雷伯恩对此很不舒服，因而对赫尔姆斯很嫉妒。

在雷伯恩当局长的日子里，每当西贡站站长德西尔瓦与洛奇发生冲突时，前者从来不敢找华盛顿派人来裁决和调解双方的矛盾，因为小雷伯恩的等级观念很深，他自然听从国务卿和大使的意见。再说，雷伯恩也不愿步麦康的后尘。麦康敢于和总统争辩，敢和其他机构的首脑顶撞，最后却落得个被迫辞职的下场。这些事在雷伯恩的心理上产生了极强的威慑作用，使他成了白宫的一个唯唯诺诺的店小二。然而，他在局内，却横行霸道，不懂装懂。雷伯恩的行径招致了中情局内的普遍反对。从1965年底开始，以副局长雷·克莱为首的一些高级官员便想方设法将雷伯恩从中情局赶走。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举行的聚餐会上，模仿雷伯恩的举止言行，极尽嘲弄挖苦之能事，有时还将他在局内的形象介绍给白宫的知己。雷伯恩心中明白，克莱因等人在背后和他过不去。1966年，克莱因被贬职，从情报部部长长的位置上跌下来，去西德担任法兰克福站站长。不久，克莱因脱离中情局到国务院主持情报工作。

当克莱因与雷伯恩闹矛盾的时候，副局长赫尔姆斯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实际上是倾向于克莱因），他在耐心等待着，有那么一天能坐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宝座。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以及即将发生的事情，心中早已有了底。

就在约翰逊任命雷伯恩为局长，赫尔姆斯为副局长之前，约翰逊特地将赫尔姆斯召去，他坦率地对赫尔姆斯说：“我让雷伯恩去中央情报局只是暂时的安排，我让你参加所有的会议，当你能接过这付担子时，在我认为适当的时候，就任命你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当赫尔姆斯担任副局长有一年时，约翰逊在与他的一次私人谈话时，进一步露出了实情。约翰逊说：“当时我决定任命雷伯恩的原因在于，你是个职业的情报官，在华盛顿政界圈子里，别人对你不了解，在国会、在报界、在社会上人们对你不熟悉，因此我要先给你一个出头露面的机会，让一个能与国会、与其他机构打交道的人到中央情报局当局长。但我万万没有预料到雷伯恩干得那样差劲。”

雷伯恩在中情局局长的位置上只呆了14个月，就因不称职而下台了。中情局总部的人员说，雷伯恩在局长任内留下的唯一影响是禁止中情局自助餐

厅卖白面包，因为他吃惯了海军常吃的那种黑面包。美国情报界人士认为，他是历任局长中最无能、最无作为一个。

1966年6月18日，约翰逊正式任命赫尔姆斯接替雷伯恩的位置。在这之前，约翰逊已向报界透露了自己这一决定，但他事先没有向赫尔姆斯打招呼，赫尔姆斯是在和一名记者通电话时，才得知这个消息的。约翰逊破天荒地提拔一名中情局的职业官员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他需要立即找一名可信赖的中情局局长。当麦康向约翰逊提出辞职时，约翰逊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结果只物色到雷伯恩这样的人。现在，约翰逊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再重新物色新的人选，而赫尔姆斯正是约翰逊所需要的人。作为一个职业的情报人员，赫尔姆斯已经在公众和国会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现在，总统又提携了他，他对总统必定是感恩戴德的。

二十九、美国在越南的失败

临危受命

1966年6月30日，理查德·赫尔姆斯

正式就任中情局局长，他是在中情局历史上第一个由普通特工人员逐级升任到局长的人。赫尔姆斯于1913年3月30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圣戴维斯城，早年随父亲到欧洲，曾在瑞士和德国求学。1935年，赫尔姆斯毕业于威廉斯学院，即任合众社驻欧洲记者。1935~1942年，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广告部任经理等职，曾受到德国希特勒的接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尔姆斯到美国海军预备队服役，后来调入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不久他以海军少校军衔到欧洲战区活动。1943年，赫尔姆斯前往柏林，在艾伦·杜勒斯的手下从事秘密活动。1946年他以海军上校的军衔退役后，即转入美国陆军部战略情报部门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中情局成立后，赫尔姆斯在负责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处工作，先后在该处任副处长、处长，后来又升为中情局副局长。赫尔姆斯从事情报工作20多年，享有“第一流的职业秘密活动家”的美称。

赫尔姆斯上任时，约翰逊政府已把越南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他们一面出动大批美国飞机连续轰炸越南北方，一面向南越增派大量美军；与此同时，中情局内部正围绕着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问题进行大辩论。受命于非常时期的赫尔姆斯要挑起中情局这副担子确实不容易。他不得不如实地向白宫提供令对方感到讨厌的情报和消息，但还得向白宫表明，就越南战争而言，中情局支持白宫打赢这场战争。赫尔姆斯从中情局与白宫的总体关系上吸取了一个官僚体制的教训——跟着大家犯错误要比靠边站当正确者强。因此，他在这两者之间的绳索上，小心翼翼地蹒跚而行。

赫尔姆斯上任后打算要办的第一件事是，恢复中情局人员的士气，重现中情局昔日的“神威”。在前任局长雷伯恩掌舵的日子里，中情局与美国空军部和国防情报局争夺用技术手段来收集情报的权力时，吃了败仗，使中情局元气大伤。

赫尔姆斯清楚地看到，越南战争越打越激烈，美国公众和中情局人员对这场战争的前途也就越来越沮丧。中情局向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提出的建议和忠告一度被冷落，这就更增加了中情局人员的失望心理。为此，赫尔姆斯采取了“紧跟大方向走”的策略：在中情局以外，赫尔姆斯要让别人看到他是总统的人，在中情局内部，他运用“中央情报局必须依靠总统支持”这一理论来控制部下。在这两个方面，赫尔姆斯确实煞费了一番苦心。

众所周知，自从1945年以来，能真正驾驭好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很少很少，国务院对国际事务发表的观点通常不是当任总统任职期间内迫在眉睫的任务。因此，国务院并没有真正得到美国总统的信赖。然而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中情局却在总统的庇护下，不动声色地在制定对外政策的竞技场上大显身手，一度成为总统的御用工具，它做的事让总统满意，使总统放光出彩有了面子，这正是中情局的威力所在。后来由于猪湾事件，才削弱了中情局在白宫的地位。赫尔姆斯深谙这些经验教训，他决心不再重蹈猪湾事件的覆辙，他把在越南战场上呆板的军事行动留给大使和驻越军援司令部去干，中情局则集中力量搞其他的秘密活动以及对情报进行综合分析，这两件事正是中情局的拿手好戏。

中情局受宠

赫尔姆斯升任局长的前一年，约翰逊政府提出“要让越南战争成为美国的长征”，为此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2月份，约翰逊批准对北越进行轰炸；7月份，他又同意派遣大批美军赴越南参战。当时的中情局对这两项重要决定似乎有些麻木不仁，其实在此之前，中情局曾经向白宫呈交了对战争升级持有异议的估计报告，但他们提出的观点未受重视。雷伯恩当时不想“干扰”白宫的越南战争政策，他不想为了让别人能理解中情局的观点而不惜一切去“奋斗”。而今轮到赫尔姆斯当局长，约翰逊已经规定了大政方针，赫尔姆斯只能让中情局对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可以抉择的方案作出确切的判断和估价。在当前的政策和权力的游戏中，动用中情局的分析力量是赫尔姆斯所能打出的唯一一张王牌。赫尔姆斯决意为白宫解决在制定政策中遇到的问题，而不想标新立异。

在美国狂轰滥炸越南北方之前，约翰逊总统曾担心轰炸升级会导致苏联的干预。于是，他要中情局探听苏联领导层对此事的反应。送来的报告使约翰逊宽慰了不少——克里姆林宫认为，即使美国在离中国边境十几公里的地方进行轰炸，也只不过是中国的问题。这使白宫最终下定决心对北越实施大规模的轰炸。

然而，不论是空中轰炸还是地面进攻，中情局的评估始终都是悲观的，他们认定，轰炸的升级只能导致越共“反轰炸”行动的升级。

白宫的决策者出于“多米诺骨牌”理论和镇压“中国模式的叛乱”的观念，为维持美国的“世界信誉”，顽固坚持打赢越战，使得决策本身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与既定意图相反的、准确的情报估计或分析一概被排斥。与越战有关的几大情报部门（中情局、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司、国防情报局）关于轰炸北越之成效的一系列预测和报告都被打入冷宫。中情局有时还言而有据地否定对越干涉所依据的基本前提。例如，它曾向约翰逊指出，印度支那以外的任何东南亚国家都不会因为越南的“陷落”而被共产党控制。这类意见自然更难被接受。

随着白宫在越南战争中逐步升级的政策，赫尔姆斯领导的中情局亦步亦趋。1967年，中情局扩大了训练南越特种部队的活动。这些小分队受命执行特殊任务：捣毁越共的“下层建筑”，即越共军队的政工部门。从1965年开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情报站都忙着训练人员去组建设在西贡的所谓“特援局”。到1968年底，在南越西贡的情报站拥有近1000名中情局的谍报官员，另外还有3000人是“订了合同的”。中情局的影响遍及越南的每个省、市、村、寨，而且深入到了老挝和柬埔寨。

1965年初，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总统顾问邦迪在征得约翰逊总统的同意后，曾请情报部长克莱因对在越南进行“滚雷”式轰炸战术提出分析意见。后来，克莱因写出的分析报告对该战术行动的前景持悲观态度。麦康局长根据克莱因的观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声疾呼：“轰炸决不可能改变北越人的政策，反而会使他们的态度更加强硬。即使美国的轰炸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再升级，也无济于事，到头来只能使美国公众转向对立面，反对这场战争。”麦康还说：“美国人不应该采取一种不可能赢得战争的军事行动，使自己陷入丛林战斗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这种与白宫政策相悖的观点是约翰逊总统所不容的。不久，麦康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中情局。

转眼一年过去了，麦克纳马拉又向赫尔姆斯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要中情

局对在越南进行轰炸的有效性进行分析。麦克纳马拉认为，国防情报局对在越南的轰炸效果抱有明显的偏见和盲目乐观的态度。所以他向约翰逊提出建议，让赫尔姆斯在中情局建立一个特别小组，专门从事分析这一军事行动。总统同意了。现在，对“滚雷”式战术轰炸的分析完全交给中情局一手包揽了。为此，五角大楼和国防情报局很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因为这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亲自提议的。接替克莱因情报处长职务的杰克·史密斯参加了对越南战争情况的分析工作，他写了多份分析报告。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他这样写到：

“ 赫尔姆斯不时地到我们处来，把我们分析报告中的要点记下来。麦克纳马拉只要呆在美国，他不可能不相信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当麦克纳马拉第一次开口要我们对‘滚雷’式战术轰炸进行分析时，我当面问他：‘是否要和五角大楼以及空军方面的人联合起来搞分析，因为他们已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了’。‘不，不必这样做，他们的观点我早已清楚了，我想听听你们这些聪明人对这一军事行动的看法。’麦克纳马拉回答道。不过到了后来，发生了一些节外生枝的事情。麦克纳马拉去越南跑了一趟，那里的军界人士把南越的情况向他叙述了一遍，麦克纳马拉这才感到，要是他对越南战争也抱悲观的态度，会有损于军界作出的努力……”

林登·约翰逊虽是个很有政治能力的人，但他对越南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把这场战争引向何处，并非真正了解。美国的军方人士也同样如此。约翰逊总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派遣大量美军开赴越南，这给美国的经济体制带来了各种沉重负担，因为战争需要美国军方招募大批美国青年去当兵，让他们去打一场最困难的战争。而那些职业军人们对这场战争却很感兴趣，他们想要试验一下手中的武器究竟有多大威力，他们想检验一下自己所创造的战术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

由于中情局已经着手对“滚雷”式轰炸战术的研究工作，同时麦克纳马拉在白宫又为中情局说了话，于是赫尔姆斯被邀请去白宫参加制订政策的工作，并参加了总统星期二的工作午餐会。实际上，约翰逊和肯尼迪一样，对美国在越南参战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仅仅笼统地认为这是在“遏制”共产主义。难怪，约翰逊和他手下的军事官员只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而战。1961年，约翰逊当副总统时，曾经访问过越南，回国后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必须用能赢得胜利的力量和决心在东南亚展开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否则的话，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太平洋，只能守住我们自己的海岸。”赫尔姆斯认为，只要中情局对越南战争本身不提出异议，有关美国在越南进行特殊军事行动和军事目的的看法，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析报告体现出来。

1965年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中情局对美国出动飞机轰炸北越的海防市发表看法，中情局直言相告：“一般人总以为，螺丝拧得再紧一点，可能会削弱敌人抵抗的决心，迫使对方乖乖地坐下来谈判，但是我们并不相信轰炸海防会有这样的效果。”

1966年，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进一步断言：轰炸北越仅仅产生了一种边际效应，中情局并不期待这次空袭会产生大的结果。赫尔姆斯曾在私下对一名同事说：“我们确确实实不该卷入这场战争，我们不必同那些只图背上有一袋大米就心满意足的人去打仗。”此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对待轰炸北越的问题上的观点与中情局不谋而合了。

可是，赫尔姆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中情局的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导

致了与军方的冲突……

自欺欺人

萨姆·亚当斯是哈佛大学毕业，他最初在中情局从事非洲问题的分析工作，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他奉命转向对越南战争的分析。

1967年，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估计，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游击自卫队、服务队和政治干部在内，总人数是27万。亚当斯从1966年缴获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文件中发现，敌军士兵中开小差的现象十分严重，亚当斯从手头现有资料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敌军士兵每年开小差的人数是5万至10万。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如果把这一数字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统计出来的敌军死伤、俘虏等15万人的数字相加，那么目前敌方的兵力已所剩无几了。最多不超过7万人。要是果真如此，打垮敌人便成了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严峻的战场态势使亚当斯对此事将信将疑，他决定作进一步的调查。

亚当斯从调查中发现，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统计的只是身穿军服，头戴小红星软木遮荫帽的正规部队，其余三方面武装力量都没有计算在内。实际上，近年来的敌方人员变化很大，除正规军外，还有33万人的游击队。

1967年，亚当斯被调到赫尔姆斯的越南事务特别助理乔治·卡弗的小组工作。不久，卡弗和亚当斯一起前往檀香山，参加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召开的关于越南军事问题的会议。会上，军事专家盖恩斯·霍金斯上校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估计敌人兵力的总数是50万人，这个数字和亚当斯估计的60万人就比较接近了，这说明，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估计的敌方兵力只有27万人的数字已受到多方面的怀疑。敌人的兵力到底有多少？这在美国人的心理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要是大家认为只有27万人，美国公众便会相信越南战争一定能打赢，要是知道敌人兵力有50万甚至60万人以上，那么美国公众便会认定这场战争打赢的可能性远比政府告诉他们的要小得多。1968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约翰逊总统下了决心，一定要使越南战争在1967年有所突破，否则的话，他在1968年的大选中必败无疑。为了不往约翰逊头上泼冷水，没有人想告诉他打赢越南战争要比设想的困难得多。出于国内的政治原因，约翰逊也希望把敌人兵力的数字估计得越少越好。美国的电视节目每星期都把越南战场上敌人的死伤数字公布于众，一旦得知自己面前的敌人的数字竟比原先告知的要多一倍，那么在公众舆论中必定要产生强烈的政治上反响。

1967年5月，中情局的国家情报分析委员会要对越南战场情况进行全年评估时，五角大楼的态度很强硬，不希望中情局对军方关于敌人兵力的统计数字提出疑议。这一棘手的问题只能由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来解决了。于是，赫尔姆斯作出三项决定：第一，在中情局内组织力量复核亚当斯估计敌人数字的具体证据；第二，他本人要亲自约见国家情报分析委员会的谢尔曼·肯特，詹姆斯·格雷厄姆和五角大楼的一名代表，要他们对估计敌人兵力数量这件事起草一份协定。因为赫尔姆斯不想让中情局为了这件事再与军方发生任何冲突，再说约翰逊本人也不愿听到敌人的兵力有如此之多。第三，派卡弗、亚当斯和另一名中情局的高级情报分析专家威廉·海兰于9月10日去西贡，详细了解一下驻越军援司令部的统计资料，根据从何得来的，并设法与对方就敌人兵力的数字也达成协议。

中情局与军方对越南敌人兵力的估计数字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并达成协

议，这一要求是白宫提出来的。赫尔姆斯意识到这件事关系重大，决不能草率行事，他决定等卡弗，亚当斯等人从西贡回来之后再作决定。

卡弗一行在西贡逗留了3天，他们与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分析专家也足足争论了3天，最后卡弗草拟了一份驻越军援司令部、五角大楼和中情局三家都能接受的《西贡协定》，这份协定同意只将敌方的正规军和自卫队的数字统计出来，其他方面的力量排斥在外，这样统计出来的数字是29.9万人至33.4万人。

9月13日，西贡会议一结束，卡弗便打电报给赫尔姆斯，解释自己在统计敌人兵力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没有把非正规军的数字加进去，因为驻越军援司令部顽固坚持这个立场。卡弗的电报还说：“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篡改敌军兵力的实际数字，是因为威斯特摩兰将军在科默的怂恿下已有过指示，估计敌方的兵力不得超过30万，否则将会导致报界的批评。”

1967年11月22日，驻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威斯特摩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敌人的兵力已从28.5万人减少到24.8万。”然而，他对于霍金斯上校和亚当斯两人一致认为敌人还有25万至35万其他方面的武装力量这件事丝毫没有提及。

按照《西贡协定》的精神，隶属中情局的国家情报分析委员会提出敌人的兵力数字估计为29.9万人至33.4万人。中情局终于向五角大楼作出了让步。

事实无情

11月24日，中情局驻西贡的情报分析专家乔·霍维从缴获的敌方文件和拦截到的空中电讯等方面的材料中，经过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北越大量的地面部队正在通过胡志明小道涌入南越。霍维详细地写了一份备忘录，断定敌人将发动反攻。除霍维外，美国其他方面的人士也提出过类似的警告。当时，对于敌人发动进攻的具体日期，各部门推测的结果都不一致，再加上中情局和军方正为了敌人兵力的数字争论不休，因此，霍维的备忘录没有引起重视。

1968年1月29日深夜至3月19日，北越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新春攻势。他们向西贡、顺化、岷港、芽庄、归仁、大叻等6大城市以及所有省会、城市的美国和南越政府军基地发起全面进攻，顿时使美军在战场上陷入了十分被动的防御地位。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南越傀儡政府此时不得不承认面前的越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要比自己自己公布的数字多得多（实际上，越共在南方战场上已投入了近70万的兵力，越共在南北方的全部兵力已达到90万人以上）。

尽管中、越、苏等国官方当时称之为“新春大捷”，但从军事角度讲，春节攻势是失败的。除顺化外，在所有地点越共武装的进攻几天内即被击退。据美国军方估计，其阵亡者达32000多人，美军和西贡政府军只损失了3000人。几乎在整个南越，民解的基层组织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阵亡的基层干部达30%。还有许多干部因失去武装保护或暴露身份而落于敌手。从1968年7月始，西贡政权和中情局实施以逮捕、绑架和杀害民解基层干部为内容的“凤凰”计划，一年半内清除了25000人，民解损失惨重，美军、中情局和西贡政府军的“绥靖行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一些观察家认为，湄公河三角洲的民解力量已消灭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北越正规军——人民军取代南方民解武装成为南方抗美战争的主力。无论从主管力量还是客观条

件看，人民战争变成了常规战争。

然而从政治上看，春节攻势取得了胜利。它极大地动员了美国的反战舆论，向美国人民显示了越南共产党人的战斗决心和战斗能力。通过电视，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看到了在越南这场空前剧烈的搏斗，看到了越共军队涌入西贡的美国大使馆的“令人震惊场面”。给他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美军的火力优势，而是“越共”的心理优势。尽管在春节攻势中，民解武装与美军的阵亡比例为 30 : 1，但美国人关心的是有 1001 名美国青年丧了命。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武元甲不需像威斯特摩兰那样必须关注对阵亡名单大叫大嚷的公众。”此时，美国陷入了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内分裂和动乱。从意志的较量而言，美国事实上已经输定了。

面对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约翰逊总统处境十分狼狈。他不得不承认，从南越撤军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1968 年 2 月 4 日，也就是越共发动新春攻势的第 6 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召见卡弗。麦克纳马拉说，他复查了所有来自越南的有关敌方军事行动的报告，发现敌人兵力的总数要比中央情报局和军方一致同意的数字多一半。麦克纳马拉十分关注这件事，他也提出要重新估计一下。然而，这位支持中央情报局的上层人物马上就要“退休”了，他是作为最后一位主张战争降级的人离开白宫的。

这时，中情局的一些情报分析专家准备把统计出来的敌人兵力的确切数字公布于众。他们意识到，如果再对军方妥协的话，中情局的名声将会一落千丈。赫尔姆斯也认为中情局应抢先一步，争取主动。

1968 年 2 月 11 日，卡弗打电话给亚当斯，要他向西贡发一份电报，与驻越军援司令部商议重新确定一下南方越共武装力量的数字。当时，西贡总统阮文绍已在一次讲话中毫不掩饰地承认：“越共在南方的兵力要比我们承认的数字大得多。”在卡弗看来，阮文绍的讲话有利于中情局重新提出对敌方兵力的估计。

心情沮丧的亚当斯从卡弗那里得知中情局准备与军方再次就敌方兵力数字之事进行辩论的消息后，突然兴奋起来，他立即向西贡的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发去电报，事情终于在华盛顿发生了变化（见下一节）。

越共的新春攻势被击退后，亚当斯的内心充满着矛盾、痛苦和失望，他想辞去在中情局的工作。作为一名中情局的中级情报分析专家，他没能在上层人物关于敌人兵力数量进行的辩论中充分表述自己的观点，尽管他分析的方法和估计出来的数字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认为，倘若当初中情局的头头们能坚持自己对越共的判断和估计，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是能够接受的，那就不会出现遇到敌人反攻时措手不及的情况。亚当斯暗中责怪赫尔姆斯没有据理力争，使白宫接受他的意见，否则的话，南北越共军的联合攻势不可能使成千名美军官兵丧失了生命。亚当斯对赫尔姆斯的失职行为十分气愤。1968 年 4 月 1 日，亚当斯告诉中情局督察长，他要向赫尔姆斯起诉，要求总统把赫尔姆斯局长的职务撤掉。5 月底，亚当斯向督察长正式递交了起诉书，要求他调查事实真相。4 个月后，调查工作全部结束。

赫尔姆斯对这次调查满不在乎，他表示愿意接受调查。调查小组由中情局总顾问劳伦斯·豪斯顿、局长助理约翰·A·布罗斯和副局长鲁弗斯·泰勒组成。他们举行了听证会，最后做出的结论是：虽然亚当斯对敌方的兵力作出的估计数字比其他任何人更精确，但是他并没有拿出足以使人信服的证

据。他们建议，亚当斯可以把对赫尔姆斯的指控呈送总统的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马克思·泰勒将军裁决。9月份，亚当斯的指控书连同督察长的报告一起送到了白宫，可是打那以后，指控书犹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回音。与此同时，中情局内部却刮起了一股风，要把亚当斯开除出中情局。亚当斯感到彻底绝望了，他主动提出辞呈，从此离开了这个庸俗腐败的机构。

亚当斯个人的失败就在于他同白宫在越南推行的政策背道而驰。

1968年年中，驻越美军达到525000人。

约翰逊打退堂鼓

1968年2月，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向白宫请求增派20.6万名美国士兵到越南，约翰逊让接替麦克纳马拉的新任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召集一个特别研究小组来讨论这个请求。2月28日至3月3日，赫尔姆斯向特别小组的成员介绍了中央情报局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分析报告，赫尔姆斯最后作出的结论是：“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在今后的10个月，整个越南形势最多只能保持敌我双方相持的态势。”他的结论和克利福德以及特别研究小组的看法是一致的。3月4日，克利福德向约翰逊总统报告说，照目前的状况，越南战争继续升级也无济于事，派再多的军队也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就这样，驻越军援司令部的增兵要求遭到了白宫的拒绝。3月底，约翰逊向高级顾问小组的艾奇逊、鲍尔、布雷德利将军、邦迪、迪安、洛奇、墨菲、李奇微将军和万斯征求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高级小组的成员接受了中情局的观点，也认为罗伯特·科默和驻越军援司令部的绥靖计划并没有发生作用，因而他们断定，美国不应再继续卷入越南战争，应该撤军。3月25日，高级顾问小组成员召见了国务院负责越南实物的菲利普·哈比卜、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威廉·E·德普伊少将和中情局的卡弗，要他们3人各自发表对越南战争的看法。

哈比卜认为，一旦美国从越南撤军，或者南越政府垮台，这些都将会产生外交上和政治上的问题。

卡弗足足讲了75分钟的话。他说：“由德西尔瓦倡导的、科默和驻越军援司令部继承的绥靖计划只是一场大屠杀，这场战争一定会吃败仗。”卡弗又将亚当斯对敌方兵力分析作了介绍：“敌人的兵力足足有65万，除了伤亡、逃跑和这次反攻失败而丧生的人数外，敌人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让五角大楼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数字见鬼去吧！”

德普伊将军抛出了五角大楼的统计数字。他说：“先生们，我愿把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估计出来的详细数字告诉你们，敌人的兵力有23万，被我们打死了将近8万，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干得不错。尽管敌人的反攻确实使我们感到吃惊，但不管怎样，我们是干得相当不错的。”

高级顾问小组人员阿瑟·戈德堡打断了德普伊的话，问道：“将军，是否请你把刚才讲的话再重复一遍？”“好的，先生。”德普伊客气地回道。

“你刚才说，敌人的兵力是23万，是吗？”戈德堡问道。“不错，是这样说的。”德普伊回答。“你还说已经消灭了8万名敌人，是吗？”戈德堡又追问了一句。“是的，杀了8万，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德普伊很有把握地回答。“那么，”戈德堡不紧不慢地问，“敌人的死亡和严重受伤的比例是多少？”“大约1比10”。德普伊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且慢，将军，”戈德堡比划着手势继续说，“我们可以这样假定，敌人对待伤员的态度并不像我们那样关切和忧虑，他们把那些轻微受伤的人又送回战斗岗位。再退一步

说，假设他们轻、重伤员与死亡的比例为 3 比 1，将军，你看这个假设是否站得住脚？”“先生，可以这样假设。”德普伊附和着说。“好吧，我不是数学家，不过，按照上面的假设来计算，敌人的死亡人数是 8 万，那么伤员的人数应该是 24 万，加起来总共是 32 万。你刚才说敌人的兵力只有 23 万，请问，我们现在还去跟谁打仗呢？”戈德堡尖锐地提出质问，德普伊顿时哑口无言，低着头两眼发直、呆呆地站在那里，真想从地上找一条缝钻进去。高级顾问小组里的李奇微和布雷德利这两位老将军将军忍不住笑出声来，继而便是哄堂大笑，会议只得到此结束。

翌日，高级顾问小组向约翰逊总统提出建议，不必再派兵给驻越军援司令部，美国必须从越南撤军。

3 月 28 日，赫尔姆斯、卡弗和德普伊将军又被召到白宫，要他们把那天在会议上发表的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再对总统、副总统、惠勒将军以及即将上任接替威斯特摩兰司令的艾布拉姆斯将军重复一遍。德普伊将军讲完后，卡弗便接了上去。尽管他讲得有条有理，可是约翰逊却显得坐立不安，几次打断卡弗的讲话，问道：“快讲完了没有？”赫尔姆斯见约翰逊一反常态，显出如此心神不定的样子觉得很好笑。没等卡弗把最后的话讲完，约翰逊便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间，不一会儿又回来了。他进屋后，先握了一下卡弗的手，说了声：“什么也不必再说了。”然后然后神情沮丧地走出了房间。3 天以后，约翰逊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他并不谋求担任下届总统，他要在本届总统剩下的任期不多的时间里，致力于寻找一条结束越南战争的道路。这标志着约翰逊在政治上的失败，而对越南战争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疑，中情局的分析报告和赫尔姆斯在每星期的工作午餐会上经常阐述的观点，对约翰逊总统的最后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约翰逊也看到自己已不可能再期待军事上的“突破”，他无法再操纵公众舆论的潮流了。如果自己再参加下一届总统的竞选，那么等待他的只能是一败涂地。

10 月 31 日，约翰逊宣布全面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

1979 年，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在美国国内对越战批评与日俱增的日子里，“我同约翰逊总统之间感到最难相处的一件事就是，他总是说：‘我只不过是在执行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政策。’有一次，我说，约翰逊总统，你完全错了。（美国在越南的）事实是，杜鲁门给予了金钱援助，艾森豪威尔派去一些人充当顾问，而肯尼迪派去的人首先开了火，你则是扩大战争的人。他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三十、“牛车”与“黑盾”

在前面第十六章里曾经介绍了“黑鸟”SR—71 双座高空高速战略侦察机，它还有一位外形与它完全相同的姊妹机——单座型 A—12 侦察机（代号“牛车”），却鲜为人知。这是因为它是专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研制的、担负有特殊使命的先进侦察机，它不仅对外界保密，而且对美国军界也是高度保密的。1967 年前后，这种飞机曾秘密执行了代号为“黑盾”计划的侦察北越等国的任务。仅仅一年之后，它就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短暂的生命使它更增加了几分神秘……

* * *

1967 年 5 月 31 日，在日本南部冲绳岛的卡德纳美国空军基地，一架外形又长又薄的对外界高度保密的飞机已滑行到跑道上。尽管阵雨当空，该机飞行员还是接到了起飞的命令。瞬间，飞机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大轰鸣，顷刻便升入空中。几小时后，在相距 2400 公里之遥的空域，这架具有非凡高性能的奇特飞机在北越上空完成了两次贯通侦察飞行，麻利地掉转机头，神速地返回了基地。

这架飞机就是洛克希德公司的“臭鼬工厂”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研制的 A—12 高空高速战略侦察机，其飞行性能之优异，可以说开创了美国空中力量的新纪元。这一天，A—12 飞机是首次以 3 倍多的音速执行侦察任务。

“牛车”出笼

1967 年初春，华盛顿政府的首脑们以极大的担心关注着越南北方。据中情局的报告，北越可能已经大量部署了具有可怕攻击力的苏制萨姆型系列地对地导弹，如果真是这样，北越就能有效地攻击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基地。假如北越出现这种动向，美国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呢？由于白宫领导人怀疑现役美国空军侦察机是否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更加剧了这种担忧。为此，约翰逊总统要求有关部门就这个问题提出方案。

中情局提议，采用其代号为“牛车”、尚处于保密阶段的最新式侦察机 A—12 来执行任务，以获取北越军事部署的情报。

“牛车”这个代号加在 A—12 的头上，委实不公。因为 A—12 飞机外形别致新颖，机体又扁又长，两台推力强大的发动机安置在两侧三角翼的半翼展处，又长又薄的机头和前机身宛如一把前伸的利剑。外形如此犀利逼人，简直与“牛车”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其实际性能也令人刮目相看：A—12 能以 M3 的速度飞行（M 是指声音的传播速度），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其航程可达 4800 公里；在 27400 米的最大巡航高度，以高速巡航的航程可达 5500 公里。正因为它具有如此优异的高空高速性能，当时任何空中和地面对手都奈何不了它，所以生存力极强，在大多数威胁条件下，均可安全执行任务。

说到 A—12 优异的高速飞行性能，还应提到它以 2735.3 公里/小时的速度创造的飞越美国的纪录。1966 年 12 月 21 日，洛克希德公司试飞员比尔·帕克驾驶 A—12 用 6 小时飞越了美国大陆，航程达 16308.58 公里，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它非凡的高速性能。因为它创造了其他任何飞机都无法达到的速度纪录。

另外，中情局指出，A—12 所带空中侦察设备的技术性能，远远优于中情局的无人驾驶侦察机或 U—2 高空侦察机所带设备的性能。在该机驾驶舱前

后，各有一个大尺寸的设备舱，可安置较多先进航摄仪和各种信息搜集传感器。例如，高分辨率的航摄仪和图像雷达、能探测无线电通讯和雷达波特征电子侦察设备，以及能窥视边界对方一侧纵深达数百公里的侧视雷达。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该机可在 24000 多米的高空以 3 倍音速的速度飞越对方领空，每小时侦察面积达 15 万平方公里。驾驶舱的各种设备仪表，在 60 年代是最先进的。

1960 年，鲍尔斯驾驶 U—2 飞机在苏联被击落后，美国政府对部署在敌国上空进行有人驾驶飞机的侦察行动格外小心。但是，由于担心北越可能部署新型导弹，所以，曾经反对用 U—2 飞机侦察苏联的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们最终还是同意重新审议利用“牛车”侦察北越的方案。

此外，还应提及 A—12 曾准备用于侦察古巴的一段插曲。当初，美国要用 A—12 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侦察古巴。1964 年初，中情局计划部（即特别行动部）开始策划对古巴进行侦察的可能性，行动计划代号为“云雀”。由于飞机意外事故，该行动计划一度搁浅。但是，在 1964 年 8 月中情局却指示“云雀”计划要达到紧急战备状态。这包括组建一支能实施在古巴上空侦察的行动小分队。这次行动规模不大，计划是以 M2.8 的速度在 24000 米高度进行侦察飞行。对“牛车”这种远程战略侦察机来说，显然是大材小用了。

在对飞机设备进行较大改装后，侦察古巴的行动小分队进行了模拟训练，并向上通报了该分队已具备紧急执行“云雀”行动的能力。对古巴进行侦察的通知是提前两周下达的，但行动规模稍有改变，参与行动的飞机和飞行员均有所减少。

正当小分队做好一切准备等待起飞之日，行动又发生了变化。后来证实，因为 U—2 飞机完全能够胜任这项任务，所以 A—12 小分队便被转为执行更艰巨的任务。

“黑盾”计划

1965 年，美国打算用“牛车”来侦察中国的军事动态，其行动计划代号为“黑盾”。此后，美国一直在精心策划在亚洲部署 A—12 飞机。行动要求，在整个计划的第一阶段，3 架 A—12 飞机每年将两次进驻冲绳，每次为期 60 天，参与行动的工作人员为 225 名。此后行动再走上正轨，由一个固定的小分队驻扎在卡德纳基地专门执行“黑盾”计划。但后来侦察目标有了变化。

1967 年，美国对北越部署导弹非常担心，因此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在 5 月初提出了部署“牛车”的方案，并交国务院和国防部审议。5 月 16 日，在总统和高级安全顾问的“星期二午餐会”上，他谈到了这项提案，并得到总统的认可。这个提案就是把 A—12 部署到冲绳，以执行对北越进行空中侦察的任务。第二天，总统顾问沃尔特·罗斯托便正式传达了总统关于实施“黑盾”行动计划的决定。

5 月 18 日，向卡德纳基地的空运工作开始进行。按行动计划，3 架 A—12 将长驻冲绳。5 月 22 日，第一架 A—12（编号第 131 号）从美国大陆起飞，经 6 小时零 6 分长途转场飞行，直抵日本冲绳的卡德纳空军基地。5 月 24 日，第二架 A—12（第 127 号）转场飞行 5 小时 55 分，也顺利飞抵目的的。5 月 26 日，第三架 A—12（第 129 号）虽然按计划开始了转场飞行，不料中途在威克岛附近上空，其惯性导航系统和通讯系统发生了故障，为保证飞行安全，预防意外，飞行员将飞机降落在威克岛上。事先设置在该岛的紧急救援分队迅速排除了飞机障碍，第二天这架飞机才安全飞抵卡德纳。

一切安排就绪后，美国将该计划的部署通告了驻菲律宾、泰国、南越和日本的大使，以及中情局在这些地方的分站站长和情报站站长，还有日本首相和冲绳的高级官员、泰国总理和空军司令、中国台湾首脑及军界要人等。对此计划，这些人无不拍手叫好。

虽然 A 12 归属中情局，但在机体表面上机徽，则是美国空军的标志，目的是为隐蔽其执行“黑盾”计划的特殊秘密使命。

虎穴侦察

1967 年 5 月 29 日，卡德纳基地的部队作好了出动准备。按照空军上校休·C·斯莱特的命令，共 260 人被配备到“黑盾”计划的各机构中。除了机库需要推迟一个月才能完成之外，全部设施都可供连续飞行时使用。第二天，行动小分队便完全处于待命状态，而实际上飞机要在 31 日才出动。

首次执行“黑盾”任务要飞两条航线，一条是经北越空域，另一条是经将南北越南分隔开来的非军事区上空。两条航线的飞行时间均为 3 小时 39 分，飞行巡航速度为 M3.1，巡航高度为 24300 米。

侦察飞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北越全部地对空导弹阵地共 190 个，A—12 侦察拍摄了其中的 70 个，还拍摄了另外 9 个重要军事目标。这次飞行没有被对方地面雷达跟踪，显然对方没有察觉。通过 A—12 的侦察飞行，到 7 月中旬，完全可以确认北越尚未部署地对地导弹。这使白宫大大松了一口气。

在 1967 年 5 月 31 日到 8 月 15 日期间，A—12 为执行“黑盾”任务，共有 15 次处于待命状态，但实际上只出动了 7 次，其中被对方雷达跟踪有 4 次，但未受到攻击。

在兰利的中情局特别行动部指挥室统一计划、指挥了 A—12 的全部侦察行动，而且还对目标地区的天气情况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监视。在华盛顿时间每天下午 4 点钟，都要召开 A—12 出动准备情况的碰头会。如果天气情况良好，驻卡德纳基地的部队就会处于待命状态，并得到侦察飞行路线指示。

执行任务的部队通常要提前 28 小时至 30 小时进入待命状态。在飞机起飞前 12 小时，要第二次审查目标空域的天气状况。如果天气好，则继续进行执行任务的各项准备。在起飞前两小时，才作最后决定是否出动，并通知机场。最终的出动决定也不完全取决于目标空域的天气状况，还取决于空中加油区和出发时基地上空与返回基地上空的天气情况。

卡德纳基地从接到待命通知开始，就要选定执行任务的主力飞机和主力飞行员，备用飞机和备用飞行员，还要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测和检修，并把照相机装上飞机。

直到出动的前一天傍晚，执行任务的飞行员才能接到任务航线情况的指示。飞行前的最后指示，到起飞那天上午才能下达，内容包括飞机及各系统的状态信息、最新天气预报、飞行计划的修改变动，以及其他有关情况。这一切都是出于保密。从最坏处着想，飞行员知道得越少越好。

飞越北越上空执行“黑盾”任务的典型过程是：飞机从卡德纳起飞后，在冲绳南部上空进行一次空中加油，按计划进行穿越北越的侦察拍摄飞行或作重复穿越飞行，接着飞到泰国上空进行第二次空中加油，然后再返回冲绳卡德纳基地。

“牛车”的飞行速度极快，仅用 12 分钟就能完成两次穿越北越的侦察飞行。但是，美国人明白，由于 A—12 的转弯半径长达 180 公里，所以在狭窄

的越南上空执行某些任务时，飞机一转弯，肯定会闯入中国领空。

众矢之的

1967年8月16日到12月31日，A—12进入待命状态共26次，其中实际飞行15次。在9月17日那天，北越的一个地对空导弹发射阵地的搜索雷达跟踪了A—12飞机，但该阵地的制导雷达却未能发挥作用。在10月的一次飞行中，北越发射了一枚地对空导弹，但未能击中目标。这是“牛车”首次遭到导弹的攻击。该机的侦察照相机拍摄到了阵地上空发射导弹时的烟雾、导弹本身和导弹飞行时排气凝结的尾迹。由于A—12装备了电子对抗系统，因而有效地干扰了对方导弹的攻击。

在10月的另一次飞行中，飞行员丹尼斯·沙利文在穿越北越上空时，发现自己被对方地面雷达跟踪，受到两个地对空导弹阵地的威胁，结果对方并未发射导弹。但他第二次穿越北越时，却遭到了至少6枚导弹的攻击。飞机的侦察照相机拍摄到了每枚导弹飞行排气凝结的尾迹，他本人还目睹了其中3枚导弹在空中爆炸的情景。在返回基地后发现，该机右机翼下部的整流带，被一金属碎片穿透，落在了机翼油箱的支撑构件上。显然，北越的萨姆导弹对A—12还是有威胁的。

窥视朝鲜

1968年，“牛车”进入待命状态共15次，实际出动6次，除4次飞越北越上空外，有两次飞越北朝鲜上空。1968年1月23日，北朝鲜海军俘获了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两国关系顿时紧张起来。为探查在此事件后，北朝鲜的军事动向，1月26日，A—12飞机对其进行了首次侦察。中国跟踪了这架A—12飞机，但未向它发射导弹。

然而，美国国务院担心，如果继续对北朝鲜进行侦察，一旦出事，飞行员落入敌国境内，造成的外交乱子将不堪收拾。因此对再次侦察不予批准。于是，负责具体指挥的保罗·巴卡利斯准将便向国务卿迪安·拉斯科扼要介绍了任务实施的细节，并保证飞机飞越北朝鲜的时间不会超过7分钟，所以即使飞机出了事，人机也绝不至于落到北朝鲜或中国境内。国务卿仍不放心，提出了种种修改飞行计划的意见。所以他也是“黑盾”行动计划最高级别的制定者。

1968年5月8日，A—12对北朝鲜进行了第二次侦察飞行，实际上也是“牛车”执行“黑盾”计划的告别飞行。

穷途末路

面对A—12及其双座的空军型SR-71飞机多年来消耗的巨额资金和日益增长的计划费用，美国预算局怀疑，在由中情局的A—12和空军的SR—71组成的联合机队中，是否有必要配备那么多A—12飞机，也怀疑单独建立一个中情局的A—12机队的必要性。尽管有人提出过几种能大幅度削减预算的解决方案，但预算局的态度仍是取消A—12发展计划。

在“牛车”执行“黑盾”计划的整个过程中，美国空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除财政支援外，还提供了空中加油和卡德纳基地的飞行设施，向冲绳空运了所需的人员和补给品。空军自己还向洛克希德公司订购了一个小队的A—12。所谓A—12，就是取名为SR—71的双座侦察机的原型机。

SR—71的规定任务是进行“突击后的空中侦察”，也就是在对敌进行核打击以后，用它侦察敌方动态。显然，执行这种任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该机也用于一般空中侦察。

如果用 A—12 来执行这些任务，就更具优越性。因为 A—12 只载一名乘员，所以它能装载更多、更大、性能更好的侦察设备。同时它是有文职人员管理的，这就更有利于秘密使用，至少不会像空军那样需要那么多的人员和飞机。无疑，A—12 是当时世界上效能最高的侦察机，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最好的战略侦察机。

本来美国空军采购 SR—71，会拓宽“牛车”的发展道路，因为这意味着空军可负担一部分财政费用，而且每架飞机的成本也将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但是，也正是由于 SR—71 的存在，才使“牛车”走上了绝路。财政上的困难迫使 A—12 幼年夭折。

实际上，A—12 退役也经过了一番周折。因为它在第一次执行侦察北越任务之后的几个月中，确实表现非凡，成绩显赫，所以当它行将退役消息一传出，就受到相当一批高级官员的严重关注。显要的国会议员、总统的情报顾问委员会官员，以及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等，都感到不安，于是该机退役一事暂且推迟。1968 年春，对“牛车”继续服役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又对预算成本重新作了研究，然后提出了 4 项为使该机继续服役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一切都未能挽救 A—12 的命运。1968 年 5 月，经约翰逊总统批准，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重申了封存“牛车”的决定。

1968 年 3 月初，美国空军的 SR—71 开始陆续到达卡德纳基地，接管“黑盾”计划的使命。5 月 8 日，“牛车”完成了最后一次任务后就接到了返回国内的通知。

中情局行动部选定 A—12 在 6 月 8 日起飞，经转场飞行回国。原先在国内的那些 A—12 飞机已在 6 月 7 日提前入库封存。

祸福双全

虽然 A—12 在执行“黑盾”计划过程中从未被击落过，但没有“人祸”不等于没有“天灾”。那是在驻海外的最后几天，突如其来的打击，既莫名其妙，又令人胆颤心惊。1968 年 7 月 4 日，杰克·W·威克斯驾驶第 129 号飞机从卡德纳基地起飞，作更换发动机后例行的检验飞行。当他飞到马尼拉以东 836 公里上空时，基地还能听到他的声音，然而此后他就失踪了。

有关方面当即全力以赴，在半径 3000 公里范围内进行仔细搜索，以期救援，但毫无收获。这架飞机失事的原因一直未能查明，至今仍是谜。官方在新闻公报中说，失事的飞机是 SR—71，其目的是为了隐瞒中情局执行的“黑盾”秘密计划。几天后，剩下的两架 A—12 小心翼翼地冲绳返回美国，从此打入冷宫。

1968 年 7 月 16 日，在美国本土秘密执行“黑盾”计划的内华达空军基地，中情局为实施此计划举行了一个颁奖仪式。

中情局副局长、海军中将鲁弗斯·L·泰勒向 5 名大难不死的飞行员颁发了中情局星形勋章，失踪飞行员的妻子也为丈夫领了奖。驻冲绳基地的负责实施“黑盾”计划的指挥官斯莱特上校等也被授予美国空军勋章，“牛车”小分队及其支援保障分队得到了美国空军优秀部队奖。

三十一、格瓦拉之死

革命者

60年代前期，卡斯特罗公开断言古巴

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整个拉丁美洲传播开来。切·格瓦拉秘密走访了拉美一些国家和非洲刚果（金）的地下游击队组织，选择“突破口”，策动“古巴式的革命”。对此，局长赫尔姆斯任命菲茨杰拉德领导中情局里整个的拉丁美洲处，以加强中情局“遏制”卡斯特罗的作用。这一计划包括通过国务院的外交努力将古巴排除在美洲国家组织之外、利用国际开发总署的经济发展联盟制裁古巴、训练和装备一些拉美国家的反暴动部队（即特种部队）、加强中情局在整个南美洲的情报活动，对拉美国家的反共政权给予政治的和准军事上的支持等。

格瓦拉是阿根廷人，1934年出生，当过医生。格瓦拉十分推崇并钻研中国的毛泽东和越南的武元甲等人关于游击战方面的军事理论。

1954年，格瓦拉来到危地马拉，亲眼目睹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那里发动的政变。1977年，中情局特工霍华德·亨特回忆说：“当时我们也许不应该让危地马拉人（即阿马斯一伙人）向机场上被我们驱逐的、包括切·格瓦拉在内的那个小组开枪。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们没有击毙阿本斯，我认为那样做会很糟糕。”

格瓦拉是一个社会意识很强、具有反抗精神的医科学生，当时他刚满20岁，性格刚烈强悍。他在危地马拉与其说是一个革命者，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热心的观察家，至少早期是如此。但是后来他成为阿本斯的支持者。当阿本斯逃亡后，格瓦拉跟随他一起在墨西哥寻求政治避难。在那里，他见到了劳尔·卡斯特罗，后来，劳尔又将他介绍给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他们并肩战斗，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格瓦拉成为颇有名气的职业革命家。

后来格瓦拉在总结危地马拉的教训时说，拉丁美洲的一切改革不论怎样合理，只要“侵犯”了美国的利益，都将遭到美国镇压。他认为，阿本斯垮台的原因是他未能武装农民。格瓦拉在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我看到了哈科博·阿本斯的垮台》中概括了革命组织的策略。他论证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必须建立一支忠于政府而不是独立于政府的军队，他们必须摒弃温情主义，因为面对美国的敌对势力，温情主义是自取灭亡。格瓦拉在结束语中宣布：“现在，斗争开始了。”

7年后，当中情局在古巴企图重演危地马拉的故伎时，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兄弟毫不客气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征战玻利维亚

1966年11月初，作为古巴政权第三把手的切·格瓦拉放弃了他在古巴的一切党政职务（工业部部长、政治局常委……），乔装成乌拉圭商人，来到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当时格瓦拉的假护照就已被中情局识破，但中情局没有打草惊蛇）。格瓦拉带领31名游击队员在事先买下的农场里安营扎寨，进行训练，同时在附近山里挖掘岩洞，藏储各种给养。1967年2月1日，格瓦拉率领27名游击队员（包括15名古巴人和12名玻利维亚人）向尼阿卡瓦苏以北和格兰德河以北地区长途进军，目的是侦查当地情况，并同当地农民取得联系，选择地点发展势力，同时，格瓦拉还多次试图与城市游击队取得联系，但直到最后也未成功。

格瓦拉在格兰德河北边游动了一个多月，与农民们聊天，这就暴露了他们的行踪。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农民奥诺拉多·罗哈斯出卖了游击队并使许多人丧生。更糟糕的是，在游击队于3月下旬返回尼阿卡瓦苏营地的旅途中，先遣队人员违背游击战的原则，来到玻利维亚石油公司的雇员巴尔加斯的家里，随身带着枪枝，谎称是墨西哥地质工作者。再难得有人会编造比这更不像样的故事了。当他们离去后，巴尔加斯沿路跟踪他们，并向当局告发。

格瓦拉回到营地后，又发生了更坏的事情：2月间他们外出时，来了新招募的8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开小差，并被当局逮捕。这两人中的一个是奸细……

在以后的几天里，当局已经极精确地测定了营地位置，军队越逼越近。侦察飞机整天在这个地区上空盘旋。通往城镇的道路被封锁了，食物供应被切断……为了打破围困，格瓦拉的游击队在尼阿卡瓦苏的峡谷中伏击了一支政府军，打死7人，俘虏7人，包括一个少校和一个上尉。然而，政府军重兵压境，步步紧逼。游击队被迫撤离农场营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到古铁雷斯村，并于4月10日在伊里皮蒂附近同政府军又打了一仗，打死10人，俘虏30人。这一仗使玻利维亚政府大大震惊，随即宣布在大部分东南地区实行戒严，并禁止共产党和左派组织的一切活动。

事实上，早在1966年末，中情局就已经开始秘密调查格瓦拉的行踪了。

1967年3月，中情局正式确认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活动，并呈报白宫。约翰逊总统亲自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此事进行研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逊将军和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玻特将军为代表的军方主张立即组建特种部队司令部，出动美军进入玻利维亚，以期一举消灭游击队。上任不满一年的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认为，目前格瓦拉的势力不大，不需动用美国正舰军；当前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如果向玻利维亚出兵，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势必波及到越南战争的进行；中情局完全可以对付格瓦拉游击队，以秘密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已经被越南搞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总统十分赞赏赫尔姆斯的建议，当场决定由中情局统筹和指挥对格瓦拉的秘密行动，同时他还决定，驻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军事情报机构及其特种机动部队归属中情局辖制。

随后，中情局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组长由美军南方司令部情报机构负责人、空军准将威廉·斯科尔担任，他的副手是特种部队的雷蒙德·韦伯中校，具体行动由中情局老资格反游击战专家、绰号“老头子”的拉尔夫·谢尔顿少校直接指挥。

中情局派出了16名特工人员和游击战专家，并从韦伯中校的绿色贝雷帽战斗团选拔了50名“绿色贝雷帽”作为骨干，他们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与中情局驻拉巴斯站汇合。

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武官爱德华·福克斯上校的真实身份是中情局驻拉巴斯情报站站长，正是他在1964年的军事政变中将玻利维亚空军司令巴里恩托斯扶上总统的宝座；陆军司令奥万多也是福克斯上校扶植起来的。可以说，中情局完全控制着玻利维亚军方。

首先，“老头子”谢尔顿带领全班人马在拉巴斯郊区的一座兵营训练120名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人员，以此作为玻军的骨干，进而“由点到面”地对玻军官兵进行反游击战的强化训练，而后直接指挥他们作战。

4月12日，中情局在圣克鲁斯以北荒废的拉埃斯佩兰萨糖厂建立反游击

战训练中心，着手组建和训练玻利维亚突击营。他们主要从驻卡米里的第 4 师抽调了大批兵员，后来又从驻圣克鲁斯的第 8 师选拔了部分人马，还抽调了一些空军和伞兵，前后共计 2000 多人。在这里，20 多名由中情局指挥的“绿色贝雷帽”和少数古巴流亡者充当管理者和训练者的角色，每期训练约 600 名官兵。

训练结束后，中情局将格瓦拉及其游击队员的照片和画像分发给每一个突击队官兵，同时还为玻军配备了侦察机、战斗机和武装直升飞机。

对于格瓦拉的追剿，中情局反游方战专家采取了外松内紧的方式，将包围圈逐步缩小……

4 月中旬，格瓦拉将队伍分为两支：由古巴人华金率领 17 人的后卫队（大都是伤病员）以及由格瓦拉率领 12 人的先行队。从此直到全军覆没，这两支队伍注定永远不能重聚了。

随着开小差者越来越多，游击队（号称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的处境越来越险恶。8 月上旬，政府军找到 3 个岩洞。这样，游击队再也没有医药、食品、武器和电台了。更严重的是，有关城市联络网的照片和文件被缴获，特别是一张洛约拉·古斯曼的照片。她是游击队城市组织的司库；她随即被认定并逮捕了，而且依据从她屋里搜出的材料，连同从岩洞里缴获的材料，城市中的游击队组织及其同情者被一网打尽。现在，格瓦拉的全部队伍被孤立隔绝了，尽管他们东拼西杀，屡屡重创敌人，但包围圈越来越小了。

8 月中，游击队得以生存（且不要说成功了）的唯一希望，是重新聚集他们的力量。出于巧合，格瓦拉一行与华金一行各自从北边和南边彼此相向靠拢，没有一方知道另一方也有此意图。

8 月 30 日，华金一行来到奥诺拉多的农场“普埃斯多毛里西奥”。这里是格兰德河的汇合处。华金一行被伪装成农民的士兵发现。奥诺拉多告诉开到的政府军，他将在次日指点游击队在附近渡河，军队随即设下埋伏。傍晚 5 点，华金一行 10 人肩负背包在河中泅渡……岸上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射击。他们试图丢掉背包进行还击，但在没胸口的河水中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最后两个人塔尼亚和华金还能够还击，但也是短暂的。整个一批人都被消灭了。后来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巴列格兰德，作为军方的胜利公开展出。华金队伍覆没的第二天，格瓦拉一行就赶到这里。但一切都过去了。

“这是最后的斗争”

在整个 9 月份，格瓦拉一伙四方游动，无处安身。9 月 26 日，他们在伊格拉斯地区遭遇政府军，伤亡惨重。此时，由中情局训练的 600 名玻利维亚“突击”部队遍布于游击队的活动区域，而且还得到两名前游击队员的口供，得知格瓦拉残部急于突围。事情很清楚，格瓦拉已被包围，逃脱的机会非常渺茫。他们在伊格拉斯的崇山峻岭设法顶了 10 天，于 10 月 7 日深夜，在尤罗峡谷谷底悄悄行进。一个农民发现了这支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扛着步枪和背包的队伍，他立即派他的儿子向附近的驻军报信。驻军司令普拉多上尉马上组织人马封锁了尤罗峡谷出口，抢占出口处的高地，设好埋伏……

中情局在得到玻利维亚方面的情报后，又通过自己的情报关系最后确认了格瓦拉藏身的具体地点，于是中情局的顾问们亲自来到现场指挥。

1967 年 10 月 8 日星期天的早上，格瓦拉的 17 人游击队躲藏在树木繁茂的尤罗峡谷。他们在空旷的高处看见军队正在移动，知道自己已被四面包围。此时，摆在格瓦拉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撤回峡谷深处，要么就地隐蔽，

坚持到天黑或许能脱离重围。格瓦拉选择了后者。下午1点多，战斗打响了，玻利维亚政府军发起进攻。就地隐蔽已不可能，只有撤离，而唯一可能逃出的路线就在通往格兰德河的峡谷。格瓦拉选定6名志愿队员担任火力掩护。格瓦拉率领的7人小组迅速滑下峡谷直扑格兰德河。但他们不知道包围圈已经合拢，而且他们恰恰冲进守候在峡谷出口处的敌人伏击圈。适得其反，倒是那些志愿担任危险任务的一伙人最终设法逃了出来。格瓦拉一行本该比较容易对付局面的，却陷入层层包围之中。此时，中情局军事顾问正在现场督战，指挥玻利维亚政府军的进攻，另一伙中情局官员则乘坐一架直升飞机，并带着两架战斗机在战场上空盘旋，向地面报告格瓦拉的行踪，随时支援政府军的进攻……

格瓦拉的小组很快被分割开来。不久，格瓦拉的手枪被打坏，他的小腿又中弹负伤，他的战友威利只能一手提枪，一手拖着格瓦拉拼命向山上爬。刚爬到山腰，埋伏在山上的政府军大声高喊着：“放下武器，举起手来！”格瓦拉和威利都没有开枪，在沉默片刻后，格瓦拉大声说：“不要开枪，我是切·格瓦拉。对你们来说，活着的我比死去的我更值钱。”威利对围上来的士兵们大声说：“这是格瓦拉司令，你们要尊重他！”

也许是出于“尊重”，威利被全身捆绑在担架上，由士兵抬着，格瓦拉则被两名士兵搀着，踉踉跄跄地走下山去。

在普拉多上尉的亲自监督下，格瓦拉及其战友被直升飞机押解到附近村庄拉伊格拉一所小学校，分别被单独关押在两个教室里。当晚，普拉多上尉曾想审讯格瓦拉，但格瓦拉拒绝回答问题。最不知趣的是前线突击营指挥官塞尔尼奇上校，他简直乐昏了头，一路上坐在汽车里喝得酩酊大醉。他首先来到隔壁房间，毒打身材弱小的威利，然后摇摇晃晃、指手划脚地来到格瓦拉面前。格瓦拉突然猛扑上来，一记重重的耳光，将他打倒在地。塞尔尼奇恼羞成怒，他爬起来疯狂地殴打格瓦拉……

抓获格瓦拉使玻利维亚当局遇到一个难题，因为玻利维亚已经取消了死刑，而且在整个玻利维亚无法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来关押这样的要犯，巴利恩托斯一想到对格瓦拉进行公审就不寒而栗，如果把他送往美国同样是不可能接受的建议。于是，玻利维亚当局决定尽早处死格瓦拉。

虽然军事当局在原则上已经决定，格瓦拉一经俘获，立即枪决（正如其他游击队员被俘时所遭遇的那样），但因军官们没有接到来自拉巴斯的直接授权，他们没有马上执行这项命令，因此格瓦拉得以在拉伊格拉过夜。

格瓦拉被关押在一个小学校的教室里。有那么一个时刻，来了一位年仅22岁的女教师胡丽亚·科尔特斯，她到教室来取教案。格瓦拉满含微笑望着胡丽亚。“您好！”她说。

格瓦拉点点头，友善地问道：“您是这里的教师吗？”

“是的”

格瓦拉笑了，扬起他那长满落腮胡子的下巴朝黑板指了指。黑板上是一行西班牙文：“我已经会读书了”。

“这些西班牙文是你写的吗？”

胡丽亚羞怯地点头说：“是我写的。是教学生们识字的。”

格瓦拉笑了。“你的那行字里，有一个重音符号标错了，‘会’字是不该标成重音的。”

“啊！您说的对！”胡丽亚惊悟地拍起手来，提高声音说：“我想起来

了，是我错了。”

格瓦拉说：“不要紧，你还年轻，好好学习，将来你就不会错了。”

这是格瓦拉对善良人们的最后祝福。

10月9日清晨，军区司令官华金·塞特诺上校和中情局顾问费立克斯·拉莫斯从巴列格兰德军事总部乘一架直升飞机到达，以便确认格瓦拉。他们进行了审讯，但仍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拉莫斯把格瓦拉的随身文件统统予以照相。

不久，奥万多将军等几名军界头目在塞尔尼奇、塞诺特等人的陪同下走进教室。奥万多让中情局特工冈萨雷斯问格瓦拉：“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奥万多敦促冈萨雷斯：“再问他，还想些什么？”

格瓦拉厉声说道：“我在想，你们将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被我们的人枪毙！对你们，统统要枪毙！”

奥万多第一个从教室里退出来，其他军官和中情局的特务们也纷纷跟着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奥万多下令，在他离去后，立即处决格瓦拉及其战友。

上午将近10点，直升飞机又送来执行枪决的命令，它是经无线电传送并由总统巴利恩托斯将军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奥万多将军签署的。

执行命令的士兵们决定用抽签的办法来确定究竟由谁来动手，最后抽中签的是马里奥·德兰少尉。

塞尔尼奇上校把中情局的特别赏金——厚厚的一迭美元交给马里奥·德兰。然而，马里奥把美元揣进口袋后，却仍然拉不开枪栓。于是，按照中情局顾问们的建议，又赏给马里奥几大杯上等白兰地酒……

马里奥首先枪杀了威利。隔壁的枪声响过后，一个军官问格瓦拉，“一会儿就轮到你了，还有什么话需要留下吗？”格瓦拉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将要枪毙我，我本来就不应该让你们抓活的。请转告菲德尔，这次失败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革命将会在其他地方取得胜利。请转告阿莱达（格瓦拉夫人），重新结婚，好好生活，让孩子们读书学习。最后，请告诉你们的士兵把枪瞄准一点。”

醉熏熏的马里奥·德兰少尉在人们的簇拥下走进教室。他奉命不得向格瓦拉的脑袋开枪，因此他端起半自动步枪对着格瓦拉的胸部以下一连射出9发子弹，格瓦拉的下腹部几乎完全被打烂了，由于没有伤及头部和心脏，格瓦拉在极端痛苦中喘息和呻吟了很长时间。最后，另一名烂醉如泥的军官用手枪向格瓦拉的左肋补射一枪，格瓦拉才终于死去。7名中情局特工和“绿色贝雷帽”在现场监督行刑过程。

尽管格瓦拉的游击队曾经抓获过近百名敌军官兵，但从未处决过任何一名俘虏（经过教育后都释放了）。可是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当局却极其凶残地杀害每一名游击队战士。

下午1点，塞特诺上校回到巴列格兰德，向新闻界宣布了格瓦拉死亡的消息。当晚5点，直升飞机把格瓦拉尸体从拉格伊拉运来，放在把列格兰德医院洗衣房的水泥洗衣台上，在这里指挥调度的是另一个中情局特工爱德华多·冈萨雷斯。

格瓦拉牺牲时，身穿着绿色夹克衫和鹿皮裤，脚上是一双伞兵靴。

从格瓦拉遗体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头发很长，双眼圆睁，昔日圆润的面庞此时异常削瘦，他的上衣被剥光，双臂被捆绑过的伤痕依稀可见，

他的下身盖着一件已被鲜血浸透的绿色军服……

根据中情局特别行动部的指令，刽子手们锯下格瓦拉的头颅和双手，装入容器中，用防腐液浸泡保存。不久，中情局将格瓦拉的头颅和日记原件取走，但他的双手留在玻利维亚内政部，他的日记复制成数套照片也保留下来。

格瓦拉牺牲后，中情局通过传播媒介，编造了所谓塔尼亚与格瓦拉的浪漫史，并宣称塔尼亚是苏联克格勃特工，她奉命参加游击队，成了格瓦拉形影不离的情妇，由于格瓦拉同苏联的分歧日深，克格勃指令她向玻利维亚当局出卖了格瓦拉游击队，塔尼亚本人则秘密返回苏联……云云。

这是中情局惯用的宣传伎俩，意在败坏格瓦拉和苏联。

请看事实——

1. 出生在阿根廷的德国共产党人塔尼亚投身古巴革命后，她奉命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以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不久在上层社会中站稳了脚跟。但塔尼亚是个热血青年，她不甘在安逸中生活，向往参加战斗，于是她在3月中旬来到游击队营地。对此，格瓦拉曾经责备她不该放弃秘密工作岗位，并决定，一旦情况允许，她和另一名法国记者德布雷离开游击队。然而，陷入重围的游击队最终未能将他俩送出去。

2. 塔尼亚来到游击队不久，因患重病而留在华金支队，并与华金支队在格兰德河的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塔尼亚本人身中数弹，她的遗体被冲到河滩西面3公里处。玻利维亚当局在巴列格兰德公开展出这些游击队员的遗体，后来将他们合理在一处，塔尼亚作为游击队唯一的女性被埋葬在另一处。

3. 华金支队自4月份与格瓦拉支队分别后，双方根本不知音讯。

4. 法国记者德布雷一直同游击队患难与共（被俘后经法国总统戴高乐出面，得以生还祖国），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坚决驳斥了“对格瓦拉的无耻诽谤”，就连那4名开小差的玻利维亚人也承认，“格瓦拉品格高尚，绝没有这类风流勾当”。

5. 关于格瓦拉与塔尼亚的“艳事”最早出自美国一家小报，该报声称消息来源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可靠人士”，其实是中情局反间谍处。

说到底，中情局造谣是因为惧怕格瓦拉；生前惧怕他，死后也惧怕他。

就个人品质来说，格瓦拉的确是无可挑剔的。在古巴，他曾经担任工业部长和银行行长，掌握着古巴全国的资产，然而他一直在只有12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工作，除了每月120比索的工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离开古巴时，他没有给妻子和儿女留下一文钱，而且他没有要求古巴政府对他的家庭给予特殊照顾。在玻利维亚，他严于律己，和战友们平等相待，每天自己铺床叠被，不要他人帮忙；在粮食紧张时，他和大家一样，分得3片鹿肉，从不特殊。有一次他装有干粮的背包被河流卷走，他在当晚坚决不吃战友的干粮。他还为战友和当地村民们拔牙治病……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为了救助高度近视而又失落眼镜的战友，他中弹被俘；在他的影响下，一度在战场上表现懦弱的战友威利最后同格瓦拉一样英勇不屈，视死如归。

在出征玻利维亚的前夕，格瓦拉曾经率领大家高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格瓦拉不死

自称为“世界革命者”的格瓦拉牺牲后，其影响遍及全球，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西欧，一些青年把他视为具有浪漫色彩的侠客式人物罗宾汉，他成了造反者和理想主义的象征。

60年代后期

至70年代中期，西方一些激进青年的“反文化”趋势至少有部分动力来自对格瓦拉以及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化和误解。出于对本国社会的不满，许多人自称为“格瓦拉主义者”或“毛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格瓦拉未竟的事业中”以及正在进行“史无前例”尝试的中国，其后在现实中的幻灭是可想而知的。1968年在法国巴黎爆发的学生运动中，格瓦拉成为他们高举着的偶像。30年来，许多左翼激进组织和游击队一直把格瓦拉奉为楷模，试图以暴力和恐怖手段“争取独立自由，讨还公正平等。”然而，当年的格瓦拉绝不是屠杀无辜的恐怖主义者，更不是劫持人质的绑匪……

作为一代英雄，格瓦拉不仅在古巴，而且在全世界受到许许多多人们的崇拜。

1970年，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阿格达斯冒着极大的危险，将格瓦拉的日记复制照片及其双手和面模先后送交哈瓦那，他也举家移居古巴。

古巴政府将格瓦拉的日记作为革命教材大量印刷，免费分发给人们；并将格瓦拉的双手妥善保存在一个玻璃容器中，在每年的10月8日移放在民族英雄马蒂的纪念碑下，供人们瞻仰。

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的超级市场里，印有切·格瓦拉肖像的商品随处可见，一些纪念物和贵重礼品还印有格瓦拉的手迹签名，在德国，甚至可以看到“切·格瓦拉夜总会”。日本商人尤其会做买卖，在东京的街头树立起格瓦拉的塑像，有的是借格瓦拉抽雪茄烟的因缘做香烟广告，有的是借格瓦拉脚蹬的伞兵靴推销靴袜；格瓦拉的英姿还出现在瑞士生产的手表和滑雪板上，而法国和意大利的时装模特们则佩戴着格瓦拉的圆形无沿软帽为自己增添几分俏丽……

30年过去了，不论在东方或是在西方，格瓦拉的名字还是那样响亮，他的形象栩栩如生……

历史在告诉人们：格瓦拉不死。

三十二、尼克松与“疯子理论”

赫尔姆斯留任

1968年11月11日，刚在总统大选中

获胜的尼克松到白宫拜访了约翰逊总统，听取了包括赫尔姆斯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关于美国的现状、越南战争和其他世界事务的情况介绍。两天后，尼克松单独邀请赫尔姆斯到他在纽约皮埃尔饭店的总统竞选总部交谈。

自从赫尔姆斯被约翰逊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他不参与政府所制定的政策，而是尽力为政府的政策效劳。这使他在华盛顿政界赢得了好名声，国会把他看成是一名有成效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和行政长官，或许这是由于赫尔姆斯在对待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和约翰逊一起走钢丝的结果。而今，赫尔姆斯在政治上的平衡术终于又得到了报偿。尽管他不属于尼克松的人，可他还是被尼克松认定是有能力的专业情报官。确实，赫尔姆斯不同于前任的杜勒斯和麦康，他没有个人的政治基础，对尼克松不存在潜在的威胁。

在皮埃尔饭店的一间会客厅里，尼克松告诉赫尔姆斯，他和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局长将在下届政府中留任。12月28日，尼克松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尼克松曾作过指示，要尽快地物色新政府的人选来替换上届政府中不称职的人。赫尔姆斯很幸运，他没有被尼克松一脚踢开，对此，赫尔姆斯委实很得意，他决意在华盛顿的官场上继续他的中庸之道：“跟着感觉走”。

其实，尼克松并不信任赫尔姆斯，也不相信中情局。他把1960年竞选失败归咎于中情局，该局许多高级官员都是亲肯尼迪家族的乔治敦派。尼克松认为，为了确保肯尼迪上台，他们抛出了关于“导弹差距”的报告，作为民主党候选人攻击他的炮弹。

尼克松对白宫并不陌生，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他曾任两届副总统，访问过55个国家，取得了丰富的处理国际问题和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

尼克松对外交事务怀有极大的兴趣，他担任总统的特点之一就是优先考虑外交事务，并始终把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曾说：“我一向认为，这个国家在内政方面可以自治，无需总统。你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胜任的内阁来隔离国家内部事务而已。你们需要总统制定对外政策。国务卿其实无足轻重……”在工作风格上，尼克松与约翰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尼克松爱好看书和思索问题，勤于自己动笔写东西，工作时充满信心和干劲。但是，尼克松不愿和陌生人多交谈，他很少直接找政府各部门的头头商谈工作。每当他遇到麻烦时，只是与身边几名他最信赖的顾问和助手磋商。在尼克松的这些幕僚中影响力最大的应当首推亨利·基辛格。

对外总管基辛格

基辛格年轻时是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才生，50年代投身政治。此人才华横溢，聪明机敏，鬼点子多，他倡导的“均势”理论与“尼克松主义”不谋而合。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很快成为尼克松的最亲密心腹、主要的谈判代表、凌驾于白宫内阁成员之上的首席部长。他在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远比国务卿更为有力的影响，他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制定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大本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工具。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说：“在美国，作为一个德裔犹太人，基辛格在政治上已经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顶点。”

在国际上，基辛格的名声之大甚至超过了尼克松，连尼克松本人都不无

醋意。有一次，基辛格与尼克松一道乘飞机出国访问，当飞机降落在欢迎的人群面前时，“为了突出总统的形象”，尼克松的手下悄悄将基辛格的外衣放到了别处。机舱门打开后，尼克松笑盈盈地走下飞机，接受人们的热情欢迎，而此时的基辛格正在机舱里忙着找他的外衣……

赫尔姆斯重新被任命为局长后，实际上他很少有机会与尼克松总统单独见面，每天只是向基辛格和黑格汇报工作，把国际上最新的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听后，经常这样回答赫尔姆斯：“我们正需要向总统提供这些材料呢！”

尼克松、基辛格和肯尼迪一样，喜欢亲自控制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与外交政策有关的情报。尼克松要在华盛顿建立自己的幕后统治集团，他并不期待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加入这个集团。因而，在尼克松坐镇白宫的日子里，中央情报局根本就没有机会使自己处于行动的中心，通常由基辛格在白宫发号施令，尼克松只要基辛格一人来代他处理情报事务。于是，基辛格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了美国整个的情报系统，一向由中央情报局掌握的权力，开始转移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手里。自从尼克松手下有了基辛格这样一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中央情报局便失去了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响。

基辛格在与中央情报局打交道时，从来不直接告诉对方总统或者他本人到底需要哪方面的情报，而是要中央情报局对所有的情报作广泛的分析，然后他从中挑出他认为最感兴趣的部分。基辛格经常对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说：“你们要把搞到的东西统统送来，我知道我需要的是哪些材料。”

1968年12月，在尼克松宣誓就职前，基辛格先向赫尔姆斯打了招呼，说在这届新政府中，许多事情要发生变化。过去，凡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总是先请中情局局长对当天要讨论的议题作简要的介绍，然后就有关问题进行回答或解释。从现在起，中情局局长作完情况简介后，便可离开会议室，不必参加讨论了。赫尔姆斯心中相当不满：这一决定严重动摇了中情局局长在白宫的地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情报工作方面是美国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中情局的行动理应得到它的批准并接受它的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又是一个讨论情报工作和对外政策的机构，如果中情局局长不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就不可能很好的了解国家政策的蓝图，这样会使中情局的情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白宫出难题

赫尔姆斯把基辛格对他说的话告诉了新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莱尔德不同意基辛格的这种作法，他认为中情局局长决不应被排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外。莱尔德对基辛格突出自己，揽权专权的作法早已不满，同时出于日后的需要，莱尔德决定卖个人情，帮助赫尔姆斯改变目前的处境，感情投资在前，收取效益在后。于是，莱尔德自告奋勇，径直找到基辛格交涉。莱尔德振振有词地对基辛格说，如果把赫尔姆斯排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那么尼克松总统很容易遭到外界的批评，人们会指责他没有征求情报部门头儿的意见，就擅自作出有关国家战略的决策。基辛格似乎感到自己理亏了，终于作出让步，赫尔姆斯又照常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尽管如此，赫尔姆斯总感到在尼克松手下干活，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在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时，赫尔姆斯常常不得不忙于应付尼克松本人对中情局的贬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到：“尼克松把中央情报局看作是那些反对他的东北部名牌大学知识分子的庇护所，因此，尼克松总感到自己与赫尔姆斯格格不入，他甚至怀疑赫尔姆斯深受自由的乔治城人的推崇，他常

把自己面临的困难归咎于乔治城的人。”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向赫尔姆斯提出，要中情局向白宫同时呈送情报分析的原始材料，如电报、拦截到的电讯内容、用技术手段收集到的情报和照片，以及中情局人员写来的书面报告等。基辛格要在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的帮助下，自己对这些材料作出分析判断。基辛格长期坚持这种工作方式反映了他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的特点。尼克松在这方面也和基辛格雷同，他一向为自己熟悉其他国家的情况和掌握外交政策而骄傲，一些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传阅的材料或文件，他经常预先看一遍，这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中情局的情报来源和分析心中都有了底。

使赫尔姆斯最感到棘手的事情是，他常常要在会议上回答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的尖锐问题。

就在尼克松宣誓就职后不满一个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大家正要讨论以戈翁为首的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与脱离联邦的比夫拉省军事长官奥朱古的伊博族军人集团交战之事。按照以往的惯例，赫尔姆斯先将尼日利亚战事作一简单介绍，并且把已经承认“比夫拉共和国”为独立国家的几个其他国家的名字一一报了出来。突然，尼克松打断了赫尔姆斯的讲话，插话说：“你看，迪克，你把另外两个国家遗漏了，不是还有赞比亚和象牙海岸也承认了吗？”赫尔姆斯听后愣了一下，窘迫得说不出话来。他重新镇定了一下，然后又介绍了尼日利亚各部族之间的长期争夺，他认为这复杂的政治因素是造成尼日利亚内战的部分原因。没等赫尔姆斯把话讲完，尼克松又插话进来，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说起来：“的确这样，这个问题有它的历史原因，英国的殖民政策支持北区信奉伊斯兰教的豪萨族，这就加剧了尼日利亚的紧张局势。那儿还有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种因素，确实是个灾难性的问题……”尼克松的这席话表明他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十分清楚，赫尔姆斯不能不佩服总统广博的国际知识，而在这同时，又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他很清楚，现在他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介绍情况时，来不得半点疏忽，否则的话将会当众出丑。

尼克松很关注中情局提供的有关莫斯科、北京和中苏关系方面的情报，他甚至要详细了解中情局对有关情况作出判断时，应用了哪一方面的情报来源，并要中情局写出详细的书面材料。来自白宫的这些苛刻的要求反而束缚了中情局为总统服务的手脚。首先，尼克松和基辛格要中情局预先呈送详细的书面材料，他们就能对所要讨论的问题了解得十分清楚，在中情局提出判断的结论时，他们常常可以寻找漏洞。为了避免出岔子，中情局不得不十分谨慎地行事，这就变相地捆住了中情局的手脚；其次，尼克松只在白宫极小的圈子里制定政策，他把中情局及其他机构和部门的首脑拒之门外，中情局在采取某项行动时，常常对政府下一步的政策一无所知。因此，当尼克松专心致志地要在越南推行他的“疯子理论”时，中情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等部门还都蒙在鼓里，不知尼克松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只有尼克松本人和他的两名亲密助手霍尔德曼、基辛格知晓“疯子理论”的真正含义。然而，他们不愿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任何人，惟恐泄露天机，前功尽弃。

在尼克松时代，中情局在制定政策中，特别是在总统力图恢复同共产党中国的正常关系中，影响甚微。在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之前，基辛格绕过国务院和中情局，包揽同中国的一切谈判。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致认为，中情局的任务主要是提供情报素材和执行白宫的秘密计划，至于情报分析那是白

宫的事，其他人不应过问。

尽管如此，老于世故的赫尔姆斯还是尽力同基辛格搞好关系，这对于疏通白宫是至关重要的。

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上台后，经过 1 年的修修补补，他的“尼克松主义”总算完成了。其理论主要有 3 个要点：

1. “美国将信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
2. “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同我们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我们认为它的生存对我们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援助”；
3. “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我们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将指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主要责任来提供其防务所需的人力。”

“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承认美国在全世界力不从心，必须收缩海外战线，同时要求盟国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

“尼克松主义”使美国终于实现了结束越战的目标，摆脱了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不仅如此，它的实施还使美国缓和了与苏联的关系，并打开了同中国大陆联系的大门。

“疯子”不疯

尼克松的“疯子理论”实际上就是“报复反应”理论。“为了避免人们把尼克松主义当做美国示弱的政策，对于任何敌对势力的侵犯，美国都将予以足够的、毫不留情的回击。”然而，“疯子理论”但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顺利。

1969 年 4 月 14 日，北朝鲜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把美国的一架 EC—121 型电子侦察机击落在公海上，造成了 31 名机上人员死亡。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极力主张要对北朝鲜进行无情的报复，而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国防部长莱尔德、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则主张应采取克制性的适度的报复行动。赫尔姆斯和莱尔德等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他们已从拦截到的电讯中得到证实，北朝鲜并非是有意采取挑衅行动来击落美国的侦察机，纯属指挥系统出了故障才造成了这一事件。鉴于一些高级官员联合反对尼克松要对北朝鲜进行报复的主张，这使白宫一时难以决定应当如何行动，尼克松要履行“疯子理论”遇到了障碍，无奈之下，他只得采取克制行动。他感到自己的双手被下属束缚了，但又不能冒明火，只得在背后大发雷霆。尼克松在一次与人谈话时愤愤地说：“看来该找个机会把莱尔德和罗杰斯从内阁赶出去！”赫尔姆斯、莱尔德和罗杰斯实在不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过错，他们只是从现实出发向总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而已。不过，这次是他们成功了，尼克松要对北朝鲜采取军事报复的行动毕竟没有实现。

在印度支那，尼克松倒是把他的“疯子理论”实践了。针对越共军事行动的升级，尼克松政府以战争升级相对应，在逐步撤军的同时，下令出动 B—52 战略轰炸机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老挝和柬埔寨边境，并派遣美军进入柬埔寨领土“捣毁越共的庇护所”。

劫 营

随着越战的延长，美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战争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且报纸不断报道美军战俘在北越遭到严酷虐待，有的被拷打致死等情况。因此，

反战团体和战俘家属希望政府要求北越释放俘虏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对白宫的巨大压力。

1970年5月8日，7.5万人高举反战标语牌游行到白宫。尼克松总统亲自赶到林肯纪念堂，向聚集的群众发表讲话，进行说服，他表示同北越进行归还俘虏的谈判，努力查明失踪者的下落。尼克松还接见了俘虏们的妻子，听取了她们的陈述，答应继续争取归还俘虏。

尽管美国在当时的巴黎会谈中多次向北越方面提出要求，但美国俘虏没有得到释放。北越方面声称：“俘虏得到了人道主义的待遇。但他们是人质，只有美国从越南全面撤退时，才能得到释放。”

1970年5月初，中情局和美军情报机关得知，在越南河内以西37公里的山西关押着数百名美国俘虏，在河内以西50公里的禄村也关押着美军俘虏。

中情局立即派出SR—71侦察机。从航空照片上可以看出，有几个在院内活动的人像是美国人，院子里晾晒着俘虏的衣服。这些晒在地上的衣服形成了一个“K”的字样（K是“望来营救”的意思）。从地面上的一些暗号，判断出这里有55名俘虏，其中有6人急需治疗。此外，还发现另有6名俘虏计划越狱的暗号。他们选定了地点，要求援救。这6个人要求在山西南13公里处巴纬山的西侧山脚下营救他们。看来，这是为给俘虏营寻找柴火或木料而外出的俘虏们在当地搞出的计划。

于是，在美国的空军特种部队司令部、美国空军司令部、空军情报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情报局等等机构中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汇报、请示、讨论、审批……

到了6月初，军方总算拿出了计划草案，经过讨论决定，准备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在6月30日前制定出方针大纲和计划概要，第二步制定出具体实施要领，进行训练，加以落实。

到了7月末，军方才正式确定了执行任务的指挥者：特种部队马诺尔准将任总指挥，空降部队西蒙斯上校任突击队指挥，两人按照上级制定的方案开始行动：

1. 在各自的基地开始招募自愿参加的人员；
2. 8月8日与有关的参谋人员一起再次在华盛顿集合，用5天的时间研究计划；
3. 做好9月上旬在埃格林空军基地训练的准备；
4. 在8月20日前制定出训练计划，28日前拿出袭击实施计划；
5. 9月6日前开始训练；
6.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10月10日前，将部队部署在东南亚；
7. 袭击选在10月20日至25日之间气象良好的日子。

就在军方做准备工作的日子里，越南北方发生了意外事情。由于中情局和美国空军实施人工降雨，导致红河泛滥成灾，因此山西的俘虏们在7月14日夜被转移。10月下旬中情局得知山西战俘营曾经搬空，后来又住进了人，但没有证据说明它又成为战俘营，而且当时中情局并不知道55名战俘已迁往山西以东24公里处的洞海陆军营地。

受军方的委托，中情局制作了山西战俘营小型模型，这件模型很精巧，以人工方式制出从夜暗到月圆时的月光，使人身临其境。据此，训练班子在弗吉尼亚州建立了一个模拟山西战俘营的基地，训练选在夜间或白天苏联卫

星不经过上空的4小时内进行。在其他时间里将主要建筑物分解、收藏起来。对参加行动的队员，没有透露真实地名，只讲进行袭击训练。

11月8日清晨，马诺尔准将和西蒙斯上校接到国防情报局的报告：从最近的征候看，山西战俘营的活动减少了；据SR—71飞机于11月3日的侦察，没有发现人的踪迹。当时考虑到有可能是俘虏营转移了，或者是不允许俘虏到室外活动。下午，他们两人和普拉克鲍到白宫向基辛格做了汇报。基辛格问：“如果失败了怎么办？”普拉克鲍回答说：“到目前为止，共进行了170次训练，从训练成绩看，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基辛格听了很满意。11月13日，中情局获悉，6名计划越狱的战俘已经全部被杀害。

11月18日，尼克松总统终于批准了劫营行动。于是，从美国加州埃格林空军基地起飞的C—141运输机载着55名突击队员于11月18日凌晨在泰国的达卡里空军基地着陆。

11月19日，国防情报局局长贝内特通知普拉克鲍，据中情局报告，山西战俘营已经空了，新俘虏营在洞海，有150人左右；可是根据空中侦察，山西俘虏营是有人的，但不知道是什么人。现在命令已经下达，普拉克鲍左右为难。他认为，不应停止营救山西的俘虏，即使俘虏营是空的，也不能放过这次机会。在他看来，错过这一次，机会就不会再来了（至少对美方来说，从策划到实施一项行动真是太难了）。然而，眼前的情报却是越来越趋向于否定俘虏的存在。

11月20日凌晨4时，普拉克鲍得知马诺尔准将已提前1天给突击队下达了出发命令，于是他找到穆勒上将。这时贝内特局长也在场，他右手拿着一大迭表明山西营地有俘虏的情报卷宗，左手则拿着一份厚厚的表示没有俘虏的情报材料。贝内特局长表示支持袭击的决定。

上午6时，穆勒上将和贝内特局长向国防部长莱尔德报告了情况，并建议说，事已如此，即使俘虏存在的可能性只有10%，也应袭击。莱尔德不得不下了决心，他告诉总统部队已经出发，总统也无可奈何了。

11月19日凌晨3时30分，突击队接到总统批准行动的命令。当天，队员们进行了简单的训练，认真检查了装备。晚上，中情局官员就老挝边境附近的情况，作了一小时的介绍。接着，队员们听取了如果独自一人在地面时，如何发出求救信号的示范讲解，并领取了小地图和血型卡片，这种地图是绸子做的，正面有地图，角上缝了一块小磁石，并在反面用拼读的发音符号写着：“哪边是北方？”“请给点水”，“请找医生来”等最简单的老挝语和越南语。

11月20日上午，队员们领取备品，午饭后领取安眠药强制睡午觉。下午6时，指挥官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首次宣布了袭击山西战俘营的计划。不知是谁吹了一声口哨，屋里一时鸦雀无声。不一会儿，队员们一齐起立鼓掌。由于这是冒险行动，为了防备万一，队员们都整理好准备交给家属的照片、书信、现金和日常用品。

临行前，进行了最后一次装备和用品的检查。每人脸上都涂成了黑色，以便夜战。

11月20日和21日，突击队分两部分从两处泰国空军基地出发，于11月21日凌晨1时在老挝中情局的秘密基地上空会合，并进行空中加油，随即直扑山西营地。

突击队分为两部分——

1. 突击队分为 3 支分队：袭击分队、支援分队和警戒分队，共计 55 人，以 C—130 运输机为先导，6 架武装直升飞机编队紧随其后。支援分队将从另一个方向降落，以策应袭击分队。

2. 空中支援分队由 5 架 A—1 攻击机和 15 架 F—4 和 F—105 战斗机组成，另外还配有 HC—130 飞机作为加油救难之用，该队也以 C—130 运输机为先导。

到达山西上空后，袭击分队的直升飞机离开编队降落，其他飞机分别向自己的空中待机位置飞去。投下照明弹后，俘虏营一片通明，攻击机向营地的监视塔猛烈开炮……

按照预定计划，HH—53 中型直升飞机在营地的小院内进行毁坏性着陆。飞机撞倒了大树，飞机翼片被撞掉。袭击分队队长马德维斯带领绿色贝雷帽冲出飞机，高喊：“我们是美国人，别抬头！”接着他们冲进楼里……

西蒙斯率领的支援分队认错了目标，结果直升飞机降落在一所中学的院子里。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射。过了一阵，西蒙斯呼喊直升飞机。飞机在熊熊大火旁小心地降落下来。待全体人员到齐后，飞机便朝着俘虏营飞去。此时，袭击行动已经过了 8 分钟。后来才知道，驻扎在中学里的不仅有北越部队，还有苏联官兵，共死了 100 多人。

马德维斯上尉的小分队冲进楼房内，把俘虏营全部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俘虏。越方的抵抗很微弱，西德奈中校的警戒分队把重要的楼房分别炸掉。这时，西蒙斯的支援分队也赶来了，但越方却没有来增援。

袭击后 16 分钟，突击队开始撤离。马德维斯上尉在撞坏的直升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后，随着 33 名队员起飞离去。整个袭击比预定时间超过 1 分钟。美军无任何伤亡。

突击队归来时，尼克松总统已经得知结果。但他强作欢颜，执意要给行动人员授勋，并指定其中必须有一名黑人。

行动失败后，五角大楼指责中情局提供的情报有误，而中情局反唇相讥说：当初，山西战俘们传递出来的情报不可能在几个月后，仍然新鲜如初；成熟的水果即使放在冰箱里保存，几周后也要腐败，更何况是情报！按照军方的效率，情报再鲜嫩也会长出皱纹来！

军方怀疑可能是因泄密而导致行动失败。两个月后，美国情报机构派人来到金边进行秘密调查。当时柬埔寨处于战争状态，这里是东西方阵营的接触点和搜集情报的好地方。

通过法国特工的帮助，美方与波兰、苏联和中国的情报人员进行了接触。他们事先并不知道袭击计划，反而向美方打听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在哪里？美军是否要进攻越南北方？

经综合分析，美国情报机最后构断定不存在泄密的问题。

劫营行动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美国军事指挥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1. 效率低下。

就在接到情报之后，华盛顿上层机构磨磨蹭蹭，一拖再拖：向五角大楼吹风就耽擱了两周的时间，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忙于举行一连串的“退休典礼”、发表演讲和欢迎宴会，又花费了 10 多天；本来是在 5 月末酝酿的计划，结果直到 9 月 6 日才开始实战训练。最令人费解的是，尽管美国当时在东南亚有 50 万人的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却舍近求远，匆匆忙忙在美国本土组织

突击队成员，并花时间为秘密行动的指挥官办理入境许可。

2. 情报与指挥决策脱节。

情报信息是军事指挥的依据和保证。在作战行动正式实施前，必须对目标进行情报信息的实时确认，这是情报工作对军事行动计划的权威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情报信息就是最高决策者。然而，在整个秘密行动准备期间，情报信息明显不足，而且与准备工作不衔接，中情局实际上是作为局外人旁观，国防情报局比它也强不了多少。对此，决策者和指挥者都没有予以重视，这就预先注定了秘密行动的命运。

3. 在行动实施前夕，已经得知山西营地的俘虏被迁走，虽然营地还有人，但不能确定是谁。这时本应停止实施行动，即使为此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训练也在所不惜。然而军方以参战官兵的情绪代替决策，以想当然来指导行动，那么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曾有一名中情局人员问马德维斯上尉：“听说你到北方去劫营，是这样吗？”他回答：“不，我到北方捕风捉影去了。”

其次，中情局在情报工作上漏洞百出。

1. 从5月末发现战俘求救信息起，中情局过了5个月才报告山西营地俘虏搬空的消息，在此期间，中情局几乎无所作为。本来，要跟踪确定山西营地的情况变化至少在技术手段上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增加侦察机的飞行次数，进行定时侦察等，但情报部门没有尽职尽责，至少没有把它作为头等工作抓紧落实。

2. 中情局等情报机构在工作上的延误，造成了情报信息不及时、质量不高等问题（至少是原因之一）。情报信息的时间性强，因此对它的时效性必须予以不间断的复查和确认。从劫营行动的全过程来看，中情局未能及时提供变化中的情报信息。直到作战行动正式开始前夕，对于山西营地到底有无战俘，情报机构仍然拿不准，这无疑关系到整个行动的成败。

3. 此次作战行动固然是以军方为主，但中情局是重要的配角，特别是在决定是否实施劫营行动的问题上，中情局提供的情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山西营地情况不明之时，中情局本应就此明确提出停止行动的建议，这是情报机构份内的职责。但中情局不仅提供情报不及时，而且在情报分析中的态度也模棱两可，说到底是不愿承担责任。有人说中情局是“中庸局”（意指其情报分析八面玲珑，为自己留有余地），此言不虚。

越南战争“越南化”

“尼克松主义”的首要目标是“把美军承担的义务转交给南越人”，通过使战争“越南化”来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卷入，进而将“越南化”的设想扩大为未来的“亚洲化”设想。它期望亚洲国家能更多地“自助”，在地区安全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在今后亚洲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将主要担负经济和军事供应义务，并提供海空军支援，而由亚洲国家自己提供心要的地面部队。

为了实施“越南化”计划，尼克松政府一面坚持施加军事压力、甚至不惜进行战争升级，一面坚持谈判，同时开始从越南撤军。

尼克松上台后着手进行“越南化”战争——即逐步撤出美国军队，战争交给越南人自己打。这就意味着中情局也要减少在越南的存在。作为弥补措施，它加紧招募当地间谍（总数达3000多人）。但这项行动后来被证明代价巨大而收效甚微。数百名在中情局领饷的间谍原来都是骗子，他们标以“重要价值”的机密材料，主要是从报纸或道听途说得来的。仅在一次重新审查

中，中情局就开除了 300 人。实际上，在整个越战期间，中情局在越共内部连一个高级间谍也未发展成。所以中情局在情报来源上越来越依赖南越政府。而南越政府则不断夸大它的成功，因为只有表明它具有长期生存的能力，才能得到美国国会批准的财政援助。

从赫尔姆斯到科尔比，都拣白宫愿意听的话说，逆耳的消息绝不上报。为了影响舆论支持越战，有 800 多外国记者被中情局当做“喉舌”使用。此外，中情局按照白宫的指令进行“摸底调查”，对一些大的广告公司施加压力，使其撤销对那些反战刊物的支持，搞垮了几家反战出版机构，同时还检查出版物的银行帐目，以查明这些出版物的国内外财源和纳税中是否有违法行为，并在编辑部安插中情局的特工人员，从中散布假消息制造混乱。

中情局的甜蜜报告使白宫轻松愉快，相信越南化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南越政府已经能够独立与越共作战了。

1973 年，美国开始从越南大幅度撤兵。1975 年 4 月 30 日中午，最后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离开西贡，就在当天几乎同一时刻，北越人民军的坦克抵达西贡总统府。美国人抛下数千曾为他们卖命的南越人远走高飞了。

越南战争以美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老挝兴亡

在印度支那战争中，越南是主战场，老挝是辅战场，因此中情局的角色也有所不同。在越南，中情局是配角；在老挝，中情局则是主角。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老挝战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争”。

在老挝，当时形成三股政治势力：以苏发努冯亲王为首的老挝爱国革命战线党的左派；以富马亲王为首的中派；以富米·诺萨万为首的右派。

1960 年 8 月，中情局发现北越的高级干部和补给品都通过越老南部边境的狭长地带来到越南南方。安南山脉横亘于这个狭长地带，山上栖息着苗族部落，他们长期以来靠种植和贩运鸦片为生。中情局与苗人首领王宝接上了头，从 1960 年秋开始，对他提供军事和经济的援助，支持富米势力与他联合对老挝左派开战。

1961 年春，在巴特寮和贡勒部队的进攻下，王宝带领苗民从查尔平原撤退，整个村落纷纷搬迁到山里。中情局立即向山区忠于王宝的苗民村落空投大米、种子、工具和药物等等。同时中情局把大批苗族村民带入王宝在普比亚山下建立的新的栖息地区。1961 年 12 月，中情局帮助王宝在更西部地区建立了两个新基地，一个在龙镇，另一个在桑通。龙镇建有一条导航设备完善的全天候机场，“每隔几秒钟就有一架通往泰国的飞机起降”。在以后的十多年里龙镇一直是王宝的指挥中心，还成了主要的山区贸易中心和苗人集合地点。桑通则成了行政、医疗和教育中心。中情局派遣安东尼·波什普尼担任王宝的高级顾问。美国驻老挝大使沙利文“全面指挥中情局驻万象情报站，进行和加剧老挝战争。”

中情局在龙镇有一个由 3 名军官组成的指挥班子，另外还有大约 30 多名美国特工人员负责训练，他们与王宝的别动队在一起作战。这些中情局特工大多是绿色贝雷帽出身。除了龙镇，中情局在老挝还有 3 个训练基地。据估计，中情局在老挝的人数至少有 300 人。

很快，王宝的兵力迅速发展到了 3 万人。根据安东尼制定的规划，1 万名苗人组建成配有火箭筒和重迫击炮的游击营，还装备了 105 毫米的大炮。这些大炮通常由美航公司的直升飞机从一个山头吊到另一个山头，用来轰击上

下的目标。

1964年雨季，苗族武装与老挝皇家部队联合袭击了巴特寮在查尔平原的东翼。中情局为这次称为“三角行动”的进攻提供了紧急支援，“由于空投物资数量非常大，以至于必须要得到约翰逊政府中很高级别的批准。”在美国空军战斗机的支援下，老挝右派军队占领了查尔平原，在11月雨季结束前，巴特寮部队和北越正规军被迫撤退，在撤退中又连续遭到苗族武装的伏击，损失很大。

中情局在老挝的成功，使白宫为之振奋。1964年8月，约翰逊总统亲自接见了美国驻老挝大使比尔·沙利文，慰问有加，以资鼓励。

王宝被中情局请到美国，周游迪斯尼乐园，参观威廉斯堡，还帮助王宝为他的6个老婆购买物品，煞是忙碌了一番。

中情局在越老边境一带的山区开展了大量秘密行动：监视和破坏“胡志明小道”（北越通往南越的一条山区运输线，途经老挝和柬埔寨）、向北越和老挝渗透南越特工队、冒充巴特寮部队袭击北越军队等等，“中情局搞破坏的本事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王宝的苗民武装对北越正规军和巴特寮部队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方式，使北越军方束手无策。科尔比兴灾乐祸地写道：“在南越，美军对游击战曾大伤脑筋，现在在老挝重演了这个局面，该轮到北越品尝苦果了。”旱季，北越军队占领了一些地盘，到了雨季，王宝的部队又把它夺了回来。虽然北越的军力占据绝对优势，但在老挝战场上却打了个平手。这一来一往的拉锯战差不多一直持续到1973年印度支那停火协议在巴黎签订。

根据巴黎条约的规定，2月22日12时印度支那全面停火。就在那一天，王宝眼睁睁地看着美国主子撤离了老挝。最后在一架美军飞机上，中情局顾问用无线电发送一句话：“再见，下一场战争再见。”

不久，王宝单枪匹马登车上路，辗转流亡到加拿大，成了农场主。

树倒猢狲散，王宝盘踞的地方顷刻间随风一扫而光，4万多苗族难民逃到泰国，另外有55000名苗族人跑到美国重新安家。

三十三、“鸦片战争”

一战后期，美国战略情报局启用和扶植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抗击德意法西斯。于是，黑手党死灰复燃，毒品贸易兴盛起来，在欧美畅销不衰。战略情报局与意大利黑手党在毒品贸易上曾经密切合作，双方对此都“深感满意”。

战争扶植毒品，毒品推动战争，从此中情局与鸦片战争结下了缘份。从印度支那、阿富汗到尼加拉瓜，鸦片伴随着中情局的秘密战争发祥开泰，而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金三角”

40年代末，法国情报机关收纳了印度支那的黑帮社团，其中包括越南平遂安地区的海盗和老挝山区种植鸦片的苗族人。法国方面肯定了这种“社会性抢劫最终有益于法国的事业”，并指出，“如果我们拒绝帮助苗人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这会将它们推入敌人的阵营，而越共方面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买下这些鸦片，并将这些‘硬通货’用于国外市场”。

从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法国的空运混合特遣队在老挝以议价买下春季收获的鸦片，用飞机运往越南圣·雅克海岬附近的一个秘密场所，这里是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基地，贮存有数千吨鸦片。从这里通往西贡平遂安司令部的小道上，来往的高速卡车将鸦片运到平遂安在西贡两家制造鸦片的大工厂（一家位于堤岸Y桥的司令部附近，另一家位于国会附近），在那里，他们将罂粟原汁加工成鸦片，由黑社会组织分配给西贡和堤岸的各个店铺和烟馆，平遂安与法国人分享其成。同时，平遂安向香港和法国科西嘉岛的黑社会组织出售鸦片。法国人通过毒品贸易支持和控制老挝苗族反共武装。然而，到了1954年，中情局的兰斯代尔上校闻到了香味，他将法国人运往马赛的鸦片截往美国海岸。

由于鸦片是非法的秘密交易，法国人只好忍气吞声。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全部接管了老挝的苗族反共武装及其鸦片贸易。这是一个“黑吃黑”的过程。

1954年11月，法国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在一份预测印度支那未来20年的绝密报告中指出，中情局已经插手老挝政治，并接管了泰国、老挝的毒品走私活动。这里是世界有名的“金三角”地带（包括缅甸），中情局坐卧其中，横财滚滚。

前中情局局长科尔比道貌岸然地说，中情局“禁止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携带毒品，总之，与鸦片生意不发生任何联系”，但他不得不承认，“在老挝人中，特别是在下寮一些领导者中，这种生意肯定继续存在，并且当这种生意开始对我们在越南的部队产生影响时，它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同时，科尔比自己也承认，中情局对老挝毒品贸易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美其名曰：“不参与。”

然而，正是因为有了中情局的飞机，才使毒品贸易更加便利，效益更高，生意越发兴隆起来。

海洛因和吗啡在印度支那50万美军中泛滥成灾。据60年代的美国报刊估计，每年约有1亿美元消耗在毒品方面。美国军方人士惊呼：“当前对美国士兵的最大威胁不是越共的卡宾枪，而是来自老挝丛林的名牌海洛因。”

美国国内舆论曾经指出，老挝是亚洲毒品的源头；中情局在其中的手脚

很不干净。

对此，美国国会在 60 年代末派团前往老挝调查毒品问题，中情局驻当地机构以“热情、严谨”的态度接待调查团的来访。不用说，调查结果不了了之。但是，调查团后来指出，有许多问题“漏洞百出”，中情局无法自圆其说。在此之下中情局不得不承认，“有个别人员参与了毒品走私”。然而，毒品走私的巨大规模岂止是中情局“个别人员”所能完成得了的？从流通渠道来看，毒品至少要经过中情局在当地的三道环节才能运出，这一铁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金三角”特产主要是经泰国、香港这条路线运输和销售的，而中情局与香港、泰国等亚洲主要的贩毒组织关系密切，他们有着“经常和重大的业务往来”。据美国芝加哥黑手党党魁吉安卡纳的弟弟揭露，60 年代，中情局对亚洲贩毒集团提供保护，并从事洗钱的勾当。

祸患无穷

中亚的鸦片问题由来已久，在严酷的山区和沙漠，人们吸食鸦片的习惯已持续了数百年，但过去多半是自产自销。

70 年代末，阿富汗战争给中亚的毒品生产带来了生机。阿富汗反政府武装通过种植和销售鸦片解决经费不足，用以补充武器和给养，于是罂粟产量从过去的几百吨一下猛增到几千吨。中情局向阿富汗运输援助物资与阿富汗国内毒品向外贩运都必须经过巴基斯坦这个“通风口”，毒品由此借光不少。据报道，中情局官员对于抵抗组织贩毒“并不干涉”，“而且特别欣赏”将毒品运往前苏联的中亚地区以及侵阿苏军中。

80 年代末，苏军撤离阿富汗，毒品也随之在苏联发扬光大。目前，阿富汗的毒品对中亚诸国形成严重威胁，已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从 1995 年初到 1996 年底，印度警方查获数起大宗走私毒品，总计价值达 8000 多万美元。据报道，这些毒品均来自阿富汗内战各派系。

美国卫星侦测显示，塔利班控制的地区涵盖阿富汗 75% 的罂粟田，估计 1996 年 4 月份的鸦片收成将达到 3000 吨，比 1995 年增加 600 吨。

90 年代的亚洲有两处毒品发源地：缅甸和阿富汗。

“古柯碱事件”

如果有人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全球最大的“黑道”，可能令人难以置信。1996 年 8 月，美国加州的《圣何塞信使报》记者加里·韦布以三篇连载文章证实了这一事实。

80 年代，中情局局长凯西为了颠覆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权，不但私卖军火给伊朗，将所赚的利润用来资助反政府军，同时还在中南美洲种植和制造一种廉价的多用途古柯碱，然后借中情局的特权，通过运送军火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回程飞机，载运古柯碱返回美国，然后利用中情局和贩毒组织的关系，在洛杉矶黑人社区将这些毒品廉价倾销，单单在 1982 年至 1986 年间，就卖掉了好几吨。

中情局为中心的“贩毒黑暗联盟”出面的是线民（业余耳目）布兰登等人，他们都是“尼加拉瓜反抗军”的外围。他们在接获古柯碱后，即全部批发给洛杉矶最著名的大毒枭罗斯，他再向黑人青少年社区分销。在 80 年代之前，价格昂贵的毒品只是白人中上等阶层的颓废用品，但自从中情局大量生产和销售的古柯碱出现后，黑人社区的毒品以及为了争夺毒品利益而出现的枪战随之日甚一日。而后，中情局完成了支持“尼加拉瓜反抗军”和败坏黑

人社区的任务后，即在“扫毒”的幌子下，由布兰登出面检举罗斯，使他被判终身监禁，而布兰登本人则安然无恙，被派往尼加拉瓜，成为美国缉毒局的职员。

记者韦布就是从狱中罗斯提供的这一线索开始追踪，并发掘到许多机密文件，证实了这个以中情局为中心的“贩毒黑暗联盟”的存在。甚至考察出它的作业流程：古柯碱的种植与加工多数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等国进行，由于当时的“尼加拉瓜反抗军”主要基地是在邻近的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因此毒品也大都由这两个地方的美国军用飞机运回美国本土，得州一个空军基地就是毒品的主要集散地。

《圣何塞信使报》记者韦布在写这些报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文章等于在美国政治圈中投下了一枚超级重磅炸弹。

对于美国黑人领袖而言，他们终于找到了故意败坏黑人社区的元凶。由北卡罗莱纳州选出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公开指控说：“如果你的政府在你的社区里贩毒，如果你们的监狱人口比例过高，你就必须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大阴谋。”

年方40岁的韦布这次算是捅了马蜂窝。他的报道刊出后，立即震动了全美的黑人社区。黑人主办的周刊《最后的呼唤》刊登题为“政府为黑人社区里的廉价古柯碱应当如何做交待？”的文章，要求政府公开说明。黑人喜剧演员、著名主持人格雷戈里和“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理事麦迪逊带领愤怒的黑人，来到中情局总部门口抗议示威而遭逮捕。《圣何塞信使报》就此事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座谈会，结果来了1500名政界人物，将“华盛顿会议中心”挤得水泄不通。

80年代，美国的“伊朗门事件”闹翻了美国政坛，而现在这起“古柯碱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喧闹讨论，已越来越引人瞩目，众议院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准备将此案列入议程，而且可能还要设立专案调查。

昔日的“伊朗门事件”是经由一点一滴的揭露而成为愈闹愈大的丑闻。它涉及到中情局和白宫的官僚违法僭权，但无论案情如何严重，它终究未涉及美国国民。但“古柯碱事件”则不同：

1. 中情局自己制造毒品并向美国黑人社区倾销，特务机关本身成为最大的黑道帮派，腐败和越权到了如此严重地步；

2. 美国毒品问题始于50年代后期，毒品由于价格昂贵，贫穷的黑人和拉丁美洲后裔可望而不可及，因此普及程度受到很大限制。但自从中情局以廉价倾销古柯碱后，毒品以及由此引发的帮派问题遂在黑人社区日益严重；

3. 中情局在南美洲制造毒品，经由中美洲销至美国，它构筑了一个毒品生态圈，当然也就等于构筑起一个随时以扫毒为名，干涉中南美洲事务的“干涉框架”，从而可以把中南美洲永远置于其掌控之中。

因此，许多人认为，“古柯碱事件”是个比“伊朗门事件”更严重的案例。难怪《圣何塞信使报》刊登“黑暗联盟”系列报道后，有关中情局贩毒的问题就开始了深入调查。人们发现，有关中情局贩毒之事，以前就暴露过蛛丝马迹，但都被人将线索蓄意掩盖或清除了。例如，在1987年“伊朗门事件”调查过程中，即已发现中情局将武器运到尼加拉瓜游击队设在洪都拉斯的中情局基地，返回的飞机都携带了毒品。然而当时并未就此事深究。这至少说明，白人政权对中情局倾销毒品一事并不介意。

再如，90年代洛杉矶发生了多起警官涉嫌与毒贩挂钩和洗钱的丑闻。有

一位被告警官的律师布朗在承办该案的过程中，发现有一名中情局官员在此案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该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将证据文件向法庭提出，但承办法官却以中情局官员涉及的情节与警察贪污洗钱无关，要求被告律师不得将该部分公开提出，于是这部分案情遂被归档。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圣何塞信使报》刊登的“古柯碱事件”出现后，当年的承办律师回到法院寻找旧档，却发现有关中情局官员涉及贩毒洗钱的那些实物证据和附件竟然全部消失了！

三十四、中情局违心低头

孰是孰非？

1963年，中情局科技部部长惠隆在科技部里成立了一个国外太空军事分析中心，专门收集国外导弹发展的情报。惠隆让科技部的人员与中情局以外的研究机构进行广泛接触，从而扩大了收集情报的渠道，这一点是科技部的独到之处。

1967年，情报部部长史密斯又把中情局从事太空情报研究分析工作的各个科室集中起来，成立了中央情报局战略研究室，该室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和汇报苏联在太空的军事活动。史密斯领导的战略战略研究室和惠隆领导的国外太空军事分析中心共同协作，取得了不少情报分析研究成果。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与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发生了新的冲突。

美国军方情报机构通常不愿意同中情局或其他情报机构交换绝密的军事情报。1969年，中情局与美国军方情报机关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取名为“悬崖”的苏制SS—9型洲际弹道导弹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分歧。SS—9型洲际弹道导弹究竟是否具备分导多弹头导弹的功能？中情局与军方情报机关各执己见。

早在1964年，美国借助间谍卫星对苏联的观察，中情局科技部设在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监测站的监视以及停泊在苏联海面附近的美国间谍船对苏联的遥测和窃听，发现苏联已经研制了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一年后，中情局又得到确切情报，这种导弹的弹头连同燃料的总负载量是15000磅。美国的军事专家对此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苏联为何要发展如此庞大的导弹？结果，军事专家们提出了两种假设：1.苏联人可能要应用这种导弹来装载大型弹头，提高爆炸当量以弥补苏联导弹精确度差的这一严重缺陷；2.苏联人可能准备把SS—9型洲际弹道导弹改成分导多弹头导弹。五角大楼坚信第二种假设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五角大楼的将军们竭力要求加快发展美国的分导多弹头导弹的计划，同时改进美国目前的反导弹防御系统。

当时分导多弹头导弹的研制工作还仅仅处于初步阶段，苏联是否已掌握这种新技术，从而来完成自己的分导多弹头导弹体系的研制工作与美国抗衡呢？对于这一点，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们持怀疑态度。中情局在侦察中发现，1967年苏联部署了200枚单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其目标是对准美国的“民兵”式地对地导弹发射场。中情局同时还发现，苏联用SS—9型洲际弹道导弹来发展自己的分级轨道轰炸体系，这两个重要发现更加深了中情局的疑问。他们认为，SS—9型洲际弹道导弹根本不具备分导多弹头导弹的功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本人倾向于中情局的看法，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苏联的SS—9型洲际弹道导弹已发展成分导多弹头导弹。麦克纳马拉不赞成再花费大量金钱与苏联展开更大的军备竞赛。然而，军方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就此对中情局多有指责。于是，中情局的赫尔姆斯决心非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1968年已过去了181天，美国的侦察卫星在苏联导弹试验场上空足足侦察了117天，仍未得到苏联SS—9型洲际弹道导弹研制目的的最后证据，一直到了第220天，中情局才获得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中情局和麦克纳马拉对苏联SS—9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分析是正确的：苏联目前虽然有发展分导多弹头导弹的计划，但尚未成功。

这时，在约翰逊政府中接替麦克纳马拉职务的克利福德也同意前任国防部长和中情局的观点。于是在 1968 年 10 月 2 日，中情局的国家情报委员会明确写出了书面报告，认为 SS—9 洲际弹道导弹并没有发展成为分导多弹头导弹，但苏联已有了这方面发展计划的打算。

官大有理

约翰逊政府下台后，关于导弹问题的争执在新政府内部更趋激烈。尼克松、莱尔德、美国空军部和国防情报局不同意中情局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分导多弹头导弹，美国的“哨兵”式反弹道导弹防卫体系必须从城市防卫扩大到“民兵”式地对地导弹发射基地的防卫。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辩论是否要批准防止核扩散条约，对苏联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认定直接关系到条约能否在国会顺利通过，同时，对尼克松政府下一年度的国防开支预算计划的制订以及能否在国会中得到批准都有着重大影响。在美国的军费开支问题上，历届的白宫政府总想多要钱，而国会议员们为了讨好选民（国内纳税人）总想少给钱，这已经成了惯例。

中情局和五角大楼都声明了各自的观点，提出了各自的设想和建议。中情局坚持原先的看法，认为苏联的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尽管对美国是一种威胁，但它远远不及分导多弹头导弹体系的威力。

基辛格决定让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审核所获取的一切证据，复查中情局和五角大楼提出的论点，以便使争论的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一步一步地进行着，中情局则感到周围的无形压力一步一步地增加着，这种压力就是要中情局认可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已具备了分导多弹头导弹的功能。

1969 年 4 月，尼克松总统公开声称，中情局关于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的估计有错误，国防部长莱尔德则散布了大量有关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详细材料，想借此引起国会的惶恐，以拉拢更多的人支持他发展反弹道导弹体系的设想。很明显，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决心要找到苏联进行分导多弹头导弹试验的确切证据。

为谁作证？

这时，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正举行关于苏联核威胁与核进攻步骤的听证会。5 月 17 日，赫尔姆斯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国情报界对于苏联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受到很大压力的情况下，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们仍坚持认为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不具备分导多弹头导弹的功能。中情局相信，苏联的导弹弹头命中精度相当差，只能依赖增加弹头的爆炸当量；在导弹技术方面，苏联还远远落后于美国。

6 月，史密斯和惠隆两位部长准备了一份材料呈送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苏联并没有寻求对美国的第一次核攻击力，而且他们也不具备这种能力。不久，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中情局情报报告的会议上，基辛格向赫尔姆斯建议，要他再仔细检查一下中情局的分析材料。赫尔姆斯回到中情局后，决定重新写一份情报分析报告，他委托老资格的中情局人员艾博特·史密斯负责此事。赫尔姆斯知道，一旦中情局真的和白宫发生了冲突，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然而，就在 6 月 23 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关于苏联是否准备发动对美国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讨论会上，中情局与白宫方面的矛盾终于公开了。会上，赫尔姆斯和莱尔德分别对参议员提出的问题作

了回答。赫尔姆斯把中情局收集到的有关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证据和写出的分析报告向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作了介绍，他明确地说：“苏联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威力和苏联的意图并非像美国国防部长所讲述的那样。”赫尔姆斯的观点得到了参议员艾伯特·戈尔等人的支持，其他有关部门也认为中情局的观点很有说服力。

“觉今是而昨非”

令人费解的是，就在赫尔姆斯与莱尔德在参议院直接冲突后不久，赫尔姆斯却突然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承认莱尔德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莱尔德咄咄逼人的气势下，赫尔姆斯俯首称臣，改变了原来一再坚持的结论。赫尔姆斯的这一反常举动顿时引起了中情局内外许多人的不满，大家不明白赫尔姆斯改变态度的奥秘何在。即将离任的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托马斯·休斯认为，赫尔姆斯这样做是错误的，尽管受到了政治上的压力，但不能放弃原则。曾受赫尔姆斯的委托准备重新动手撰写情报分析报告的史密斯更是被他上司的这一转变惊呆了。他说：“这不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屈服，更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当着众人的面，亲自打了中央情报局的耳光。”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们认为，赫尔姆斯的这一行径很不光彩，他向总统呈送的分析估价报告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整个中情局。当然也有人对赫尔姆斯这种不得已的做法表示同情和理解。情报部长史密斯说：“历史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情报人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供的情报却受到决策者的忽视。英国的丘吉尔就经常忽视情报人员的判断。制订政策的人有这种权力，莱尔德当然也有这种权力。应该承认，情报分析报告只是一种判断，即使它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过是主观判断而已。赫尔姆斯摒弃了原来的判断，或许是因为他感到这种判断中有漏洞。”

1978 年，赫尔姆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的一段话，倒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发生冲突时，中央情报局局长可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完全有可能被出卖。”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情局原先的估计是正确的。苏联的第一次分导多弹头导弹体系的试验直到 1973 年 8 月才正式开始进行，应用的并不是 SS—9 型洲际弹道导弹，而是 SS—18 型导弹。直到 1974 年 12 月，苏联才开始在新一代 SS—19 型导弹上部署分导多弹头导弹系统。

从那以后，国防部长莱尔德在制定政策时更加轻视中情局向他提供的情报，他宁可相信国防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和分析报告。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也不喜欢中情局的独立行事和独立见解。因为他们要在自己的白宫这个小圈子里包揽一切对外政策。不过，在对外开展秘密行动时，他们毕竟还是离不开中情局。

关于战略导弹争论的是非本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情报观点要为白宫的全球战略和国内政治服务。

三十五、搞垮阿连德

阴谋未遂

肯尼迪当政时，曾有过一个庞大的计划—要把智利树立为拉丁美洲资本主义“民主”的样板，“让智利与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形成鲜明的对照”，宣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遏制古巴“红色瘟疫”在拉丁美洲蔓延。

1964年，社会党左翼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参加智利的全国总统大选。恨之入骨的中情局急红了眼，先后出资400万美元支持基督教民主党的爱德华·弗雷竞选总统。中情局利用传单、报刊、广告等宣传媒介美化弗雷，攻击和丑化阿连德及其社会党，宣称如果让阿连德执政，智利将会蜕变为充满恐怖和血腥的、独裁专制的警察国家……最后竞选的结果，基督教民主党人弗雷由于得到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支持，得票最多，当上了智利总统。据统计，弗雷竞选总统的费用有一半来自中情局的腰包。华盛顿对这次竞选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认为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成效卓著”，“功不可没”。白宫对弗雷寄予很大希望，认为他能够把智利引向“健康、民主的道路”。弗雷上台后，在他执政的6年时间里，确实采取了一些土地改革、财富重新分配、推行教育和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但智利国内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还相当严重。弗雷推行的内外政策得到了美国驻智利大使爱德华·科里的赏识和支持。

转眼到了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的日子临近了。阿连德卷土重来，积极参加总统竞选。他指责弗雷“半心半意”地推行社会改革，主张要加快速度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智利国家。

从1969年12月份起，白宫开始策划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计划。1970年3月，同家安全委员会里负责审核中情局秘密行动的总统特别小组，又称“40委员会”，批准中情局在智利进行反阿连德的宣传活动。同年6月，从智利传来消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阿连德很可能会在大选中获胜。这时，总统特别小组开始考虑是否让中情局在智利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来阻止阿连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表了态：“我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由于其本国人民不负责任而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在6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上，特别小组进一步决定，中情局向智利增派力量，借此影响那里的选举，同时还授权中情局在9月4日大选前，设法在智利的某一选区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中情局照办了。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右翼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乔奇·亚历山德里占压倒多数，阿连德位居第二，而美国中意的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汤米的选票仅仅排在第三位。对于这个结果，白宫和中情局认为还不错。

在智利大选的前夕，正当中情局采取行动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时候，一些在智利有巨额投资的美国大公司也忧心忡忡，一旦阿连德当选总统，他会把一些在智利的外国大公司收归国有，这将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他们积极出钱资助亚历山德里和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汤米参加竞选。在这些美国公司中首当其冲的要算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安纳康达铜业公司了。1970年5月，任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的前中情局局长麦康私下约见了现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他向赫尔姆斯提出中情局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共同协作来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愿意向中情局提供100万美元，作为反阿连德的秘密行动经费。在此之前，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已

交给国务院 50 万美元，用于反对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中情局对于自己到底能把智利的总统选举操纵到何种程度，心中还没有底。两年前，中情局在一份关于拉丁美洲问题的情报分析报告中曾做出过这样的结论：拉美国家中的社会改革力量十分强大，外界难以对它进行控制。因此，左右为难的赫尔姆斯只能对麦康说，让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自己去花这笔钱，中情局可以协助对方，并且把中情局在智利的一些重要关系告诉了麦康。

除了工商界人士外，一些军界人物对阿连德当选总统后的前景也忧心忡忡。这情况都一一传到了基辛格、赫尔姆斯和米切尔那里，他们先后向尼克松作了汇报。

9 月 4 日，智利全国大选开场了。出人意料的是，阿连德竟然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消息传到华盛顿，各方面都感到非常震惊。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科尔比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和‘40 委员会’作出了一项十分愚蠢的决定……因此，中情局没有支持非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民族党的乔治·亚历山德里或基督教民主党的拉多米罗·汤米来接替弗雷总统，也没有促使其中一个让位，而只是插手搞了个宣传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的‘破坏运动’。这个行动比起援助阿连德的某个反对派来当然是个省钱的手段，只花了不到 50 万美元，但结果证明是白费。

正如我的纽约民主党好朋友们所预言的‘一文不花你就一事无成’，其后果是一场灾难。亚历山德里和汤米分散了民主党派的选票，阿连德以 36% 的多数轻易赢得了胜利。”

“轨道 1 号”和“轨道 2 号”

听到阿连德在选举中夺魁的消息，尼克松暴跳如雷。9 月 15 日，尼克松总统把赫尔姆斯召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连同尚未接替罗杰斯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和司法部长约翰·N·米切尔一起开了个碰头会。会上，尼克松大发雷霆，激动万分，赫尔姆斯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尼克松发过这样大的火。”尼克松认为，阿连德的胜利意味着卡斯特罗的反美革命已蔓延到了智利，并将在那里传遍整个拉丁美洲。尼克松总统给赫尔姆斯下达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命令——破坏阿连德就职，“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拯救智利！……花上 1000 万美元，不够的话再加些！”为了区别中情局在智利进行的其他活动，这个计划被称为“轨道 2 号”，此前破坏阿连德当选总统的行动和计划被称为“轨道 1 号”。

由于阿连德只获得了简单多数，所以根据智利宪法，他还必须经智利国会投票通过才能就职。中情局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授权，准备使用一切手段阻止阿连德通过这次表决。这些手段特别包括寻求智利军界的帮助。正如事后赫尔姆斯所言：“如果说我从椭圆形办公室出来时背包里曾带过一根元帅手杖的话，那就是在 9 月 15 日那一天。”然而，阿连德就任总统已成大势所趋，决非尼克松的好恶所能决定。因此赫尔姆斯苦笑着对尼克松说：“你交给了我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赫尔姆斯明明知道不能成功的事，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干。后来，他的好友基辛格告诉他说，对于尼克松的许多话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更不能当做命令看待。尼克松发号施令经常是表示他的不快——“别闲着，亨利！”基辛格说，尼克松并非总是表里如一。对于基辛格，这是简单的事情，属于经验之谈，但赫尔姆斯并不知道这一点，一直诚恐诚惶地去折腾。

赫尔姆斯还从总统那里直接得到了另一项指示：不得把“轨道 2 号”计

划传到中情局以外，不得把它告诉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也不得告诉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其下属各部或“40委员会”。

像总统授权搞颠覆活动这样的事倘若发生在10年前，中情局人员一定会欣喜若狂，倾注全部的热情来承当这付“重任”，而今，他们却是顾虑重重，举棋不定。此事如果被外界知道了，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国会势必要追究违法的责任，到那时，中情局的参与者势必成为白宫的替罪羊而被贬职、罢官甚至坐牢。这次行动要冒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赫尔姆斯离开白宫后，和助手一起驱车赶回中情局总部。不巧，路上交通堵塞，他们的车子在路边足足停顿了半个小时。赫尔姆斯坐在车子里心事重重，他对助手阿贝尔谈起了刚才尼克松布置的任务。阿贝尔疑惑不解地问道：“我真不明白，既然我们认为这件事难以成功，为什么还非要我们去干不可？”赫尔姆斯若有所思地瞧了他一眼，回答说：“阿贝尔，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学会去理解它，而且我还必须学会理解我们的总统呢！”赫尔姆斯在他的笔记中这样写到：“或许只有十分之一成功的把握，但这是为了拯救智利，值得去尝试一下。不能顾及危险，也不能让美国驻智利大使馆卷入进去。准备好1000万美元的现金，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更多一点。派出我们最能干的人去冒此风险，在48小时内制订出行动计划。”尽管赫尔姆斯顾虑重重，但他还是尽力而为。

中情局驻圣地亚哥情报站站长亨利·赫克谢尔对于中情局是否有能力阻止阿连德当选总统缺乏信心，他打电报向华盛顿总部提出了疑问。计划部部长托马斯·卡拉默辛命令赫克谢尔立即返回华盛顿总部。在总部的办公室里，赫克谢尔被他的上司们训斥了一顿。他们对他说，这次秘密行动即使中情局不想干也得干。挨了批评后满腹牢骚的赫克谢尔回到了圣地亚哥，对他的下属说：“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没有人打算到白宫去对总统说，我们中央情报局不能干这种事。我们只好干吧！”

赫尔姆斯经过一番冥思苦想，选择了几名得力干将来执行这项任务。他任命戴维·菲利普斯担任刚成立的智利特遣队队长，这个特遣队的秘密使命就是阻止阿连德正式就任总统。

当计划部西半球处副处长吉姆·弗兰纳里向菲利普斯转达此事时，菲利普斯也感到困惑不解：“我简直难以相信怎么会看中了我？”“我们要派出的是最优秀的人物。”弗兰纳里作了解释。“为什么不让美国在智利的大使馆卷入此事？我们这样做不就意味着这件事对科里大使和哈里·施劳德曼副大使进行保密吗？”菲利普斯询问道。“是的，我们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国务卿罗杰斯呢！”弗兰纳里继续说：“不过，科里和罗杰斯参加了我们在智利采取的第一方案，即外交和经济的行动，至于我们准备好的第二方案就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弗兰纳里还告诉菲利普斯，总统特别小组已经批准了中情局的第一方案（即“轨道1号”），但还不知道中情局还备有第二方案（即“轨道2号”），更不知道中情局要不惜一切手段对阿连德的就职典礼进行捣乱；虽然“40委员会”可以出钱收买智利国会投票反对阿连德，但是这笔钱没有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作不会收到效果。“那只有唯一的方法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即军事政变。”菲利普斯最后提出了建议。“是的，这是唯一的办法。”弗兰纳里同意菲利普斯的看法。“不过，要办成这件事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因为目前智利陆军总司令施奈德将军反对采取任何违反宪法的行动来阻挠阿连德就任总统。你的看法怎样？”菲利普斯问道。“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的问题是赫尔姆斯规定的时间太紧了。”弗兰纳里说。

中情局在智利的第二方案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在中情局内，只有局长赫尔姆斯、计划部部长卡拉默辛斯、计划部西半球处正副处长布罗和弗兰纳里、特遣队队长菲利普斯以及中情局在智利的 12 名人员中的 4 人知道第二方案。具体执行这个方案的菲利普斯内心十分矛盾，他经常自己问自己：“中央情报局是否必须响应总统专横的命令，在一个有民主传统的拉美国家策划军事政变？”与此同时，他担心中情局在智利一时还找不到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来取代阿连德。菲利普斯的这一担忧终于在 10 月 24 日智利国会的选举中得到了证实。尽管中情局在秘密执行第一方案时已经花费了 25 万美元，智利国会仍选举阿连德就任总统，他如期宣誓就职。面对这种局势，中情局全力以赴实施第二方案。中情局派出一支由局内官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智利狂热地工作了 6 个星期，他们不受当地情报站的管辖，只向华盛顿总部汇报；他们与军政界的领导人接触，进行评估，从中挑选可以出面反对阿连德的人物；确定他们可能需要多少经费、武器和其他援助；商量怎样才能阻止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美国前大使科里曾透露，在“轨道 2 号”计划中有 9 次暗杀阴谋，其中 1 次指向阿连德总统本人。尽管如此，但第二方案中直接涉及到的策划军事政变，时机尚未成熟。

实际上，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在某些方面两者间的界限并不是很分明的。这两个方案都设想在智利策划军事政变的可能性。美国大使科里曾明确地对弗雷总统和智利一些高级官员、将领谈起，要是阿连德当选总统，美国将终止对智利的军事援助。两个方案所不同的是，第二方案所策划的智利军事政变除了少数具体策划者知情外，其他人一概不知。最令中情局伤脑筋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智利头面人物愿意出面唱主角。全面负责第二方案的卡拉默辛斯向尼克松汇报时说：“智利的军方人士乱糟糟的，他们不愿干什么事情。要是连他们也不想干，这场政变要取得成功就变得更渺茫了。”

物色丘八

1970 年 10 月，中情局形成了一个后来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1. 鉴于智利陆军总司令施奈德将军和总统弗雷两人都不愿意采取非法行动阻挠阿连德就任总统，中情局必须加紧收集情报，物色有军事政变意向的智利官员；2. 通过舆论宣传，散布谣言和采取恐怖行动，在智利形成一个适合军事政变的社会气候；3. 对那些有政变意向的智利官员讲明，虽然美国不能直接派兵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他们发动军事政变。

在圣地亚哥的美国大使馆武官保罗·怀默特上校与智利的一些军界人士关系密切，因此中情局请怀默特上校帮助执行三点式计划。国防情报局也向中情局提供了一些军界人士的名单，一旦发生政变，这些人可能会有用处。在这些人中，有退休的陆军将领罗伯特·维沃克斯和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卡米洛·瓦伦朱拉将军。中情局知道，智利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支持政变，尤其是施奈德将军，他在军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曾公开而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信念，即“军队绝不采取任何反对宪法程序的举动”。中情局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被智利站站长赫克谢尔描绘成“手下没有一兵一卒的将军”维沃克斯身上，他是唯一愿意和阿连德捣蛋的老丘八。他的一些举动很快引起了施奈德将军的注意，他坚决抵制了维沃克斯等人的政变计划。为此，中情局作出决定，踢开施奈德这块绊脚石。

赫尔姆斯不赞成暗杀施奈德将军的方案，除非有美国总统的亲笔手谕（他怕日后吃不了，兜着走）。赫尔姆斯说：“自我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那天

起，我就决定，在我任职期间，坚持不搞那种玩意儿，并且对我的下属也讲明了这一点。”由于赫尔姆斯的这一明确禁令，10月13日，赫克谢尔从圣地亚哥向中情局总部发来急电说：“为了加快军事政变的步伐，维沃克斯打算在48小时之内绑架施奈德将军和他的副手普拉茨。”并请求总部指示。10月15日，计划处处长卡拉默辛斯把维沃克斯的情况向基辛格和黑格作了汇报，白宫立即发出指示，由中情局出面给维沃克斯发去一份电报，告诫他不要采取鲁莽的行动，电文是这样的：“已审查了你的计划，根据你提供的情报和我们从其他方面获得的信息，我们的看法是，你的政变计划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取得成功，一旦失败，只能削弱你的实力，请务必保留你的力量，你和你的朋友们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的。让我们继续保持联系，你会继续得到我们的支持。”

在智利，维沃克斯将军已决定孤注一掷，但他推迟了绑架施奈德的时间。他对中情局的官员说，他要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0月22日绑架施奈德，因为10月24日是国会确认总统的日子，11月5日就要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

10月17日晚上，美国大使馆武官怀默特上校会晤了一名智利陆军军官和一名智利海军军官。嗣后，他把这两名军官提出需要10枚催泪瓦斯手榴弹、3支0.48口径轻型冲锋枪和500发子弹的请求转告给中情局。起初，中情局怀疑对方是否会用这些武器来绑架施奈德，但又觉得这两名军官不像是维沃克斯那一伙人，也就放下心来（然而，中央情报局很清楚，这些武器的用途只能与军事政变有关）。10月19日，智利军官要求的武器和弹药隐藏在外交邮袋中从美国运到圣地亚哥，21日转交到了这两名军官的手里。几乎就在这同时，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瓦伦朱拉将军也提出了要绑架施奈德将军。实际上，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都知道对方有发动政变的计划，但他们不愿意携起手来一块干，因为两人都想在政变成功以后独坐军政府的第一把交椅。然而，瓦伦朱拉在10月19日绑架施奈德的计划失败了。那天施奈德将军没有像以往那样乘坐陆军司令部的汽车去吃晚餐，而是改乘私人汽车外出了；而且那天他的警卫人员寸步不离，这使前去执行绑架任务的人无法接近施奈德。当时，中情局仍在规劝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别草率行事（中情局认为这两人谁都成不了大事，没有大用处，但弄不好却容易捅出漏子，给自己带来麻烦，不好收拾），但他们不予理会。这样，中情局先后与他们断绝了联系。

维沃克斯按照自己原定的计划，于10月22日采取了行动。早晨刚过8点，施奈德乘坐的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朝陆军司令部驶去，半路上突然遭到歹徒的拦截，汽车被迫停了下来，施奈德见状不好，急忙拔出手枪自卫，这时，歹徒先发制人，慌忙开枪射击，子弹打穿了施奈德的胸膛，他跌倒在血泊中。3天以后，施奈德在医院里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维护宪法！”

智利警方在歹徒身上查获了使用过的武器。后来，维沃克斯被抓了起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外加5年流放。瓦伦朱拉因有策划政变的企图，也被军事法庭判处3年流放。

中情局得知了施奈德的死讯后焦灼不安。菲利普斯预感到，中情局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认为是参与了这次暗杀活动，因为就在维沃克斯采取非常行动的前一夜，中情局把3支轻型冲锋枪交给了这些对施奈德有成见的军官。

但后来得知，这些武器在那次绑架中并没有用上，中情局的人员这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那天维沃克斯派人绑架施奈德，并没有准备要暗杀他，所以前去执行任务的人随身只带了手枪，没带其他武器。当施奈德首先拔出手枪想进行自卫时，维沃克斯的人于是就开枪射击，没想到，子弹射中了施奈德的要害处，导致他终于身亡。

菲利普斯领导的智利特遣队判断，施奈德死后，如果再有人站出来发动军事政变的话，成功的可能性一定是很大的。但是赫克谢尔不同意这个看法，早在10月9日，他就预言：“要是智利陆军总司令施奈德遭到暗杀的话，只能使智利军界更坚决地聚集在立宪主义的旗帜下。”事实果真如此。在施奈德去世后的第二天，在圣地亚哥有数十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悼念这位为捍卫民主而牺牲的将军。人们义愤填膺，强烈谴责阴谋集团的罪恶行径……当时任中情局副局长的科尔比哀叹道：“这次尝试的失败（为阿连德）平息了军内的不满”。

马不停蹄

10月23日，赫尔姆斯再次检查了第二方案（“轨道2号”）在智利的执行情况。他认为，中情局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只有依靠智利人自己去搞了。在此之前，赫尔姆斯已向尼克松作了汇报，说中情局能办到的事情都办了，至今智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想进一步发动政变。1970年12月，麦康对约翰·布鲁斯说：“赫尔姆斯没有采取戏剧性的行动来有效地阻止阿连德当选总统，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失望。”当时，在华盛顿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赫尔姆斯在关键时刻溜之大吉，尼克松和基辛格责备中央情报局贻误了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时机。”对此，一个直接参加了第二方案行动的中情局人员回答说：“我们是代人受罚。”

关于赫尔姆斯向尼克松汇报和请示中情局在智利的行动一事，尼克松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我指示中央情报局放弃这次行动。”不过，尼克松没有说清到底要放弃哪一个行动方案。中情局当时理解为放弃第一方案，而第二方案的行动仍然继续进行。直到10月15日，计划处处长卡拉默辛斯见到了基辛格和黑格以后，才知道白宫的意图。

后来，基辛格和黑格为此事作证时，基辛格说：“我对卡拉默辛斯说，第二方案已被白宫取消了。后来，在我的办公室里再也没有人谈起过第二方案这件事，我们也再没收到这方面的报告。按我的记忆里，第二方案是在10月15日前终止的。”黑格在作证时说：“那天会晤结束，离开办公室时，我脑海里留下清晰的印象，他们（中央情报局）准备停止那件事。”然而，计划处处长卡拉默辛斯于1975年在丘奇委员会作证时这样说：“我确信，我们在1970年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73年发生了作用，阿连德最后在智利的军事政变中被人杀害了，但也有可能他是自杀的……就我所知，第二方案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实际上，我们当时被告知，阿连德现在已经是总统了，因此，旨在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第二方案已经结束了。但我们又被告知，要继续尽我们的努力，为最终实现第二方案的目标发挥我们的作用。既然如此，我认为第二方案已终止的说法是不贴切的。”

不难看出，总统、总统顾问和中情局对关于第二方案是否终止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是有矛盾的。这有点像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当政时发生的情况一样，也存在着一个“似乎有理的否定”这样的情况：尼克松总统的指示模棱两可，而中情局则以没有接到白宫明确无误的新指示为借口，仍按照原定

计划行事。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尼克松的说法是为了推卸责任，中情局对尼克松当时的意图也是心领神会，依然尊旨行事，后来在国会追查责任时，中情局就不肯为白宫背黑锅了，因为他有把柄在手：你白宫一边说结束，一边还让我们继续努力，因此责任最后还是你的。

科尔比对白宫和中情局在阿连德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倒是说了一点老实话：

“我并不是要粉饰中央情报局在智利的行动，而仅仅是在说明它在智利的真正作为。根据尼克松总统的直接指令，1970年在执行‘轨道2号’计划时的确试图搞军事政变。中央情报局也的确实行了这个计划，尽管它在1973年曾设法‘疏远’和脱身，但对其后果仍应负一定的责任。后来当阿连德压制中间党派、政治团体和舆论工具时，中央情报局对它们的支持的确造成了智利的紧张局势，否则如果阿连德的压力没有受到抵制，也就不会有什么紧张局势了。而且，美国对阿连德的确采取了敌对政策，其中包括号召私人资本反对智利，国务院取消对它的国际信贷，以及美国军方与智利军方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等。……”

“……在智利的行动所需经费之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央情报局的预算。阿连德取得权力后，开始实行排挤反对派的计划，而中央情报局则想方设法支持反对派反对这种压力，希望他们能够东山再起，在1976年再次大选时获胜，使阿连德和卡斯特罗的希望破灭。中央情报局集中力量通过第三国帮助中间党派，支持自由和反对观点的报刊和电台，援助学生和工联组织，使他们能够不顾阿连德政府对它们新闻出版经费和活动的种种限制作法而生存下来。中央情报局在1973年初智利国会选举中对反阿连德的候选人的支持，使得他们在国会的两次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从而能够弹劾阿连德。议会议员、最高法院和总审计长都公开批评他破坏宪法。”

从1971年下半年起，中情局和智利军方加紧联系。中情局驻圣地亚哥情报站搜集了大量对今后政变“有极高价值的情报”，例如被现政府逮捕的智利人名单、政变时需要特殊保护的对象的名单以及政变时必须占领的重要设施等等。

中情局在智利政变前加紧制造骚乱，煽动和支持一些右翼工会领导的工人罢工。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卡车司机长达一年的罢工，这次罢工造成了智利经济的严重失调，“使人民的不满达到了危险点”。中情局通过第三者秘密提供经费支持罢工工人长期坚持与政府对抗……

尽管国内政局动荡，但是在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卡洛斯·普拉茨的领导下，军队一直严守中立，而且在1973年6月27日还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然而过了两个月，中、高级军官的家属们聚集到普拉茨家门外举行示威，军队的不满情绪已经公开化。普拉茨被迫辞职，由皮诺切特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右翼军人集团在独立纪念日游行的掩护下发动政变，挥兵进攻拉莫内达总统府，空军的飞机也参加了轰炸。阿连德拒不投降，孤身奋战，坚持抵抗，他本人最后牺牲在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牺牲时，他的双手仍紧握着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冲锋枪……后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向阿连德的家属发去了唁电，称赞阿连德是智利伟大的民主战士，并对他的不幸遇难表示沉痛的哀悼。

几艘美国海军军舰就在智利海岸沿线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军演习。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盘旋在安第斯山脉上空。根据来源不同的

消息报告说，飞机是在为政变策划者之间进行联络，并为中情局监视政变的进展情况。这表明，中情局对此事是预知的。

在后来美国国会的调查中，国务卿基辛格被迫承认了中情局曾插手智利政局。

据中情局官员自己说，他们是通过在智利的内线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方知政变的阴谋，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积极鼓动和支持了政变军人的行动，只是没有直接出面而已。不过，据官方统计的数字，从 1970 年 11 月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至 1973 年 9 月阿连德饮弹身亡，在这不到 3 年的时间里，中情局在密谋反对阿连德的颠覆行动中总共花费了 800 万美元。

阿连德死后，在智利成立了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乌加特为首的军人独裁政府。美国立即予以承认，并给予大量援助。黑暗统治在智利整整维持了 15 年。

三十六、中情局与“水门事件”

谁是贼？

正当中情局忙忙碌碌地进行反阿连德的秘密行动时，美国共和党内一伙人忙着为尼克松筹划竞选第二任总统。为了刺探民主党竞选的策略和活动情况，他们派人在 1972 年 6 月 17 日 夜悄悄潜入民主党党部所在地水门大厦，偷拍文件并安装了窃听器。然而，就在这伙人准备溜出来的时候却被大厦的保安人员当场抓获。于是，美国现代史上有名的“水门事件”爆发了。这一事件之所以酿成轩然大波，同尼克松政府的一些政策过多照顾西部和南部财团利益而损害了东部老财团利益有关。因此，“水门事件”首先由东部财团控制的《华盛顿邮报》揭诸报端，接着通过各种手段使之闹大。在国会两院占多数的民主党人死死咬住“水门事件”不放，向尼克松的共和党政府发起全面进攻，调查“水门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追究法律责任，矛头直指白宫。作为幕后操纵者的尼克松本人，拼命遮挡招架，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司法部对此事进行调查。尼克松的这一企图最终激怒了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美国国会议员，形成了国会参众两院一致决心弹劾总统的大趋势。为了避免遭到弹劾进而坐牢的下场，尼克松接受了基辛格的建议，於 1974 年被迫辞去美国总统的职务。

“水门事件”被揭露后不到两个星期，白宫顾问约翰·迪安告诉新上任才一个月的中情局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这次闯入水门大厦的那些人当中多数曾与中情局有一定的瓜葛，这一点无论对中情局还是对白宫都是不利的。迪安讲的的确是实话。在报纸上揭露出来的闯入水门大厦的人员中有前中情局安全室高级官员詹姆斯·麦科德。麦科德于 1970 年中情局退休，1972 年年初，他参加了为尼克松蝉联下届白宫老板的总统竞选委员会。另一名与“水门事件”有重要关系的人员是霍华德·亨特。亨特也是 1970 年中情局退休的，此前在中情局计划处工作，在“猪湾事件”中他以埃杜瓦多的化名代表中情局与迈阿密的古巴流亡人员联系。在这次“水门事件”中，亨特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除了把前中情局的同事麦科德拉下水外，还通过迈阿密的古巴流亡人员团体，招募了 4 名美籍古巴人参与“水门事件”。其中有一个叫尤金尼·R·马丁内斯的人，他在“水门事件”发生前一直为中情局收集有关迈阿密古巴人团体活动的情况，每月从中情局领取 100 美元的报酬。既然有这样一批人在“水门事件”中充当了角色，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怀疑是中情局在幕后操纵了这一特大丑闻。

别把我们扯进去

在麦科德和马丁内斯等人潜入水门大厦后 20 个小时，中情局安全室主任霍华德·奥斯本立即打电话到赫尔姆斯的家中，直接向中情局局长报告：“今天凌晨两点半，中央情报局前雇员麦科德和另外 4 个人在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时被当场扭获。另一名叫亨特的前中央情报局雇员也与此事有牵联。”奥斯本打电话给局长并不意味着中情局正在密切注意麦科德和亨特的一举一动，作为安全室主任，当得知那些与中情局有关系的人犯了法，立即向局长报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在华盛顿，赫尔姆斯“触角”的灵敏度并不亚于其他人。他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调查中情局是否与此事有牵联。6 月 19 日上午 9 点，赫尔姆斯召开局长办公室会议。在会上，赫尔姆斯把有人闯入水门大厦，以及闯入者中的

麦科德和亨特等人曾与中情局有过关系这一严重事件作为主要议程提请大家讨论。赫尔姆斯说：“奥本斯告诉我，亨特也参加了这一事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报纸上我没见到亨特的名字呀！”“是的，报纸上的确没有亨特的名字，因为亨特的名字是在潜入水门大厦而被捕的两个人的笔记本上出现的。奥本斯也从警方的关系那里证实了这一情况。”有人插话回答了赫尔姆斯的疑问。

亨特过去是中情局的老特工。他在50年代推翻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的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60年代的“猪湾行动”中因为不服从命令被解雇，1970年提前退休。退休后，他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

亨特被指控参与了“水门事件”，这一点最使中情局的头头们伤脑筋，因为亨特进入白宫为尼克松工作后，中情局曾为他提供过一些供间谍用的装备和伪装物。那是一年前的事情。1971年7月7日，尼克松的国内事务助理约翰·埃利希曼打电话给当时的中情局副局长、海军陆战队上将小罗伯特·E·库希曼。埃利希曼说：“霍华德·亨特已被白宫雇佣为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他想来拜访你，你是否能为他提供些方便？”两周后，亨特果然出现在库希曼在中情局总部的办公室里。他声称奉有白宫的特殊使命，要去“拜访”某人，以便从中获取情报。因而需要中情局为他提供帮助。

经库希曼同意，中情局将亨特安顿在华盛顿一座安全住所里，还提供了一套电话监控设备、一套化名证件、一顶假发套、眼镜、变声装置、一架装在打字机外壳里的磁带录音机、一架藏在烟荷包里的照相机，还包括一个专用电话号码，以备发生意外时使用。后来亨特要求中情局提供进一步的支援时，技术人员们意识到亨特要干的事绝非仅仅是谈一次话。于是他们逐级上报。8月27日，库希曼下令取消对亨特的进一步支援，并把此事通知了白宫。

此前，亨特要求中情局提供一份关于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情况简介。埃尔斯伯格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指控将五角大楼有关越南战争问题决策的历史文件提供给《纽约时报》，这些文件的公布把美国政府弄得窘迫尴尬。目前，埃尔斯伯格正在洛杉矶的心理学家刘易斯·菲尔丁博士那里接受心理治疗。为了掌握埃尔斯伯格的确切情况，亨特准备在9月份去菲尔丁的办公室做点“手脚”。这一次，局长赫尔姆斯亲自批准了亨特提出的要求，为他准备了一份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史材料，还让中情局派出测谎专家，帮助亨特讯问一名被怀疑泄露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机密的国务院官员。随后，亨特又向赫尔姆斯提出想借调他在中情局工作时的女秘书帮助工作，当时这位秘书正在中情局驻巴黎站工作，所以赫尔姆斯没有同意。其实，中情局的这番慷慨是想借机搞好与白宫之间的关系。

鉴于亨特索取了种种搞间谍活动使用的物品，中情局内有些人感到蹊跷和不安，甚至产生了种种猜疑。8月末的一天，计划部部长卡拉默辛斯特地邀请亨特共进午餐，想从对方口中套出一些话来，看他用这些东西究竟干什么。亨特只是诡秘地说，“为政治工作。”从那以后，赫尔姆斯停止了中情局对亨特的进一步帮助。

在6月19日召开的局长办公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会议开得相当热烈。前雇员麦科德的被捕、亨特与“水门事件”的牵联、中情局曾经为他提供过间谍活动用的工具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成了正副局长和处长们感到十分棘手的事情，大家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于是让刚从越南回来、现在主管审计的副局长科尔比代表中情局处理“水门事

件”，协调局内这方面的工作。科尔比目前已成为中情局的第三号人物。赫尔姆斯提出了一个所有与会者一致赞同的方针：“我们要保持冷静，不主动采取任何行动，尽量远离这该死的事情，否则的话，反而会被人利用，把我们牵扯进去。”

各怀鬼胎

然而，赫尔姆斯的这个主张并不是尼克松希望中情局所采取的态度。“水门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尼克松决定利用中情局来掩盖白宫与“水门事件”的关系。就在总统作出这个决定的前两天，赫尔姆斯已向新上任的联邦调查局代局长帕特里克·格雷断然否认中情局与潜入水门大厦的人有任何联系。可是格雷不相信赫尔姆斯的话，他认为中情局和闯入者肯定有关系，并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了白宫顾问迪安。尼克松正好利用了格雷的怀疑，来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尼克松的眼里，水门事件被暴露不是偶然的，是他在中情局的老对手——即1960年为肯尼迪竞选效劳的那些人——精心安排的闹剧，目的是使他在竞选连任的活动中难堪和败北。尼克松不想让中情局从水门丑闻中溜走。他想把抓住中情局作为一种手段，以便阻止联邦调查局追查竞选连任委员会通过曲线方式从墨西哥转给“管子工”们的秘密经费。

6月23日，尼克松决定把中情局的正副局长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将军同时召到白宫，让他的顾问埃利希曼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会见他俩。在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赶到白宫之前，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把设想好的方案向尼克松汇报，并进行了仔细的讨论。霍尔德曼认为，中情局肯定会从一名叫马丁内斯的特工那里预先知道有人要潜入水门大厦。3人商量后决定，让中情局副局长沃尔斯特出面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局长格雷，希望对方停止进一步插手调查“水门事件”，因为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有过协议，彼此不干预对方的秘密行动。霍尔德曼对总统说：“让沃尔特斯出面打电话并非是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再说，格雷本人也希望限制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只是苦于找不到正当的理由。现在让沃尔特斯打电话，正好使格雷有了借口。”霍尔德曼认为这样安排肯定会产生好的效果，因为经手“水门事件”一案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已经得出结论：中情局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水门事件”。指定担任副局长职务才一个月的沃尔斯特出面（而不止局长赫尔姆斯出面）与联邦调查局交涉的另一个用意是，在赫尔姆斯与沃尔特斯之间制造猜疑和摩擦。尼克松很赞同这个手法，他说：“我们一定要打得猛一些，他们用什麼方法进攻，我们就用什麼方法回击。”

赫尔姆斯与沃尔特斯在去白宫之前，先在外面共进了午餐。他俩料到，把他们召到白宫一定是为了“水门事件”。赫尔姆斯揣摩着，沃尔特斯到中情局不过6个星期，他的任职是由尼克松亲自提名的（取代前副局长库希曼）；这次，埃利希曼又特地关照要沃尔特斯一起前往白宫，赫尔姆斯担心，沃尔特斯会不会和白宫串通一气，把中情局硬拉进“水门事件”里，然后拿他赫尔姆斯当替罪羊，再由沃尔特斯取而代之。赫尔姆斯回想起自己担任副局长时，自己不是与当时的约翰逊总统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吗？想到这里，赫尔姆斯更加感到忐忑不安……

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与中情局正副局长的谈话完全是按照尼克松设计的方案进行的。由霍尔德曼唱主角，埃利希曼在旁边策应。一开始，霍尔德曼就开门见山地问赫尔姆斯：“中央情报局是否与这次潜入水门大厦的人有关

系？”“没有关系。”赫尔姆斯肯定地回答。“从联邦调查局在墨西哥的调查材料来看，”霍尔德曼有意地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这件事与‘猪湾事件’有关系。”“我实在不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赫尔姆斯这时变得针锋相对起来，讲话的声音也提高了，“我本人对‘猪湾事件’毫无兴趣，再说，据我所知，凡是与‘猪湾事件’有关的问题不是已经都了结了吗？时间已过去这么多年了，如果再发生什么与‘猪湾事件’有纠葛的事，我也不在乎了。”赫尔姆斯刚讲完，霍尔德曼就紧跟着说：“总统要沃尔斯特将军打个电话给帕特级克·格雷，告诉对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可能会和中情局在墨西哥的秘密行动发生冲突，最好不要出现这类不愉快的事情，调查工作必须逐渐停止或降温。”

霍尔德曼的这番话讲得相当赤裸裸：尼克松要中情局承担“水门事件”的全部责任，这样，联邦调查局便可以此为藉口不对其他任何人提出指控。而那些已被指控犯了罪的人也可在中情局这顶大保护伞下，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进行申辩。在霍尔德曼的话里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如果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不按照白宫的意图来办事，那么，他俩正副局长的位置是难以保住的。对于白宫走的这招棋，赫尔姆斯并不感到十分惊讶。他沉思了片刻后作出这样的回答：“刚才谈到与墨西哥有什么关系，这一点我确实不明白。但我必须承认，倘若总统、霍尔德曼先生或者上层的其他先生已经有我还不知道的有关墨西哥方面的情况，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白宫常常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消息。但是要我来证实中情局在墨西哥的秘密行动是否会由于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而受影响，或者将要受到影响，我认为这事关重大，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办理这件事。”最后，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同意由沃尔特斯出面，先同格雷谈一下。

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一起离开了白宫。一路上两人攀谈了起来。赫尔姆斯告诉沃尔特斯，必须提醒格雷，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协定：任何一方在工作中涉及到对方人员时，必须立刻通知对方。由于格雷是在1972年5月3日胡佛病逝后的第二天才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代局长，他对许多事情还不熟悉。眼下，赫尔姆斯想争取时间来证实一下，那些潜入水门大厦的人到底和中情局在墨西哥的秘密行动有何关系，或者与“猪湾事件”有何关系，以便在最后作出决定，是否要按照总统的意愿去办事——设法阻止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等赫尔姆斯与沃尔特斯一离开白宫，霍尔德曼立即去向尼克松报喜，白宫的策略奏效了。

沃尔特斯按预定计划拜访了格雷，他告诉对方：“尽管目前联邦调查局在墨西哥的调查尚未触及中情局的秘密工作，但如果继续搞下去的话，有可能会暴露一些重要人物。”按照赫尔姆斯的叮嘱，沃尔特斯特地提醒格雷，在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之间存在那条不成文的协定。从格雷处回来，沃尔特斯就向赫尔姆斯作了汇报。他不安地问，是否真的会危及中情局在墨西哥的重要人物，赫尔姆斯作了否定的回答。

与此同时，格雷的确按照沃尔特斯的要求去办了。他好像已经意识到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可能会把矛头指向何处，他似乎对白宫的困境很同情。于是，他告诉自己的部下别再审问那两名在墨西哥人开办的银行里填写支票的人了，因为这些支票是要支付给那几名由于“水门事件”而蹲监狱的人。

恕不从命

1972年6月26日，星期一，沃尔特斯被迪安请到白宫，再次商量如何

处理“水门事件”的办法。现在的沃尔特斯已被当做尼克松在中情局的亲信，是一个愿意为总统火中取栗的人。可没想到，沃尔特斯并不是个随意摆布的傀儡，他使迪安大失所望。但迪安并不就此善罢甘休，在一个星期里，他连续约见沃尔特斯三次。此时沃尔特斯心中已经有了底，他对迪安直截了当地说：“中央情报局与‘水门事件’毫无牵联。中央情报局在墨西哥也没有什么秘密活动会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而受损害。”“那么，你的意思是——”没容迪安把话说完，沃尔特斯马上接下去说：“凡是和‘水门事件’有关的人都应被解雇。”“我们不准备解雇任何人。”迪安低声回答道。“那么，迪安先生，现在普普通通的小爆炸将会变成几百万吨级的氢弹爆炸。如果那些与这件事有关系的人现在不去触动他们，将来他们就有可能变成氢弹爆炸。”沃尔特斯用这样的比喻提醒迪安。迪安的双眸露出一种恳求的目光，他喃喃自语道：“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一连几遍地重复着这句话。

沃尔特斯每次与迪安会面后，都把双方谈话的内容详细地告诉赫尔姆斯。其中有一次，迪安要求中情局保释那几个潜入水门大厦的人出狱，沃尔特斯直截了当地回绝了，他指出这样做绝不可能，因为中情局没有可用于此种活动的经费，即使有，也必须要将此事告诉国会的各委员会。此时，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已经预见到，“水门事件”将有可能在美国成为一件特大的丑闻。因此，每一次谈话，每一封信，每一份备忘录，甚至连一个电话都必须慎重对待。

6月28日，赫尔姆斯作出决定：“中央情报局坚持自己对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要求，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应仅限于那几名被捕的人以及直接受到怀疑的人，不要再扩大调查的范围。否则的话，就有可能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发生冲突。”中情局要求联邦调查局只调查潜入水门大厦的人，不要由于潜入者过去与中情局的关系，而去调查中情局昔日与现在所从事的秘密行动。从道理上看，中情局提出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这毕竟算是赫尔姆斯按照白宫的意愿作出的最后的决定。就在做出决定的当天，他按照早先安排好的议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一次为期三周的旅行，中情局的日常工作由沃尔特斯主持。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在“水门事件”发生后，赫尔姆斯密令主持人体药物实验的戈特利布博士立即将导致奥尔森自杀的那次实验记录全部销毁。赫尔姆斯敏锐地察觉到，在不久的将来国会很可能要对中情局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

自作自受

在联邦调查局，格雷为自己在“水门事件”中捂盖子的行为而坐立不安，他要沃尔特斯把6月23日讲的话写成书面材料，以便将来作为凭证，证明中情局正式要求过联邦调查局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着想，限制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但沃尔特斯却再也不准备合作了，上次他与迪安会谈时，已表明了这一态度。沃尔特斯知道，就白宫方面而言，现在他代表着中情局在“水门事件”这场压轴戏中唱主角，他的讲话关系着整个中情局的利益，因此，他明确对迪安说：“我完全确信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水门事件’，任何想把它拉进去的企图都会造成对总统、对国会以及对国家严重的损害。中情局是个超党派的机构，它不偏袒任何一个党派，尽管在这个机构中工作的人带有个人的观点，但这个机构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一旦中情局卷入党派之间的政治活动，它便失去了对总统、对国家的价值。”

7月6日，沃尔特斯前往格雷在司法部的办公室拜访了他。他对格雷说，他并不想以损害国家或者中情局的安全利益为理由要联邦调查局停止在墨西哥做的进一步调查。整个7月份，沃尔特斯一直就‘水门事件’有关事宜频繁地与格雷联系，他们两人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尼克松总统要把与“水门事件”有牵联的人全部解雇，以免留下祸根。尽管如此，格雷仍想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保护总统和总统身边的人不被卷入“水门事件”中去。格雷的跟头也正是跌在这上面。后来格雷烧毁了一些亨特的案卷，其中包括亨特伪造的关于肯尼迪总统和中情局参与暗杀吴庭艳的电报。此事被揭露后，迫于种种压力，格雷不得不于1973年4月辞去联邦调查局代局长的职务。当时，亨特伪造这些电报的目的是：一旦罗伯特·肯尼迪在1972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就发挥这些伪造电报的政治杀伤作用，以支持共和党的尼克松竞选总统。

避祸抗命的结局

1972年8月，麦科德因潜入水门大厦，触犯了法律，正在等候审判。他告诉在中情局安全室的老朋友保罗·盖纳：“有关方面对我们这些被告正在施加压力，要我们声称是在执行中央情报局的某项秘密行动。”麦科德还向盖纳透露：“亨特在潜入菲尔丁的办公室时，使用了中央情报局向他提供的照相机，他偷拍了一些照片，现在这些底片还在中央情报局，亨特要中央情报局替他冲洗一下。”得到这些消息后，科尔比要中情局安全室对照片之事进行详细调查，他担心这些照片会使中情局卷入“水门事件”或其他潜在的丑闻中去。科尔比的小心谨慎并不是多余的。1972年12月，安全室主任奥斯本作出鉴定：亨特送来的照片确实是在洛杉矶拍摄的，照片里有一栋房子正是菲尔丁博士的；另有一份关于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文件。这说明亨特已经偷偷摸摸闯入了菲尔丁的办公室，并拍摄了有关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材料。当时这一件事还不为人们所知晓。科尔比反复思索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些照片交给联邦调查局。中情局的这一作法再一次引起了白宫的惊恐。1973年2月9日，约翰·迪安向中情局提议，让联邦调查局把这些照片以及中情局有关“水门事件”的备忘录全部退回到中情局，“只要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留下一张卡片说明此事就行了。”沃尔特斯和科尔比都反对这样做。沃尔特斯说：“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在司法部的卷宗里留下了一支镞向中央情报局的箭。”所以，沃尔特斯拒绝了迪安的要求。然而迪安不死心，他建议中情局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款，付给潜入水门大厦的那些人，因为那些人曾表示，只要能得到丰厚的报酬，他们愿意承担“水门事件”的全部责任。沃尔特斯告诉迪安：“提取这笔费用必须向国会的监督委员会汇报。”沃尔特斯的这番话犹如一盆凉水浇在迪安的头上。

后来，麦科德不断地写一些匿名信寄到中情局。赫尔姆斯和中情局总顾问劳伦斯·豪斯为此事斟酌了好久，一时不知如何处理这些信。只有两种作法，要么把麦科德的辩解告诉联邦调查局，要么就索性不理他，让他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赫尔姆斯和豪斯最后打定主意，坚持原定的策略：不主动做任何事情，除非白宫向中情局提出特别要求。科尔比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中央情报局的这一策略终于避免了自己在‘水门事件’或者其他非法活动中被拉下水。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央情报局不得不采取了与白宫对立的立场。”在调查“水门事件”中叫嚣最甚、最凶的《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里也称

中情局是“本城中唯一对白宫说‘不’字的一家”。

然而，迪克·赫尔姆斯终于为这个“不”字付出了代价：1972年12月初，尼克松免去了他的中情局局长职务，让他卷起铺盖前往伊朗去当大使，任命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施莱辛格担任中情局局长。

当赫尔姆斯最后离开兰利总部时，他站在门厅久久地注视着大理石墙壁上代表着中情局殉职者的30颗星星，在场的所有人员流露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一些人泪流满面……

赫尔姆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担任中情局局长期间之所以龌龊不断，其原因就是他与总统没有真正的私人关系，缺少政治后台，底气不足……

赫尔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时间之久仅次于杜勒斯。在他当权期间，越南战争占去了中情局的大部分精力，尽管他在工作上没有出现大的差错，但还是受到了“水门事件”及其余波的冲击……

不管怎么说，中情局确实参与了因秘密追查五角大楼绝密文件泄露事件而严重侵犯人权的埃尔斯伯格事件以及尼克松竞选丑闻“水门事件”。中情局由此开始了多灾多难的历程……

沃尔特斯在保护中情局不被“水门事件”大火吞没的争斗中始终站在第一线，因此博得了大家的赞赏。1973年5月，他被授予中情局的最高荣誉——“杰出情报勋章”。接替赫尔姆斯局长职务的施莱辛格在授勋仪式上说：“他只要走错一步，都可能毁灭中央情报局，然而他半步也没有走错。”

詹姆斯·施莱辛格到中情局之前，做了两年的预算管理局副局长。他曾经从预算的角度对中情局的工作做过分析研究。他从管理方面对中情局的评价是：它在搞技术性情报上要比搞政治性情报情报上强得多。他头发灰白，表情严肃，常叼着一个烟斗，弃欢穿花格呢子衣服，外表决不像一般人眼里的中情局局长。

施莱辛格在中情局呆了不到5个月，但他的所作所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说如果他不高升的话，中情局可能会在他手里来一个“大翻身”。任期内，施莱辛格敢冒全局之大不韪，做了两件追魂夺命的大事：1.大规模裁减人员，特别是从事隐蔽活动的特工。他规定，凡工作期限超过20年以上者都必须离开中情局，这样一来，将有2000多人被裁减，虽然由于他的任期太短，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年富力强者已被赶走了1000多；2.他本人以及授意他人揭露中情局的“家底”，导致中情局声名狼籍。点燃这两把火后，局内怨声载道，连施莱辛格本人也感到自己很不安全，惟恐那些用惯了“匕首加斗篷”的特工对他下毒手，多次增加保镖的人数，甚至在墙上挂起他的肖像时，也要装上特殊的监视器，以监视那些敢于对他的肖像表示不满的特工人员。结果，只录下了一个镜头：有一个妇女走近他的照片时，用拇指贴着鼻子，另外四个指头则轻蔑地扇了扇。

随着隐蔽活动的整体收缩，中情局变卖了曾在朝鲜、印度支那和其他地区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民用航空公司、南方空运公司和西方企业集团的资产。

为了增加透明度，修好自身形象，副局长科尔比将他分管的“计划部”改为意义更明确的“行动部”，同时，通往中情局总部公路上的路标也由“公路局”改为“中央情报局”。然而，这些小改小革无法阻止中情局滑向低谷的势头。

三十七、斋月战争前后

战前形势

中东问题十分复杂。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突袭埃及和叙利亚，继而乘胜进攻约旦。战争共打了6天，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的约旦管辖区、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其面积共达65700多平方公里。

在中东“六·五”战争爆发前，摩萨德向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通报了以色列准备先发制人的战争方案。与此同时，赫尔姆斯局长为约翰逊总统准备了一份《如何帮助以色列》的专题报告。报告中写道：“在整个1966年财政年度，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总额为11亿美元，其中4000万美元用于今年购置坦克和飞机。这是自1958年财政年度以来援助数量最高的一年。在外交上，支持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三大任务之一。使与以色列交界的约旦成为缓冲地区，这对以色列是有利的。1965年，对约旦的援助已达5.2亿美元，这里面包括了中情局15年来支付给约旦国王侯赛因个人的钱款。”当“六·五”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赫尔姆斯便十分自信地说，以色列肯定能打赢这场战争。沃尔特·罗斯托和约翰逊总统的外交顾问们则称，这场战争是最后解决中东问题的机会。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的第二天，罗斯托写了一份报告给约翰逊，指出，“如果以色列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行动，这会使苏联人感到担忧。那时，马上抛出一份简单的停火决定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既成事实，谈判中东的永久和平问题，而不是回到停火线。”华盛顿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只有使以色列更强大，才能加快中东问题和平解决的步伐。

“六·五”战争的结果不仅加深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仇隙，也加剧了美苏两国在中东利益的争夺。从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停火决议”那一天起，中东的局势就已经十分明朗，以色列不可能永久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外乎两种可能：1.通过谈判解决争端；2.军事冲突进一步加剧和升级。为了对付以色列，苏联增加了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援助；美国也增加了对以色列的援助。

到了尼克松坐镇白宫的时候，中东问题处于高度对峙的状态。

与埃及拉关系

埃及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遭到惨败后，纳赛尔病怒交加，不久就去世了。接任的萨达特总统仍继续奉行与苏联结盟的政策，对此美国十分焦急。1971年，中情局派遣特威腾来到埃及，任中东情报站站长，该站设在西班牙大使馆的美国科里。特威腾的任务是竭尽全力设法打入埃及政府，打开中东的局面。不久，他结识了萨达特最亲密的顾问阿什拉夫·马尔万。此人对埃及日益依赖苏联的援助深感疑虑，而且崇拜美国，同时他非常憎恨埃及的情报机构头子萨米·谢里夫。谢里夫是苏联在埃及的头号特务，而且是萨达特圈内人物中公开维护苏联利益的埃奸。经过一番努力，特威腾终于把马尔万拉了过来。

1971年5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特威腾接到从兰利总部发来的急电说，有人阴谋推翻萨达特，这是苏联克格勃的计划。政变的确切证据很难获得，因为埃及的情报机构掌握在谢里夫手中。但把各方面的零星情报拼凑起来，中情局得知有一批被克格勃收买的萨达特的高级助手，企图发动一场政变，并

要谋害萨达特。其中有一份情报最具权威性。提供者是一个苏联的职业外交官兼克格勃官员，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萨哈罗夫。他过去在埃及，现在在科威特工作。萨哈罗夫在整个60年代里为中情局工作，最近他受到克格勃同事的怀疑，因此他准备逃离。他汇报了有关在开罗进行政变的计划；同时，中情局还在埃及收集到其他一些情报，包括策划人之间的电话记录。所有情况表明，这场政变很可能成功。如果萨达特被推翻，这将意味着埃及会成为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从而使苏联在纳赛尔时期一些庞大工程上花费的几十亿卢布得到百倍的报偿。

特威腾立即行动。在第二天的早晨，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克格勃布置盯梢的埃及特务甩掉。最后他终于见到马尔万，向他详细叙述了政变计划的概要……几天之后，萨达特粉碎了一起未遂政变，将主要策划者全部抓获。特威腾提供的证据是策反人之间的电话录音。5月11日早晨，马尔万把这些录音带交给萨达特。录音带证实，特务头子谢里夫和副总统阿里·萨布里都是阴谋参与者（克格勃指定萨布里在干掉萨达特后担任总统）。

这一下，特威腾成了埃及不公开的英雄。对中情局来说，实在是极其重大的胜利；对美国来说，利润更是美不胜收。挫败政变后，苏联人被赶出了埃及，他们收买的间谍大都被捕入狱，苏联大使馆几乎被孤立起来。由于萨哈罗夫提供的情报，使中情局弄清了苏联在埃及的每一个谍报人员，实际上已经把原来的埃及共和国变成了监禁克格勃的集中营。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埃及的大量援助……

当埃及成为美国的同盟者之后，向美国提供了种类繁多的苏联的武器装备，以作为萨达特感谢美同的一种表示。例如，美军建立起一支“红色”沙漠部队，就是一个完全由苏联坦克和装甲车装备起来的装甲营。该营驻在加利福尼亚州，现在仍然被美国用来给部队作下次战争的战术训练。

美国与中东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搞热了关系，对日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作用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厢情愿

萨达特是在1970年9月纳赛尔逝世后继任埃及总统的。他上任后便表示愿意和以色列缔结和约，承认和尊重以色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埃及领土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活动等。此外，萨达特还多次提出重开苏伊士运河的具体建议。实现这些和平主张和倡议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埃及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倡议并不意味着单独或部分解决办法，而只是同以色列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基础的广泛解决办法有机联系的程序性行动；以色列心须承担撤退到1967年6月的边界的义务；埃及军队一定要越过运河，开到东岸的西奈半岛去。以色列不愿全部接受这些条件，它认为，部分撤军可以考虑，但不同意归还耶路撒冷和原约旦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

面对这一僵局，萨达特认为，只有战争才是收回西奈半岛的唯一希望，只有战争才能打破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僵局。萨达特公开声明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在以色列和美国很少有人把萨达特的讲话认真看待。包括以色列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所有情报机关都认为，以色列军队的素质和装备远在阿拉伯国家军队之上，历次中东战争特别是“六·五”战争的胜利就是明证；同时，经过美国5年的大规模援助，以色列的实力更加强大，所以，萨达特如果想打仗，只能是以卵击石；现在萨达特发表战争讲话，其目的是为了安抚国内军方的压力，也是为了向阿拉伯盟友乞讨更多的援助，说到底，

萨达特的讲话不过是危言耸听，虚张声势罢了。1973年4月20日，情况似乎有了变化。中情局在一份关于中东问题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中谈到：萨达特开始慎重考虑自己的讲话，但尚未有其他证据表明埃及正在准备一项特别的军事行动计划。这份报告最后作出的结论是：萨达特继续通过外交和政治方式谋求解决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一旦这种方法失败，他也有可能诉诸武力。

5月5日，中情局局长施莱辛格当面送交即将担任国务卿的总统国家事务助理基辛格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上说，萨达特已经命令埃及军队作好越过苏伊士运河、开到东岸去，向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队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然而，施莱辛格特地向基辛格补充到：“中央情报局并不相信这个军事计划是为了达到萨达特总统提出的最终目标。它只是起到心理上的进攻作用，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实际意义。”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这样说：“中央情报局不相信预定在仲夏举行的联合国对中东问题的辩论前，中东会发生敌对行动。5月中旬，中情局在送来的一份报告中还声称，即使联合国的辩论毫无结果，也不意味着敌对行动是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就在施莱辛格与基辛格谈话后的第10天，施莱辛格又重申：“埃及的军事实力有限，它最多只能对以色列发动突然的空袭。如果埃及军队真的跨越运河，即使让他们占领一小块土地，他们也守不住一星期。”中情局情报专家的意见是：埃及由于技术和装备上不如以色列，无论如何不敢首先发动进攻；萨达特现在只是发动政治攻势，目的是想加速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盛顿只有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司长、原中情局情报处处长雷·克莱因不同意中情局方面所作结论的后半部分。克莱因说：“如果萨达特的外交努力落了空，他非冒诉诸武力的危险不可。今年秋季，中东将再次发生敌对冲突决不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

1973年9月，种种迹象似乎已使包括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在内的所有美国情报机构都相信，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气候并不象中东要发生一场大的战争，阿拉伯国家也不像有这种打算。即使真的发生战争的话，阿拉伯国家肯定会遭到比“六·五”战争更惨重的失败。

这时，美国国家安全局拦截到成千上万份电讯，从这些电讯中发现，中东有战争的迹象。国家安全局甚至拦截到一些有关军事行动计划的电讯材料。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拦截到的电讯材料数量太多，鱼目混珠，造成一些关键性的电讯材料来不及处理，只好搁置一边。再说，国家安全局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监听渠道和破译密码的能力，他们把一些敏感的电讯材料扣压在自己手里，没有拿出来让情报分析专家过目。另一方面，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秘密工作方法使情报分析专家们没有机会直接与外国领导人对话，无法充分利用一些高层的外交渠道，以致中情局在埃及的一个秘密关系确切报告了埃及人在作战争准备时，竟无人相信。以色列摩萨德和军方人士此时也同样高枕无忧，他们坚持认为，西线无战事。

尼克松对中情局与外国情报机构，特别是与英国、西德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的密切关系很不满意，他认为中情局太依赖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了，缺乏大国的风度。其实这是尼克松的短见，他不懂得，情报活动领域绝非一家天下，各国情报机构各有短长。就拿以色列的摩萨德来说，在中东地区人力情报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能力远远不及摩萨德，这是情报界一致公认的事实。一位摩萨德官员曾说过：“中央情报局需要我们超过我们需要他们。”尽管如此，摩萨德并非三头六臂，事事万能，它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1973

年爆发的第4次中东战争就是摩萨德最大的一次败绩，舔人余唾的中情局当然更是下乘表现。

战争突降

1973年10月4日黄昏，摩萨德总部接到埃、叙两国于10月3日最后确定的向以色列发动全线进攻的“巴德尔行动计划”，该计划的影印件上赫然表明，10月6日18时进攻全面开始。然而，这一情报被以色列内阁否决。

10月6日凌晨4点，以色列军方特工十万火急地再次报警：埃及和叙利亚定于当天下午6点同时在南北两线向以色列发动全面进攻。最糟糕的是，身为国防部长的达扬此时仍拒绝实行军队总动员，拒绝动用后备队，他坚持只为防御进行有限和局部的动员。由于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的力争，最后由总理梅厄作出折衷决定，批准动员10万人，同时否定了埃拉扎尔关于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破坏敌方全面进攻的主张。此时，已是上午11点了。

1973年10月6日14时，埃及和叙利亚提前4小时出动几十万大军、上千辆坦克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全线进攻，灭顶之灾终于降临。埃及军队迅速越过苏伊士运河，不到两天就摧毁了被以色列吹嘘的不可逾越的巴列夫防线，收复部分西奈领土，在西奈半岛控制了从苏伊士湾东岸的迈萨拉角到福德港一片200公里长、12~17公里宽的3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叙利亚军队也势如破竹，一度打到了太巴列湖。以色列军队除极少数地带由于在几天前就严阵以待因此得以坚守外，整个战线几乎都被突破了。以军面对敌军1:20甚至是1:40的悬殊优势拼命阻击，争取时间，等待国内援军。这时，以色列的军政头目才如梦方醒。总理梅厄夫人向全国发出紧急总动员，她连连疾呼：“现在是犹太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最危急的日子里，梅厄夫人甚至一度准备动用原子弹，作为挽救局势的最后手段。为此，以色列的特种空军飞机实行24小时整装待命……

以军先在北线反击叙利亚，保住以色列本土，从而改变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在北线取胜后，以色列移兵南线，反攻埃及，双方1800多辆坦克在运河东岸进行激战。

根据中情局间谍卫星提供的情报资料，以色列发现埃及两个军团之间的结合部有一较大空隙。16日，以色列装甲部队见缝插针，偷渡运河到达西岸，迅速向北、向西扩展，一举切断西奈半岛与埃及的联系，将西奈半岛上的埃及第三集团军和东岸的苏伊士城死死围困起来，形成就地全歼埃军主力的决定性胜利态势。后来在美国“达到了撕破脸皮的愤怒程度”的压力下，以色列被迫同意停火。

“斋月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白宫，从总统尼克松到中情局局长科尔比都大吃一惊。尼克松进而更加认定中情局过分依赖外国情报机关，没有依靠自己的情报来源和情报判断，致使中情局又一次出现情报失误。尽管尼克松指责中情局失职，华盛顿却到处流传着这样的小道消息：克莱因领导的国务院情报研究司提出了萨达特准备发动战争的警告，后来中情局也作出了类似的结论。小道消息自然也传入以色列大使馆武官莫德切·格的耳中，他向国内军方领导人报告了此事。战后，在以色列全国掀起了追究初战失利的责任时，军方将此事拿出来证明自己“尽职尽责”了。其实，直到萨达特发出进攻命令的前一刻，以色列官方还坚持认为萨达特只想寻求外交上解决问题，不敢轻举妄动，尽管他们在开战前曾收到约400份反映埃及和叙利亚备战的情报，可是无人相信。

在施莱辛格担任局长的那段日子里，他有意识地尽量淡化这些危机性情报，否则的话，将要迫使陷入“水门事件”的尼克松花费更多的精力对中东问题进行斡旋。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解决因“水门事件”引起的一系列国内问题显得更为迫切，此时的尼克松不相信自己有政治资本去解决中东问题。现在，中东战争打起来了，倒反而使尼克松减轻了负担。至于中情局局长科尔比则认为，自己正式担任局长不过一个月，因此关于中东战争的情报失误和自己无关。

正当大家责备中情局在中东战争前没有作出正确判断的时候，基辛格的班子成员劳伦斯·伊格尔伯作了如下评述：“我的看法是，我们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情报的质量，而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消化获取的情报。手头上的材料已清楚地表明萨达特准备好发动 1973 年的战争，而这些材料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十分有趣，亨利·基辛格看到一些原始情报后，他比我们的情报界早一步作出了萨达特打算发动一场战争的结论，却为时太晚了！”

三十八、火烧中央情报局

局内矛盾

施莱辛格只担任了4个月的中情局局长

长,随后便出任国防部长,接替施莱辛格职务的是老牌职业特工威廉·科尔比。科尔比身材不高,背有点驼。他在情报界人士的眼里是个政治上的流浪汉,他是唯一不属于任何政党的中情局局长。

在“水门事件”爆发的前后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参众两院相继补充了一批新议员。这些新议员不拘泥于参众两院传统沿袭下来的小组委员会制度,对许多事情都要追根刨底。尤其在揭出“水门事件”丑闻后,追究政府机构不法行为及其责任者的浪潮日甚一日。面对这种形势,科尔比认为,中情局已经无法再保住过去一直隐藏在秘密行动中的那些违法丑闻了,因此他对于来自政界和报界的追问采取了“承认过去错误,现在已经改正,今后不会再犯”的态度。中情局的人员发现,他们的新局长与从不把家丑外扬的前任局长赫尔姆斯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非常不情愿但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科尔比把一件又一件的中情局丑闻抖落出来。大家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安格尔顿领导的反间谍处人员对科尔比更是反感,甚至有人怀疑科尔比是否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克格勃打入中情局总部并窃取要职的间谍。当然,反情报处忌恨科尔比还另有原因。

上届局长施莱辛格在中情局内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裁员。约占全局7%的人员被解雇或被迫辞职和退休,按照施莱辛格认为“死木头”大多在秘密单位的想法,其中对行动部裁减的比例最大,当然这与副局长科尔比也有密切的关系。科尔比曾经对施莱辛格说:“当心,将会给你带来最多麻烦的是楼下那群干秘密勾当的家伙。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是和他们一起干出来的。我了解他们,让我下去替你照料他们吧。”于是由科尔比分管了计划事务这部分工作。在裁员过程中,他极力鼓动施莱辛格把长期担任反间谍处处长的安格尔顿和他手下的几名高级官员赶走,但施莱辛格没有同意。后来,科尔比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这件事:“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有一位高级官员逃脱了这场清洗,他就是吉姆·安格尔顿。我不想隐瞒我曾向施莱辛格反复重申我早就形成的看法:安格尔顿的那种超绝密的行动作风至少在近几年来已和我认定的基本原则毫不相容,我建议应该调走安格尔顿。但是施莱辛格却犹豫不决。显然,他看中了安格尔顿那毫无疑问的才华,忍耐不住想搞清楚他那套复杂的学问里究竟有何值得进一步利用的东西。也许,安格尔顿对苏联所持的毫不妥协的冷战观点也迎合了施莱辛格本人强烈的反共意识。因此,他不让我清洗安格尔顿,但同意让我在他的行动计划中作一些重大的改动。”

现存,科尔比就任局长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了。

科尔比与安格尔顿的矛盾由来已久,但两人之间发生的第一个公开冲突则是在邮检问题上。

邮检工作实际上一一直由中情局安全室承担,反间谍处的工作只是负责对邮检中发现的疑点进行分析处理,并与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系。邮检中心设在纽约和旧金山。从1952年到1973年,中情局的邮检工作持续了20多年。当时,安全室人员把一些来自苏联以及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信件扣压下来,处理方法有信封法和信囊法两种。前者是将信封拍照存档;后者是小心秘密地拆

开信的封口，检查并拍下其中的内容，然后将信重新封好。“还有几次曾短期地检查过中国和古巴的邮件”，一旦发现与美国“安全利益”有关的信件，便通报联邦调查局。

自从中情局的这件丑闻被披露出来以后，引起了施莱辛格和科尔比的重视。科尔比提议立即终止这项工作，安格尔顿对科尔比的提议置之不理。相反，他向施莱辛格抛出许多证据，证明中情局邮检工作的重要性。安格尔顿还要求尼克松总统亲自批准中情局的邮检工作。最后，施莱辛格作出了一个折衷的决定：邮检工作暂时停止。可他没有讲明，是永远终止这项工作，还是暂时的停顿，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科尔比上任后，没有立即清除安格尔顿。他感到，由于施莱辛格采取的裁员措施，现在的中情局尤其是行动处人心惶惶，内部很不稳定。“秘密工作单位刚刚度过其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人事动乱，如果再采取不利于安格尔顿的举动就会被认为是要有更大动乱的征兆。”科尔比着手更改了行动处的工作范围，取消了安格尔顿的一些重要职责（例如“制乱行动”，与联邦调查局的联系，与以色列的单线联系等），规定反间谍处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不受外国间谍的侵害。安格尔顿很恼火。

科尔比知道，反情报处在名义上从属于行动部，实际上是一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虽然反情报处的规模小了，但它还在神出鬼没地进行着秘密行动，谁也弄不清它究竟做什么。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特纳把反间谍处称为安格尔顿的“男爵领地”。

不久，有两个问题使科尔比转变了当初的想法，下定决心清除安格尔顿：1. 反间谍处坚持“对一个忠实而优秀的秘密行动官员的怀疑。尽管在几年前已经彻底调查过了，证明其能力超群，工作很有效率，早已撤销了怀疑，但反间谍处不接受这个结论。因此，使受怀疑的官员最后还是被派到一个边远贫穷的岗位上工作了许多年。不仅如此，反间谍处未经允许还向外国情报机构散布说这个人苏联特务”。这个被怀疑的人叫加布勒（后面将介绍）。后来加布勒被任命为驻外情报站站长，但那原来是安格尔顿设下的圈套。科尔比知道此事后十分生气；2. 安格尔顿是最先与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打交道的中情局官员之一，他和以色列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是中情局内著名的亲以派（他当初的亲以观点被杜勒斯的中情局所接受，进而被美国国务院接受，并且被历届美国总统奉为圭臬），对美以情报交换工作起到过重要作用。但科尔比认为，当中东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后，美以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依然凭借安格尔顿当中间人就不合适了，“由于安格尔顿的秘密工作作风使得他在中东工作的官员和相当多的情报分析人员对中情局与以色列的联系采取了人为的隔绝状态”，几乎被安格尔顿一人所垄断和控制。特别是科尔比在中东之行中发现，中情局驻以色列的情报站不能与附近阿拉伯国家的情报站进行联系，因为以色列只和反间谍处人员有来往。因此，科尔比决心更换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把反间谍处在以色列的“户头”取消。

1974年12月17日，科尔比把决定告诉了安格尔顿：或者留下来（但必须调换职位当顾问），以便把自己的才智和经验留给中情局，或者在文官委员会提出的公务员退休的最后期限之前完全退休。为此，科尔比给安格尔顿几天考虑的时间。

安格尔顿辞职

1974年12月18日，也就是科尔比与安格尔顿谈话的第二天，科尔比突

然接到赫什打来的电话。西摩·赫什是《纽约时报》的调研记者，1969年11月16日赫什率先在报上披露了1968年3月16日发生在越南美莱的大屠杀内幕。在这场大屠杀中威廉·L·卡利中尉指挥美国步兵开枪打死了450名赤手空拳的越南平民。赫什的文章一发表，公众舆论哗然，同年11月24日，卡利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赫什则荣获了普利策新闻奖和波克奖。此时，科尔比的心里忐忑不安，赫什打电话给他总不会有什么好事。

赫什在电话里说，“比美莱大屠杀更耸人听闻的事情就发生在中央情报局里。我指的是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进行的非法活动。”科尔比愣了一下，觉得事情不妙，但一时又想不出怎样回答对方。赫什继续讲道：“我这里掌握了中央情报局代号为‘制乱行动’的详细情况。这个秘密行动的实质是中央情报局利用窃听、邮件等非法手段监视国内一些反对越南战争的团体的活动。”赫什把事情挑得相当明白：“你们的‘制乱行动’直接违反了中央情报局的章程。”赫什不客气地将了科尔比一军。科尔比提出与赫什面晤再说，赫什欣然同意。

12月20日，科尔比在自己的办公室与赫什会面，他想澄清一下事实。科尔比说：“中央情报局调查反战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是否有外国人在幕后操纵这个运动，中央情报局这样做是合法的。当调查后没有发现外国人与这个运动有牵连时，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便取消了。”关于邮检和窃听的问题，科尔比解释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与调查反战运动没有关系。这是中央情报局为防止情报和技术泄密而进行的一项正常工作。不过，”科尔比的话这时显然软了下来，“中央情报局在过去的28年时间里确实发生过少数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监视某些人的行动，这超越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范围。应该强调的是，1973年，中央情报局已经作了反省，并公布了一系列明文规定，提出中央情报局今后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严格行事……”

不管科尔比讲话的艺术如何高明，他毕竟证实了赫什要揭露的事情不是虚构捏造，承认了中情局有违反章程的行为。他承认，前任的一些局长，尤其是赫尔姆斯主持中情局工作期间，对国内反战运动进行了监视，这显然是超越了中情局只对外不对内的权限的非法行为。这一点，科尔比的前任局长谁也没有承认过。赫什对于这次和科尔比见面感到十分满意，科尔比讲的一席话等于为赫什即将刊登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作了权威性的肯定。赫什离开后，科尔比便把负责“非法”监视活动的反情报处处长安格尔顿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通知他必须马上离开中情局。科尔比的态度很坚决，他告诉安格尔顿：“报界将揭露你进行秘密邮检之事。”安格尔顿和他的几名高级助手则认为，科尔比为了把他们撵出中央情报局，有意识地把邮检的秘密告诉了记者。盛怒之下，他们提出了辞职。

轩然大波

1974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在第一版登出了横跨三栏的大标题：“据说中央情报局在国内对反战力量和尼克松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紧接着就是一段骇人听闻的导语：“根据重要的官方消息来源，在尼克松执政期间，中央情报局直接践踏了它自己的法规，对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团体采取了大规模非法的侦查行动。”

一场新闻和政治的大火立即在全国熊熊燃烧开来。舆论纷纷攻讦中情局在国内所从事的特务活动，指责它已变成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同时，清除安格尔顿的举措更是火上浇油，舆论的抨击日益激烈……

中情局官员戴维·菲利普斯说：“一夜之间，中央情报局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一个阴暗卑鄙的机构，其人员的秘密活动像幽灵般地威胁着美国社会。圣诞节后，我回到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时，我觉得赫什的文章使一个曾经坚如磐石的情报机构出现了一道大裂缝。”

中情局的“制乱行动”是从1967年开始的。当时，根据约翰逊总统的命令，中情局去调查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是否受到外国的操纵和资助。这样，便由安格尔顿的反间谍处负责这项调查工作。“制乱行动”起初由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起来搞，这就使中情局的“制乱行动”挂上了合法的招牌（因为美国的安全法规定，联邦调查局的工作范围是管内不管外）。随着“制乱行动”的深入，中情局整理汇编了数千份在美国国内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像马丁·路德·金这样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以及像简·方达那样的著名艺术家。调查后，中情局认为反战运动与外国没有联系。可是，约翰逊总统始终不同意这一调查结论。因此，到了尼克松坐镇白宫的年代，“制乱行动”仍神出鬼没地进行着。1971年，中情局人员设法打入国内各个反战团体内部，想从中取得伪造的身份作掩护，伺机在今后打入国外的反战团体和组织。1972年，赫尔姆斯下令：“中央情报局的‘制乱行动’从对国内反战运动的调查转向调查国际恐怖主义行动。”

这样便使“制乱行动”合法化了。可是，安全室负责的与“制乱行动”有联系的“抵抗计划”却继续监视着美国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直到1973年6月才终止了安全室的“抵抗计划”。整个“制乱计划”是在1974年1月才终止的。

在中情局内，除科尔比外，还有不少了解“制乱行动”内情的年轻一些的官员，他们在当初就对中情局违反章程的行动表示担忧和关切。1972年秋季，中情局督察长威廉·布罗在一份报告中表达了大家的忧虑：“尽管普遍认为，中情局的插手是为了对付外国人操纵和利用美国公民，可是大家对中情局监视那些没有间谍活动嫌疑的美国人的行动仍表示十分不安。有时，总部要求中情局的国外情报站收集一些美国著名人士在国外的一言一行。其实，这些人的行踪去向都有公开的报导，不像存在颠覆的阴谋。这些情况使大家对‘制乱行动’的性质与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质疑。”

科尔比根据了解到的中情局国内丑闻整理成一份693页、内容包括近700项“可能破坏中央情报局立法特权的或至少是有疑问的”活动的《项目单》，准备交给正在科罗拉多州度圣诞节的福特总统，想通过白宫将这份《项目单》向报界透露。当时，科尔比认为，解决中情局眼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向美国公众如实交待事实真相。然而，多数人不赞成科尔比的想法，他们认为不该把所有底细都公布于众，否则事情会弄得一团糟。科尔比先把《项目单》和一些涉及秘密行动的丑闻告诉了国务卿基辛格，请他转告福特总统。基辛格起初也不同意科尔比将全部丑闻抖落出来，但看过《项目单》有关暗杀行动方面的内容之后，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基辛格对科尔比说：“哎！比尔，我曾认为在最初赫什与你谈那件事时，你应该断然否定它。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原因。”

正在这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秘密听证会，科尔比把呈送白宫的那份材料复印一份交给了这两个委员会。参众两院的小组委员会看完材料后得出结论：报告中的内容并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因此，在未征得白宫同意的情况下，它擅自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科尔比也坚持己

见：“水门事件”的风暴正在中情局上空翻腾，挽救中情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如实说明真相，保证今后不再重蹈覆辙。科尔比的态度引起了各方的争论。

福特总统当然不愿承担公开泄露美国情报机密的责任，也不想指责前任总统利用中情局从事不轨勾当。而中情局内的人员担心泄密后，自己会被舆论说成是践踏法律章程而声名狼籍，而且这是要追究责任的。国会方面则认为，中情局和白宫在有意隐瞒重大丑闻的真相，因此只有公布中情局昔日的秘密，才能使它在今后依法办事。

圣诞节后的第5天，科尔比在中情局总部的大礼堂召开高级官员大会。他再三向各级官员声称，自己要保护中情局不受伤害。科尔比向到会者介绍了中情局一些不能外扬的丑事。他指出，赫什的文章有很多夸大和失实，并告慰大家，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们，中情局就能顶得住外来的批评和攻击。科尔比说：“我相信，没有一位公正的审判官会对中央情报局人员在今天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下所做的事定罪。”

福特的心事

由于“水门事件”的原因，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被迫辞去美国总统的职务，由副总统福特出任美国第38届总统。1973年10月10日，原副总统阿格纽因贪污被揭露后，身败名裂地辞了职，尼克松毫不犹豫地启用了在政治上“走温和的中间道路”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福特。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让福特担任副总统，才不至于在国会中引起什么大的争议。不过，谁也没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于尼克松的辞职，福特又轻而易举地登上了世界瞩目的美国总统的宝座。福特保留了白宫的原班人马，继续推行前任总统的对外政策。

与尼克松相比，福特更接近“普通”的美国人。和美国大众一样，他对中情局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中情局副局长沃尔特斯将军曾用这样的话来描述：“当人们感受到有外来威胁时，希望中央情报局搞到尽可能多的情报，当处在太平盛世时，却又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是不道德的。”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福特一直是众议院里非正式监督中情局活动的12名议员中的一个。尽管他口头上声称坚决支持国会提出的要对中情局实行监督的原则，实际上福特希望中情局只要把他必须知道的事告诉他就行了。也许就是这个缘故，福特直到自己担任了美国总统后，才第一次得知中情局还有那么一些不能外扬的丑闻。最令他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暗杀外国领导人的阴谋正是发生在60年代，他作为国会议员监督中情局的时候。

1974年的圣诞节，福特收到了科尔比让基辛格转来的有关中情局丑闻的报告。阅毕，福特通知科尔比于1975年1月3日来白宫面谈。那天，科尔比把中情局所有的非法活动和骇人听闻的丑事和盘托出，福特这才恍然大悟，他感到自己的政治处境相当危险，决心尽早摆脱。当务之急是必须解除施莱辛格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施莱辛格是尼克松的忠实“奴仆”。

对科尔比来说，1月3日和福特总统的会谈非常重要。当他离开白宫时，自认为对自己领导的中情局下一步该怎么走，心里终于有了底。此前，报界对中情局面临的危机和福特总统将要采取的对策有着种种猜测。为此，科尔比一直惴惴不安。他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这样说：“我一直担心白宫要远远地避开中央情报局和它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就和‘水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情报局想要避开白宫一样。我害怕白宫拉着马车到处跑，却偏偏把我抛在车外，

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现在，福特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一定要开诚布公地对待中情局。他说：“我认为，对中央情报局进行不必要的揭露会影响他们的士气，损害中央情报局有效的工作，并导致外国政府不敢和我们交换情报。如果我让国会单独对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的话，难免会出现上述情况。”福特还告诉科尔比，他准备委任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中情局的国内活动，以回答《纽约时报》的指责，并希望由此平息国内舆论。

1月6日，白宫调查中央情报局国内问题的特别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福特强调说：“这样做，既能维护我们的安全利益，又能避免损害我们的民主和自由的传统。今后任何情报活动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目的进行。”在福特的讲话里没有提及，也没有暗示中情局必须按总统的命令行事。他似乎想让美国人理解，中情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必须按照自己的工作需要进行情报活动。不过，在福特总统的这些话语中，多少有这样的含义：中情局确有不轨行为。

福特接任总统后，就着手为卜届总统竞选作准备。他仔细斟酌要做的每一件事，他要维护美国总统的威信，为自己创造最好的机会。正是出于这些考虑，福特总统赦免了尼克松“所犯的、可能犯的或参与的一切罪行”。他的理由是：“审讯一名美国前总统的后果将会无可挽回地失去国家业已恢复的平静。”现在，福特处理中情局的问题当然也是从政治利益来考虑，他提出要调查中情局的违法行为，但决不想深入搞下去。

福特任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调查中情局活动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成员有前商业部长约翰·T·康纳、前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前司法部副部长欧文·N·格里斯沃尔德、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L·兰尼兹尔、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等人。该特别委员会也称洛克菲勒委员会。按照福特的命令，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将调查材料直接向总统汇报。

科尔比认为，福特总统走出的这步棋，正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既想满足美国公众提出的调查中情局非法活动的要求，又不想把中情局策划暗杀阴谋这类事情暴露出来；因为福特心里十分清楚，公开揭露这些丑闻不仅会损害中情局的利益，而且会败坏美国现政府的形象。科尔比断定，中情局只有立即主动地把一切非法活动公布于众，才能使中情局真正摆脱困境。可是白宫不喜欢科尔比的这种坦率态度。

科尔比到洛克菲勒委员会第三次作证之后，洛克菲勒副总统悄悄把科尔比召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和颜悦色地问科尔比：“比尔，你真的认为应该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吗？我们认为，你们中央情报局总该有些事情需要保密吧！如果有些问题你觉得难以回答的话，你可以不予以回答，这里没有人会因此而责怪你的。”科尔比立刻明白了副总统的弦外之音。显然，副总统不赞成科尔比用这种方法来摆脱困境，而是希望他采取中情局传统的方法，以国家安全利益为借口，回避和阻止别人对中情局的深入调查。但科尔比不愿按照他们指定的调门去应付调查，他简单地向洛克菲勒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尔后，他继续如实地回答洛克菲勒委员会向他提出的一切问题，而且他还详细地把所有阴谋勾当都说了出来。但他又一再强调说：“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央情报局已变得更聪明了。”科尔比希望人们能以向前看的态度对待中情局的“陈年旧账”。

1975年6月6日，洛克菲勒委员会提出了第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

主要针对赫什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指控中情局侵犯人权、在国内从事非法活动的文章作出回答。报告中这样写道：“特别委员会详细分析了许多事实后确信，中央情报局在国内从事的绝大部分活动符合其章程规定。在过去的28年中，中央情报局确实也做了一些应当受到指责的事情，从法律规定和公众利益出发，绝不允许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过，中央情报局在过去所做的该受指责的事情中，责任并非全在中央情报局的身上，有些是在美国总统直接或间接授意下进行的，有些是国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权后，中央情报局在行使职权时分不清合法与非法之间界线的情况下造成的，但有些则完全是中央情报局违法和侵犯人权的行动。而在1973年和1974年这两年中，中央情报局没有再发生类似的非法行动。”

在谈到中情局暗杀外国领导人的阴谋时，报告是这样陈述的：“特别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开始调查后不久，人们指责中央情报局参与暗杀某些外国领导人，这件事引起了特别委员会的重视。尽管特别委员会对是否有权调查暗杀事件并不明确，但仍询问过这件事，总统也同意我们的这种做法。鉴于时间紧迫，特别委员会无法对这件事作全面的调查。总统要求特别委员会把所了解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交给他，现在已经照办了。”

从这份调查报告中不难看出，白宫一方面想把中情局暗杀外国领导人之事掩盖起来，另一方面，惟恐美国在国内外舆论面前招致更大的被动不得不逢场作戏地指责一番。

科尔比看过这份报告后感到十分欣慰。不管怎么说，报告毕竟证实了科尔比在赫什的文章发表后与福特总统讲的话都是实话——在他担任中情局局长的日子里，中情局没有再发生过赫什所揭露的那类非法勾当。

国会调查，报界讨伐

就在白宫宣告成立由洛克菲勒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后不久，1975年1月21日，参议院成立了一个调查中情局活动的委员会，由参议员丘奇任主席，也称丘奇委员会。一个月后，众议院不甘落后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委员会，由众议员派克任主席，也称派克委员会。

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参众两院的一些议员死死咬住“水门事件”以及中情局在国外进行暗杀颠覆活动、在国内从事侵犯人权的邮检、窃听等违法活动的问题，在国会和新闻媒介中大张旗鼓地抨击中情局“卑鄙无耻的行径”。在一片叫骂声中，科尔比焦头烂额，中情局更是声名狼籍。尤其是丘奇委员会一马当先，不留情面，大揭中情局之短，大摆中情局内幕，他们甚至把中情局对苏联进行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绝密内容也端出来示众。丘奇参议员本人毫不掩饰自己准备竞选1976年或198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野心，他把国会对中情局的调查看作是自己参加总统竞选的跳板，想从美国公众和政界对中情局丑闻的震惊和愤怒中沽名钓誉；派克众议员也把这次调查看作是自己向上爬的千逢难载之机，拼命聒噪，生怕少捞政治油水。正因为如此，参众两院的调查委员会要求中情局向他们公开一切事情。当洛克菲勒委员会发表了调查报告后，这两个委员会竞相争夺中情局在国外从事暗杀活动的材料，而洛克菲勒委员会已把这方面材料交给了福特总统，由他亲自保管。可是，掌握这些材料的福特总统在白宫为《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和高级编辑举行的一次午宴上说漏了嘴，提到有关中情局暗杀活动一事，声称这是关系到国家的最高利益，应当保守秘密。然而，事与愿违，消息迅速传播出去，风起云涌，推波助澜，国会和报界的调门就更高了，追究暗杀活动的呼

声一浪高过一浪。

尽管洛克菲勒委员会在报告中苦心积虑地使用各种巧妙语言，但毕竟承认了中情局确实从事过暗杀外国领导人的阴谋，这是官方第一次承认这件事。1975年6月5日，就在洛克菲勒公布报告的前一天，《纽约时报》抢先刊登了有关中情局从事暗杀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其中的一些素材取自一年前中情局局长科尔比向国会负责监督中情局活动的小组委员会披露的内幕情况。参议员丘奇和众议员派克对此事紧追不舍，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这两人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各自拼命寻找耸人听闻的东西，力求“轰动效应”，其中任何一方若占据了报刊的头版头条位置都必然招致另一方的眼红。此时的科尔比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三天两头地跑到调查委员会那里去作证，人家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主动合作，“态度诚恳，光明磊落，决不保留”。基辛格有一次当面讥讽科尔比说：“你现在哪里是去国会作证，分明是去‘忏悔’！”

“水门事件”后，国会成功地迫使尼克松总统在民众的唾骂声中下了台，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现在还保持着当时“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激情。面临这种形势，福特不得不小心翼翼，他已经没有第二条道路可选择了，只有开诚布公地对待公众所怀疑的任何事情。6月10日，福特被迫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将把洛克菲勒特别委员会交来的材料连同其他有关材料向参众两院的调查委员会提供方便……所以不可能存在捂盖子的事情。”福特嘴上是这样说的，可实际上他对派克委员会提出看文件审材料的要求并非有求必应。他始终持谨慎态度。他曾多次征求司法部长的意见，只要司法部长认为不必满足派克的要求，福特便断然拒绝派克方面的要求。后来，派克委员会内部产生矛盾，因此闹翻了，从而成全了白宫和中情局，科尔比总算从大审判中逃了出来。

根据1975年调查报告显示，从1961年起，中情局在世界各地进行了约900次大的破坏行动，几千次规模不等的破坏活动；在150个国家和地区从事间谍活动。虽然这些数字未必准确，但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1975年春，负责科学和技术事务的中情局副局长卡尔·杜凯勒告诉科尔比，在他管辖的很少使用的地下仓库里发现了几瓶足以致人于死命的东西——11克水生贝类动物毒素和少许眼镜蛇毒素，还有用以注射这些毒素的有关器材，包括一支发射毒针的枪和其他器械，“保留这些东西无疑是不合适的”。1970年，尼克松为履行一项条约的规定，曾下令销毁所有这类毒物，只保留一定的数量供研究使用。杜凯特提到的那些毒物足以杀死成千的人，显然超过了研究用量。经查明，原来是一个中级官员当初出于好奇心，认为这些毒物的潜在价值很大，而且制造成本极高，因此没有销毁，就地保存起来。后来那个官员退休了，他的后任以为这些毒物是经过上级批准的，也没有理会。由于科尔比再三要求局内各部门彻底检查和报告有问题的事物，因此才发现了这些东西。科尔比立即主动向白宫和国会调查小组作了报告，以表明自己和中情局“襟怀坦白”。

然而，丘奇委员会马上抓住这个绝好机会，于9月6日举行了首次公开听证会，将科尔比召来，让他在众多的电视摄像机前讲述来龙去脉。前来猎奇的议员和记者们根本不听科尔比的解释，蜂拥而上，争着摆弄那支注射枪，拍一张手拿杀人工具的照片。其中有人把注射枪摔到科尔比面前的桌上，准备拍下科尔比手拿注射枪的镜头，这时中情局的罗戈文冲上前来，一把夺下

注射枪，并用身体挡住科尔比，总算为他解了围。此时会场上乱作一团，简直闹翻了天……从那天以后，报纸纷纷报道说，科尔比在中情局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科尔比本人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年来，他遭到白宫的多次申斥：没有在当初就明确否认赫什的失实之词：把有关赫尔姆斯的材料交给了司法部；对洛克菲勒委员会过分热心帮忙；没有抵制每一次的国会调查；特别是国会要注射枪就积极送过去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房顶差点都揭了盖。似乎是为了配合这一声势，在街头上到处张贴着这样的漫画：扑克牌的黑桃A中挂着科尔比的头像，旁边写着：越战杀人犯。

11月2日，福特正式通知科尔比辞职。科尔比回绝了福特提供的充当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的安慰性职务，准备在第二天离开中情局。副局长沃尔特斯从中进行斡旋，请求白宫继续让科尔比留任3个月。因为当时的接任者，美国驻中国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正在北京为福特访华作准备，并在其访华期间充当福特总统的陪同；此外，在布什宣誓就任中情局局长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国会的调查进入了最高潮，中情局必须要有首脑出面。于是，福特总统又面请科尔比留任，并应科尔比的要求向报界声明，在过渡时期，科尔比拥有中情局局长的“全部和充分的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科尔比对国会的调查很合作，但他并非毫无保留。作为统管美国各情报部门的中央情报主任，他特别小心地保护国家安全局，使调查只能局限于询问其表面上的工作，而不触及它的实质业务。正如科尔比所说，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产品是“美国的秘中之秘”。它所破译的密码和截取的通讯情报，数量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局外人的想象。

1976年1月，派克委员会那份由于内讧而尚未完成的调查报告被泄露给报界。白宫方面勃然大怒，福特、基辛格和科尔比向派克和众议院强调，这一泄密事件直接损害及美国的安全利益。因为前不久，中情局驻雅典情报站站长里查德·韦尔奇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被3个来历不明的人杀害，就是因为被那些反中情局的人公开点明了特工身份而招致的后果。1976年1月29日，国会终于同意，未经白宫方面审核，任何人不得公布派克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这样一来，福特就转向了主动。2月17日，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必须停止对我们情报活动的不负责任的揭露，公开性是我们民主社会的标志，但不应危害国家的安全利益。正如美国公民不希望把国防部的秘密作战计划公布于众一样，我认为他们也不希望让真正的情报秘密被人揭露出来。”喧嚣一时的调查风波终于渐渐平息下来。

不久，国会通过一项特工身份保护法的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政府部门的现职或退休人员未经批准而公布特工的身份，将判处10年监禁和5万美元罚款；记者和其他人员则判3年监禁和1.5万美元的罚款；即便这些被披露的身份出现在公众也能得到的情报资料中。这项法案实际上是和平时期的一种新闻检查。

死猪不怕开水烫

就在美国国会调查中央情报局活动历时一年的时间里，有一个人是最吃苦的，他就是前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因为国会所调查的有关中情局的大部分非法行动和丑闻都发生在他当局长的任期内。科尔比向司法部和国会交出的材料，实际上就等于把赫尔姆斯交待出去了。这倒不是科尔比有意出卖赫尔姆斯，对于科尔比来说，赫尔姆斯是他的恩师，他之所以当上副局长，尔后又晋升局长，实在是仗赫尔姆斯的提拔。凭心而论，造成如此轩然大

波，这是科尔比当初始料未及的。但是，面对国会和司法部的追问和调查，赫尔姆斯与科尔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赫尔姆斯只是谈及一些已经由科尔比交待出去并且被国会公布于众的事情，再深入追问，他就缄默不语了，特别是涉及到秘密行动中参加者的具体人名，他是一问三摇头，“守口如瓶”。作为驻伊朗大使的赫尔姆斯，三天两头坐飞机回美国接受调查，至少作证 13 次，“屁股都快磨破了”。赫尔姆斯和科尔比成了国会调查的两名重点对象，今天你来，明天我到，这出二人转足足唱了大半年。

赫尔姆斯这种豁出去的态度终于激怒了国会和司法部的调查大员们，由此触发了对于赫尔姆斯犯有伪证罪的调查。1977 年，在美国政府对赫尔姆斯提起公诉的第 77 ~ 650 号刑事诉讼案中，他被指控犯有轻微罪行，罪名是没有“完全和充分地”提供证词。丘奇委员会那时正在对尼克松当政时期中情局在智利的秘密活动进行调查，对此，赫尔姆斯没有要求申辩，最后的判决是罚款 2000 美元，两年监禁缓期执行，并接受法官的训示。那位法官指责他在公开审理时有“不名誉”的行为。赫尔姆斯的辩护律师则声称“我的委托人会把这种判决当做荣誉的象征，如同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赫尔姆斯昂头挺胸刚要表现一下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但律师悄悄告诫他：“息事宁人，见好就收！”于是，赫尔姆斯低头躬腰，接受了判决。

有许多人认为这种判决不尽公平：赫尔姆斯是在保守机密，不让总统授权执行的秘密行动传到没必要知道的人那里。散发机密情报，有一条基本准则，那就是看接受机密的人从工作出发是否真的有必要了解它。有无必要知道，是绝对的衡量尺度。从总统到历任中情局局长常常没必要了解到细致入微的地步，没有必要知道情报来源是准，也没有必要知道所采用的是什么技术，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

判决结果一公布，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肯伍德乡间俱乐部里，400 名退伍情报军官全体起立，对到来的赫尔姆斯表示欢迎。两个纸篓里塞满了现钞和支票，准备替他交纳 2000 美元的罚金。这一下又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弄得司法部好不尴尬。最后的结局是不了了之。

1983 年 10 月，里根总统授予赫尔姆斯国家安全奖章，以此为他恢复名誉。

其实，中央情报局从事的所有不法勾当都是奉旨行事，都是总统的意思，明知违法也得干。赫尔姆斯在“猪湾事件”期间，从肯尼迪家族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肯尼迪家族要的是最后结果，不问手段和途径。他们想要卡斯特罗消失——见上帝，可他们嘴上从来不直接说这样的话。如果当时身为行动副局长的赫尔姆斯说办不到，那他就下台吧！不过，每当隐蔽行动遭到失败或被揭露的时候，中情局毋庸置疑要成为替罪羊。其缘由并不难找：进行隐蔽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官方承担责任。因而，一旦计划败露，白宫就装聋作哑或百般抵赖。50 年来，美国总统亲自为隐蔽活动承担责任的事例只有一、两起。为总统当好替罪羊，这是中情局局长的本份。说到底，在丑闻和非法活动的责任上，局长比起总统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米粒对西瓜。

70 年代美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对中情局的秘密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50 年代 ~ 60 年代，隐蔽行动在中央情报局占了 54% 的预算；到科尔比下台时，预算下降到 4% 左右。直到 80 年代初，这种趋势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三十九、“肃鼠行动”

“守护神”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被科尔比赶出中情局的詹姆斯·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生于1917年，母亲是墨西哥人，父亲是镇压墨西哥革命的美国军官。

1945年杜鲁门总统解散战略情报局以后，安格尔顿是战略情报局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安格尔顿在中情局内是个传奇式人物，神秘色彩浓厚。他是个瘦高个，瘦得像一具干尸，身穿黑色的丧服。他性格内向，喜欢对提问题的人反问。他还曾赢得种植兰花的桂冠，而兰花是每7年才开一次花，可见此人具有超常的耐心。有一次，一位官员应召去他的办公室，发现他蜷缩在一间密室里，窗户上蒙着漆黑的窗帘，没有一丝光亮。“安格尔顿本人正在刺眼的灯光下阅读文件……我仿佛觉得我去了一个不能对任何人讲的地方……这种感觉整整一天后才消除。”

安格尔顿投身谍报事业受父辈影响很深。他父亲就是情报局派驻意大利的军官。他本人在中情局最初的工作也始于意大利。他在阻止共产党取得大选胜利的秘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安格尔顿从50年代起负责中情局反间谍处的工作。50年代中期，他和哈维在揭露原子间谍案和菲尔比间谍案中有所贡献，从此声名显赫，成为中情局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掌管着大量经费，可以不受约束地在全世界开展他的反间谍活动；他可以敲门就径直走进杜勒斯局长的办公室面陈工作，副局长赫尔姆斯对他也很放手，他成为中情局的第一“守护神”。

安格尔顿是“怀疑一切”的代表人物，其观点常常令人感到怪异。例如，他认为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裂痕是一种假象，中苏分裂是麻痹西方的诡计……科尔比与安格尔顿为此长期争论不休，这是他们之间矛盾的渊源之一。自杜勒斯到施莱辛格，中情局局长们对安格尔顿都很垂青，对他那套玄虚神秘的迷宫理论也很感兴趣。

1960年，克格勃高级官员、苏联驻赫尔辛基大使戈利钦投奔中情局。负责接待和询问他的就是安格尔顿。月复一月，安格尔顿组织力量突击准备西方各国情报专家赴美向戈利钦各取所需。收获是很大的，英、法、西德等国根据戈利钦的指证及其提供的明确线索挖出了几十个隐藏很深的苏联“鼯鼠”。到了1963年，戈利钦提供的线索日益朦胧，搜索范围越来越宽，根据他“该打扫门槛了”的建议，安格尔顿于1965年开始在美国和西方情报界展开了一场“肃鼠行动”，意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清查苏联间谍。在这一秘密行动中涉嫌的特工人员达数十名，他的“火眼金睛”冤枉了不少人，甚至牵连到一些西方盟国情报机关，与他抓到的真货相比，实在是过大于功。许多人评价他“徒有虚名，自作聪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说他是“中情局里的麦卡锡”。前中情局局长科尔比坚决将他赶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怀疑一切”，使中情局背了一屁股冤、假、错案，弄得局内外怨声载道，人人自危。

然而，支持安格尔顿的人说，正是由于他的敏锐，才创造了中情局历史上反渗透成绩最好的时期，任何情报机构都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他是中情局的老警卫。

以下择要介绍几位被安格尔顿视为“苏联间谍”的美国间谍，从中可以对中情局的秘密活动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保罗·加布勒

保罗·加布勒 1918 年生于美国的纽瓦克市，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波兰移民。二战时期，加布勒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在太平洋战场参加过 35 次俯冲轰炸任务，获得过 11 枚勋章和奖章。50 年代初转入中情局，1952 年在西德情报站工作；1956 年任中情局驻瑞典斯德哥尔摩情报站副站长；1959~1960 年间到中情局兰利总部工作，任苏联处国外情报科科长；1961 年，他以美国驻苏使馆海军武官助理的掩护身份，出任中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第一任站长。

从苏联归来后，加布勒本来应该仕途亨通，然而他却在 GS—16 的工资级别上搁浅，并连续 14 年未得到提升，原因是他已经成了由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领导的美国情报界内“肃鼠行动”的怀疑对象。1966 年 5 月，成为“肃鼠行动”对象半年后，加布勒突然被赶出中央情报局行动部，调到皮里营的该局训练学校出任教官。这一工作调动的真正含义，在中情局人员内部是心照不宣的，但加布勒却一直蒙在鼓里。不久，这名曾经在中情局极有前途的“情报才子”又面临两种选择：或是去几乎没有战略意义的加勒比海一个小岛——特利尼达情报站工作，或是退休。上司的态度十分严厉：想好后，马上出发或即刻“开路”——退休滚蛋。已经 55 岁而且有一个极需钱上大学读书的女儿的加布勒，出于无奈，接受了新的任命。

1970 年初的一个夜晚，从西半球来加勒比访问的一位密友告诉加布勒，“他们认为你可能是苏联间谍”。加布勒这时才明白自己连遭厄运的奥秘。在以后的 18 个月中，因毫无根据地被怀疑而产生的烦躁和不安，使加布勒什么也不想干，实际上中情局总部也没有交给他任何必须完成的工作，而且他的位置不久就由另一名官员所替代。令加布勒气愤和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人证实告诉他上级对自己的怀疑；为什么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形式的审讯；为什么既不停止自己的工作，又不让他干任何具体事情。

其实，加布勒所不知的是，对于安格尔顿等人搞的“肃鼠行动”有许多人持反对意见。局长科尔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有关加布勒的问题档案中明确写上了自己的否定意见，强调指出“加布勒是忠诚的”。

1973 年，在科尔比的干预下，加布勒被任命为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3 年后，他任职期满回到华盛顿，准备提前退休。不知何故，他的退休申请被返回。直到 1977 年加布勒在情报界效力满 25 年退休时，他的工资标准仍停留在 GS—16 的级别上。

此时，安格尔顿和热衷于“肃鼠行动”的其他一些人陆续离开了中情局，反间谍处也换上了新的领导人，卡特的心腹特纳出任中情局局长。加布勒认为昭雪的时机已到，他毫不迟疑地给特纳局长写信，要求重新审查自己的“间谍嫌疑”问题。就在正式退休的前 3 天，加布勒接到局长的答复。特纳肯定地指出，加布勒是被“臆想出来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遭指控”的受害者。这位新局长向加布勒表示“诚挚的歉意”，并许诺将尽他个人所能，帮助加布勒获得由于 14 年来工资一直停留在 GS—16 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全部补偿。

加布勒作为中情局的正式成员的最后 3 天，是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度过的。他向国会讲述了自己 14 年来的遭遇以及“肃鼠行动”对美国情报工作造

成的损失。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以个别案例的形式，决定给加布勒“一大笔钱”，以补偿他 14 年来的损失。退休后，加布勒一直在亚利桑纳州搞房地产投资生意。

瓦西亚·哥米尔金

哥米尔金的祖籍是白俄罗斯，1926 年出生在中国的新疆。其父是沙皇派驻新疆的特使，“十月革命”后，他与白俄军队一起回到俄罗斯，后又来到中国，并成为经营石油、黄金和皮货的国际商人。1932 年，新疆各宗教派别间爆发混战时，只有 6 岁的哥米尔金和他的母亲、姐妹和兄弟企图越过沙漠戈壁逃离那里，但被土匪扣为人质。直到两年后，其父用重金将他们赎出，才结束了囚徒般的生活。1934 年，哥米尔金的父亲被苏联红军逮捕后处决。

哥米尔金经过百般努力后，终于来到美国，并成为其公民。二战中，他参加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区充当俄语翻译。1951 年，他加入中情局后，他流利的俄语和中国普通话引起了上司的注意，于是他被分配到苏联处工作。1956 年，哥米尔金以使馆政治事务专员的掩护身份到日本东京从事秘密情报活动，并成为第一位被允许直接与苏联外交官接触、与克格勃官员同桌对饮的中情局秘密行动官员。此前，这类行为在美国情报界是绝对禁止的。

在日本，哥米尔金抓住机会，及时给克格勃在东京的一位“居民”设下了“爱情陷阱”。他的手段是：先租一套公寓，在街头雇一名妓女，然后就安排这位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每周到那里“消魂”一次。不知内情的克格勃特工真的与妓女“相爱”了，并开始每天都来幽会这位拿中情局工薪的“情人”。哥米尔金对他们接触的全部细节都进行了监视。这对“情人”一直“相爱”了 3 年，在此期间，哥米尔金则通过那位妓女获得了大量价值颇高的“枕边情报”。

1962 年，哥米尔金被派往巴格达，担任那里的情报站副站长。1966 年，他亲自招募了一名克格勃女官员。她是以设在巴格达的苏伊文化交流中心负责人为掩护身份的另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妻子。哥米尔金冒着个人风险，将这名女特工和她的两个孩子偷运出伊拉克，最后送达美国本土，使她成为美国情报界了解克格勃内幕的又一窗口。

除策反苏联间谍外，哥米尔金在伊拉克还获取到数百份苏联军事技术手册，其中之一讲述了苏联新式战斗机上安装的最先进弹射器的一种高科技，这是中情局很长时间就想得到的；另一本则讲述了苏联解冻设备的技术细节，此技术的获得，使五角大楼节省了数千万美元的研究费用。克格勃也曾企图招募哥米尔金，但他都巧妙地摆脱掉了。

在伊拉克期间，哥米尔金的“成果”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中情局兰利总部的最新情报简报上，总部也经常向他发去“肯定英雄业绩”的表扬电文。当他回到华盛顿时，人们普遍将他视为英雄。当时的苏联处处长戴维·默菲长时间地握他的手，对他在巴格达期间“十分出色的行动”，表示衷心的祝贺。根据哥米尔金的业绩，他本应得到提升，并被授予勋章。中情局官员对勋章的渴望，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虽然它仅仅是一种象征，标志着一个人工作出色、事业成功。但若没有这枚勋章，则暗含着许多内容，人们会因此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职务的提升也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标志。然而，中情局的这位英雄奉命回到总部后，既没有得到勋章，也没有被晋升，在原职上竟然一直呆了 12 年。

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和苏联叛逃者戈利钦指控他为苏联间谍的唯一根据是，他的祖籍是苏联，以及他多次与克格勃官员打交道。当“间谍嫌疑”的印章盖在哥米尔金的档案上后，他的情报生涯也就完结了，不得不从中情局全职特工的位置上退下来。但是，退下来的第二天，中情局竟以“自由契约特工”的方式，让哥米尔金重新“加入”该局，使其得以继续为美国的情报事业效力，直至正式退休。由此也可以看出哥米尔金在中情局苏联处的重要作用。

奈莱德·迪克·科维克

科维克于1926年12月1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座小城希宾。父亲是不懂几个大字是塞尔维亚矿工；母亲也是塞尔维亚人，却受过一流的教育，她对小科维克进行家庭教育，将自己掌握的历史和语言知识传授给儿子。科维克的父母在一战结束后移居美国。

1944年，正值二战最关键的时期，18岁的科维克高中毕业。他参加了美国海军，不久被派往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但他“不愿在战时将时间浪费在读书上”，要求到前线参加战斗，所以科维克被空投到南斯拉夫，后又调到冲绳岛，成为三级无线电发报员。

复员后，科维克再次进入威斯康星州大学学习。这次他攻读的是俄罗斯与国际关系学。在这里，他的导师发现了他的才华，并将他推荐给中情局。他的语言才能令中情局的招募人员大为吃惊。1950年10月，科维克成为中情局苏联处的正式雇员。

在短期速成训练中，科维克学习了侦察、反情报、固定情报交接点的使用，接头信号的传递、密写技术等基本间谍活动技巧。随后，他便开始独立进行工作了。1953年，他奉命来到欧洲，负责间谍的招募、训练，并以各种方式向东欧和苏联派遣特工的工作（例如使用潜艇、橡皮船、商船、气球飞渡和空投等）。

1954年，科维克调回华盛顿，成为中情局苏联处主管叛逃者事务的D科副科长。1955~1958年，他又调入苏联处的SR—9部门，参加了旨在招募友好国家人士为中情局效力的“第三国籍人士”计划。他不仅亲自征招外国公民充当中情局的间谍，还训练他们如何进行秘密特工活动。在此期间，他每年平均到欧洲执行招募和训练任务多达8次以上。例如，1956年1月，他被空投到挪威，训练了挪威外交官英格堡·利格伦。利格伦来到莫斯科充当了中情局在那里的秘密间谍邮差后，科维克又完成了数次相同的任务。1958年1月，他飞到巴黎，帮助那里的中情局情报站站长盘问并成功地招募了一名苏联人，而后控制这名间谍为美国效力达数年之久。

科维克的成功，受到包括安格尔顿的赞赏。1958年6月科维克结婚时，安格尔顿还专门送去鲜花表示祝贺。科维克在中情局的事业十分成功，同事们都认为他的前途远大。

然而，自1965年8月开始，他却成了美国情报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肃鼠行动”的受害者。对他的间谍嫌疑，直到1980年才彻底撤销。在此期间，他的家庭和办公室的电话被窃听；外出时，总有“神秘的人物”跟踪；他的工资标准停留在GS—14级别上长达15年之久。1966年5月，他被要求暂时离开苏联处，到中情局设在珍珠营的一个训练基地担任教官，教授年轻的中情局雇员招募和控制苏联间谍、非法入境者和叛逃者的技巧。1970年，极为赏识科维克秘密行动才能的中情局行动部许多处室的领导要求科维克到他

们的部门区工作，但一直未获批准。同年，他被召回华盛顿，担任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联络人。这样的安排旨在使科维克不能离开市区，便于监视。

自 1974 年起，科维克先后写信给几任局长，希望重新审查自己的“间谍嫌疑”问题，并要求得到经济上的赔偿。尽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秘密小组委员会在 1978 年 6 月 19 日就倾听了科维克的陈述，但直到 1981 年春，这位最优秀的秘密特工才得到彻底平反：他获得了勋章，还得到了高达 6 位数的经济补偿金。

科维克退休后，他和夫人生活在南卡罗莱纳州自己的家里。尽管旧日老友不时前来，但他除打打高尔夫球外，不再谈论过去的一切，也不过问其他事情。

英格堡·利格伦

英格堡·利格伦是挪威情报局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女间谍。50 年代曾以“第三国籍人士”的身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

利格伦生于 1915 年，虽然容貌平平，但天资聪颖，勤奋努力。中学毕业时，利格伦的各科成绩均为全班第一。

二战爆发后，在德国占领挪威的最初几个月里，利格伦就为挪威抵抗组织做情报工作。后来逃亡到瑞士。战后她加入了挪威情报局。

利格伦在大学学习时，就表现出超人的语言天才，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俄语和波兰语的考试。参加情报局后，很快成为挪威情报局长威尔艾尔姆·伊温格最信赖的秘书兼翻译。她曾经被派往西德，指导那里的挪威军队的秘密行动，并曾在挪威北部边界地区与苏联人合作，完成过特殊使命。

50 年代后期，由于奥斯陆和华盛顿的情报关系合作，使得北约各国接收到苏联科拉湾海军基地的无线电通讯；在挪威北部边境地区，美国设有一些极为灵敏电子设施，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英国通讯指挥部共同管理着那里的一些监听站，其中之一位于靠近苏联北海舰队活动区的瓦德瑟（一旦发生冲突时，苏联北海舰队将从那里出发）；挪威和美国还共同管理着位于挪威北部专门为 U—2 型侦察机提供加油和着陆服务的地面设施。此外，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逐渐加强。

不久，中情局苏联处向挪威提出需要一名“低级间谍”到莫斯科帮助工作，利格伦被理所当然地选中了。她聪慧、能讲俄语，并热衷于中情局赋予自己的间谍“中间人”的特殊使命。1956 年 1 月 8 日，中情局年轻的、精通数国语言的秘密行动官员理查德·科维克奉命抵达奥斯陆，开始对利格伦进行特殊的技能训练。两人合作得十分默契，科维克坚信利格伦必能成为中情局杰出的“邮递员”。不久，利格伦到挪威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大使名义上的秘书，她的真正任务是以“第三国籍人士”的身份，秘密为中情局工作，她在中情局档案中的代号为“椴木—37”。

来到莫斯科不久，利格伦就成了克格勃的招募对象，但苏联人并不知道她已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工。苏联情报机关先派出了一名叫赫尔加·格雷琴科娃的莫斯科大学 21 岁的女学生与利格伦接触，目的在于摸清她是否单身、是否有同性恋倾向和是否感到孤独等情况。

1957 年春，利格伦买了一部轿车，但在第一次驾驶考试中却没有通过（克格勃有意做的手脚），这时潇洒大方、彬彬有理的费利普夫来到利格伦面前，主动提出要充当她的驾驶训练指导员。这位奶油小生实际上是克格勃派来的

一只经过特殊训练的“乌鸦”，专门勾引外国妇女，使之成为苏联间谍。

利格伦对克格勃的招募活动有清醒的认识，并及时将情况汇报给使馆的安全官员。在回到奥斯陆与科维克见面时，她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对克格勃对自己的招募行动。挪威情报官员和科维克都十分信赖利格伦，他们断定，平淡无华的外表和对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必然使利格伦终生不嫁，她肯定能抵御住任何男性的诱惑。利格伦果然不负上司和中情局的信赖，在与克格勃招募人员巧妙周旋的同时，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智，多次完成中情局交付的情报传递任务。她总能摆脱克格勃的跟踪，成功地将中情局计划送交苏联境内的美国间谍的信件，投进各个不同的邮筒，最后转到收信人的手中；她还经常将挪威克朗和美元兑换成卢布，秘密放入“死投点”，然后通知美国间谍前去提取；她经常以密写方式不断将自己的活动报告给伊温格局长和科维克，使他们一直了解苏联境内情报活动的进展情况。她的工作危险性极大，然而她却从不索取任何报酬，她要求得到的仅仅是“为自己信仰的政治制度效力后所产生的满足感”。利格伦的工作十分出色，在两、三年里，她几乎成了中情局在苏联间谍活动的中枢人物，而且一直没有被克格勃察觉。

1959年8月，利格伦在莫斯科工作3年后，回到奥斯陆，从事其他工作。这本来应该是她与中情局关系的结束，然而，5年后，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的安格尔顿以及他所信任的苏联叛逃者戈利钦，却捕风捉影地指控她是暗藏在挪威情报机构内部的克格勃间谍。利格伦因此受到审查。

1965年9月14日早晨，利格伦在上班途中被挪威情报与安全局警察逮捕。在被捕后的前3天，利格伦的直接上司挪威情报局局长伊温格一点不知她被捕的消息。尽管利格伦一再声明自己清白，还是于9月18日被关进布兰德特瓦德女子监狱，并不准保释。“利格伦间谍案”在报上公布后，轰动了整个挪威，在这个小国里成了头号新闻。

1965年12月10日，挪威情报与国内安全局局长布里恩正式向法院建议以“苏联间谍”罪对利格伦判刑，然而证据明显不足。12月14日，经过对安格尔顿和戈利钦提供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后，法官拒绝继续审理此案，同时宣布她无罪释放。经过3个月的审查和狱中煎熬，利格伦终于走出监狱，但她随即就失业了。

1966年1月28日，挪威议会成立了三人小组，对“利格伦间谍案”进行重新审查，再次确认她的清白。小组指出，对利格伦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1968年，议会以73票对63票通过了对利格伦误遭逮捕的补偿议案，她因此得到了3万克朗的补偿金。

“利格伦事件”的发生，极大地破坏了美、挪情报机构之间良好合作关系，为了与昔日的伙伴恢复相互信任与合作，1975年，接替安格尔顿的反间谍处处长乔治·克拉里奇做出了“慷慨”的决定：付给利格伦25万美元的补偿费，这相当于她自被捕之日到当时近10年的工资总额。克拉里奇还言明，如果她想多要，经中情局局长批准后，仍可得到满足。为此，中情局派出特使到奥斯陆，当面向挪威情报部门和利格伦本人道歉。此时个性更加孤僻的利格伦拒绝会见这位特使，只是通过挪威情报机构的接待人员向他表示：感谢中情局的慷慨，但拒绝接受任何钱财。

利格伦终生未嫁，退休后，她住进挪威南部的一所老人院，1990年病逝。

奥列格·潘可夫斯基

奥列格·潘可夫斯基 1919年生于高加索，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

其岳父是苏军上将。潘可夫斯基在苏联军事院校前后度过了10年学习生涯。在卫国战争期间，多次立功，曾获得5枚勋章和8枚奖章。

潘可夫斯基是苏军总参情报局（格鲁乌）上校情报官，对外身份是苏联国家科学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

50年代，潘可夫斯基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工作期间，多次寻找中情局、英国秘密情报局（主管情报搜集和分析）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并主动向它们提供苏联在中东的计划。由于安格尔顿的主张，当时的美英情报机关拒绝与他接触，特别是中情局多次将他拒之门外。中情局的秘密档案显示，潘可夫斯基的背景、他在二战中的经历、他与将军女儿的婚姻以及他在仕途上的步步高升都与一个叛变者“正常形象”大相径庭，反间谍处的安格尔顿坚持认为潘可夫斯基的表现是克格勃的阴谋，因此所有北约驻安卡拉的使馆都接到警告，拒绝这个上校的“顽固纠缠”。60年代初，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继续将成包的机密材料主动送给西方外交官，屡屡被拒绝。后来在一次招待会上，潘可夫斯基将一卷文件塞到一个加拿大外交官的手里，然后就离开了。这份文件经伦敦秘密情报局的专家鉴定，认为是真的，由此断定中情局对潘可夫斯基的判断有误，并指示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与其保持联系。1961年3月10日，潘可夫斯基告诉英国商人雷维尔·温（当时他率领英国商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说，他将率领一个苏联代表团赴英回访。他交给温一些文件和一封写给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的信。4月20日，潘可夫斯基在伦敦一家饭店与英美情报机构的官员会面，介绍苏联情况（后来在与潘可夫斯基会面时中情局配备了3个翻译官和18个安全保障人员）。在这次会议上，英国情报机构将潘可夫斯基移交给中情局。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使中情局震惊，几乎不相信它们会如此走运，然而，这一切又是不容怀疑的。从1961年4月到1962年秋天的16个月期间，潘可夫斯基提供了5000多份高度机密的情报资料。在中情局历史上，潘可夫斯基是迄今为止“最重要、贡献最大、情报价值最高”的间谍。

此时在华盛顿，中情局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它不能承认原来对潘可夫斯基的判断是错误的，否则将使中情局的身价暴跌，从安格尔顿到局长麦康很可能像杜勒斯一样被肯尼迪总统赶出中情局。潘可夫斯基在情报中详细报告了苏联导弹计划的技术数据，特别是有关洲际导弹的制导系统。它表明，苏联导弹的现状落后于它的发展计划，差距优势在美国一方。

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即报告肯尼迪总统。原因是：1.中情局的一些高级官员尚未被说服，主要是安格尔顿本人仍然坚持认为潘可夫斯基是冒牌货，他的态度在当时是左右中情局的；2.有些人担心这个消息会加强五角大楼鹰派的地位，有可能使他们关于先发制人打击软弱的苏联的主张占主导地位。麦康决定在适当的时机把这一情报提供给肯尼迪总统。

转眼到了7月，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准备工作开始紧张地进行。赫鲁晓夫的决策遭到一些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军方）的强烈反对，以至赫鲁晓夫不得不解除两名将军的职务，才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

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随即持以强硬态度，逼苏联立即撤出。就在古巴导弹危机进入高潮时刻，10月22日，苏联逮捕潘可夫斯基。这不但使中情局和肯尼迪完全认定潘可夫斯基的真实性，同时也给肯尼迪壮了胆：这是因为不仅肯尼迪确信美国掌握核优势，而且赫鲁晓夫获悉肯尼迪已经了解内情。在明了对手已看清自己手中底牌的情况下，谁还能继续

吓唬人呢！因此，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信说：“只有那些想毁灭自己的疯子和自杀的人才想摧毁你们的国家。”肯尼迪提出了交换条件：你撤走导弹，我不碰古巴。赫鲁晓夫点头同意，于是危机结束。

1963年5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公审潘可夫斯基，并判处他死刑。潘可夫斯基死后，中情局借私人名义为他树碑立传，出版了《潘可夫斯基遗墨》。据说该书是一本日记集，是潘可夫斯基生前写的，一直藏在他在莫斯科公寓的一个书桌抽屉里，后来被中情局的间谍找到，偷偷带出苏联。于是，潘可夫斯基便被吹成了“面对死刑判决，他表情坚毅，没有丝毫的惊慌和畏惧”，是“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想型间谍”。英国王室还煞有介事的授封潘可夫斯基爵位。然而，事实揭穿了这套把戏：《潘可夫斯基遗墨》原来是由前《生活》杂志撰稿人吉布和苏联叛逃者德里阿宾在中情局的授意下，根据英国秘密情报局询问潘可夫斯基时的录音写成的。树立“英雄形象”无非是玩弄宣传把戏，在死人身上榨油。

潘可夫斯基是苏联特权阶层的成员，而且家庭生活美满，个人仕途远大，可以说凡是他想拥有的已经都有了；他既不需求金钱，又不贪恋酒色，而且在他工作过程中，曾经十多次出国，却没有投奔西方，坚持在苏联国内“作战”，甚至在接到中情局的报警后，他还是临危不惧，拒绝逃到美国。这是为什么？

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潘可夫斯基反叛的动机莫衷一是。按照中情局的说法，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并在后期发现共产主义是个骗局”，从而使潘可夫斯基成为反抗苏维埃制度的异教徒。但谁都能看出，这种说法纯属反共宣传的需要，并没有真正揭示潘可夫斯基反动到底的内在联系。像他这种情况在世界间谍史上是一个很罕见的案例，值得研究。

安格尔顿并不认为自己对于潘可夫斯基的处理有误，他说：“当初对他的态度算不上是个错误，因为他没有经过考察，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但有人对此抨击道：“在1958年潘可夫斯基主动与我们挂钩时，我们像躲瘟疫一样回避他，直到1961年，他才发挥了作用，这中间损失的3年不正是你一手造成的吗？”

莱斯利·詹姆斯·班奈特

1993年7月初，加拿大政府的代表专程来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省的格莱内尔格，在一套朴素的住房里会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他保证渥太华很快会寄给他一张15万加元的支票，并解释说这是政府对他20年来蒙受冤屈的补偿。这位老人就是前加拿大反间谍部门负责人莱斯利·詹姆斯·班奈特。21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被抛弃、被怀疑的阴影之中。现在，总算有了结果，尽管补偿金数额不大而且来得太迟，但它却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标志着长期冷战恐怖史的结束。班奈特看着政府代表，倾听着他们的安慰之词，泪水随着几十年的甜酸苦辣夺眶而出……

班奈特1920年出生在英国的南威尔士南部一个穷苦的矿工家庭，二次大战期间曾在信号情报部门工作。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到澳大利亚，在那里结了婚。1954年，班奈特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并参加了皇家骑警队，由于工作出色，很快被任命为骑警队安全处处长。安全处是一个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的单位，主管侦察、确认和逮捕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苏联及其他国家间谍的工作。

班奈特的荣升似乎预示着他的未来前途无限，然而，他的结局却相当凄

惨。尽管班奈特发誓要忠于加拿大，愿意为自己的“第二个祖国”捐躯，上任后也确实为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做了许多工作，但事与愿违，由他亲自部署并指挥的几次捕谍行动相继程度不同地失败了。更糟糕的是，一些同行视他作为一名“外国人和外来者”，对他“未经努力就轻易得到了这么重要的职务”而心怀不满，加之班奈特“经常穿一身苏格兰呢制服，肘部还缝上个装饰性的大补丁，与身着鲜红警服、神采奕奕的骑警相比，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他在皇家骑警队中很少得到人们的好感和同情。当有风吹草动时，他自然最容易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班奈特的职务相当于他的美国同行——热衷于抓间谍的安格尔顿在中情局里的位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毁掉班奈特前程并拆散其家庭的罪魁祸首竟是安格尔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1961年，克格勃官员戈利钦投奔中情局后，便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安格尔顿讲述有关苏联鼯鼠的故事。他讲得越多越生动，安格尔顿就越信以为真，最后竟然到了无论戈利钦讲什么，安格尔顿都深信不疑的地步。为了追查戈利钦提供的线索，安格尔顿专门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全面展开了“肃鼠行动”。

班奈特的几次反间谍行动失败后，安格尔顿对其产生了怀疑，60年代后期，安格尔顿将手下人秘密获得的班奈特个人档案及其有关的全部材料送到戈利钦面前。戈利钦看过后说：“对，我认为这个人就是苏联间谍，而且是个关键人物。”后来，班奈特根据加、美情报合作协议亲自写给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更加深了这位反谍巨头对他的怀疑。班奈特在报告中说，被派到华盛顿充当两德情报机关与中情局联络员的一名西德特工在渥太华访问期间，班奈特曾问他在南美旅行时是否碰到过克格勃间谍，这名特工人员显得十分恐惧。中情局因此便开始对西德特工海因茨·赫尔实施了全面监视。数月后，赫尔到南美杰克逊洞穴游览区度假时，碰巧与两名克格勃间谍同行。安格尔顿手下的主要“捕猎者”佩蒂经调查分析认为，克格勃此举旨在陷害赫尔，“让我们相信赫尔不是好人”。安格尔顿因此断定：班奈特肯定是克格勃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环节”，“要不是班奈特事先暗示，我们绝不会知道赫尔的南美之行”。于是，赫尔事件触发了班奈特一案。

熟知此案的中情局官员回忆说：“安格尔顿指示说，一定要抓紧，把此案查清楚”。随后，安格尔顿利用各种迂回手段，例如与加拿大情报界高级官员聚餐，在狂饮暴食中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使他们相信美国对班奈特间谍嫌疑的指控。经过安格尔顿的“不懈努力”，加拿大警方终于决定正式对班奈特进行调查。1970年，皇家骑警队最高层经研究后，制定了旨在查清班奈特间谍活动的“铁夹行动”计划，开始对班奈特展开全面、细致的调查。从此，班奈特受到昼夜连续不断的监视：电话遭到窃听，卧室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器，家里和办公室内还被安装了隐蔽式摄像机。调查人员一直想弄清楚班奈特是如何与苏联人联系的。他们曾数次从班奈特的家中跟踪他到一个树林，并且每次都发现班奈特从车箱里搬出一只笼子。调查人员几次想走近去看看他究竟从宠中放出去的是什么，但怕打草惊蛇，未敢向前。由于树林枝叶茂密，空中监视也是不可能的。侦查人员只能隐藏在远处监视，等他把事情办完再进行跟踪。尽管不能确定班奈特究竟在干什么，但美国人的怀疑却深深印在了加拿大反间谍人员的脑海里，因此他们主观地推断：班奈特是在“放信鸽”，与克格勃进行联系，或是在传递情报。实际情况是，班奈特将

毁坏自己花园的黑松鼠抓住后，不忍心打死它们，便菩萨般地来到树林中放生。到 1972 年，仍没有获得班奈特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的皇家骑警队决定“逼蛇出洞”，开始与班奈特正面接触，连续对他进行了数天的严厉审讯。审讯人员提出的问题多种多样，为了显示对班奈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甚至描述班奈特与妻子间的性生活细节。至此，班奈特才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卧室早已被窃听、窃照。随后，班奈特被赶出办公室，并被告知他在反间谍部门的工作“结束”了。被开除后，班奈特在日记中写到：“一生的事业完蛋了，连妻子都遭到他们的诬陷，他们究竟想对我怎么样呢？上帝呀，救救我吧！”3 个月后，妻子忍受不了突然而且原因不明的灾难，与班奈特离了婚，独自带着他们的一对女儿去了澳大利亚。所幸的是，班奈特虽被撤职，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一直不足，因此未被关进监狱。后来，班奈特考虑到，既然在加拿大无法洗清自己的“间谍嫌疑”，何不移民澳大利亚，离自己的女儿也近一些。

定居澳大利亚后，班奈特一直住在格莱内尔格，靠微薄的政府津贴过着清贫的生活。直到现在，他仍然独身生活，去洗衣店洗衣服，买菜做饭都由自己动手。他一直极力保持着尊严，并不断鼓励自己不能被冤屈摧垮折服。班奈特多次上书加拿大有关当局，要求为自己正名。

对于班奈特是苏联间谍的指控，早就有人提出异议。1977 年，加拿大总检查长在议会上指出，证据证明班奈特确实是一个“忠实的加拿大公民”，然而他的话并没有洗刷掉班奈特的间谍嫌疑。

90 年代，新闻媒介旧案重提，他们发现了新的证据并对案件做了较为公正的报道。1993 年 3 月 30 日，加拿大的一家电视台在其节目中提供的新证据说，皇家骑警队中确曾有过一名接收苏联数万美元报酬的克格勃“鼯鼠”，他就是吉勒斯·布鲁纳特，而非班奈特。布鲁纳特也是骑警队成员，其父曾是安全局的第一任局长。布鲁纳特的生活穷奢极欲，经常到墨西哥旅游，1984 年 49 岁时去世。电视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总检查长道戈·路易斯就在众议院宣布：“我向班奈特和众院保证，加拿大政府确信班奈特从来都不是克格勃的‘鼯鼠’”。此后，成立于 1984 年并接管皇家骑警队反间谍指责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详细审查了保存下来的原始档案材料后，决定为班奈特“平反”。

终于洗清自己的班奈特事后通过加拿大电视台说，他对那些随便怀疑他人而对无辜者犯下罪恶的“罪犯”没有受到惩罚感到异常气愤。然而，他对终于洗清了自己的间谍嫌疑感到十分高兴。他说：“问题终于解决了，加拿大人民终于承认了我，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再也不必为洗刷自己而奔走呼号了。”

经安格尔顿“甄别”后，被怀疑为苏联间谍的人有不少，结果后来证明绝大多数都是错案。在肯尼迪遇刺后跑到美国的鲁申科，被安格尔顿定为假叛逃，由此蹲了 3 年多监狱（详情参见第二十四章）。甚至连中情局局长科尔比也被安格尔顿怀疑是克格勃打入中情局的头号“鼯鼠”。这下算是摸着老虎屁股了，科尔比清理门户，将他赶出了中情局。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特纳对安格尔顿那一套做法也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安格尔顿之所以能够无法无天，就是因为“各守一摊”的体制所致。

然而，间谍活动的危害是巨大的。弥补间谍造成的损失需要多年的艰苦努力和数十亿美元的代价。有时，间谍造成的损失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

如休斯飞机公司高级工程师贝尔仅仅为得到 11 万美元非报酬，竟将 F—15 主力战斗机俯瞰射控雷达、拖式反战车导弹、凤凰空对空导弹及隐密式雷达等机密设计图售予伪装成商人的波兰情报人员——马林·兹查斯基，这些资料后来送给莫斯科的克格勃。此案使美国数亿美元的研究成果顿时化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尤其是对国家的安全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据专家的初步研究表明，美国情报机构驻外特工网络以及在世界主要地区的电子窃听系统都曾遭到间谍的严重破坏。在国内公众的呼声下，美国国会在 80 年代通过了包括对间谍恢复死刑、对接触保密资料的 400 万政府雇员进行测谎器检验等一系列法规。

反情报专家指出，死刑不可能遏制间谍活动。当间谍认为一旦被捕可能坐牢，更不用说被处死时，他们就不会去执行秘密任务了；他们一般认为是不会被捕的。测谎器也不是追查隐蔽间谍的可靠工具，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完全可以使测谎器无效。要防止再度出现间谍年，仅仅依靠采取简单强硬的措施是不够的。逮捕和起诉间谍只能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反间谍机构的目标应是先期发现，事先遏制。只有在国家安全没有受到损害之前完成案件的侦破，这样才是反间谍工作的成功。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人认为安格尔顿的错误与成绩相比是“可以谅解和允许的”。

安格尔顿离去后，中情局反情报人员从 300 名减少到 80 名。安格尔顿建造的情报中心资料库按地理位置被分成了若干部分。据说获取出入证易如反掌。在美国情报机构接二连三地发生间谍案之后，专家们建议扩大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反情报职能，改善协调工作，以弥补国会抨击情报机构后所带来的经费压缩、人员裁减问题。然而，训练一支反间谍队伍至少要花费 4 年时间。专家们认为，迅速加强保密的最好办法是减少密级文件数量和接触密级文件的人数，同时严格政府安全检查制度和增加检查次数。但是据 1988 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分析，在安全方面仍有不少漏洞，例如，五角大楼每 5 年需要接受一次安全检查的人员多达 10 万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认为，目前“秘密材料太多，能接触秘密的人太多，间谍太多……而消除间谍威胁的努力则太少。”

